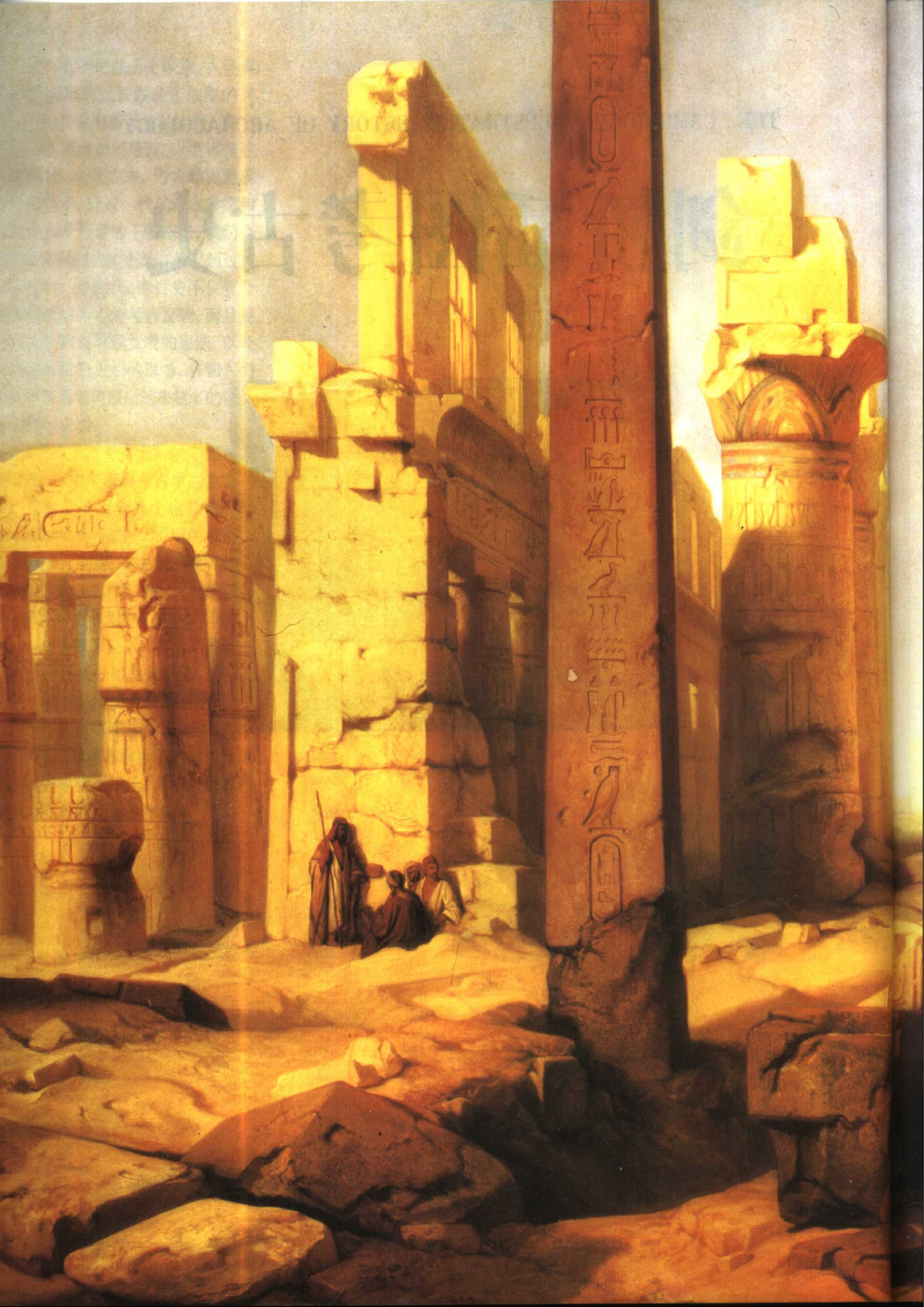
THE CAMBRIDGE ILLUSTATED HISTORY OF ARCHAEOLOGY

剑桥插图考古史

保罗 · G · 巴恩 主编 郭小凌 王晓秦 译





撰稿人:

保罗·G·巴恩 (Paul G. Bahn, 西欧旧石器时代部分)
吉纳·巴恩斯 (Gina Barnes, 达勒姆大学, 远东部分)
卡罗琳·伯德 (Caroline Bird, 墨尔本的特罗布大学, 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屿部分)
彼得·博古茨基 (Peter Bogucki, 普林斯顿大学, 中欧东欧部分)
菲利普·杜克 (Philip Duke, 杜兰戈的卢威斯堡学院, 北美部分)
克利斯托弗·斯凯瑞 (Christopher Scarre,剑桥大学麦克唐纳研究所, 西欧部分)
克利斯托弗·埃登斯 (Christopher Edens, 哈佛 大学, 近东、中亚、印度部分)
大卫·吉尔 (David Gill, 斯旺希大学学院, 古典世界部分)
约翰·霍弗克 (John Hoffecker, 阿尔哥国家实验室, 中欧和东欧旧石器时代部分)
克利斯托弗·米 (Christopher Mee, 利物浦大学,希腊和爱琴海部分)
卡萨利纳·斯赖伯 (Katharina Schreiber,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拉拉分校, 拉丁美洲部分)
斯蒂文·斯内普 (Steven Snape, 利物浦大学, 埃及和黎凡特部分)
安·撒克里 (Anne Thackeray, 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 非洲部分)

以及

克劳迪·科恩 (社会科学研究高等学院, 巴黎)
安德鲁·弗克森 (Andrew Foxon, 赫尔城市博物馆)
艾丽斯·基欧 (Alice Kehoe, 密尔沃基的马凯特大学)
卡尔·兰伯格-卡洛夫斯基 (Carl Lamberg-Karlovsky, 哈佛大学)
玛丽·安·莱文 (Mary Ann Levine, 马萨诸塞大学安摩斯特分校)

中文译者:

郭小凌 (序、前言、第1-6章、考古大事年表)
王晓秦 (第7-8章)
王铁军 (进一步阅读书目、图片致谢)

目 录

序

我们均由过去塑造而成，因而对过去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我发现的过程。由于过去是目前尚存的最后一块鲜为人知的大陆，其大片土地仍处在现代研究者的视野之外，所以每一次考古发掘都无异于是对这片尚未得到多少开发的广阔世界——我们自身和人类文化的起源——所进行的一次探索性考察，正是考古学给我们勾勒出了从现在通向人类形成的那个奇异年代的一些基本轨迹。

考古史是极为引人入胜的，它内含着无可数计的伟大发现：阿尔塔米拉的野牛群像和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作品；图坦哈蒙的陵墓和埃及法老传奇般的财富；复活节岛及其不可思议的"隆哥－隆哥"文字①。可以说地球上的每一块大陆和每一个地区，都拥有自己的考古学。由于这个学科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才使得我们首次有可能构建出真正的世界史，或者说真正的世界史前史。

本书的最动人之处就是它讲述的故事只是刚开了一个头儿，这是因为考古学虽然可以追溯到醉心于收集古物的古巴比伦君主那波尼德以及古罗马和中华帝国早期的古物鉴赏家那里，但它真正的开端一般认为还是在1859年、即人们认识到人类曾经拥有悠久的历史、其形成的年代要远远超出17世纪时由热诚的经院学者们所确定的公元前4004年的期限。这个认识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如同"探险家科尔特斯"在首次看到太平洋时仿佛望见了"鲜为人知的达连山②的山峰"一样，具有难以想象的、广阔的发展空间（就人类存在的时空范围而言）。如果我们把考古学看作是对人类历史的调查研究的话，那么这一认识的出现就标志着这个学科的真正诞生。

这个故事还在继续。当前众多激动人心的发现已不仅来自新的发掘，而且也出自诸如放射性碳素断代法和分子遗传学研究等新技术的应用，它们大大改变了我们研究和理解过去的能力。此外，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已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我们不只在重新发现过去，而且是在创造过去。因为从地下挖出来的各种史料自己不会直接说话，必须由人来解释它们，而我们正是它们的解释者。所以，在我们看来，"过去"尽管是建立在经考古学家的探铲挖出的全部伟大发现基础上的，但它在一定意义上仍然可以说是我们的创造之物。所以，考古学史是一部颇为复杂的历史，它不单讲述关于考古发现和新型研究技术的故事，还涉及到新的解释范式。我们虽然是由过去塑造而成，但我们实际上又通过考古实践在为我们自身创造着过去。因此考古学的历史乃是我们自我认识的历史。

理学博士、不列颠学会会员、文物收藏协会会员、
迪斯尼专聘考古学教授、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所长
剑桥大学基督学院院长

凯姆斯托恩的伦弗鲁爵士

①指刻在石板、木简等书写材料上的文字符号，当地人称rongo-rongo，至今未能破译——译者注。

②位于巴拿马——译者注。

前　言

“考古学”(archaeology)这个概念，目前在字面上的意思是指“对古代的研究”，它意味着对人类过去的遗存（从人类原始时期的用品到昨天刚丢弃的垃圾）所进行的调查研究。这个概念是由古希腊人无意中首先创造出来的，原形是archaiologia，意即对古代事物的讨论。它起初用来说明远古时期，比如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在位期间，有个哈利卡纳苏人狄奥尼修斯写了一部罗马史，自罗马起源写到布匿战争，书名便叫《罗马考古》。

然而，“考古学家”（archaeologist）一词则出现于公元1世纪，具有某种专门的含义。在希腊人那里，它指的是在舞台上通过哑剧形式再现古代传说的演员。但在后来，考古学家和考古学这两个词都销声匿迹了，一直到公元17世纪才得以重新出现。当时有一位热衷于收集古罗马遗物的里昂医生兼古物研究者雅奎斯·斯蓬（Jacques spon)，他不仅引用了“archaeology”（考古学）这个词，而且还用“archaeography”来表示同一个意思。但目前只有前一个词保存下来，成了国际通用的词汇。

说起来十分有趣，“考古学家”这个词曾被用来表示在舞台上手舞足蹈、展现古代传说的演员。事实上这个词的含义也没有多少变化。正像本书所描述的，现代考古学的活动大体可视为两个分头平行上演的肥皂剧。第一出剧包含考古学家自身，他们的不同个性、影响、友谊和关系，他们之间的竞争和敌视，当然也如同所有肥皂剧一样，还经常有人死亡，有新人物出现，从而把充满生机的新鲜气息注入剧情。剧中也有结党营私的现象，有权力集团和秘密结社，有高尚的圣人



长期以来，过分专注于过去一直被视为一种古怪行为，所以毫不奇怪，考古学的历史多同那些独立思考、常有奇谈异想的名士有关。这幅名为“罗马最优秀的古物收藏家会议”的讽刺画，系由18世纪罗马最著名的学者之一、画家皮耶罗·莱昂内·盖齐(Piero Leone Ghezzi)于1728年所作。显而易见，盖齐是与会者中最清醒稳重的人，他正在后侧做笔记。前面坐着的人是著名古物收藏家巴隆·封·斯托克男爵(Baron von Stosch)。

和卑鄙的小人，有令人厌恶者和为害乡里的恶霸，还有知情人和局外人。总之，生活中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可谓应有尽有。

第二出剧的内容是关于考古学家们对过去的认识，由于新证据的涌现或旧证据需要重新解释，加之考古学家们自身的个性、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等因素始终掺杂在他们的解释当中，所以这些认识在不断地更改。正像任何优秀连续剧中的情形一样，有突如其来的震惊，有错综复杂的剧情和转移注意力的闲扯。这是两出没有结局的肥皂剧，但它们都要求有一股川流不息、不断更新的活水——一些标新立异的人物以及一些惊世骇俗、极富魅力的发现——来保持观众的浓厚兴趣。如果没有观众，那它们就会处境困难，或许有被取消播映的危险。

第一出肥皂剧涉及考古学家及其个性，内容是完全真实的。第二出剧是叙述由考古学家们拼凑而成的过去，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构的成分。大多数考古学家力求客观地重现过去，努力想发现过去“真正”发生了什么，但在缺乏能够穿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机器的条件下，他们所能做出的最好成果仍是一种可以为人所接受的虚构故事——一种根据恐怕是无法验证的资料推演出来的故事。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即使是对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这是因为文字史料始终是主观性的，而且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但对于无文字可考的各个时期来说，考古学是我们得出一种有根据的猜测的唯一手段。

考古学家们的记述通常得到对过去所绘制的一些复原图样的说明和支持，近些年来我们已认识到，许多诸如此类的复原形象——如对尼安德特人之类不同的古人类化石的复原——不仅愉悦和教育了大众，而且在影响考古学论争和促使出现一些偏颇性的解释方面实际上也起了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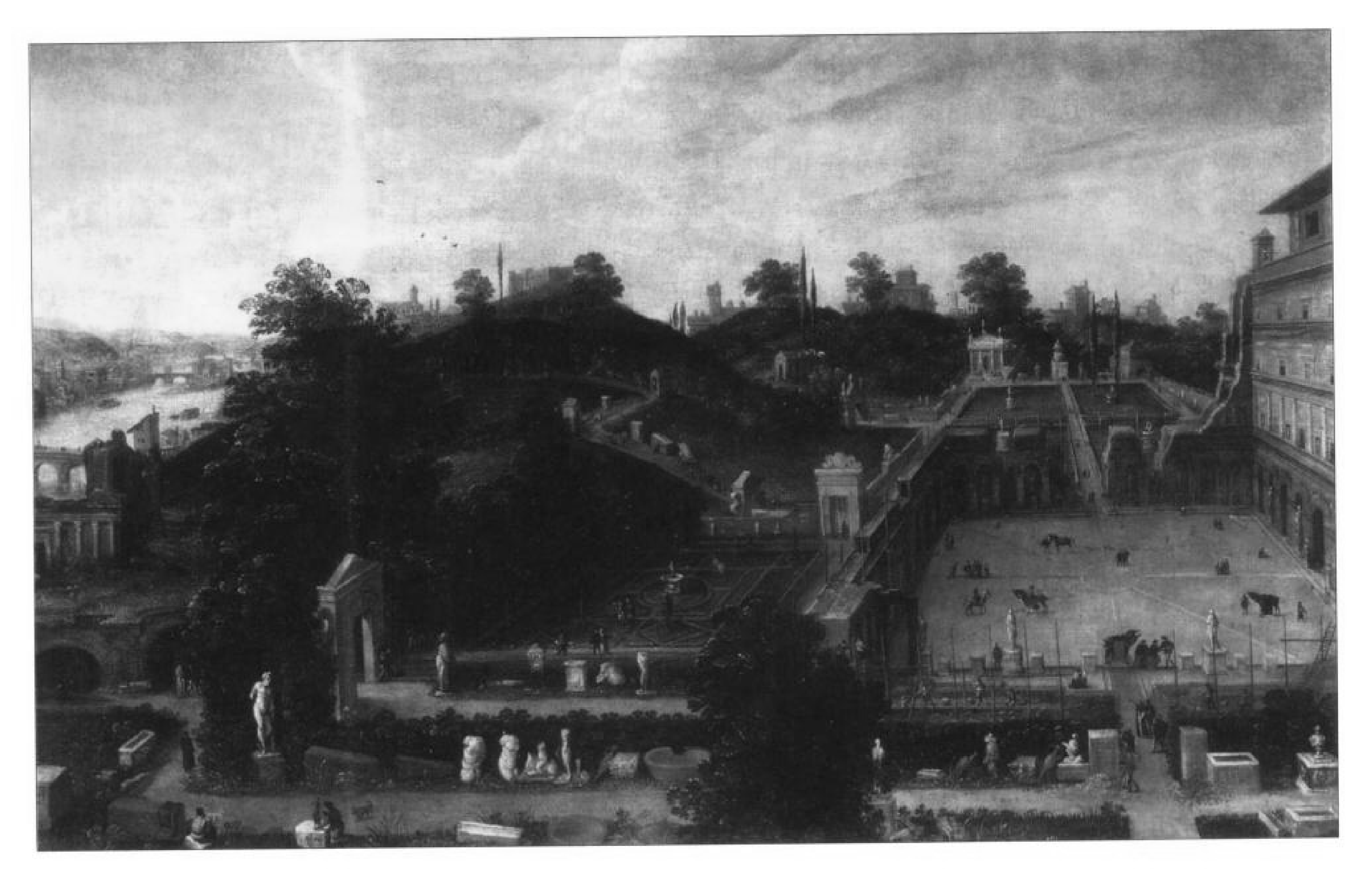
科学正是在“这种文学的偏颇”中，通过话语和视觉形象所表现的各个故事情节来展开自己的活动的，这种文学的偏颇允许一些传统神话占有它们的一席之地，在那里能看到富有感染力的词汇或栩栩如生的画面，它们比起白描式再现过去要更具魅力、更容易打动人心。例如，当小玛丽亚·德·索图奥拉（Maria de Sautuola）第一次发现位于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穴顶部的大型野牛画时，她并没叫喊“公牛！公牛！”假如她说了什么的话，她也会喊“爸爸，你看，牛！”在苏卢特（Solutre）所发现的群马被驱赶和滚下山崖的戏剧性画面，促使第一部关于史前史的长篇小说问世，但这部小说对那个遗址却始终没有给出真实的描述。在图坦哈蒙墓的入口处，卡那封（Carnarvon）问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是否能看到什么。卡特的答复并非是“是的，有各种令人吃惊的东西”。按照卡特个人的笔记，他的回答是：“是的，真是妙不可言。”前面那句著名的话其实是后来阿瑟·迈斯根据卡特的笔记写的。恩里克·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并不是因为小时候得到了一本带有烈火中的特洛伊城插图的书，从而激起了他寻找该城的欲望。他对这个题目的兴趣要到很晚才产生，行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也没有在迈锡尼的发掘现场向希腊国王十分匆忙地发出电报，称“我已看到了阿伽门农的面孔”。这个情节是后来发明的。马萨达（Masada）的保卫者们集体自杀这一令人动容的英雄壮举，很有可能是一场屠杀，是后来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为个人目的而改写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该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约瑟夫斯的艺术加工，尽管发掘者伊哥尔·亚丁（Yigael Yadin）极力想使考古

材料适合古代史家那更鼓舞人心的有关事件的描述。

本书依照年代的顺序叙述考古学的缓慢进步。从早期古物收集者们盲人瞎马般的摸索到当前高技术、多学科项目的研究，从博学家的时代到高度的专业化阶段，从一窝蜂地争挖奇珍异宝到为解决特定问题而进行的探寻。它在讲述一个人们认识不断提高的故事：关于过去的证据是能够幸存下来并且是可以找到的，证据中隐含的秘密也是能够被发现的。它在讲述一个人们日益关心过去的故事，由于这种关心，过去的证据才得以发现并得到了解释。它在讲述一个考古学的进步与技术进步——从航空摄影到定年方法和计算机的应用——之间紧密联系的故事。考古学的一个最显著的进步就是大大提高了获取信息的能力。比如，现在从一块陶瓷碎片上便能提取多种多样的信息（它的年代、装饰、原材料及其来源、烧制的温度），大概还能识别出它曾经盛过什么食品。

考古学不再仅仅着眼于发现古文物了，尽管这仍是考古学相当重要的任务。今天的考古学更多地关注于发掘古文物的内涵。因而本书在内容上将尽量兼顾石破天惊的发现和具有同样举足轻重作用的思想的发展，如考古学家们如何努力认识过去，从初始时幼稚的断言和思考，到当前所谓后现代的冥思苦想以及对“事实”的怀疑。

同时，本书试图把许多主要的历史人物置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显而易见，所有的考古学家都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他们的政治或宗教信仰、他们的师承关系、他们的朋友和宿敌的重大影响。这一点绝不是什么新颖的看法，早期的历史学家们之所以有种种偏见，原因就在于他们要仰赖统治者的慷慨捐助。所有作者们的观点都不可避免地来自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但我们没有必要把这种局限一味看成是消极现象，因为当学者们在努力坚持或反之要打破



尊显的人生。由来自克里夫的亨德里克三世所绘（1584年），图为枢机主教菲代里科·切西（Federico Cesi）位于罗马的宫殿和花园，园内陈设着这位枢机主教收藏的部分古罗马文物。这是文艺复兴时期迷恋古希腊和罗马古代的一个典型例证。在这种对古典的文化诉求中，隐喻着社会等级的合法化和财富的差异。

一种为人们所珍惜的状态时，固有的偏颇能够大大激励人们的创造性。

虽然这是第一部在真正的世界范围内对考古学的发展进行考察的书，但某些读者仍有可能发现，本书在根据“西方的经验”说明这门学科的时候，有过分的西方中心论之嫌。我们并不想对此加以辩解，因为考古学并不是由非西方人创立的。它主要兴起于欧洲，缘由于当时的人们企图认识他们所意识到的遥远的过去。欧洲人通过对古典世界的研究，极力想理解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他们最初为了寻找与古典世界和基督教史有关的各种文明的痕迹而着眼于埃及和近东地区。这些地区曾被视为西方思想和精神生活的摇篮。只是在相当晚后的时候，考古学的兴趣才传播到其他地区。因而对欧洲的强调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历史偶然性的结果。同样，本书的大部分篇幅将不得不把西欧和东欧分开来叙述，因为二者在过去许多岁月里所走的道路是相当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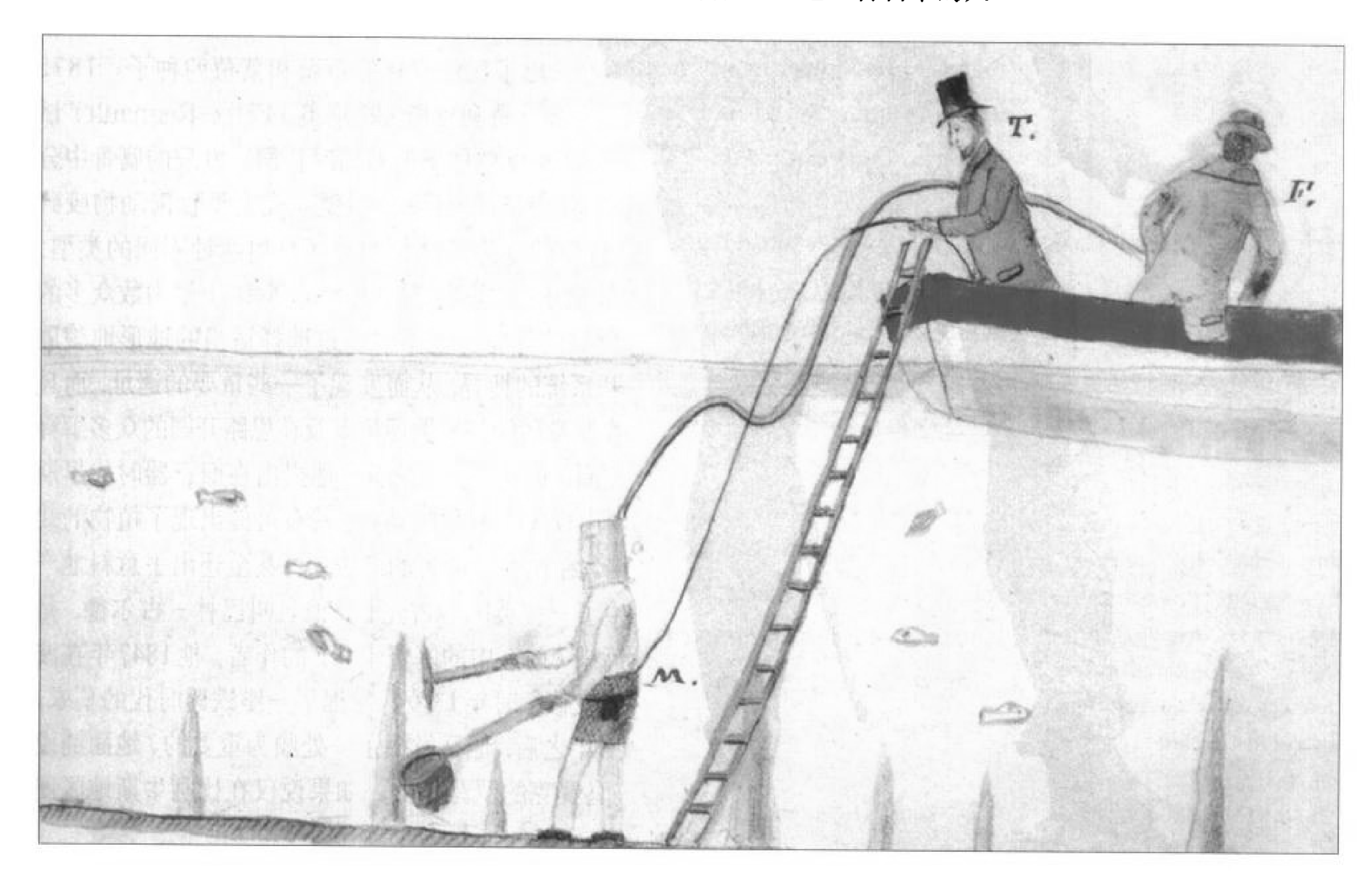
在撰写本书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取舍的问题。这并不是说世界考古史的题目过大，以至于不可能将如此丰富的内容充分纳入到一本书当中。事实上本书的全体撰稿人均能根据他们自己研究的时代和地区，十分轻易地向书中堆砌材料。问题在于我们想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事物和人们所知甚少的事物之间、在考古学的一些最伟大突破和有时并不引人注目但却对这个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些事件或发现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除了某些明显的例外，本书在后几章中很少强调具体的考古遗址和个人，因为要想对最近的事件做出充分的考察，并对它们在整个考古史上的真正意义和重大作用做出准确估价是不可能的。

我们希望，本书的作用之一是鼓励读者、尤其是学生读者深入查阅这个学科的一些被世人忽略的旧作。面对着日渐增多的文献作品，人们能够理解学生们为何不愿阅读那些似乎过时的、与现实没有关联的过时材料，况且这些材料中的大

1854年8月24日进行的第一次“水下发掘”。这幅水彩画表现伯尔尼的地理学家阿道夫·封·莫尔洛（Adolphe von Morlot，1820－1867年）手持鹤嘴锄和捞网，在莫尔格斯的冉弗希湖——瑞士湖上居民居住遗址的木桩中搜寻。湖上居民的遗址是在此前一年发现的。

他的头盔用锌片制作，镶有一块玻璃面板，用皮带紧缚在他肩膀上，洛桑博物馆馆长弗雷德里克·特鲁瓦永(Frederic Troyon)和F·弗莱尔在小船上用手动压缩机为他输送空气。气体从他的下巴底下泄漏出来，形成大的气泡，这是因为头盔同他的身体不能严密结合。

莫尔洛在不久写给费迪南德·凯勒（Ferdinand Keller）的信中说：“在淡蓝色微光下，站在那些古代木桩中间，真是充满了诗情画意。”





自19世纪以来，考古学已为民族自豪感提供了一个表达的出口，这种表达通常是无害的，但偶尔也具有负面影响。右图为“英武的高卢人”的缩影，系凯尔特人埃布罗恩部落的首领安比奥里克斯的青铜像，它矗立在比利时坦格奈斯的市场上。这里不难发现阿斯特里斯、阿比里克斯和格塔菲克斯，在歌西尼和乌德尔佐的那场既有名又滑稽的脱衣舞中所嘲弄的那种高卢态度的起源。

部分还是用某种外文写的。然而，他们却能在尘封已久的19世纪的学术成果中发现未知的思想财富，它们将表明，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新思想不是从持续积累起来的相对陈旧的观念中脱胎而来，根本没有什么突兀的发现或者冷不丁儿冒出的灵感。认真研究这个学科形成的各个阶段，人们将受益匪浅。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自学者和博学家最终都成了名家。

以我个人为例，当我在20年前开始研究比利牛斯省(法国比邻大西洋的一个省份——译者注)的时候，我发觉我对19世纪的法国考古学文献有了全新的认识。文献中有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由于我读到他们透彻的见解和感受到他们在与同事交换意见时的诚恳，往往直抒胸臆，他们因此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也为这些先行者的成就而感到震惊。例如，普埃什神甫(the abbé Pouech)于1847年在勒荷姆洞穴中为发掘熊骨，把发掘现场的表面划分成一米见方的块，赋予每个方块一个字母，为的是看清熊的骨骸是否完整。1870年，埃米利安(Emilien)和查理·弗罗萨尔(Charles Frossard)在奥兰山的马格德林文化的洞穴中提取了一些沉积物，利用一种虽然粗糙但很有效的浮选法对沉积物进行筛选，找出了已经炭化的草莓和紫莓的种子。1878年，费利克斯·勒尼奥(Felix Regnault)试图从伽尔伽斯旧石器时代洞穴发现的腐骨中分离出咬碎的骨头，以便研究大型食肉动物咬碎骨头的行为，这帮助他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类型。爱德华·皮耶特(Edouard Piette)是为数众多的领域的先驱，他不仅通过选择适当的地形地貌展开系统的搜寻，从而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址，而且在测量和保护发掘现场以及在思路开阔的众多解释方面，也开了风气之先。他提出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便出现了半驯化的动物，并有可能出现了植物的栽培。在比利牛斯省的考古中，甚至还出乎意料地产生了一位英国考古先驱，他名叫巴林－古尔德，是后来《前进中的基督士兵》的作者。他1847年在波城度假，时年13岁，发掘了一座铁器时代的墓冢。三年之后，他又发掘了一处颇为重要的、地面铺设马赛克的罗马别墅。如果说仅在比利牛斯地区便

发现了如此众多的古文化遗址，产生了如此广泛多样的研究成果，那么在这个世界其他地区的文献中又会有多少宝藏有待开发呢？

在剑桥出版的有关考古史的著作中，我以为向业已卸任的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教授致敬是非常合适的。他的神来之笔以及他那引人入胜的课程，使几代读者和学生结识了出现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的那些令人心驰神往的人物和透彻的见解。本书是奉献给他的一种感念。我们希望他称许并欣赏这部书的内容。

保罗·G·巴恩


IAm cantũ illa
finierat. Cum
me audiendi
auidũ stupentē
qȝ arrectis ad
huc auribus

第一章 对考古学的考古

如同任何研究领域一样，考古学没有一个固定的起点。人们对过去的好奇心不是什么新鲜的感觉，它为人类所普遍共有。人们一直知道很久以前就有其他人存在。在考古学或古物研究活动出现之前，关于过去时代的知识仅仅来自文字记载、口碑、宗教信仰以及传说和迷信。在不少农村地区，直到20世纪情况也仍然如此。过去留下的最明显的遗迹就是笼罩在各种神话和民间传说中的、屹立在地表的纪念碑或建筑物废墟。这些遗物刺激了人们的想象，他们通常把这一切归结为鬼斧神工的结果，其中很自然地多认为系由某些巨人所为。在有些基督教社会里，古代的纪念物最终是同鬼怪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西南欧，史前岩石艺术遗址和巨石陵墓则往往被冠以中世纪早期摩尔人征服者的名称。

在20世纪以前，大多数人实际上极少出门旅行，世世代代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和工作，因而产生了强烈的血统意识和连续性的感觉，牢固地附着在某一地方的土壤之上。并且无论是在古代世界还是在中世纪，人们都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所繁衍生息的地方有可能是有关过去的信息之源这一点一无所知。大多数古文物是由于耕作或建筑活动而被偶然发现的。任何一次挖掘古物的活动都包含着搜求金银财宝的动机，或者是为了寻找圣人们的遗物（在中世纪的欧洲）。

考古学的起源是同一些先驱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不仅对过去有浓厚的兴趣，而且认识到还有一种与古典文献记载有所不同的历史，可以根据遗留在地下的痕迹（的确无处不在）恢复起来。

近代以前对过去的认识

已知最早的考古调查是由巴比伦国王纳波尼德进行的。他在公元前6世纪掘开了一座神庙的地板，挖出了下面近2000年前的基石。他注意寻找神庙废墟的建筑规划，从这些“发掘”中收集各种古物。纳波尼德根据他的宗教改革路线致力于正确复原这些神庙，强调他的帝王权力是从早期的国王那里一脉相承下来的。他的铭文谈到了这一点：

> 他在（伊巴巴尔神庙）的地基中看到了一尊纳拉姆辛的父亲萨尔贡的雕像。像的半个头部已经破碎，损毁严重，以致雕像的面容已无法辨认。由于对众神和王权的敬重，他召来了能工巧匠，对雕像的头部进行了修复，复原了它的面孔。他没有变换它的安放地点，仍把它安置在伊巴巴尔庙中……

无论纳波尼德使用的技术与19世纪的发掘技术多么相像，他却并非是一位早期的考古学家。然而，他对过去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他女儿的家里有一个专门的房间，收藏着当地出土的古文物。

在巴尔干半岛东部，一位5世纪的色雷斯公主的墓葬中有一把旧石器时代的

左图：埋在地下的宝库。这个场景出自一部1477年的法国手稿。以道德教训为借口而发掘地下陪葬的宝物。坐在椅子上的是一位行政官员，代表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财富的人，其脚边摆放着他的财宝。下方有个人正用鹤嘴锄在地上挖洞。

石斧。即使是神圣的皇帝也不能避免考古的诱惑。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古罗马传记作家——译者注）告诉我们，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世纪“收藏有众所周知的‘巨人’——已灭绝的海洋与陆地怪物的巨大头骨，以及古代英雄们的武器”。这种对“古代英雄”的兴趣可以追溯到通常所认为的考古学之父——荷马那里。正是荷马借助他在史诗《伊利亚特》中对特洛伊战争和在《奥德修记》中对不同土地上的民族的描述，才使人们的目光转向过去。

近 东

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①]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有沿袭了2500年的文学传统，另有1000年的历史隐含在神话和口头传说当中。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名望使它的许多传统载入包括《圣经》在内的相邻地区的古代文献当中。这种文学传统明显地包含一些诸如王表、年表、年代记、史诗、悼词之类的史料。从公元前三千纪开始积累，这些历史文献便作为培训书吏的教材被反复地加以复制，并通过图书馆传播开来。到了伟大的亚述国王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东北部）的时代，以及公元前一千纪尼布甲尼撒（新巴比伦王国的国王——译者注）的时代，具有教养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便成了漫长的历史传统意识的继承人。

西亚人对过去有一种共同的态度，就是人类世界是由神灵创造的，需要一位

嗜血成性的亚述人。在这块会战中的战车与骑兵的浮雕上，战败的敌人在马腹下遭到践踏，一只秃鹰盘旋在上方。



① 古希腊人对西亚两河流域的称呼——译者注。

公正的国王来保障社会秩序。像吉尔加美什（约生活在公元前28世纪）这样的英雄和公道的国王，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神话里的主要人物；相反，不虔诚的行为则导致社会动乱、饥荒和瘟疫流行、蛮族入侵及其他灾难。神话和诗歌贬低不虔诚的国王，如公元前23世纪的国王纳拉姆辛。他的行为冒犯了神灵，引起社会秩序的崩溃。这种态度在《圣经》中被处理为同神订立的一种契约，把正确行事和恰如其分地举办典礼与仪式当作人民及其领袖的责任。

《圣经》作为古代典籍和早期基督教的作品，对西方人来说，保存了有关铁器时代西亚文明的记忆。《圣经》中的一些篇目，比如《列王记》和《尼希米记》等，按编年顺序记载了以色列和朱迪亚（约相当于今巴勒斯坦南部和约旦西南部地区——译者注）的命运，以及它们同腓尼基、北部阿拉美亚诸王国、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关系。以赛亚和其他先知利用道德语言作为暗示，留下了关于帝国征服、反抗侵略和终告失败而被放逐等生动的史事。在这些记载中，亚述人无度的征服欲和极端的残忍行为得到了概括，巴比伦成了罪恶、淫荡和政治压迫的象征，它的灭亡是对不忠和邪恶的一个具体教训：

巴比伦，诸王国的骄子……将要像上帝毁灭的所多玛和蛾摩拉城一样，永远空无一物……野兽出没，房屋里充斥着咆哮的动物。（《以赛亚书》第8章，第19－21节）

征服世界的英雄。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4－335年在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埃及、波斯和巴克特里亚所取得的胜利，成了希腊语言和文化在近东以及远至印度广泛传播的工具。关于他的超常勇敢、冷酷无情以及他策动的多次谋杀——甚至可能谋杀了他的父亲马其顿王腓利——已经成了萦绕不尽的传奇故事。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因高烧在巴比伦去世。死前几个月，他曾放浪形骸，酗酒作乐。这是英雄亚历山大在硬币上的形象，头上有宙斯－阿蒙神的公羊角，表明他具有神灵血统。

古典世界

古典文献提供了有关东方、尤其是有关波斯的另一种观点。希腊人对波斯人的看法既包含对其社会美德和骁勇能战方面的钦慕，也包含对其政治依附和“东方专制主义”的鄙视。公元前5世纪波斯入侵希腊失败之后，希腊人的态度带有了希腊优越的自负成分。古典文献保存着有关东方城市、文明和历史的记载。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是一位对波斯人表示钦佩的人，他留给后人一段关于巴比伦的描述，直到19世纪，这一描述仍是古物学家研究工作的良好指南：

这是一座巨大的正方形的城市，每边几近长14英里，城垣周长约56英里，除了方圆巨大之外，它的壮丽也胜过这个世界上已知的任何一座城市……四周的城墙上有100个城门，包括立柱和门楣在内，均为青铜所造……（贝尔）神庙（亚述神灵中的最高神——译者注）是座方形建筑，边长两弗隆（一弗隆等于1/8英里——译者注），开有青铜大门。中央有座牢固的塔楼，一弗隆见方，塔基上竖有一塔，第二个塔上又有第三个塔，依次上去共有八塔……在塔的顶端才是伟大的庙堂。

其他古典史家和地理学家记载了地中海东部各个地区及其文化的细节，其中包括远至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的印度以及晚后罗马人所进行的海上贸易。虽然这些细节往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它们中的许多描述仍然是颇有价值的史料。譬如

早在文艺复兴之前，由于新的建筑、挖掘水井和地窖，以及人们每日在原为古代城市的田地里种植和侍弄蔬菜和葡萄树，导致古文物不断出土。根据历史学家李维的记载，公元前181年在罗马挖出了萨宾人努马·庞皮里乌斯（公元前7世纪的一位半传说中的罗马国王）的陵墓，其中伴有努马本人撰写的一些哲学论文。

这幅由波里多洛·达·卡拉法吉奥作于1525年的画面，恰值那尊闻名遐迩的、公元前2世纪左右的拉奥孔大理石雕像在罗马重新得以发现后不久。现在该雕像收藏于梵蒂冈，它曾经对米开朗基罗影响甚大。

有本名叫《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的书，是一本关于如何从事贸易的手册，作者不详，其中列举了来自东非和印度洋上的马来群岛（岛上有一些罗马人的港口）的货物。古典文献还包含一些信息，对研究美索不达米亚早期政治史至关重要。一位名叫贝罗苏的巴比伦尼亚的祭司，甚至用希腊文写了一部巴比伦的历史，从创世纪一直写到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

公元前8世纪，希腊自所谓的黑暗时代脱颖而出，重新引起人们对青铜时代以来的古代遗存的兴趣。特别是那些处于地表的迈锡尼世界的“蜂巢墓”(beehive)，使人联想到从前曾有过一批先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当希腊诸国试图确立它们的共同性时，这些陵墓于是被当成希腊人共同祖先的葬身之地。结果，许多迈锡尼时期的陵墓招来了新的祭献，产生出了一种对较早时代的英雄们的敬仰之情。有一座被当成供奉对象的铁器时代早期的陵墓位于阿提卡的迈尼迪(Menidhi)，墓葬中包括一些带有几何形饰纹的陶罐，上面绘有行进中的战车队伍，说明历史上存在着诸如荷马《伊利亚特》之类有关英雄的口头史诗所反映的那个时代。

迈锡尼时代的陵墓后来继续受到人们的崇敬。在修建雅典广场(古代雅典的市场)期间，人们偶然发现了一座陵墓，时间是公元前5世纪，一些被人们作为供奉之物的盛油的器皿遗留了下来。在希腊化时期（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陵墓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崇拜。公元前5世纪初，在希波几次战争之后，雅典将军客蒙决定将业已去世的雅典英雄提修斯的遗骨运回国内。这些遗骨是他在远征斯基罗斯岛期间发现的，他将它们运回国内，安葬在一个特殊的墓地里。据推测，这些遗骨可能是那座岛上属于青铜时代的某个比较令人瞩目的坟墓中找到的。

同时，在城邦泰格亚和斯巴达之间的一次争议中，斯巴达人被告知，他们在找到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希腊领袖阿伽门农的儿子奥雷斯蒂斯（Orestes）之前，永远不会优胜于敌人。据希罗多德记载，一位叫里卡斯的斯巴达人偶然发





奥林匹亚的宙斯雕像

用黄金和象牙制成的宙斯的巨型神像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它坐落在奥林匹亚大庙的屋檐之下。这是雅典雕刻家菲迪亚斯的杰作，公元前5世纪晚期完成，幸存到公元5世纪晚期，存在了900年之久。这与现代不列颠距最终税册①订立的时间长度相等。

旅行家波桑尼阿斯于公元2世纪详尽地描述了宙斯像的形状（如左图），左手持胜利女神像，右手持一根权杖。

> 神像的鞋子是黄金的，宽袍也是黄金的。在宽袍上，有一些生动的图画以及象征性的百合花。神座用黄金、宝石、乌木和象牙装饰得绚丽多彩。此外，在座位上方还有彩绘和雕像。

波桑尼阿斯继续描述宝座上的装饰，那上面有阿尔泰米丝和阿波罗射杀尼奥波的孩子们的情景。雕像高达13米（43英尺），相当于一座三层楼房的高度。

> 对奥林匹亚宙斯神像的高度和宽度所做的测量，已被记了下来并为我所知。但我不会赞美那些进行此类测量的人，因为他们记录下来的尺度，远不如雕像给人所产生的印象深。当雕像完成之后，菲迪亚斯向宙斯祷告，如果他喜欢这件作品，就请给一个表示。就在那一刻，据说一道闪电击中了地板。被闪电击中的那个地方现在被一件青铜容器所遮盖。

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公元1世纪则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宙斯座像的高度有误，"因为尽管（菲迪亚斯）表现了坐着的神灵，但（宙斯）几乎触到了屋顶，因此给人的印象是倘若他站立起来，他会碰穿庙顶"。

在俄国巴克西发现的一件几乎属于同时代的雅典红色彩陶的酒具上，有这座雕像的画面。雕像的头部还出现在皇帝哈德良（古罗马皇帝——译者注）统治时期在埃利斯发行的铸币上。波桑尼阿斯曾得出结论说："整个雕像前部的地面是用黑色大理石铺成的，而非用白色大理石。其边缘用隆起的波斯大理石镶边，成一个半圆，用来收敛泼洒在雕像身上的橄榄油。"

1721年，奥地利建筑家约翰·菲舍·封·耶拉克重塑菲迪亚斯雕刻的宙斯神像。封·耶拉克是第一位将古代作家提供的各个细节全面结合起来、比较合理地重建宙斯神像的人。雕像的骨架由造型复杂的木料构成，在面孔、躯干和皮肤处覆上细薄的象牙片。诸如布料之类的细部则用锻打出来的贵金属箔片来装饰，与木制的骨架结合得丝丝入扣，浑然一体。

宙斯的那根象牙手指上，据说被胡乱刻上了一行字："潘塔尔克斯是美丽的。"这是一个关于热爱菲迪亚斯的人的典故。按照波桑尼阿斯的说法，他赢得了公元前43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角力比赛的冠军，成为雕刻家塑造宝座四腿之间的一尊雕像的模特儿。

对于公元1世纪的罗马演说家西塞罗来说，在奥林匹亚的菲迪亚斯"头脑中具有一种美的预想，这种预想如此完美，以至他能够用自己的艺术家之手全神贯注塑造出神灵真正喜爱的作品"。一个世纪之后，对菲迪亚斯不大尊敬的卢基安嘲笑雕像内的木头已成了老鼠出没的地方。

最后，在公元391年，由于基督教会影响的增大，奥林匹亚的神庙被关闭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也终止了，宙斯的雕像被拆除，经过爱琴海，运送到君士坦丁堡的皇宫中被重新竖立起来。公元475年的一场大火最终焚毁了这座雕像。

①英国历史上1086年英王威廉一世颁布的全国土地、财产、畜生和农民的调查清册，又称《末日裁判书》——编者著

现了奥氏的遗骨。在一个铁匠铺里，铁匠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著名发现：

> 我在这个院子里为我自己挖一眼井。挖着挖着，突然碰到了一口7腕尺(cubit)长的棺材。由于我不相信曾有人会比我们现在的人高，我就打开了棺材，发现其中的尸体同棺材一般长。我量了那具尸体，并将它再次掩埋了起来。

里卡斯认为这是奥雷斯蒂斯的遗骨，于是便回到那个铁匠铺，把遗骨起了出来。结果，据说斯巴达人从此便一直将泰格亚人打得落花流水。

如同目前的情况一样，新的城镇和楼房的建设有时会使过去的遗存重见天日。当朱里乌斯·恺撒在修筑靠近那布勒斯的新城市卡普亚（卡希里努姆）的时候，他的传记作者苏埃托尼乌斯写道："在一些非常古老的坟墓里"发现了"不少古人制作的陶瓶"。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同时告诉我们：当恺撒在古希腊科林斯的遗址上发现一处罗马人的殖民地时，他的士兵们找到了大量公元前7－6世纪的陶罐与青铜器，每座墓都被掠夺一空。这些古物在罗马以高价出售，标以"来自科林斯古墓"的字样。这是一起早期盗墓和古物贸易的范例。

幸存下来的古典遗物。这枚圣阿尔班的刻有浮雕的宝石，人们称之为卡阿德摩。上面有一位4世纪的罗马皇帝的肖像，传到中世纪后成了保佑母亲生儿育女的护身符。它用红条纹玛瑙制成，镶有银边，"大到一只手几乎拿不住"。它本是由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埃特尔来德二世送给圣阿尔班·阿贝的。此图为马修·巴里在1257年绘制。

在希腊，即使其并入罗马帝国之后，人们对过去的兴趣仍旧继续。地理学家兼历史学家波桑尼阿斯于公元2世纪写了一部有关希腊古遗址的旅游指南。各个建筑及其他文物有时是在希腊史上的关键事件——公元前5世纪早期击败波斯人侵——的背景下加以叙述的。波桑尼阿斯曾经穿过分布在乡间的诸神庙废墟，在他看来它们是由于波斯入侵者的破坏而被废弃不用了的。他提到位于雅典的提修斯庙中的绘画（属于公元前5世纪）便因那次浩劫而遭到破坏。

即便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人们仍然继续对过去表示敬意。随着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区确立统治地位，异教崇拜便逐渐消亡，神像和神庙以及对它们的信仰均被抛弃了。新教会的教职人员开始收集古代的雕像。一位拜占廷的编年史家曾记载：君士坦丁堡劳苏斯宫中的一批出自古典世界的雕像，于公元475年遭到一场大火的破坏，其中包括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所做的那尊很有名的、来自克尼多斯城的阿芙罗狄忒（希腊爱神，罗马人将其称为维纳斯——译者注）像，还有埃及人阿马西斯奉献给神庙的那尊由林迪安所做的雅典娜像，以及菲迪亚斯为奥林匹亚神庙所做的宙斯巨像。

中古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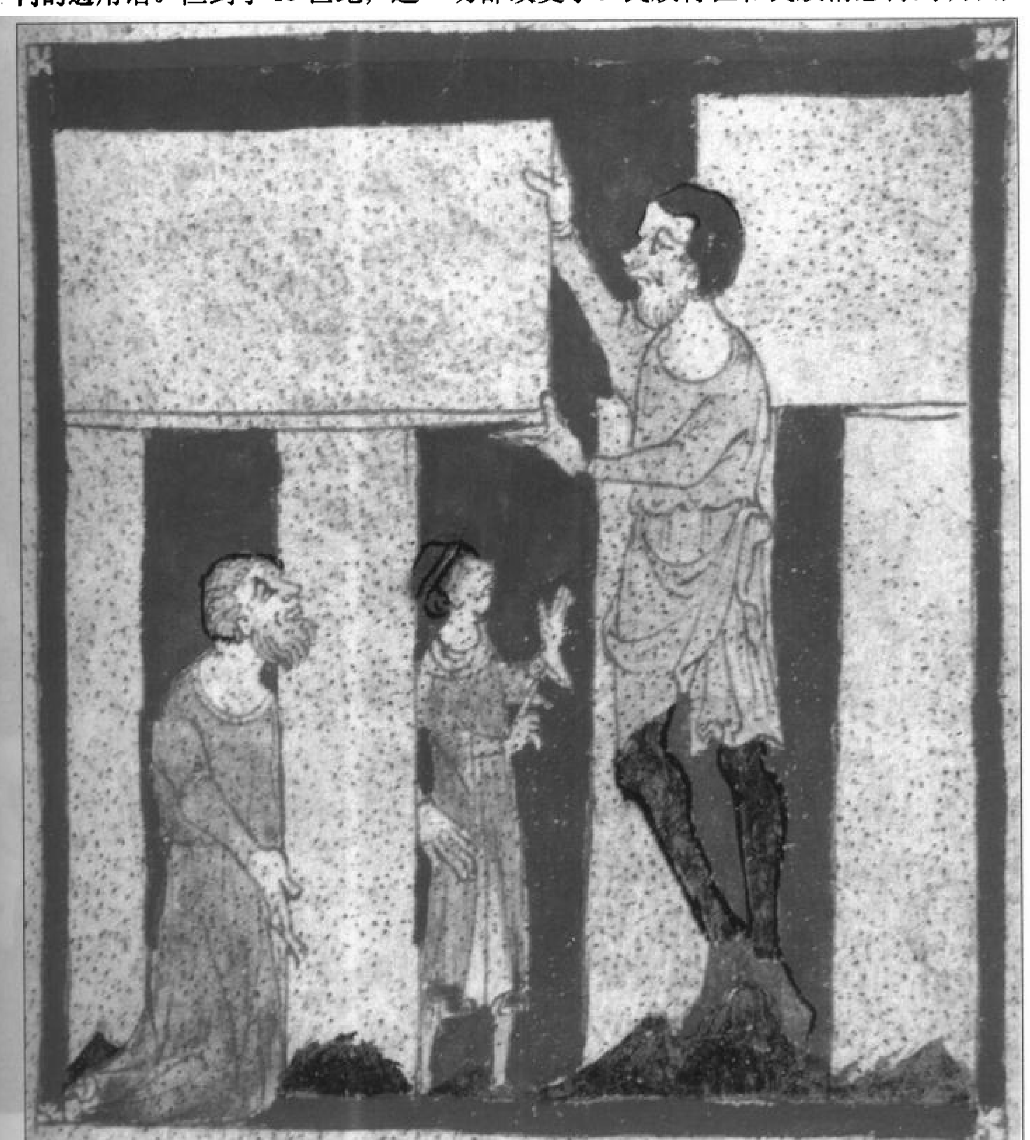
在中古欧洲，人们对基督的信仰同对民间神话的信赖紧密交织在一起。《圣经》的《创世纪》章把人类起源的地点放在近东、这不仅体现在开创天地万物的时期，而且也体现在大洪水之后、诺亚子嗣们重新定居在大地上的那段时间。异教被认为是由那些离开近东、失去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主流信仰的接触因而堕落的人们发展出来的。异教徒的遗迹因此被视为堕落者的遗物，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被摧毁，要么便将它们中性化或基督教化。教堂在一些主要的史前遗址旁边建立起来，比如在英国南部埃夫伯里巨石圈旁便建起了教

堂。欧洲各地都把原来献给旧宗教的泉水变为对圣人们的祭品。

与此相关的是全面缺乏历史意识，世界被认为是由上帝在七天时间里依次创造的，并且作为一个神圣计划的组成部分，其结局是基督的再次降临和进行最后的审判。由于对长期的自然或文化上的变化缺乏理解，人们对于技术和社会在许多年代里始终不断演变的思想，仅有一点模糊不清的认识。在中世纪的手稿和肮脏的玻璃上，《圣经》中的人物被刻画成穿着中世纪衣服的古代人。

造成这种缺陷的第三个因素是具有学术性质的神话的力量。威尔士僧侣南尼乌斯在9世纪宣称特洛伊的一位王子布鲁特斯（Brutus）是在大洪水浩劫之后第一位定居在不列颠列岛上的人。他的这个假设的一个有力支持是他推测"不列颠"(Britain)一词出自"布鲁特斯"。两个世纪以后，蒙默思郡的威尔士编年史家杰弗里在他虚构的《英国诸王史》中，甚至对布鲁特斯到达不列颠列岛的时间都有精确的表述，即公元前1170年。同样的神话和推理式的谱系也在欧洲大陆上得到推广。例如，哥特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圣经》提到的挪亚的孙子歌革。

这类神话是同西欧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12世纪，法国出生的统治者们统治着从比利牛斯山延伸到苏格兰边界之间驳杂多样的土地，意大利的牧师们则被指派在法国和英国生活。法语得到广泛流行，成为欧洲贵族圈内的通用语。但到了15世纪，这一切都改变了。民族特征和民族情感得到确认，



左图出自14世纪的一部英国手稿，描绘神秘的默林(Merlin)[1]，在建造巨石阵。这是中世纪十分罕见的有关史前古物的绘画，也是最早为人所知的此类绘画。

画面描述了一个充满色彩的传说，意即蒙默思郡的杰弗里所作《英国诸王史》（约1136年）中所描写的首次传道（约1136年）的情景。墨林是魔法师和先知，梦妖之子，他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竖起石阵，而他的巨石则是他施用魔法从爱尔兰运来的。由于在5世纪应邀为不列颠战胜撒克逊人的伟大功绩建立一座永恒的纪念碑，墨林"把居住在爱尔兰基拉劳斯山的'巨人'们召到自己身边。那个地方有一处石堆，当时无人能够将它们竖立起来，除非兼有超人的技能和窍门。那些石头如此巨大，以至现世中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气力挪动它们一下。它们是巨人们在许多年前从遥远的非洲搬运过来的，有一段时间被巨人们安放在他们居住的爱尔兰。他们打算一旦感到自己生了病，便在这些巨石边进行沐浴，因为巨石表面时常冒出水流，水流入浴盆，他们在浴盆里洗过之后疾病便可痊愈"。

事实上，这片巨石阵的沙岩来自西撒克斯，我们今天看到的新石器时代的巨大石圈是在公元前约2100年间建起来的。

① 英国中世纪传说中的魔法师——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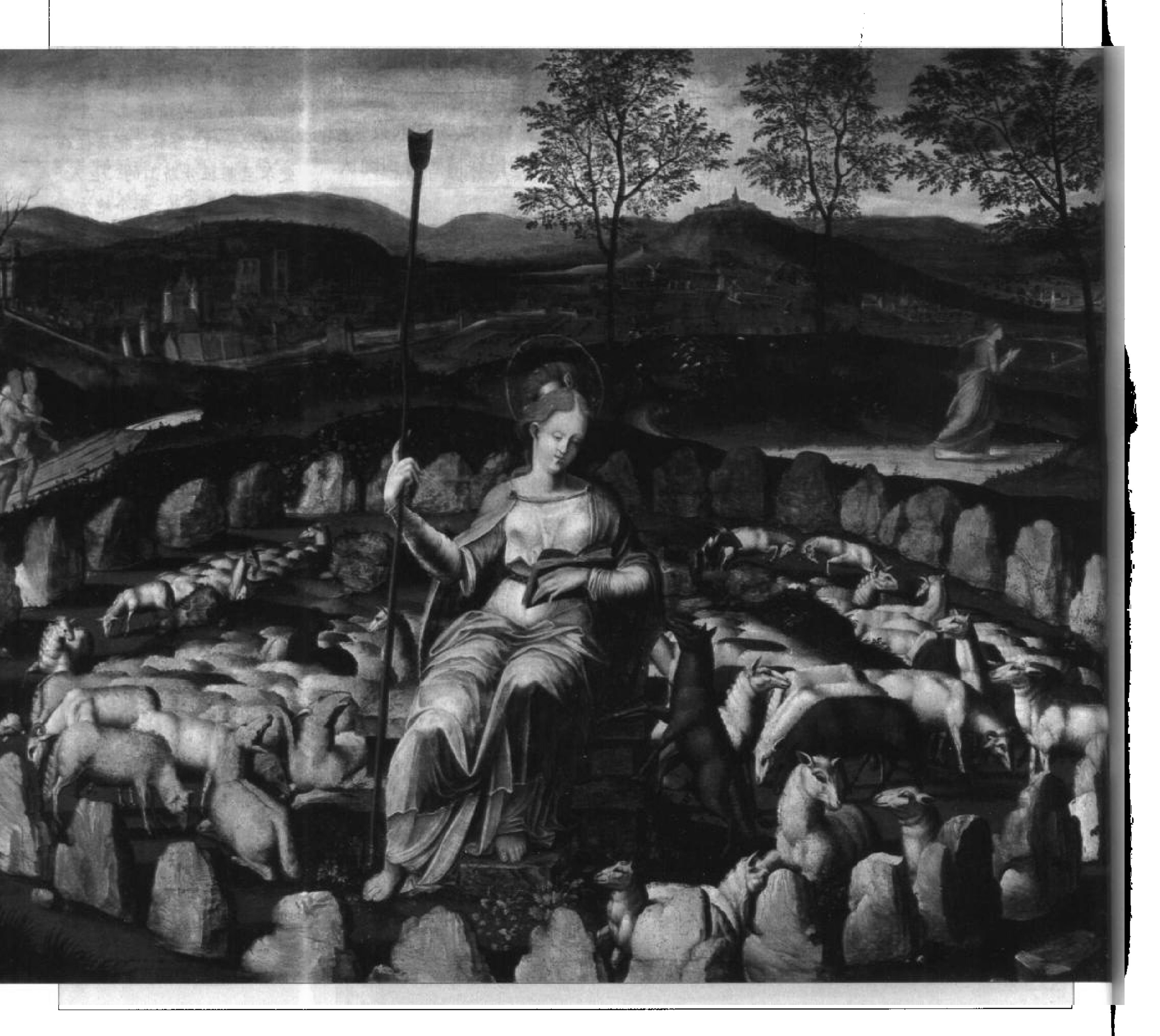
被排挤掉的偶像崇拜

在西欧,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社会于公元前几千年便立起许多竖石纪念物,早期基督教的僧侣们将它们视为与自己的信仰水火不容的异教象征。在罗马帝国期间,即使这些纪念物已不再是宗教仪式注目的焦点,但各种传说和信仰仍然附着在它们身上。对它们的破坏是普遍现象,但并非始终认为有必要摧毁这些纪念物,它们也被用来为基督教服务。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布列塔尼的石碑,它们的顶部被重新雕刻成十字架的形象。在其他地方,石碑的表面也被刻上了十字。16 世纪威尔士人圣参孙的传记告诉我们:一天,他到了康沃尔,看到人们在向一座石碑献祭。他迅即抨击他们的偶像,并使他们转信基督教。他用自己的手在凹凸不平的石碑表面划出了一个十字,表示对这种皈依的认可。

下图是16世纪的一幅关于圣日内维芙(巴黎的保护人)的画。她与绵羊在一起,周围环绕着一个史前石圈。这处已被毁坏的古迹几乎可以肯定是在今天的南特境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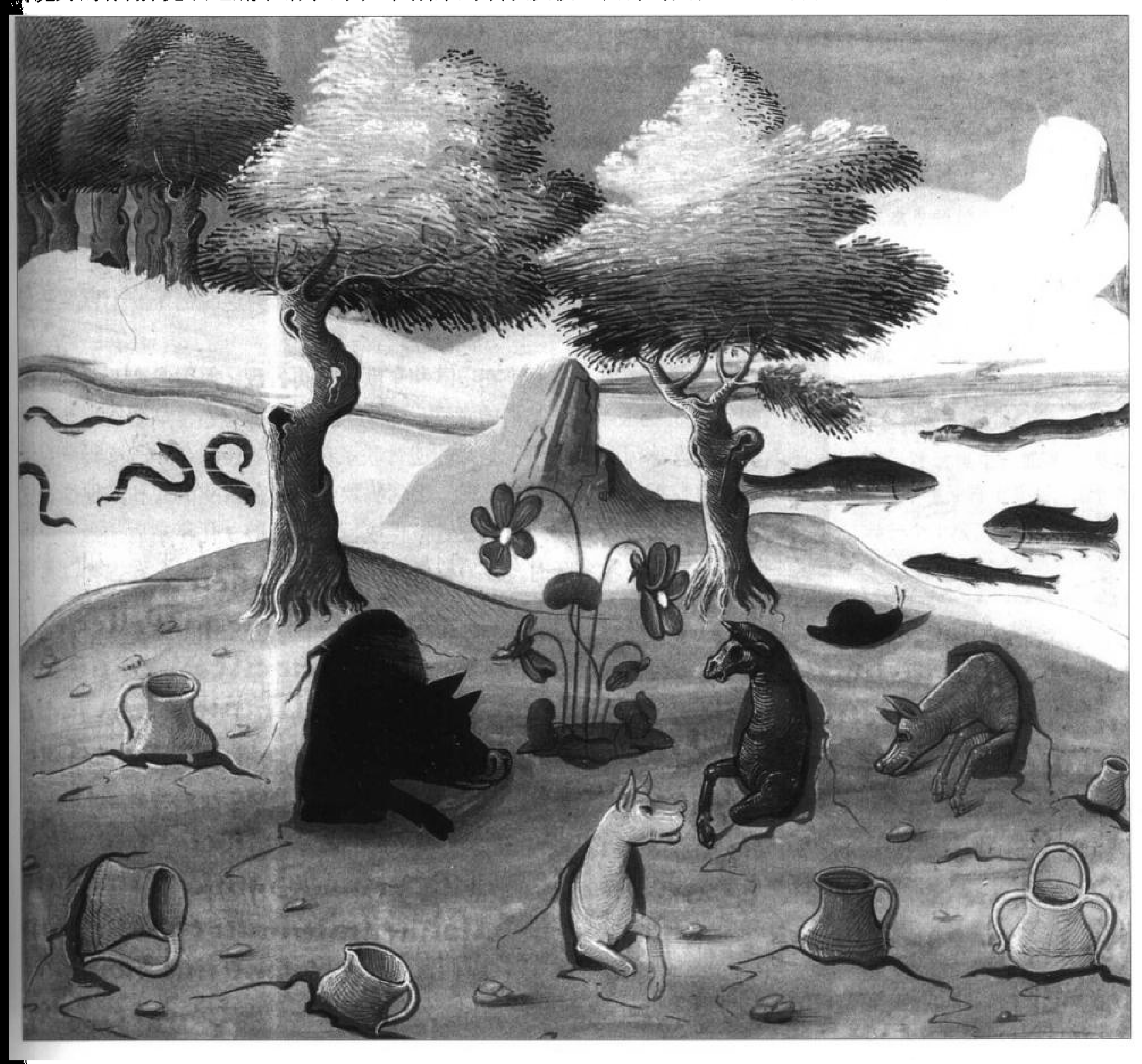
这是欧洲巨石文化的最古老画面之一,它把基督教同异教联系在一起。先前它被收藏于巴黎圣摩里教堂内。



民族教会开始发展，英语在英国宫廷中得到使用，外国干涉遭到激烈反抗。在这种情况下，对民族主义神话的需求日益强烈。意大利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的关系被人揭示出来，并由于古典文献的重新发现和古典建筑艺术的复兴而得到加强。在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英国，作家们把目光转向布鲁图和有关亚瑟的传说，以便重新塑造民族的过去。印刷术的发明为满足有教养的阶级对这种大众神话的需求提供了手段。有关布鲁图和亚瑟神话的一个版本是卡克斯顿的《英国编年史》(1480年)，该书系属在英国印制的第一批书籍之列。

在中欧和东欧，也有一些很早就对古典世界表现出异乎寻常兴趣的例子。有些纯粹是商业性的。由于古代银币的发现直接有利于国库收入，所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瓦萨于1547年在阿兰群岛发现古代铸币之后，便公开宣称他对找到更多的此类钱财感兴趣。此外，这类发现也是激起人们好奇心的一种方式，比如陶器外表便给了人们“神奇的”感受。15世纪的编年史家简·德鲁戈什(Dlugosz)在其《波兰史》中就谈到斯莱姆镇附近出现的非凡现象。那儿有许多陶器似乎因某种魔力的作用，竟从地底下钻了出来。在斯莱姆镇以及波兰西部的其他一些地方，

“神奇的坛坛罐罐”。似乎借助神力从地下出土的陶罐引起洞穴中的动物的注意。这是15世纪巴尔特莱米·德·格兰威尔的手稿《财产纪实》(Le livre des proprietes des choses)中的一幅插图。



这类奇迹层出不穷，长期流行着有关从地下冒出“神奇的坛坛罐罐”的民间传说。1416年，根据波兰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二世迦基罗的诏令，由他在场的情况下，波兰人对曾经出土过一些陶器的诺科沃进行了发掘。

这个事件标志着对东欧史前居民遗存所进行的一次最初的、有意识的调查。这些“神奇的坛坛罐罐”多半是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1200－700年）的骨灰罐，几乎可以肯定是出自广泛分布在中欧和东欧的大片墓地中的一个墓群。由于安放骨灰罐的墓穴上覆盖的土壤受到侵蚀，因而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它们是自己从地下冒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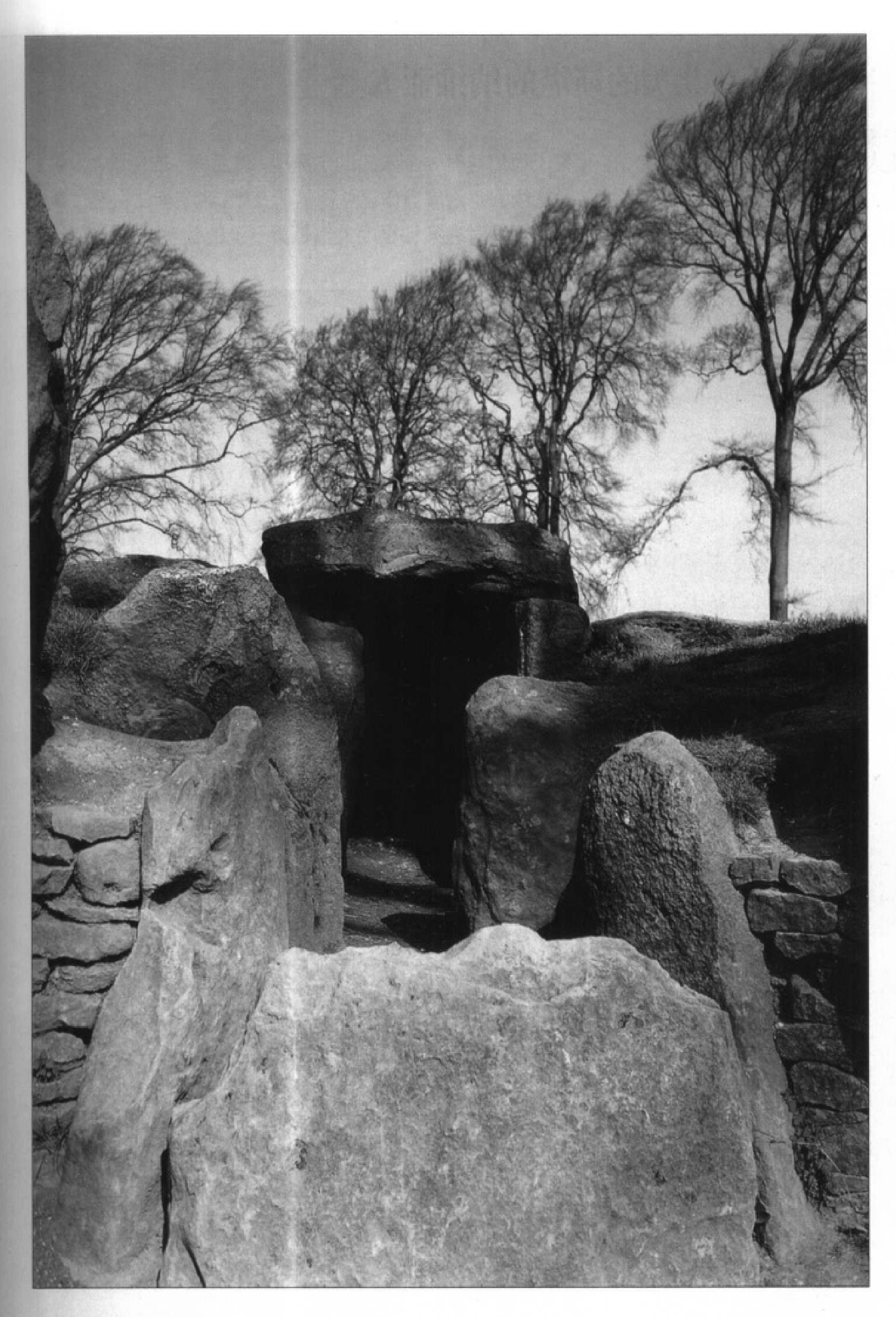
类似德鲁戈什这样的编年史家在东欧是很常见的，他们经常记录一些有关当地人民的文化起源以及故土的传说。他们往往把坟丘归之于异教徒所为。德鲁戈什对克拉科夫附近的两处大坟丘的起源进行了思考，认为它们是传说中的克拉克的墓地，他把这个传说人物看作是一位罗马人，企图将早期波兰同古典古代联系在一起。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巨大史前巨石纪念物同样被归之于异教部落或大洪水前的巨人所为。德文 Hünenbett 在过去常被用来表示巨石陵墓，这个词出自古老的德文“巨人的床铺”。

过去也存在一些关于我们现在所称的“历史考古”的记载。例如在1390年，西里西亚（指中欧包括波兰、捷克和德国部分地段的一个地区——译者注）的布尔兹格王子路易斯，在奥德河边的斯拉夫人要塞里克金进行发掘，想要确定那里是否曾为三个世纪前的弗罗茨瓦夫（现布雷斯劳）主教们的驻地。甚至早在1091年，在基辅就有过多次考古发掘，试图找到第一座俄国修道院的奠基人狄奥多西乌斯的墓地。一些战场旧址也得到了研究。编年史家提到某些遗址中有半掩埋状态的人的尸骨堆。但总的说来，这类发掘为数很少，因为这时仍是一个以魔法和神话为主要解释手段的时代。

旧石器时代人类留下的痕迹在中欧和东欧被一再发现，但正像在西欧的情形一样，直至19世纪上半叶，它们的意义尚不为人所知。在东欧，早期发现几乎无一例外地同发现冰河时代晚期猛犸象的遗骨联系在一起。1679年，一支哥萨克军队在卡尔科夫挖掘磨坊水坝时，发现一批猛犸象骨，同在西欧洞穴和其他遗址中发现的人类和动物遗骨一样，这些象骨被当成巨人的骨骸。几年之后，当一位哥萨克领袖公开展示一枚象牙时，沙皇费奥多尔·阿列克塞维奇下令发掘和测量那个遗址，但却一无所获。

沙皇的这个举动确立了一个时至今日由国家参与考古活动的先例。1718年，彼得大帝向全国民事和军事当局发布指示，要求收集和记录“自地下发现的古物，意即与我们现在见到的有所不同的怪石、动物、鱼类或鸟类的骨骼”。在引起他关注的发现当中，有来自顿河流域的猛犸象的遗骨，那是在后来为人所共知的科斯廷基村（kost 在俄语中系“骨头”之意）附近的旧石器时代的露天遗址集中地找到的。沙皇亲自观察了某些来自科斯廷基的猛犸骨，认为这是一支古希腊远征军的战象遗骸。实际上这些遗骨是2万多年以前处于大冰期的人类收集的，其中许多成了在寒冷荒凉的地表搭建住所的材料。

在许多世纪里，欧洲的农民在耕田时不断翻出人工打制的燧石石片和磨光石器。流行的看法把它们解释为小精灵射击或闪电的产物（古希腊人称之为霹雳



这座新石器时代有墓室的长形古墓，位于英国南部的牛津郡，时间属于大约公元前3500年。该墓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被人所知，当时被称作“维兰德的铁匠铺”。那个铁匠叫维兰德，是北方的神灵。根据传说，如果一位旅行者的马失去了马掌，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将马留在这座古墓旁，并在石头上放一块硬币。当他返回古墓后，那匹马已经钉上了掌，而那枚硬币却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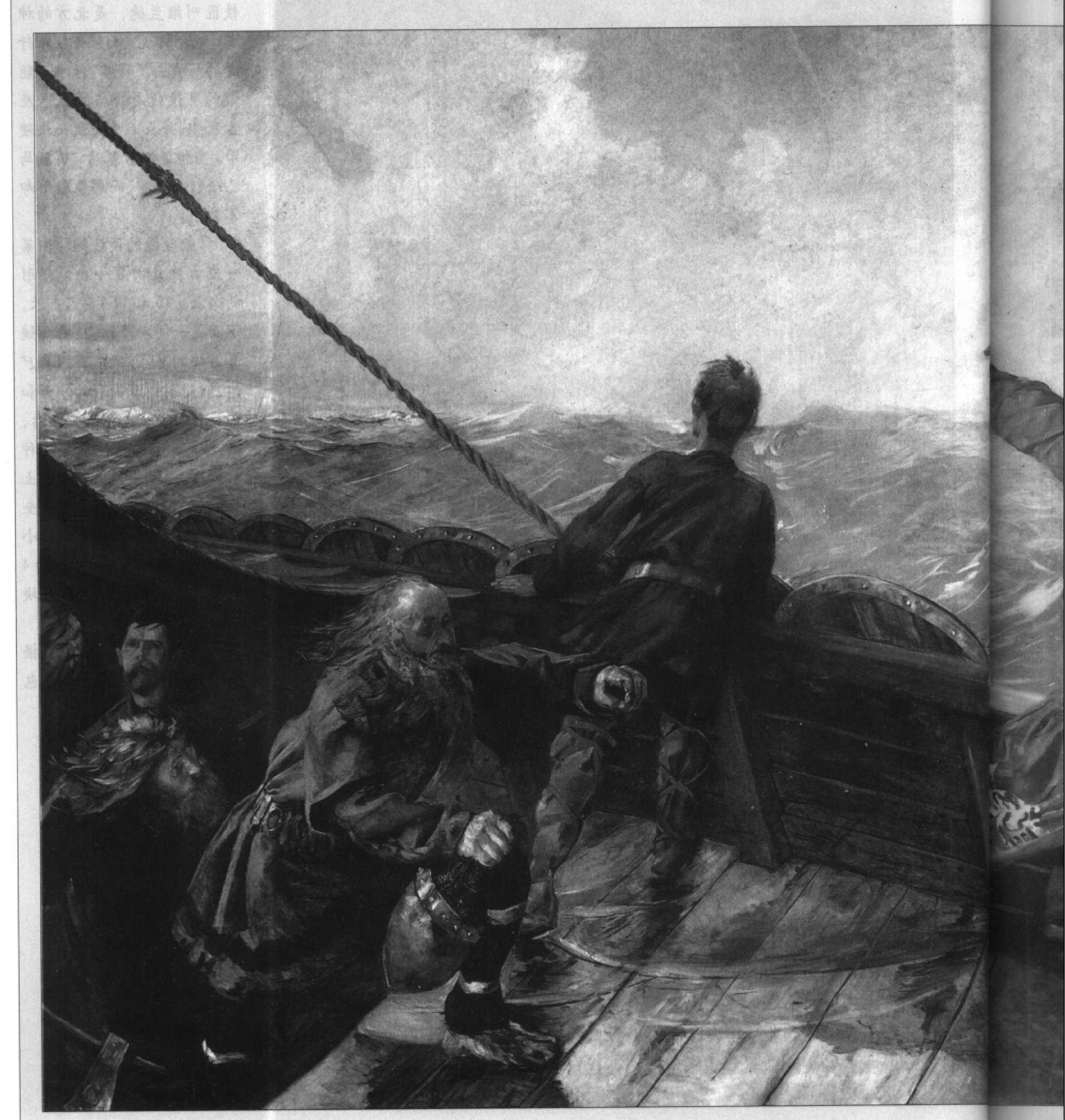
“维兰德的铁匠铺”即第一座古墓最初是一座蛋卵形的山丘，16米（54英尺）长，下面是一间木质结构、地面铺有石块的墓室，墓中有14具尸体，四周围绕着圆形的沙岩和白垩碎石。一些年过去之后，这座原始的古墓被目前这种长55米（180英尺）的楔形土丘所包围，边缘有用沙岩块垒成的边石，每个侧面开有小沟。正面令人印象深刻，由4块高达3米的圆形大沙岩块（最初是6块）所构成。

对该楔型土丘墓的发掘证明，墓中埋有8人，其中包括一个小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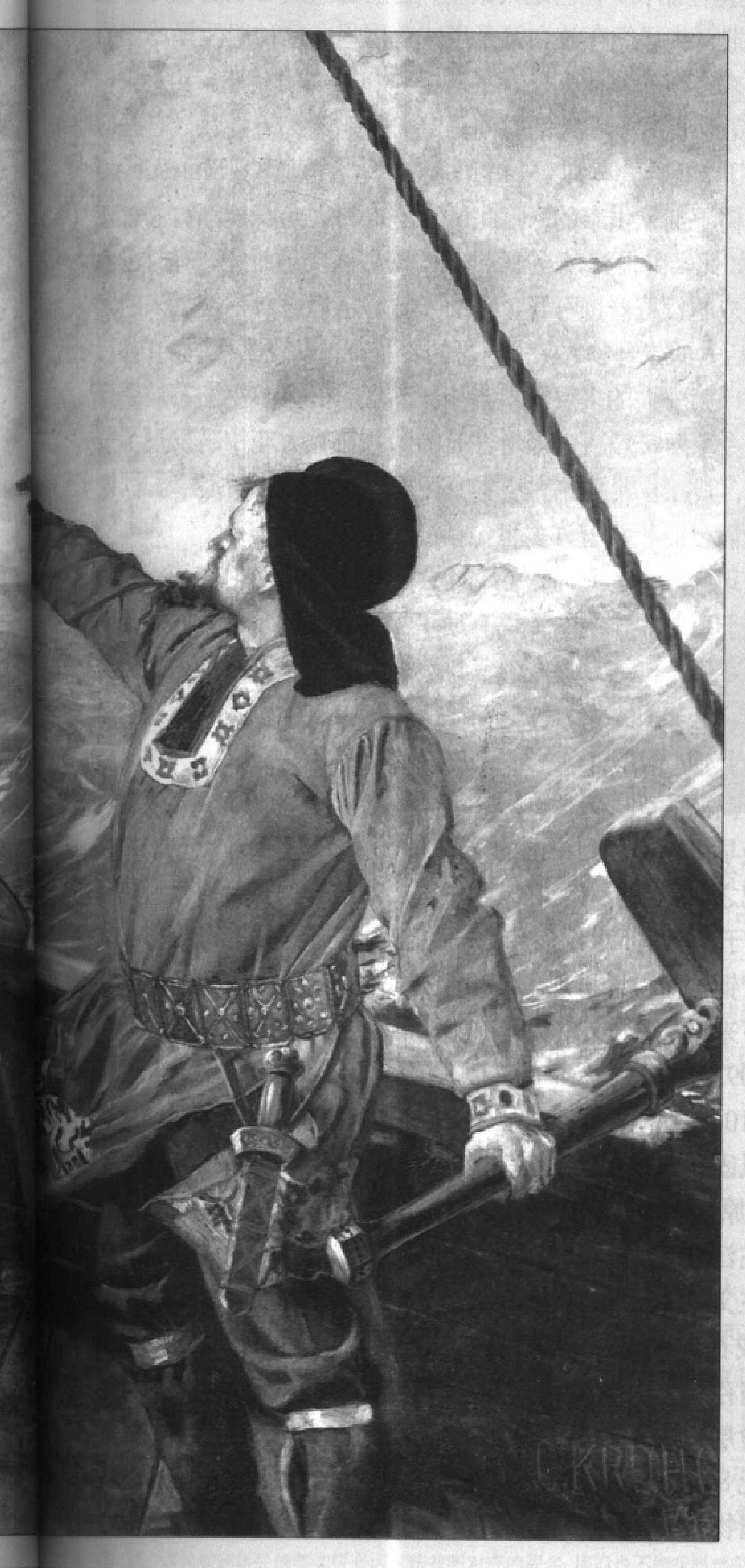
石）。这一理论被某些作家赋予伪科学的精心阐释。17世纪中叶，有位权威将它们的起源解释为“因环型气体在云朵中聚合成球形的一种闪电从天空发射而成”。这类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解说无助于找到这些奇怪东西的真正成因。埃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把古代的箭头和磨光石斧当作护身符，一直到近代为止，民间信仰还认为这些石器为神力使然。直至19世纪晚期，法国南部的牧羊人还将一块磨光石斧放到领头羊脖口处的袋子里，以保佑羊群；或者在羊圈上挂一块，或者在羊围栏的出口处埋上一块，以驱邪防病。他们甚至自己也携带一块作为一种咒符。

活跃在北美的斯堪的纳维亚人

史料显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水手于9世纪抵达冰岛。在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莱夫·埃里克松与其他人在格陵兰登陆。较有争议的是关于他们曾出现在北美的传说，尤其是关于他们曾有一个未知的定居地"温兰德"的传说，人们暂时把缅因州沿岸当作温兰德的所在地。这个神话引起了最恶劣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第一流的伪考古学研究。



就消极面而言，有一种关于斯堪的纳维亚人出现在北美大陆的说法是从一些根本就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遗存推论出来的。例如，罗德岛纽波特的那座殖民时期的石砌风车房，曾被某些人解释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教堂（尽管其灰泥中的二氧化碳气泡经放射性碳素法测定是公元1650年）。同样的伪造物还有"肯兴屯石碑"（Kensington Stone）。这是一块伪造的载有古代北欧铭文的石碑，发现于明尼苏达州的肯兴屯，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期，甚至直到现在仍被当作是可靠的证据。



有关斯堪的纳维亚人到达北美的真正的考古学证据出自兰赛·奥克斯·米多遗址，这是挪威人在纽芬兰北部地区建立的一个定居点，建立时间是在1000年左右。它由8处草泥遗迹构成，其中包括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房屋和一个铁匠铺，以及一些属于挪威人的无可争议的工艺品。

比较模糊的证据是考古学家在加拿大近北极圈的埃尔斯米尔岛上发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一些遗物，包括木箱、木桶残片，铁制和铜制物品，小船的铆钉，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锁甲。斯堪的纳维亚人或许有可能深入北部至如此之远，但这些遗物同时也可能是从外边运来的货物。

同新大陆的这种有限接触仅仅持续了几个世纪，恶劣的气候阻碍了欧洲人向这里的大规模殖民。983年至985年，冰岛人埃里克成为第一位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家"，当时他在格陵兰发现了"石制工具和武器"，他后来把这些石器同他儿子在温兰德看到的同类古物进行了比较。这一做法使他得出正确的结论："斯克莱菱人"（Skraelings，挪威人对他们在新世界遇到的爱斯基摩人所用的称呼）先前曾在格陵兰居住过。

左图：挪威人莱夫·埃里克松（Leif Erikson）在约985年间发现北美东海岸，长期以来，这一情节便在历史和传说之间徘徊不定。根据冰岛人关于格陵兰人的传说，有一个大概最晚至1200年时编纂成文的故事，莱夫是第一位登上温兰德（葡萄或浆果之地）土地的欧洲人，那是一块冬季无冰冻期、长满野生葡萄和小麦的土地。他在那里备好越冬的设备，于第二年春天同他的随员返回了格陵兰。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由于在纽芬兰北部兰赛·奥克斯·米多的发掘，这个传说才有了确凿的考古学证据。

在克里斯蒂安·克罗格（Christian Krohg）的这幅关于斯堪的纳维亚人首次登陆的浪漫画面上——作于1893年，即戈克斯塔得（Gokstad）号船发现该地之后仅10年——莱夫手把着船舵，正激动地指向那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欧洲之外

相同的信仰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在中非，磨光石斧被当作闪电的造物，人们小心翼翼地世代相传。在西非，穿孔的石头被称作雷电石。当地人把两块出自坦噶尼喀湖西岸的穿孔的石头交到霍尔（Hore）手里。霍尔当时在英国传教协会于1877年组织的远征队里担任船长。在当地人眼里，这些石头被看成是祖先传递来的某种信息，所以他们把石头仔细存放在篮子里或茅屋里。这种遍及黑非洲的传统表明，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人已有了对祖先和古物的兴趣。

据记载，在印度发现第一批磨光石斧的时间是19世纪40至60年代。它们均出土于一些村庄的树木之下。马哈德奥神（Mahadeo）或马哈德瓦神（Mahadeva）在印度农村一般是在菩提树下加以供奉的，因此所有出土的磨光石斧都被放置在这些树下，即使今天也是如此。在北美15至16世纪的一些人类遗址中，有时也能见到当地人在几千年前制造的投石器、石管、铜制工具，它们显然是被后来的人们所发现的古物，并成了后人的崇拜物。在墨西哥的希华阿，发现了猛犸的臼齿，它们保存在帕奎姆的史前印第安人的多层建筑当中，该地是在1400年左右被丢弃的。在特诺奇提特兰城（今墨西哥城——译者注）的阿兹特克大庙中，发现了一个作为奉献品的石制面具，其存在年限比大庙本身还要多2000年。在秘鲁，据说印加帝国的皇帝们因色情需要而收藏着许多世纪前的莫奇人的陶器。

在普通百姓对过去表现出好奇的同时，各个社会的贵族们则对他们特定的起源表现出固有的兴趣。关于祖先和血统的传说有助于巩固贵族的地位，同社会下层保持一定的距离。1692年，一位地方的大名或封建领主为了调查一份碑铭的确切与否而发掘了两座坟墓，这是日本第一次有文字记录的发掘活动。在朝鲜东南部，一位地方总督的父亲于1748年进行了同样的发掘。他挖了六座古墓，为的是想弄清这些古墓是否属于高丽王朝（918 - 1392年）时期的他的祖先的陵墓。

远东对古物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宋朝（960 - 1279年）。当时，儒教在被佛教排挤了几个世纪之后得到复兴。在宋代中国，对过去的黄金时代所持有的高度尊重的态度（孔子于公元前5世纪倡导的一种态度），通过研究和模仿收藏在私人和皇室中的古代青铜器而得以再现。约30个有关古代藏品的目录，包括对古物描写和绘画幸存了下来，这是从文献资料中所知的总共119个目录的一部分。吕大临（Lü Dalin）于1092年撰写了最早的文献，记载了自商代到汉代（公元前1700 - 公元220年）共210件青铜器和13件玉器。这些古代器物的仿制品被用在宫廷仪典当中，目的是巩固和加强宋朝的统治。

在日本，儒教的分析原则——对自然界及其内容进行理性解释，并采用度量、描写和刻画的方法——在江户时期（1603 - 1868年）引起对石头、药草、化石和古文物颇感兴趣的自然主义者的出现。由于缺乏诸如供贵族赏玩的青铜器之类的官方记载，所以像箭镞或石斧这样的日常用品在日本的解释就同西方有所不同。在英国，人们常把史前遗存与腓尼基人、以色列人灭亡的部落或德鲁伊特人（古代克尔特人的知识分子阶层——译者注）联想到一起。而在日本，此类古物或者被认为系最初史书（公元8世纪初问世）中所提到的先民所为，或者归之于北海道岛上的原始虾夷人的遗物。这部分人只是在19世纪才引起日本城市文化的注意。



中国的古物鉴定家。这是由杜谨（Tu Chin）在6世纪晚期所作的一幅画②，刻画了一位富裕的古代青铜器收藏者在庭院里休闲。他新近得到了一些古玩，摆放在矮桌之上，他的一个朋友显然同样是热情的古玩收藏家，正全神贯注地审视着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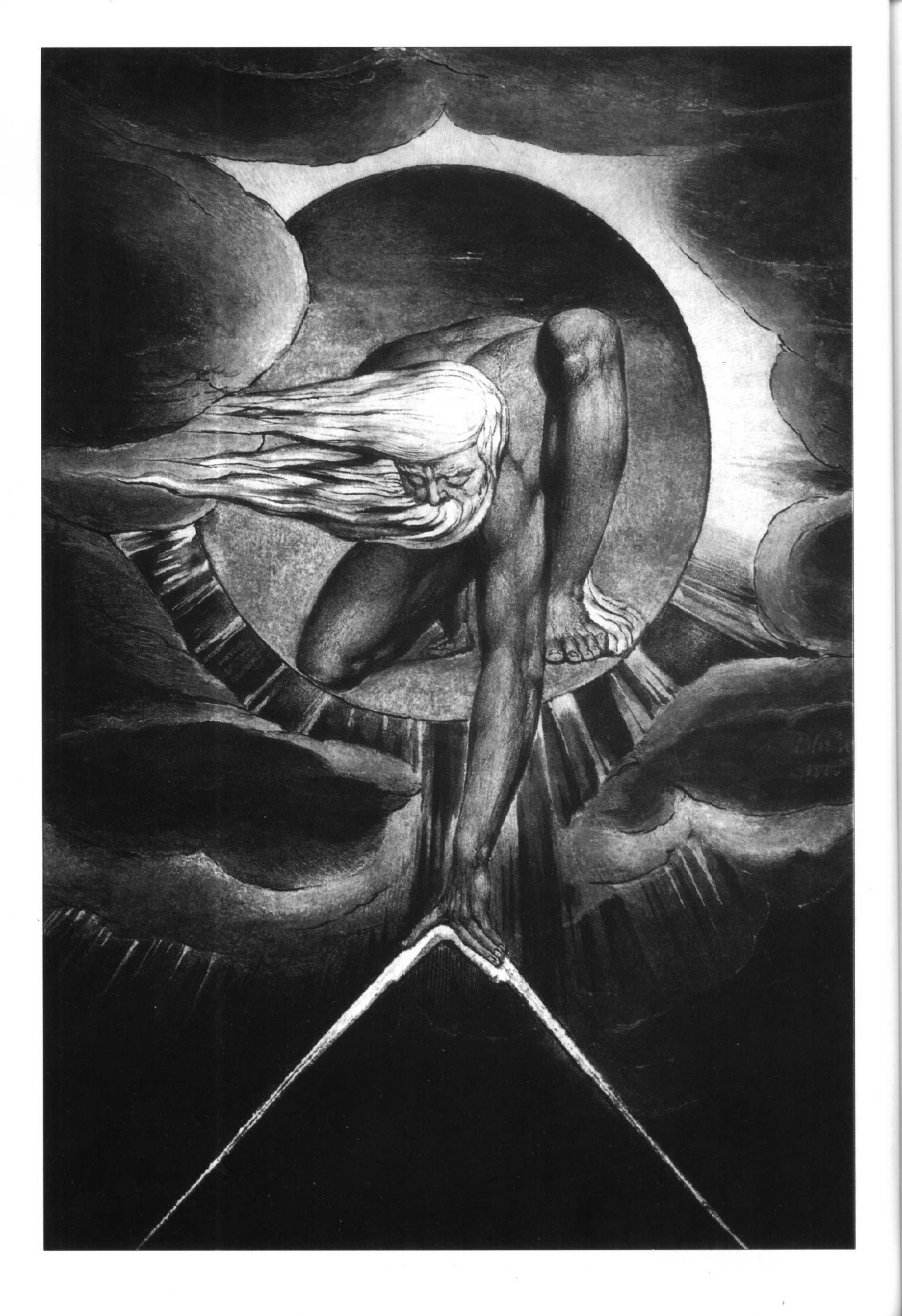
② 中国目前传下来的最早的国画作品是隋朝展自虔的《游春图》，因而本书所说的“6世纪晚期”显然不确。在本书所说的时间(南北朝时期)里，中国尚无鉴赏古物的风气，古物鉴赏之风兴起于宋代。而且虽然南北朝时期出了许多书法和绘画家，但绝对没有叫Tu Chin者。只有明代画家杜谨(16世纪前期人)与之接近。经查此画确系出自杜谨之手，现藏于台湾故宫，画名为《玩古图》——译者注。

人们认为考古遗物是古代史书所记载的那些人的“原始”作品，而非“成文史前”的遗物。例如，儒教史家白石新井把日本的石镞归结到中国史料中提到的古代满洲居民Shukushinjin①人身上。当时尚不知道史前绳纹文化的居民，实际上是这一文化的创造者在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之间制作了这些石器。将这些古物同历史记载分离开来，足足用了半个世纪左右的研究时间。直到1936年，此类古物的纯粹史前性质才在日本得到公认。

寻找时间段

尽管人类有上万年历史的认识早已存在于古希腊人、古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尼亚人以及古代中美洲人中间，但无论在当时的西方还是东方学术界之中，都不存在史前史的观念。人们认为人类事务的唯一构成和世界的起源存在于文字史料当中，对西方人来说，尤其是存在于《圣经》当中。阿尔马的大主教詹姆士·阿瑟尔（James Ussher）于1650年宣称，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中午被创造出来的，这一说法迄今经常受到人们的嘲笑。然而，为整个人类史拟定

① 这一古代满洲居民的英文拼音因无法找到对应的假名，因而也不能找到对应的中文名字，只好暂付阙如——译者注。



一个这样的年表成为17世纪学术活动的主要任务。阿瑟尔绝不是第一位大胆定年的人。受人尊敬的英国8世纪时的历史学家比德（the Venerable Bede），把创世纪的时间定在公元前3952年。而在犹太历法中，将创世纪的时间估计为公元前3761年的做法，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存在。

阿瑟尔所说的年代对当时来说完全是常见的传统。但与流行的误解有所不同的是，他的这个结论不是通过把《旧约全书》里的所有具有血缘联系的人的存在时间累加后得出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他用以替代的方法是将上帝创世纪所用的6天时间当成6000年，想象出在上帝那里，一天等于地上1000年。这在当时是一种广泛流行的说法，这意味着大地是在基督降生之前4000年就被创造出来了，在基督降生之后又经历了2000年的时间。多出来的4年则出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希律死于公元前4世纪。这就形成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基督降生之年。诸如比德之类的学者则想象创造天地万物的时间在春季，因为这是适宜生命出生的季节。其他人则是秋季创世纪的拥护者，因为犹太历法中的犹太之年是从那个季节开始的，而希伯来的经书是这一纪年体系的基础。阿瑟尔挑出秋分（在旧罗马历中的10月）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作为开始日，武断地把创造第一道光作为他的年表的开端，他猜测这个时刻必定发生在中午。其他学者，如17世纪的牧师约翰·莱特福特同样随心所欲地将开端设定为早晨。他写道："天空和大地，中心与其周围之物，都是在同一时刻从充满了水分的云团中创造出来的……这一切发生了，而人类是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早晨9点由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之神所创。"

今天看来，阿瑟尔和莱特福特的这些算法显然是极端幼稚的（尽管现在仍有某些人认为创世纪的时间系完全由信仰所决定）。但这些人毕竟是聪明的学者，他们的结论在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得到了广泛认同。他们的这种幼稚性有两个可以理解的原因：首先，这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当时认为《圣经》是上帝绝对正确的代言书，具有至高无上、无可争议的权威。其次，阿瑟尔和莱特福特生活在前科学时代，是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基于自然科学而非圣书的年表能够确立起来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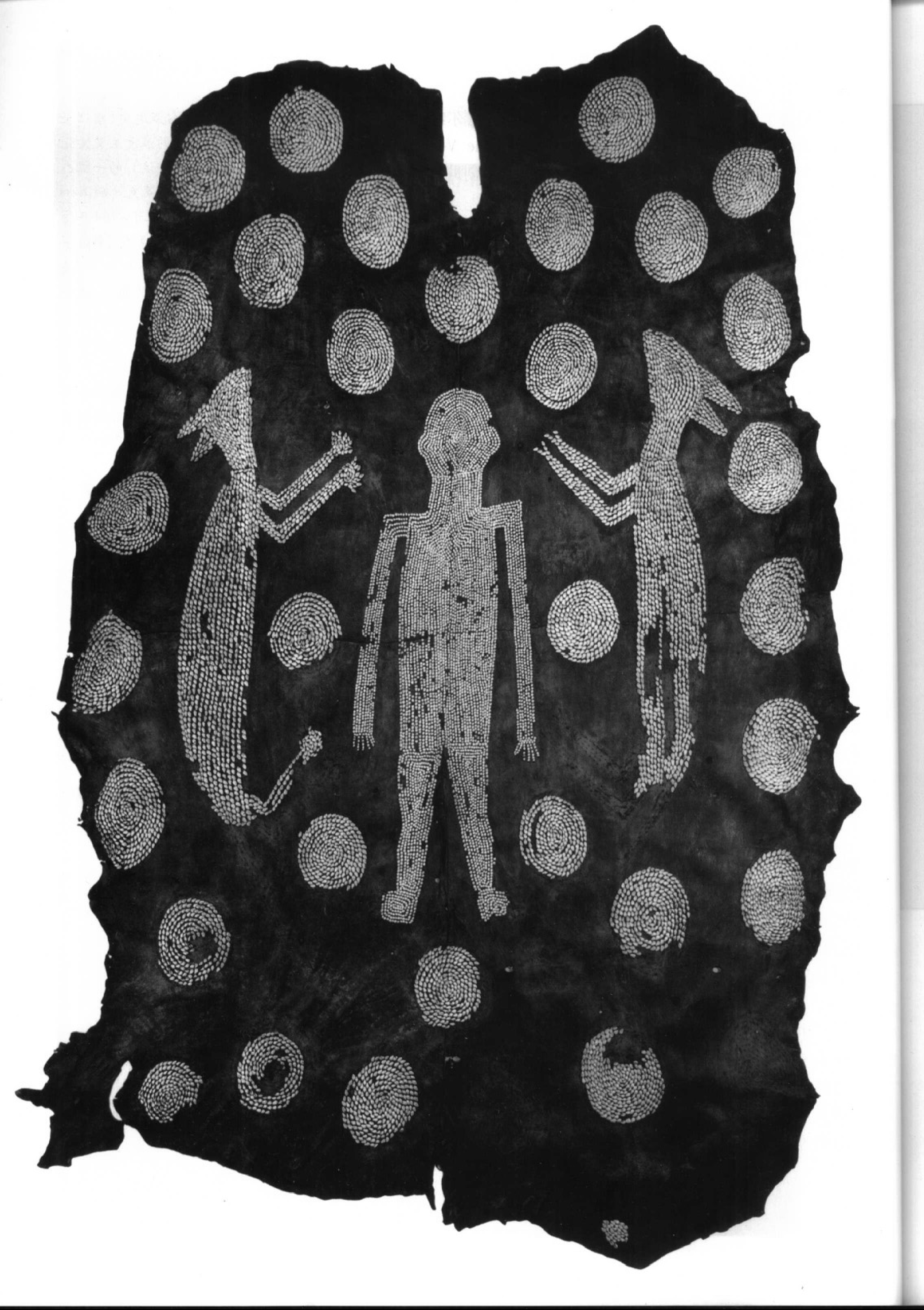
这是对久远的过去加以理解的第一束闪烁不定的亮光，是把人类史置于一个固定的时间框架内的最初尝试。即使是在这一时期，有些先驱者便已开始意识到，土壤的下面有可能清晰地告诉我们关于过去的情况，这些情况大概比文字史料还要可靠。而且各种古文物加深了这种印象，增强了人们对自己先人的尊敬，促使人们对时代、生死本身的性质进行深沉的反省。正像古物研究家托马斯·布朗医生于1652年在诺福克郡发现瓮棺墓葬时所说：

> 对我们的这些骨灰瓮，这里没有人能自称与之有关系，我们只能注视着这些人的遗物，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将法律赋予他们的后辈，在漫长的模糊不清的时代之后，现在却成了后辈摆布的灰烬。但要记住是他们把早期的文明带到了这些乡间，让我们忘掉早已逝去的各种灾难，宽厚地保存而不是亵渎他们的骨灰。

左图：狂飙运动（指18世纪后期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化运动——译者注）的一幅杰作。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凭借想象于1794年绘出《古老的日子》或《创造宇宙的上帝》一图，概括了《圣经》关于创世纪的描述，这种特创论直到19世纪中叶仍在人们的头脑中广泛占据着支配地位。

布莱克灵感的直接源泉大概是弥尔顿的《失乐园》（第7章，第225－227行）：

> 他从上帝永恒的备用之物中，取出那黄金制做的圆规，他在周围画出了宇宙，以及所有的造物……



第二章 旧世界和新世界（1500-1760）

16世纪到18世纪是欧洲海外扩张的世纪。我们在这个时期看到了古物研究之风的兴起。这是一种对过去遗存的日益强烈的感知，与之相伴的是对那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远在天涯的异族社会的发现。尤其是美洲人的相貌举止和生活方式，从西方人的角度看简直迥然有别，于是他们很快就把印第安人同古典史料中所知的、旧大陆的古代民族联系到了一起。

左图："波瓦坦"的长袍，用七头白尾鹿皮制成，上缀数千个贝壳饰品，大小为2.35(8英尺)×1.6米（5英尺），是17世纪早期英王查理一世的园丁约翰·特拉德坎特父子得到的一件最著名的、来自新世界的珍品。有位在1638年参观过位于朗伯斯区[②]特拉德坎提乌姆博物馆的人，曾记载他见到的"弗吉尼亚国王的长袍"，并说这件后来被称作"弗吉尼亚之王波瓦坦的长袍，四周用贝壳或劳诺克[③]镶边"。

波瓦坦即波瓦坦联盟至高无上的首领瓦汉索纳考克（Wahunsonacock），他是印第安公主波卡洪达丝之父。他的女儿在詹姆斯镇皈依基督教，嫁给一位英国人，并于1616年被带到英国，晋见过詹姆士一世，还在王宫内受到宴请。到英国第二年，她因染上天花而去世，享年22岁。

由于特拉德斯坎提乌姆博物馆关闭，"波瓦坦的长袍"于1659年落到古物家埃利阿斯·阿什莫尔（Elisa Ashmole）的手中。阿什摩尔于1692年去世后，它成为牛津阿什摩尔博物馆的藏品，而且是镇馆藏品之一。

遭遇其他文化

15世纪末，欧洲人同新大陆的接触日渐增多，如意大利探险家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其中卡伯特于1497年从北部登上布莱顿海角的岛屿，哥伦布则于1492年在加勒比海地区登陆。哥伦布的双脚踏上新世界的土地一事，引起了知识界对《圣经》逐字逐句的批判。因为在《圣经》中，只字未提过新大陆或新大陆上的居民，所以论争很快就集中在有关美洲当地人（被误称为印度人，即印第安人）是否属于人类的问题上。如果说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应该如何解释他们的存在？一种流行的理论（即便在今天，摩门教会仍在坚持）认为他们是所谓已消失了的以色列部落的后代，即《约书亚书》中所描述的被以色列人从上帝赐予的"应许之地"逐出的那些人的后代。

后来欧洲人受到了更大的冲击，他们发现新大陆文明的先进和成熟的程度，丝毫也不比他们自己的文明逊色，于是有关印第安人是否人类的问题就几乎不再有人提起了。1519年，西班牙人赫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 Cortes）在尤卡坦半岛、即今天墨西哥所在的地区登陆，以便深入该岛内地，对各种有关这个重要文明的传说进行实地调查。他为了使自己的追随者矢志不移，竟破釜沉舟，烧毁了自己的船只。他和当地一些对墨西哥帝国统治颇为不满的集团结成了同盟。墨西哥帝国通常又被称作阿兹特克帝国，而阿兹特克是一个生活在墨西哥版图内的民族的名字，帝国的统治者实际上称他们自己为墨西哥。

科尔特斯及其追随者没有料到他们竟进入了这个帝国的中心地带，抵达了巨大的城市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an）[①]。经过一番努力，科尔特斯活捉了墨西哥统治者孟特祖玛，并于1521年成功地控制了这个帝国。无论科尔特斯多么不经意，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与他所属文明同样复杂和人口众多的另一个文明。此前，欧洲人连做梦也没想到在所谓野蛮人的土地上，会有如此辉煌和富足的文明存在。墨西哥的征服激起了一代西班牙人对美洲大陆的移民潮，为了寻求大量的财富，他们驱船驶向新世界。

与科尔特斯首次发现墨西哥同年，西班牙人在现今巴拿马城建起了一个打造船只的殖民点，这促进了对新发现的太平洋地区的开发。殖民者很快听说还有一个伟大文明，位于南美西海岸南部的一个叫作"比鲁"（Biru）的岛上。于是，弗

① 今墨西哥城——译者注。
② 伦敦坎伯德雷大主教官邸所在地——译者注。
③ Roanoke，弗吉尼亚的一条河流和城市名，这里可能指一种特有的河贝装饰——译者注。

特诺奇提特兰城

西班牙征服者赫尔南多·科尔特斯在向墨西哥帝国的中心地带进发期间，攀上了一处山岭的顶峰。他看到下面是一片广袤的平原，巨大的波波卡特贝特火山和伊兹塔齐华特尔火山的峰顶覆盖着冰雪，在平原上投下了阴影，四周为峰坡树杪所环绕。平原的中央有五个巨大的湖泊。墨西哥的首都、岛屿城市特诺奇提特兰看上去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几十座高耸的金字塔装饰着城市，上面用石灰水和染料涂抹的色彩灿烂夺目，三条铺设好的道路从东面将城市和大陆连结起来。这些西班牙人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这座城市，所以对这种奇异的景色毫无准备。特诺奇提特兰，这座延续了30个世纪的中美洲文明的承载者，现在正处于毁灭的边缘。

该城大约于1345年建立，目前几乎完全隐埋在现代墨西哥城那横七竖八的城区之下。要对它的实际规模进行估计是不容易的，但人们认为如果把位于湖泊岸边的郊区也算进去的话，特诺奇提特兰至少拥有20万人口。它的领土分成四部分，体现了墨西哥人对宇宙和世界的划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符号、颜色和神灵。如同中美洲的早期城市一样，该城的布局呈网格状，这具有象征性的、多半是天文学方面的意义。在这一象征性的宇宙的中心，亦即城区四部分相交的地方，是特诺奇提特兰的心脏，是整个墨西哥文明最为神圣的地区，那是一些最重要的宗教建筑的所在地。

在神圣的中央广场上，有座全城最引人瞩目的建筑——宏伟的双重金字塔，这是墨西哥人的大神庙。1978年，墨西哥城照明和供电公司的工人偶然发现了它的遗址。随后10年，为使这片圣地重见天日而连续展开发掘。该金字塔相当于5层楼高，正面有两条平行而陡峭的台阶，顶端是两座神庙：一座供奉雨水之神特拉劳克（Tlaloc），一座供奉战神惠兹洛－波克提里（Huitzilopochtli）。两座神庙的正面均有一块奉献牺牲的大石，上面摆放的是活人祭品，祭司们要从牺牲的胸腔内取出仍在跳动的心脏献给太阳神。据说大庙在一次修缮之后，曾将8万人作为献祭仪典的牺牲，整个献祭仪式持续了4天，大庙竟浸泡在人牲的血流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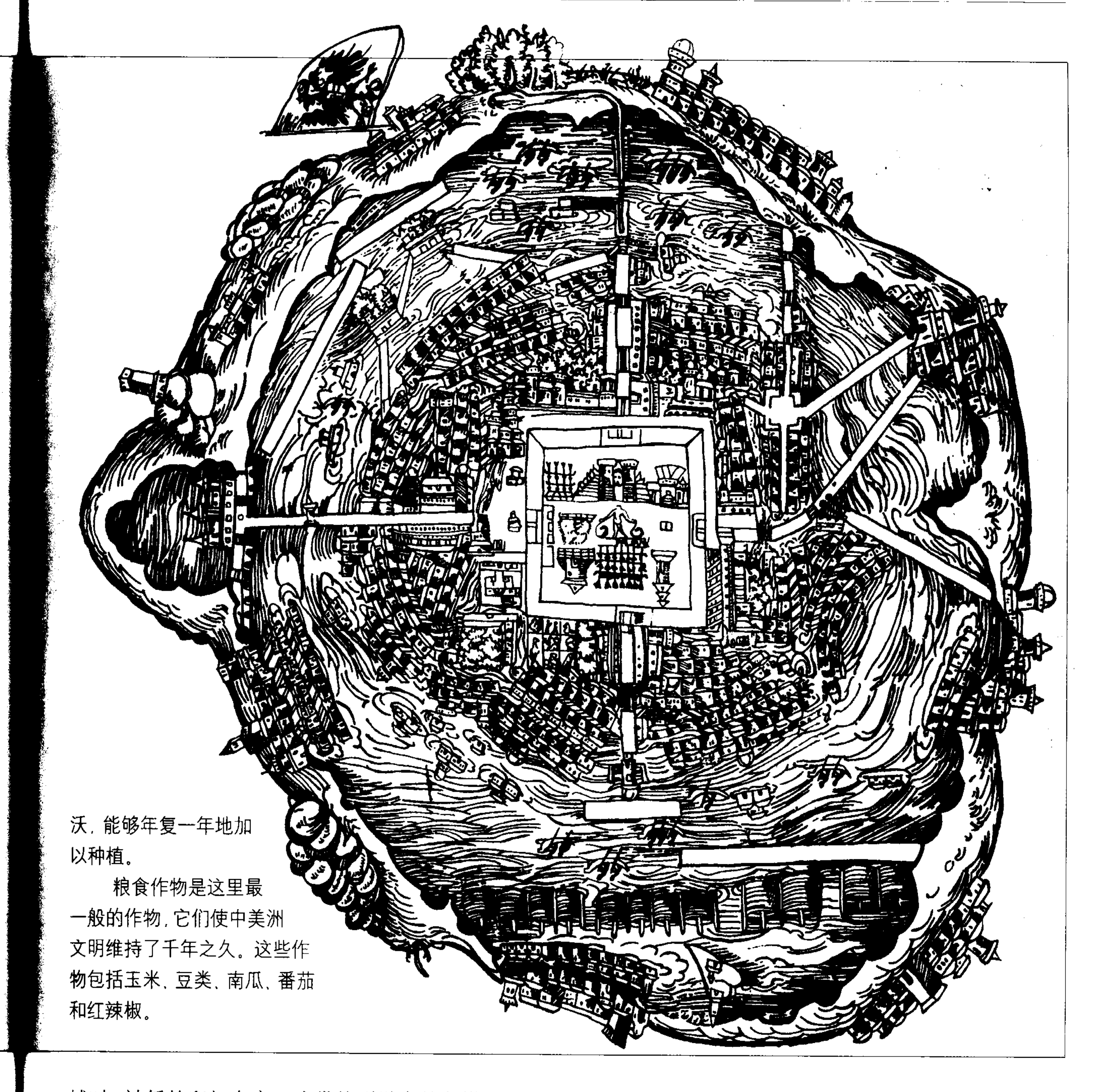
在神圣广场两侧的其他庙宇中，有些是供奉风神、迅捷如飞的蛇形神奎札科特尔（Quetzalcoatl）的。这些庙的辅助装饰是一些经过雕镂的巨石，其中一块石板的直径长达10英尺（3米），上面雕有墨西哥历法的详细情况。有座小庙象征一个"赞潘特里"（tzompantli，头骨架），它四侧的石雕是240个人头骨。这类头骨架是供摆放某些牺牲者的头骨用的。

广场上还有一个球场，这是为一种相当残忍的宗教体育比赛而修建的。参赛的两队使用一个实心的大橡胶球（rubber ball）。在赛后举行的仪式中，要将失败的一方作为祭祀的牺牲。考古证据表明，这种球赛的规则和目的虽然仍旧不明，但早在公元前一千纪左右，居住在海湾沿岸的印第安人的一支奥尔梅克人（公元前1200－前400年）以及占据墨西哥南部和危地马拉的马雅人（公元300－900年）便已玩这种游戏了。

在特诺奇提特兰城的周围，人们从湖底挖出淤泥堆在浅滩处的芦苇席上，形成高出水平面的一个个长形土墩。土墩的两头用树木加固，树根扎在苇席和湖底。相邻土墩间的水路可供独木舟通行，便于人们进行栽培、施肥和收获果实。每天早晨，人们用小船把从城里收集来的人的粪便运到这里贮存，使得这些袖珍田地变得十分肥

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在1524年开始了一系列探险活动中的第一次行动，这些探险最终发现并征服了印加帝国。印加帝国是人们所知的新大陆的最大帝国，其版图囊括今天的厄瓜多尔、秘鲁、智利北部及阿根廷西北部。

皮萨罗在展开第三次成功的远征之前，曾回西班牙待了不长的时间。他会晤了科尔特斯。科尔特斯鼓励他坚持自己的目标。所以在1532年11月16日，皮萨罗去面见印加皇帝阿塔华尔帕（Atahuallpa），地点在秘鲁北部的卡加马尔卡（Cajamarca）城。阿塔华尔帕在本国新近的一场血腥内战中，曾遭到数千印加老兵的围困却大获全胜。所以他觉得没有多少理由惧怕150个陌生的来客。结果证明这是个致命的错误。由于皮萨罗运用了科尔特斯屡试不爽的策略，他一下子便将那位皇帝变成了阶下囚。他要阿塔华尔帕用难以想像的大量金银来赎买自由，按现代货币来衡量，其价值要超过一千万镑。当金银财宝不断涌流进卡加马尔卡



沃，能够年复一年地加以种植。

粮食作物是这里最一般的作物，它们使中美洲文明维持了千年之久。这些作物包括玉米、豆类、南瓜、番茄和红辣椒。

城时，被俘的印加皇帝一边借他刚学会的象棋来消磨时间，一边期待他的朋友皮萨罗给他一个美好的结果。但由于惧怕印加人的暴动，这位西班牙人最终背信弃义，将阿塔华尔帕处以绞刑。

随着征服墨西哥和印加的消息为世人所知，有关美洲拥有大量财富的其他故事更加刺激了西班牙人的想像力。为寻找诸如南美北部的黄金国这样一些神话中的伟大文明，人们进行了多次探险。在找寻墨西哥北部的希波拉（Cibola）的过程中，西班牙探险者弗朗西斯科·瓦兹奎兹·德·科罗纳多（Francisco Vazquez de Coronado）于1542年派遣一支探险队去寻找所谓的七座城市，据说这七座城的街道都是用黄金铺设的。他的人马的确在北美洲西南部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部落，最有名的是新墨西哥的苏尼人，他们杀死了科罗纳多的代理人伊斯特本·穆尔。但这些部落社会较之墨西哥人或印加人的社会要简单得

墨西哥帝国的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城的平面图，据说由赫尔南多·科尔特斯本人绘制。该城被泰克斯可可湖（Texcoco）所环绕，通过一些堤坝上的道路和沟渠同大陆相连。特诺奇提特兰城在宏大的规模方面堪与任何欧洲城市相媲美。科尔特斯的这张地图在1524年出版于纽伦堡市。



1521年的掘金者。同代人菲力普·圭亚曼·波马绘，画中描绘西班牙人与印加人的接触。印加皇帝（左侧）坐着同一位西班牙人交谈。在他们身后是印加建筑物——库房和神庙。在盖丘亚，该印加人正在问西班牙人是否吃黄金的问题，那位西班牙人的答复是肯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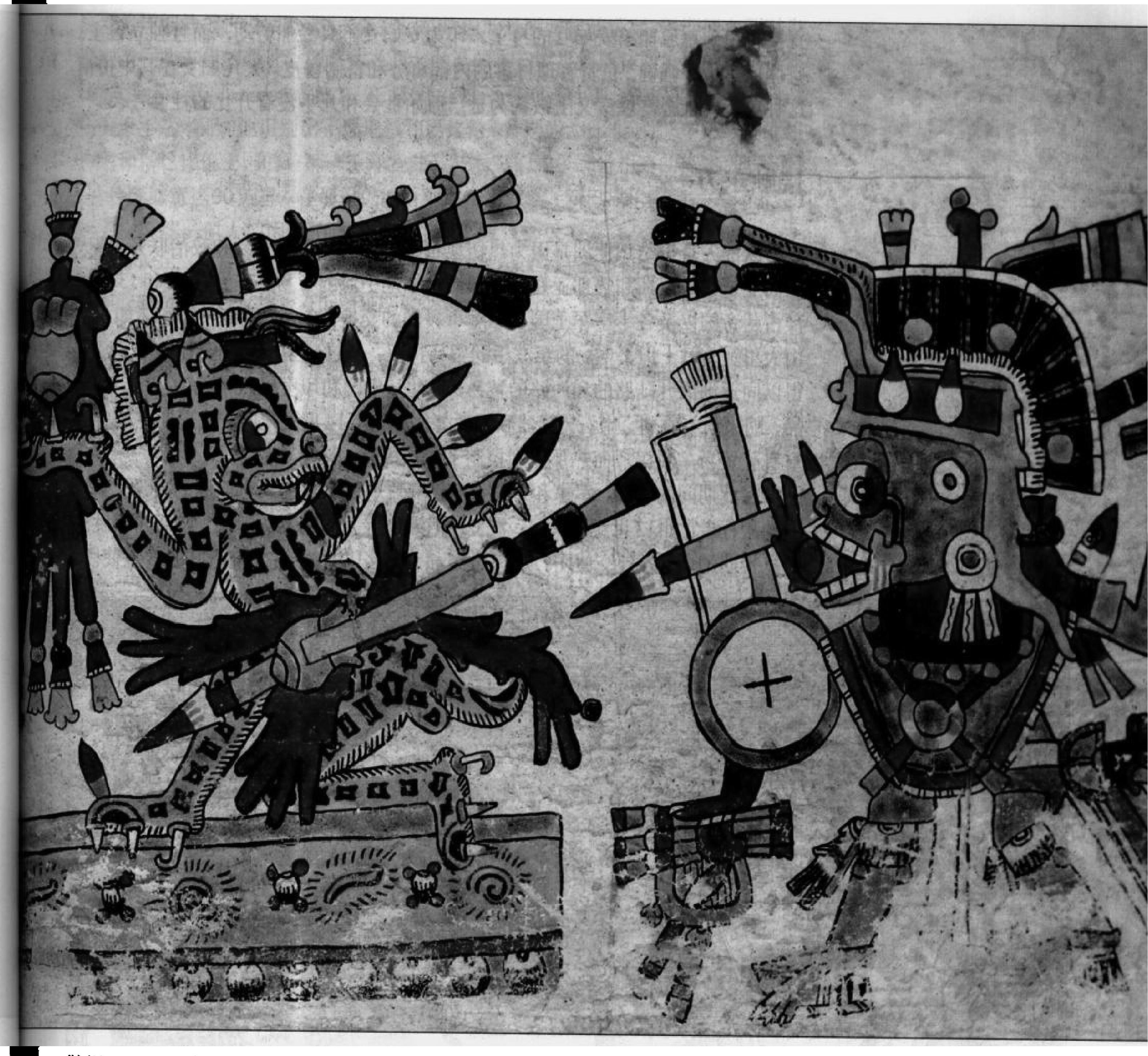
多，没有什么黄金遍地的城市。于是欧洲人寻找神话般财富的热情开始消退了。

与此同时，天主教会在西班牙的领地上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一些神父对印第安人是什么人、他们来自何处的问题争论不休，其他神父们则致力于摧毁所有异教崇拜的证据。为数众多的有关墨西哥和马雅文明的文字史料在中美洲被焚毁了，以致今天马雅人的四部主要的法典仅有部分片断残留下来。然而在尤卡坦，迭戈·德·兰达主教对古代马雅文明的废墟表现出巨大的兴趣，他成了第一位能够理解错综复杂的马雅历法的欧洲人。这种复杂的历法是建筑在相互联系的时间循环和天文观察基础上的，累计着自时间开端以来的天数。马雅人的日期用象形文字刻写在每一座重要的纪念石碑之上。

另一位神父巴尔托洛姆·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认为，生存在他周围的各民族来自过去的文化，而正是这些过去的文化造就了那些古代的遗址。他看到复杂的社会原本是从较早的、更为简单的社会脱胎而来的。他还是当地居民权利的坚定捍卫者。他竭力保护印第安人，避免欧洲人的胡作非为。在南美，彼得罗·德·西札·德·莱昂（Pedro de Cieza de Leon）游览了先前印加帝国的大部分领土，记述了途中访问的各个地区。他提到诸如瓦里和前印加帝国的首都提亚华纳科（Tiahuanaco）这样的重要遗址。他大概是第一个认识到其他文明在印加文明之前便已存在的人。这些西班牙神父和旅行者留下的诸如此类的记录，成了对美洲伟大的前西班牙文明后裔的最早的人种志记载。

早期欧洲人在北美的开发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各重要势力开发这块大陆基于不同的原因，但他们均利用当地部落成员作为战争的雇佣兵。西班牙人大批抵达这里是在16世纪，有些是经陆路从墨西哥进入北美西南部地区的，其他人则乘小船进入佛罗里达及其东南相邻地区。他们的目的首先是寻找黄金。在教皇保罗三世于1537年发布敕令说美洲土著属于人类，因而其信仰是可以改变的之后，西班牙人还力求使当地人皈依天主教。法国人派出了他们的探险家雅克斯·卡蒂埃。他于1534年开始了7年之久的航行，此间曾进入圣劳伦斯湾。尽管法国神父也在他之后来到这些地区，但卡蒂埃的意图却是开发诸如渔业和毛皮贸易之类的商业资源。英国人基本上是抱着实用和世俗的目的到这里来的，他们对加拿大土地的兴趣来自毛皮贸易的需要，对东部沿海地区的兴趣则是为了土地开发和在那里殖民。

早期欧洲人对于他们所遇到的土著居民的态度是千差万别的。一方面，土著美洲人被认为是无人性的野蛮人，没有一丝一毫的文明成分。另一方面，作为野蛮人，他们具有天然的品质，而这正是腐朽的欧洲人所欠缺和丧失了的。一位美国教士卡顿·马瑟（Cotton Mather）因写了382本书而没有被人遗忘，他极为



宇宙间的冲突。这是出自马雅人古代典籍的一幅插图的细部，目前收存于博洛尼亚。图中描绘金星之神特劳伊克斯卡尔潘泰库特里（Tlau-ixcalpantecuhtli）攻击一个虎猫状的武士，他的矛刺入了那个武士的心脏。

傲慢，于1692年在撒勒姆进行了巫术审判，认为印第安人过于野蛮，以至不可能皈依基督教。与此截然相反，19世纪早期的画家，如宾夕法尼亚人乔治·卡特林便把密苏里州中部草原的印第安人描绘成浪漫的武士，他们因尊严和勇敢而闻名于世。他甚至带着三个印第安人随从到欧洲各宫廷进行游说旅行，说服人们对印第安人蒙受的灾难表示同情。这两种态度都是不现实的，无论哪一种都使美洲土著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欧洲人之所以对印第安人具有歪曲的印象，是因为他们是用欧洲人而非印第安人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他们的。18世纪的毛皮商对印第安妇女的看法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当时的欧洲，妇女被视为男人的装饰物，一位参加工作的妇女，尤其是参加体力劳动的妇女，其地位被认为较不劳动的妇女要低下。这种价值判断被

直接转用到草原印第安妇女的身上。印第安妇女不只参加劳动，而且独立自主，身体通常十分强健，负责管理村落的内部事务和备制兽皮。大凡妇女在其中扮演这种角色的社会，在广义上被认为是“原始社会和几乎没有开化的社会”。

接触东方

欧洲人直接结识亚洲是因为热切地希望加强同那里的贸易和政治联系。意大利商业城市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当时统治着东地中海的贸易。作为对12和13世纪拜占廷帝国以及各十字军王国予以军事援助的交换，这两个城市获得了诸如亚历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的黎波里的贸易特权。通过这些巨大的交换中心，欧洲得以同亚洲展开陆路的和海路的贸易，借此从中国和印度输入精美的丝绸、棉织品、胡椒粉与香料、宝石、瓷器和其他奢侈品。至14世纪末叶，威尼斯在地中海享有了贸易垄断权，而热那亚则控制了经过黑海的陆上商路。

在此期间的贸易、军事和外交接触，日益增加了欧洲人对亚洲的兴趣。到中国的旅行者，如13世纪的马可·波罗，把沿途有关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印度的信息带回国内。各外交使团，如13世纪和14世纪驻节蒙古人统治区的教皇使团，



也带着详细的报告返回欧洲。大多数记载谈论的是同时代的情况，但即使在那时也提到了一些古代的遗址。图莱达（Tuleda）的本杰明是穆斯林西班牙的一位拉比（犹太学者、法师——译者注），在1160至1173年间进行了一次周游世界的旅行。在美索不达米亚，他识别出了尼尼微和巴比伦（分别为《旧约全书》中记载的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的首都——译者注），并对它们做了一番粗略的描述。他写道"这片废墟宽达30英里，在那里仍能看到尼布甲尼撒（新巴比伦国王——译者注）的王宫废墟，但人们因害怕毒蛇和蝎子而不敢到那里去。"

1498年，即瓦斯科·达·伽马在印度西南岸的卡利卡特登陆并因而开辟了绕道非洲的海路之后，发现东方的速度明显加快。作为回应，葡萄牙人在欧洲的竞争者也加强了对东地中海到印度洋和中亚的陆路开发。在整个16世纪，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继续借助于连接波斯湾和地中海的商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者取代拜占廷成为东地中海的支配力量后，将特许权授予外国商人，以促进商业的发展。外商社区在黎凡特的一些主要城镇中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携带着东方货物的商队纷至沓来。某些敢于冒险的欧洲商人还涉足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甚至远至印度，见到了处于这些遥远国度中的古城废墟。

欧洲人已经对《圣经》中记载的那些靠近地中海沿岸的地点很熟悉了，巴勒斯坦对朝圣者尤其具有吸引力，牵动着那些虔诚的基督徒们的好奇心。比如像亨利·蒙德雷尔（17世纪晚期在阿勒坡的一位英国牧师）这样的观察者便考察了位于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罗马大神庙——巴尔贝克神庙的废墟。个别商人甚至开始收集到铸币、铭文和其他古文物，尽管他们的努力尚不足以同他们在土耳其西部对希腊和罗马雕像的全面洗劫——为了供英国贵族花园做优雅的装饰之用——相比。

在更远的东方，有关巴比伦和波斯波里的问题经常出现在旅行家的记述里，这是西方文化同古代近东文明的第一次直接相遇。《圣经》仍旧是理解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历史信息的主要来源。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文献的重新发现，使得古希腊和罗马人对这些显赫一时的伟大城市的记载，越来越为欧洲人所知。莱昂哈特·劳沃尔夫（Leonhart Rauwolff）是一位来自德国奥格斯堡的医生，他于1573至1576年进行了一次穿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旅行，他认为自己看到了巴别通天塔（古代的杜尔·库里伽尔祖，其废墟仍保留在地面之上达55米高）。当他想起《圣经》中的记载时，他说自己看到了毁灭的"巴比伦"，这"对于所有三心二意和傲慢无礼的暴君是最可怕的范例"。10年之后，英国商人约翰·埃尔德雷德（John Eldred）把巴别塔描述成边长四分之一英里，用土坯砖垒砌、砖缝间垫有苇草的建筑。埃尔德雷德还把这座废墟同在伦敦新落成的圣保罗大教堂进行了比较。另一位英国商人兼传教士约翰·卡特莱特（John Cartwright）在巴比伦遗址待了一些天，他发现那是一座极为庞大和形状不规则的土山。他因考察巴比伦而使他（1611年所作《传教士游记》中）思考了人生无常的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公正地问：这座一度令人敬畏、雄居世界的骄傲城市变成了什么？它的喷泉、它那稀有的浴室、巨大的塔楼、伟大的神庙、美轮美奂的王宫及其国王们的其他奢华纪念物现在何处？唉！流逝的时光，湮没这一

左图：是高贵的野蛮人还是残忍的蛮族人？这幅出自列·莫奈《美洲》一书中的雕版画——《奥提那人如何处理那些被杀的敌人》，虚构了北美印第安人的残忍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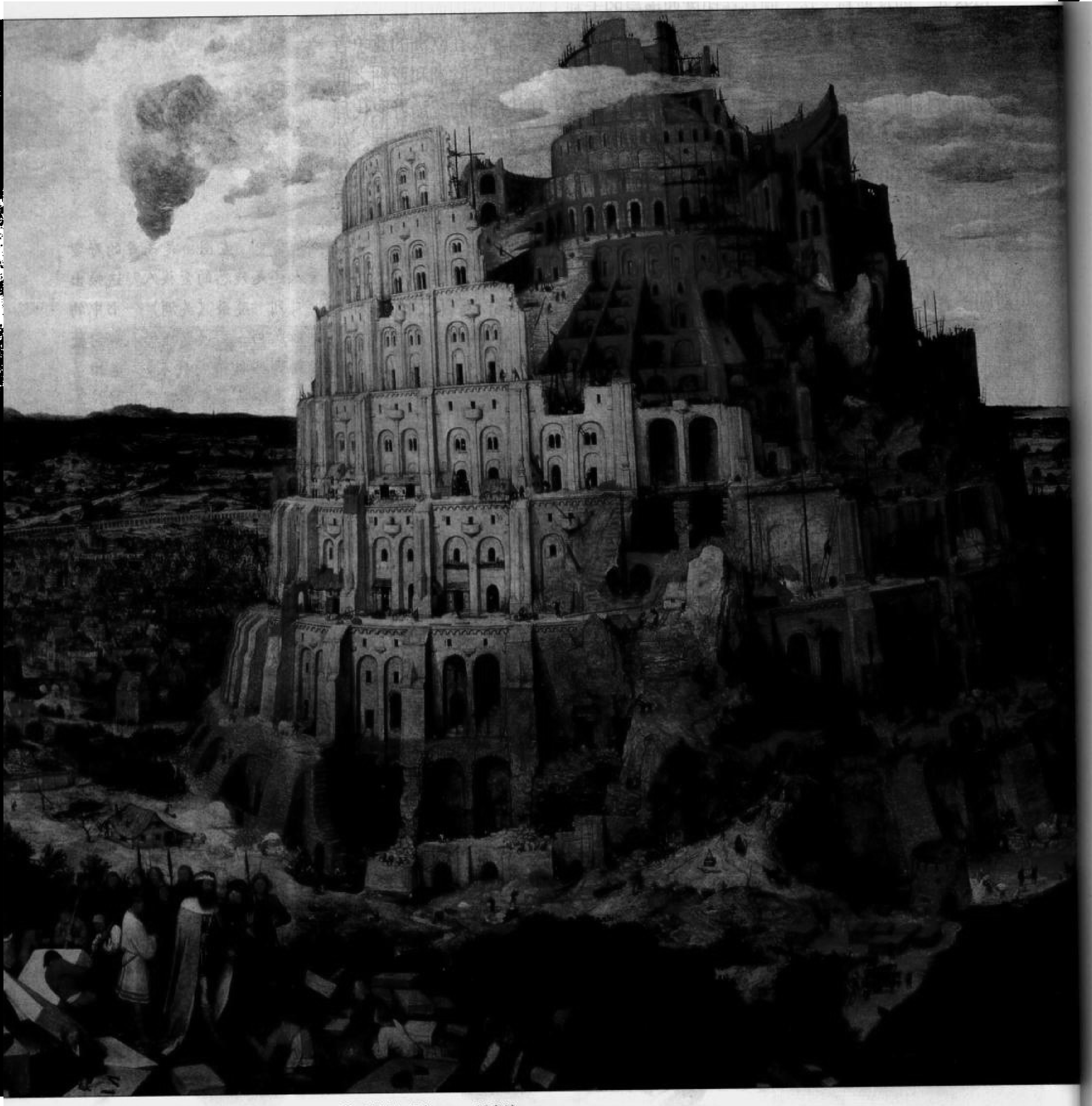
在他们与敌人的冲突中，任何死者都被他们立即肢解，其目的是：人们用比钢刀还锐利的芦苇片，从前往后环行割开死者的头皮直至头骨，将长一英尺半多的头发连皮拔下，拢到一起，在顶部打一个结……之后……他们在地上挖一个洞，点着火……然后烘烤这些剥下的头皮，直到像羊皮纸一样干燥。他们还惯于在一场战斗之后，用这些芦苇刀自死者肩部附近切下他们的胳膊，自臀部附近割下大腿，弄断骨头，再用一根木棒支起它们，将这些新切下的、仍然滴着鲜血的残腿断臂放到同一堆火上烤干，随后把它们连同头皮挂在他们的长矛头上，作为战利品携带着返回家园。

《圣经》里刻画的形象。对近东的早期考古发掘，是由于对《圣经》提到的诸如巴比伦以及巴别塔之类遗址的好奇心而引起的。这幅画由老彼得·布鲁格尔所作（约1515－156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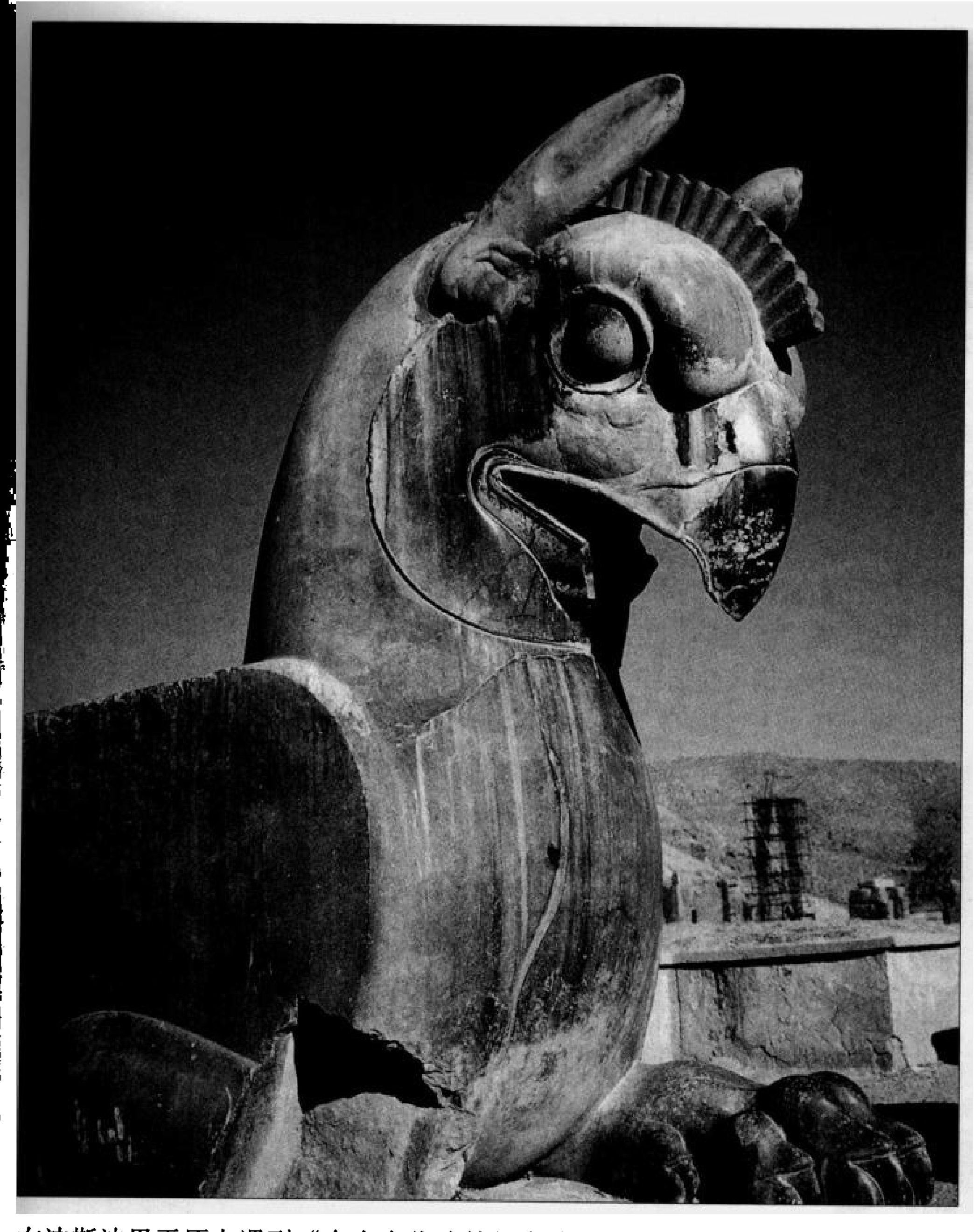
切，我们因此可以说：

为什么死去的人使我们惊异？
因为纪念碑崩塌，
塔楼倾覆，建造者的名字，
已经无影无踪。

卡特莱特还拜访了波斯波里①，他从古希腊人的描述中知道了这个城市。他



① 波斯古都之一——译者注。



波斯波里的巨大狮身鹫首怪兽。波斯波里的宫殿由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皇帝大流士在大约公元前518年所建，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0年占领并焚毁了该城。波斯波里的废墟吸引了众多17世纪的旅行家。

所有这些人中最有影响的是托马斯·赫尔伯特。他在1627年周游了沙·阿巴斯的王国，行程2900公里（1800英里），陪伴他的是詹姆士一世派遣的新任驻伊朗大使多德摩尔·科敦爵士（在这次旅行的途中过世）。

赫尔伯特生动地记载了伊朗南部和波斯波里废墟的景致，描述了矗立在宽大的石基平台上的、用圆柱支撑的迷人建筑。这些记载在他回国后得到发表，对英国读者起到了一种启示作用。

在波斯波里平原上遇到“众多古代建筑的废墟”，其中包括“据说由居鲁士修建的美妙的宫殿废墟”，以及“一座上面建有精致的殿堂的山，大部分古代波斯的国王安葬其中”。

几年之后，即在1615年，伟大的意大利旅行家彼特罗·德拉·瓦勒（Pietro della Valle）到圣地去朝拜，之后游历西亚，在印度生活了一年。10年后他返回罗马，携带着来自巴比伦和乌尔的刻有铭文的砖头以及在波斯波里发现的铭文抄本。他的铭文使得欧洲首次结识到——倘若仅仅是好奇的话——楔形文字，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使用的钉头状的文字。

在这一时期，材料的积累还带有偶然性，不过是因个别旅行者的一时兴趣所致。然而至少到了17世纪中叶，欧洲人对近东地区出现了较为系统的古物学方面的兴趣。欧洲最早的学术团体开始向那些到东方去的旅行者交待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涉及到古代遗址。例如伦敦皇家学会在1667年给即将去波斯设拉子的一位商人草拟了若干关于波斯波里的问题。其他商人因好奇心的驱使，

也主动去调查一些问题。有两位这样的人，在听说叙利亚沙漠中有一座城市废墟的流言之后，曾试图到那里旅行。两人的初次尝试因一些难以解决的条件而受阻(1678年)之后，他们终于在1691年到达被证明是古代商业集散城市的帕尔米拉。他们关于这次旅行的记载于1695年由伦敦皇家学会出版。其中描述了他们遇到的文物。我们可把这次活动看作是在近东进行的第一次专门性的考古远征。

右图为吴哥窟。这些神采各异的浮雕立在莱波王的梯形台座上，看上去栩栩如生，如同葡萄牙人初访柬埔寨时首次看到的那样。

吴哥为柬埔寨高棉国家的首都，这个国家在9至14世纪期间占据了印度支那大部分土地。吴哥地区曾拥有两座由城墙环绕的古代城市，其中一座城市的护城河同较早的那座的护城河连结在一起。雅梭哈拉普拉城由高棉国王雅梭瓦尔曼一世（约889－900年在位）修建，吴哥的中央建筑巴洋（Bayon）由国王迦雅瓦尔曼七世（约1181－1219年在位）建造。

巴洋被描述成“一朵石花”，用来作为这座首都的天然中心和世界的哲学中心。迦雅瓦尔曼七世的头像被雕刻在这座多塔的建筑物的四壁上，监督着这个世界。他面部的神情也表现在位于建筑物内部的佛陀雕像的脸上，以说明国王具有神性。巴洋周围完全由雕像和条状的雕塑构成的回廊所环绕，上面刻画着伟大的战役、隆重的游行以及节庆的景象。

如同中美洲的古代马雅文明的各个中心一样，吴哥由众多神庙构成，世俗建筑极少。这里的贵族和平民居室多半是夹杂在这些巨大石砌建筑之间的草木结构的房子，使用寿命很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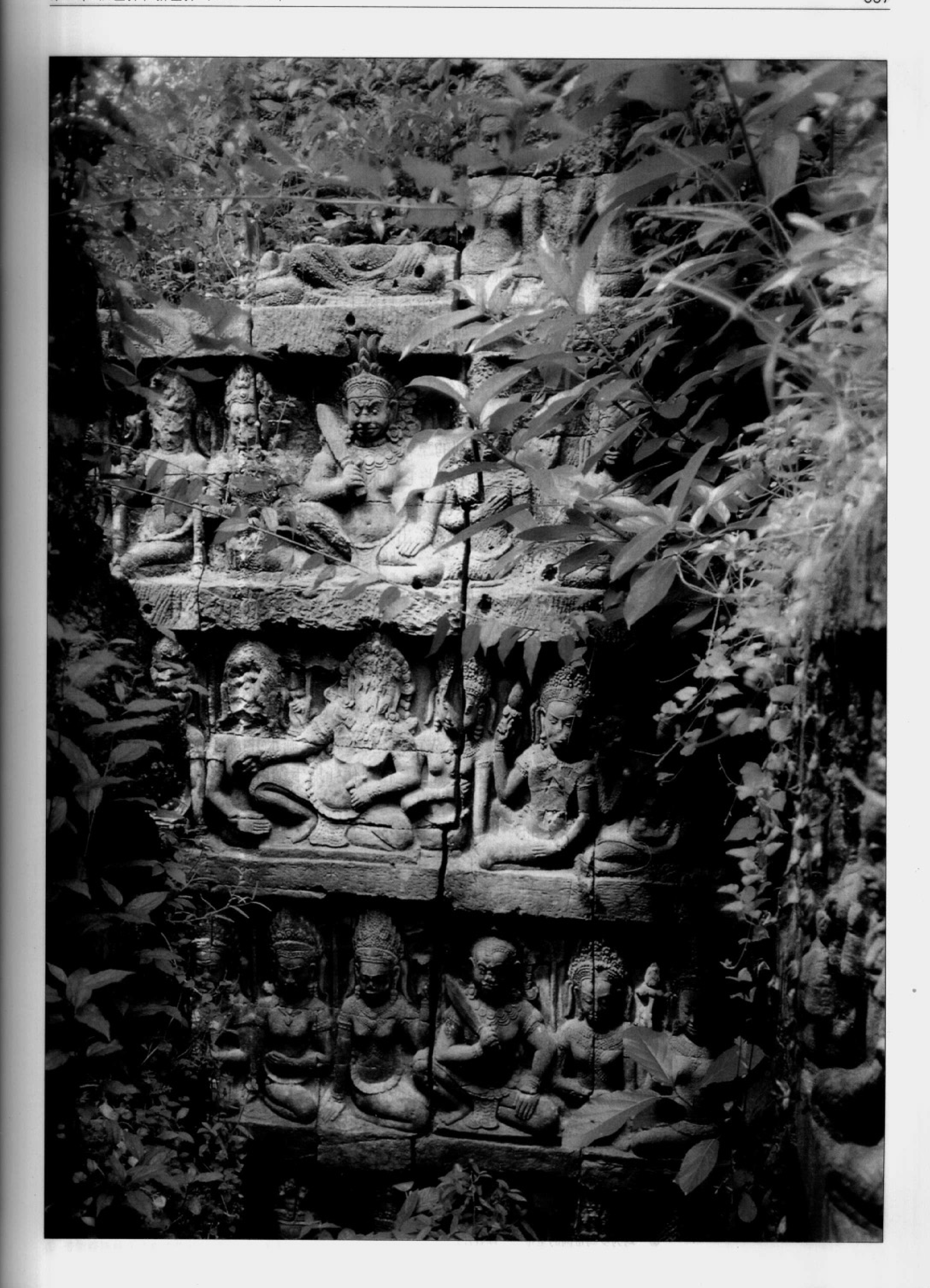
印度和远东

欧洲人最初接触印度及其过去的历史是在印度次大陆被殖民化的时候。由于不满足从陆路与亚洲通商的份额，英国与荷兰(在1600和1602年)以及法国(在1664年)相继建立起东印度公司，以同葡萄牙的海上贸易一争短长。这些公司将商贸活动和军事行动相结合，力求打破葡萄牙对印度洋的控制权。到了17世纪末，这三个国家都在印度和东南亚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到1858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统治权转移至英国王室手中为止，这家英国公司一直对几乎整个次大陆有效地实行着直接、间接的统治，同时在像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周边地区建立了代理机构，形成了英人居住区。巴格达的英国居民在19世纪期间，对该地区的考古发掘起了关键作用。

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的殖民活动促进了对南亚古代文物的研究。带有异族情调的印度神庙、雕塑和仪典曾引起早期殖民者的注意。在西印度埃勒芬塔、坎合里和埃洛拉等地的岩壁内凿出的这类建筑和作品，经常使各种评论家激动不已，人们不断地变换着倾慕和厌恶的复杂情绪。一位16世纪在果阿任职的葡萄牙总督多姆·乔奥·德·卡斯特罗（Dom Joao de Castro)，对坎合里石窟的印象极为深刻，以至于他认为这“几乎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相反，葡萄牙医生伽尔齐亚·达·奥尔塔（Garcia da Orta）却颇为反感地认为，在孟买附近的岩石上凿出的神庙尽管漂亮，“无疑(埃勒芬塔)是颇值得一看的景致，但它看来是邪恶的魔鬼运用他的全部力量和知识来欺骗异教徒的产物，为的是要异教徒们对他顶礼膜拜”。

对古印度古文物的这种态度在18世纪继续存在。摩西的《印度概览》(1750年出版)一书认为这些神庙鄙俗不堪，“一度由于实行卑鄙低劣的迷信活动而受到污染，挤满了低下卑微的民众。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就是他们比罪恶之地的人民好不到哪里去，和俄摩拉城(《圣经》中所说的罪恶之城——译者注)的居民没有什么两样”。

这种反应很自然地是由于遭遇到了一种丰富的文化传统，而西欧的宗教和古典遗产又几乎没有对此提供什么必要的思想准备。有些人推测，石窟神庙中的雕塑风格是对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4世纪入侵印度北部之后所带来的希腊风格的模仿。其他作家则认为，这些印度的古物形式是从人们所知甚少的中国古代文明那里借鉴来的。事实上，西印度的神庙是在公元一千纪下半叶修建的，它们包括印度教和耆纳教的庙宇，但大多数为佛教徒所建。然而，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已是很晚的事了。欧洲人对印度史及印度文化的了解在随后一个半世纪里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葡萄牙人在17世纪穿越印度洋的航行也使他们接触到东南亚的一些早期国家。与西班牙人对新大陆的较高级文化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葡萄牙人并不是毁灭这些文化，而是同地方王室签订贸易条约，在使用武力上有所限制，并不占领当时业已存在的港口。但就像印度的情况一样，他们对自己见到的当地艺术也表示了怀疑。在17世纪早期，最早到达东南亚的葡萄牙人在柬埔寨见到了早期高棉人的遗存，如吴哥窟。他们很难相信这些遗存为当地人所建。一位作家把它们归之于亚历山大大帝，而另一位则认为系“定居在中国的犹太人”所为。这些看法反映了西方人一般不愿承认东方人也有创造高度文明和艺术的力量与能力。

然而，遭遇其他文化的经历不只限于15和16世纪的欧洲。大多数在东地中海区域出现的大帝国——如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曾引起过庞大的官僚国家同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在亚洲，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皇帝推行的扩张政策也使中国的朝臣接触到许多陌生的文化。因为不断派出使臣去考察这些民族，汉代官修的文献里留下了含有大量民族志的描述。例如据记载，在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人①中间，壮健的韩国青年将木棍插到他们背部事先备好的洞眼里，用草绳将它们捆住，即使它们整天使用背上的木棍从事劳动，也不感到痛楚。这个段落被解释为对木制的A型背架的表述，即便今天的朝鲜农民仍然用它向田里运送或运出东西。

幸存下来的古典文物

许多中世纪的城市，如伦敦、约克、巴黎、里昂、美因兹、科隆，是建筑在早期古典建筑的基础上的。在英国，一部约在公元700年左右问世的、由佚名作者所写的书《圣卡斯伯特传》说：这位圣人曾拜访过卡莱尔城（古代的卢格伐里乌姆）的遗存，他对“罗马人先前修建城墙和挖掘水井的奇特方式惊讶不已”。有些古代的庞大建筑还变成了教堂。在现代托斯卡纳区的阿莱佐，罗马的谷仓在9世纪仍被当作住房使用。在罗马，提图斯、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和君士坦丁②的凯旋门约在12世纪还成了要塞墙的一部分。这些较晚后的建筑物和修筑活动的残迹将早期罗马文明的许多遗存保留下来了，随着某些富裕家族开始收集和展示它们，这种风习很快成了访问意大利的北欧人竞相效仿的对象。

希腊和罗马雕塑作品的发现也促使同时代的美术家研究和仿效古典模式。各流派的雕塑家利用精细的测量技术，力求创作出古典形式的雕塑作品。而且，在欧洲贵族社会中间，这种发展倾向仅是更广泛地强调古典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17世纪晚期，学习古典世界的美术、语言、文学和历史知识已稳定地成为一位绅士所受教育的基础，这种教育模式持续了两百多年之久。

更令人惊异的是，在这个时期，西欧人开始对他们原先不大在意的古典考古学有了兴趣。1603年，约翰·斯托（John Stow）曾描述了他在伦敦斯皮塔菲尔德的罗马墓葬中得到的陶罐。1677年，伦敦药剂师和古物收集人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精确地记载了在为新的圣保罗大教堂开挖地基时出土的罗马陶窑：

① Samhan，南部三个名称带韩字的国家——译者注。

② 均为罗马帝国的皇帝——译者注。

阿兰德尔伯爵托马斯·霍华德（Thomas Howard）

在罗马城废墟中发现的大理石雕像，如1506年出土的著名的拉奥孔雕像，曾经令米开朗基罗激动不已，促使贵族们形成了收藏雕塑的嗜好。英国的绅士们到意大利旅游的时尚，逐渐带上了一种“发现”古代美术作品、并将它们运回国内以使自己的花园、居室四处生辉的期望。

最早的收藏家之一是阿兰德尔伯爵菲利普之子托马斯·霍华德（1585－1646年）。1612年，霍华德的医生建议他到国外去旅行。旅途中他到过罗马。由于得到了教皇有关部门的批准，他展开了“发掘”工作。在发掘过程中他“挖出”了一处被掩埋的房间，其中包括一些古罗马的半身雕像。这些雕像多半是他为了个人目的而事先埋进去的。后来他通过收购、接受其他收藏家的惠赠以及委托匠人按古典样式制作等形式增补了藏品。霍华德这时已承袭了阿兰德尔伯爵的封号，为了安放日益增多的古物，他在伦敦的阿兰德尔府邸内增建了一座摆放雕塑的长廊。

1621年，霍华德委托驻萨伯林堡（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宫廷）大使托马斯·罗（Thomas Roe）以他的名义收集雕塑作品，后来又派遣他的牧师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去君士坦丁堡。因试图获得公元4世纪奥里亚门上的提奥多西的浮雕（该门已被砌入土耳其的耶迪库尔要塞当中），霍华德的代理人设法让一位伊玛姆①指责浮雕是一种盲目崇拜，希望将它们拆掉，以便能运到阿兰德尔府邸中。但这个计划夭折了，当托马斯·罗与佩蒂最后拟同财务大主管打交道的时候，一场民众暴动使计划功亏一篑。

佩蒂随后沿安纳托利亚海岸旅行，因海船遇难沉没，损失了他收集的全部雕塑作品。然而在伊兹迈尔（斯米尔纳），他的运气得到改善，买到了一批替代的古物，这批古物原本是为另一位鉴赏家德·佩莱斯准备的。他把这批古物平安无事地运回了英国，并在1628年以《阿兰德尔的马尔马拉藏品》的名义公之于世。

阿兰德尔的大理石藏品中有250件希腊铭文，这是希腊铭文首次进入英国，引起人们的特殊兴趣。此外，他的收藏中还包括37尊雕像、28尊半身像以及诸如石棺和祭坛之类的多种古文物。在这些收藏物当中，包括出自帕加马大祭坛上的刻画希腊神灵与巨人战争的浮雕。

随着阿兰德尔于1646年的逝世，英国社会对古物的兴趣逐渐衰退，他的藏品遭到破坏，一块希腊碑铭甚至变成了砌炉子的材料。在王政复辟之后的1667年，经日志记载者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的鼓动，他的一些藏品被交予牛津大学，在谢尔登剧院外面进行了展出。对这些藏品的进一步破坏，促使人们将它们移交给阿什莫林博物馆。在阿兰德尔的住宅毁灭之后，其藏品的核心部分于18世纪在这座博物馆中得到了重新安置。



托马斯·霍华德，阿兰德尔伯爵二世画像，由丹尼尔·米坦司（Daniel Mytens）于1618年所绘。他是收藏雕塑和铭文的先驱，曾派代理人赴意大利、希腊以及爱琴海东部地区为其收购古文物。陈设在阿兰德尔府邸（恰好位于伦敦海滨以南）中的这些古典文物，给造访它们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拜访过阿兰德尔伯爵花园，那里站立着众多古代伟大的男人和妇女的雕像，他惊异地呼唤道：‘这是死而复生’啊”。

① 带领穆斯林在清真寺作礼拜的人——译者注。



威廉·坎顿（1551－1623年）像。基莱尔兹于1609年所作。

奥尔·沃姆的奇珍异物收藏室。出自《沃姆历史藏珍》1655年。

这是座烧制古罗马灯盏、水瓮及其他陶制器皿的窑址，还残留有一些陶器。它处于大约26英尺深的、未曾触动过的深暗色的土中……是在1677年挖掘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东北部交错地带的地基时发现的……在这座暗黑色的陶窑上方有多层棺材，最底层的是用白垩制成的，因而估计其年代属于图密善皇帝[①]以前或这位皇帝在位之时。

最初的古物学家

在欧洲，人们对民族起源的兴趣日益增强，很快便不再满足于神话传说之类的传奇解释了。尽管弗朗西斯·培根曾说过“最古老的时代（除了保存下来的文献记载之外）都已泯灭无闻”，但随着教育的进步、读写能力的提高和书本知识的积累，人们开始为自己的历史信念寻找更加可靠的基础了。

一种重大的变化发生在16世纪的西北欧。当时人们首次意识到，关于自己祖国的史前史和早期史的知识，可以通过研究田野中的古文物而获得。这种新认识导致亨利八世于1533年任命约翰·利兰（John Leland）为国王的古物收集人。利兰有很深厚的学养，他起先在伦敦的圣保罗学校学习，后来又先后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深造。接受任命之后，他首先致力于搜寻尘封在修道院和学

① 公元1世纪后半叶的罗马皇帝——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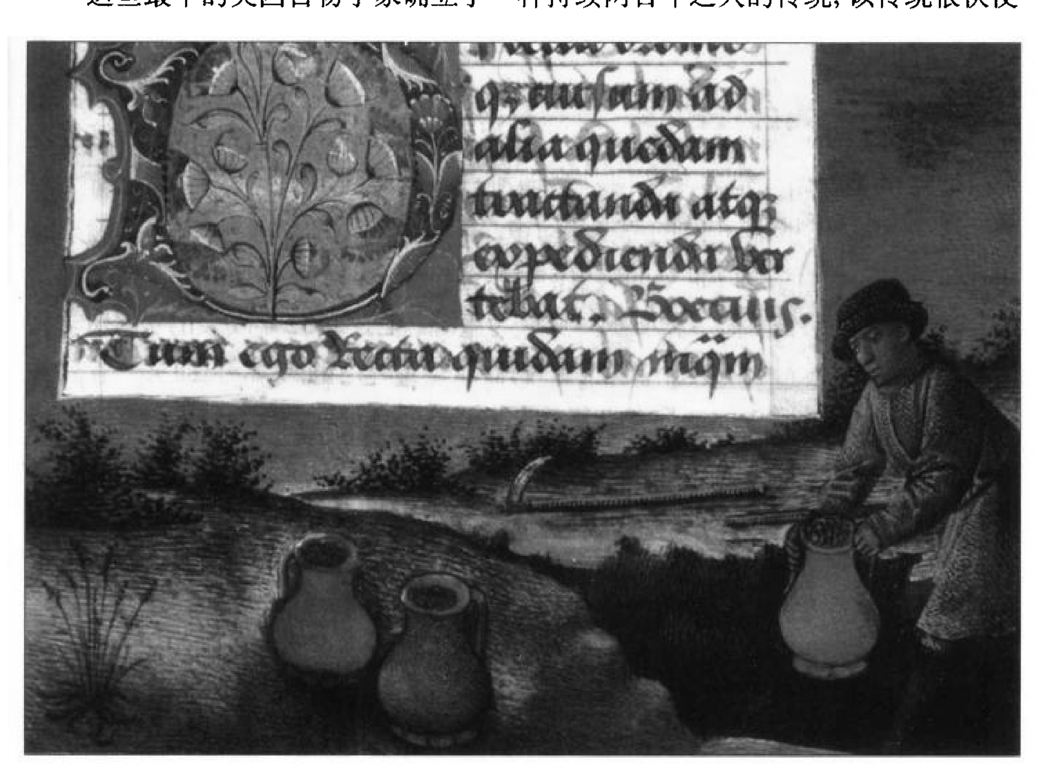
院图书馆中的那些已被人遗忘的文献，“意在使古代作家的作品……或许能摆脱默默无闻的状态，为世人所知”。到了1540年，他已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各地进行过广泛的旅行，访问和描述了各种古代文物，“并提到如果这样做的话，所有事物都是非常难以忘怀的”。

都铎王朝的古物学家和历史学家威廉·坎顿继续了这一具有美好前景的事业，他在1568年发表《不列颠》一书，第一次对不列颠早期的遗存做了全面描述。巨石柱群和位于罗马不列颠行省北部边境、在哈德良皇帝（117－138年在位）时期修筑的泥石混合结构的防御工事——哈德良城墙，在书中均有记载。坎顿把城墙视为“皮克特人的城墙”，并评论道：在比德撰写《教会史》的8世纪，它已是很著名的古建筑了。无论怎样，他的描述毕竟是建筑在个人观察基础上的：

> 我确实看到了那个地方，它建在高坡和山岭的悬崖之上，蜿蜒起伏，妙不可言。在有些坡度平缓开阔的地方，它的前面有一道宽阔的深沟，现在有许多地方已被填高，成了土埂或军事道路，而在大部分地区则被断开。它有许多塔楼和要塞，互相间隔的距离大约1英里，人们称它们为“城堡的坐骑”……在这些塔楼和要塞之间还矗立着一些安扎士兵的小角楼，以便能及时发现敌人并迅速登上塔楼。

后来进行的调查证实了坎顿的描述，只是沿城墙每隔1英里设置的要塞实际上间隔是1罗马里，要塞之间有较小的塔楼或角楼，城墙后面有调动士兵的道路和平行分布的土木工程，这些与坎顿的描述大体相似。《不列颠》书中还谈到一些自哈德良城墙或城墙附近出土的罗马铭文，作者利用这些材料来解释这座防御工事的起源和历史。

这些最早的英国古物学家确立了一种持续两百年之久的传统，该传统很快便



发现宝物。这部在15世纪问世的手稿中的插图显示：一位农民用锄头挖出了一个装满金币的陶罐，另外两个陶罐立在锄边。

在银行出现之前、为安全起见，特别是在危急动乱时期，把金钱和金银餐具埋到地下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而重新找到这些财宝则可能相当困难。1667年，由于受到有关荷兰舰只抵达泰晤士河的报道的惊吓，一位日记的作者撒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的妻子和他父亲将几袋金币埋在他家的花园里。4个月后，派比斯因寻找藏金地点而焦急万分：

> 我父亲和我提着一盏昏暗的灯笼，乘着夜色，同我太太一道去花园干一件大事，就是挖掘我的那些金币。但主啊！我不知一时交了什么倒霉运，他们竟记不清它们埋在什么地方了。我心里开始烦躁，气不打一处来。他们不应该忘记藏匿的地点啊。最后我感到害怕：这些金币没准儿不翼而飞了。我用铲子一而再、再而三地铲啊挖啊，希望能够如愿以偿。

装金币的袋子已经破裂，虽然藏金币的地点已被挖了个底朝天，但佩皮斯仍不能找回他的全部金币。

右图为美洲印第安人的首领像，由伊丽莎白时代的探险家和画家约翰·怀特（John White）所绘。怀特是第一位描绘美洲土著的欧洲人，他的作品对西方人关于他们自身祖先的认识，即看来同美洲土著类似的认识有直接影响。尤其是怀特在弗吉尼亚见到印第安人的皮肤刺纹和文身的习惯，可以同古典作家遗留下来的有关皮克特人和古代不列颠人的记载相比拟。他为印第安人"在从事一般狩猎活动或参加隆重聚会时的穿着习惯"所震惊。

传播到西北欧的其他地区。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民族意识因丹麦和瑞典于1503年的分裂而得到加强。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两国均可以自诩拥有杰出的古物学家——瑞典有约翰·伯里，而丹麦有奥尔·沃姆。他们都记录了古代遗存（特别是刻有古代北欧文字符号的石块），收集到重要的古代文物。伯里担任年轻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多弗斯（1611 – 1632年在位）的老师，这位国王鼓励研究瑞典古物，并任命伯里为皇家古物收集家。沃姆是奥胡斯市长的儿子，起先学医，后来成为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四世的御医。他是一位道地的博学家，还担任过哥本哈根大学人文学科的教授，后来还讲授过希腊文。沃姆布置了一个天然和人工珍品博物馆，并通过对所有教职人员发出一份王室通知的方式，试图草拟一份有关丹麦古文物的详细目录。各教堂的负责人员被要求对其教区内的考古发现进行调查，提交报告，并要求牧师们草拟当地古文物的一览表。这些要求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重复进行了多次。1684年，一份王室文告附带宣布，发现的古代金属器物必须呈交王室政府，这就使有关"发现的宝物"的各项法律得以固定化。这些法律从源流上讲，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丹麦和12世纪的英国。

在德国，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也出现了对民族古文物的新兴趣。这里的古物学家拥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即他们得到了古典文献《日耳曼尼亚志》的帮助。这是一部关于早期日耳曼人的不朽记载，由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于公元1世纪所作。尽管严格的考古学处理方法在德国用了足足两个多世纪的时间才取代《圣经》自创世纪开始的纪年方法，但对欧洲历史的新理解毕竟已经有了基础。

在17世纪和18世纪，人们对考古遗存的兴趣更加系统化。尤其值得一提的人物是瑞典古物学先驱奥洛夫·鲁德贝克，他是第一批像解剖学家一样处理考古发掘的人物之一，不仅从地下挖出古物，而且记录古物与不同土层的关系，公布他所考察的古文物在地层学方面的情况。

在中欧和东欧，早期的古物学家仿效西欧模式，收集古文物，查勘明显暴露在地表上的古迹。巨石陵墓和巨石圈在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尤为引人注意，而在这些地区以东却十分少见。于是古物学家们把目光集中在遍及中欧、东欧的坟丘上，集中在铁器时代的、带有护城壕沟的斯拉夫人的城堡要塞上，集中在将罗马与蛮族世界区分开来的那些用石灰石垒砌的堡垒和营地上。这些古代遗址从荷兰开始，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一直延伸到了黑海。

这个时期的中欧和东欧的考古活动中，有一个非凡的人物——简·约翰斯通(Jan Johnston)。他是17世纪的医生，祖籍苏格兰，生于波兰西北部，在托伦读书上学，后来到英国、荷兰和西里西亚广为旅游。他在1632年发表的《创伤学科诸特征》一书中提到："在地下发现的陶制器皿是丧葬用的陶罐，里面盛放着死者的骨骸。在所有的罐中……都有骨灰，一些罐里还有指环。我们知道，古人有焚烧死者尸首、掩埋骨灰的风俗。"这样一来，在两个世纪里一直流传的"神奇的瓦罐"的说法，现在有了理性的解释，原来它们不过是史前的骨灰罐而已。

据说约翰斯通还在托伦的图书馆中见到过一些出土的骨灰罐。在诸如16世纪德国矿物学家乔尔格·阿格里科拉(Georg Agricola)这样的早期作家的作品中，有若干关于条顿人葬俗的记载，并最终将这些记载同骨灰罐联系了起来。在他的其他著作中，还论及人类文化的进步，发展了关于进步及文化随时代变化而变化

的思想。尽管这些认识还不是很充分的，但毕竟是19世纪进化思想即将面世的一种先兆。

史前史露出端倪

史前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进一步的重大进展，是随着路易十四建成伟大的新宫——凡尔赛宫而出现的。这位太阳王的宏大志向间接地引起了欧洲考古史上的一次发掘活动，该活动属于最早的、有文字记录的发掘活动之一。

1685年，在诺曼底南部的一个叫科彻莱尔的地方。地方贵族罗伯特·勒·普雷沃根据王室的指令，去寻找修缮厄尔河上的一扇闸门的石料。这本应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从当地采石场便可得到这些石料。然而在1685年，由于建造凡尔赛宫及修建庞大的水道，这个地区开采出来的所有石料都被用光了。幸运的是总算还有一处来源，这就是勒·普雷沃自己的田产。在俯瞰厄尔河的一处山坡坡顶，有两块石板立在地面上。勒·普雷沃召集了一批工人把这两块石板很快移开，露出了原先没有看到的、位于下面的第三块石板。把这第三块石板翻起来之后，发现了一些人骨，距地表有6英尺深。至此，原本是找石破石的工作转变为细心的考古发掘。勒·普雷沃和他的工人们为这一发现所吸引，放弃了原先的计划，开始了精心记录和复原一座史前时代的墓室的工作。他们最后共发现了20个头盖骨，同时还发现了的石斧、陶器和大量灰烬。

勒·普雷沃在科彻莱尔的发现之所以被人难以忘怀，不只是因为他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用巨石建造的合葬墓，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他进行这一次发掘的方式。他使用了20世纪才广泛运用的小心谨慎的方法，记录下了他的发现物的细微末节。他不像他的大多数同代人，并非受寻找殉葬宝物的欲望所驱使，而是抱着理解他所发现的古物的真诚愿望。最重要的是，他的发现成了欧洲考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尽管太阳王的凡尔赛宫的水道建设事实上始终没有完成，但科彻莱尔的发掘却一直到下一个世纪仍有影响。1719年，勒·普雷沃的兄弟东姆·伯纳德·德·蒙福孔（Dom Bernard de Monfaucon），一位天主教本笃会的教士，写了一些关于古文物的书。他利用这个遗址出土的石斧材料，把科彻莱尔发现的墓葬归之于“某个野蛮民族，他们既不知道使用铁器，也不晓得任何金属”。这一关于前金属器时代的认识，成为欧洲史前史年表赖以确立的基石。

右图：尤里乌斯·恺撒在他《高卢战记》一书中（第6卷第16章）记述的树条编扎的人像。这种粗野的德鲁依特教焚烧牺牲的方法，正像这幅出自埃尔赖特·山姆（Aylett Samme）的《大不列颠古迹说明》（1676年）的插图所示，给17世纪人们的想象力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根据恺撒的记载，克尔特人认为"神灵喜欢处决那些因劫掠而被抓获或者犯有罪过的人。但当他们缺少罪犯的时候，他们便毫不迟疑地用无辜的人充作牺牲"。

山姆写道：对上述"奇怪的习俗，我在这里并不认为有什么离奇之处"。他的这一生动的描绘为后来的作家们所喜闻乐道，随时随地会强调德鲁依特的野蛮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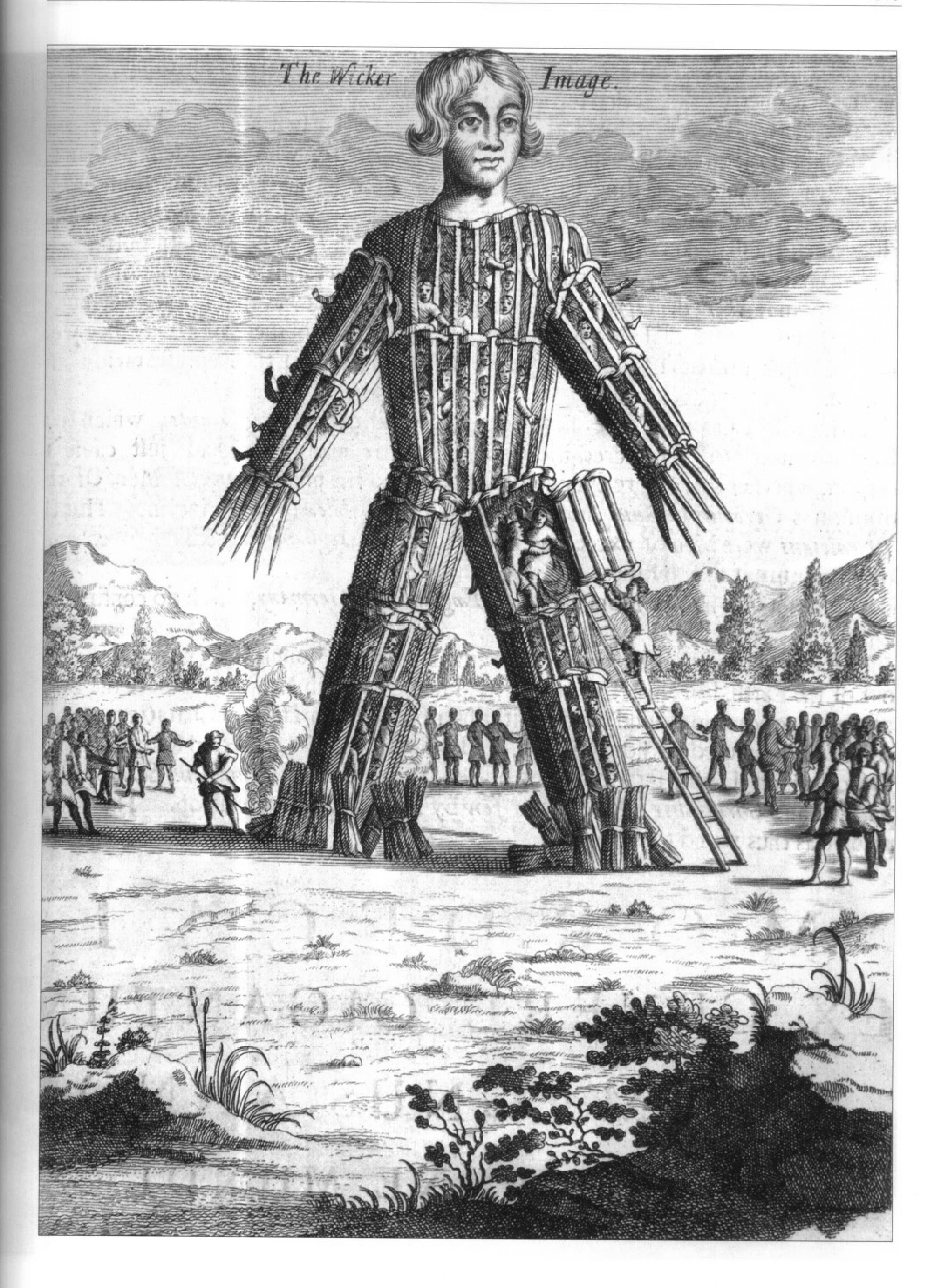
几乎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人们认识到早期石制工具的真正性质。这方面的线索早就明摆在那里，欧洲探险者从美洲曾带回来打制石片和磨光石器，但在16世纪，仅有少数学者能够合乎逻辑地认为欧洲发现的类似石器肯定是人类的工具。这些人中包括矿物学家乔尔格·阿格利科拉和米歇尔·梅尔卡蒂（Michel Mercati）。后者是教皇克莱蒙特七世的御医和梵蒂冈植物园的管理人。梅尔卡蒂编纂了一份梵蒂冈收藏品的目录表，其中包括燧石箭头，他认为这些东西是由铁器时代以前的人制作的。他过世后出版的遗作《金属论丛》（1717年）中有一幅插图，上有一件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刀。

只是到了17世纪的末叶，这样一些思想才开始被普遍接受。勒·普莱沃特在科彻莱尔的发现对此提供了可靠证据，证明那些石片和磨光石器的确是早期人类的工具。随后，在1720年，德国古物学家罗德（A.A.Rhode）发表了关于他个人首先尝试制作燧石物品和复原古人制作技术的记述。他成功地复制出一些与许多世纪积累起来的"雷石"相类似的石器，破解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令人困惑不已的疑案。最后的突破是在几年之后，1723年，法国人安托尼·德·朱西厄（Antoine de Jussieu）将"雷石"同已知是出自加拿大和加勒比地区的类似石斧加以比较。与他之前的梅尔卡蒂、德·蒙福孔一样，德·朱西厄把雷石划归到尚不知铁器为何物的远古时期。但与前人的不同之处是，他能利用民族学的眼光观察史前遗存，证实自己关于石器时代的思想。这种方法只是在最近50年才得到充分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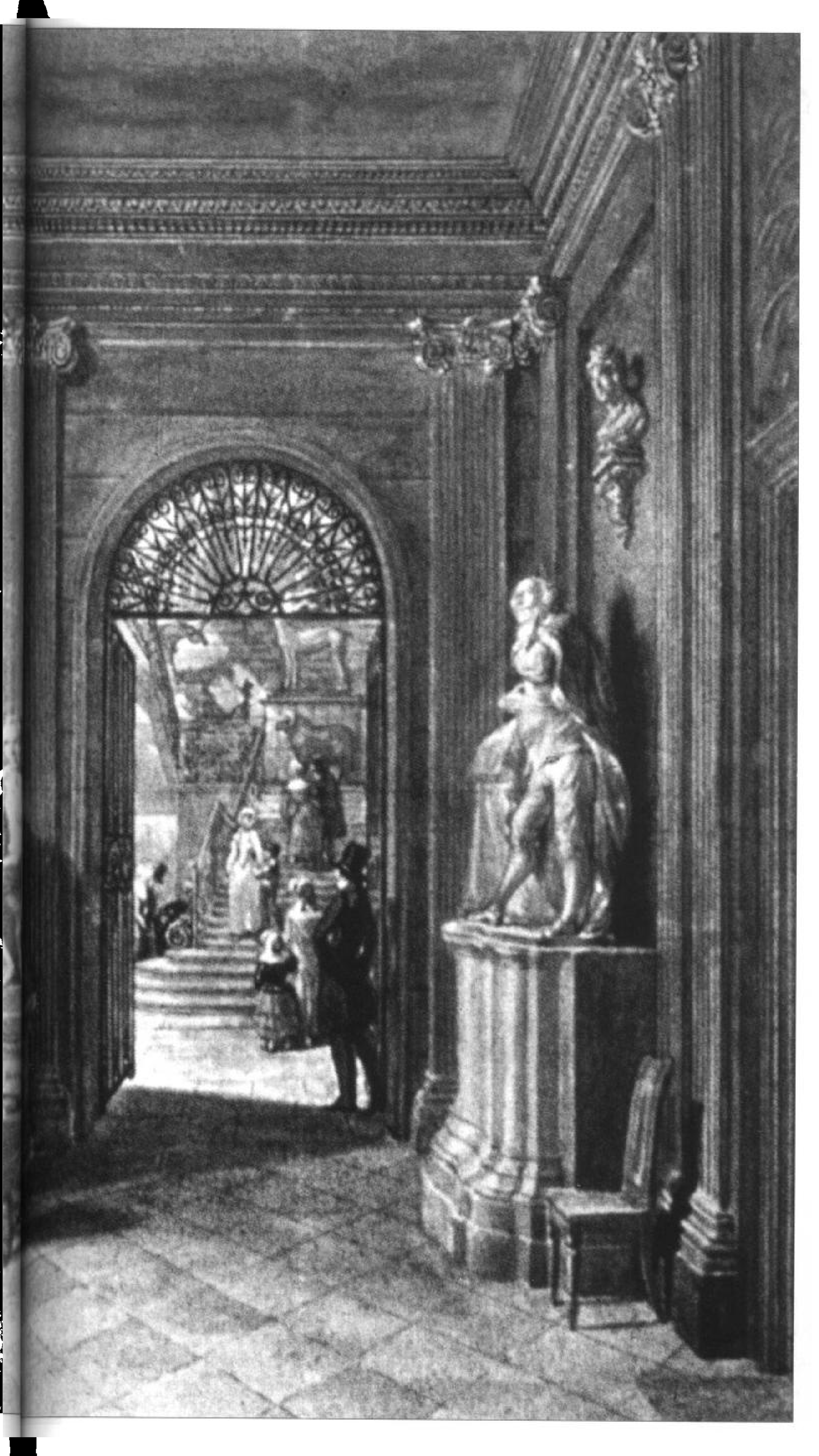
画家约翰·怀特在新大陆则运用了不同的民族学方法。1585年，他同拉雷夫一道去弗吉尼亚，在那里不只画印第安人，而且还凭想像绘制古代不列颠人和皮克特人的形象。他画笔下的古人和今人有许多共同的特点，简直就是互为模特儿。荷兰画家鲁卡斯·德·希尔（Lucas de Heere）约在同一时期也把古代不列颠人描绘成美洲印第安人的模样。美洲土著因此被用来作为类比古代欧洲人的外表及其使用工具的直接原型。古物学家约翰·奥伯雷于1659年得出结论：事实上，威尔特郡的古代不列颠人，"在我看来，在野蛮程度上只比美洲人高出两到三个级别"。

奥伯雷和斯塔克利

奥伯雷是17世纪英国古物学的带头人，他是个"具有丰富经历但颇令人感伤的人"，是" 适逢灾祸时代的一位律师"，大半生时间用来打官司或者躲避债权人。他还是天生的善侃健谈者，交过许多朋友，以白描的形式为他们一一写了《传略》并流传于世。在他还是独立自主的乡绅时，便开始了自己的史前古迹研究。这种研究持续到17世纪70年代，直到债务使他一贫如洗，连自己的书籍都被没收为止。由于他的朋友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古物学家埃利阿斯·阿什莫尔（Elias Ashmole）等人慷慨解囊，奥伯雷才能继续对自己家乡威尔特郡的古迹进行研究，并拟出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有关巨石阵和埃夫伯里史前巨石圈的研究大纲。尽管他的大作《不列颠的古迹》至今没有出版，但奥伯雷的观察是精确的，其结论是富有影响的。他出错的地方是把巨石圈解释成德鲁依特（druids，古代克尔特人的知识分子，充任祭司、教师等社会职务——译者注）教


The Wicker Image.





设在蒙塔古宅邸中的旧大英博物馆的前厅，1759年1月15日向公众开放。目前博物馆矗立在布卢姆斯伯里区7英亩见方的原址上。这个馆址连同那座虽优雅但却正在颓坏的老楼，是在5年前耗资10250镑从拉尔夫·蒙塔古手里买下的。

馆中的藏品起初分成三部分展出，这就是已出版的书籍、手稿以及天然和人工制品。由于发行彩票筹集到95194镑8先令2便士，博物馆从一开始便除了购到斯洛恩的庞大藏品外，还收购了两处重大的手稿藏品：花费10000镑购到哈里安收藏的手稿，以及买下了柯顿收藏的手稿。这些手稿中包括林迪斯法恩的《福音》书（the Lindisfarne Gospels）、史诗《斐欧沃夫》（7－8世纪开始出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史诗——译者注）、现存的4部《大宪章》抄本中的两部。

国王乔治二世于1757年将皇家图书馆捐赠给博物馆，随后在1823年，又收到了属于乔治三世的62250卷图书和19000本小册子的赠品。

1772年，博物馆用8000几尼（近代英国曾使用的一种金币，1几尼等于21先令——译者注）购买了威廉·汉密尔顿爵士（Sir William Hamilton）的希腊陶瓶藏品。1808年收购了汤利（Townley）的大理石藏品，耗资20000镑。1756年，第一具木乃伊收进该馆，这是一份不算很大的私人遗赠（埃及古文物）的组成部分。1802年，乔治三世将大批古物赠送给这座博物馆，其中包括罗塞达石碑，这是由拿破仑组织的埃及科考活动发现的，后被英王弄到了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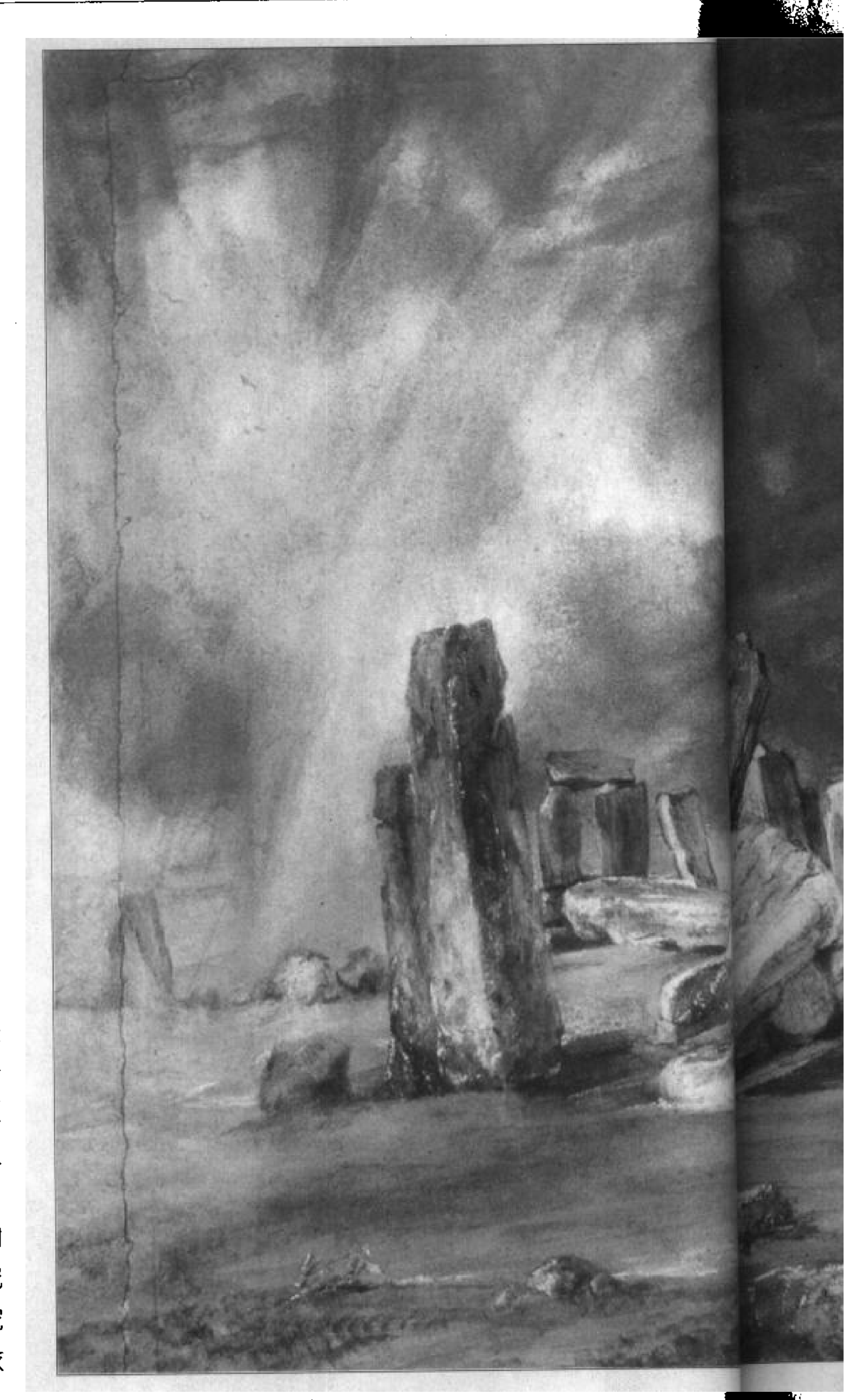
认识巨石阵

巨石阵是世界最著名的史前遗迹之一，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令人惊叹和思考的对象。大约在1130年，一部由亨廷登的亨利（Henry，一位林肯教堂的领班神父）所作的英国史中首次提到了它。他在书中写道："奇特的巨石是依照门道的形式竖立起来的，没有人能想到如此巨大的石块是如何架到高处的，也无人能想到它们为什么要建在那里。"几年后，在蒙茅斯的杰奥弗里（Geofferey）所著的那部少见的《不列颠诸王史》（1136年）中，巨石阵越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我们在书里看到对建造这一古迹的最初解释，也就是由墨林（Merlin，传说中的魔法师——译者注）施魔法从爱尔兰南部的一座山上搬至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以作为对遭到背信弃义的撒克逊人残杀的那些不列颠贵族的纪念碑。后来，杰奥弗里坚持认为那是国王亚瑟之父大龙头尤瑟的墓地。

这种中世纪的神话解说在16世纪被批判地处理英国早期史的做法所取代。17世纪初，当古典建筑师伊尼哥·琼斯查勘巨石阵的时候，他勾勒出生动的草图。他感到，这种精心设计的结构不可能出自处于野蛮状态的不列颠人之手。琼斯的草图去除了巨石上的坑坑洼洼之处，抹去了岁月剥蚀的痕迹，按他设想的原状对巨石阵进行了复原。他认为这是一处罗马时代的巨石阵，外围是一个完整的圆环，带有六个对称的石门坊（以两块巨石为柱、一块巨石横搭在中央为梁）。尽管他的绘画在主要方面是根据废墟实况，而且也没有任何罗马建筑可资借鉴，但他复原这处古迹原貌时所想的却是古典法则，而非基于他本人对巨石阵的准确观察。

17世纪晚期，随着田野考古工作在英国南部地区的稳定开展，巨石阵成为人们注意的一个焦点。奥伯雷研究并勾画了这处古迹的平面图，第一个把它同恺撒、塔西陀等古典作家提到的前罗马时代的不列颠祭司——德鲁依特联系在一起。附加在巨石阵故事里的德鲁依特不过是一种杜撰，但这种解释一旦形成，巨石阵为德鲁依特神庙的思想便挥之不去了，但奥伯雷至少认识到巨石阵是前罗马时代的古迹。

有关德鲁依特教的思想在18世纪得到斯塔克利的进一步发展。有人给这座古建筑的主要部分起了些引人联想的名称，如巨石祭坛、宰杀石之类，促使人们产生狂乱的想象——愚昧的德鲁依特教仪式用人牲作为祭品。到了这个时期，巨石阵已被观察者正常地描画了出来，浪漫的巨石形象现在被琼斯式的古典风格的复原图所替代。19世纪初，画家康斯特布尔（Constable）和特纳（Turner）两人以戏剧性的风雨天幕为背景，描绘了巨石阵的景观。



只是到了19世纪末叶，较为科学的处理方法才最终取代了对巨石阵的浪漫主义的欣赏态度。首次严格规范地发掘这处古迹是在1901年，随后的发掘是在1919－1926年。遗迹在20世纪50年代又展开了进一步的发掘。人们发现，这是一处经过若干建造阶段的古建筑，在许多世纪里得到添补和修缮。最初兴建于大约公元前2800年，当时是土沟和土堆。直到公元前三千纪末，位于石圈中央的巨大沙岩石门坊才最终竖立起来，这比德鲁依特的出现要早几千年。巨石阵是周围地区用于仪典活动的主要古建筑，的确有可



能是以日月为准的。尽管在那里发现了墓葬，但没有证据表明在"巨石祭坛"上要摆放少女牺牲。事实上，那是一块原先直立、后来平倒下来的岩石。

这些发现并没有消除群众对德鲁依特传统的信仰。自从1905年以来，现代版的德鲁依特——所谓依循古代规则的德鲁依特教派，仍一直在每年夏至到来之时利用巨石阵举行典礼。所以，巨石阵在今天不仅仍然是一处重要的史前遗迹，而且是一些变化不定的信仰的有力象征。

约翰·康斯特布尔（1776－1837年）画笔下的"巨石阵"，1836年在皇家科学院展出。画家作品的说明中写道："神奇的古迹巨石阵，矗立在远方无垠的荒原上，仿佛同过去时代的各种事件毫无干系，又同现代人对它的各种利用联系在一起，使你越出了所有历史记载，把你带入一个过去的全然未知的混沌当中。"

这些凹凸不平的石块与以天空为背景的浪漫主义画风提供了强烈对比。左下部那只跳跃的野兔是个巧妙的提示，提醒人们注意，同石器时代相比，生命转瞬即逝，变幻无常。

的神庙。

这种迄今为止仍在平民大众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理论解释，得到奥伯雷事业的著名继承者威廉·斯蒂克利（William Stukeley）的进一步发展。斯蒂克利起初是位医生，后来成为教士，同时又是早期古物学家中多姿多彩的人物之一。同奥伯雷一样，他是位敏锐的观察家，他正确地鉴别地貌的年代，例如他曾提到希伯里山（Sibury Hill，一座位于英格兰南部的巨大史前山丘）是罗马时代以前的遗迹，因为从米尔顿豪尔到巴斯的罗马大道绕开了它。他在早年游览并考察过众多古迹，包括巨石阵和埃夫伯里，但在寻求对他所见现象的解释时，他能追溯到的历史记载只是尤利乌斯·恺撒之类古典作家的作品，恺撒曾写道：

> 作为一个民族，高卢人极端迷信。所以当人们蒙受重病之苦或面临战死危险之时，他们献祭或起誓的祭品是人牲，由德鲁依特作为仪式的主持人。他们认为，拯救一个人生命的唯一途径是用另一条生命作为替代来抚慰神灵的愤怒。他们定期举行国家的献祭活动。某些部落拥有树条编织的巨大偶像，它们的四肢是用活人填充起来的，然后把它们放到火堆上，将那些人牲活活烧死。

斯蒂克利到死都在他所研究的各种史前古迹中看到德鲁依特的影子。他对德鲁依特教的浓厚兴趣出自自己的宗教信仰，他编写出了一部英国史前史的庞大纲要，按照这个纲要，德鲁依特是在挪亚度过大洪水的劫难之后不久，来到当时作为腓尼基人殖民地的一个组成部分——英格兰的。

在奥伯雷和斯蒂克利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矛盾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改善了田野考古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又不加批判地加以解释，热衷于把可见的古迹同历史记载中所提到的民族联系在一起。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仍旧局限在中世纪的哲学和见解的范围内而不能自拔。但就他们所拟定的概要、大纲和描述而言，奥伯雷和斯蒂克利为现代人理解英国的田野古迹奠定了基础。他们还证明，研究英国史前史(简直无处不在)的工作，在没有一个年代学尺度的条件下是多么艰辛。对他们来说，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古迹都被混淆在罗马时代以前的某个时段内，他们尚不具备说明确切时间（几十年前、几世纪前以及几千年前的）的手段。

伦敦古物家协会于1707年成立的时候，是一个由具有共同旨趣、即热心于研究和发表古物学成果的人组成的小团体，斯蒂克利成为这个组织的第一任理事长。该协会于1717年正式建立，并在1770年开始出版第一期年刊《考古学》。也就在这个时期，大英博物馆通过收购——由发行彩票筹集的资金——汉斯·斯洛恩（Hans Sloane）爵士（医生兼自然主义者，于1753年去世）收藏的80000件古文物，包括钱币、古物、绘画、书籍和手稿，得以建立起来。博物馆最初设在尚属半农业区的布卢姆斯伯里区的蒙塔古宅第中，馆内的藏品于下个世纪又移到了在同一地点专门建设的馆舍内，该馆于1847年竣工。这座位于大拉塞尔街上的宏大建筑，是一座古希腊风格的真正的艺术殿堂。随着博物馆藏品的不断增加，馆舍的规模也在稳步地扩大。

关于远古的最初暗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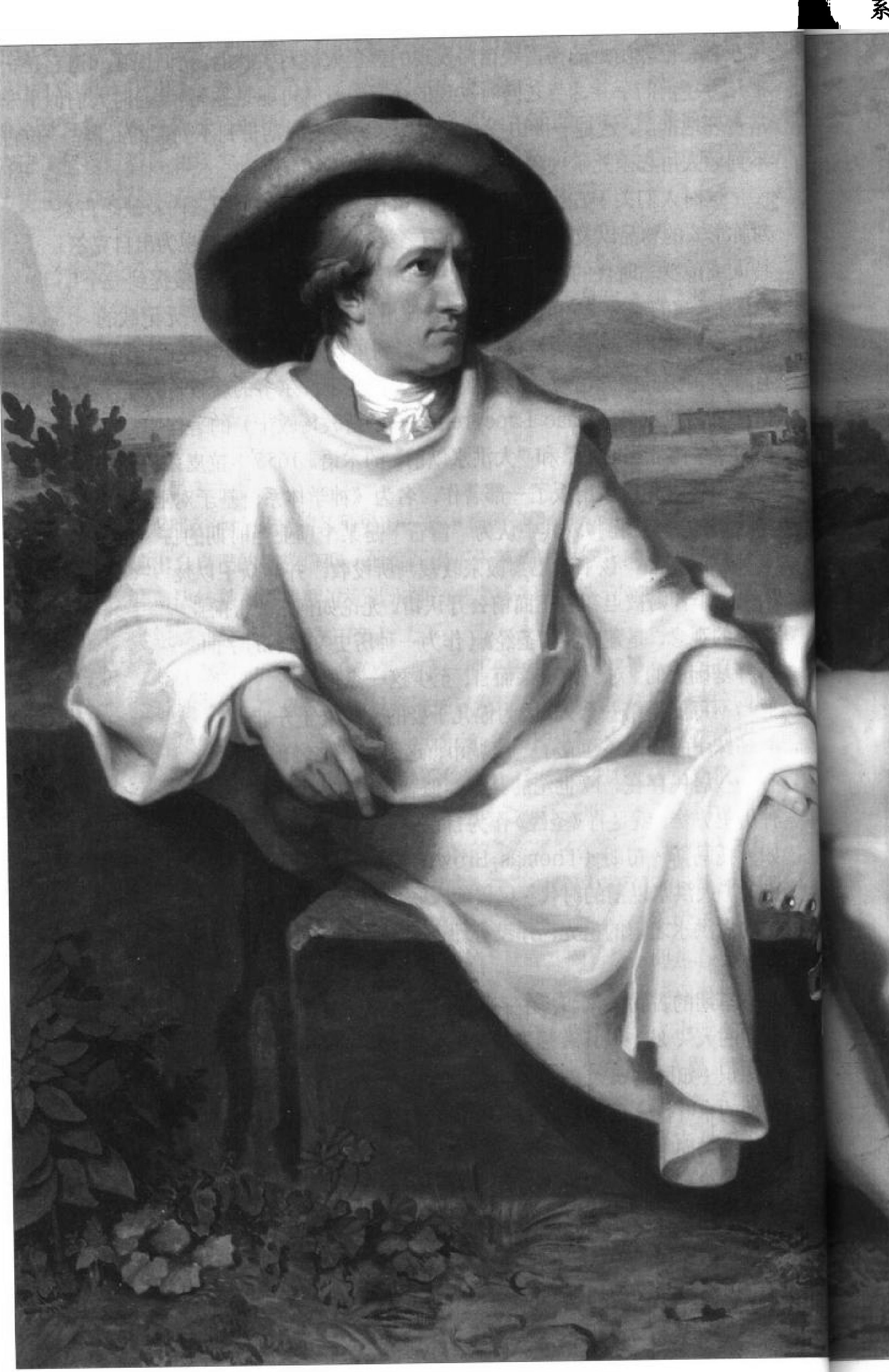
在英国以及其他国家都曾偶尔发现过旧石器时代的燧石工具，但它们的重要意义却未能为人所知。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就是约翰·科内尔斯于1690年左右在伦敦附近的格雷旅馆路发现的黑色大燧石尖状器。我们现在知道它是一把几万年前的手斧，与之同时发现的还有象骨（可能是猛犸）。当时人们似乎非常合理地推测，这是一件由罗马人在克劳狄统治时期带到不列颠的武器，一位古不列颠人用它杀死了大象。

这时人们关于古代的观念仍旧停留在文字记载的范围之内。缺乏古典对称形式的物品以及诸如手斧和巨石之类的人工遗迹因此被视为出自克尔特人或前罗马时代的高卢人之手。罗马作家卢克莱修确曾间接提到一个"我们未知的成文史之前的时代"，并使用了一个概念来称呼"无记载的史前史"。然而，这种认识只是逐渐地得到重新确认。一个比较确定的有关史前史的概念出现在17世纪中叶，出生于波尔多的新教传教士伊萨克·拉皮莱（Isaac Lapeyrere，一个新教传教士）的著作中，使用了"前亚当时期"和"大洪水以前"的术语。1655年拉皮莱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出版了一部著作，名为《神学体系：基于对亚当之前的人类预测》，其中认为"雷石"是某个前亚当时期的古老民族的制品。该书在巴黎被宗教裁判所没收，并当众予以焚毁，而作者则被迫在教皇面前公开认错。无论如何，关于前亚当人的观念，是建立在《圣经》（作为一种历史文献）的字面解释基础上的。对于拉皮莱而言，至少这一点他很清楚，即亚当不可能是第一个人，因为他儿子娶的一位女子并非他的姊妹，而且他还建立了一座城市，这暗示在他之前已有一些居民存在。17世纪的其他类似著作也在利用一种历史方法，就是将《圣经》作为自己的主要史料。例如，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于1646年提出的"大洪水以前的时代"仅仅使人联想到《圣经》中的大洪水之前的祖先，并没有什么其他新鲜的东西。

出自无文字记载的时代。科内尔斯于3个世纪之前在伦敦格雷旅馆路发现了这把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手斧。斧长16.5厘米（6.5英寸）。

早期的古物学家们，在字面上的意思是"博学多才的人"，是一些具有强烈好奇心和深刻广博的学科知识（如医学或天文学）的饱学之士。但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叶，人们能察觉到某种转型的趋向，虽然尚不能说是向考古学过渡，但毕竟一种独立的学科正在形成。有关远古的知识可以通过远古留下的物质痕迹并借助于一种解释把和描述这些痕迹的手段构建起来。学者们正在日益接近这样一种认识，即地下和地表遗存的物质痕迹如同书本一样，是可以提出质询和加以解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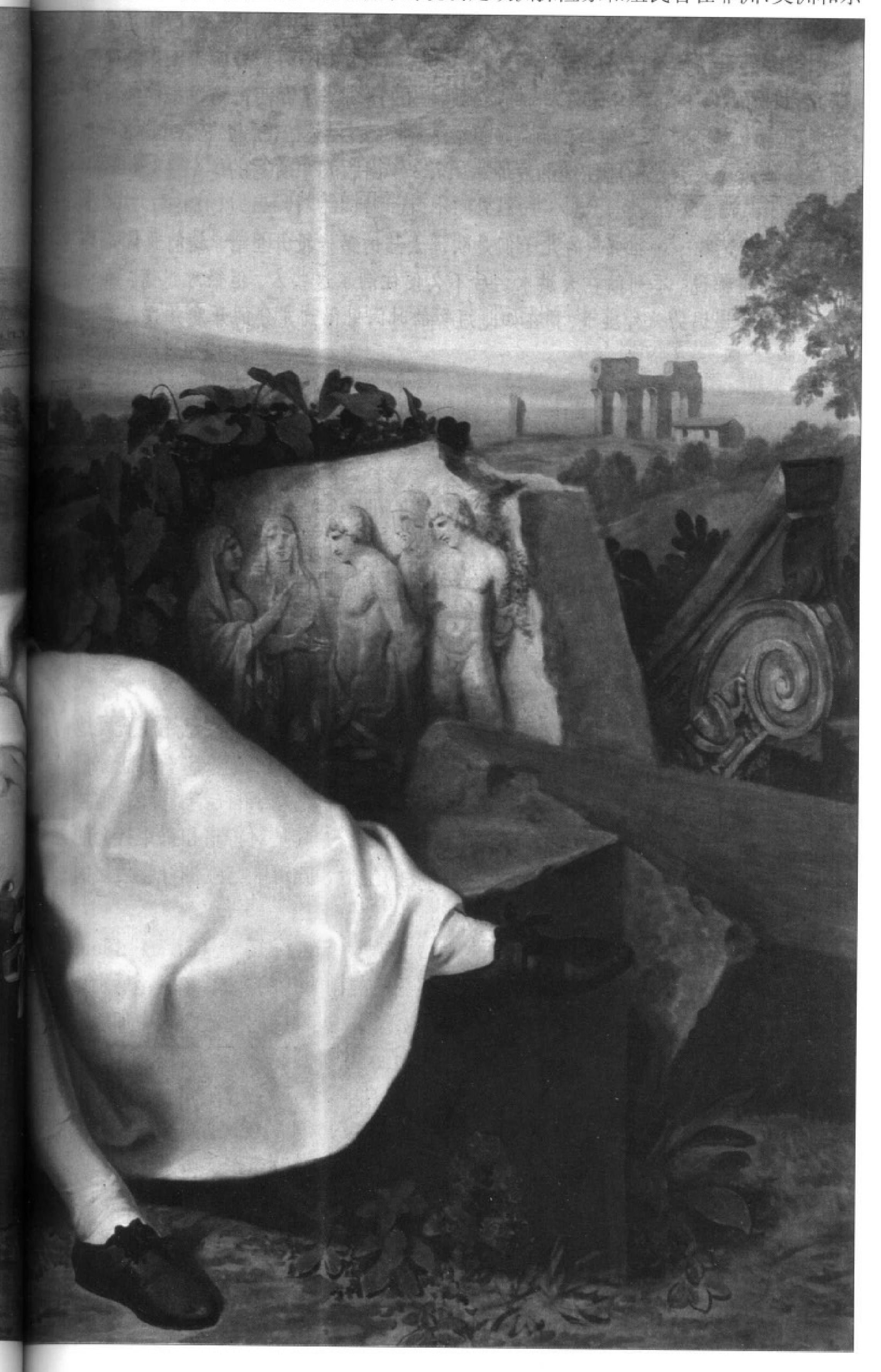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古物学家和探索者（1760－1820）



歌德在罗马乡间。约翰·提斯克本作于1787年。虽然他发觉画中的古代废墟在比例上颇令人失望，不如皮拉内西(Piranesi)的雕版画，但诗人歌德对古典意大利的热情在他首次长期（1786－1788年）走访那里之时得到了激发。在罗马，他立即感受到了较他的家乡城市法兰克福更多的东西。他在进入这座城市时大声喊道："我只是现在才开始真正的生活！"而在他离开罗马后则悲哀地说："自从我穿过莫勒桥（Ponte Molle）回到家里，就从未有过充分舒心的日子。"

对新古典主义的真正挑战不仅无损于可以度量和观察的古典时代，而且也无伤大雅——难以捉摸的精神。因为歌德始终坚持认为："古典主义是健康的，而浪漫主义则是一种弊病。"

中世纪对人类过去的看法基本上是一些建立在人类受制于上帝意愿基础上的宗教故事。人类道德与肉体之所以健全，根源在于服从上帝的意志。人性是非常矛盾复杂的，以致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倒退和堕落的倾向，除非与神祇或教会保持联系才能达到永久的至善。对此最好的说明是欧洲探险家和殖民者在非洲、美洲和东



南亚看到的异教民族的生活条件。他们拥有的技术是简陋的，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与同代的基督教欧洲相比，显然是很原始的。

到了18世纪末叶，这种对人类过去的看法被根本动摇了。技术和认知的进步，伴随着欧洲经济和军事优势的确立，这开始使人们确信：现在并不亚于过去，过去并非某种逝去了的黄金时代，人类能够为自己塑造更好的未来。这种新的信念引发人们重新估价过去的解释模式。甚至在18世纪初，对野外调查工作的理性研究和日益增多的证据引起了一种新怀疑主义的形成，这促使古物学家们提出质疑：《圣经》是否能解答所有的问题。正像亨利·罗兰兹（Henry Rowlands）牧师在其著作《人类先前居住地的复原》（1723年出版）中所写的：

> 古代记载……雅弗[①]的儿子们是欧洲大陆的第一批开垦者。我们通常听到的故事都说：不列颠在大洪水之后不久便住满了这些人。但很难想像，如此广大和遥远的一处土地，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得到充分的开发并且人满为患。

启蒙时代关于人类过去的看法

这种新的探索精神是更为广泛的思想运动，即人们所知的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同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和苏格兰的约翰·洛克、大卫·休谟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启蒙运动对考古思想的主要影响是它坚决主张人类进步的观点——相信人类的条件正在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相信人类的改善主要是由于人类自身的努力和自然而然的进步。正是在这种氛围中，进化思想的种子最终扎下了根。

考古学可以对这种人类进步的思想提供出色的证据。石器现在已无庸置疑地被看作是早期欧洲社会的工具，来自一个早于铁器的时期。然而，启蒙思想家们一般采取的方法就其本质而言是思辨性的。这种方法不是基于石制工具和其他技术进步的证据，而是依赖对欧洲之外的社会的认识，尤其是对狩猎和采集社会的认识。启蒙作家们很自然地联想到，这些民族的生活方式可能与欧洲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相类似。

对这种思考方式进行透彻分析的人是托马斯·波纳尔爵士（Sir Thomas Pownall），他于1769年考察了爱尔兰的新格兰治史前时代的墓冢。在4年后发表的关于这处古迹的记述中，他力求将这处墓地置于人类发展的一般图式中加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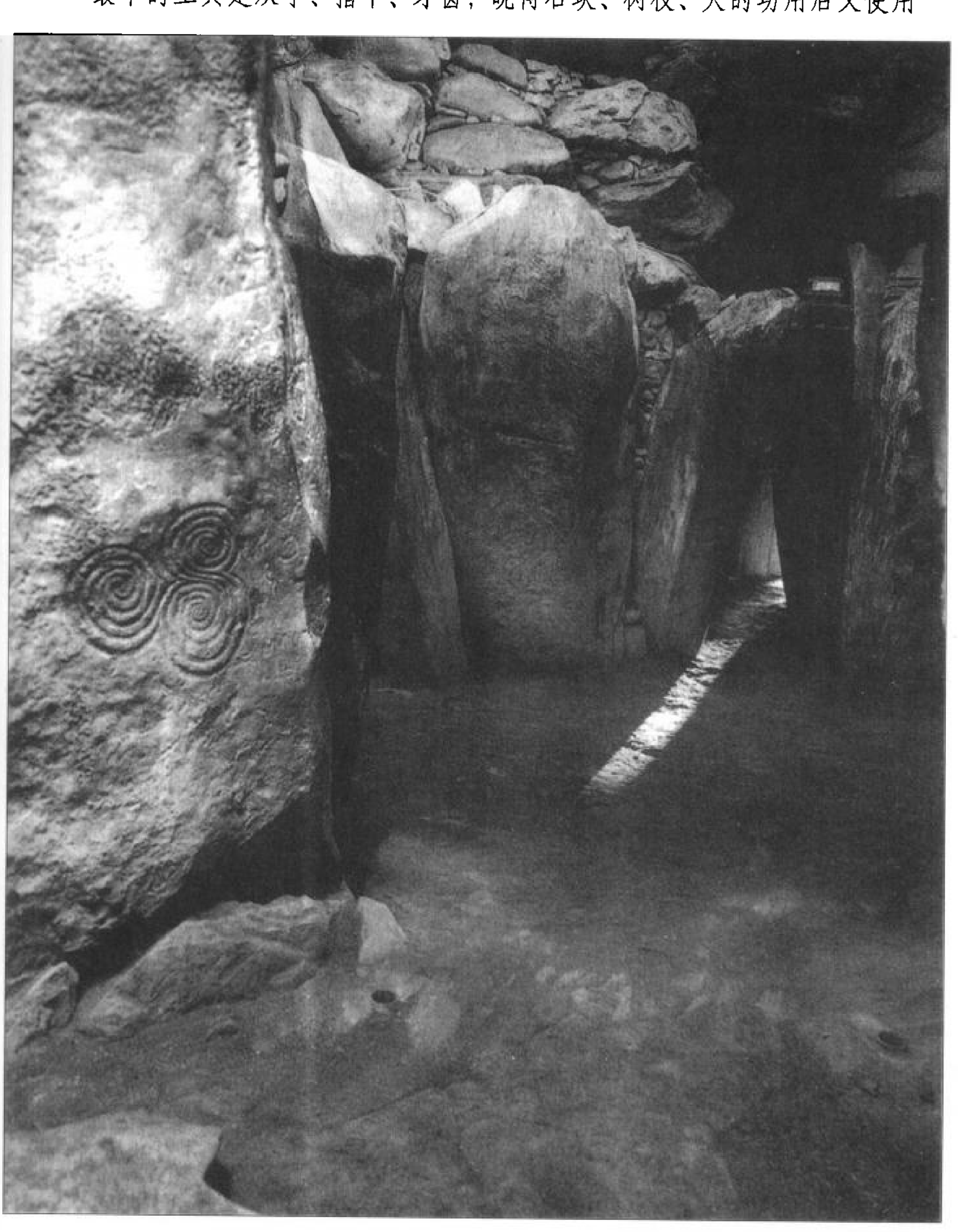
> 这块土地起初除了有水流动的地方之外，四处布满了树木。最初到这里的人类也许是依靠林间果实、鱼类以及狩猎为生的林地人。在这些人之后是在田间劳作的人。他们定居到这块土地之上，成为固定的居民并不断繁衍。无论在田间劳作的人到了哪里，正像今天所看到的情况一样，他们都在排挤着零星的、分散的狩猎人类。

① 《圣经》所载挪亚的第三子——译者注。

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表明波纳尔的头脑中已想到欧洲人在北美的殖民，以及英国和法国农民正在取代从事狩猎采集或园圃业的北美印第安人。他利用已知的现象来解释他认为在遥远的过去所发生的变化。这种18世纪的处理方法——通过研究世界其他近代或同代社会的方法——即使是对于今天的考古学家来说，其价值也仍然是无可估量的。

进步的思想很快便应用于技术领域。梅尔卡蒂是流行解释——各种石器乃是鬼斧神工的产物——的早期反对者，他根据自己从古典文献获取的知识，把这些工具同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的作品联系起来。卢克莱修的卓越诗篇《物性论》除了包含有趣的原子思想之外，还有一个段落，谈及人类有可能经过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再到铁器时代的技术演化序列。梅尔卡蒂的《金属丛论》中直接援引了卢克莱修的诗文：

最早的工具是双手、指甲、牙齿，晓得石块、树枝、火的功用后又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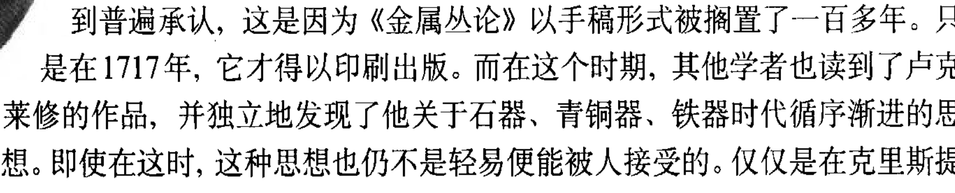
位于都柏林北部博恩河谷的新格兰治墓的枕梁拱状墓室，时间属约公元前3100年。在12月21日太阳升起时，即在冬至的时候，太阳光穿过墓道入口上方的一个小开口，沿着石板墓道顶部，射入十字形的墓室达17分钟。

墓冢的外壳用一层白石英小圆石子铺就，边缘围以装饰性的大石块。墓冢本身高11米（36英尺），直径85米（280英尺）。呈散状抽象装饰的边石、墓道和墓室均属欧洲最杰出的史前艺术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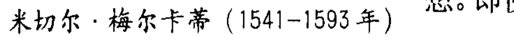
这类工具。后来发现了铁器和青铜器，但青铜器是最先被发现的，人们懂得利用铁器是在它之后的事。

甚至在卢克莱修之前，类似认识已在远东由一位东周时期（约公元前770－前221年）的中国哲学家表述了出来，他引用下列诗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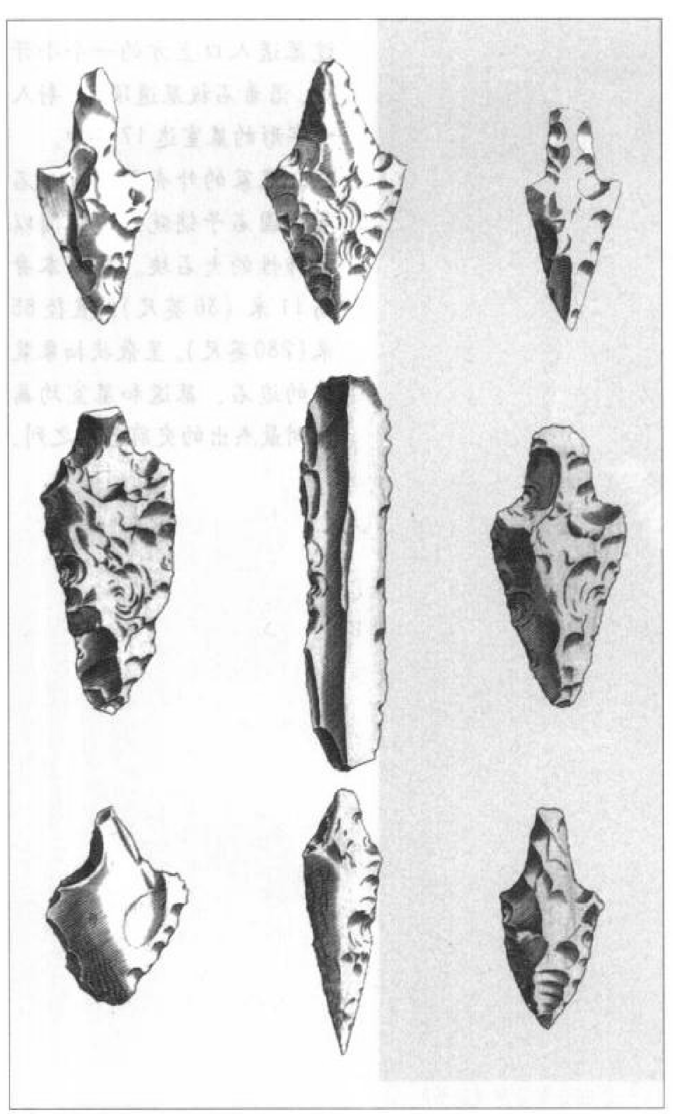
在轩辕氏、神农氏、赫胥氏时代，武器是用石头制作的，为了砍伐树木，建造房屋，掩埋死者……在黄帝时代，武器是用玉制作的，为的是砍伐树木，建造房屋，挖掘土地……掩埋死者。在禹的时代，武器是用青铜制作的，为了开挖河道……建造房屋……现在，武器是用铁制作的。



梅尔卡蒂的石器、青铜器、铁器的序列在16世纪和17世纪没有得到普遍承认，这是因为《金属丛论》以手稿形式被搁置了一百多年。只是在1717年，它才得以印刷出版。而在这个时期，其他学者也读到了卢克莱修的作品，并独立地发现了他关于石器、青铜器、铁器时代循序渐进的思想。即使在这时，这种思想也仍不是轻易便能被人接受的。仅仅是在克里斯提安·泽金森·汤姆森于19世纪早期重新组建哥本哈根的丹麦国家博物馆时，作为史前史纪年基础的三个时代的分期体系才得到了理所当然的确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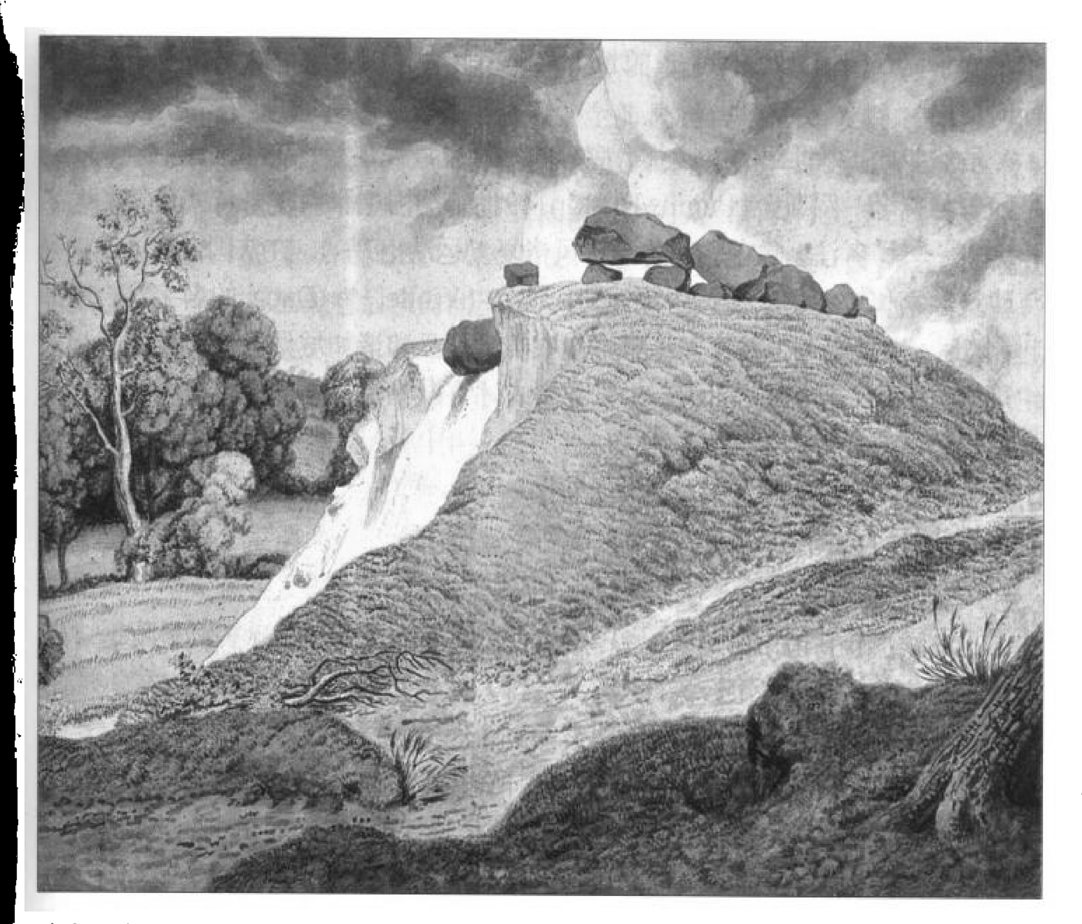
米切尔·梅尔卡蒂（1541－1593年）



中欧和东欧属于西方启蒙运动发展的边缘地区。直至18世纪晚期，易北河以东才明显受到理性和系统关注古代世界（作为人类生存状态的认知来源）风气的影响。结果，考古事业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的形式发展起来。譬如，在18世纪的波兰，由于国王斯坦尼斯拉夫·奥古斯都(Stanislaw Augustus)和简·波托茨基(Jan Potocki)伯爵热衷于波兰古典古代，考古因此带有了贵族性质。在巴伐利亚、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主要推动者是地方名人，尤其是像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Josef Dobrovsky)那样的牧师。斯堪的纳维亚也具有同样的情形。欧洲各地在这一时期的注意力仍集中在人工制作的器物上，人们把它们看作是过去信息的主要承载者，很少注意到它们与周围环境的联系，除非遇到无法忽略的场合，如在洞穴遗存中同时发现了已绝灭的动物和人工制品时，才会这样做。

浪漫主义

尽管18世纪孕育出了宏大的人类进步的模式，但这并不能使人们断绝对吟游诗人和德鲁依特编造的过去的



浪漫主义的反叛。德国画家乔约翰·提斯克本（Johann Tischbein，1751－1829年）在调和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互相冲突的力量时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他在年轻时迷恋古典建筑和古代遗物，曾为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爵士的希腊陶瓶藏品作画，并给他的朋友歌德画了那张最著名的油画像（见第52-53页）。在以后的生活中，他转向用水彩表现史前遗址，甚至绘制了一些日耳曼的古代遗物发表。

这幅浪漫主义的作品所表现的巨石墓，显然是座已被挖掘的古坟。该画作于画家生命的末期，即1820年。

迷恋。古典史料所描述的、粗野的凯尔特武士和祭司，转化成为民族英雄以及理想化的过去的象征。早在16世纪，古典文献便被用来塑造民族主义的神话，前罗马时代的高卢人和日耳曼人，被描绘成积极反抗外敌侵略的光荣祖先。诸如尤里乌斯·恺撒之类作家所提到的有关人牲和其他可怕的德鲁依特教仪式的证据，似乎只是增强了这些异教祖先的神秘性。

至18世纪末，无论在法国还是在英国，把每一处史前遗迹与德鲁依特教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了通行的做法。有些过激的人甚至认为，凯尔特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是吟游诗人传给后人的一种深邃哲学的守护者。巨石陵墓则是奉献人牲的祭坛。人们对凯尔特人的一切事情都推崇备至。18世纪60年代，苏格兰诗人詹姆士·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发现虚构一部有关传奇英雄芬哥尔（Fingal）的史诗的所谓完整“译本”是值得做的，并将他的伪作称作是芬哥尔之子——盖尔人的吟游诗人奥希恩（Ossian）的作品。他的诗作开始一度受到广泛欢迎。

西欧对于凯尔特人的狂热是与对古典古代的持久兴趣并行不悖的。然而，古典主义毕竟属于地中海世界，英国缺乏那些屹立于地表上的古典遗存，而北欧则根本就没有古典遗存。这一点似乎有助于史前考古学在这些地区的早熟。那些对古典古代具有高度敬意的人，倾向于把晚期古典古代和文艺复兴之间夹带的那段“中世纪”看作是粗野和退化的阶段。只是随着浪漫主义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在西欧的兴起，中世纪的遗产才又一次开始成为时髦之物。但对于中世纪的兴趣却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人们始终比较好地了解到中世纪史的基本脉络。在伦敦古物学家协会的最早期的出版物中，收有论中世纪遗存的论文。甚至出现过对中世纪遗址的考古发掘，如1727年，路易十四的图书管理人和谱系作家皮埃

左图为霹雳石。出自梅尔卡蒂去世后出版的著作《金属论丛》（1717年）。他强调这不是雷电的造物，而是人工制作的燧石箭镞和其他石片工具。

在西撒克斯的考古先驱。威廉·康宁顿（1754－1810年）和理查德·考尔特·霍尔（1758－1838年）正在督导对巨石阵南侧一组坟墓的发掘工作。水彩画由菲力普·克罗科尔所作（1807年）。

对康宁顿和考尔特·霍尔的目的来说，困难的问题是不能做浪漫的假设。正像考尔特·霍尔在他的《南威尔特郡的历史》（1812年）一书导论中所坦言的："我要向你们描述我们看到的东西，简言之，就是我将对你们讲述一个质朴的、毫不添油加醋的故事。从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书中出现的一切不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无可争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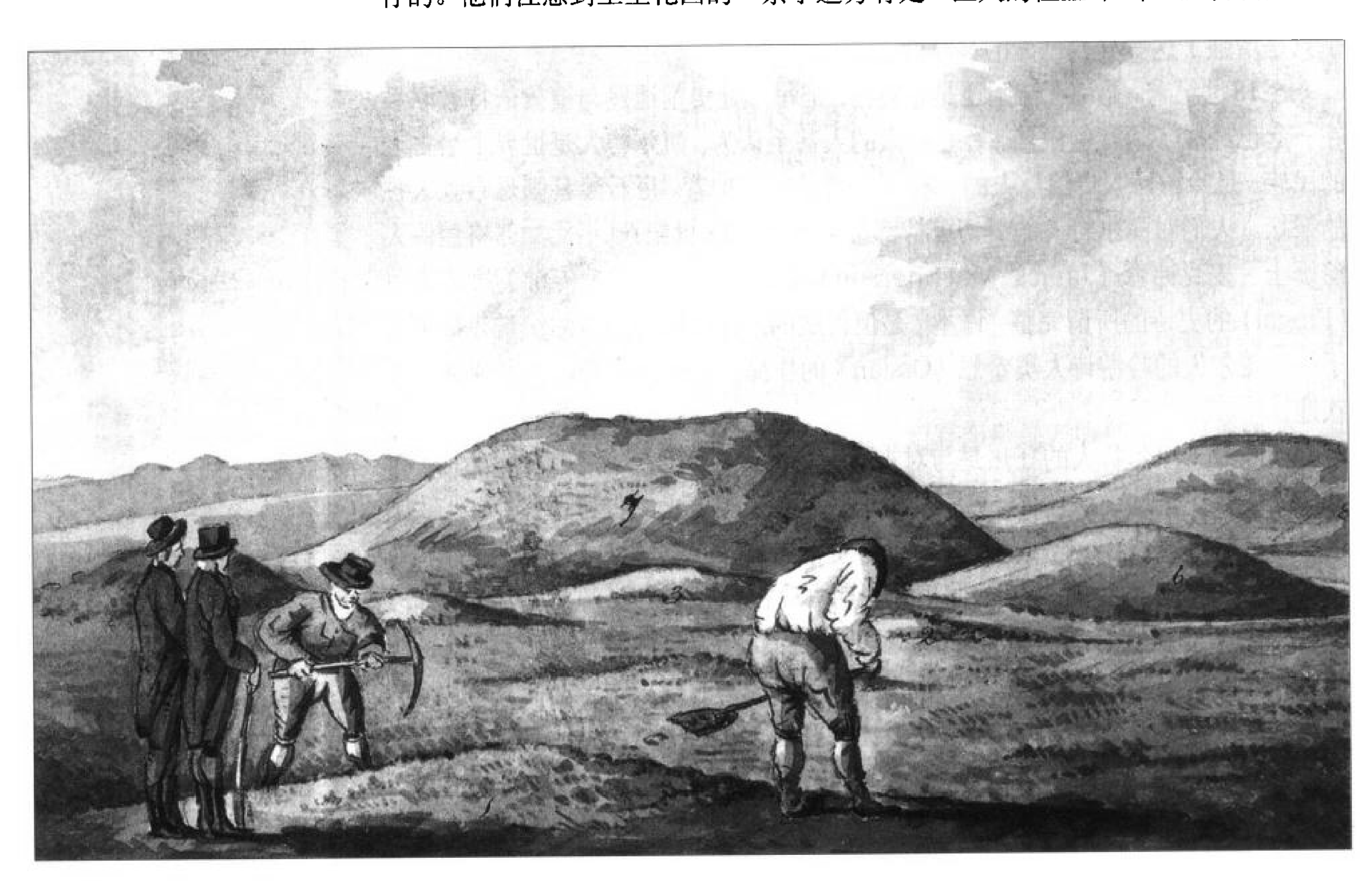
尔·德·克莱朗博（Pierre de Clérambault）在法国查特尼－马拉波里墓地进行的发掘。

虽然如此，中世纪的废墟获得应有的地位应该说还是在19世纪。在英国，这是随着与普金－罗斯金(Pugin-Ruskin, 19世纪英国主张恢复哥特式建筑的艺术评论家——译者注)联在一起的哥特风格复兴运动出现的。在法国，这场运动则与建筑学家和考古学家维奥列特－勒－迪克（Viollet-le-Duc）的名字结合在一起。随后，中世纪考古在许多年里聚焦在美术作品和诸如城堡与修道院之类地表建筑物上。仅仅是在最近30年，中世纪考古才在欧洲考古学的主流范围内拥有了自己的适当位置。

持铁锹的人

当北欧贵族到地中海地区旅游、附庸古典文明的风雅的时候，在其国内，不大张扬的关注古物的风尚继续流行。特别是到了18世纪末叶，发掘的热潮开始形成。在这类早期的发掘中，有一些组织得很好，而大多数则杂乱无章。从事后来看，发掘者对西欧的史前墓葬造成了可怕的破坏，他们认为在早餐前挖上五六个坟丘算不得什么难事。在许多发掘现场，几乎没有什么记录保留下来，而出土的文物随后便流失了。

幸运的是，并非所有的发掘者在他们的处理方法上都是随心所欲的。一次先驱式的发掘颇值得一提，这是由丹麦王子弗雷德里克（Frederik），即后来的弗雷德里克五世及其宫廷总管埃里克·蓬托皮丹（Erik Pontoppidan）于1744年6月进行的。他们注意到王室花园的一条小道旁有处"巨人的住室"，即一座古坟，于是



他们决定进行发掘。在挖开地表土之后，他们立即发现了两个盛有骨灰的陶罐以及一些零碎的金属残片。但这绝不是该墓葬的全部。他们继续向下发掘，付出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他们发现了一间用石块垒砌的墓室和四具死者的骨骼。这些骨骼伴随着一些石片工具，它们是那种“被农民们称之为雷石而实际上是古矛头或其他武器”的石器。蓬托皮丹通过细心观察得出了结论：骨灰罐在时间上较之带墓室的坟墓要晚一些，推测是在后来时间里葬入仍受人们尊崇的墓冢之内的。

随着蓬托皮丹在丹麦、勒·普莱沃特在法国的发掘，我们看到了主要不是以寻宝为目的，而是以理解过去为主旨的考古发掘的开端。在英国，这种科学发掘的主要先驱威廉·康宁顿（William Cunnington）和理查德·考尔特·霍尔（Richard Colt Hoare）一道发掘了威尔特郡的几百个古坟，其中有许多离巨石阵不远。在每个发掘地点，他们都留下一个铅制的标记，提示未来的考古学家：它们已被两人首次发掘过了。

康宁顿和考尔特·霍尔试图在他们遇到的各种坟墓类型中寻找一种模式，但他们吃惊地发现，小型坟墓通常较大型坟墓的葬品要丰富。他们的努力最终获得了成功。在离巨石阵最近的一个坟墓，即所谓布什墓（Bush Barrow）中，他们发现了带有美丽的菱形饰纹的金片，以及一把手柄上嵌有小金钉的匕首。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有一个重要目的没能实现。他们的目的之一是发现谁是这些坟墓的建造者，查清“他们属于在这些岛屿上世代繁衍的居民中的哪一支”。经过10年努力，发掘了465座墓葬，康宁顿和考尔特·霍尔仍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严重缺乏一种编年的尺度，这是将他们的发现分门别类归纳到不同时期的基本手段和依据。只是到了20世纪，人们才认识到这些坟墓是青铜时代早期的贵族们的安息之地，“布什墓”中的黄金制品属于他们的一位首领所有，该首领大约死于4000年以前。

考古与观光旅行

在一个绅士教育主要仰仗学习古典的时代，这一点是很自然的，即古希腊和古罗马应成为18世纪欧洲贵族的基本文化旨趣的来源之一。这种对古典的爱好在意大利是容易满足的，因为矗立在地表之上的罗马时代的古建筑，在意大利的阿奎雷亚、贝内文托、卡西诺、维罗纳，尤其是在罗马本身，简直是随处可见。但北欧因缺乏古建筑，所以那里的贵族就需要通过海路坐船或陆路乘车的旅行，越过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去寻找古典。他们的麦加就是罗马。

大多数旅行者是20多岁的英国绅士或德国王室成员，在学习本国的历史遗产之前，他们要由导师陪伴完成他们的留学教育。偶尔也有全家人及其随从一道乘马车悄悄去意大利“安营扎寨”的。但比较老道的古物收集人往往是派遣他们的代理人去收购雕像、珠宝和其他文物。这样得来的雕塑作品，最终成为一些国家的伟大藏品，如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柏林阿尔特斯博物馆藏品的基本组成部分。

贵族们对希腊罗马的兴趣，也反映在他们国内的住房所采用的新古典建筑样式上。在英国，最著名的是罗伯特·亚当建造的希昂住宅（1761年）和科德尔司

挖掘古墓的英国人

地上的古墓和石碑在古代被当作死者在地表的实物纪念碑。有些土坟的中心是单个人的一个墓穴，而其他土坟则在漫长的时间里有过一段不断添加和扩大的复杂历史。大多数坟茔明显建在山脊上，以便从下方能够清晰地看到它们。

尽管堆土成丘的葬俗延续到罗马和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但在不列颠，绝大多数坟丘都属于史前时期。新石器时代的长形墓多单独出现，而青铜时代的圆形墓则通常组成松散的墓群或线形的墓地。到了铁器时代，方形墓（开有水沟）成为约克郡东部和苏格兰东部及中部的典型形式，在正式墓地当中广为流行。

一种强烈的民间传统认为，大多数坟茔受到仙女和魔鬼的长期佑护，以避免社会动乱的破坏。但今天，除在诸如索尔兹伯里平原那样的军事训练的地区之外，许多坟茔都因农业的发展而被夷为平地。古物学家J·R·莫蒂默（J·R· Mortimer）估计，至1843年为止，约克郡丘陵地带的坟丘数目，因在先前半个世纪里的农业发展，以及圈占中世纪的荒地和共有地，而被减少了25%。

18世纪早期，人们认为这些坟丘是不列颠古代居民的葬身之地。因此发掘坟丘对于绅士们而言，成了一种时髦的乡间体育运动。直到19世纪晚期，这类发掘的结果都要登载在《绅士杂志》颇为显眼的栏目上。发掘者手持鹤嘴锄和铁锹工作，有时一天要挖开几个坟墓。发掘往往同周日下午给来客留下印象的一次娱乐活动差不多。

较为认真的发掘者多半是医生、律师、牧师，即有教养的中产阶级，而不是地产主。18世纪具有严肃的古物学兴趣的古墓发掘者中，有牧师布里安·弗塞特（Bryan Faussett；在肯特州）和威廉·斯塔克利（在西撒克斯）。正是在巨石阵附近的一处遗址，斯塔克利于18世纪70年代留下了第一份有关发掘古墓的清晰记录。西撒克斯地区的发掘明显包括那些“古墓骑士”们的活动，而威尔特郡则是一块打下了木材商人康宁顿和伦敦银行家理查德·考尔特·霍尔爵士的特殊印记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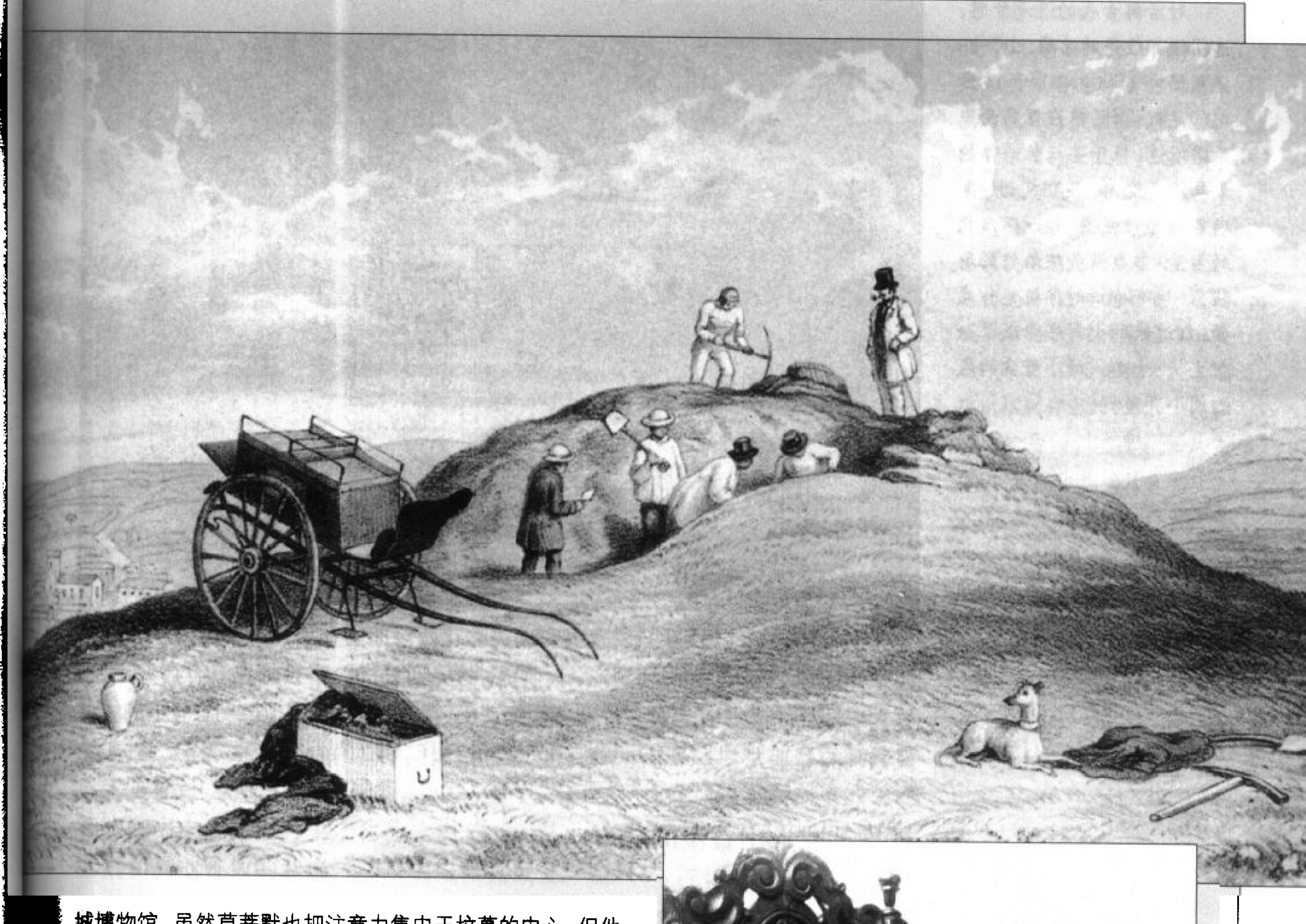
在这支考古队里，康宁顿是实际的发掘人。考尔特·霍尔是财务支持者，他拥有足够的钱财资助这项最终发掘了465座坟墓的考古计划。他们的发掘技术、记录方法、在分类和综合方面所下的工夫以及出版物，对在威尔特郡和其他地区效仿他们的所有人，都具有重大影响。他们的发掘始终与经验性的科学调查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所以考尔特·霍尔曾有一段著名的评述：“我们根据事实而非理论说话。”

发掘古墓活动在19世纪得到广泛发展，发掘者之间往往展开激烈的竞争，这是由于他们力图将更多的遗址纳入自己的征服计划，力求获得更多的古文物。他们之所以如此热衷，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古代遗址的迷恋并怀有记载与整理远古历史的愿望。一些考古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这时脱颖而出。富有的德贝郡地产主托马斯·贝特曼（Thomas Bateman）及其合作者在皮克区与约克郡进行的发掘工作尤其引人瞩目。他们共发掘了360多处遗址，贝特曼还留下了详尽的出版物和一套完整的档案，作为他们所有发现的记录。当时人们打开古墓的通常做法是在一座土冢的侧面挖一条通向中心的壕沟，或者将其四等分分块挖掘。R·S·艾萨克森（R. S. Isaacson）在《一位掘墓骑士的古墓发掘》（1845年）的诗中，以精心推敲的诗文刻画了巴克曼的发掘工作：

……凝视着那心爱古墓的目光
仿佛穿透了地层，直射正中央……
然后如大梦方醒，我的古墓发掘人啊，
我们开挖的日子到啦！
众人欢呼雀跃，
同时还大口灌进掺水的烈酒，
这个世界上除了发掘古墓，
还能有什么值得一试的事情！

与之相对应，威廉·格林韦尔（William Greenwell）是达拉谟大教堂的教士、教长及教士团的图书管理人。他在英国许多地区从事发掘，挖过的古墓超过443个。他具有广泛的兴趣和联系，积累起可观的古文物藏品，现均收藏于大英博物馆。他使用的发掘技术与贝特曼的类似，即挖出两条平行的、通向古墓的沟，一般将整个墓冢掀开。格林韦尔因未能充分监督他的工人，以及因某些发掘工作质量低下，受到其他人——主要是他的竞争者莫蒂默——的批评。但他发表的发掘记录却大多是高质量的，他把这一切归功于考古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皮特－里弗斯将军（General Pitt-Rivers），是里弗斯将军使他初次领略了发掘工作的乐趣。

莫蒂默是约克郡东部的谷物商，他对考古学和地质学的兴趣源自1851年的那次大展。他和他的兄弟罗伯特（Robert）对在约克郡发掘古代遗址和收集地质及考古标本充满了激情，以至燧石和其他石器在当地竟被称为“莫蒂默”。除了铁器时代的墓地，即达恩墓群和位于丘陵地带的加通及德里菲尔德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墓地之外，他还发掘了约克郡东部的304座墓冢，创建了一座收藏发现物品的博物馆，发表过一份详细的报告。目前他的收藏品陈列在赫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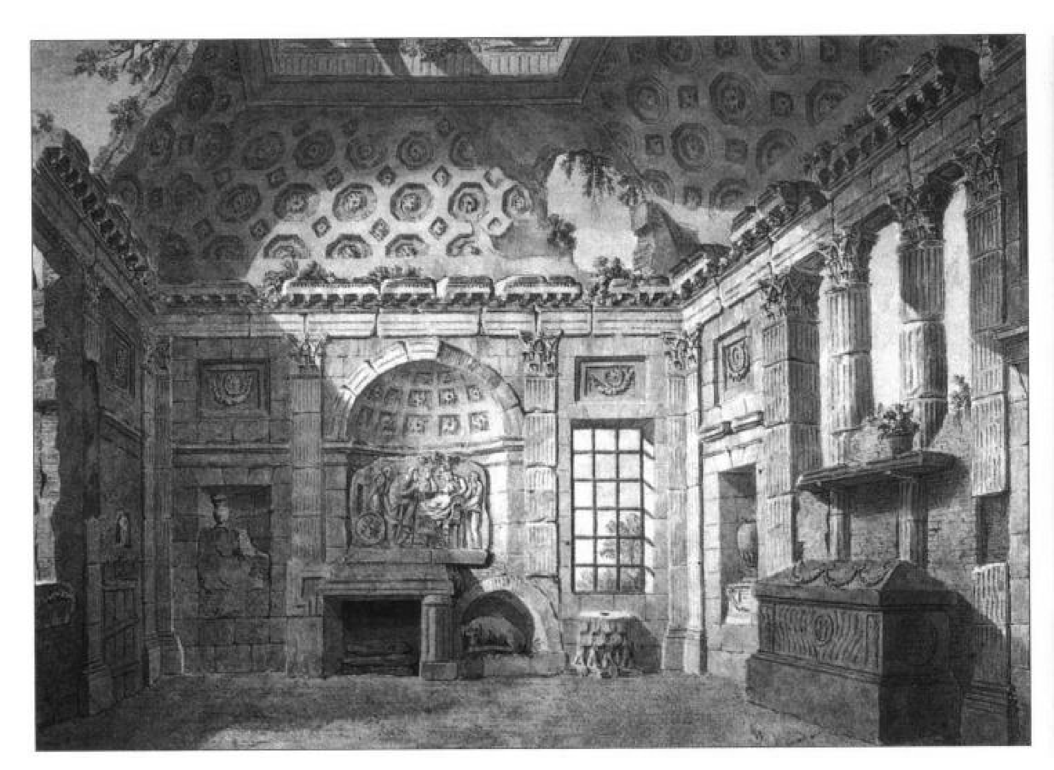
城博物馆。虽然莫蒂默也把注意力集中于坟墓的中心，但他的发掘技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后来一些年份里，他重新发掘了某些他认为可能遗漏了某些细节的遗址。他与格林韦尔和另外一位东约克郡的古物学家（博因顿，Boynton）共同发掘了达尼墓群，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

随着全面系统的发掘工作的兴起，如皮特·里弗斯对各种类型和不同年代的遗址的发掘，人们挖掘古墓的热情开始消退。到了20世纪，这种现象已完全消失。

安德鲁·弗克森（Andrew Foxon）撰稿

上图：贝特曼于1845年5月28日开挖德贝郡韦顿的古墓，人们称该古墓为“栽髏的提灯”。上图为F·W·潘克为艾萨克森的诗歌《一位掘墓骑士的古墓发掘》所绘的卷首插画。

右图：凯农·威廉·格林韦尔（1820－1918年），据说他是位“绝妙的健谈者，具有敏锐的幽默感”。他喜爱并常征引的名言是：“永远不要考虑理论，只管收集事实。”



对古典古代的浪漫梦想。这间顶部敞亮的凉廊，由C-L·克莱里索（Clérisseau）于18世纪60年代设计，建在罗马西班牙路附近，位于圣三位一体德蒙特修道院内，现仍完好。室内家具看上去像是一些残损的古董：书桌做成破石棺的形状，一块有檐口的厚板充作桌子，翻过来的大写字母成了一把坐椅，古典式的小壁龛构成一间小狗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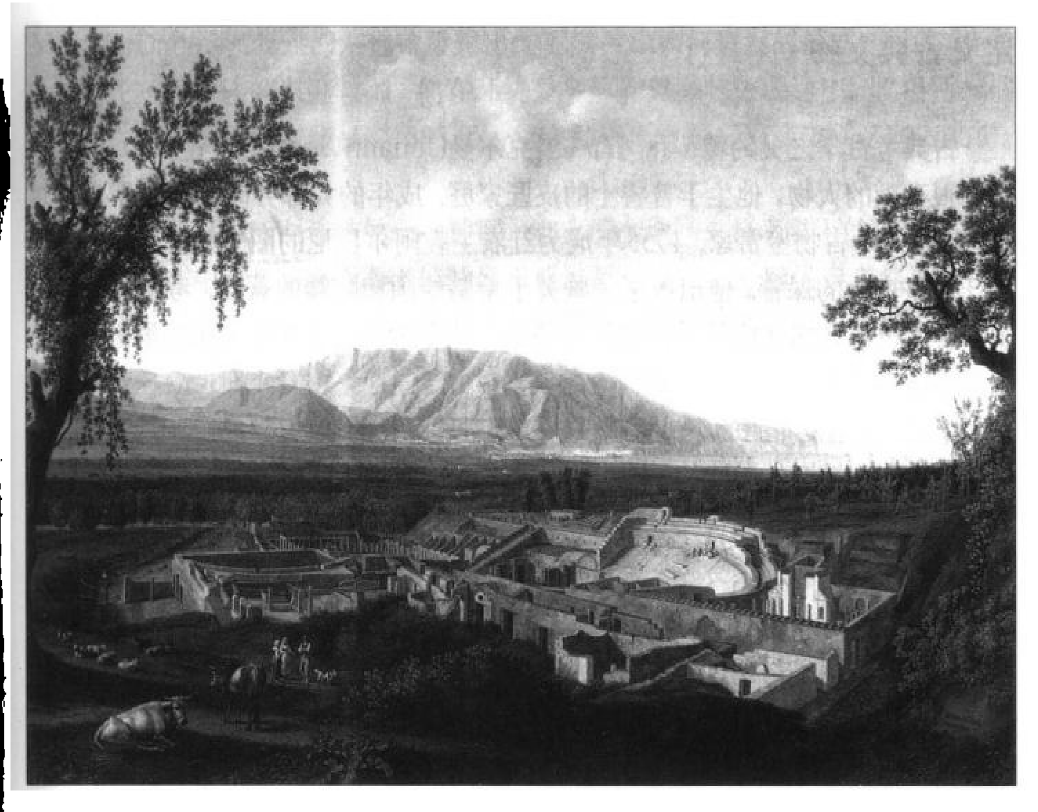
敦住宅（1759 - 1765年）以及美轮美奂的花园，如同在斯托亥德与斯脱夫的花园一样，饰有神庙、岩洞和湖泊。很明显，这一时期的许多绘画也具有古典主题，屹立着圆柱的废墟成为众多自克劳德和普桑（两人均为法国16 - 17世纪的古典风景画的奠基人——译者注）时代以来的田园风景画的内容。

被维苏威火山吞没的城市

18世纪以前的漫长时间里，人们在那不勒斯湾周围偶尔发现了一些古代雕塑和经人手加工过的石块，这意味着那里曾存在过古代的城市，后来被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的喷发所吞没。我们是从小普利尼（Younger Pliny）晚年所写的生动的历史记载中，获知这些业已消失了的城市的：

> 是否待在家里或伺机跑到旷野中去，因为建筑物现在被猛烈的震动所摇撼，似乎在左右摆动，就好像要连地基一道崩塌似的。另一方面，在屋外，有被落石砸伤的危险，即使它们重量很轻或很酥软。不管怎样，在对风险进行了一番权衡之后，他们选择了后者……为了避免落物砸到头上，他们顶着枕头，裹着衣服。

赫库拉尼乌姆的系统发掘始于1738年，那不勒斯国王提供了资金，很快便出土了雕塑、圆形石柱和壁画。但由于在开挖湮没城市的火山灰时往往要借助于炸药，所以各种古物不得不在炸成碎片后再加以恢复。发掘工作进行到两年的时候，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与朋友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到那不勒斯观光旅行，回国后将他的见闻写了下来："他们打开的通道弯弯曲曲，现在长度超过了一英里……当你漫步在那里时，你



庞贝、哈克特（J.P.Hackert,1737-1809年）绘。正是画家哈克特绘制的这幅赏心悦目的风景画，将威廉·汉密尔顿爵士吸引到这里。而当歌德与提斯克本于1787年抵达那布勒斯时，也正是这幅画促使他们访问庞贝城。歌德起初觉得"这座宛如僵尸般的城市留给我们的是相当不快的印象"。但后来他发现自己难以摆脱对它的回忆，于是在两天之后回到这里。他反思道："世界上已经发生过许多灾难，但从来没有一场灾难像这次灾难那样，给后人带来如此多的宜人之感"。

能看到圆形的剧场，看到许多用大理石柱装饰和用大理石包墙的房屋，看到神庙的一角，看到绘有壁画的房间的一些拱顶。"罗伯特·亚当后来访问了这里（1755年），记载了他凭借火把的光亮，下到地底下的圆形剧场内参观的情景。他看到"刚发现不久的陶瓶和大理石人行道"，以及"我们到那里的前一天刚刚出土的大理石桌子腿儿"。他写道：整个城镇"一度充斥着神庙、柱廊、宫殿和其他雅致的装饰"，"现在则简直像是一座煤矿，一群苦工在那些被古人丢下的废弃房间里劳作着"。

发掘庞贝城是在10年后开始动工的。在这里，令人窒息的火山灰如滂沱大雨，倾泻到这座城市身上，同时也使该城的封存形式不同于赫库拉尼乌姆。一些有机物，如木头和纺织品，都被腐蚀殆尽了。而城市居民的尸体却被发现裹夹在业已硬化的火山灰里。如果将那些一度填充着组织和骨骼的空间用石膏填满——这项技术是考古学家基尤赛普·菲奥雷里（Giuseppe Fiorelli）于19世纪开发出来的——死者的形状便可得到复原。这两座城市现在成了观光旅游的重要去处，比较尊贵的游览者还可目睹有计划的现场发掘，或许正好在这个时刻，发掘者会从火山灰里找到异乎寻常的东西。

自18世纪以来，庞贝和赫库拉尼乌姆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1世纪罗马市镇生活的极为珍贵的史料。其原因之一是它们就像两件埋藏着时代文物的密封器具，而大多数古代的城市要么无影无踪了，要么在放弃前已被搬运一空并拆走了可重复使用的建筑材料。再一个原因就是在这里发现了家具和其他家庭用品，甚至包括炭化的食品，这使得考古学家能够知道这些建筑物和房间是派什么用场的。这里幸存的墙壁通常保持着原有的高度，因此这两座被掩埋的城市便保存着独一无二的壁画，这些壁画中有许多在早期被割成石膏薄板，存放到那布勒斯博物馆，当作美术作品悬挂了起来。

定义古典文物

古典考古学之父约翰·乔阿奇·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是位很有趣的人物。他生于普鲁士的皮匠家庭，成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罗马度过的，曾是一个古物鉴赏家，1755年成为红衣主教阿尔巴尼的图书管理人，1763年担任教皇古玩的保管。他出版了一些关于希腊绘画和雕塑的著作，考察过派斯图姆、赫库拉尼乌姆和庞贝。在庞贝城遗址，他抱怨说只有8个人在那里工作，挖出这座城镇恐怕需要几个世纪。

温克尔曼偏爱希腊的审美情趣——基于对理想化的运动员和神祇雕像的研究，以及他本人同性恋的激情——通过为那些观光旅游的人所写的旅行指南之类的书籍，广泛深入地影响到社会大众。他的大作《古代艺术史》(1764年）最先出的是德文版，然后出了法文版、英文版，成为新古典主义的指南。他还把全新的处理方法引进古典雕像的研究领域。他放弃了以辨认著名历史人物或根据雕像的所有者为雕像分类的做法，构建起一种编年结构，永久性地影响到考古学上观察、展示和讨论问题的方式。

展示古典文物

自国外旅游归来的人，都热衷于用古代的雕像或并非很古老的雕像等艺术藏品装点自己在乡间和城里的住宅，以体现有学识和文化品位。许多人向教廷官员行贿，以便他们能将古文物带出意大利。例如，皇帝哈德良的年轻情人、于尼罗河溺水而亡的兰丝当恩·安提诺丝的雕像，被一个叫作伽文·汉密尔顿的商人弄到了手，他是色尔本伯爵威廉的代理人。像的头部是哈德良在罗马城外的庄园废墟中找到的，但没有得到教廷准许出口的许可证。据说汉密尔顿只能靠奉送给“教廷下属的古物学家一份额外的礼物”，才将头像运出意大利。这也是意大利雕塑家们制作头像和石灰石浮雕板之类的仿制品，冒充古代作品出售的时代。今天，这些仿制品或许被认为是伪作，但当时它们却是颇令人骄傲的资本，因为它们扩大了那些新古玩收藏者的藏品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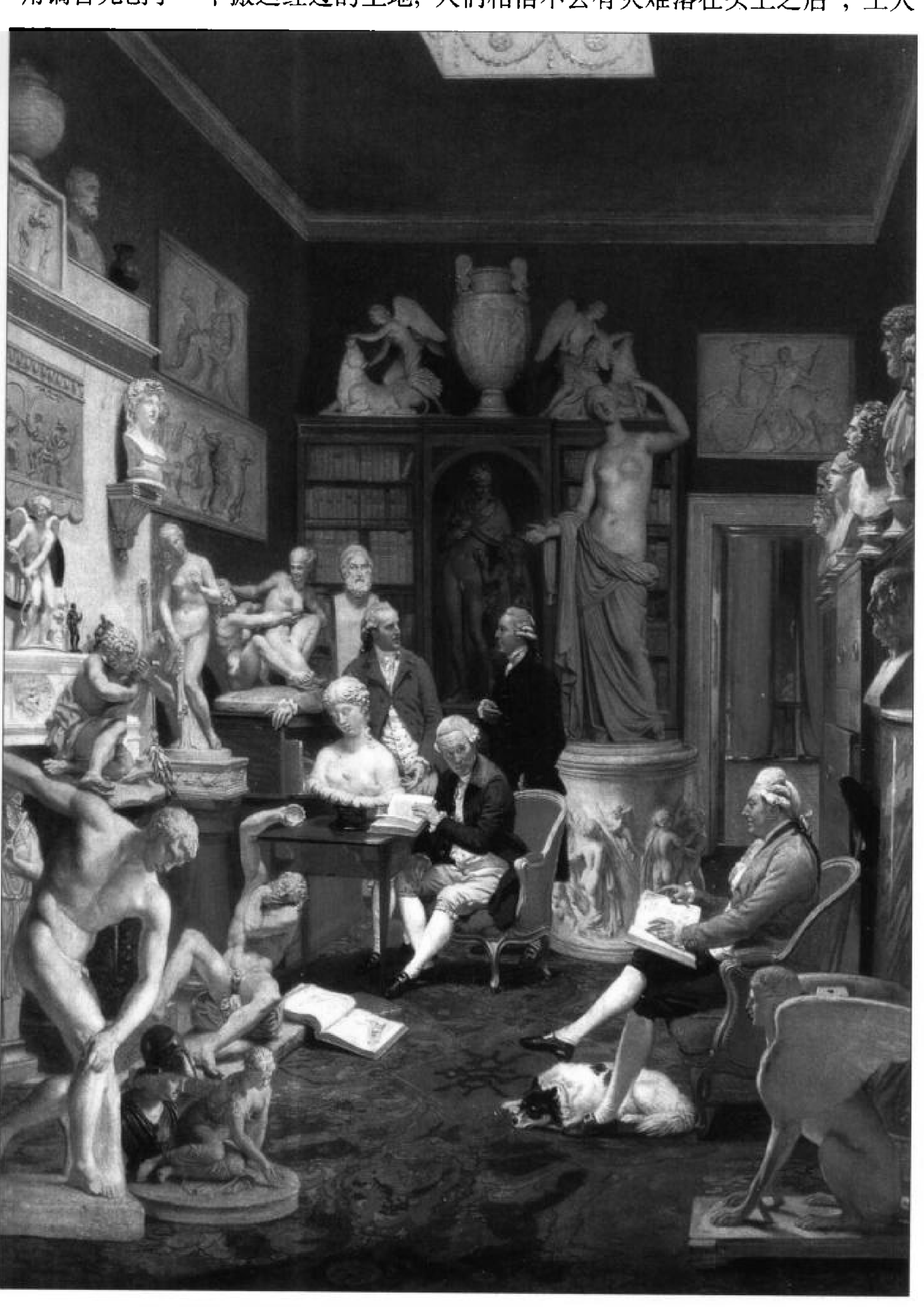
英国人的大量这类藏品中，有许多在它们的所有者后来沦落的时候遭到了破坏，但也有一些始终完好无损。陈设在约克郡纽拜大厅中的一件雕塑——现仍陈列在那里——被置于一间由罗伯特·亚当于1767年设计的特殊侧室中。这件藏品是威廉·韦德尔（Willam Weddell）于1765年在罗马得到的。另一批原封未动的重要藏品是为莱斯特伯爵托马斯·科克（Thomas Coke）收集的雕塑系列，它们使诺福克的霍尔克汉姆大厅四壁生辉。

在希腊旅游

众多贵族们的古玩收藏品是在访游意大利时收集的。然而，当拿破仑战争打破了既定的观光旅游形式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东方，尤其是地中海东部地区。在这方面，一位早期的著名旅行家是爱德华·丹尼尔·克拉克博士（Dr.

Edward Daniel Clarke），他曾设想出维苏威火山如何喷发的模式，并在20多岁时担任一些贵族的家庭教师。他在环绕爱琴海和黑海的旅游途中，收集到一批重要的古典雕塑和铭文藏品。1803年，他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展出了这些古文物，因为他还是该图书馆馆员。

正是在阿提卡（中希腊的一处地区，雅典所在地——译者注）的位于埃列西斯的希腊神庙中，克拉克获得了他的最重要藏品之一——一尊供奉在那里的、在许多年里被认为是农业女神德迈忒尔的巨大雕像。他获准搬运这尊雕像，并为此做好了准备。当他进行搬运时，一头牛挣脱了缰绳，用头冲撞那尊大理石像，这个事件吓坏了他雇佣的、迷信的当地工人。他们把这看作是某种象征，即倘若雕像被运走，他们的土地将会变得贫瘠。只是当一位地方东正教牧师穿上他的法衣，“用镐首先刨了一下搬运经过的土地，人们相信不会有灾难落在头上之后”，工人



查理·汤利（Charles Townley）在他的美术收藏室中，由乔汉恩·佐法尼绘（1733－1810年）。

汤利是在1768年访问意大利时成为古典文物迷的。在那不勒斯，他遇到英国使臣威廉·汉密尔顿爵士这位常驻此地5年之久的狂热的古物收藏家。之后不久，他便得到了他的第一件古代雕塑：一尊两个青年玩膝拐骨游戏的雕像。

随后10多年的时间，随着藏品日渐增多，汤利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帕克街的住宅成了收藏室。餐厅“主要为他的那件最珍贵藏品所占据”，即一尊真人大小、穿着简单合体的维纳斯像。这是在罗马近郊奥斯提亚的克劳狄浴室废墟中发现的。壁炉两侧的壁橱中立着蒂阿娜和塔丽亚（前者为罗马月神，后者为舞蹈和田园诗歌之神—译者注）像。雅典娜和宙斯-塞拉皮斯（宙斯与古埃及神奥西里斯的一体像—译者注）的半身像点缀在壁炉前。一道中楣紧附在墙上，上面饰有“常青藤的花彩以及纵酒狂欢时的用具”。

房间里还有从皇帝哈德良在提沃里的庄园遗址得到的赫拉库勒斯（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译者注）的巨大头像和汤利的《掷铁饼者》。后者是由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雕塑家迈伦（Myron）—菲迪亚斯（Pheid－ias，古希腊雅典的著名雕塑家，伯利克里的朋友—译者注）的同代人—所雕的一尊真人大小的《掷铁饼者》像的复制品。

1805年，汤利过世，这些藏品被移交给大英博物馆。博物馆为此专门新建的一间陈列室，于1808年对外开放。

们才克服了恐惧情绪。当运它到英国的轮船环绕古德温暗沙航行的时候，这尊命运不济的雕像又差点儿丢失。今天，这位“女神”已不再被人崇拜了。她的雕像现在陈列在剑桥菲兹威廉博物馆，被认为是侧立在德米忒尔神庙入口处的两尊女石像柱之一（以站立的女子为形式的石柱）。

拿破仑时代漫游于希腊的最声名狼藉的收藏家是埃尔金（Elgin）第七代伯爵托马斯·布鲁斯。他在1799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君士坦丁堡政府的大使。正是埃尔金，在其合法性值得怀疑的情况下（因当时希腊处于土耳其统治之下），把位于雅典卫城、属公元前5世纪的巴台农神庙上的华丽大理石雕刻，弄到了自己手里。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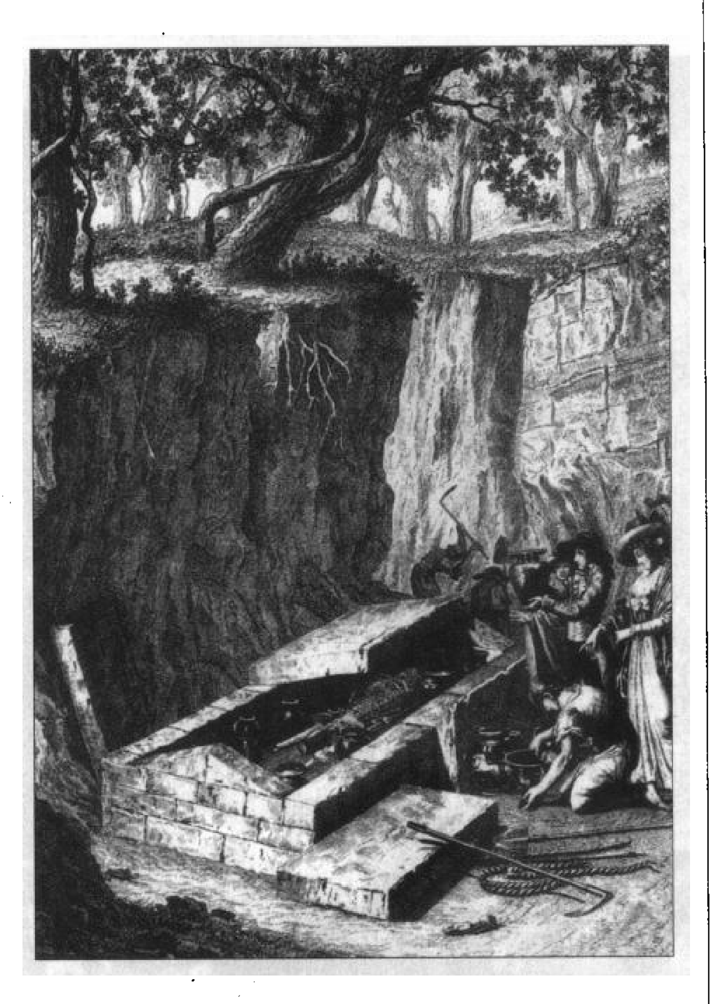
威廉·汉密尔顿爵士

在收集古希腊装饰性陶瓶的英国绅士当中，开风气之先者可以追溯到威廉·汉密尔顿爵士（1730－1803年）。他是英国驻那布勒斯宫廷的使臣，且是全权大使。汉密尔顿在那布勒斯收集藏品的活动长达37年多，但即使在1764年，即他抵达那里的头一年，他便已拥有相当可观的收藏了。在整个逗留那不勒斯期间，他购买了大量文物。为了收购诸如波斯纳尼收藏物（购于1766年）那样的藏品，他常常要与人谈判。他还通过对那布勒斯周围的坎帕尼亚墓地进行“发掘”，以此补充自己的藏物。在提斯克本所编《出自古代陶瓶〈发现于两个西西里王国墓地〉的雕版画汇编》（1791－1795年）中有一幅雕版画，表现汉密尔顿和他的妻子正在打开一座坟墓，墓里露出带有红色图案的陶瓶。

出版这样的出版物，目的在于出售藏品。皮埃尔·德汉卡维里（Pierre d'Hancarville）手中有一些汉密尔顿早些时候交给他出售的陶器，他写道：这些器皿“对了解印章和图案藏品均很适宜，或者说它们可用来布置有品位和有学识者的柜橱，不仅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而且具有实用和教益作用。德汉卡维里所写的两册关于这些收藏品的书，分别问世于1768年和1770年，第三、四册的出版则因他典当的那些陶盘而受到耽搁。

1772年，韦奇尔顿的第一批藏品以8000几尼的价格卖给了大英博物馆。第二批藏品是在1789和1790年间收集的，并于1798年运往英国。但第三批因HMS·考罗索斯号船在斯奇里岛附近遇难而丢失。剩余古物的大部分被富有的阿姆斯特丹商人托马斯·霍普（Thomas Hope）于1801年以4500几尼买走，并在他的位于伦敦公爵夫人街的寓所进行过展出。

这些陶瓶上的画法通常是非常随意的。但有一些形象意在表现古典时代的辉煌。著名的英国瓷器生产者乔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根据“埃特鲁里亚器皿”复制了它们，并在斯塔福德郡的“埃特鲁里亚”作坊进行制作。



上图：威廉爵士和他的夫人埃玛·汉密尔顿于1790年在诺拉的坎帕尼亚墓地打开一座陵墓。60岁的汉密尔顿着迷于他那年轻魅人的太太（后来成了纳尔逊的情妇），鼓励她放开头发，在赫库拉尼乌姆壁画前，身着飘逸的服装，摆出一副舞者的姿态。惊异不已的歌德写道：“你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此图是C·H·克尼普（Kniep）为提斯克本的《出自古代陶瓶〈发现于两个西西里王国墓地〉的雕版画汇编》（1791－1795年）所作的卷首图。



大英博物馆中的埃尔金室（Elgin Room）。在这个临时陈列室中，詹姆士·斯特法诺夫（James Stephanoff）曾首次展出过出自巴台农台神庙的大理石雕塑作品。

埃尔金一直坚持说他的行为是高尚的，他“完全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就是为大不列颠乃至也是为整个欧洲，用尽可能有效的知识和手段保存及完善以雕刻和建筑为代表的卓越的希腊艺术”。

他告诉英国国会的一个遴选委员会：假如他没有抢救出这些大理石作品，它们也许不复存在了。

座神庙在1687年遭到威尼斯人一发炮弹的破坏。那枚炮弹引爆了土耳其驻军当时堆积在那里的火药。结果，埃尔金的代理人获得了一份敕令，可以拿走“任何一块上面刻有古老铭文或图案的石块”。这句话使他们将这座建筑的中楣、三角墙上的雕刻、墙面（方形的浮雕板）席卷而去。从1801年12月开始，这些古文物被运往英国，直至1804年1月以后，大部分文物才算到岸。埃尔金的行为使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可言。拜伦勋爵（Lord Byron）对他进行了不指名的攻击，很少有人欣赏那些精美的雕塑作品。最终，埃尔金分别以62440镑（1811年）和更高的73600镑（1815年）的价格，将他的收藏品卖给了英国政府。而这些大理石作品最后仅以35000镑售予大英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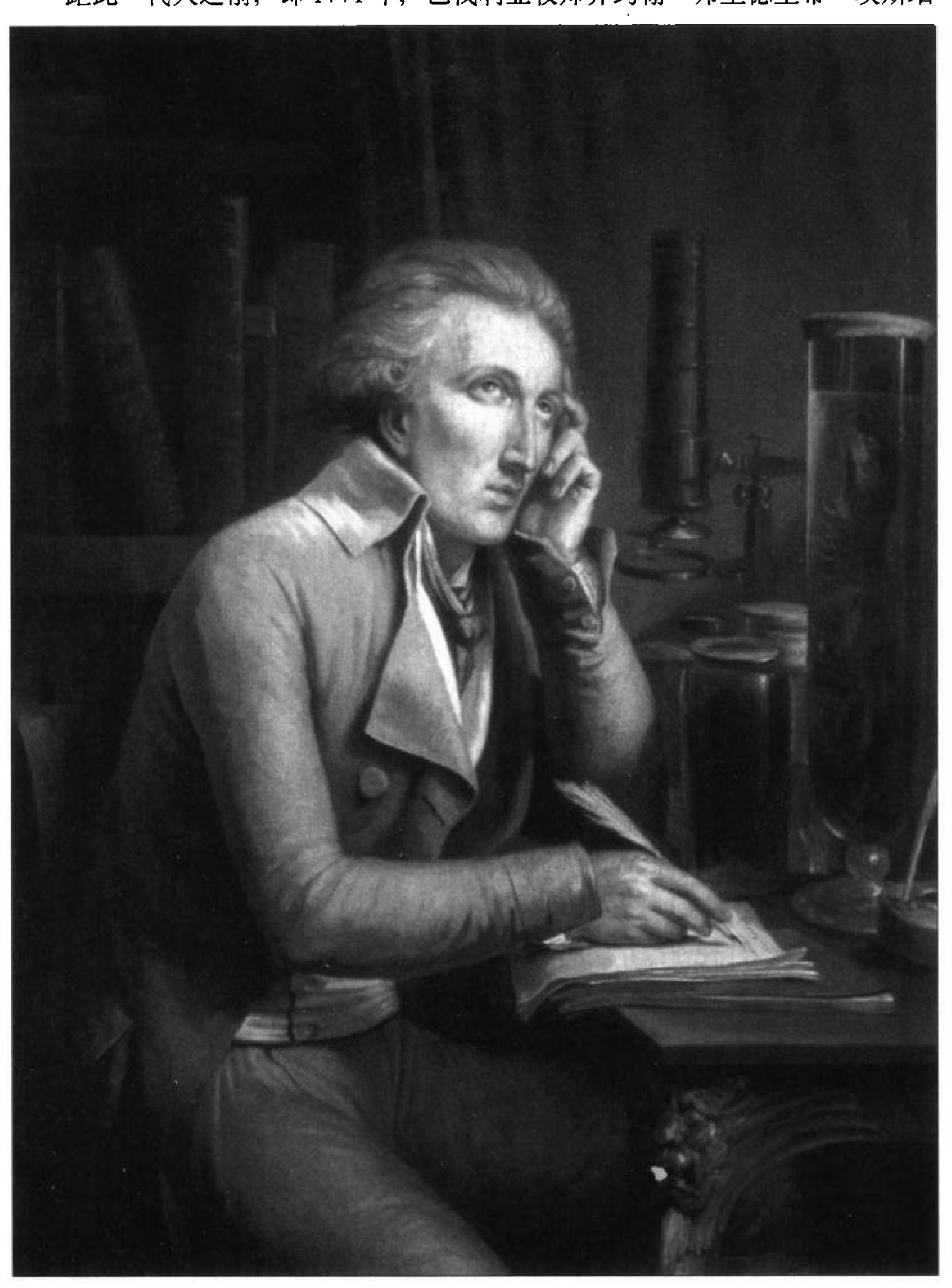
化石人初次引起轰动

初生的考古学科是丹麦内科医师和博物学家尼尔斯·斯坦森(Niels Stensen，即尼科劳斯·斯托诺）成果的早期受益者，斯坦森于1669年画出了第一张地质学的剖面图。正是斯坦森认识到这类剖面可以解释为不同的发展层次，他确立了沉降和地层叠压的原则，也就是较晚的层面一定位于较早的层面上方。

在西欧，将这一思想首次应用于考古学的人出现于1797年，这就是一位名叫约翰·弗里尔（John Frere）的英国乡绅。他在萨福克郡豪克森的一座采石场发

现了一些被人加工过的石器，其中包括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手斧。这些石器埋在地下4米（13英尺）一处未经触动的堆积物中，伴有已灭绝的大型哺乳动物的遗骨。弗里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识别出他的发现物是加工过的石器，而且他把它们划归到十分遥远的古代。他的结论是：它们是“……一个尚不知金属为何物的民族制作并使用的战争武器……我们的确可以将它们划到非常遥远的远古时代，甚至超越了现今世界所处的时代。”弗里尔画出了石坑的侧面图，注意到加工过的燧石分布在一个很厚的砂砾层中，每平方米有七八件。他的发现引起伦敦古物协会的注意。尽管这家协会的期刊《考古》发表了这些发现，但弗里尔发现的意义——如同一个世纪前康耶尔斯发现“古代不列颠人”的手斧，最终在勒兰德的《收藏品》（1770年）一书第二版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英国的当时以及此后几十年都未能被人认识。

距此一代人之前，即1771年，巴伐利亚牧师乔约翰·弗里德里希·埃斯珀



乔治·居维叶（1769－1832年）。正是居维叶首先创立了动物分类的自然体系，由于他对动物和鱼类化石——特别是在巴黎盆地出土的已灭绝的巨大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他建立了古生物学和比较解剖学学科。1789年，他成为法兰西学院的自然史教授，在君主制复辟之后，成为巴黎大学校长和法兰西贵族。

至1808年，居维叶已确认：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在遍及北欧地区发现的猛犸象的巨大遗骨，并不像先前人们所猜测的，是《圣经》所载的被大洪水冲到北欧的死象的残骸，而是适应寒冷气候的化石象，与现存于非洲和印度的现代大象有明显区别。

(Johann Friedrich Esper)，在德国汝拉的拜罗依特附近一个叫盖兰罗依特的洞穴中，发现了一些人骨，同时伴有熊和其他灭绝动物的遗骸。埃斯珀推测这些人骨可能属于一位德鲁依特，或者属于大洪水前或较晚后的某个死者。但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人骨必定是插入到那些含有动物骨骸化石的堆积层中去的。他写道："没有充分的理由，我不敢假定这些人类的成员与其他动物化石属于同一个时代。""它们一定是偶然到那里去的。"

然而，在其他地区，学者们开始对圣经《创世纪》章中关于大地形成的解释提出挑战，尽管这种挑战还是小心翼翼的。地层学的原则首先被运用于研究埋藏在地层中的骨骼化石（地层古生物学），如土木工程师和英国地质学之父威廉·"斯特拉塔"·史密斯（William 'Strata' Smith，第二名Strata即英文中的地层，这里有尊称或戏称的意思——译者注）便在他的《英格兰地质图》（1815年）一书中运用了地层学原则。在同一时期的法国，比较解剖学之父、伟大的乔治·居维叶则扩大了这一原则的应用范围，把它用于从甲壳动物到哺乳动物的身上。他构想出化石动物与现代同类动物之间的差异之处，这些差异随着地层的年代而增大。这种观念发展到最后，也就是进化理念。居维叶还利用比较解剖学方法，根据残缺不全的骨骼化石复原了整个动物的原形，这是考古学家们在最近50年时间里才充分开发出的一项技术。

到这时为止，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仍然没有受到这些自然科学成果的多大影响，或许正需要化石人的发现来改变这种情形。虽然有埃斯珀的发现以及其他许多论据尚不充分的说法，但居维叶还是怀疑化石人与在"大洪水"以前的堆积层中发现的、但现已消失的物种相并存的事实。他依照《圣经》的说法，认为人类出现于动物之后。这种观点似乎与当时在地质学上的一些发现相适应。然而，居维叶与他的学生及追随者们有所不同的是，他并不绝对否认化石人一度存在的可能性，他只是否认所发现的是化石人的骨骸。

古老而遥远的土地

"就埃及而言，我将用很大的篇幅来评述它，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它这样多的奇迹。"尽管这是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早在公元前5世纪写下的一段话，但这些话代表了早期欧洲人对古埃及的看法：一片神奇的土地，到处是异乎寻常的古建筑和异样的人民。这种魅力至今犹存，特别是那些矗立着埃及古建筑的地方。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基泽的大金字塔。到那里访问的人长期以来便认为它们具有非常神秘的意义：它们为半神半人的英雄而建，由那些沉浸在不可思议的宗教仪典中难以自拔的人士所设计，建造者是大批在皮鞭抽打下流血流汗的奴隶。

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埃及的兴趣，以及这种兴趣所表现的方式，在许多方面同文艺复兴之后重新苏醒的欧洲人对埃及人的兴趣相似。13座饰有象形文字的方尖碑自罗马的埃及行省运至罗马以衬托罗马城的尊显与伟大，便是这种兴趣的早期的证明。这种公众对收集古物的强烈欲望，以另一种方式并主要是在19世纪反映了出来。当时同样的古建筑作为外交赠品被用船运到伦敦、巴黎和纽约。例如，克莱奥帕特拉女王的方尖碑从亚历山大里亚装船后，在一次多事的航行中，于比

斯开湾几乎被一场风暴所吞没，经过一波三折才最终被竖立在伦敦泰晤士河的河堤上。诚如通常所见，这种观点和拥有的强烈欲望会发展成为想要理解的要求，这正是贯穿着新生的考古学学科的一条线索。

18世纪末叶，欧洲人已与埃及建立了密切联系，已经对近东地区有了相当多的知识积累。但此前这个地区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却有很长时间难于接触。当时存在着两个主要的史料来源：一个是希罗多德的记载——它之所以很容易理解，是因为作者使用的是希腊文，而这种语言在欧洲已被人熟知并做过研究；另一个来源是《圣经》。正是《圣经》中的记载对近东考古给予了最初的推动。

近东考古的起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西欧的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正在利用对旧石器时代的最新发现，就古代人类的进化问题同捍卫《圣经》的原教旨主义者进行着激烈的争论，而正是同一些原教旨主义的卫道士们却又在鼓励考古学家们到近东去考察探险。他们以为这类发掘，尤其是在黎凡特地区的发掘，会发现《旧约全书》提到过的城市、个人和事件的痕迹，如大洪水，从而能证明《圣经》记载的准确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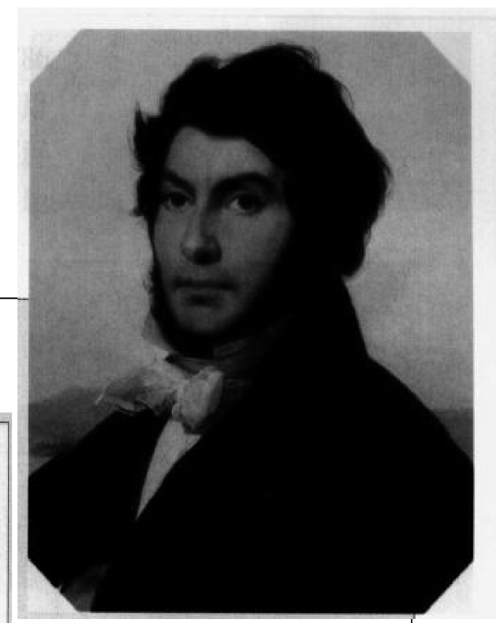
以《圣经》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同样在试图解释古代世界的文化变革和文明兴起的现象。一种得到热情推广的早期看法是扩散理论。这种看法认为，世界某个地区所发生的社会、文化及技术变革，首先是由于来自其他地区的思想传播或民族迁徙。这一理论忽视了一个地区的民族独立产生相似思想或发明相似技术的可能性，而不同民族实际上均具有学习并掌握某种技术的天赋。但这种有关过去的观点得到了《圣经》的支持和论证。《圣经》的《创世记》篇便支持诸如将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和挪亚的各家子嗣在大洪水后分散到各地、成为所有人类祖先之类的扩散理论。这种文化变革的观点表面上很吸引人，但实际上具有严重缺陷，它在20世纪初由于受到解剖学家和埃及学家格拉夫敦·埃利奥特·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的提倡而倍受青睐。史密斯在像《早期文化的迁徙》(1915年)这样的书中提出，整个人类文明都发端于埃及，是从埃及传播到近东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去的。

拿破仑在埃及

拿破仑于1798年入侵埃及时，不仅率领了一支在金字塔会战中击败马木路克武装力量的可怕大军，而且还有一支由167位专家学者组成的小股部队。在法军短暂的占领期间，这些专家组成为一个考察队，负责对埃及进行详尽调查，包括调查埃及的地理、动植物状况，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尤其是调查古代的建筑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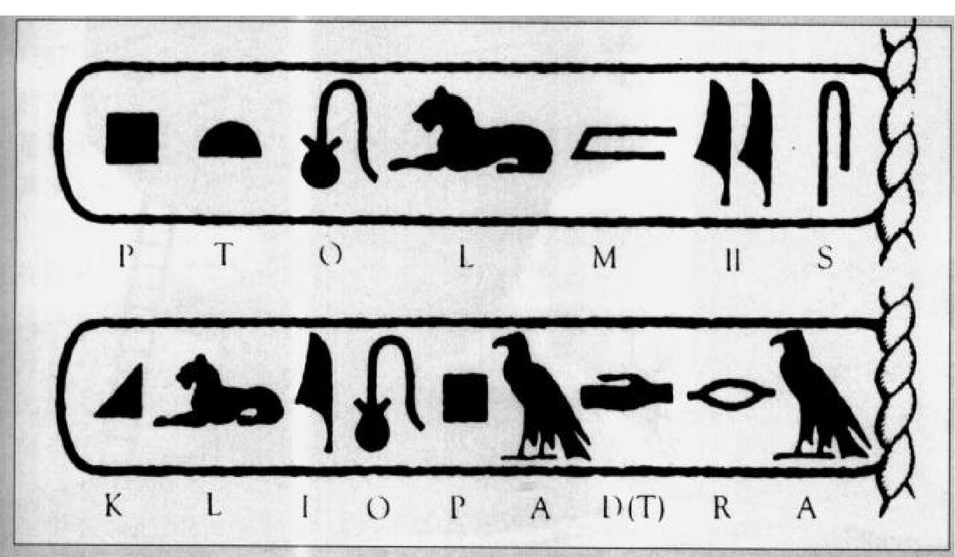
在最值得一提的人当中，有外交家、业余艺术爱好者和二等贵族（minor nobleman）巴隆·维旺特·德农（Baron Vivant Denon)。他在早期作为一位古物学家，曾致力于路易十五交托他的使命，即为路易十五的情妇玛当娜·德·邦帕多尔设法收集珠宝和纪念章。通过频繁参加约瑟夫·德·博阿尔内(Josephine

de Beauharnais）的沙龙，德农结识了拿破仑，因而成了埃及考察团的成员。正是他为多卷本《埃及描述》一书（关于考察队工作的最为不朽的记录之一）制作的150幅精致的插图，描绘出某些最重要的古建筑的状况，详细记录了经考察队复原的众多易于移动的古物。德农所写的有关他的工作记实《游历上下埃及》（1802年出版）也具有重大影响，它的英文和德文译



上图：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ollion）像，由莱昂·考格奈特（1794年－1880年）绘制。

商博良和罗塞达石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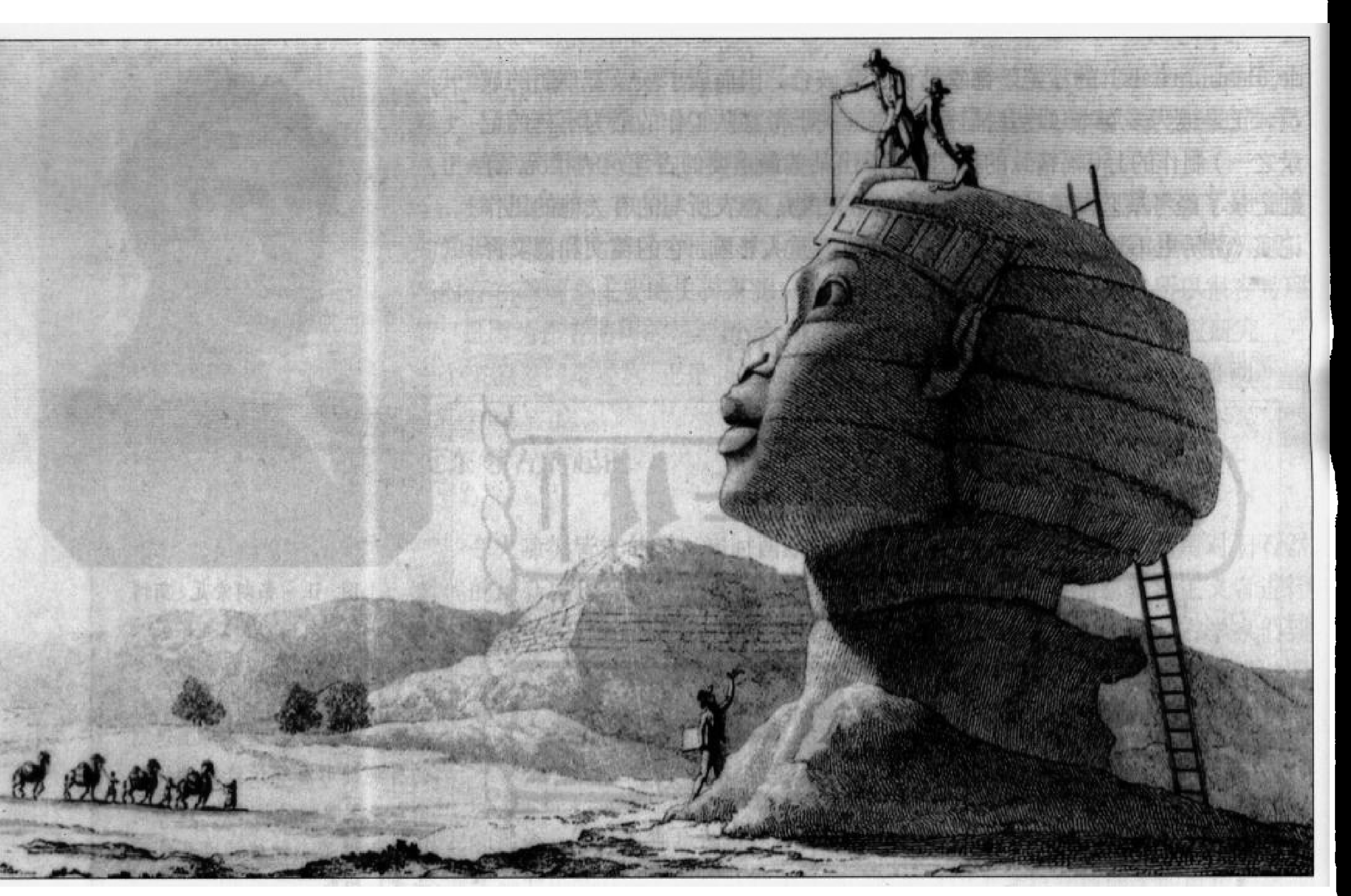
左图：罗塞达石碑上镌刻的有椭圆形和螺纹修饰的托勒密与克莱奥帕特拉字样，这为商博良提供了一把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钥匙。

从法国人手里得到的这块重要的埃及石碑，被乔治三世于1802年送给了大英博物馆。这个石碑就是罗塞达石碑，它是破译迄今为止尚未释读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这块黑色的玄武岩石碑，是在1799年于埃及北部沿岸罗塞达镇附近修筑圣－朱里安要塞期间发现的，上面用三种不同的文字（希腊文、埃及象形文、埃及俗体文）刻写着同一个文本（托勒密五世于公元前196年发布的一道敕令）的三个副本。一旦认识到三部分铭文的内容是相同的，而希腊文部分又能够被轻易地加以阅读和理解，就意味着罗塞达石碑是释读古代埃及文字的一把钥匙。

主要的"开锁人"是让－弗朗索瓦·商博良（1790－1832年），这位早熟的东方学家早在19岁时便成为格勒诺布尔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他对埃及的兴趣是受他哥哥影响和支持的结果。在长期破译的过程中，他哥哥是他最亲密的同伴。商博良在古代语言、特别是科普特语方面的天才，是与他对解决象形文问题所采取的一种坚定的、系统的处理方法分不开的。在早期学者（如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的工作于1822年取得突破。在致蒙希埃·达歇的信中，他描述了他在释读象形文表音符号和解译由它们构成的"词汇"方面所取得的显著进展。

商博良最初的任务是释读国王和女王的名字"托勒密"和"克莱奥帕特拉"的象形文文本，这些名字已通过希腊文部分被识别了出来。因古埃及人习惯在国王名字上圈一个椭圆（我们现在称之为椭圆形轮廓），该项工作比较容易完成。当时，解决构成两王名字的象形文符号的表音部分要相对简单一些。第一步认出了其中所有象形文字的表音符号，方法是同其他用椭圆形轮廓环绕的国王名字进行比较。通过与已知的科普特文——前伊斯兰和基督教时期的埃及语言，自古代埃及语言演化而来，商博良已是该语言的专家——中的类似词汇的表音符号进行比较研究，这个文本的其他内容也就迎刃而解了。

商博良在这项工作取得明显成功之后，紧接着的是两次出国考察活动。第一次是1826年参观意大利博物馆的埃及古文物藏品，第二次是在1828－1829年间首次对埃及古建筑上的象形文铭文进行系统考察。商博良的成就得到了承认，他于1826年被任命为即将开放的卢浮宫埃及古文物收藏室的管理人。1831年，巴黎法兰西学院又为他设立了一个埃及史和埃及考古学教授职位。一年后他辞别人世。



在大金字塔的阴影下。

法国于1798年入侵埃及，军队中既有士兵也有学者，出类拔萃的维旺特·德农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是他的著作《游历上下埃及》中的一幅插图，这是人们在对斯芬克斯人面狮身像进行测量。如我们今天所知，埃及学直接脱胎于德农的著作及他在1809年至1830年间出版的多卷本《埃及描述》中对古埃及所做的奠基性记载。

随着罗塞达石碑的发现和商博良的研究，欧洲掀起了一股热衷于埃及古物的浪潮，室内装饰、家具、餐具甚至花园设计都效法古埃及的样式。

本使埃及受到国际社会更为广泛的关注。也正是由于德农，我们才知道那个难以忘怀的故事：在尼罗河的一个拐弯处，当乍一看到巨大的卡尔纳克和卢克索神庙时，“整个军队突然不约而同地呆立住了……大家兴奋地拍打着双手”。

考察队收集到的古文物被船运回法国，但由于法国海军在尼罗河会战中被纳尔逊击败，再加上拿破仑的部队突然撤出埃及，业已积累起来的战利品便拱手丢给了英军，结果它们没有被运到卢浮宫，而是进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东方学研究

自18世纪后半叶始，欧洲人在中东的探索步伐开始加快。历次探险的时间增加了，也更加系统化了。1761年由5人组成的赴阿拉伯半岛的丹麦探险队体现了这种趋向。6年后，只有弗里斯兰德·卡斯坦·尼布尔一个人返回了故里，他的同伴均死于探险路上。但他的旅行使他能够远涉埃及、也门、阿曼、印度、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尼布尔在《阿拉伯半岛游记》一书中，描述了位于波斯波里王宫遗址上的建筑和雕刻，精确地转录了许多王室铭文。这些铭文抄本肇始了中东楔形文字的释读工作。尼布尔认出了三种不同的文本，其中一种是带有42个字母文字符号的文本。他还描写并配图说明了一些美索不达米亚的废墟，包括由他正确识别出来的巴比伦与尼尼微城。

在18世纪80年代，法国植物学家安德鲁·米肖（André Michaux）到波斯游览，带回了一份曾经刻写在石碑上或泥版上、并竖立在神庙里的法律文献（kudurru）。这份楔形字的铭文内容很快便被完全误译了。在同一时期，法国在

巴格达教区的主教约瑟夫·德·博安考察了一些美索不达米亚的废墟，并于1786年试验性地发掘了巴比伦。这是已知的对中东古代遗址的初次发掘。他发现了用模子制作的涂釉砖块，上面有一只动物和星星状的符号，同后来发现的那些在巨大的伊斯塔尔门上的符号相类似。他的发现报告表明，通过发掘可以轻而易举地

重新发现巴比伦

克劳狄乌斯·詹姆斯·里奇（Claudius James Rich，1787－1821年）是美索不达米亚史的最后一位货真价实的古物学方面的伟大考察者。他在考古学先贤殿中的地位是基于他对巴比伦的研究，包括对它的描述和绘图。他曾两次专程访问过古巴比伦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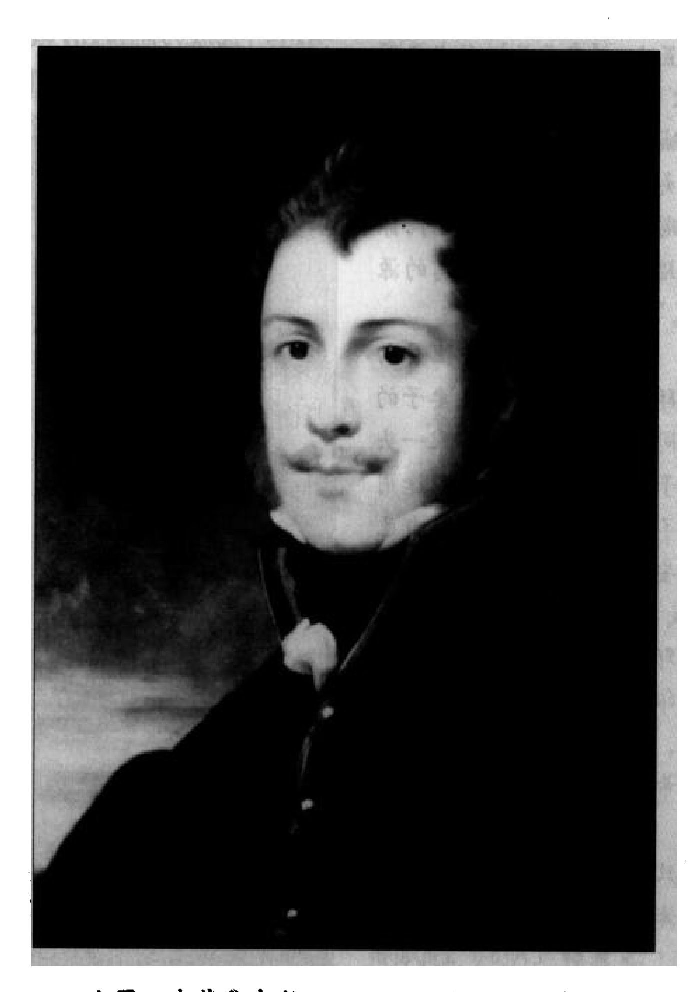
里奇虽然出生于第戎，但却是在布里斯托尔长大的。在那里他自学了突厥、波斯、阿拉伯、希伯来、叙利亚文，还学了些中文。他的语言天赋使他在17岁时获得了东印度公司军队见习生的身份，后来他作为英国在地中海地区的总领事驻节开罗。经过在开罗和孟买的短暂逗留之后，他于1808年被任命为英国在巴格达的常驻代表。在以后的12年时间里，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

里奇担任公职期间遇到的棘手问题是东印度公司提供的资金不足，以及同帕夏（当时奥斯曼帝国及北非地区高级文官的通称——译者注）不断发生政治冲突。1821年，他同帕夏们的关系彻底破裂，他的职位因此也就保不住了。他辞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工作后，与妻子玛丽坐船去波斯南部海岸的布什尔。他在那里等候命令，而玛丽则继续前往孟买。受好奇心的驱使，他游览了波斯波里（波斯帝国的四古都之一——译者注）部分地区。正是在那里，他染上了霍乱而不幸去世。

里奇于1811年首次访问巴比伦。当时，他在玛丽及其姊妹和一名全副武装的保镖陪伴下，在那里游览观光了整10天。他描述并详细观测了巴比伦在地形学方面的主要特点：这是一座紧挨幼发拉底河左岸、方圆接近4公里（2.5英里）的古城废墟。在他的《回忆巴比伦废墟》（1815年）一书中，叙述了这处遗址的一些突出景观，如尼布甲尼撒设在城北的夏宫巴比尔宫，设在城南的夸斯尔宫，以及亚历山大大帝去世的地点伊什塔尔门地区。巴比伦的名声和关于它的争论促使他于1817年第二次造访该城。里奇在这次察勘访问当中，为解答他的疑问而进一步搜寻了有关的信息。

里奇是位业余古物学家，不是考古学家。他是在尚未收集到有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可靠考古信息的时候，或者说是在楔形文的文本被破译之前，展开自己的工作的。尽管如此，他在巴比伦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把精确性注入了那些日积月累、似是而非的各种旅行报道。同时他为自己考察过的地方，以及显而易见的一些熟砖建筑废墟绘制了地图，还对已发现的室内或建筑组合内的铭文的位置，如圆形印章和裸露的墓葬进行了敏锐的观察。

尽管一个世纪以后，科尔德威（Koldewey）对巴比伦进行的系统发掘最终取代了里奇的结论，但里奇为所有后来的工作，尤其是由于古物学家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好奇心所推动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上图：克劳狄乌斯·里奇。他在21岁时便已"掌握了东方的多种语言和熟谙东方的风俗习惯。他在大马士革有几周时间装扮成格鲁吉亚土耳其人，混在数千赴麦加朝圣的人流中。

找到楔形文文书，所以在1790年的法国和英国引起了轰动。

于是，现在便开始了更为系统的考察。此类考察一般是由各国政府和商业组织推动的，东印度公司甚至要求它的常驻巴格达和巴士拉的代表负有收集楔形字铭文的任务。这些常驻代表中最成功的人就是克劳狄乌斯·里奇。他对尼布甲尼撒的古都巴比伦进行了著名的地形学研究，在没有系统发掘的前提下收集了尽可能多的信息。如同他的前人一样，他手头拿着希罗多德、斯特拉博（Strabo）、狄奥多（Diodorus）等古典作家的作品，根据他们提供的证据去解释这处遗址。他写道："我极力想证明，现在巴比伦城的这种废墟状态同希腊作家所做的完好描述完全吻合，简直丝丝入扣。"里奇在巴比伦进行过一些发掘，发现了一口棺材，并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旅行过。他于1812－1818年间发表的报告引起学术讨论，激起相当多公众的热情。拜伦男爵甚至在他的诗歌《唐璜》中提到了里奇："尽管克劳狄乌斯·里奇这位骑士弄到了一些砖块，后来还写了两部回忆录。"

其他人对有关古代中东的地形学知识的日积月累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作家詹姆士·摩里埃。现在最容易让人记起的是他那以歹徒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伊斯帕汗的哈吉·巴巴历险记》（1824年出版）。他于19世纪头10年间，为了攫取浮雕而在波斯波里进行过初次发掘。在他的掠夺行为被当地总督制止之前，他已将

从空中鸟瞰巴比伦废墟。金字形神塔—《圣经》所载的巴别塔，位于照片前景的显著位置上。《启示录》卷中曾写道："什么城市能同这座伟大之城相比？它穿红挂绿，美轮美奂，佩戴着黄金宝石、珍珠玛瑙……伟大的巴比伦啊，你是娼妓之母，人间邪恶的源泉。"

当里奇于1811年12月初次拜访这处遗址，他在妻子的陪同下从巴格达出发，乘一头骡子驮着的辇，乏味的旅途用去了两天时间。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他的随行人员包括"我自己的一支轻骑兵，一门轻野炮，一名陆军士官长，12名印度兵，大约70头驮运的骡子，一个出自帕夏的官员，一个希尔巴尔阿拉伯人的酋长"。

里奇考察了现在已知是巴比伦内城神庙和宫殿的整个土丘，借助他的助手亚伯拉罕·洛克特（Abraham Lockett）的帮助，他制作了一张平面图，其水平与现代制作的平面图不相上下。为调查夏宫废墟的地下情况，他派工人们挖掘巴比尔土墩。当工人挖开一个墓葬之后，里奇注意到他们"一件挨着一件地拖出棺材和遗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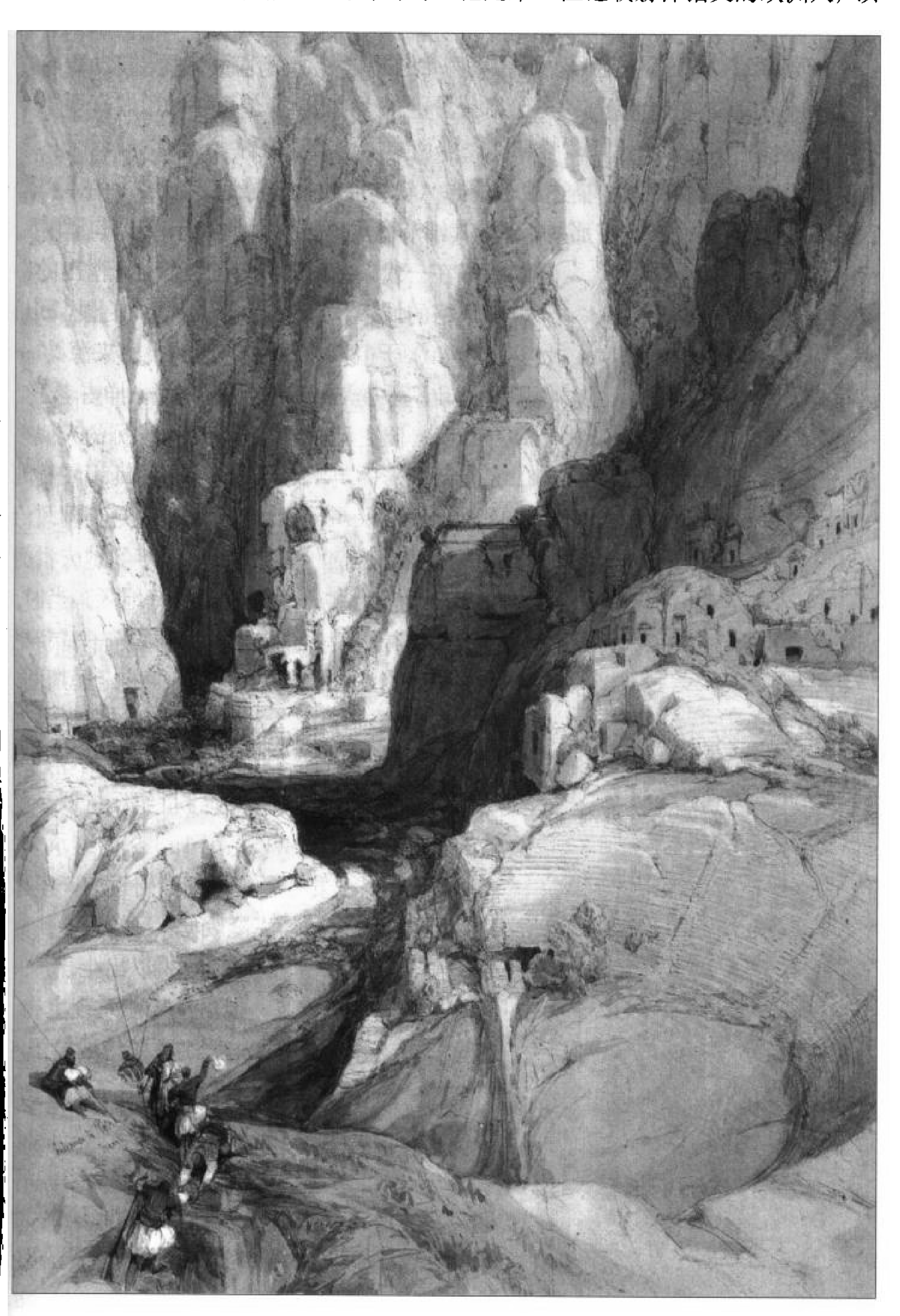
从当地阿拉伯人手里抢救出来的一批烧制的建筑用砖当中，他获得了一组保存良好的楔形字铭文，它们最终成为1825年大英博物馆继承下来的镇馆文物藏品的一个组成部分。



体积过大而无法运输的石雕砸成了几段。

在阿拉伯半岛和黎凡特地区的旅行者

19世纪初，在拿破仑对巴勒斯坦的入侵（作为他的埃及远征的一部分）失利之后，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黎凡特地区的系统探查。瑞士旅行家约翰·路德维格·伯克哈德（Johann Ludwig Burckhardt）大概是这一时期的探险者中游历最广的人。他伪装成一位来自印度的穆斯林商人，在大马士革和阿勒坡居住了几年，将有关叙利亚的古文物信息记录了下来。他是第一位记载赫梯铭文的欧洲人，该



红玫瑰般的城市。佩特拉的入口，大卫·罗伯兹画（1796－1864年）。继伯克哈德于1812年参观之后，位于现约旦南部、在岩石上凿出的佩特拉陵墓和神庙废墟，吸引来了众多的19世纪的观光者。

佩特拉被群山环绕，处在红海和死海之间的主要商路上，曾一直是公元前一千纪的埃东王国和纳巴泰王国的重要据点。除了拥有公元2世纪的罗马剧场和神庙之外，那里大部分幸存的建筑属于公元前2世纪。有关这一遗址后来的历史，直到今天人们也所知甚少。

铭文刻在位于奥仑特河畔的一座建筑物的墙石上。他后来沿尼罗河上行，发现了位于阿布·辛伯尔的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的神庙。1814年，他穿越红海，到麦加朝圣。伯克哈德去世后，他的遗体葬在开罗的穆斯林墓地中，他的手稿和日志藏品则馈赠给了剑桥大学。

伯克哈德从阿勒坡向南旅行，访问并描述了位于佩特拉的著名的纳巴泰王国的遗址，该遗址出现于公元元年左右。然而，他在那里停留时间很短，因为他怕待久了会触动当地向导的神经，他们也许会抢劫他的钱财和宝贵的日志：

> 我遗憾未能对（佩特拉）做非常充分的描述。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周围人的品性。我在一片旅行者们从未见过的荒漠当中，毫无保护可言。严密监督这些异教徒（正像人们所称呼的那样）的工作会激起他们的怀疑，误以为我是寻找宝物的江湖术士。

伯克哈德对佩特拉的描述载于他的《叙利亚和圣地游记：1810 - 1812年》（1822年出版）一书中。在那些年里，其细节已足以吸引大批旅行者步其后尘了。恰好在一代人之后，那些在岩石上开凿出的希腊风格的城市建筑，成为诗人约翰·伯根（John Burgon）于1848年所作名诗的灵感来源："一座红玫瑰般的城市，几乎像时间一样古老。"

第一位在巴勒斯坦展开实际发掘的人似乎是极具色彩的英国旅行家赫斯特·斯坦霍普夫人（Lady Hester Stanhope）。她是英国政治家老威廉·皮特的孙女，从1810年到她去世的1839年为止，她一直住在黎凡特地区。当时，她的古怪行止使她获得了一个绰号——"黎巴嫩的愤怒修女"。在黎凡特长期的定居期间，赫斯特夫人进行了广泛的旅游，到过罕见人迹的地区，如位于叙利亚沙漠深处的巴尔米拉。在那里她把自己想像为公元3世纪反抗罗马统治的芝诺比阿女王（Zenobia）①的继承人。1815年，她组织发掘了位于加沙附近的一座巴勒斯坦沿岸城市阿什克隆废墟，目的是寻找黄金。她的发掘使一些罗马遗存得以出土，其中包括一尊皇帝的雕像。但由于未能发现宝物，这些古物被赫斯特夫人一怒之下统统毁掉了。

印度和地中海地区

对印度古代史的注意始于18世纪后半叶对印度语言和哲学的研究。这一研究揭开了历

① 巴尔米拉王国女王，后因独立战争失败而被罗马俘虏——译者注。

史崭新的一页，发现了有关亚历山大大帝在北印度的战役同随后在中亚建立的希腊诸王国存在联系的信息。加尔各答最高法院的法官威廉·琼斯爵士（Willam Jones）对这个研究领域的形成做出了最大贡献。早在1774年，他便同著名的辞典编纂家萨莫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一起敦促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调查（印度）重大古建筑的遗存，探寻已毁灭的城市遗迹"。10年之后，孟加拉亚洲协会建立了起来。这是一个将所有爱好亚洲艺术和科学的欧洲人集合在一起的民间组织，其成员共同阅读有关考古学、钱币学、碑铭学的论文、文学作品和手稿。该协会的一位声名显赫的成员是詹姆士·普林塞普（James Prinsep，1799 - 1840年），他是第一个释读古印度梵文和佉卢文的人①。

早期印度和古典地中海世界的联系得到钱币学发现的进一步证明。人们不仅在印度北部发现了希腊铸币和印度-希腊铸币，而且在南部还找到了罗马铸币。关于罗马钱币的报道是在18世纪80年代首次出现的，当时在马德拉斯附近发现了一个储钱的地点，后来在整个印度南部都不断有钱币出土。这种与早期罗马帝国贸易的证据使人想起普利尼（Pliny）的警告：罗马的金银在公元1世纪如滚滚洪流涌向东方。

发现世界的尽头：大洋洲

如果说欧洲人在16世纪跨越大西洋的扩张行为是那个世纪的特征的话，那么欧洲人在太平洋上的探险活动则是18世纪的特征。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长期以来便活跃在东印度地区，早在1606年，荷兰船只杜根号就眺望到了澳大利亚。至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访问了塔斯马尼亚岛、新西兰、新几内亚以及澳大利亚西部和北部沿岸，并绘制了这些地方的地图。

到了1760年，尽管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对大洋洲的贸易和殖民感兴趣，但推动他们驶向这些世界边缘地区的动力，在这时却是对知识的渴求和地道的个人兴趣。18世纪晚期的航海大发现是在启蒙运动以及实证科学开始兴起的条件下展开的，所以系统收集信息不仅对航海本身十分重要，而且对于说明那些假设的、与人类相关的自然条件也是很有意义的。正如当时的法国哲学家约瑟夫-马利·德·热朗多（Joseph-Marie de Gerando）写的那样：

> 哲学旅行家乘船驶向大地的终端，他事实上穿越了时代的序列；他驶入了过去；他迈出的每一步都跳越了一个世纪……（他）为了我们而回到我们自己祖先的状态，回到最古老的世界历史当中。

詹姆士·库克船长的三次航行确立了一种系统探险和记载的传统，这种传统很快便成了人们奉行的标准做法。库克是约克郡的一位农场工人的儿子，因在皇家海军里步步高升，最终成为他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航海家。他从1768年至1771年间乘坐"奋进号"展开第一次航行，探测了社会群岛（Society Islands），绘制了新西兰的海图和澳大利亚东岸的地图。第二次航行（1772 - 1775年）当中他拥有两艘船，广泛查勘了太平洋海域，两次穿过南极圈，甚至访问了遥远的复活

右图：像这样精雕细刻的佛塔，是将西方人的注意力引向印度的第一批考古遗存。

德干高原阿玛拉瓦提曾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全印度最雄伟的佛教建筑"。该建筑有个雕刻的石灰石圆屋顶，高18米（60英尺）、直径40米（130英尺），早在公元2-3世纪便矗立在那里。英国访问者于1797年发现的只是"一条环形的壕沟，约10英尺宽。向下挖大约12英尺深，就遇到了大片的砖石结构，每块砖16英寸见方，厚4英寸……在这个坑中有一块横躺着但已破碎的白石板，上面仍有一些人物浮雕……"

19世纪40年代的发掘出土了许多雕刻品，其中大部分最终被运至伦敦。19世纪70年代展开了进一步的发掘，出土了近400件雕刻品，目前收存于马德拉斯博物馆。

① 均为古代印度的文字——译者注。

节岛。最后一次航行（1776－1779年）的目的是寻找环绕美洲西北部的航线。库克付出了相当多的时间，用来考察太平洋岛屿、美洲西北沿岸和白令海峡。但他在返回夏威夷时被杀。后来英国人的许多次航行是由库克的同伴率领的，其中最著名的是航海家乔治·温哥华（George Vancouver）和海军军官威廉·布莱（William Bligh），后者是“慷慨号”船长及后来的新南威尔士总督。

法国人驶向大洋洲也受到学术好奇心的强烈推动。让－弗朗索瓦·德·拉·彼鲁兹（Jean-Francois de La Perouse）是经验丰富的海军军官，他于1785年被派往太平洋，当局给他的指示是监视其他欧洲列强的活动，调查太平洋居民的体格特征及其生活习俗。1800年，新成立的人类考察学会发出详细指示，要他为尼古拉·博丹（Nicolas Baudin，也是海军军官）率领的探险队了解社会人文的情况。一位医学专业的学生弗朗索瓦·皮隆（Francois Peron）跟随博丹出航，皮隆建议探险队应当包括专门研究人类学（anthropology，这是他发明的一个术语）的科学家。

作为探险的时代，18世纪勾画了一张世界地图，至该世纪末期，这张地图同我们今天所知的世界地图已没有什么两样了。在发现新大陆的航海实践中，科学人

库克船长的民族研究

詹姆士·库克船长（1728－1779年）三次赴太平洋的远航，对18世纪的英国具有巨大影响。他把民众的想象力刺激到了这样一个高度，即大英博物馆的奥塔黑特（塔西提岛）展室和蒙塔古殿中的南海展室成了伦敦令人瞩目的地方之一。库克的探险活动所收集的丰富信息，影响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对太平洋海区各民族及其手工艺品所做的民族学描述，促进了社会进化思想的发展。太平洋成了调查原始社会属性的一个场所。

库克船长首次乘“奋进号”远航的目的是学术性的，至少部分是学术性的。英国海军部指示他：

> 详细考察那里的土壤和作物的性质；考察定居或出没无常的野兽或家禽，河流里或沿海岸的鱼类情况；考察矿藏、矿物质或宝石的储量和分布情况；你应带回所发现的每一种标本，以及你能够收集到的树木、水果和谷物的种子标本，将它们移交给我们的海军大臣，以便使我们能够对它们进行适当的审查和实验。你同时要考察当地土著人的天分、性格、禀性和人数。

皇家协会指定科学考察人员和美术家参加科学探险，领导人是富裕的林肯郡的地产主、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协会给他们配备有“奋进号”作为浮动的科学机构。结果收集到大量出自太平洋岛屿、澳大利亚、东北亚、西北美和火地岛的资料，包括有关自然史的标本、手工艺品、笔记、图谱和绘画。其中的民族学记录提供了有关太平洋居民首次遭遇欧洲人时的珍贵描述。库克第一次的远航计划非常周密，以至它不仅为他的第二次、第三次航线确立了准则，而且为这一世纪其他的探险旅行也确立了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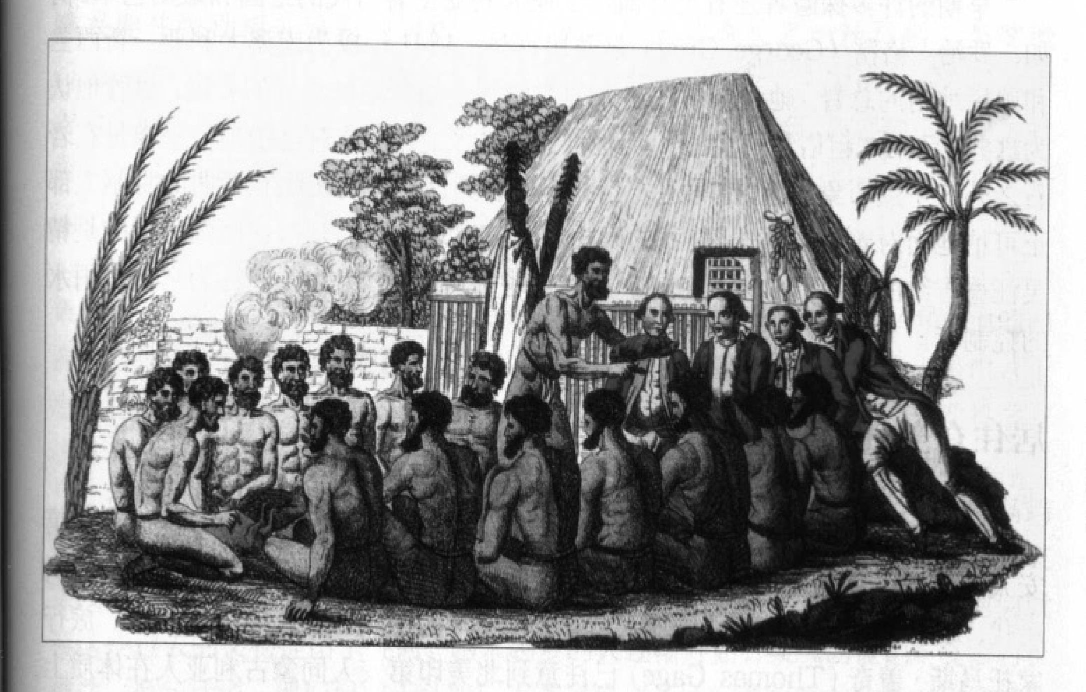
库克所处时代最关注的问题不可避免地集中于自然史问题。当时民族学尚未成为一个学科，所以民族学的样本只被简单地标上了“新奇事物”的字样。但皇家协会主席的确交给库克和班克斯一张清单，单上列举和描述着他们遇到的各地民族的简况。类似的专题一览表往往成为后来远航记录的内容框架。有关这些考察的最详尽最全面的记录，自然而然涉及到像塔西提岛那样的地区。在那里，他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与当地人建立起了十分友好的关系，并学了一些地方语言。对于新西兰，他们在岸上待的时间则相对较短，加之遇到的人通常都很紧张，因此诸如社会关系和宗教习俗之类的问题就很少涉及。关于各民族物质生活方面的记述往往是非常细致的，参与探险的美术家们所作的绘画和素描补充了文字描述的内容。

库克的考察活动收集到2000多件手工制品，从饭碗之

员的参加及被要求进行周密的文献记载，使大洋洲世界和西欧世界的遭遇留下了无比重要的记录。探险家们从海外带回欧洲的各种标本、手工艺品、绘画和文字记载，不仅激发了欧洲对“新世界”的兴趣，而且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植物学、动物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形成。

开发澳大利亚

起初，在澳大利亚殖民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异乡的土地和人民怀有好奇心，也可以说是科学的好奇心。阿瑟·菲力普（Arthur Phillip）总督是一位海军军官，而约翰·亨特（John Hunter）船长是位热心的自然主义者，他最终取代菲力普成为新南威尔士的总督。他们两人在澳大利亚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于1788年挖开了杰克逊港的一些坟丘，意在了解墓内的情况。另一位海军军官、新南威尔士的勘测负责人约翰·奥克斯利（John Oxley）则在1817年调查蓝山山脉西侧期间发掘了拉克伦河附近的一座墓葬，在重新埋葬发现的人类遗骸之前，他对发现物及其周围的情况进行了仔细的记录，并根据自己的观察得出结论——内地的



左图：在太平洋岛屿上做客的库克船长正在接受神圣的赠礼。

排水量为336吨的“奋进号”在1770年4月20日望见了澳大利亚东南一角。白人殖民者第一次登上悉尼的时间是1788年。约18年后，库克宣布新南威尔士为英国国王的领地。

类家内用品到做工精细的夏威夷斗篷和仪典上戴的头巾等等应有尽有。在第一次远航中，最重要的民族学记录和收集到的物品是库克和班克斯本人所作的记载和收集到的藏品。但在第二次航行中，自然学家乔治·福斯特（George Forster）和他的父亲——具有苏格兰血统的普鲁士人赖因霍尔德（Reinhold），对他们同当地人的会晤做了详尽的记录。此外，三次航行中的许多军官和船员都收集了手工艺品，它们或被留作个人的纪念，或作为礼品送给他们在伦敦的赞助人及收藏家。

获利也是动机之一。与科学家一道，收藏家、私人博物馆经营人和商人都为获得“新奇之物”展开竞争。自然史的标本，如植物、动物和贝壳成了最令人追逐的对象，而民族学材料或“人工制作的新奇之物”却很容易得到，所以并不要求做什么特殊的准备。由于这种非正式贸易的结果，库克远航中收集到的手工艺品现在流散到从伦敦到圣彼得堡、从斯德哥尔摩到悉尼的世界各地。



新荷兰乔治王海峡附近的被遗弃的印第安人村落。约翰·布克斯作于1791年。

有关未被任何国家兼并管辖的土地——没有原居民的荒凉土地——的法律拟定，涉及在第一批白人殖民者到达时有100万土著居民的整个澳大利亚土地的大约四分之三，即中部的沙漠以及东南部富庶的河流冲积的土地。

由于受到周期性的游牧生活的支配，当地人口密度很低、技术非常简陋，拥有的财产也微不足道，但饥荒和营养不良却几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无需迫切寻找食物这一点，为社会、宗教仪式、丰富的想象和艺术生活留下了充足的时间。

库克船长认为澳洲土著是幸福的民族，没有欧洲人所承受的那些负担。但白人鉴于当地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异己的社会结构及其对物质财产满不在乎的特点，很快便将他们看作是"原始人"。

阿波里金人在风俗习惯上与沿海人有所不同。

早期的许多探险者还看见并描述了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绘画和雕刻艺术。例如，乔治·格雷（George Grey）是殖民官员，1841年成为南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殖民地角的总督，他画下了在澳大利亚西部金伯利地区看到的岩画。尽管他认为这些岩画是"粗俗和野蛮的"，但他详细描述了它们，并对这些画似乎像是在岩石之外这一点印象深刻。他写道："当我乍一看到这巨大的头颅和弯曲的身躯上部正可怕地面对着我的那一刻，我的确相当吃惊。"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画表现的是精灵汪德吉纳的存在，这一点在这个不毛之地尤其重要，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是雨水的控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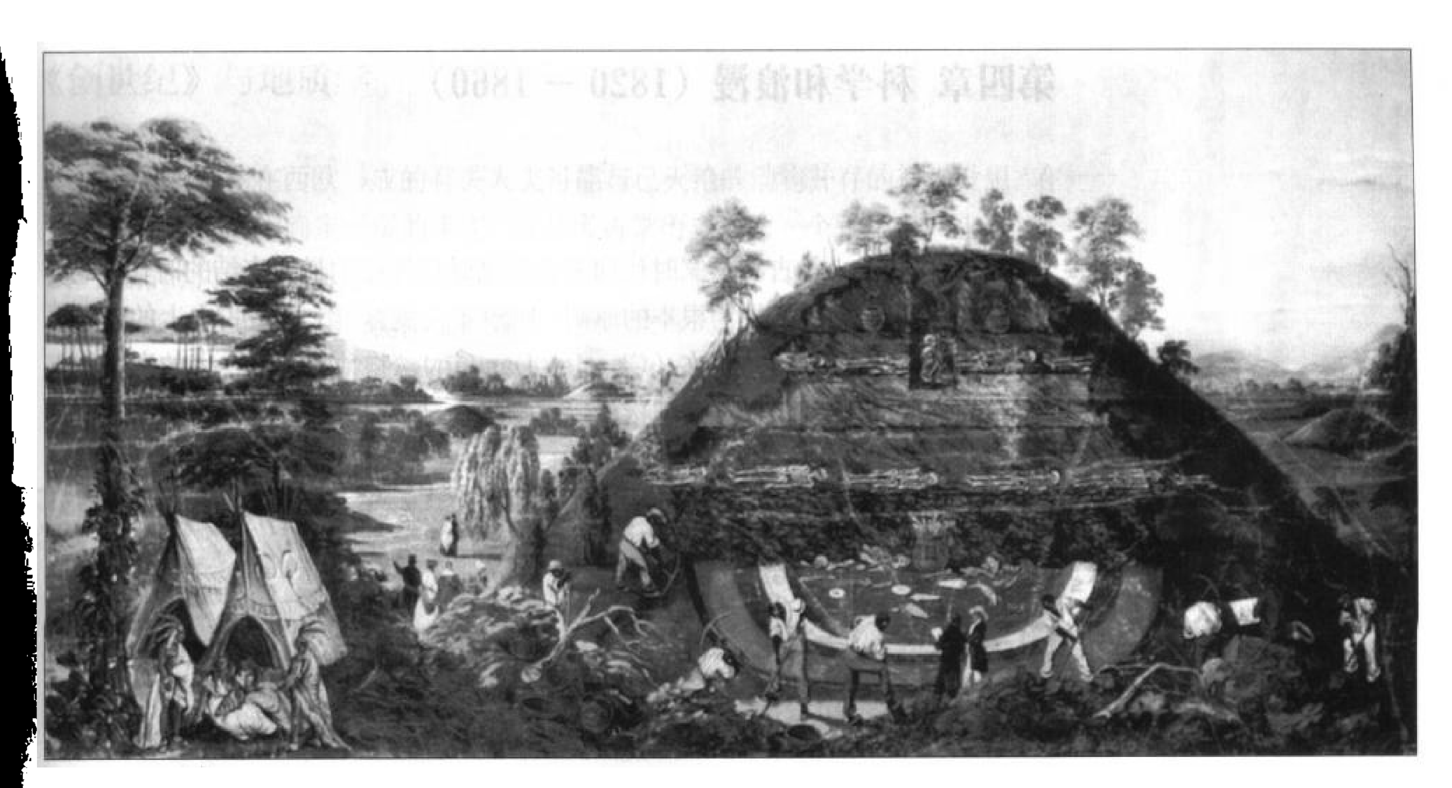
居住在美洲大陆的是什么人？

北美最早的殖民者对这块大陆上土著居民的起源并不怎么关心，他们把印第安人看作是以色列人失落的十部落成员的后裔，或者是亚特兰提斯[1]逃亡岛民的后代，或者是古代斯堪的那维亚人或斯基泰人[2]的子嗣。尽管早在1648年，旅行家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已注意到北美印第安人同蒙古利亚人在体质上有相似之处，并因此得出结论说印第安人一定是经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的亚洲人，但异想天开的理论仍在人们的认知上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

关于印第安人是"原始人和缺乏进化"的流行观点，在19世纪的争论中可以明显看到。这场争论围绕谁是遍及美洲中西部的土墩（如卡霍吉亚土墩之类的遗址）的始作俑者。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倘若早期的欧美人读了霍尔南德·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于1539年冒险穿越这块大陆东南部的编年记的话，那么这场争论本来是可以很快解决的。德·索托明确说明这些土墩是他遇到的印第安人的神庙和宫殿遗址。

① 传说沉没于大西洋中的岛屿——译者注。

② 古代黑海北部草原的游牧民族——译者注。



密西西比河流域一览，约翰·埃根作于1850年。这幅发掘路易斯安那州一座土墩的画面，常被错误地用来说明杰斐逊于1784年率先进行的那次发掘。不过，画家对土墩层次的刻画却明显受杰斐逊那次发掘的影响。画家的作品证明土墩出自印第安人，而非出自一个特殊的建造土墩的种族。注意左下角有印第安人，而发掘的工人却是黑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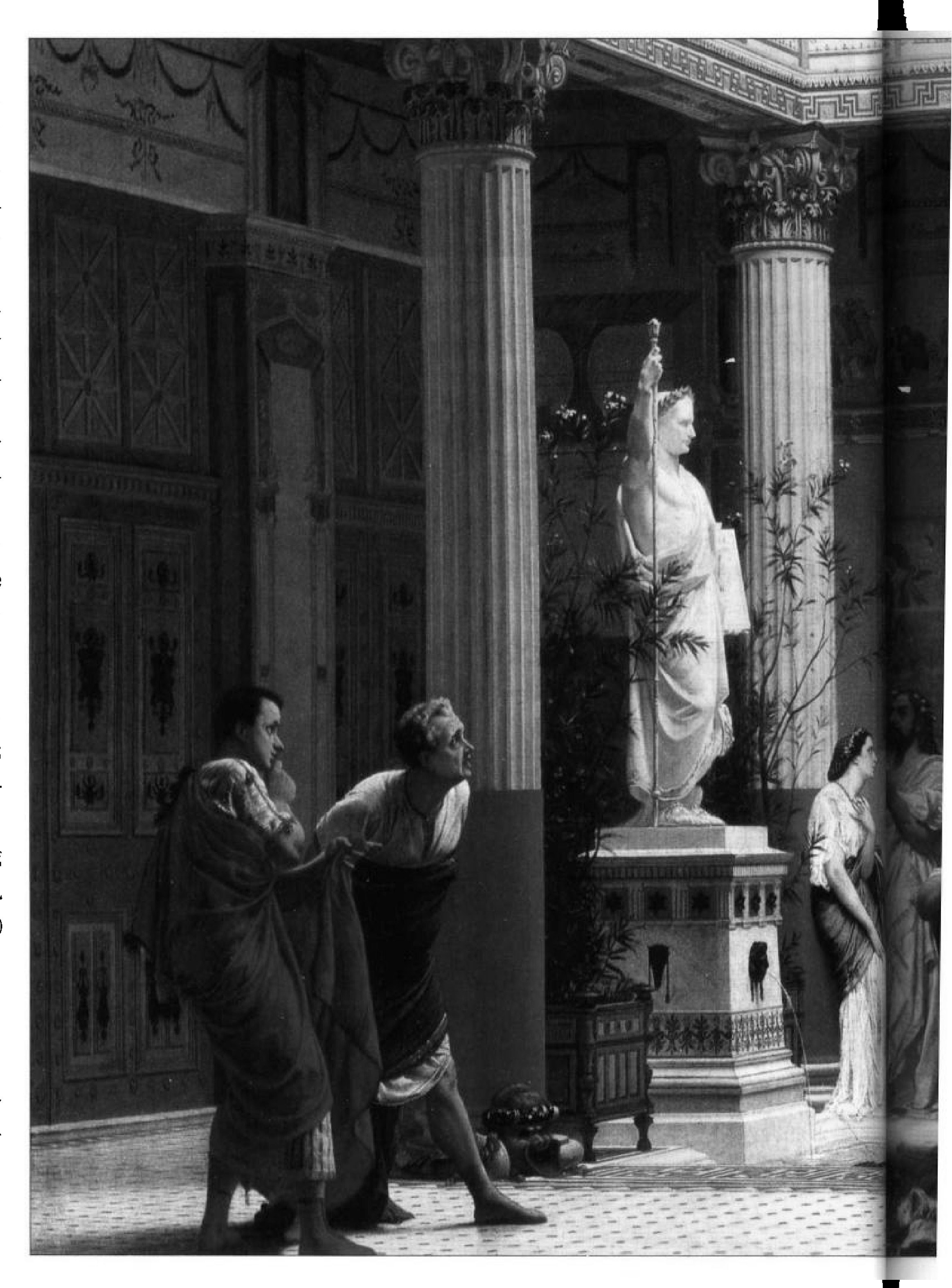
18世纪末叶，美国哲学学会（以费城为学会中心地）是对土墩建造者问题颇感兴趣并鼓励相关研究的组织之一。该学会的理事长之一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后来成了美国的第三届总统。然而，美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古物学研究的学会却是建立于1812年的美国古物研究者协会，该会的宗旨是为社会教育收集和提供古文物。在协会的第一期刊物中，刊载了由凯莱布·阿特沃特（Caleb Atwater）撰写的论中西部土墩的论文。

北美第一次有记录的发掘是由杰斐逊本人于1784年进行的。尽管人们长期以来便知道分布在乡间的土墩是古人的葬身之地，但杰斐逊却想具体了解：他的弗吉尼亚地产上的那些土墩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发掘的结果证明它们原来是由若干个文化层和墓葬本身组成的。在专业考古当中，杰斐逊的做法被视为早期科学方法的典范，即先确定一个研究目标，然后设计出一套特定的策略来实现它。

这个时期，世界各地不断冒出一些轰动一时的事件：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的发现，惊人的古埃及的各种奇观。于是兴起了一股狂热收集古典艺术品、古文物及挖掘史前古墓的风潮。虽然当时人们的着眼点仍在手工艺品，但不久他们就对这些过去的文物提出了疑问。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开始怀疑《创世记》说法的正确性。换句话说，他们已敢于认为：人类远比《圣经》讲的要古老得多。这是一场现在就要开打，既然打就要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会战。

第四章 科学和浪漫（1820 – 1860）

19世纪中叶，是古物学家时代向考古学家时代过渡的最终完结的时代。地质学中的地层学原则已被视为根本的原则。1859年大概算得上是考古史上的最重要的年份，随着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物种起源》一书的发表和有关人类远古时代的认识被普遍地接受，古物学在这个时期的发展达到了顶点。



庞贝式的生活方式。君主拿破仑的精美绝伦的庞贝宫的中庭，名为狄奥美德别墅，位于巴黎蒙田大道。设计师是艾尔弗雷德－尼古拉斯·诺曼德(Alfred-Nicolas Normand)，始建于1857年，这座大厅迅速成为“整个巴黎上流社会聚会的殿堂和艺术作品的荟萃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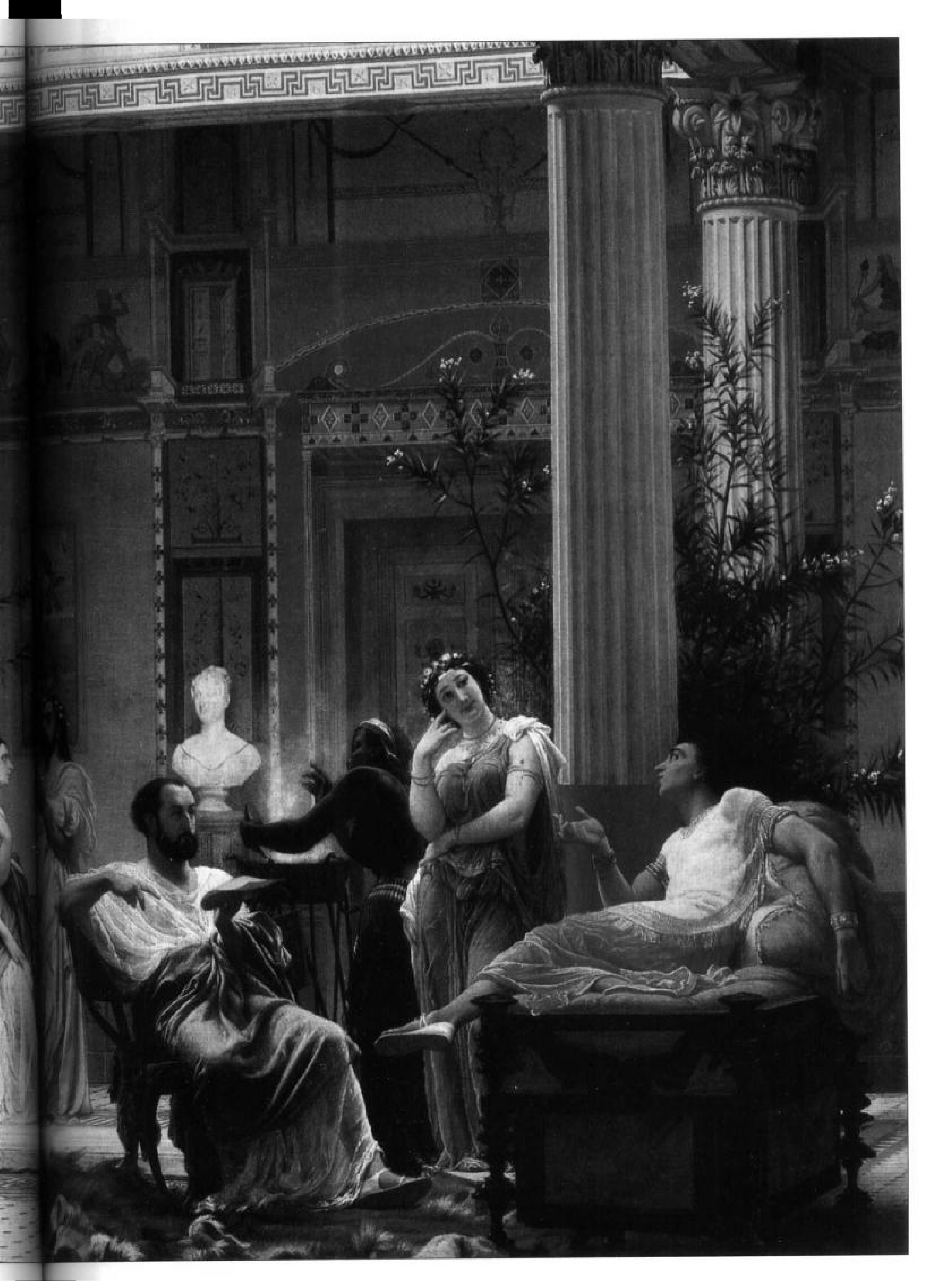
由罗布尼制作的家具和克里斯托夫勒制作的银制餐具，均是对公元前1世纪罗马制品的精心仿造。在这幅由古斯塔夫·布朗热（Gustave Boulanger）于1860年所作的油画中，身着罗马服装的演员正在排演着一出戏剧。

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整个欧洲的建筑和室内装潢上都受到庞贝风格的影响。在19世纪40年代的阿沙芬堡，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格一世(Ludwig I）便下令完整复制卡斯托(Castor）和伯鲁克斯（Pollux）的住宅。在这个时期的伦敦，艾伯特王子(Albert)产生了为白金汉宫修建一座庞贝式花园凉亭的念头。这个凉亭于维多利亚和艾伯特访问庞贝城6年之后落成(1844年)，一直保存到1928年。

《创世纪》与地质学

18世纪晚期在西欧形成的有关人类可能与已灭绝的动物并存的初步设想，在19世纪中叶已成为确定不疑的事实。这是考古学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一个人类的远古时代最终得到确认的时期。

约从1810年起，在法国南部的佩里哥德，就有人收集到燧石工具，钻进过一些洞穴，同时经人加工过的燧石的买卖活动也随之开始。这个地区的考古先驱是弗朗索瓦·瓦塔尔·德·茹阿内（Francois Vatard de Jouannet），他是波尔多



地区的一位教师和图书管理员，通常被人称作“史前考古之父”。1810年，他在佩里格附近的埃柯奈波夫发现了第一批加工过的燧石：一些石斧和箭镞，其中有些经过打磨加工，剩下的则为打片成型。他根据那个时代的做法，把这些石器归结为“高卢人”之作。几年后，即1815－1816年间，他发现并挖掘了孔伯·格莱纳尔和佩克·德勒阿兹的洞穴遗址。茹阿内在乡间漫游，手里拿着榔头，与农民们交谈，激发他们对石器的兴趣。他既是第一位认真注意到洞穴和岩棚居所的人，又是第一位对洞穴中发现的灰烬堆、烧骨和燧石石器感兴趣的人。他并不像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那样，把这些发现简单地归结为“大洪水”的结果，他对骨骸化石进行了化学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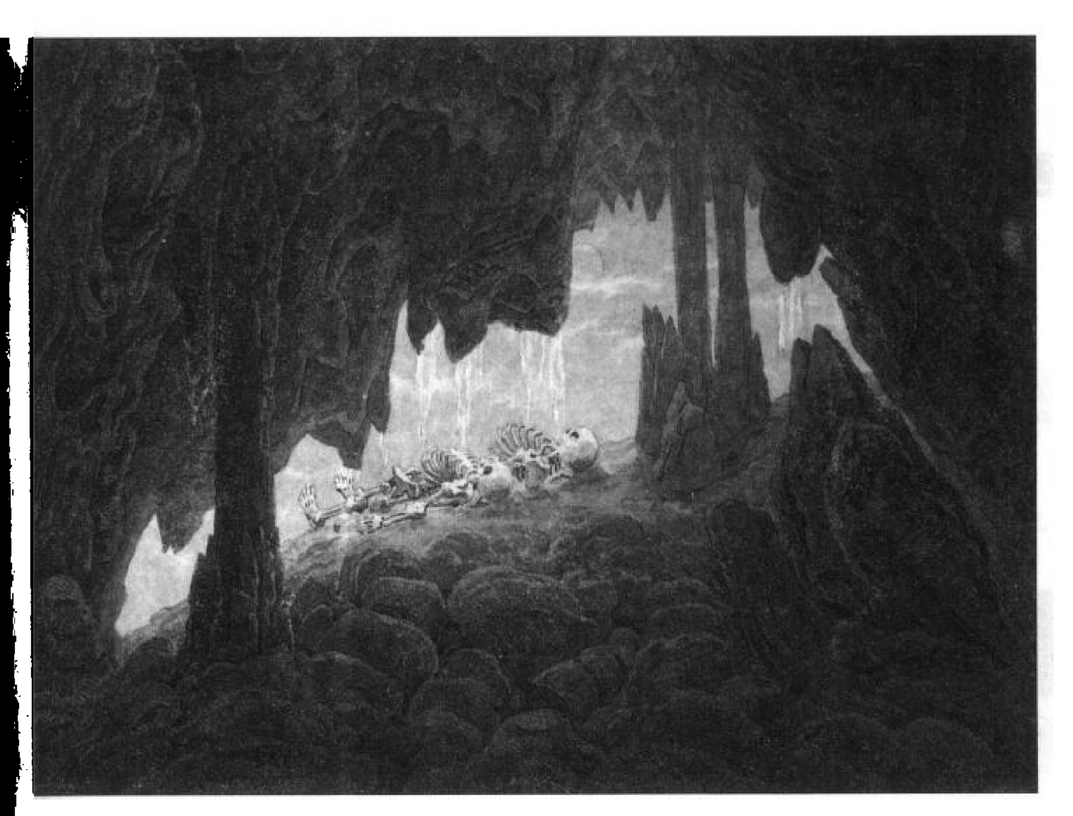
茹阿内也是第一批对石器制作技术以及打片和磨光的连续工序进行研究的人。1834年，他在洞穴燧石工具上辨认出最初敲打的痕迹和后来经“轻轻敲打”修理成型的痕迹，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二次打薄成型或成刃口的工序。在试图重构石片和磨光石斧制作方式的过程中，他还认识到旧石器和新石器之间的区别。尽管他没有想到它们在编年次序上的不同位置，但他是第一个建议存在两个时期，即较粗糙的石片工具（旧石器时代的工具）要先于较先进的磨光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虽然这一时期把加工过的燧石统统划归到“高卢人”名下，但有些令人费解的地方是：拉丁作家（古罗马作家——译者注）从来没有提到高卢各部落用过这些东西。而且，在茹阿内发现的洞穴中，这些燧石是同骨骸混在一起的。同样的燧石工具与骨骸共生的现象也在英国的英吉利海峡地区随处都能见到。1823年，英国国教牧师及牛津大学第一位矿物学和地质学教授威廉·巴克兰（Willian Buckland）出了本书，名为《大洪水后的遗骸：对保存在洞穴、裂沟、洪水冲积的碎石中的有机物遗骸，以及对其他能够证明发生过一次世界性的大洪水现象的考察》。巴克兰在威尔士西南海岸帕维兰德的“山羊洞穴”中，发现了一具我们现在已知为男性的遗骸，身上染着红赭颜色，年代属于大约26000年前。虽然同时还发现了象骨、犀牛骨和熊骨以及伴生的象牙手镯和手杖残片，但他认为这个“帕维兰德红赭太太”是罗马不列颠人，手镯及手杖残片是用洞穴中发现的“大洪水以前”的象牙遗存制成的。

巴克兰明白地表示，人类和化石动物不属同一时代。然而在1825年，另一位传教士和主教神父约翰·麦克内里（John MacEnery）开始探察英格兰西南部托基地区的肯特山洞。他在洞中也发现了燧石工具和已灭绝的动物骨骸。麦克内里于1828年得出新颖的结论，认为“在洞内由钟乳石形成的、完整无损的层面之下，实际上存在着燧石工具这一点已不成为问题”。但在同巴克兰商榷时，他确信燧石工具是外来的，是从钟乳石上面的一些“灶坑的洞眼”掉到下面沉积物上去的。这就如同当时的一首诗中所说：

> 对大洪水的某些疑虑一度表达了出来，
> 巴克兰德出现了，但一切却令人莫名其妙。

麦克内里回避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他的认识同正统观点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人骨洞"，一幅由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年)所绘的颇为独特怪异的画。洞中的骨骸被几千年里形成的钟乳石紧紧包围着。沉默少语、清心寡欲的弗里德里希赋予其象征的含义。他是德国早期的最伟大的浪漫主义画家。尽管是歌德的朋友，但他在年轻时却采取了一个重大的举动，拒绝依循学习美术的学生一定到罗马去朝圣的传统。

在1869年以前，他的发现没有充分公开。尽管如此，早在1840年，他的观察就已得到了地质学家罗伯特·高德文·奥斯汀（Robert Godwin Austen）的支持。奥氏同样认为"诸如燧石制成的箭头和石刀之类的物品沉积在（肯特洞中的）许多地方……洞穴哺乳动物的骨骸和人类的这些制成品一定是在钟乳石层形成之前便已被带到洞中了"。

作为最显著的证据，这样的遗址在欧洲大陆接二连三被发现。著名奥地利地质学家阿米·布韦（Ami Boué）是法兰西地质学会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823年左右声称自己在位于莱茵河右岸的拉赫的沉积层中，发现了某个化石人的一半骨骸，同时发现的还有已灭绝的动物化石。在法国东南部，一位纳波奈的制药商保罗·托纳尔（Paul Tournal）于1826年在比兹（奥德省）洞中进行挖掘，发现了伴有粗陶、已灭绝或现存的动物骨骸及"边缘锋利的石英残片"的人骨与人牙。他不懂考古学的分层方法，但他于1828年的确提出了存在化石人的问题。1834年，由于他注意到在"已灭绝的物种"的骨头（1831年在一些洞穴中出土）上留有切割工具的痕迹，因此他对存在化石人这一点就更加坚信不疑了。

无论如何，托纳尔的看法具有重大意义。他强调地质学的证据，突破了把古代洞穴内的沉积层同大洪水联系在一起的老框框。到了1833年，他已将最近的地质时期，即存在人类的地质期，划分为不知时间长度的历史时期（要回溯到7000年以前）或者"前历史"（antehistoric）时期。他不只第一个使用了这一术语，而且是首次将地质学和历史真正结合起来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历史上的前洪水时期转变为史前史时期。随着前洪水时期的含义发生变化，那些赞同存在着"大洪水以前的人类"的人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圣经》和宗教的"敌人"。

然而，不应把争论看作是简单的"《圣经》反对科学"之争。有些神父，如麦克内里是承认考古证据的，而许多地质学家在当时对古典作家描述的大洪水也深信不疑。正是托纳尔看到那些已经灭绝的动物之所以消失，原因不在于一场突然的灾

布歇·德·彼尔特



为古代人类提供最终证据的人是杰克斯·布歇·德·彼尔特（Jacques Boucher de Perthes，1788－1868年）。他是法国海关官员和业余考古学家，曾在皮卡迪省阿布维尔的露天遗址发掘过。

1830年，一位来自阿布维尔的年轻内科医生卡希米·皮卡尔（Casimir Picard）研究了索姆河沿岸斜坡的地层，注意到最低层有"高卢人的"（即铁器时代或前罗马时代）的古物，而罗马时代的古物在它的上层，最上层则是"法兰西时代的"遗物。他还确认在泥炭沼中发现的"凯尔特人"石斧，至少部分出现于泥炭形成之前，与它们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史前野牛、河狸的遗骨。这是人们所知的把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证据结合在一起的首批实例之一。

1859年4月27日摄于圣阿楚尔的一个发掘现场（上图和插入的放大照）。在场的是普莱斯特维特和伊文斯。照片显示了一把燧石石斧静卧在离地面3.4米（11英尺）深的一个未经触动的地层上。

皮卡尔不幸早亡之后，他的朋友布歇·德·彼尔特继续他的工作。彼氏在49岁以前还对考古不感兴趣，并且最初认为化石人之说不过是无稽之谈。但在1842年，由于他的第一次发现，即在芒切科特－莱斯－阿布维尔的"洪积层"中发现了一件石片工具和一个猛犸颌骨，这使他很快

改变了看法，并找到了经过粗糙加工的燧石及伴生的前大洪水时期的动物遗骨。这证明人类的存在"就像整个卢浮宫的存在一样毋庸置疑"。

布歇·德·彼尔特的三卷本著作《凯尔特人以及前洪水时期的古代遗物》（1847－1864年出版）是考古学史上的分界点。他在书中为两种类型的石器划出了清晰的编年界限，与循序渐进的两个人类阶段相适应：最古老的石片手工业归属于"前大洪水时期的"（化石）人，较近的磨光手工业属于现代人，即凯尔特人。后来，在1865年，英国自然学家和政治家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创造了"旧石器时代的"（palaeolithic）和"新石器时代的"（neolithic）这两个词（来自希腊语"旧石器"和"新石器"），用来标示人类文化的这两个阶段。

他著作的第三卷以地质学的方式，用一些交叉的章节来举例说明他的论点的真实性，这些章节描述了每个层次的位置和内容。但他关于化石人的思想是在许多年后才被学术界认可的。之所以这么困难，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思想涉及重要的意识形态和宗教问题，承认人类具有久远的时代是要冒风险的。而布歇·德·彼尔特的幼稚——有时这导致他把伪造的东西当作真正的古代遗存或工具——以及对石制工具的拙劣描绘也使问题复杂化了。

正统的观点仍然认为所有出自地层中的人骨和工具，都不会早于凯尔特时代和高卢－罗马时代。因此，这时首次在韦里（在上萨瓦省，约1833年）和查弗德（在维埃纳省，1852年）出土的，属最后一次大冰期（大约30000到10000年前之间）的可携带工艺品，尤其是一块刻有雌马鹿形象的驯鹿骨（发现于查弗德），在一座博物馆中就被归类到了"凯尔特"时代。只是在一些年之后，它才被著名的法国考古学家埃杜瓦·拉尔泰（Edouard Lartet）划归旧石器时代。

但整个气氛还是在缓慢地发生改变。1853年，在亚眠附近的圣阿楚尔发现了石制工具，同一砾石层中还有猛犸和披毛犀的遗骨。之后，1858年10月，英国考古学家休·福尔克讷（Hugh Falconer）访问了阿布维里，这是科学委员会在英国西南部布瑞克斯汉姆所监督的一项工作的组成部分。同年的稍早些时候，在该遗址已发现了封存在石笋层下的石制工具及绝灭的动物骨骸。这些发现于一个洞穴中的古物是极端细心发掘的结果，发掘的主持者是英国地质学会。科学委员会接受了这些发现具有共时性的看法。福尔克讷同样也相信他在阿布维尔发现的器物是化石人的遗存。第二年4月，著名英国考古学家约翰·伊文斯（John Evans）和地质学家约瑟夫·普雷斯特维奇（Joseph Prestwich）、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访问了这个遗址，布歇·德·彼尔特的看法最终得到了正式的承认。

1859年是"令人惊异"之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人类的远古时代在这一年里得以确认，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也在这年问世。在达尔文关于生命世界的历史观念中，人类的出现并非是神圣的造物主特创的结果，而是一种源于动物界的长期进化的产物。尽管教会极力反对进化论，但现在的大多数学者显然都已接受了它。我们称这是一次"伟大的突然其来的革命"，是因为仅仅在大约18个月的时间里，一种根深蒂固、但也不时受到怀疑的思想为一种学者们的普遍认同的进化论的观点所替代。查尔斯·赖尔的著作《人类的古代》（1863年）把一代人的研究归纳到一起，是两个新学科——史前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奠基性著作。

克劳迪恩·科恩撰稿



变，而在于我们今天已经能够观察到的地质渐变过程。在运用今天的法则去解释过去这一点上，他走在了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的那部更有名的著作的前面。

赖尔是巴克兰德在牛津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他在自己的著作《地质学原理》(1830－1833年)中提出，过去的所有地质演进过程与目前的演进过程是一致的，均经历过一个极为漫长的时期，没有必要相信挪亚遭遇大洪水之类超自然的灾变，也无需用此类灾变来解释化石和地层记录。他提出的观点如此雄辩，以至于它们改变了当时的学术氛围。传统"灾变论"因此让位于"均变论"，均变论认为，如果地质自过去到现在的演进过程是统一的，那么地球表面必定是由于无数年月所发生的沉降和冲蚀而形成的。因此，厄舍尔大主教关于创造世界的时间为公元前4004年的说法，是荒诞不经的，巴克兰本人晚年也更改了自己关于人类和化石动物非共时性的观点。最重要的是，赖尔的著作对英国生物学家，如查尔斯·达尔文、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工作以及进化观念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如同地质学的转变一样，人们对生物学的理解也突破了《圣经》7天创世说的局限，开始转变为对悠久漫长的过去的一种追忆。就与人类相关的历史而言，发现人类制作的粗笨石器，对这种新理解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绝对必需的。



查尔斯·赖尔(1797－1875年)。赖尔在30年时间里一直否认人类古代的存在。但在1859年拜访了布歇·德·彼尔特在阿布维尔的发掘现场后，便戏剧性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两年后，对英国和法国考古遗址的游览更加坚定了他新的信念，即石制工具总是深埋在地层中，同时伴随有已灭绝的动物遗骸。赖尔的《人类古代的地质学证据》一书于1863年问世，达尔文对此兴奋不已，说："真了不起，你给了人类一个多么美好而漫长的谱系啊！"

突破性的进展发生在比利时。有关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的洞穴中发现化石人遗骨的零星报道，18世纪便已出现，但它们当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1833年，一位奥地利裔的荷兰医生菲利普－查尔斯·施梅林(Philippe-Charles Schmerling)，发表了他在列日周围一些洞穴中的发掘情况，他在深层土壤中发现了燧石工具和骨器，以及披毛犀、土狼和熊的骨头，发现的人骨化石具有远古人类的特点(多半是尼安德特人的墓葬)。施梅林惊奇地发现，人类和动物的遗骨具有同样的颜色和条件，处在同一堆积物中。例如，在恩吉斯洞中，他出土了三具伴有燧石工具("箭镞和匕首")、大象、披毛犀及食肉动物遗骨的人类遗骸。

施梅林是第一位发现、保存并调查这些遗骨的生存年代及其与现代人联系的考古学家，也是认识到化石人与已灭绝的动物属于同一时代的重要人物。可惜的是，相对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在从洞底向外移动时被弄碎了，但他毕竟保留下来另外一个头盖骨的部分化石以及某些颅后骨残片。

并非所有的发现都能得到如此认真的处理。那具在15年后、即1848年于直布罗陀的福布斯采石场发现的完好无损的成人头盖骨——现在已知同恩吉斯洞中的一样属尼安德特人——便被人遗忘了，直到1862年才在一个餐具柜中"被重新发现"，并被送往英国。到这时为止，"尼安德特人"本身已经面世。1856年8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城附近的一个石灰岩洞穴，亦即在位于尼安德特河谷的费尔德霍弗·格罗托洞(一个贴切的名称，在古希腊语中有"新人"之意，此名出自一位名为纽曼的赞美诗作家之手)采石时，人们发现了一具头盖骨和一些骨骼残片。这个头盖骨具有凸起的眉脊，其高度甚至超过在恩吉斯洞中发现的头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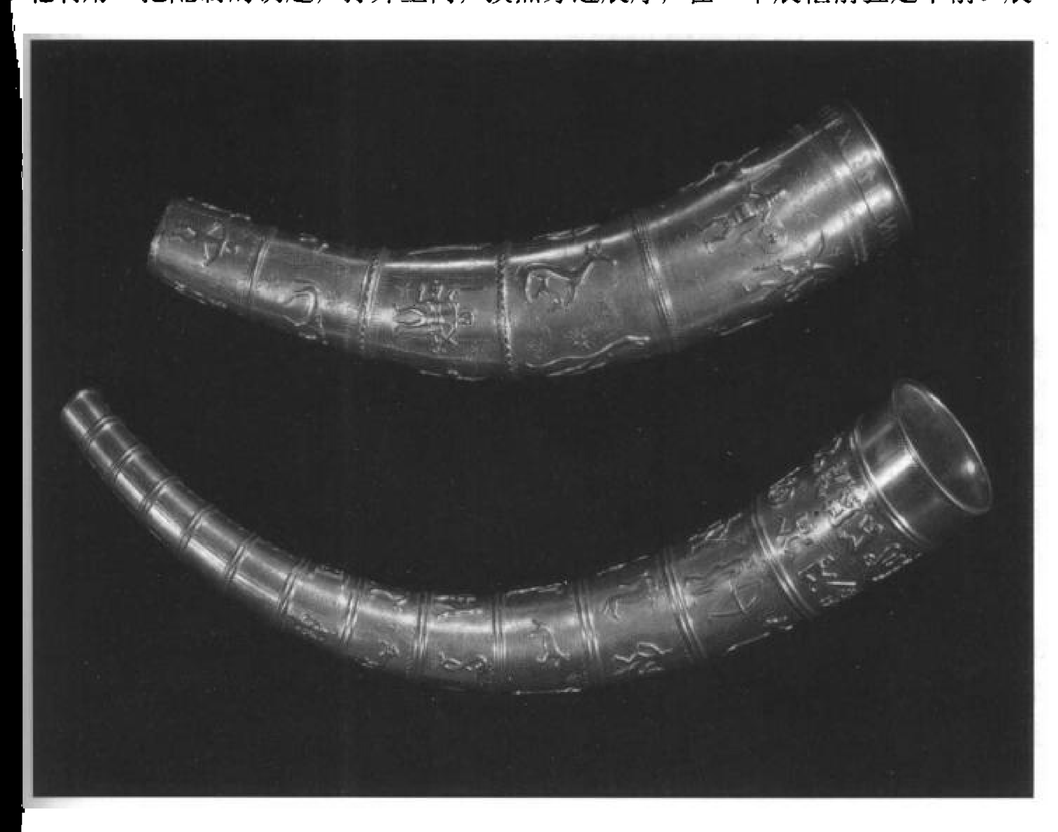
人们把这些遗骸移交给当地一位具有敏锐目光的教师兼自然史家卡尔·弗尔罗特(Carl Fuhlrott)。他认识到这不是现代人的化石，于是将这具头盖骨的石膏模型送到波恩大学解剖学教授赫尔曼·沙夫豪森(Hermann Schaaffhausen)处。第二年，两人一道将这具头盖骨公诸于众，并提出这是一种目前"即使在最

野蛮的种族那里也闻所未闻”的人类形式。他们得出结论：这有可能是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到来之前的一位当地土著居民的遗骨。然而，持怀疑态度的学术界却认为这一发现“毋庸置疑是一个凯尔特人”，“一位古代荷兰人”，“一个可怜巴巴的患脑积水的白痴，像动物一样生活在森林里”，一位“隐士”，一个“野蛮的食人者”，一名1814年的哥萨克，因骑马引起了腿骨弯曲（现在知道这是尼安德特人的一个特征）。最积极反对弗尔罗特和沙夫毫森的人是病理学家鲁道夫·威尔科（Rudolf Virchow），他把弯曲的双腿归结为幼年患佝偻病所致，佝偻引起的疼痛使这个人眉骨隆起，永久地硬化为眉脊。看来，这个世界还没有为化石人自然而然的出现做好准备。

尽管遍及西欧的许多学者和自然学家已有众多发现并认真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学术部门却仍然不为所动。居维叶到死都把所有这些发现看成是墓葬或者较晚层次的遗骨由于人为挖掘而被重新安放的结果。而他的追随者则坚决否定人类与“前大洪水时代”已灭绝的动物有同时共存的可能性。赖尔尽管是地质渐变论的最初传播者，但在1832年时仍旧认为人类是由“上帝单独予以特殊关照”才创造出来的，并在随后20年里继续坚持了这种观点。再比如，在他之前的巴克兰，也拒绝承认出自洞穴发掘所获得的地质学证据，因为那里的地层划分始终是很复杂的，有可能被轻易打乱。所以人们需要有一种无可争议的人类骨骸和已灭绝动物的骨骸并存的明白证据，如同迄今为止已被忘却的弗里尔于1797年的发现一样的证据。

史前史的三个时代

1802年5月4日夜，一个窃贼闯入哥本哈根克里斯蒂安宫的皇家古物收藏室。他利用一把配制的钥匙，打开室门，摸黑穿过展厅，在一个展柜前驻足不前。展



金角杯。1639和1734年发现于日德兰半岛的加列哈斯村，年代属于公元5世纪。这两个用纯金制作的大型仪典器物辗转成为哥本哈根的皇家收藏品，直到1802年遭到偷窃并被完全熔化。窃贼在开始出售用熔化的金块伪造的金扣、印第安人金币和其他赝品时暴露了自己。

金角的制作工艺和象征含义显然都是北欧的。在整个18世纪，它们促使有关书籍和论文“不断地涌流”出来，它们的遗失招致公众的激烈谴责。两只金杯均饰有用金箔制成的、焊附在杯壁上的人物和动物形象。较大的一只甚至还带有北欧的铭文，铭记着金角制作者的名字：“我，赫勒瓦伽斯特，霍尔特之子，制作了这只金角”。

左图为现代复制品，根据18世纪绘制的雕版画细部所作。

柜里陈列着出自日德兰半岛南部加列哈斯的无价之宝——金角杯。他打碎玻璃，取出两只金杯，然后溜之乎也。过了很长时间，当这个窃贼开始出售数量可观、令人怀疑的伪造金币和珠宝饰物时，警察擒获了他。但这时已经太晚了，金角杯已被熔化成了金块。

丹麦国家博物馆

克里斯提安·朱金森·汤姆森（1788——1865年）是哥本哈根一位家道殷实、家庭美满的商人的儿子。他创立了史前编年中三个时代的分期体系，这一分期至今仍然有效。

1816年，汤姆森负责整理丹麦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对他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将馆内的藏品分门别类，以便公开展出。他发现存在着两个具有逻辑联系的阶段①。首先，他根据制作切割工具所用的材料，把发现物分成几个类别。于是，最初的阶段以石制工具为代表，第二阶段的代表是青铜工具，第三阶段即离我们最近的一个阶段的标志是铁制工具。

这一划分本身几乎算不上什么发明。三个循序渐进的阶段——石器、青铜器、铁器阶段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并在整个18世纪被英国、法国和斯堪的那维亚人所逐渐采纳。汤姆森分期的新颖之处，在于其相互联系的观念。他不是孤立地考查这些人工制品本身，而是注意它们与伴生物品的关系。例如，他从这个角度出发，发现三个时代虽然都制作陶器器皿，但玻璃器皿却只是铁器时代的产品。这个原则不仅使划分切割工具成为可能，而且使其藏品中的所有古物都能分别归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汤姆森正在向观众介绍藏品，时间是1846年。马格努斯·彼得森绘。

汤姆森将丹麦史前史的各个阶段分门别类地展出。他还把这一编年方法推广到博物馆之外，即应用到位于丹麦乡间的田野古迹上。例如，他发现具有石建墓室的土葬墓，是石器时代的特征，而火葬却是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葬俗。

丹麦国家博物馆藏品的重组工作是1817年开始的。到了第二年，三个时代的分期体系便已成形。然而，汤姆森是位小心谨慎的人，尽管他对自己的新分期法及其基础——互相联系的原则很自信，却不急于发表它们。一直等到1836年，他才发表了自己的成果，这就是《北方考古指南》一书。这本书影响广泛，很快被译成德文、英文和其他欧洲的文字。

到那个时候为止，博物馆在向公众展出方面已经获得成功。早在1818年，博物馆就开始每周向公众开放一天，时间为每周四上午11点至下午1点。汤姆森亲自引导观众参观。他对观众的热情及诚挚态度，使他赢得了许多的拥戴者。他特别注意与农场工人保持联系，“因为正是由于他们，我们的藏品才得以扩充”。

截止到1832年，博物馆的藏品已在原展厅——圣三一教堂的顶楼上放不下了。于是又在克里斯廷伯格的一翼建了一个新馆。后来在1853年，博物馆再次迁到一处面积更大的位于王宫对面的馆址之中。汤姆森于1865年去世时，这座专门用于收藏北欧古文物的皇家博物馆已拥有藏品27000件。它们为丹麦的过去（从原始时代开始）提供了一幅无与伦比的画面。

① 原文如此。这两个阶段多半是指他处理材料的步骤——译者注。

这个惊人的失窃事件——考古学的巨大损失之一——引起公众的强烈抗议，成为几年后在哥本哈根建筑一座新博物馆的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19世纪初期，有关丹麦过去的证据正在迅速消失。农民们为获得更多的土地而破坏着巨石陵墓和夷平古代的坟茔。史前古文物的新发现虽在报章上偶有简短的报道，但随后便很快消失，古文物成了地产主手里的私产。于是一种想法油然而生：必须为此做点儿什么。

政府向西兰岛主教和西兰大学神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曼特（Frederik Münter）征询意见，曼特坚持认为，处于田野上的最重要的古文物应当受到政府的一级保护，以避免进一步的破坏。他还提议建立一座国家博物馆，专用于收藏在丹麦土地发现的所有古文物。同时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监督此项新措施的施行。

这一建议的直接结果是在1807年成立了“保存与收藏丹麦古文物皇家委员会”。该委员会立即着手收集丹麦的各种古文物。仅在头10年里，收集到的文物便已多到需要一位专门的馆长加以管理的程度了。克里斯蒂安·朱金森·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是一位很有灵感的人，他被挑选出来，交给他的工作就是对欧洲史前史研究进行改造。

汤姆森于1816年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进行藏品的重组工作。在几年之内，他采用全新的陈列方式，利用18世纪的三期说——石制工具被青铜工具所替代，青铜工具随之又被铁制工具所替代——重新布置了丹麦史前史的展品。古典作家（如卢克莱修）曾设想过用这种方式来划分遥远的过去。汤姆森个人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按照是否伴生有石器、青铜器或铁器的原则来对其他的所有发现物进行分门别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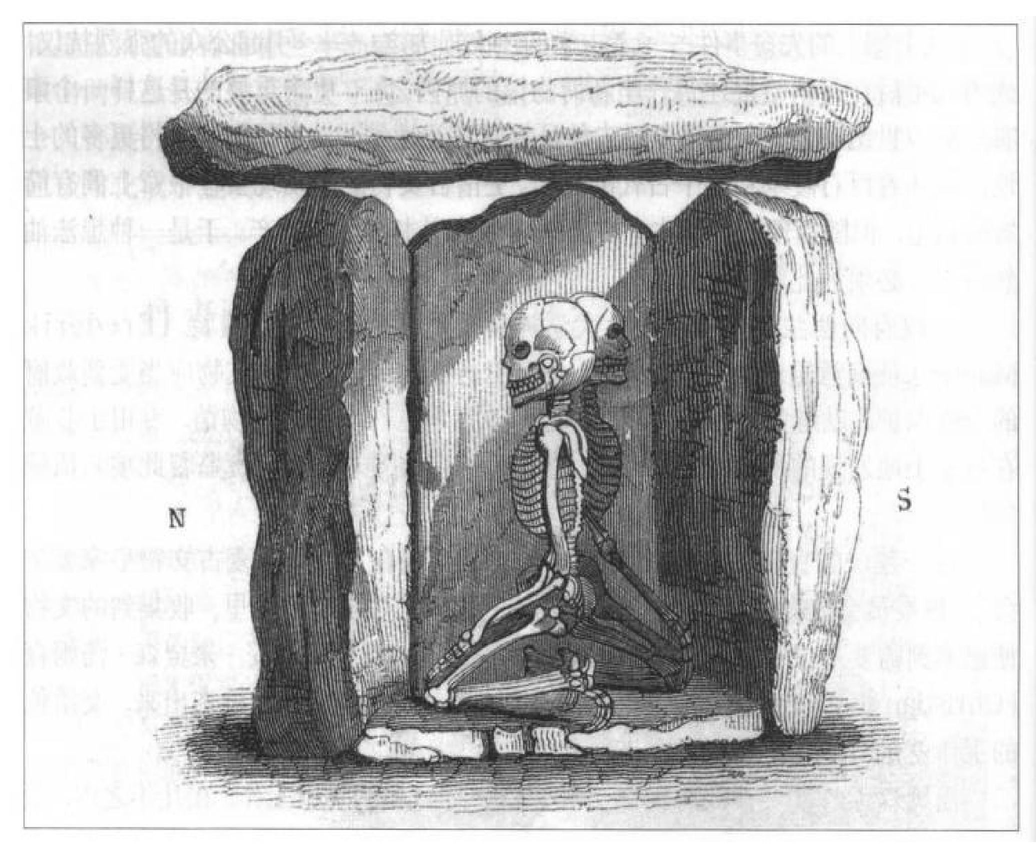
欧洲史前史的编年基础——三个时代的分期法在这一天诞生了。混沌不清的状态终于有了变为整然有序的可能，这就是按照古文物所属的阶段——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来确定它们在演化序列中的位置，划分它们的范畴。当然新的分期法也有局限性，尤其是它不能对史前遗址或史前发现予以精确的定年。只是到了本世纪，随着碳14这样的放射性测定年代方法的采用，精确定年才成为可能。但汤姆森三个年代的分期体系毕竟给考古学家提供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因为它通过给史前史赋予一个年代序列的做法，首次给史前史的解释提供了某种手段。不久，欧洲各地的博物馆都采用了这种方法，并且这一点也变得越来越清楚，即三个时代之说本身还可以细分成更具体更恰当的阶段。所以，汤姆森发起了一场平静的革命。

吉恩斯·沃索（1821－1885年）。虽然还是个孩子、大器早成的沃索已对丹麦霍森斯附近格伦豪兹的巨石墓进行了发掘，并且在17岁时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自1844年起，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考古事业。



中石器时代的发现

三个时代的分期体系证明是非常成功的文物整理和对史前史进行思考的手段，汤姆森在世时，这一体系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些新的问题的解决促使它更加完善，特别是在1851年突然爆发的一场所谓的“贝丘”的争论。贝丘系指位于丹麦沿岸地区的庞大贝壳堆，它们显然是远古某个时期积累下来的无数食品的残余。但它们到底存在了多长时间？



一座巨石墓中的骨骼，选自沃索的《丹麦的远古古物》一书（1843年出版）。沃索发展了汤姆森三个时代的分期体系，不仅用它来研究博物馆的藏品，而且用它研究丹麦田野上的古物。通过发掘贝丘、墓冢和其他遗址，他证明了这一处理方法的潜力。在从事发掘的过程中，连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都成了他的合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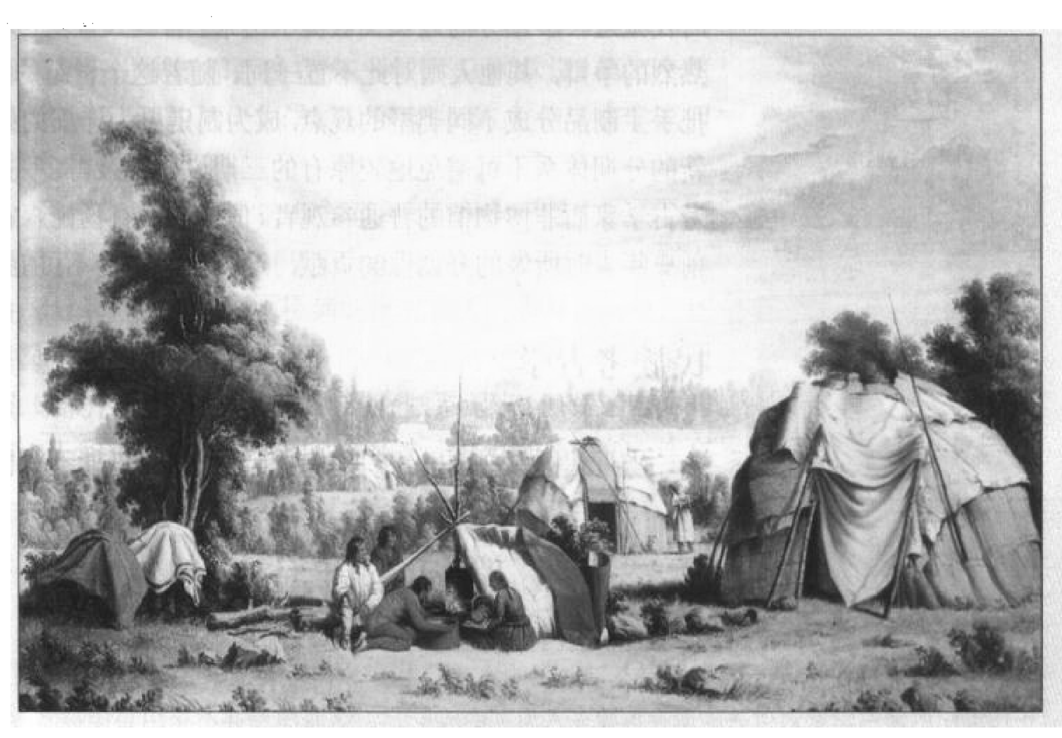
有一个既是这个问题的提出者又是解答者的人，这就是延斯·雅各布·沃索(Jens Jacob Worsaae)。他原是哥本哈根的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在19世纪30年代以志愿者的身份开始在国家博物馆担任汤姆森的助手，但两人相处得并不很融洽。沃索的父亲去世后，家庭的资助中断，沃索转而另谋生路，开始了自己的考古生涯。由于天赋和良好的机遇，他得到了丹麦国王的支持，并因此能在1843年撰写出第一部冗长的丹麦史前史《丹麦的远古古物》。由于这本书，沃索在考古学殿堂里赢得了一席之地，并且成为世界上的第一位专业考古学家，第一位真正的比较考古学家，真正的近代考古学之父。

正是几年后发生的关于贝丘的争论，促使沃索对汤姆森的三代说进行了修正。著名动物学家加佩图斯·斯廷斯特卢普（Japetus Steenstrup）从1827年起便从事贝丘的研究工作，他提出贝丘是由于海浪的作用而自然而然形成的。沃索反对这一观点，认为贝壳是以甲壳类动物为部分日常食品的人们所遗弃的。1851年，在日德兰半岛东部迈尔伽德发掘一座贝丘时，沃索认识到汤姆森的石器时代可以做进一步的细分，他将丹麦的石器时代划分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像贝丘这样的早期遗址，保存有形状粗糙的石片工具；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则具有形状比较清晰的石制工具，而且往往底部平滑，经过打磨。此外，沃索还发现在这两个阶段的后期，人类开始使用陶器。

沃索揭示的区别正是我们现在分离出的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区别。但沃索本人并没有使用这些术语。“新石器”一词是由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卢伯克爵士（Sir John Lubbock）于1865年创造的，它成了概括那些制作陶器、栽培作物、驯养家畜和使用磨光石器的社会的标准术语。在这个术语发明之前，在卢伯克的分期体系中，旧石器时代是冰川时代和“洞穴居民”的时代，是布歇·德·彼尔特和其他人在西欧河砾层中发现的燧石石片工具的时代。沃索眼中的贝丘则

丹尼尔·威尔逊与史前史

右图：大湖边的印第安人。丹尼尔·威尔逊（Daniel Wilson）是19世纪50年代研究环大湖地区印第安人部落集团的先驱。这些是苏必利尔湖北岸苏圣玛丽附近的奥吉布瓦人的营帐，由保罗·坎恩在较早些时候所绘。那间最大的棚屋顶部和靠近底部的地方覆盖着薄薄的桦树皮，这表明它是一个临时的营帐。注意那个带有垫头物的婴儿摇篮。



丹尼尔·威尔逊（1816 - 1892年）曾是一位贫苦、聪慧的爱丁堡雕刻师和古物研究者，他甚至一度交不起获取大学学位的学费。他是将“史前史”这一术语引入英语的人。“史前史”这个词于19世纪40年代便已在法国使用了，艾克塔尔的古斯塔夫（Gustave）创造了它。但正是威尔逊的两本书——《苏格兰考古与史前编年史》（1851年）和《史前人类：对新旧大陆文明起源的研究》（1862年）——才使史前史的概念在英国和北美流行起来。

在上述第一本书中，威尔逊对苏格兰古物学会的藏品进行了分类整理，把苏格兰的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同罗马时代和基督教时代区别开来。在第二本书中，他将史前时期的比较方法加以发展，将多伦多“殖民者中间出现的、出乎意料之外的迁徙”与同时代的“原始种族”进行类比。由于具有上维多利亚地区人所特有的坚定品质，威尔逊认为进化乃是造物主实现他的计划的方式，英国体现着最高程度的进步。但与他的许多同胞有所不同，他承认非西方种族的文明，坚持认为所有人类都能实现文明。他强调进化的普遍性及其对文明兴起的作用，并承认史前考古学对研究人类社会的长期变化具有价值。

威尔逊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里教授英语和历史，利用1855年和1856年的两个夏天，考察了古文物和大湖地区的印第安人。在那里，“久已湮没无闻的不列颠和欧洲婴儿时期的历史”真实地重新浮现在他的眼前。这个经验为他的《史前人类》一书提供了视角和材料。

威尔逊在《大英百科全书》第9版（1878年）中撰写了有关考古学的条目，但他的出色研究工作受到伦敦学术权威、皇家协会的会员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支持者的竞争。达尔文的信徒、银行家约翰·卢伯克爵士受一位出版商之邀，校对自己已付印的论文，并被要求加写进新的、比较研究的内容进而写出一部新书，以便与威尔逊的《史前人类》抗衡。我们今天知道，卢伯克的《史前时代》（1865年）常常作为英语世界的第一部史前考古学著作和这个学科的基础而被援引，这一现象证明，资金雄厚且具有政治影响力的都市派系集团比事物的真实过程要更加有力。因为在英国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身份较低的中产阶级分子丹尼尔·威尔逊移居到加拿大，成了流亡者，他因此而没有能力阻止卢伯克窃取本来应属于他的学科领头人的地位。

尽管丹尼尔·威尔逊受到伦敦皇家协会的漠视，但他在加拿大却颇有影响，后来他成为加拿大皇家协会的主席（1885 - 1886年），多伦多大学的第一任校长（1887年）。1888年他受封为爵士。他于1857年在多伦多大学学院开设了人类学的学分课程，这可能是人类学学科在世界上第一次成为大学的正式课程。

阿里西·克诺撰稿

明显属于一个中间阶段，即中石器时代。

由于新发现的逐步积累，知识的日益进步，对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做进一步细分的建议又被提了出来。有些人接受这种分法，有些人对此进行热烈的争辩，其他人则对此不置一词。随着这个世纪的逝去，类型学的观点、即把手工制品分成不同类型的观点，成为制定更为详细的编年的一个手段。其结果，新的分期体系不可避免地较原有的三期说要复杂得多，关心这类分期的只有专业考古学家而非博物馆的普通参观者。但如果没有汤姆森在创建第一个可操作的史前史年表时所做的开创性的贡献，这类分期法是不可能提出的。

民族考古学

当近代国家在西欧纷纷建立的时候，东欧仍处于普鲁士君主制和过去遗留的

瑞士的湖上住宅

史前生活是一首草原牧歌还是充满血腥的争斗？由于19世纪的考古学家对过去的遗存抱着先入为主的成见，就如同我们今天的做法一样，所以像瑞士湖上定居点这样的发现在今天仍是迷人的，它们是时代的镜子，映射出那个时代（19世纪50年代）发现者们的思维模式，即以为那就是人类的史前生活本身。

1853－1854年间的冬季既寒冷又干燥，苏黎世地区的许多湖泊的水位都有明显下降。在康斯坦斯湖的奥伯尔美伦，湖底暴露出厚达30－60公分（1－2英尺）的堆积层，里面有许多树桩、无数的动物遗骨和鹿角，以及用石制、泥制或木制的人工用品。一位收集古物的当地教师看到这个遗址后，与苏黎世古物协会理事长费迪南德·凯勒（Ferdinand Keller）博士取得了联系。

奥伯尔美伦以及与之类似的遗址很快便被人通称为"瑞士的湖上住宅"。从凯勒于1854年在报纸上发表第一篇报道以来，这些遗址便被划归到"凯尔特人"的名下，它们刺激了公众的想象力，激发了一场有关这些住宅建设和目的的热烈争论。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居民点反映了自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以来，居住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农民生活的一个侧面，它们通过水浸的方法保存在正常条件下容易腐烂的各种有机物，如木头、兽皮、纺织品和剩余食物。

凯勒的报道被其他报刊所转载，从而传遍了世界。这时，他对奥伯尔美伦的发现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要么这是坐落在湖边沙滩上的木桩住宅，要么这是一种用木桩支撑的搭在浅滩平台上的房屋。他最终选择了第二种解释，勾画出了湖上房屋的图样——建在离湖岸数米远的平台之上，由一条踏板与湖岸连结。在凯勒的头脑中，这些房屋并不是由直接插入湖底的立柱支撑的，他想象这些木桩是木质平台的支柱，房屋是建在平台上的，实际上是一些木头搭建的小岛。

这种浪漫的想法多半是从有关马来亚和东印度湖上村落的旅行游记中搬借过来的，此时这些记载正在逐渐渗入到欧洲人的意识当中。凯勒还把瑞士的遗址同爱尔兰的湖上水寨进行了比较，爱尔兰水寨是公元1000年间的人工岛，在诸如《爱尔兰编年史》之类的史料中曾被提到过。另一个可能的灵感来源是希腊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他曾经描述过公元前5世纪马其顿尼亚的普拉希亚斯湖上的一处住所。

无论凯勒的思路来自何处，建在水面平台上的史前房屋的说法深入人心，成为大众神话。凯勒的描绘甚至被引申和改造成更加奇特的复原图，如右图由苏黎世古物协会于1867年委托罗多夫·奥古斯都·巴赫林（Rodolphe Auguste Bachelin）绘制的画面，成了随后一些年里在阿尔卑斯山区各湖泊浅滩处发现的众多水上定居点的原型。自从凯勒的复原图确定了这些住宅的性质以来，大多数新遗址被简单地加以发掘，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其中保存良好的、丰富的手工制品。

实际上，有关湖水在房屋下面不断流动的说法绝不是无懈可击的。凯勒之后，史前史专家们提出，这些建筑物所在地区只是季节性地遭水淹，其他时间则是干燥的陆地 还有人提出它们最初是建在湖岸上的，仅仅是在后来才淹到了水里。目前，通行的两种不同看法认为，它要么是建在沼泽地，要么是建在湖岸上的定居点，两者都坚

大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控制之下。但在这一地区内部，许多渴望独立建国的民族在考古活动中发现了自己民族的过去。

考古学领域出现民族主义的一个前提是有关时间和时代序列（由汤姆森和沃索于19世纪早期对考古发现进行分类工作而确立的一种尺度）的意识。第二个前提是19世纪中叶出现的进化思想，很快从生物学扩及到考古学，促使考古学家们从源头去追寻特定范畴的手工制品的原型。

在寻找古代斯拉夫人或日耳曼人的考古遗存方面，人们付出了很大气力。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瓦夫兹尼克·苏罗温斯基（Wawrzniec Surowiecki）辨别出古代斯拉夫人与塔西陀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提到的维尼提人的差异。同时，在19世纪20和30年代，德国学者则试图将日耳曼人的祖先同北方民族，尤其是同当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开始大量发现的考古遗存联系起来。但在这方面的问题是：有些地区的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的定居地在历史上是互相重叠的，如在



决否定凯勒所持的是建在开阔水面上的木岛的说法。这两种类型的定居点由一小组成直角的房屋构成，有时还有牲畜圈和库房，最近在泰恩根－维尼发现的沼泽定居点就属这种类型。

即便如此，凯勒想像出来的复原图仍然在无数的画面和博物馆的展室中存在，并未表现出退出公众视野的任何迹象。他那牧歌式的史前生活的想法，继续对我们浪漫的激情具有吸引力，它的影响看来将不会消失。

巴赫林的奥伯尔美伦“湖上村庄”的复原图，绘于1867年。现藏于苏黎世瑞士国家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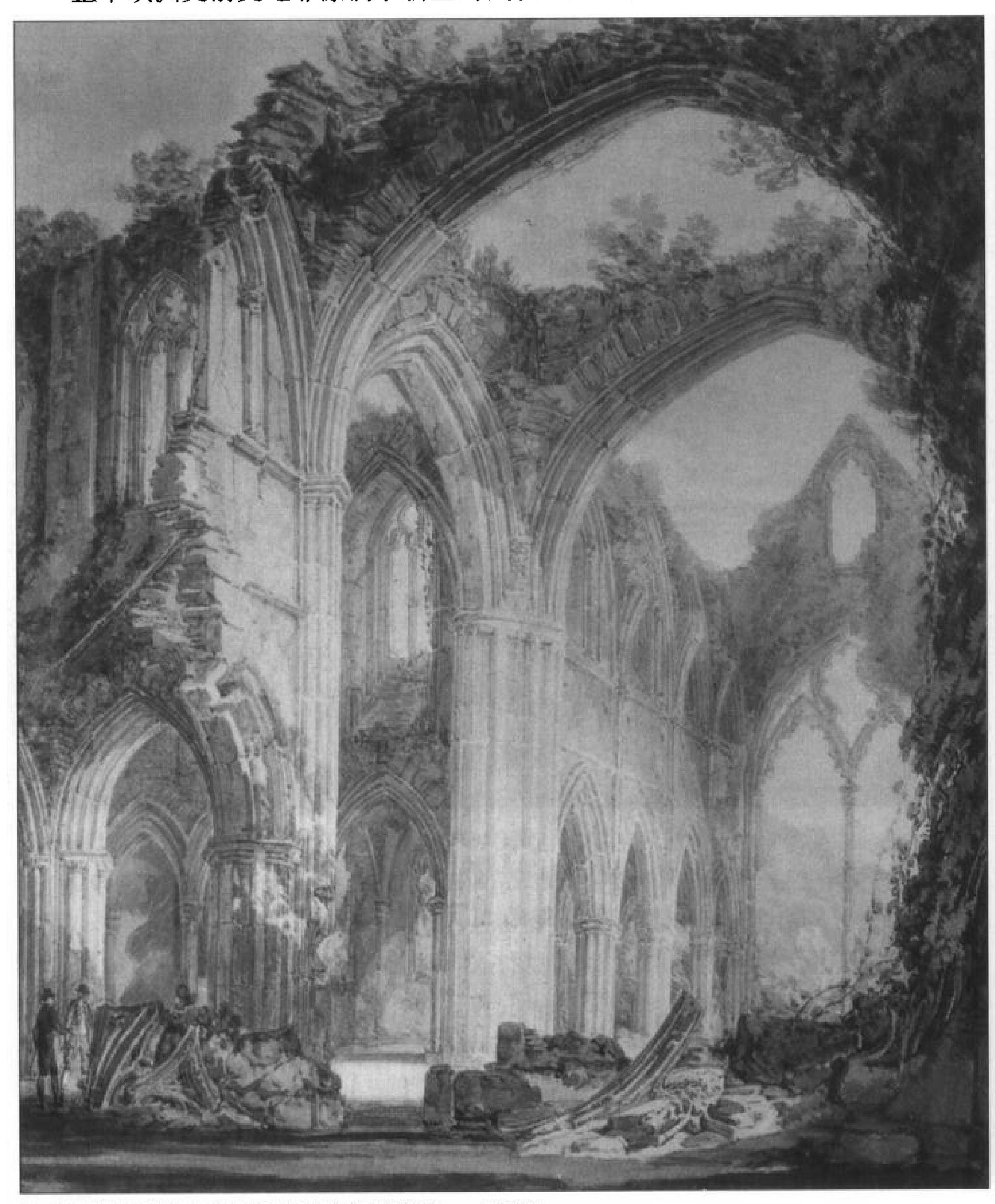
易北河下游和维斯瓦河之间的地区。

在民族主义运动对19世纪的考古学予以深刻影响的同时，它的近亲——浪漫主义也影响到人们对过去的思考。在某些方面，浪漫主义运动增加了过去——如自然界、古典作家、美妙的故事和事物——的迷人之处，使之带有一种温文尔雅的情调。这种乐观的倾向反映了人们对人性善的良好向往和对过去的亲近。但浪漫主义也有它的阴暗面，它推进了狂飙运动①，一种感情用事、富于想象和很粗鲁的运动，该运动狂热地反对被认为是缺乏血肉情感的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

正是浪漫主义的这种充满激情、毫无掩饰的原生倾向，使人们热衷于对过去的研究。对坟墓和死亡的病态迷恋出现在这个时期的音乐和绘画作品当中，引起了人们对许多墓葬遗址的发掘。同时，黑暗时代和中世纪——野蛮的一千年（公元500年至1500年）——首次得到学界的认真注意。

田野考古的发展

整个欧洲史前史绝非涂满了新生的民族主义色彩或充满了对田园诗般的前工



浪漫的破败。廷特恩修道院，约瑟夫·马勒德·威廉·特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年）作。

浪漫主义运动的迷人之处在于它用原始的生动的笔触去描写了野性和衰败的景物，它有助于促使19世纪的人们醉心于本民族在远古史前史及在西罗马帝国倾覆后的上千年里的起源问题。

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哥特式修道院和城堡的废墟便被视为野蛮和丑陋的象征，但在18世纪晚期却成了感怀伤神和浪漫主义研究的主要对象。在怀河河谷的廷特恩，修道院教堂的瓦砾受到清理，人们平整地面，铺设草皮，但攀援在废墟上的常青藤——这正是该遗址吸引人的关键之处——却被允许保留下来。某些参观者甚至希望看到更为破败的景象。其中有人写道："尽管这些断垣残壁是美丽的，但一些山角墙的顶端却有碍人的正常视觉；它们的形状庸俗不堪，令人生厌，干脆用一根木棒砸碎其中的某一些也许是明智的……"

到了19世纪早期，廷特恩已成了大众乐于参观的旅游圣地。有些观光者抱怨说，这座修道院的"景致因周围尽是用废墟中供奉神灵的石块草草搭建起来的、不堪入目的村舍和猪圈而受到破坏"，但这一切都被"它那无与伦比的壮丽"所掩盖。有些人甚至夜里来拜访，为的是体验那种在火把映照下的浪漫情调。

① 18世纪70和80年代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译者注。

业化时代的渴望。要知道，19世纪是考古学发展成为一种严肃的学术活动的时期，准确地收集资料是它至高无上的使命。例如在英国，一个致力于田野考古的新学会——英国考古协会于1844年成立，它公之于众的任务是查勘有时是发掘古代遗址，考察私人收藏和伦敦（这座首都原本是一个多世纪以前成立的古物协会的领地）之外的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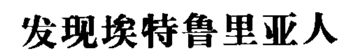


拉姆绍尔（Ramsauer）在1846－1863年间对奥地利阿尔卑斯地区哈拉斯塔特的铁器时代早期遗址进行了发掘，并做了认真的记录，对墓葬往往绘制一些醒目的水彩画。上千个坟墓中，许多拥有丰富的随葬品，如武器、珠宝、陶器以及琥珀、象牙甚至来自意大利的青铜器皿等物品，这有助于确定该遗址的年代（属公元前7和6世纪）。

哈拉斯塔特的繁荣出自对当地盐矿的开发，当公元前5世纪在其他地区发现更容易开采的盐源时，这一繁荣便告终结了。从这处墓地沿河谷而上，对矿道的发掘找到了工具、衣服甚而一名史前矿工的遗体。该遗体因埋在盐中，如同腌咸肉一样，得到了完好的保存。

随着发掘方法的日益成熟，发掘范围在稳步扩大。19世纪50年代，在奥地利萨尔斯堡附近，采矿工程师约翰·乔格·拉姆绍尔着手对哈尔斯塔特铁器时代的早期墓地（约公元前1200-600年）展开发掘。墓地位于湖边小镇旁的山岭上，他使用矿工作为发掘工人。在19年里他大约挖开了1000个坟墓，其中大约55%是土葬，约45%是火葬。墓中还出土了数千件器物，包括大量随葬的青铜器和铁器。每座墓都得到清理，画了草图，做了文字记录。不过在应该发表这些成果的时候，却因为拉姆绍尔过于谨慎而没有发表。他去世后，关于他发掘工作的主要记录不翼而飞了，只是到了1932年才在维也纳的一个二手书店里重新露面。

如同瑞士的湖上遗址一样，哈尔斯塔特为19世纪晚期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有关欧洲史前生活的侧面。参观目前陈列在维也纳国家博物馆中的各种美妙古物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感受到拉姆绍尔的发现所带来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发掘揭示了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存在于阿尔卑斯山北部边缘地带的史前社会的复杂性。他在墓葬中发现的某些随葬物，是用外来材料制成的，如琥珀和象牙，这是长途贸易的商品，是用当地开采的盐巴——哈尔斯塔特繁荣的根源——交换来的。还有其他一些随葬物则是从意大利埃特鲁里亚地区输入的。



发现埃特鲁里亚人

正在一处埃特鲁里亚墓地发掘的古物学家，吉奥瓦尼·巴蒂斯塔·帕塞里作于1767年。选自《瓦斯库里斯的埃特鲁里亚人的绘画》的卷首插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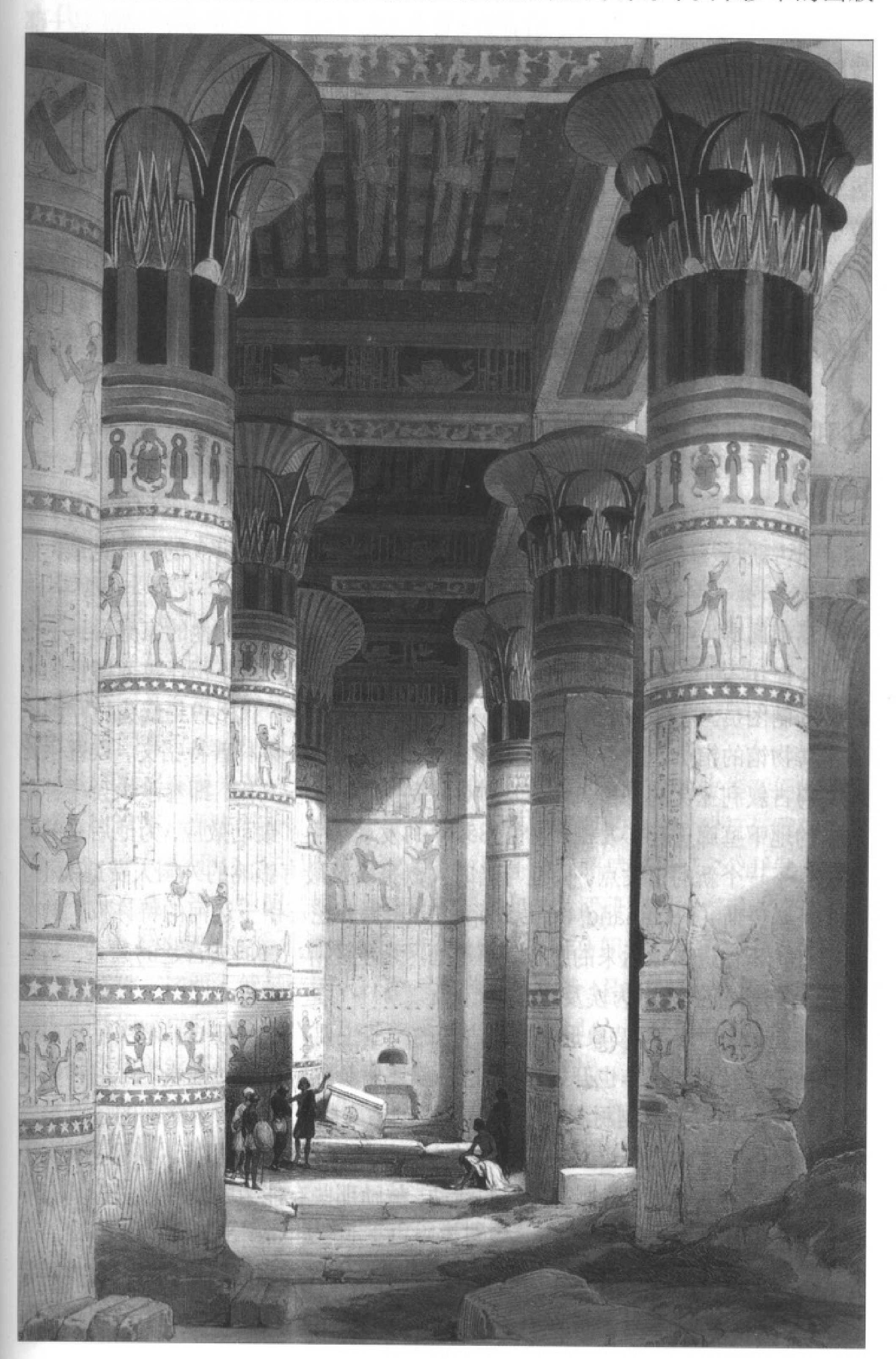
罗马北部的埃特鲁里亚拥有丰富的古代遗存，这一点很久以来就为人所知。早在1558年，在佩鲁贾的玛当娜·德勒·皮阿奇·迪·坎波教堂附近的挖掘工作中，便发现了大批在岩石中凿出的、带有埃特鲁里亚文字的陵墓。之后许多年间，这个地区不断制作出大量陶器，到1768年，勤勉的陶工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在英国所谓的“埃特鲁里亚”陶器场中的个人作坊里，制作出“埃特鲁里亚”式黑底红花陶的仿制品。事实上，韦奇伍德仿制的陶罐根本不是埃特鲁里亚式的，他的仿制对象是依靠一个活跃的贸易网自阿提卡大量船运过来的希腊陶器。

在英国，19世纪重新兴起了对埃特鲁里亚人的兴趣，这尤其反映在旅行家乔治·丹尼斯的《埃特鲁里亚的城市和墓葬》（1848年）一书中。虽然这本书中的解释有许多已经过时了，但丹尼斯熟悉托斯卡纳地区，他为读者提供了有关许多遗址和古建筑的深入细致的描述。

同时，意大利的艺术家们，如卡洛·鲁斯皮（Carlo Ruspi），也游览了埃特鲁里亚的墓地，细心绘制出他们见到的墓室的水彩画。这些描绘对今天的考古学家来说是无价之宝，因为它们记录了这些陵墓在初次打开时的状况，使后人能够准确地估量后来遭到的破坏和损毁的程度，并据此予以正确的复原。

近东考古的先声

拿破仑时代对埃及的描述，确立了早期埃及学的主要发展趋向，即着眼于屹立在地表的各种古文物。这一倾向也影响到意大利的埃特鲁里亚考古以及古典世界的考古。尼罗河谷庞大的考古宝库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和古文物，所以没有必要发掘大型的建筑。需做的事情只是录制这类信息并将它们公之于热心的欧洲大众。商博良的成果也促进了对古文物的发表工作，尤其促进了象形字文书抄本的出版



图为菲莱①的大柱廊，原载大卫·罗伯兹（David Roberts，1796 – 1864 年）的《埃及与努比亚》一书。罗伯兹是 19 世纪描绘古埃及的最伟大画家。他的作品充满艺术气息，从考古学角度来讲可谓准确无误。他生在爱丁堡的一个穷人家庭，起初为别人绘室内画，一天要干15个小时。后来逐渐改为绘制剧院布景，起初供职在苏格兰歌剧院，后来在老威克剧院和科文特加登剧院。

1838 年，罗伯兹动身去埃及，以传统的方式自开罗南下旅游，沿尼罗河到阿布·辛比尔。他雇的那条小船害虫肆虐，这使他在登船之前不得不将船在尼罗河水下浸泡了足足 24 小时。

罗伯兹在 3 个月的旅途中最终完成了一百多幅刻画入微的素描，他记录下“令人惊异的美妙遗存和在雕刻纪念碑时所付出的无尽劳动”。返回伦敦后他接着创作出大量水彩画和油画，并于1842年脱手了一组平版画，有284幅左右。这些作品在细节上丝丝入扣，直到目前仍然是埃及学家们的参考资料。

① 位于尼罗河上游，古埃及宗教圣地——译者注。

工作。这些文书漫布在庙墙和墓墙之上，是作为装饰之用的。象形文的破译奠定了理解古代埃及的基础。同古典世界一样，人们认为，埃及人自己的文字材料是直接的证据，是了解各种历史事件、宗教仪典和神话乃至日常生活状况的最好途径。

19世纪上半叶的埃及学家们，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复制文本与抄录各种纪念物上的铭文，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是德国语言学家卡尔·里查德·莱普修斯（Karl Richard Lepsius）以及诸如英国人约翰·加德纳·威尔金森（John Gardner Wilkinson）这样的碑铭学家。后者的3卷本大作《古埃及人的风俗习惯》是一部费时12年、自费抄录和独自撰述的权威性著作，相继问世于1837－1841年。莱普修斯则是继商博良之后该时期最重要的埃及学专家，其主要贡献在于继续了前人的工作，誊录埃及和苏丹的各种文物。在1842至1845年间，他率领一支由普鲁士国王赞助的考古队，绘制和抄录了远至苏丹迈洛埃的纪念碑与铭文，发掘了位于“拉比林斯”的大殓神庙。该神庙是国王阿美南哈特三世（约公元前1844－1797年）在哈瓦拉的金字塔的附属建筑。这项工作的出色成果是《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文物》（1849－1860年）一书的发表，这是迄当时为止部头最大的考古出版物，12卷的鸿篇巨制，含有894幅77×61厘米（30×24英寸）大小的图版。

马利埃特：走出混乱，建立秩序

1878年，开罗发生的洪水造成埃及学研究领域的一次最重大的损失。洪水毁坏了奥古斯特·马利耶特（Auguste Mariette, 1821－1881年）的考古记载，他曾在25年里一直是埃及学的泰斗。

马利耶特生于布伦市。他对埃及的兴趣源自1842年，当时他的家庭得到了一位叫奈斯托·勒霍特的亲戚的一些文件。这位亲戚曾在1828年担任过商博良的探险队的制图员。马利耶特自学了象形文字和科普特文字，于1849年成为卢浮国立美术博物馆的馆员。翌年，他动身去埃及，目的是想收集科普特铭文、埃塞俄比亚文与古叙利亚文的手稿。然而他却对萨克拉的塞拉派乌姆、即奉献给公牛神阿皮斯的地下墓廊进行了发掘。他在1851年的发现产生了轰动效应，为他后来的阅历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而他与当时大概是埃及最有影响的外国人费迪南德·德·莱塞普斯（Ferdinand de Lesseps，曾获得开挖苏伊士运河的特许权）的关系则进一步促进了他后来的工作。通过德·莱塞普斯与赫迪夫宫廷的关系，马利耶特于1858年被任命为埃及纪念馆馆长。

截止1850年，释读象形字文书方面的一些主要问题已被一一解决，撰写描述性的古埃及史的工作也开始进行。这种叙述史基本依赖于对地表之上的神庙和陵墓铭文的大范围复制材料。从埃及运来的古文物开始充斥于欧洲的各个博物馆，它们仍旧是以或多或少未加控制的方式收集到的。马利耶特认识到，现实要求规范挖掘考古遗址、掳掠古文物的活动，鼓励那些有能力的发掘者进行具有不同特点的发掘。

马利耶特的主要成就是建立起第一个国家文物管理部门以及伊斯兰世界的第一座国家博物馆——开罗博物馆。这座博物馆于1863年在布拉克开馆。他培养出

了人们保护埃及考古遗产的真正意识，他的文物管理部门倡导了一项大规模（尽管监察不力）发掘埃及主要古代遗存的计划。一些古代遗址，如位于卢克索的新王国时期的始建于公元前257－237年的希腊罗马人的神庙，都得到了彻底清理。1869年，为庆祝苏伊士运河的竣工，马利耶特甚至为威尔第的歌剧《阿伊达》设计了情节。这出描写古埃及人的歌剧以男女英雄被痛苦地葬入一座真实的建筑——孟斐斯的普塔神殿作为结局。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克洛迪于斯·里奇（Claudius Rich）所做的地形学的工作基本上属于历史地理学，他辨别出载于《圣经》和希罗多德等古典作家作品中的古代遗址及其主要的纪念物。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本身却始终藏匿在人们的视野之外。里奇等人在巴比伦及其他地区进行的有限发掘，提供了一些虽然神奇但不系统的考古知识，楔形文字仍旧未被破译，已发现的亚述和巴比伦人自己的记述因此毫无意义可言。然而这种晦暗不清的状态将要发生改变。在几十年热衷于考古发现和释读碑铭的浪潮当中，一些士兵和外交官对学术研究如同处理军事问题一样执着，结果是他们发明了亚述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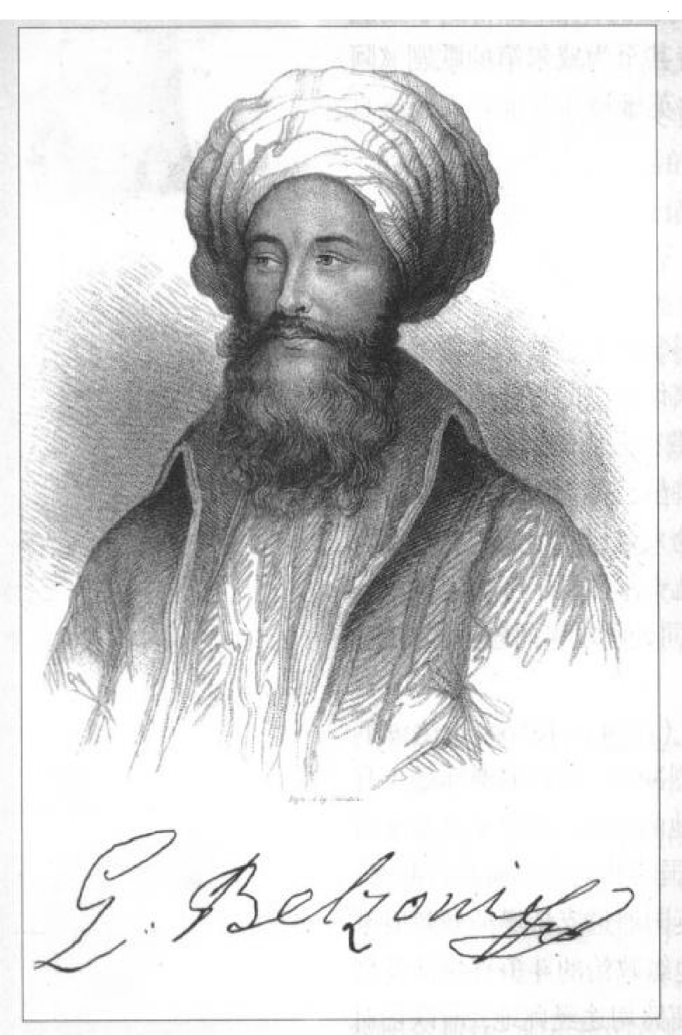
拿破仑的滑铁卢惨败（1815年）与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之间的那些年代，表明各帝国在打通西亚的问题上发生了剧烈冲突。腐朽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失去了对希腊和埃及的控制权。俄国则拓展了他的帝国，攫取了奥斯曼帝国南部的领土，并向中亚推进。法国和英国由于对俄国的共同恐惧而联合起来，但又为了自身对地中海和西亚的影响力而彼此竞争。英国通过支持奥斯曼政府来保护自己直达印度的通道，并遏制俄国的野心。这种地缘政治的斗争直接涉及到美索不达米亚。因为连结东地中海和印度的各条陆上商路均途经此地，所以它对法国和英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波斯则坐落在这些商路上，在欧洲人眼里，它是阻碍俄国有可能向中亚扩张的屏障。

欧洲列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战略和商业利益，有助于古文物收集者们的研究工作。1839年，当法国为报道关于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铭文、建筑与雕刻情况而派出一个代表团时，它同官方外交事务的联系便已昭然若揭了。公开发表的报告有一个直截了当的标题“根据外交部的指令和法兰西研究所的指示游览波斯。”因此，在西亚的第一次大规模发掘活动出自两个政府公职人员之手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这两人就是法国人保罗·埃米尔·博塔（Paul Emile Botta）和英国人奥斯坦·亨利·莱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正是他们两人将世界的注意力引向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财富。

亚述的宫殿

法国驻伊拉克东南部的摩苏尔市领事博塔，于1842年下半年开始在尼尼微（Kuyunjik）展开发掘。但因所获甚少，他很快放弃了自己的努力。随后一年是他走运的一年。在听说北部20公里（12英里）以远的杜尔·沙鲁金（即赫尔萨巴

吉奥凡尼·贝尔佐尼



吉奥凡尼·贝尔佐尼（Giovanni Belzoni，1778－1823年）画像。

拿破仑在1798年的入侵（指侵入埃及——译者注）导致欧洲同古埃及文明的直接接触，并引发了一场对埃及古物争先恐后的抢夺。该时期的这种特征反映 在一些富有传奇色彩却没有什么道德原则的冒险家的身上，他们的野心毫不低于那些资助它们大规模获取古埃及文物的赞助商。

他们当中最为成功者之一是伯纳尔迪诺·德洛维梯(Bernardino Drovetti)。他曾经是拿破仑入侵军的一名上校，在1829年以前，间或担任法国驻埃及的领事。德洛维梯雄心勃勃，精力充沛，他的代理人为数众多，大批古文物正是通过他们的手流入欧洲，构成世界三个最大的埃及古文物收藏地——柏林、巴黎、都灵——藏品的主要部分。

其他欧洲官员同样热衷于此事。英国驻开罗总领事是位业余画家，名叫亨利·索尔特（Henry Salt）。他自1816年起便雇了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以他的名义收集文物。这个人就是吉奥凡尼·贝尔佐尼。他是身高6英尺7英寸的马戏团大力士，据传能举起载有12人的铁架子。他起初到埃及是为了向埃及出售水车。这项生意失败后便受雇于索尔特。他的成就之一是在那年最炎热的季节里，从底比斯运送人称"青年门农"的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那"完美无损、美妙绝伦的花岗石头像"。现在这尊头像收藏于大英博物馆，附有由14根立柱、4条棕榈树叶拧成的绳索、4个辊子组合成的设备。他还负责从帝王谷①中搬运拉美西斯三世的石棺，除了现存于剑桥菲兹威廉博物馆的棺盖之外，该石棺整个成了卢浮宫的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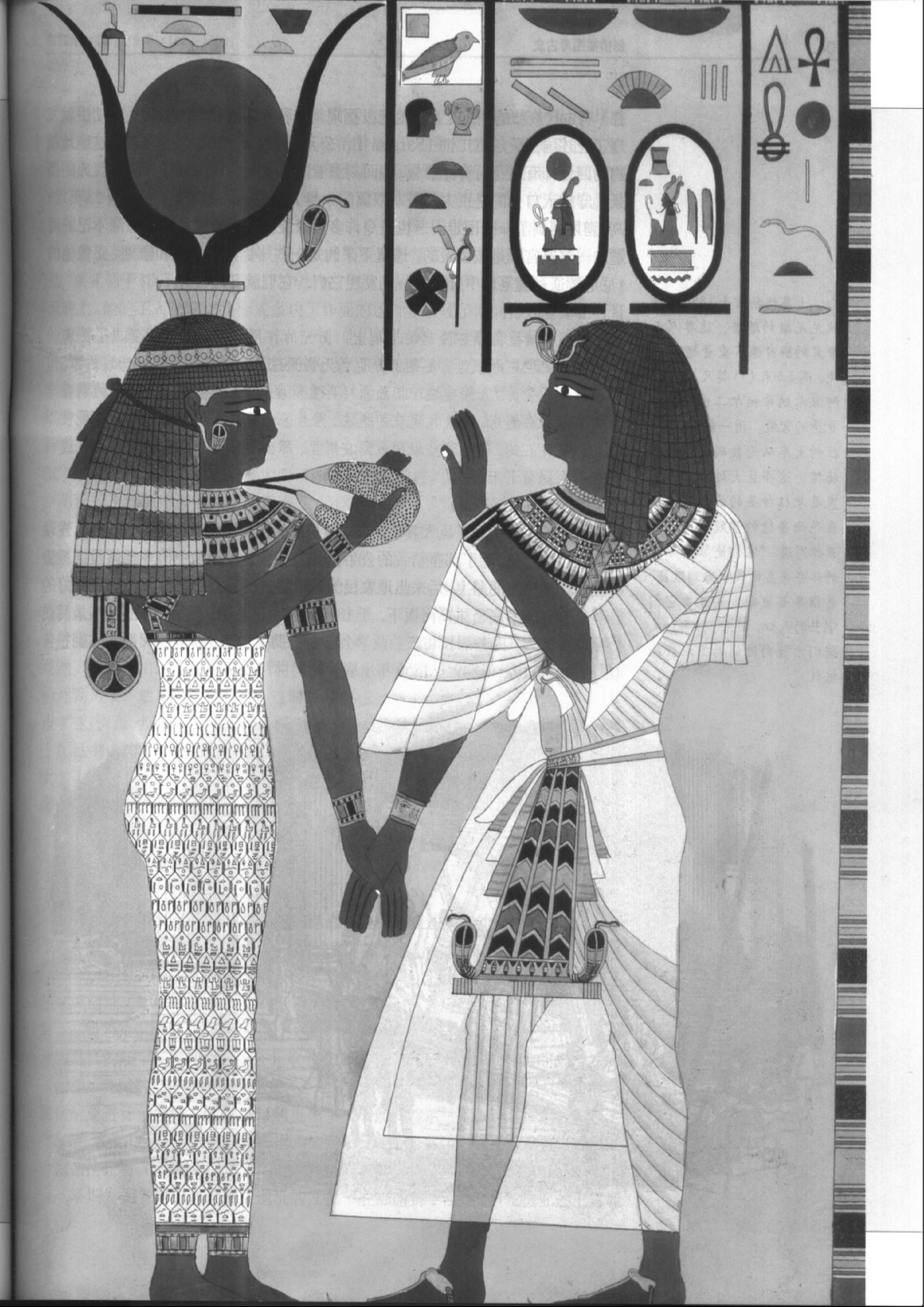
正是在帝王谷的工作，使得贝尔佐尼闻名遐迩。他最显赫的成就是在1817年10月发现了塞提一世（Seti I，约公元前1306－1290年）的陵墓。这座陵墓的装饰富丽堂皇，墓长100多米（330英尺），为埃及王陵的长度之最。贝尔佐尼给索尔特的工作汇报载于他出版的一部书中(1820年)。其中有一处极其令人难忘的文字，描述了他在底比斯西岸发掘陵墓的情景：

> 在努力进入这个地方之后，经过一条通道……大约600码长，我简直精疲力尽了，于是打算找个地方喘口气。我发现了这样一块地方，便想坐下去。但是当我的身体刚刚压到一具埃及人的尸体上时，它就像个纸盒子一样被压碎了。我下意识地想用手抓住点什么以维持平衡，但没有什么可抓。我完全掉到了破碎的木乃伊中间，身边一片骨头、破布和木箱子的爆裂声，这扬起了一片尘土，足足使我有25分钟无法挪动一步，一直等到尘埃落定。然而我仍然不能在不扬起尘土的情况下离开这个地方。我每挪动一步，都要碰碎某处的一具木乃伊。

尽管收获甚丰，贝尔佐尼在埃及的时间毕竟短暂。他于1819年离开埃及返回英国，被伦敦社团当成了名人。他着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就是在皮卡迪利广场的埃及厅中重建塞提一世的陵墓。贝尔佐尼未能找到资助者来继续他在埃及的工作，可他又不能安于平静的生活。1823年，在一次寻找尼日尔河源头的探险活动中，他在西非贝宁因痢疾而病亡。

右图，出自尼罗河畔底比斯王陵的绘画，由贝尔佐尼发现（1820年）

① 古埃及法老陵寝所在地之一——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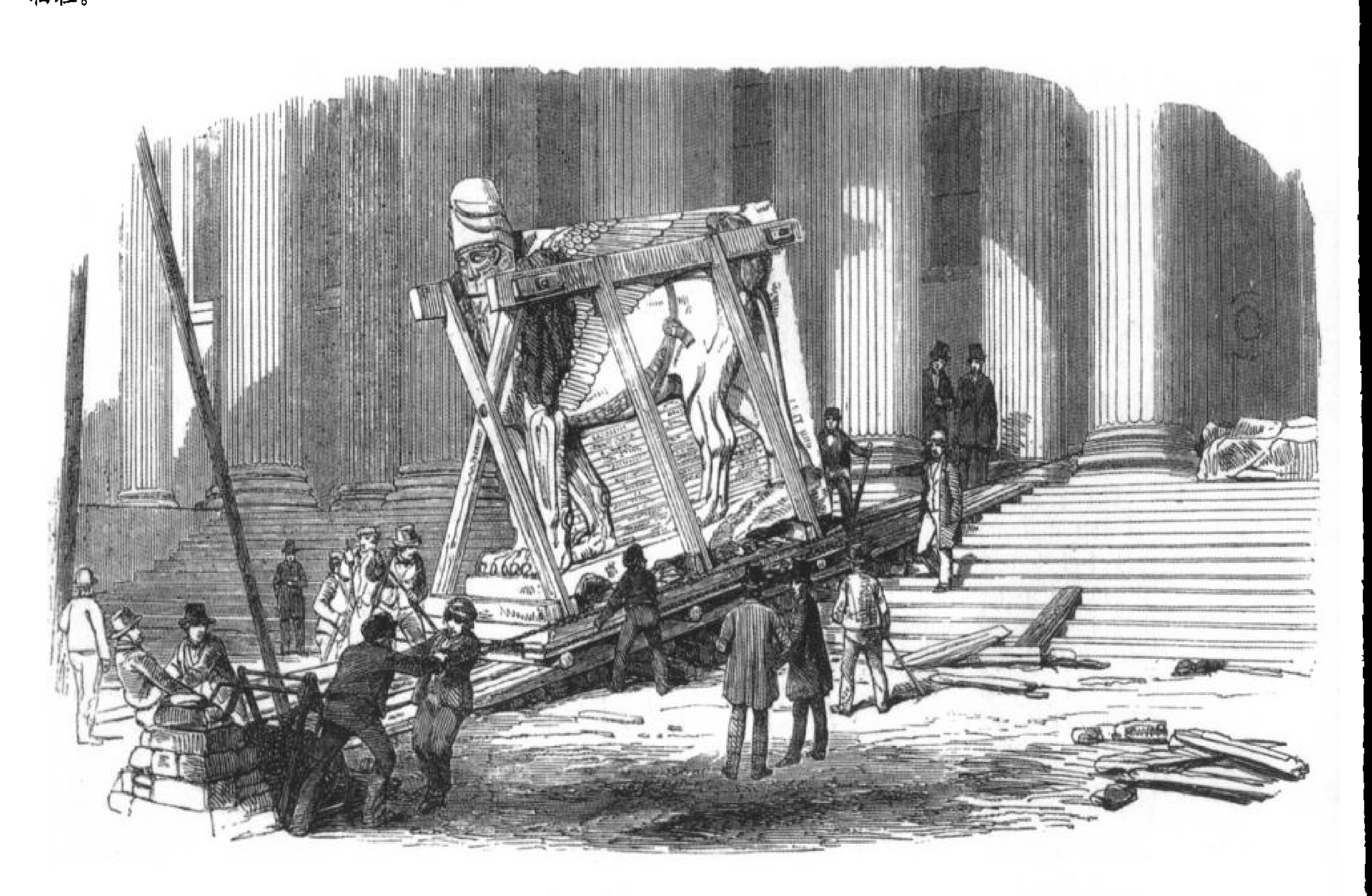


德）有古代废墟的消息之后，他把发掘现场转移到了那里，发掘几乎刚动手就发现了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Sargon II，公元前721－705年）的宫殿。这座建筑物的四壁饰有雪花石膏浮雕板，上面刻画着国王东征西伐的业绩和隆重仪典的情景。守护入口处的是巨大的带有双翼的牛身人面像，人头像足有4米（13英尺）高。博塔遇到了一个困难——也是令许多后来在亚述遗址发掘的人头痛不已的问题——这座宫殿是被焚毁的，遗留下来的是一些焙烧过的浮雕和雕刻。正像他的《尼尼微遗存随笔》中所说，一旦发现它们，它们就开始破碎了：

> 那些墙壁倒塌在隆起的土地上，阳光的作用使墙壁的表面变成了粉末状，即使现在那颇为重要的部分也已无影无踪了。这的确是令人悲哀的事，但我却无能为力，除非这一切照原样再重新埋起来，也就是为了将来的调查而重新保存起来。这是我现在的想法，因为……造成一次新的毁损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若让这些墙壁敞露在那里，那么不出三个月它们的任何痕迹都不会保留下来。

博塔的报道引起了巨大震动，法国内务部为此专门发放财政补贴，将已发现的古物运往巴黎。除了那座精致的公牛巨像之外——运送途中因车辆倾覆而被丢弃在通向摩苏尔的路上，后来当地农民为获取石膏而将它们烧毁——保存最好的一些古物装船沿底格里斯河而下，于1846年运至巴士拉，然后运到巴黎，最后在卢浮宫中陈列。内务部长和法兰西学会甚至资助了博塔5卷本的大部头发掘报告《尼尼微的古物》（1849－1850年出版）的问世。

大英博物馆于1852年接收尼尼微的雕塑。这尊人面带翼的狮身像，重量超过10吨，高3.5米（11英尺），出自阿淑尔纳希帕尔二世在尼姆鲁德的宫殿，用一辆11匹马拉的大车从伦敦码头运到博物馆。这些巨大的雕像头上裹着象征神圣的头巾，守护在尼姆鲁德的宫殿门口。莱亚德写道："它们使3000年前的那些兴盛的民族感到敬畏，并指导着他们。穿过由它们守卫的入口，国王、祭司和武将们才能向他们的圣坛敬献牺牲。"



由于1848年的巴黎革命，法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工作暂告中断。博塔在1851年被免职，从此销声匿迹，蒙受了政治羞辱。现在主动权转移到博塔的朋友、英国人奥斯坦·亨利·莱亚德手中。因受到在赫尔萨巴德的发现的鼓舞，精神饱满、精力充沛的莱亚德诱使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设法为他搞到了一张从事发掘工作的许可证和资金，以此对法国近来的成功做出回应。

借助英国驻摩苏尔副领事的兄弟、聂斯脱利派基督徒霍尔姆兹·拉萨姆的帮助，莱亚德于1845年下半年在卡尔胡的古代城市尼姆鲁德开始了发掘工作。第一天晚上，他的工人便在已划分成多块工作面的遗址上发现了两间排列着雪花石膏的房屋，上面饰有楔形字铭文。第二天，他们又发现了涂金的象牙残片。发掘队伍扩大到30人之后，发掘有了更多的发现，其中包括带翼的公牛雕像、刻画着战车和狩猎场景的浮雕。在尼尼微和阿淑尔（亚述的故都）也进行了探测。但莱亚德的活动集中在尼姆鲁德，因为这里是王室所在的城市，是《创世记》中的卡拉赫城，由亚述国王阿淑尔纳希帕尔二世（公元前883－859年）建立，集中了阿淑尔纳希帕尔及其后继者的庞大而富丽堂皇的宫殿群。尼尼微则比较老旧，由两个明显的土丘即库云吉克丘和奈比·尤努斯丘构成。尽管亚述国王在这里也建筑了宫殿和庙宇，但这类建筑活动大部分都发生在辛纳凯里布（Sennacherib，公元前704－681年）将这座城市定为首都之后的那段时间。

莱亚德的成功引来大英博物馆对他的财政资助，但事实证明这些资金是不够用的。这使他"尽可能花费最少的时间和金钱，以获得尽可能多的、保存良好的美术作品。"1874年，一度守卫尼姆鲁德宫殿入口处的雄伟的牛身人面像被运往英国。起先使用木筏沿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至巴格达，然后装船运往巴士拉，再船运到孟买，然后转运到伦敦。这时莱亚德也回到了英国，大英博物馆在同年开设了亚述厅。那一年，借助他的畅销书《尼尼微及其遗存》（1849年出版）在各个车站书店里的热销（销售量仅次于《兰黛尔小姐的烹调术》），莱亚德成了一位大名人。在1849－1851年赴美索不达米亚进行第二次探险之后，他永远退出了考古界，成了一名国会议员。

在巴比伦尼亚的发掘

莱亚德于1850年对巴比伦尼亚的踏勘只是他在亚述工作的一个小插曲。在这个地方极为成功的是他的同代人、英国地质学家和旅行家威廉·洛夫特斯（William Loftus）。在1850和1854年间，洛夫特斯两度考察了位于幼发拉底河岸边巨大的瓦尔克城遗址（又称乌鲁克，在《圣经》中称埃利克），之后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森克莱（古代的拉尔萨城，《圣经》中的埃拉沙尔）。在瓦尔克，他发掘了光明和正义之神沙马什的庙宇，发现了属于公元前2000年的古巴比伦和加喜特时期的铭文。同一时期，英国驻巴士拉副领事泰勒（J. E. Taylor）以大英博物馆的名义，也在巴比伦尼亚进行了发掘。他在1854年掘出了一条通向特尔－穆伽雅尔（阿拉伯语为"斜山"之意）一座砖丘中心的甬道，从顶部发现的铭文认出这是迦勒底人乌尔城中的兹格拉特（Ziggurat），即塔庙，《圣经》中的亚伯拉罕之家。

早期发掘者对巴比伦尼亚遗址的发掘一般都遇到了困难。当发掘亚述王宫覆

莱亚德在尼尼微

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有效开展，始于奥斯坦·亨利·莱亚德（1817－1894年）及其对尼尼微的发掘。他不是第一个发现宏伟的亚述王宫的人，这个荣誉属于博塔。但是莱亚德在美索不达米亚5年的紧张工作，发现了亚述文明本身，并在19世纪中叶将它公之于众的。

莱亚德生在巴黎，长在瑞士和意大利，16岁时到伦敦学习法律，一学6年，直到他自己有了主见，在锡兰（斯里兰卡）找到一份工作。1839年，他动身去锡兰，但始终没有抵达此行的目的地。由于对在异邦的旅行和探险十分着迷，他决定取陆路经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去印度，最后到 达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摩苏尔。在那里他走访了尼尼微、尼姆鲁德和阿淑尔。

然后，莱亚德翻过波斯西部险峻的山岭，在当地游牧的巴克提亚里部落逗留了一段时间。当他于1842年抵达巴格达时，他同意去君士坦丁堡，向英国大使斯特拉福德·坎宁就奥斯曼土耳其同波斯之间的边界状况做一个简要的汇报。一路上，他访问了由博塔开始发掘的尼尼微，这是他头一次感受美索不达米亚考古。

坎宁对莱亚德的能力印象颇深，于是为他在英国使馆找了份工作，这使他在君士坦丁堡工作了两年。在此期间，博塔发掘赫尔萨巴德的成功，激起了坎宁对古物的兴趣，也激活了他的外交本能。在坎宁决定资助莱亚德首次挖掘尼姆鲁德（1845年）一事中，同法国争夺在这一地区影响的动机起了不小的作用。

按照20世纪的标准，这些发掘都是极端原始的。无论对于莱亚德还是博塔而言，发掘的目的无非是想得到能在其国家博物馆内展示的古建筑上的雕像和墙壁上的浮雕。大批工人沿着宫殿的墙壁尽可能快速地挖掘探沟或隧道，所有易碎的物品——石灰石和金属器物以及泥灰墙上的壁画——只要一暴露到空气中，便立即蜕变分解。

1847年，莱亚德开始将他发现的文物运往英国。他力图原封不动地运送雕塑作品，避免博塔的办法，即为了便于运输而将大件古物切割成几段，在展览时还需重新加以复原。即便如此，也仍然存在着问题。在转运盛装古物的板条箱的过程中，那些到孟买海关参观的英国人出于好奇，总是将许多箱子打开来看，从而使一些经过细心包装的古物受损。1848年10月，这批珍贵的货物抵达伦敦，随后在大英博物馆展出。

亚述艺术那种好勇斗狠的特征拨动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心弦，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应外交部长威斯康特·帕默斯顿（Viscount Palmerston）的要求，并得到大英博物馆的资金支持，莱亚德在第二年又返回美索不达米亚，继续对一些不同类型的考古遗址进行发掘，直到1851年才告结束。

这时，释读楔形字文书的工作已经取得很大进展，考古重点也从发现艺术品转为寻找古文献和铭文。莱亚德对尼尼微的辛纳赫里布王宫进行广泛发掘，找到了王室图书馆的大部分遗存，发现了几乎有3公里长（2英里）、带有71个房间和门厅并饰有浮雕的墙壁。这座图书馆收存了难以数计的一时难以理解的泥版文书，后来才知道它们是有关亚述宗教、文学、政治详情的重要史料。

莱亚德还在尼姆鲁德和摩苏尔地区的其他遗址展开过发掘。1850年，他到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旅行，在巴比伦和尼普尔等遗址挖过探沟，但没有什么收获。完成第二轮发掘工作之后，莱亚德结束了自己的考古生涯。在他的监督下，他在亚述遗址的发现被装到120多个箱子运回英国。回国后，他发表了《尼尼微和巴比伦的废墟》（1853年）和《尼尼微的古文物》（1853年）两部著作。

他的考古名声非同小可，幽默杂志《活力》曾用怀疑的口气评论道："英国公众把他（莱亚德）尊崇为亚洲所有政治问题的预言家，因为他是一位精力旺盛的尼尼微的发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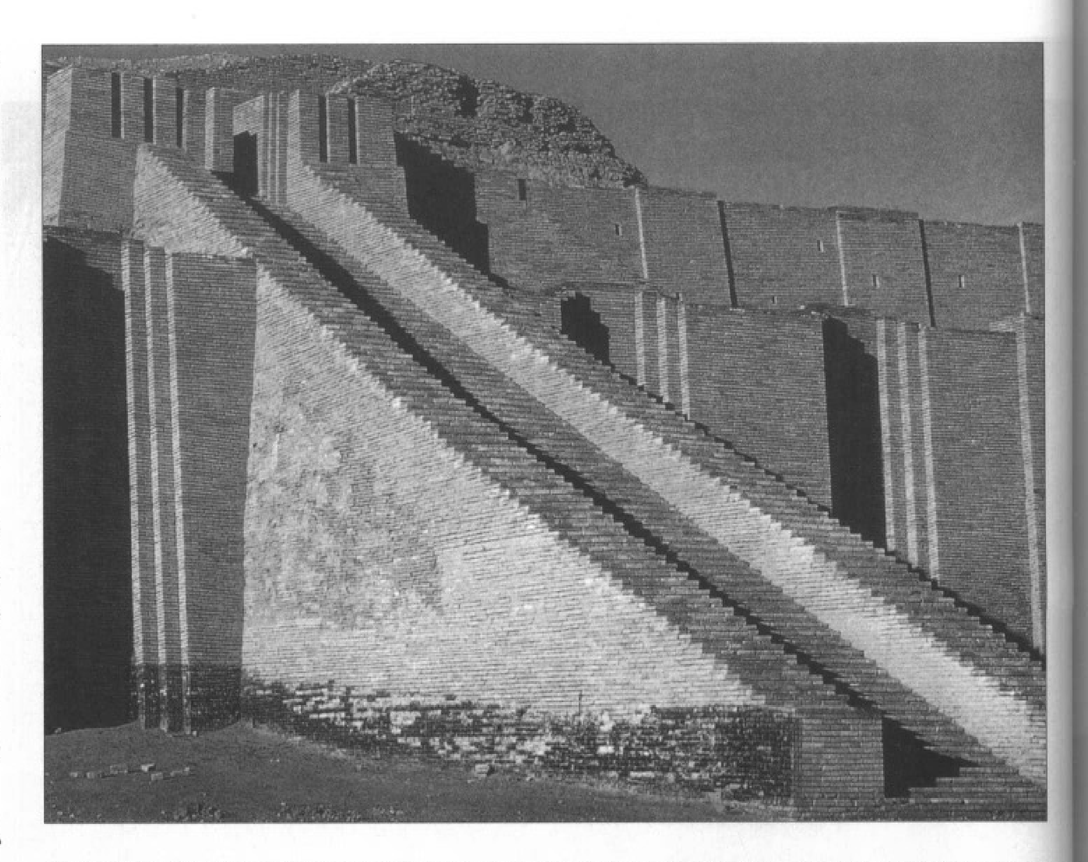
莱亚德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活动为后来的考古工作者留下了两份遗产。最显赫的一份是他在尼姆鲁德、尼尼微和其他遗址挖出的壮丽的亚述王宫及一些伟大的美术作品，使世人头一次直接感触到《圣经》所记载的帝国，并使它们的遗物在博物馆得到展出。他的另一份遗产是文笔生动的书籍、部分考古发掘的报告、探险故事，以及关于近东各民族民族学的描述。它们在19世纪50年代里广为流行，激起了19世纪中叶世人的古代文明热。这份遗产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可以同大英博物馆相提并论的。



不到10年时间，博塔和莱亚德便发现了亚述三个首都的遗址，即赫尔萨巴德、尼姆鲁德和尼尼微，通过博物馆将先前只能从书本《圣经》中才可以知道的古代文化置于大庭广众之下。即使是在这两人退出田野发掘之后，法国和英国仍在发掘古代文物方面继续互争短长。博塔的继承人——法国驻摩苏尔领事维克托·普拉斯（Victor Place）于1851年至1855年间在赫尔萨巴德挖掘，确定了宫殿的布局结构，随后又在底格里斯河边的亚述另一都城阿淑尔进行了发掘。

英国方面，拉萨姆（Rassam）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继续着莱亚德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事业。在尼尼微，他发掘了阿速尔巴尼帕尔（公元前668 – 627年）的宫殿，进一步出土了宫墙上的浮雕和图书馆的遗存。此后他转移到阿淑尔，随后又移师到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巴比伦尼亚，从事考古发掘活动。

上图：公元前2800年的亚述浮雕，是由莱亚德在1845 – 1851年间于尼姆鲁德的阿淑尔纳希帕尔二世宫殿发掘出来的。浮雕大小为1.83 × 1.17米（72 × 46英寸），表现一个长着翅膀的神灵正向携带弓箭的王室官宦施以涂油礼。莱亚德把这件浮雕送给了他的恩人、赞助者同时又是他的远房亲戚的富裕的威尔士铁器制造业主约翰·格斯特爵士（Sir John Guest）。格斯特的家位于多塞郡的坎福德·迈诺。1923年，格斯特的住宅变成了一所独立的学校。最近这件浮雕在那里又被重新发现，发现时它已被刷上了石灰水，镶在糖果食品店的墙里。1994年，该浮雕在克里斯蒂拍卖行以770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一个日本的宗教派别。这个派别认为人们从美好的艺术作品中可以获得灵感。



乌尔城的兹格拉特神塔庙。用干泥砖建造，外层包有厚达2.4米（8英尺）的熟砖，这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保存最好的神塔庙。目前为旅游者复原的形状属于公元前3000年代末叶。图中砖砌的阶梯共有三道，这是其中的一道，每道有100个台阶，顺阶梯才能进入塔门和该建筑的第一个平台（共有三个平台）。

乌尔纳姆的兹格拉特神塔庙构成一个奉献给月神的圣地中心，它的外围包括一间神庙库房，一间女祭司的住房，一座供仪典之用的王宫。为月神准备食物的厨房则矗立在西北部。

在1919－1924年的系统发掘之前，尽管利用了轻轨铁路和无数使用箩筐的劳工，这个山丘很大程度上仍然同泰勒于1854年发现它的时候没什么两样。当英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达这个遗址的时候，伦纳德·伍莱（Leonard Woolley）记录道："能够看到的仅是在顶部凸起的一些参差不齐的砖块，巨大的土丘是由未曾触动过的沙土和碎砖堆成的，它的坡度相当和缓，一个人可骑马上去。"

盖有石块的墙壁或发掘巴比伦城本身用熟砖垒砌的建筑时，当地的大队壮工能够进行卓有成效的劳动 把一座建筑物的墙壁同覆盖它们的碎石砖砾直接分离开来。然而，大多数巴比伦尼亚的城市是用未过火的生砖建成的，雨水和时间的剥蚀，以及在同一遗址上的不断施工重建，已使它们变得面目皆非，成了一堆极厚的沉积层，没有保存下来丰富的、可以复原的早期美术作品，而亚述王宫之所以迷人正有赖于此。连莱亚德这样的权威都"从总体上倾向于认为，对于广泛进行发掘……能否产生任何重要的或有意义的结果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由于下一代人在巴比伦尼亚的工作，人们这种悲观的估价才被改变了。

人们费尽周折，掌握了释读阿卡德文的能力，这等于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而这个世界在此之前还仅仅是通过《圣经》编年史家和先知的眼睛才略知一点皮毛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们现在可以研究亚述国王的外交、军事及其对帝国的统治情况了。辛纳凯里布和阿速尔巴尼帕尔的图书馆，收存着有关亚述和巴比伦尼亚的历史、神话、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宗教以及有关翻译古代其他语言(如苏美尔语)的双语词汇的泥版文书。以同样的方式，博塔和莱亚德通过亚述人的艺术复活了亚述人。

在《尼尼微及其遗存》一书中，亨利·莱亚德写到他站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新贾尔地区阿法尔山顶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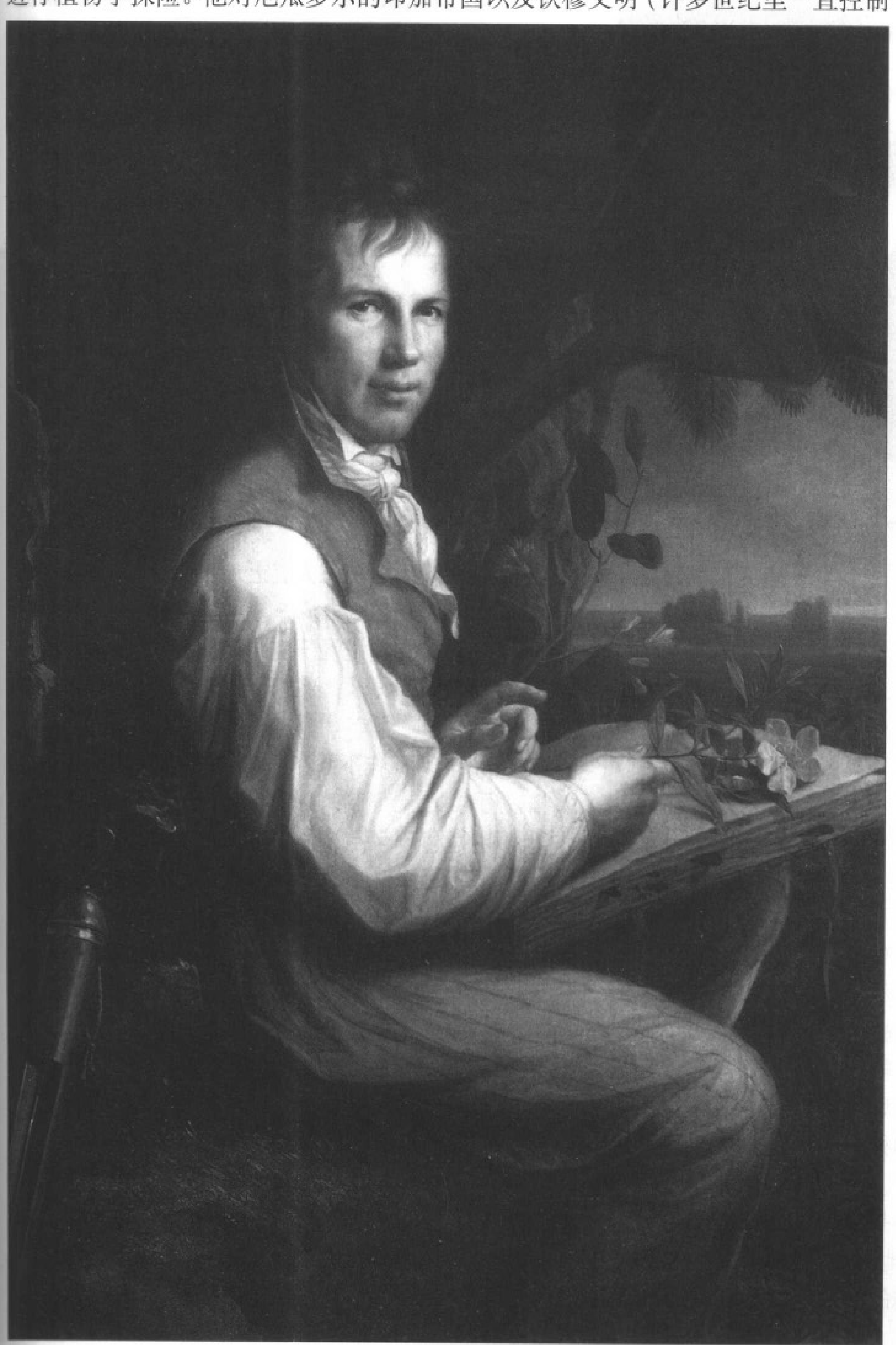
> 从墙头向四面极目远望，广阔的平原一览无余，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消失在遥远的天际。古代陵墓和村落的废墟静静的伫立在四面八方，当太阳西下时，我数出了100多个土丘，它们那黑暗狭长的阴影投射在平原之上。

1842和1857年间确立的亚述学的未来就静卧在那些土丘之中。

对古代美洲的探索

19世纪初期，西班牙对其美洲殖民地的控制受到削弱，新的拉丁美洲国家则开始同欧洲及其科学团体进行着独立的接触。随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旅行家到那里旅游，有关古代文明、特别是有关中美洲和秘鲁文明的那些难以置信的废墟的消息开始到处传播。

第一个到这个地区从事真正的科学旅行的人是普鲁士贵族巴龙·亚历山大·封·洪堡（Baron Alexander von Humboldt）。1799年，他离开欧洲，赴南美进行植物学探险。他对厄瓜多尔的印加帝国以及钦穆文明（许多世纪里一直控制



亚历山大·封·洪堡（1769 – 1859年）像，弗雷德里克·乔格·魏兹克绘于18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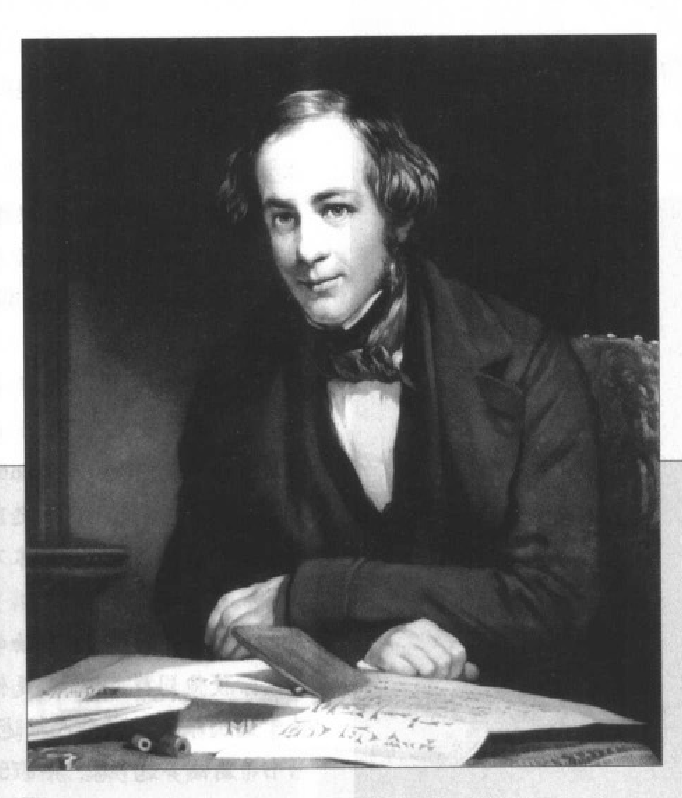
洪堡体格健壮，思想兼收并蓄，终生受到赞扬，但在他用5年时间（1799 – 1804年）穿越南美河流和内陆之前或者旅行开始时，他还根本不是什么探险家。

人类学、地理学、动物学和医学使他同样着迷。正是他关于这次旅行的《个人描述》一书（篇幅多达7卷，共3754页），促使达尔文在一代人之后乘“贝格尔号”开始了他的旅行。

洪堡不止一次差点儿丢掉性命，如他的独木舟陷在了沼泽之中，他在鳄鱼出没的河流里航行，他试图攀登位于基多附近厄瓜多尔一侧的安第斯山脉中的钦博拉索山（他以为那是世界最高峰）时都遇到了危险。他吞下过箭毒，以此试验证明毒性只有在进入人的血液的情况下才会致人死命。他同自己的伙伴、法国植物学家艾梅·邦普朗（Aimé Bonpland）抓住了一条电鳗，经历了高达600伏电压的打击。

着秘鲁的北部沿岸地区）进行了第一次科学的考察。他还是第一个对因海拔和纬度的变化而发生气候变化做出测量的人。史前文化的演进在数千年里受到了这类因素的影响。秘鲁北部沿岸的钦穆首都（1000 - 1450年）羌菖（Chanchan）的巨大废墟，令洪堡迷惑不已：为什么没有雨水明显降落在古代的砖坯墙上的痕迹？当他测量出附近太平洋上的温度时，答案不言自明了——有一股非常寒冷的海流沿着南美西海岸向北流动。这股海流今天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洪堡将古代秘鲁沿岸居民长期使用的鸟粪肥料引入欧洲，并因此而使新生的秘鲁国家经济得以成形。离开南美后，他又到墨西哥旅行。在那里他除了进行植物学的研究之外，还继续对重要的考古遗址加以考察记录。后来的查尔斯·达尔文称他是“他所处时代的最伟大的科学旅行家”。



亨利·克雷齐克·罗林森爵士（Sir 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1810 - 1895年）。他的青年时代并不像现在这样，看上去那么好学深思。罗林森曾是近卫步兵第一团的一名中尉，一度为他与“任何竞争者赌100镑为荣。比如赌跑、跳、掷圈环、打墙球、台球、射杀鸽子、猎野猪、障碍赛马、杀棋打牌等等”。他还是一位有名的骑手，在波斯他曾连续150小时骑了750英里。

破译楔形文字

17、18世纪期间，到近东去的欧洲旅行者经常携带回一些泥版文书，上面有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字铭文。这些符号是用削尖的苇棍压印上去的，很明显是一种代码，如我们今天所知，被用来表现数千年前的许多不同的语言。若没有一把破解的钥匙，这些铭文便始终是不可理解的新奇之物。如果有，那么一个可认识的全新世界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破译楔形文字的工作不是由一位学者、而是由十几位学者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地奋斗了半个世纪才完成的。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两份特殊的铭文：一份出自波斯国王在波斯波里附近的墓地纳克什－伊·鲁斯坦，另一份出自波斯西部的贝希斯吞。两份铭文都以两种或三种不同的文字——古波斯文、新埃兰文、阿卡德文——以及三种不同的书写体重复了同一个文本。纳克什－伊·鲁斯坦的文本篇幅过短，以致无法满足充分破译的需要。贝希斯吞文本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国王大流士一世（Darius I，公元前521 - 486年）篡夺王位的辩护辞，但它太长，几乎不可能对它进行完整的复制。它位于克尔曼沙附近的一个山口处，全文占地300多平方米，刻在离地面122米（390英尺）高的峭壁表面。

早期的破译工作不可避免地集中在比较容易获得、但篇幅较短的纳克什－伊·鲁斯坦铭文上。这份铭文的复制本最初能被欧洲人看到，是由于卡尔斯坦·尼布尔（Carsten Niebuhr）于18世纪末在波斯波里临摹的结果。尼布尔本人认出了铭文的一部分是古波斯文，系楔形文字的字母文版本，有42个符号。很快，人们便识别出这份铭文包含着许多公式化的国王头衔的重复话语：“薛西斯，伟大的国王，众王之王，大流士之子，伟大的国王，众王之王”。这一称呼与3 - 7世纪萨珊波斯王朝晚期的国王们所用的称呼颇为相似，而对于萨珊波斯的文献，当时的欧洲学者已能够阅读了。

第一次突破发生在1802年，当时有一位热衷于破译密码的德国中学的希腊文教师，名叫乔格·格罗特芬德（Georg Grotefend）。他发现波斯波里的铭文中有某些重复的句子，与萨珊波斯王朝晚期的表达方式雷同。格罗特芬德利用希

斯蒂芬斯和凯瑟伍德在尤卡坦的发现

1799年，即汉伯尔特乘船赴美洲的那一年，弗雷德里克·凯瑟伍德（Frederick Catherwood）在英国出生。由于性情抑郁沉稳，他被培养为一名建筑绘图员，25岁时到地中海和近东进行了长达近10年的旅行。他对考古学有浓厚兴趣，回国时携带了一大包有关埃及和巴勒斯坦的重大遗址——如底比斯、菲莱、巨石穹顶、杰拉什和巴勒贝克——的画稿。1836年他在伦敦展出了部分作品，并与喜欢旅行、热情洋溢的美国律师约翰·勒洛德·斯蒂芬斯（John Lloyd Stephens）会面。这位律师恰好也从埃及和宗教圣地旅游归来。两人很快便认识到考古是他们的共同爱好，于是商议好有机会的话将一道出外旅行。

斯蒂芬斯返回纽约之后，出版了两本书——《埃及、阿拉伯半岛及圣地游历纪实》（1837年）和《希腊、土耳其、俄国与波兰游历纪实》（1838年），从而确立了自己旅游畅销书作家的地位。这一时期，正不断传来在中美洲发现业已消失的古墨西哥文明的城市和金字塔的消息，大多数人视这些报道为奇谈怪论，但斯

罗多德记载的有关阿黑门尼德家族中担任国王者的谱系，成功地辨认出大流士和薛西斯的名字、国王一词，因此也识别出了许多字母所具有的表音价值。在随后几十年时间里，其他学者发展和修正了格罗特芬德的初步成果，但波斯波里的铭文过于简短，甚至对充分理解古波斯文都造成了困难。

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由于伟大的英国亚述学家亨利·克雷齐克·罗林森的努力，破译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罗林森受过古典学的训练，曾在东印度公司做过培训生。在学习了波斯语和一些印度语之后，他被派往德黑兰，参与训练波斯的军队。就在那里，他设法复制了贝希斯吞铭文古波斯部分的一半文本。尽管罗林森不知道格罗特芬德的工作，但运用了与格罗特芬德同样的方法，成功地译出了许多相应的人名和地名。截止1839年，由于了解了格罗特芬德的成果和已发表的其他关于楔形文的著作，所以他着手全面翻译由他复制的古波斯文本。1844年，罗林森返回德黑兰，完成了复制古波斯铭文的工作。尽管在悬崖峭壁上抄写要冒不小的风险，但他还是开始了对新埃兰文的文本复制。到这时为止，新埃兰文本已比较容易破译了，因为对内容相同的古波斯文本的破译已取得了很大进步。

更为扎实的工作是由爱尔兰人爱德华·欣克斯（Edward Hincks）和法国人朱尔·奥伯尔（Jules Oppert）于1840年代后期完成的。他们确认并详细阐释了罗林森的成果。欣克斯甚至还首次着手释读阿卡德文，证明阿卡德楔形文包括音节符号和整词符号（代表整个单词的符号）。

罗林森本人于1847年回到贝希斯吞，这次他雇了一个"粗野的库尔德人小男孩"，让他从上方爬下去，悬垂在石壁的表面，以便把凝固纸浆①涂到难于接近的阿卡德铭文上。他将木钉敲进悬崖的裂缝中，以保障"一个可以来回悠荡的座位的安全，这个座位就像是画家的吊篮；在扎牢这个座位之后，他在我的指导下逐一揭下那些纸模"。这些纸模在被解密之后，据说在大英博物馆的地下室中被老鼠吃光了。

罗林森把阿卡德文本与业已破译的古波斯文本加以比较，确定了100多个符号的意思，并译出了200个单词。吸收欣克斯和奥伯尔的成果之后，他很快便扩充了已知的词汇和阿卡德语的语法。

阿卡德楔形文表面上十分混乱，同一个符号可能代表不同的音节和不同的词，这使人产生了很大的疑虑，是对他们的重大挑战。罗林森成果的合理性只是在1857年才最终得到确认。当时，维多利亚时代的博学家和摄影术的先驱威廉·福克斯·塔尔博特（William Fox Talbot）寄给皇家亚洲学会一份新发现的楔形文抄本以及他的译文。这份铭文的原件是霍尔姆兹·拉萨姆在亚述首都阿淑尔期间发掘到的。

亚洲学会将原始文本的抄本分别寄给罗林森、欣克斯和奥伯尔，要求他们对这个文本进行独立翻译。当学会公布所有译文时，人们发现四份译文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

① 一种纸浆和黏胶的混合物——译者注。

蒂芬斯却很相信，他看过洪堡本人描述墨西哥中部这些废墟的文字。

于是，斯蒂芬斯和凯瑟伍德在1839年动身去中美洲的丛林和尤卡坦半岛进行考察。在第一次探险考察中，他们走访了科潘、帕伦克、乌斯马尔，这些地方有马雅古典时期（300 - 900年）的一些最伟大的古建筑。斯蒂芬斯以50美元便实际上买下了科潘的整个遗址。在第二次探险考察过程中，他们于1841 - 1842年走访了为数众多、规模较小的遗址，以及后马雅古典时期的巨大中心——位于尤卡坦岛的奇琴伊察（850 - 1200年）。凯瑟伍德以无比精确与华丽的画笔画下了他见到马雅艺术品。这些绘画同斯蒂芬斯的两本游记《中美洲、恰帕斯及尤卡坦游历纪实》（1841年）和《尤卡坦游历纪实》（1843年）的出版，激发了美国和欧洲读者的想象力，引起了人们对美洲古代废墟的热情，并使这种热情在文学和学术领域持续了下去。

还有一位冒险家，不只是因为向往辉煌的古代世界才出去寻找它们，这就是报纸编辑和外交官伊弗瑞姆·乔治·斯奎尔（Ephraim George Squier）。在50岁那年，斯奎尔到达秘鲁和玻利维亚南部的安第斯山区旅行。此间他考察并拍摄了令人震惊的印加文明和前印加文明的废墟。他用拍摄的照片制作了铜版画，放在他写的游记《秘鲁：在印加土地上的旅行和探索》（1877年出版）里一同出版。这是首次公开发表关于这些城镇和宗教中心——奥兰塔伊坦玻、维拉科卡和萨克塞华曼的神庙、位于皮基拉克塔的瓦里墙的印加大门以及提亚华纳科的前印加城市——的信息。他还记述和描绘了所有印加索桥中最著名的一座，即横越阿普里马克河的索桥。那位跟随斯奎尔队伍的画家不愿从这座可怕的绳索桥上过河，想找个浅滩之处涉水到达对岸。结果斯奎尔再也没有见到他。那位画家显然发现了过河之处，并且脱下衣服想洗个澡。但一阵风袭来，刮走了他的衣服和鞋子，他不得不向当地土著寻求帮助，而土著印第安人被这个裸体的“幽灵”吓着了，他们用石块赶他走并致使他受伤。画家的受伤处几个月才痊愈。



位于洪都拉斯科潘的D石柱及石柱祭坛，弗雷德里克·凯瑟伍德（1799 – 1856年）绘制。他的同伴约翰·勒洛德·斯蒂芬斯写道：“我们吃力地穿越茂密的树林，来到一根方石柱前……正面刻有一个奇装异服的人，它无疑是人像，面容严肃可怖，易于引起恐惧的感觉。背面……以及侧面都刻有象形文字。”从这些浮雕上的文字看，我们目前知道这尊马雅古物是在736年7月26日竖立起来的。

同斯蒂芬斯和凯瑟伍德的著作一样，斯奎尔的《秘鲁：在印加土地上的旅行和探索》一书也是畅销书。但书中内容的准确性是要打些折扣的。这位报人一向追寻有趣的故事，他书中的铜版画夸大了某些废墟的规模。他发表的铜版画中有一幅最为有名，这就是玻利维亚的提亚华纳科太阳门。画面上的门雄伟高大，一位骑在马上的人可以顺利穿过。其

实那扇门几乎不足一个成年人高。

土墩建造者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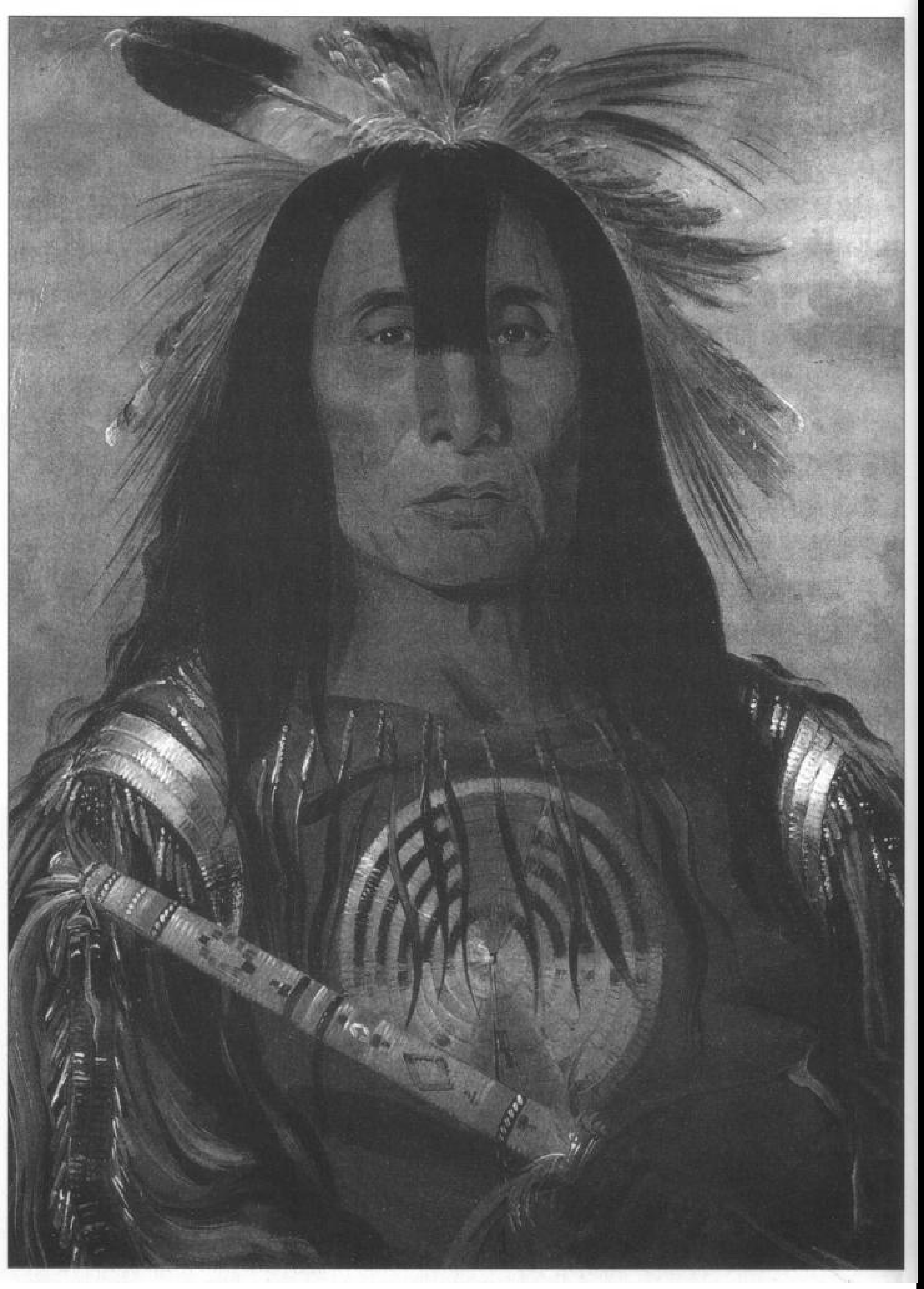
北美尽管没有类似提亚华纳科那种规模的城市或古建筑来吸引画家和旅行者，但毕竟有一些十分神秘的古代遗存。美国中西部有数千个土墩遗址。其中较小的是一些圆锥形的古墓，属于阿得纳和霍普维尔文化，现在已知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00年之间。较大的土墩呈平顶状，是诸如神庙和酋长宫殿之类大型建筑的基础，年代属于晚期密西西比文化传统（700 – 1700年）。

除了在美国西南部保存良好的废墟（如查科峡谷）之外，俄亥俄州的大蛇形土墩和位于密苏里州卡霍吉亚的高达35米（115英尺）的芒克山，都是这块大陆上最动人的考古遗址。但谁是它们的建造者呢？欧洲殖民者的目光很早便注意到中西部的这些土墩，并因此展开过一场所谓“土墩建造者”的争论。这种争论是考古学不能脱离较广泛的社会问题和公众讨论的一个实例。

突破19世纪欧裔美国人的盲目轻信的看法是印第安人有可能建造了这些土墩。倘若印第安人是野蛮的，那他们的祖先就没有必要掌握这种建筑技能。倘若承认印第安人拥有这种技能，那么欧洲殖民者用来为他们夺取印第安人土地所辩护的所谓其道德和心智上的优越性，显然也就没有任何根据了。

从空中俯瞰俄亥俄州的大蛇形土墩。这条伸展开来的“蛇”，长390米（1280英尺），宽6米（20英尺），高1.5米（5英尺），口中叼着一个蛋或一只青蛙。





"血腥部落"的酋长、"公牛"拜克·法特(Buffalo Bull's Back Fat),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1796－1872年)绘制。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一小批像卡特林和瑞士人卡尔·博德默尔(Karl Bodmer)这样的画家,在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被白人无可挽回地破坏之前,同情地刻画出了他们生活的诸多方面。

卡特林生于宾西法尼亚,从事绘画之前学习法律。他绘制的某些印第安人的作品在年代上属于1832至1840年间(对他来说那是异常多产的年份,画了约470幅印第安人的全身像),收于《北美印第安人的风俗》(两卷本,1841年)和《北美绘画选》(1844年)中。其他许多作品收存于史密森学会所属的、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美洲艺术博物馆"中。

自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晚期,这种激烈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一种观点认为,北美印第安人没有建造这些古建筑的智力,他们把这些土墩看作是来自墨西哥的托尔特克人、赶赴墨西哥途中的印度人、威尔斯人或北欧海盗所为,有人甚至认为系沉没于大西洋的亚得兰迪斯岛的逃亡者所为。而持另一种观点的是少部分古物学家,他们确信这些土墩只能是北美印第安人建造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力求开发新的考古技术。

1820年,俄亥俄州的古物学家凯莱布·阿特沃特(Caleb Atwater)第一个对这些土墩进行了有效的调查记录。阿特沃特的描绘虽然十分精确,但他反对土墩出自土著之手。美国体质人类学的先驱塞缪尔·莫顿(Samuel Morton)的工作则有进一步创新的意义。他于1839年首先对土墩中的人类头盖骨加以研究。在

对每个头骨分别做了10种测量之后，莫顿得出结论：土墩的建造者和当代印第安人属于同一种族。为了解释墨西哥文明和不大起眼的北美文化之间的差异，他提出北美印第安人由两个族系构成：一个是包括土墩建造者在内的托尔特克人，一个是蛮族人。

一些年之后，华盛顿特区新成立的史密森学会参与到争论当中，并拨给中西部的两位古物学家——伊弗瑞姆·乔治·斯奎尔和埃德文·汉密尔顿·戴维斯（Edwin Hamilton Davis）一笔资金，资助他们发表对俄亥俄与密西西比河谷的土墩所做全面考察的成果。于是《密西西比河谷的古代遗存》（1848年出版）一书便成了美国考古学的先驱之作。但即使书的作者对他们查勘的遗址进行了十分谨慎的描述，并仔细对比了有关遗址起源的各个看法，但他们的结论仍同阿特沃特的基本相同，即土墩的建造者不可能是北美印第安人。

反对阵营的形成则比较缓慢。早在1813年，J. H. 麦卡洛（McCulloh）便把这些土墩划归到密西西比印第安人的名下，并轻蔑地嘲笑外部起源的思想。亨利·R·斯库克拉夫特（Henry R. Schoolcraft）在其著作《美国印第安人诸部落》中对这一观点表示首肯，他是一位在早期很有影响的研究北美印第安人文化的专家。但同麦卡洛一样，他也在否定他那个时代的传统认识方面过于超前。塞缪尔·黑文（Samuel Haven）认为这些土墩有可能是北美印第安人所为，因为他认为这些土墩并非是什么惊人之举，完全适合他对印第安人能力的判断。

只是在又一代人之后，真相才被基鲁斯·托马斯（Cyrus Thomas）所揭示。他是位考古学家，1881年受雇为美国人种局（The American Bureau of Ethnology）调查这些土墩。经过一番紧张的考察和发掘之后，托马斯在10年时间里逐渐构建起一个无懈可击的有关土墩源于北美印第安人的报告说明。1894年，他的这项报告最终结束了有关土墩建造者的种种神话。

至19世纪晚期为止，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考古学开始在这里形成。某些重大的考古发掘活动在这块大陆不断展开。三个时代的分期体系首次把时间顺序和时间长度的观念注入进来。越来越多的古文物——古代雕像及偶然发现的小型古物——得以出土并在国家博物馆内加以展出。在随后60年里，我们将看到这些成果得到巩固，发掘的范围日益得到扩大，新型分类方法为史前时代提供了详细的年表。当然也有一些挫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考古学实践予以猛烈冲击的第一个政治事件。

第五章　寻找人类的起源（1860 – 1920）

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发表对19世纪的科学界及科学实践予以巨大的冲击。在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的影响也不小，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观念被很快用来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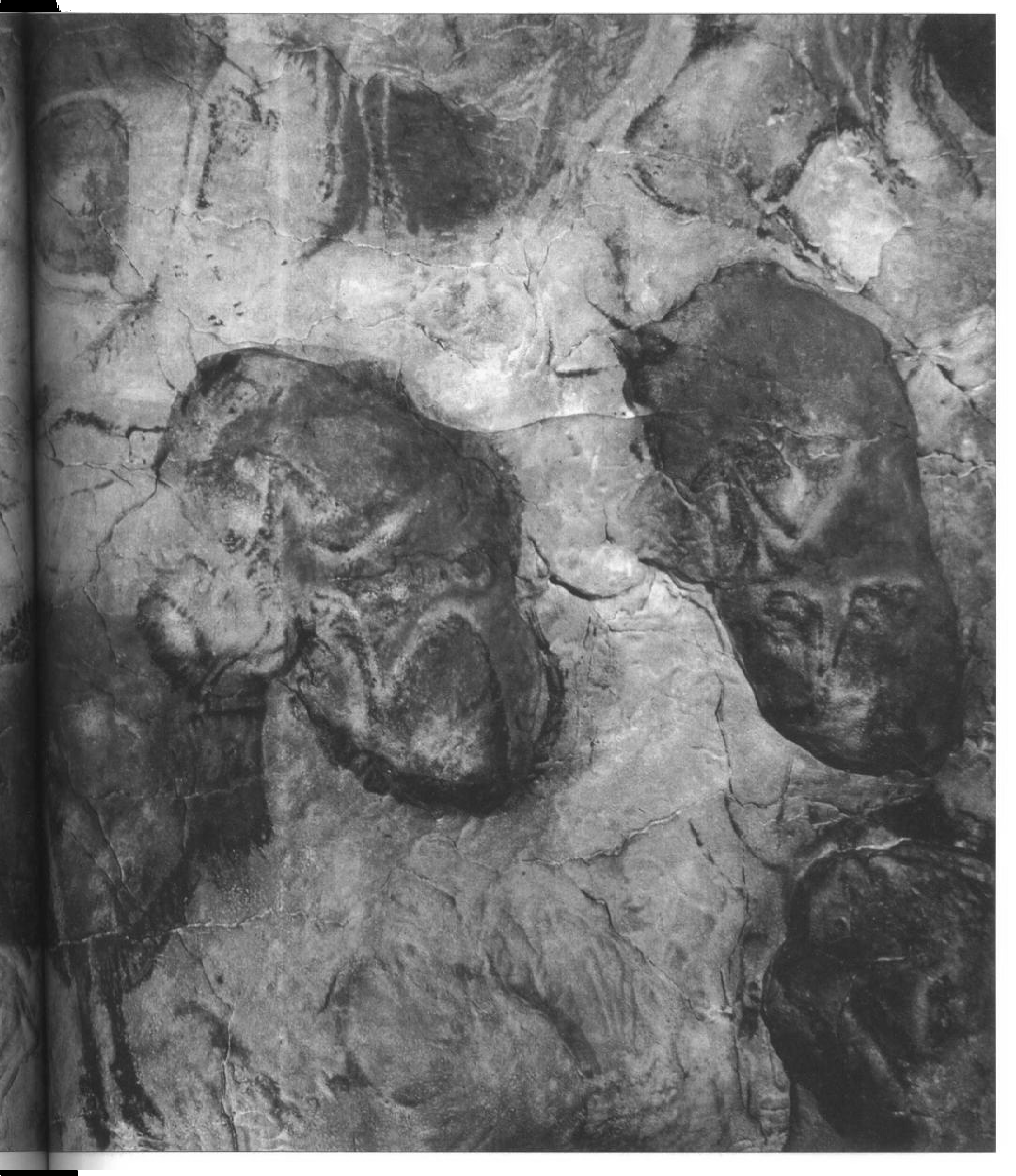


14000年前的山洞顶壁画局部，发现于西班牙北部阿尔塔米拉洞穴，这是首次发现的大冰期时代的绘画。卷毛的野牛有1.5米(5英尺)到1.8米(6英尺)长。

阿尔塔米拉洞顶画是由当地一位地产主马塞利诺·森兹·德·索图奥拉(Marcelino Sanz de Sautuola)于1879年发现的。他的小女儿后来写道："当时她在洞里跑来跑去，四处玩耍"，他的父亲则在地面上挖掘。突然她看到洞顶有些图案和形象。"爸爸，你看，牛！"她喊道。起初，德·索图奥拉笑了一下，但随后他发现图案是用某种脂肪类的东西贴出来的，而不是画上去的。他很快"变得如此激动，以致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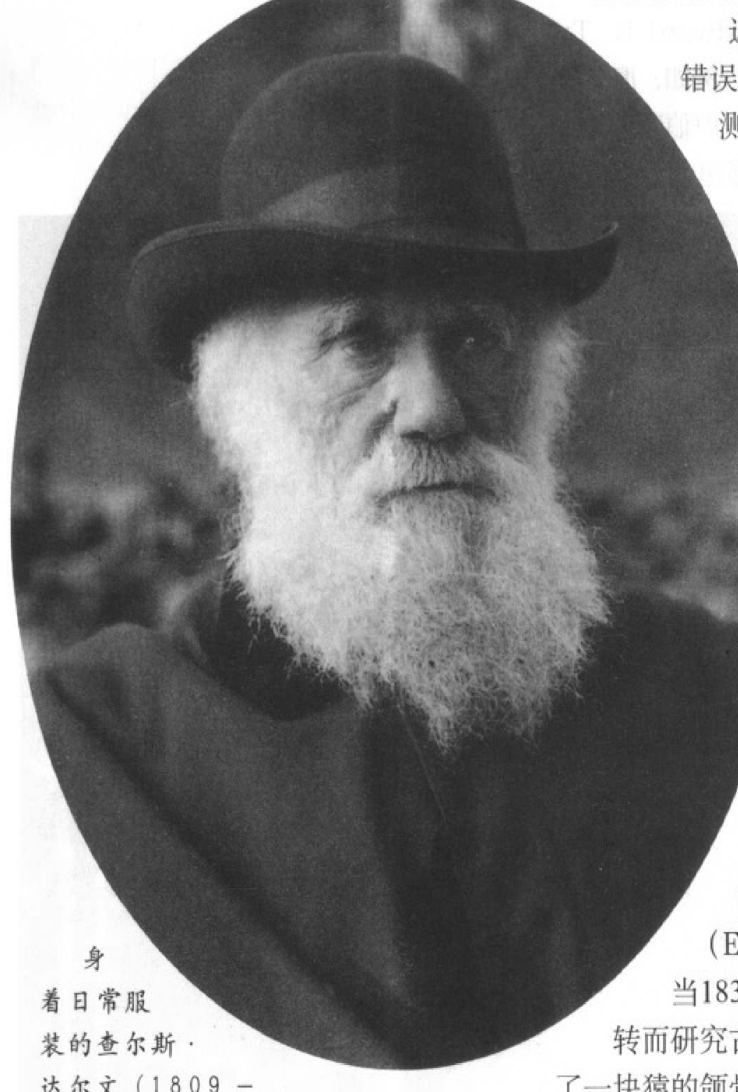
尽管德·索图奥拉在第二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谈及他的发现，但欧洲考古学界有20的年时间拒不承认这些画是古代作品，因为它们画得非常好，是"一个拙劣的画匠开的一个庸俗的玩笑"。索图奥拉的发现遭到拒绝，他的尊严受到伤害，他于1888年去世。

释人类文化的形成。到了 19 世纪末，像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这样的北美人类学家和爱德华·B·泰勒（Edward B. Tylor）这样的英国人类学家，都明确地发展了文化变革的进化理论。例如，摩尔根认为所有社会都循序渐进地经历过蒙昧、野蛮和文明阶段。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爵士在《史前时代》（1865 年）一书中以同样的方式提出：自然选择创造了人类



社会之间的差异，简陋的技术是与智力上的无知相适应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已无可争议地证明这种思想是错误的。社会变化是非常复杂的，远不是某个人所能够预测的。如果说这种进化论的弊病始终未超出学术范围的话，那么它的破坏作用也许是很有限的。但不幸的是它远远超出了学术圈。一个世纪以前，考古学和人类学实际上成了帝国主义的思想支柱：各学科都在力求证明原始社会应被文明社会所取代是一种自然规律。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北美洲，诸如“白人的负担”和“注定的命运”之类概念在过去的研究中，成了受人崇敬的思想欺骗。



身着日常服装的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年），约1880年摄于他在肯特郡的乡间住宅的阳台上。

最早的欧洲人

直到作为分水岭的1859年为止，对遥远过去的调查还只是业余爱好者和乡间绅士们的娱乐活动。但现在，随着专业实践者、既定的调查程序和术语学的出现，这种调查开始变为一门科学。

对这种转变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是法国学者、人类古生物学和史前考古学的奠基人埃杜瓦·拉尔泰(Edouard Lartet)。拉尔泰原本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律师，当1834年间有个农民给了他一颗柱牙象的牙齿后，他才开始转而研究古生物学。仅仅三年之后，他便在法国南部的桑桑发现了一块猿的颌骨化石（Pliopithecus)。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居维叶既否定化石灵长类也否定化石人的存在。而前者的出现使人们联想到了后者。1856年，拉尔泰收到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丰坦（Alfred Fontan）的文职人员的来信，说他发现了一些骨器以及同骨器共存的燧石和动物化石，发现地是法国比利牛斯山区的马萨特洞穴。1859年，他与布歇·德·彼尔特往来书信，确信人类经历过地质学上的远古时代。同托纳尔一样，他对某些动物骨骼化石上的、明显的人为切割痕迹留下了深刻印象。通过实验，即拉尔泰用一把金属锯来锯现代动物的骨头，然后同古代痕迹加以比较，以便观察会有怎样的结果。金属锯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而石刀的作用却与骨痕完全吻合。

1860年秋，我们又看到了极其重要的进步。这年9月，为了验证丰坦在较早些时候的观察，拉尔泰开始了他在马萨特的发掘。他在那里发现了与丰坦看到的同样的工具和动物化石，还发现了一块雕有熊头的骨头。这是第一件在考古发掘条件下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作品。同年10月，在回家的路上，他停下来，挖掘了位于比利牛斯山区的奥瑞纳的岩棚。这个遗址在几年前曾出土过人类的骨骼化石。仅仅几个月之后，两处遗址的情况，包括拉尔泰根据古生物学首次提出的史前时代的分期法——洞熊时代、猛犸和披毛犀时代、驯鹿时代和野牛时代——被公之于世。

不久之后的1862年，一位巴黎的古物爱好者向拉尔泰展示了出自多尔多涅省的莱塞济耶地区的某些填充着角砾岩（粘合在一起的洞穴沉积物）的骨头和加工

过的燧石。认出其中大多是驯鹿骨后，在他的朋友——英国银行家、人种学家和慈善家亨利·克里斯蒂（Henry Christy）的直接帮助与金钱资助下，拉尔泰于1863年8月动身去往莱塞济耶，在那里展开了5个月的发掘会战。当时议定：一半发现物，包括所有单件的古物都将保留在法国，而另一半发现物则交给大英博物馆。发掘成果在《古文物》（1865—1875年出版）一书中加以披露。两人发现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大冰期时代的岩洞避难所，包括勒·莫斯特（"莫斯特人"便得名于此，大约公元前180000-30000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拉·马德林（"马格德林人"因此得名，这是公元前16000-10000年间的西欧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1863年，也是在莱塞济耶地区，农学家及沙托鲁·德·切沃尼的地产主马克斯·保罗·德·维布雷（Marquis Paul de Vibraye）——已于1858年接受了布歇·德·彼尔特的思想——一直在寻找与灭绝的动物同时代的人类的证据。他本人开始在另一个马格德林人的石洞劳格里——巴斯处发掘，时间大概在拉尔泰之前。他同步挖到了有关古人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证据。德·维布雷发现了象牙制品"无羞耻的维纳斯"，即一件自劳格里——巴斯出土的裸体女性的象牙人像。而拉尔泰和克里斯蒂则在1864年5月在拉·马德林遗址发现了一件上面雕有一头猛犸象的猛犸象牙雕刻品。这一灭绝动物的形象可以说是存在古人类的铁证。

拉尔泰在多尔多涅省的工作既是一种寻找活动的顶点，又是一次新的开端。它激起了一股无法抑制的"淘金热"，人们蜂拥而至，开始用鹤嘴锄盗掘洞穴，寻找石器和骨器，特别是那些可以剥离下来的大冰期时代的岩画。人们没有任何有关发现物所在位置或与发现物相关条件的认识，忽略了这些极其重要的因素，挖掘古物时如同挖马铃薯一样。较好的发掘者虽能分出动物和工具类型的粗线条系列，但即使是他们也要依赖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劳动，这些发掘者的无知和野蛮导致发掘过程中的偷窃和欺骗，导致了对发掘记录的忽视。只有拉尔泰和克里斯蒂把少量科学方法和古生物学的技能用到自己的发掘当中，但他们的合作却为时不

雕刻在一块猛犸象牙上的猛犸。埃杜瓦·拉尔泰于1864年在莱塞济耶附近的拉·马德林岩棚发掘时发现。正是这件雕刻品证明人类一度同猛犸并存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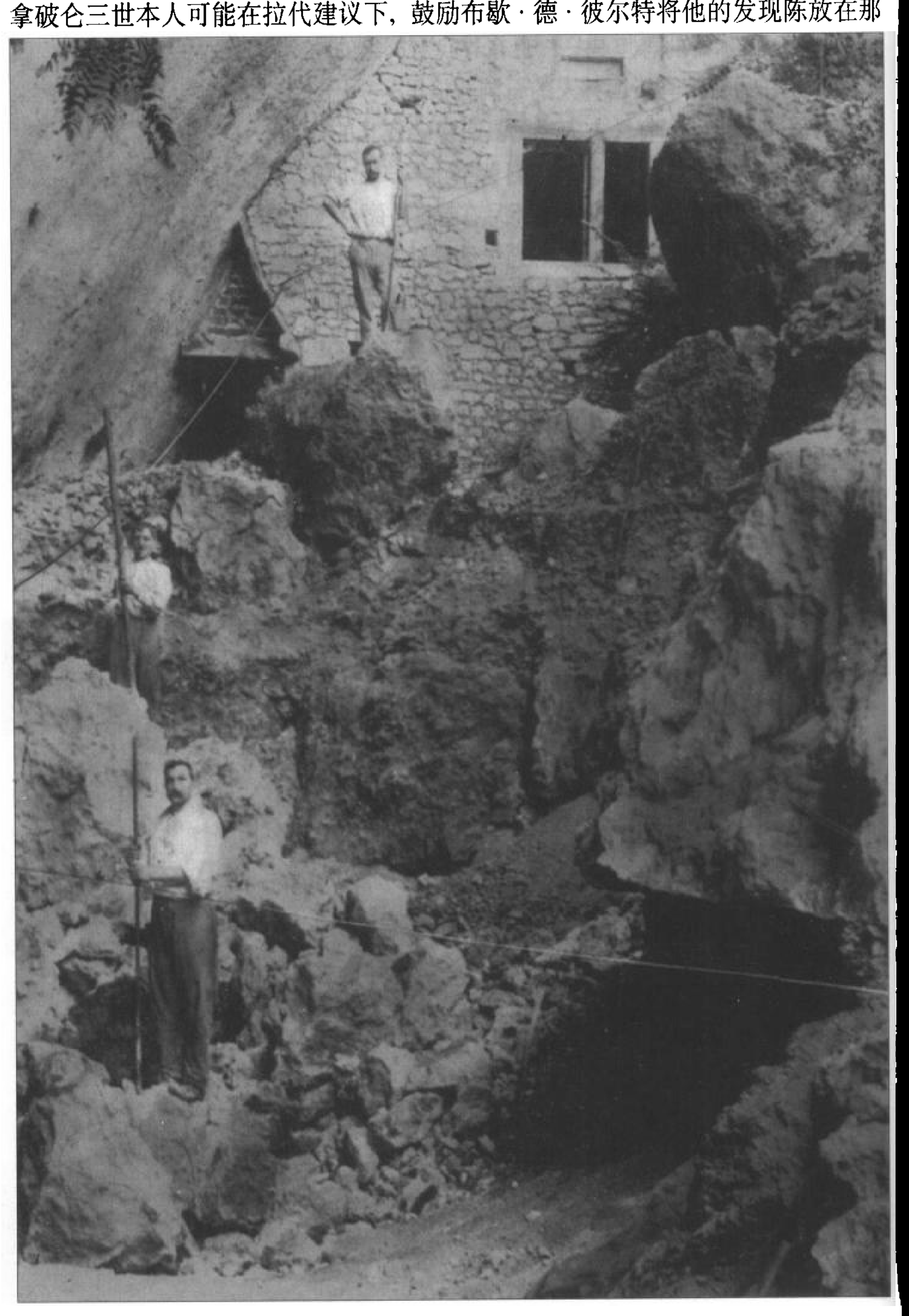
现在已知大约400件具有猛犸形象的旧石器时代的其他作品，包括西班牙、法国和俄国洞壁上的绘画和雕刻，以及骨头、石头、鹿角、象牙雕刻和三维雕刻品。



长。1815年，克里斯蒂在比利时访问时，因在洞穴中得了重感冒而去世。

同年在英国，为一些欧洲王室家族的子女担任教师工作的威廉·彭杰利(William Pengelly)，在肯特郡一个巨大的洞穴中开始了长达15年的发掘。他所做的先驱性工作和十分系统的发掘包括对现场做出规划，细心划出网格，同时模仿波伊克对每块骨头和人工制品的三维位置进行记录，并将在各层次上所发现的古物的数量记载下来。

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为考古学显示出发展方向的国家应该说还是法国。1862年，拿破仑三世开发了位于巴黎正西部的圣杰曼－恩－拉伊的别墅，把它辟为"高卢－罗马博物馆"。6个月之后，这座博物馆扩展为整个国家的古物博物馆。拿破仑三世本人可能在拉代建议下，鼓励布歇·德·彼尔特将他的发现陈放在那



不同时代的岩石。这张手工染色的照片，刻画了奥托·霍瑟尔在多尔多涅莱塞济耶地区的劳基里岩棚中所展开的尚不成熟的发掘。岩棚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发掘时间是1911年。霍瑟尔是位兼具德国人和瑞士人两种血统的古物收藏家，自1898年以来就在这一地区进行发掘，1914年因被怀疑为间谍而逃离该地。

里，并为此在1863年授予他荣誉军团骑士的称号。这座今天依然存在的国家古物博物馆最终于1867年创立。那一年正是巴黎世界博览会开展之年，会上第一次展出了旧石器时代可随身携带的艺术作品。

这一时期，对考古新发现的信息交流——不只让公众知道，而且让其他考古学家也能了解——日益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在1865年召开的第一届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大会上，学者们提出了“古文化人类学”（palaeoethnology）这个概念，用来概括对古代文化的比较研究。同年，约翰·卢伯克爵士的《史前时代》一书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术语替代了“石片石器”和“磨制石器”的提法。第一本专注于史前史研究的期刊《人类实证和哲学历史资料》(Matériaux pour l'histoire positive et philosophique de l'homme）于1864年创刊，起初的文章几乎完全出自加布里尔·德·莫尔蒂耶（Gabriel de Mortillet）一人之手，后来他很快成为史前史的主要编辑和出版家。随后，德国的《人类学档案》杂志也于1865年创刊。

现在，考古发现的密度加大了，频率也加快了。1868年，爱德华·拉尔泰的儿子路易斯·拉尔泰负责对（在铁路采石场）偶然发现的三个男子、一位妇女和一个小孩的骨骸进行处理，这些骨骸埋在莱塞济耶地区的一处叫克洛马农岩棚的地层内，时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这处遗址的名称成了整个现代人的代名词。①

洞穴和岩棚虽然继续吸引着人们的主要注意力，但也有一个明显例外的地方。1866年，历史学家阿德林·阿尔瑟兰（Adrien Arcelin）和地质学家亨利·德·费里（Henry de Ferry）开始在法国中部梭鲁特的一块开阔地上发掘，这里是复杂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一处绝壁的脚下，占地几公顷。它的考古层厚度达10米（33英尺），证明藏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30000 – 10000年）几乎每一阶段的丰富材料。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发现是一层中竟包含数千块马骨，引得拉尔泰、莫尔蒂埃和卢伯克都来到这个遗址参观。梭鲁特的史前人类专长于驱赶野马，他们把马匹圈赶到悬崖下进行屠杀。

随着人类的远古时代得到有效的承认，某些学者的头脑开始转而重构旧石器时代的日常生活图景，把考古证据同早期“蒙昧”民族的民族学材料结合在一起。为了使梭鲁特人为平民大众所知，阿尔瑟兰写了第一本以史前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梭鲁特人或法国中部的猎鹿人》(1872年)。这个努力是值得的，但结局却很不幸，仅用了两页就编造出了一个史前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神话之一，即梭鲁特的猎人常常把野马从断崖顶部赶下摔死。阿尔瑟兰在其论梭鲁特人的学术论文中，从来没有提出这种假想，因为马骨的位置表明，野马必须从断崖顶部飞出100米(330英尺）方能到达遗骨所在的遗址。

1869 – 1872年，德·莫尔蒂耶首次对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做出分类，依据的是出土的石质工具类型而非动物化石。他选择勒·穆斯特和奥瑞纳遗址代表穆斯特时期（约公元前180000–30000年）和奥瑞纳时期（约公元前40000 – 28000年）；选择梭鲁特和拉·马德林遗址代表梭鲁特时期（约公元前19000 – 16000年）和马格德林时期（约公元前16000 – 10000年）。他用后两个阶段替代了拉代的驯鹿时代。德·莫尔蒂耶将这些时代想象为以单线的、循序渐进的方式演化而来，这是一种在这个时期必然会得出来的、基于逻辑而非详细的地层学证据的结论。

圣杰曼–恩–拉伊国家古物博物馆，1867年创立。门上的说明为：“第四纪的沉积物。加工过的燧石同属于已灭绝物种的动物骨骸一道出土。”



① 这只是西方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的看法，克洛马农人实际只是晚期智人的一种类型——译者注。



亨利·步日耶（1877－1961年），天才的画家，尤擅长画动物形象。只是洞穴艺术于1902年被证明属实的时候，步日耶才在史前史领域展开了积极活动。他于同年在阿尔塔米拉洞穴中，借助闪烁不定的烛光，平躺在装满蕨草的麻袋上，尽管蜡珠不断滴落在他的衣服上，他还是临摹了那里的壁顶画。不久之后他又到多尔多涅的洞穴和岩棚中进行复制工作。

按现代标准，他的工作方法是很原始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步日耶的坚韧换来了丰硕的成果。

这首先要求的是耐力。他在一个小男孩的帮助下，将画纸直接铺在洞壁上，以便能够将纸下面的线条用蜡笔或铅笔直接描出来。光亮是用碳化物制成的火把提供的，通常由其他助手举着它们。

步日耶在几个小时里全神贯注，几乎一言不发，如果一个孩子因抽筋或疲劳而引起光线摇曳或画纸滑动，性情急躁的他就很可能会狠狠打他一巴掌。只有在必要的时候，他才调整一下自己“那盏人体枝状烛台”的四肢。

在19世纪60至70年代，我们看到发掘洞穴的活动和随后进行的日益富有想象力的研究，在整个欧洲十分活跃。例如在比利时，地质学家杜邦（Dupont）开始研究食肉动物对骨头造成的创伤同人类宰杀留下的痕迹以及骨裂之间的差异。在瑞士，首次发现属于中欧旧石器时代可随身携带的美术作品（1874年），当时有位年轻的教师康拉德·默克（Konrad Merk），在凯斯勒洛克·贝·泰恩根的马格德林时期的洞穴中，发现了一头驯鹿形象的雕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对史前古代的新兴趣导致了人类学和史前史学会的建立。在这两个国家，就像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越来越多的业余考古家开始在洞穴中发掘。

在极少数从一开始便明确承认阿尔塔米拉洞穴画为史前人类作品的学者当中，其中就有伟大的法国史前史家爱德华·皮耶特（Edouard Piette）。他是一位行政长官和地质学家，是沿比利牛斯山进行系列发掘的先驱人物。在诸如布拉塞普、高丹、劳代和勒·马斯德·阿齐尔之类遗址中，不仅出土大量属旧石器时代的、无可比拟的小型艺术品和工具，而且还使皮耶特得出了有关大冰期时代晚期的考古文化具有连续性的结论。尽管他的研究耗尽了他的金钱，皮耶特还是把他收集的古物捐赠给圣杰曼的国家古物博物馆。他处于他那个时代的前列，保留了大量动物化石，但使博物馆部分接受它们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他的思想非常开放，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激进看法，如从半家养的动物——受到人类严密控制但尚未达到家养状态——到植物栽培和原始文字阶段的思想。

无论如何，皮耶特对史前史的最为不朽的贡献是：填补了存在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之间明显的空白。1866年，爱尔兰考古学家霍德·威斯特罗普（Hodder Westropp）已提出了一个“中石器时代”阶段的设想，但在他看来，这个阶段包括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艺术时代，以及丹麦的贝丘文化。正是皮埃特，在19世纪80－90年代发掘勒·马斯德·阿齐尔的旧石器时代巨大的洞穴隧道时，确认存在着真正的过渡阶段，如“阿齐尔”阶段（约公元前9000－8000年），特点是有彩绘鹅卵石和小型鱼叉。其他较晚后的手工制品最终都以它们发现地的名字命名。

后人也会永远感激皮耶特，因为在1897年，他促使一个年轻的法国牧师亨利·步日耶（Henri Breuil）去研究旧石器时代的艺术。步日耶为皮耶特的各种发现物进行绘画的天赋很快引起卡尔达伊拉（Cartailhac）的注意，由于卡尔达伊拉的缘故，他开始研究新近得到证实的拉·摩特和阿尔塔米拉的洞穴艺术。据步日耶个人的计算，他为临摹洞穴壁画而在地下度过了700多天。从那时起直到他漫长生涯的终结，依靠其人格上的力量和他的治学成果，他不仅主导着旧石器时代的艺术领域，而且成为整个史前史研究领域的带头人。正因为如此，他有时被称作“史前史的教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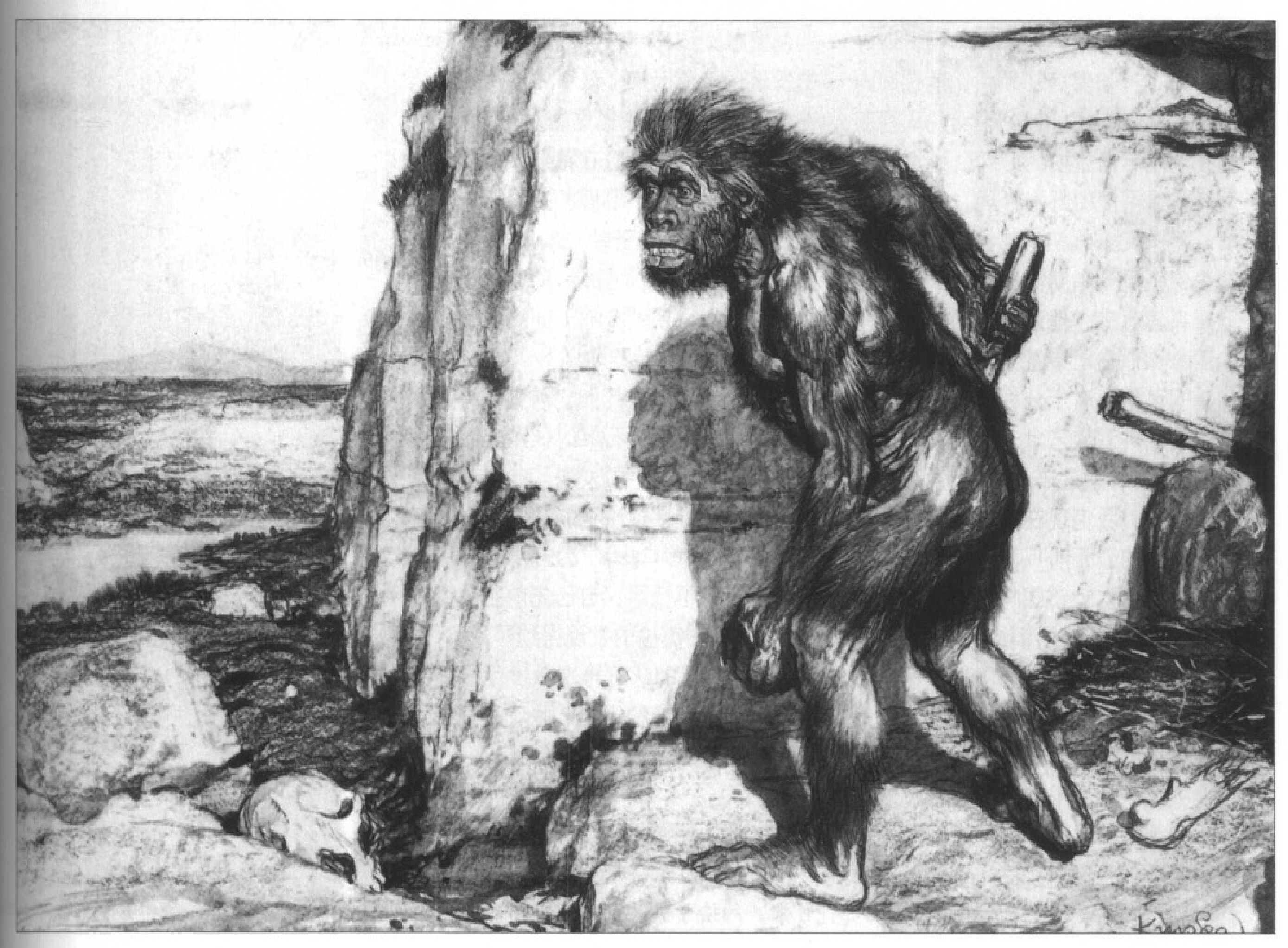
步日耶的盛名既来自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也来自他对石制工具的分类。1912年，他成功地从所谓“巴塔伊尔的奥瑞纳时期”走出来，确立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各个文化的正确序列，特别是证明梭鲁特文化应当放在奥瑞纳文化之后和马格德林文化的前面。虽然反对他的人甚至求诸欺骗手法以获得支持，但杜邦于比利时的工作早在30年前便已证实了这个划法的正确性。所以步日耶最终能发表一份伟大的综合性报告，改进、完善了莫尔蒂耶的模式，即提出西欧旧石器时代的每个

阶段应根据不同特点的工具类型来确定。这种方法在今天仍然是普遍适用的。

在1900年之前10年间，欧洲史前史研究正变得越发活跃。德·莫尔蒂耶本人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因其思想的固执以及激烈的反教权态度而继续受到消极影响，这是因他幼时在耶稣会学校蒙受的痛苦所引起的。他否定阿尔塔米拉洞穴艺术，并进而拒绝洞穴艺术研究达20年之久。他还否定所有关于旧石器时代墓葬的说法，宣称宗教——因此也就是葬俗——乃是新石器时代的发明。但他的影响力在日渐衰减。埃米尔·卡尔达伊拉（下一代的主要史前史家）起先接受了德·莫尔蒂耶的偏见，但到了1902年，他改变了自己关于墓葬与洞穴艺术的观点。1890年，卡尔达伊拉在图卢兹首次开设史前考古学的课程。至1906年，他为学生开设了正式的史前考古课程。在同一时期的慕尼黑大学，继加拿大的丹尼尔·威尔森之后的一代人时间，约翰内斯·兰克（Johannes Ranke）成为德国的第一位人类学教授。

尽管法国史前史家古斯塔夫·肖韦（Gustave Chauvet）早在1887年便提出史前艺术具有神秘的动机——对雕刻形象加以伤害意在伤害真正的动物，便于携带的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作品起初仅仅是为了装饰，即“为艺术而艺术”。然而，随着洞穴艺术在欧洲得到确认，以及对澳大利亚土著艺术的认识日益加深，更为复杂的解释开始出现。有一种非常有影响的观点是，史前艺术代表某种关于狩猎的感应巫术。这种观点是由国家古物博物馆馆长索罗门·雷纳克（Salomon Reinach）于1903年提出来的。由于步日耶的影响，这种观点在几十年里支配了

自圣徒教堂洞穴出土的尼安德特人，由库普卡于1909年绘。所附说明为：这是在解剖学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第一次复原出完整的尼安德特人形象。他长相原始，形如野兽，不能完全直立，像头大猩猩，这幅画传达了布尔关于尼安德特人非常原始低劣的观点。



史前艺术的研究。

洞穴艺术一旦得到人们承认，在法国南部的这类发现便越发多了起来，如在尼奥克斯（1906年）、在图克·奥多伯克（1912年）、在莱斯·特洛依斯·弗莱勒斯（1914年）的新发现。西班牙北部的情况与此相同。在那里，与卡尔达伊拉、步日耶在阿尔塔米拉一道工作过的史前史家赫尔米里奥·阿尔卡德·德尔·里奥（Hermilio Alcalde del Rio），发现了一大批洞穴艺术作品，如在埃尔·卡斯提

阿尔塔米拉与洞穴艺术的发现

马尔凯里诺·森兹·德·索图奥拉先生（Don Marcelino Sanz de Sautuola，1831－1888年）是西班牙北部桑坦德省的一位贵族地产主。他在中年时成了一个著名的古物收藏家。在1878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他对展出的旧石器时代的便携艺术品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返回西班牙之后，便开始亲自对一些遗址（如埃尔潘多）进行挖掘。

1879年，他重返阿尔塔米拉洞穴，因为几年前他曾注意到那个洞穴壁上有黑色的绘画标记。这年11月，为寻找史前工具和便携艺术品，他在洞内从地面向下挖掘，他的小女儿玛利亚则在洞里尽情玩耍。突然间，她看到洞顶有一幅很大的野牛彩画。

她的父亲起初不信，待到他发现图像似乎是用脂肪糊画出来的，他变得感兴趣起来。他还注意到这些巨大的图像和他在巴黎看到的便携式艺术品之间风格上有十分相似之处。他于是推测这种洞穴艺术一定和它们属于相同的时代。就这一点而言，索图奥拉是正确的。我们现在知道阿尔塔米拉绘画属于约公元前17000－12000年之间。不幸的是，他试图与学术机构交流他的发现，但却遭到拒绝，并被指责为幼稚甚至有意欺骗。在1880年于里斯本召开的国际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大会上，他的意见被法国史前史的学术带头人埃米尔·卡尔达伊拉轻蔑地否定，因为他曾受到激烈反对教权论的莫尔蒂耶的告诫：反进化论的西班牙耶稣会成员将要让史前史家们看上去非常愚蠢。德·索图奥拉，这位大失所望和不幸的人，于1888年不幸早亡。

在19世纪60至70年代，某些法国洞穴壁画也被人们注意到了。但它们成画的时间和意义却依然不为人所知。只是到了1895年，人们才对洞穴艺术有了真正的理解。当时，即在清除多尔多涅省拉穆特洞穴中的那些内含旧石器时代材料的沉积物时，人们挖出了一批从不知晓的、显然是很古老的洞壁雕刻作品。法国的其他洞穴中的发现也接踵而来，最引人注目的是在1901年于莱斯康巴里勒洞和芳特·德·哥姆洞中的发现。在莱斯康巴里勒洞里，马、牛、熊、驯鹿和猛犸形象是雕刻上去的，而在芳特·德·哥姆洞里则是绘画。现在我们知道，所有这些洞穴都属于大冰期的末期，即约公元前16000－10000年之间。

到了1902年，欧洲史前史学界已正式接受和确认旧石器时代洞穴艺术的存在。卡尔达伊拉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一个怀疑论者的忏悔》（Mea culpa d'un sceptique），公开承认（尽管多少有点不情愿）自己先前犯了错误，德·索图奥拉的发现得到了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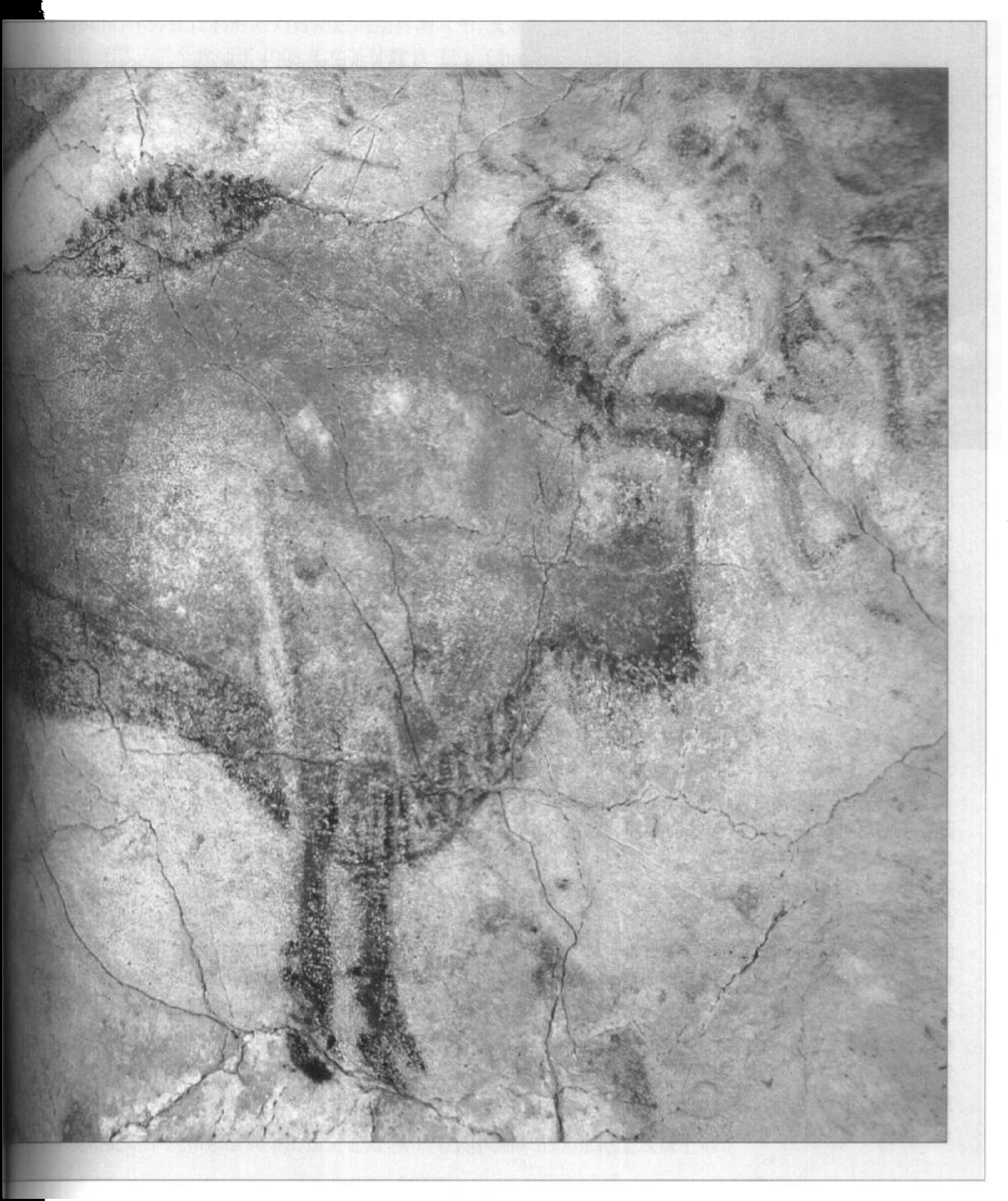
学术界的认可再次激发了一股"淘金热"，大量的洞穴艺术作品相继被发现。



右图：阿尔塔米拉洞穴中的野牛形象。约绘于公元前12000年。

科瓦拉纳斯、品达尔等洞穴中。他还首次将德·莫尔蒂埃以法国人工制品为础的分类方法用于在坎塔布里亚的发现上。

1909年，摩纳哥国王阿尔伯特一世参观了坎塔布里亚的洞穴，陪同他的有步耶和雨果·奥伯迈尔（Hugo Obermaier）。后者是移居国外的德国牧师，后来了马德里的第一位史前史教授。洞穴参观给阿尔伯特一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以至他出资在巴黎建立了一个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该所于第二年展开工作，



第一任所长是马塞兰·布勒（Marcellin Boule），重点发掘了埃尔·卡斯提洛洞穴的人口处。结果发现了一个深达18米（59英尺）且考古层次完整的文化层，年代范围从阿齐尔文化到最后一次大冰期的结束。这一完整的系列对步日耶构建颇

皮尔当人的骗局



上图：“皮尔当人”，约翰·库克绘制。查尔斯·道森，这位有可能是造假者的人，站在右起第二人的位置上。穿白大褂的是亚瑟·基斯，他在解剖学家格拉夫顿·艾略特·史密斯的指导下，正在测量头盖骨。史密斯站在基斯身后。像框里的查尔斯·达尔文正俯视着这个场面。

在考古学史上的许多臭名昭著的伪造事件中，皮尔当人骗局总是颇为引人注目的。1912至1915年，在英国南部皮尔当的砾石表层工作区内发现的人骨化石，据说是一个完整的“缺漏环节”，即“曙人”的化石，被视为介于达尔文所推测的人猿之间的化石。

皮尔当化石的基本特征是具有人的头骨、猿的颌骨。苏塞克斯郡的律师、地质学家和古物学家查尔斯·道森（Charles Dawson）宣称，两个工人交给了他一块头骨，时间是1908年，这是他们在采挖砾石时碰碎的一个“椰壳”的一部分。1911年，道森发现了更多的碎片，同时出土的还有碎石工具和史前动物的遗骸。此事引起了大英博物馆的注意。1912年，博物馆组织的发掘挖出了一块颌骨，看来是同那块头骨连在一起的。第二年，年轻的耶稣会教士泰亚尔·德·夏尔丹（Teilhard de Chardin）发现了一颗犬齿。1915年则又出土了另一个头盖骨的残片。道森本人于1916年去世。

只是到了1953年，皮尔当人头骨才被证明是一件伪造物。人们在对骨骸进行了化学分析之后发现，头盖骨与颌骨分属于不同的年代；头盖骨虽然证明是人骨，但其存在时间不过600年左右。而对颌骨的缜密核查则表明，那只是一头现代雌猩猩的颌骨，它的牙齿被马马虎虎锉低了一些，看上去就好像是人牙一样。并且所谓那些皮尔当人的骨头还被染上了化学染料，犬齿也是被燃料涂抹过的。

这个骗局一度十分有效，复原图简直多如牛毛，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考古文献曾广泛引用了这个头盖骨。然而，这一骗局恐怕并非出自解剖学专家之手，一些拙劣的伪造之处说明它完全系业余骗子所为。它之所以能长期蒙蔽人，主要是因为人们在科学方面的痴迷。在一个强权政治的时代，这似乎是英国期待已久的有关“化石人”的发现，如同雄鸡报晓一般。因为在那之前，化石人仅出土于欧洲大陆，这很令人沮丧，而且就在近些时候，即1908年，在德国发现了古代摩尔人〔海德堡人）的颌骨。当所谓皮尔当人被初次发现时，道森曾大叫道：“海德堡人有什么了不起！”

造伪的人，或者是某个对皮尔当人表示怀疑的什么人，其目的可能在于嘲弄那种潮水般的喧嚣（向“最早的英国人”致敬），于是将骨头加以粗制滥造，对皮尔当遗址恶作剧一番。可是这竟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围绕到底是一个造伪者还是多个造伪者的争论仍在无止无休地进行，甚至不着边际地扯上了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的遗址以及推理侦破手段的开创者亚瑟·柯南道尔爵士（Arthur Conan Doyle），新近又牵连上了解剖学家亚瑟·基斯（Arthur Keith）爵士。无论如何，最简单的解释应该是：查尔斯·道森就是那个造伪人。他通过一些耸人听闻的发现，反复制造轰动效应。1909年，他甚至在一封信中写道：他正“等待着似乎是前所未有的大发现”。在他于苏塞克斯郡发现的其他古物当中，有一些罗马人的砖瓦，据说是公元4世纪晚期重修萨克森海岸要塞的防御工事时留下的遗物。但后来的分析证实，这些砖瓦也是一些现代伪造物。因而，道森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奇怪的造假者，并且是独自作伪的人。

有影响的旧石器时代石质工具的分期大有帮助。由奥伯迈尔进行的这次发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结束。

在整个欧洲，进化论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已明显可见。先是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1863年）一书的出版，随后是达尔文本人的著作《人类的起源》（1871年）的问世，达尔文主义被明确地用于解释人类自身。同时，早期人类的遗存也在不断出土。1885 - 1886年，一位叫马西尔·德·普德特（Marcel De Puydt）的律师在比利时的列日附近的斯拜洞穴中，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的葬地。在法国西南部，三个牧师于1908年在圣徒教堂（La Chapelle-aux-Saints）的洞穴中发现了一具尼安德特人的骨骼化石。他们很机敏地避开了反教权的德·莫尔蒂耶学派，将化石送给布勒研究。布勒并不认为尼安德特人可能是现代人的祖先，他发现关节炎的病造成了这个老人骨骼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为所有尼安德特人所共有。这个观点成了几十年里颇为流行的看法。

在法国南部，博物学家和解剖学家亨利·马丁（Henri Martin）也于此时展开了先驱性的发掘工作。他在1906至1936年间发掘了夏朗德省拉奎纳的穆斯特遗址。他对自己发现的骨骼化石格外注意，分辨出不同的物种，对各个残片做出精细的分析。他与同代的大多数人不同，并不抛弃动物的骨骸，而是力求发现动物和人类在骨骸上留下的不同痕迹，研究史前猎人在肢解猎物时切割或砸断动物四肢的方式。这种做法表明，史前史的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严谨的阶段。

东欧的古代人类

有关大冰期期间中欧和东欧存在生命的思想，基本上是从西方、尤其是从法国传过来的。由于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气候，这些地区的史前考古很早就形成了某些独有的特点。中欧和东欧各国封建制和绝对君主制的衰落、民族主义和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的兴起要晚后于西欧，而这种趋向是近代考古学发展的基本条件。再者，中欧人和东欧人始终没有一项在全球探险和殖民的计划，而这项计划是使他们与部落民族接触并发展其对史前社会认识的重要因素。

中欧和东欧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开展也受到地形地貌的影响。在广阔的东欧大平原之上缺乏洞穴，这使调查者在寻找深埋在地下不同堆积层中的早期遗存时，很难识别出合适的发掘地点。考古学家在旷野上遇到过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通常因猛犸骨的大量堆积而发现它们，但这些遗址一般缺少很深的文化堆积层，无法提供一个长时期的编年系列。

中欧许多地区也在旷野中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同时这些地区还有为数众多的洞穴。早期的考古学家们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洞穴的吸引。早在1867年，金德里奇·翁克尔（Jindrich Wankel）就曾报道说，在位于摩拉维亚石灰岩地区的布尔诺附近，有一个拜基斯卡拉洞穴，那里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人工制品。1873年，康德·简·扎维斯查（Count Jan Zawisza）开始发掘马姆托瓦洞，该洞坐落在波兰南部克拉科夫附近的克鲁兹沃达河岸上。翁克尔和其他人开始发掘摩尔维亚东北部的普列德莫斯提则是在1880年以前，他们在田野上找到了第一处遗址。普列德莫斯提是中欧和东欧典型的田野遗址，掩埋在随风而来的大量泥土或黄土堆



积层中。发掘证明这里曾经是一处很大的住地，有灶台和地窖。其文化层中出土了大量石制工具和可携带的工艺品，其中包括一件猛犸象牙雕刻。1894年，发现了一座令人惊异的合葬墓，上面覆盖着猛犸象骨，里面葬有18具石器时代居民的遗骨。

僻处一隅的俄国很快便认识到了田野遗址的意义。在那里，洞穴主要局限于喀尔巴阡山和克里米亚地区。首次发现是在1871年，在遥远的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市建造一座军队医院时，人们发现了一些石制工具，同时还发现了用猛犸牙齿制作的人工制品，以及大冰期时代一些动物的遗骸。伊万·德曼特耶维奇·切尔斯基（Ivan Dement'evich Cherskii）通报了这些发现，他是第一位识别出石制工具在骨骼化石上留下切割痕迹的俄国人。

在俄国的欧洲部分，猛犸象的遗骸也提示人们发现了第一处田野遗址。1873年，在第聂伯河一条支流边的高兹村，出土了灶台和燧石工具残片。4年后，在奥卡河边的卡拉查洛沃又发现了石制工具。俄国考古学的带头人孔特·阿列克塞·谢尔格叶维奇·乌瓦罗夫（Count Aleksei Sergeevich Uvarov）考察了卡拉查洛沃遗址。他曾同自己的妻子一道于1869年在莫斯科创立了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以便同10年前政府下令在圣彼得堡建立的皇家考古委员会相竞争。苏联以及沙皇统治期间的俄国考古史，主要内容是基于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剧烈争逐。在这种竞争中，因为当时孔德丝·乌瓦洛娃与沙皇关系很好，所以莫斯科考古学家一度取得了早期的胜利，控制了考古发掘许可证的发放权。

在1879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这段时间里，为数众多的其他遗址受到了调查。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即顿河流域的科斯提昂基出土了石制工具（1879年）。在奥地利多瑙河畔的威尔兰多夫也发现了石器（1884年）。两地在这个世纪均成为著名的石器时代的田野遗址。在威尔兰多夫，发掘出了一系列处于最后一次冰期鼎盛阶段的石器，同时出土的还有驯鹿和猛犸象的骨骼化石。在1908年发现的便携式工艺品当中，有一个体态肥硕的著名小雕像，涂着红赭色，人称威尔兰多夫的维纳斯像。在匈牙利东北部布克山中也展开了洞穴发掘工作，但那里出土的古物因这一时期西欧考古学的发展而黯然失色。

一个名叫维根提·弗亚切斯拉维奇·克沃依卡的捷克啤酒商和业余考古家，于1893至1902年间，在一座能够俯瞰穿越基辅城的第聂伯河的悬崖上，找到了一处露天遗址，于是开始了对旧石器时代遗址的首次大规模发掘。克沃依卡挖掘的范围有7500平方米（1.8公顷）左右，挖出了大约4座用猛犸象骨搭建的住屋，但他的发掘技术极为原始，以致没有辨认出这些住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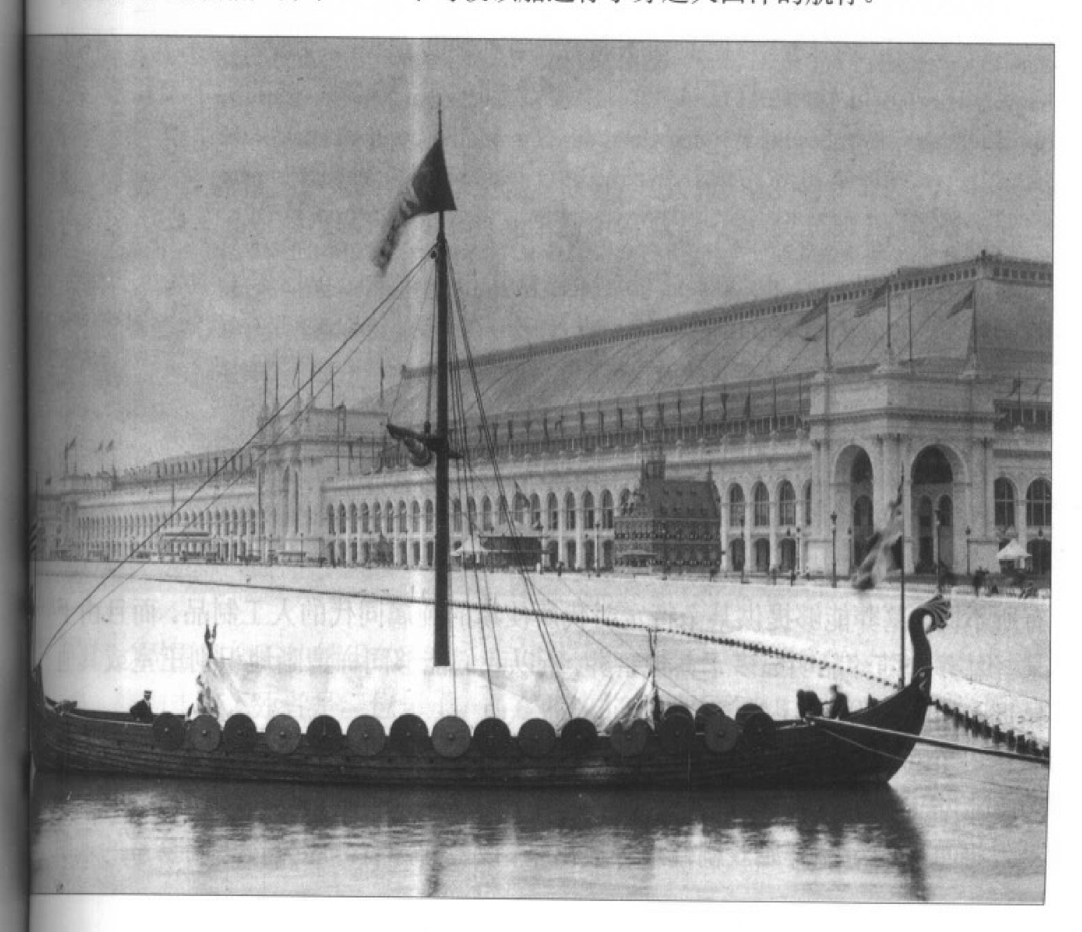
对公众想象的吸引力

在19世纪后期，无论是在东欧还是在西欧，一些主要的考古博物馆脱颖而出，其中包括美因兹的德国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1852年，RömischGermanisches Zentralmuseum）、维也纳的自然史博物馆考古部（1882年）、柏林的人类文化学博物馆（Museum für Völkerkunde）。在俄国，同样的机构也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城市建立起来。后来在这个帝国的势力范围内，如在波兰的华沙和罗兹，也出现了博物馆。尽管总的说来，这种发展是由于民族自豪感以及国民教育进步的推动，但博物馆的成立可能还有赖于汤姆森

和沃尔赛在丹麦首先创立的更为系统的陈列展品的方式。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本身，随着公众认识对考古学在揭示过去生活方面的作用日益加深，一些显然保存完好的史前遗存现在被挖了出来。在这里，对发掘制定标准的工作也远远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面。1871到1875年，在日德兰半岛东部博鲁埃什的青铜时代的墓冢中，出土了两具用大树干制作的、公元前14世纪的棺材，内有一具青年男子和一具老年女子的尸体，同时出土的还有男女服装，包括裙子、头网和内衣。那位男子的棺材被打开了，发掘者告诉沃索说："在大群围观者面前，我看到了棺内保存极好的骨架，他穿一件束腰外衣，扎着一条带有一枚完好无损的木扣的皮带（已腐烂）。在他弯曲的左臂上，架着一个装饰精美的木质剑鞘。"这些古物的发现是因为它们浸泡在水里而被意外地保存下来的，人们现在到丹麦国家博物馆里仍能看到它们。

一些年之后，在挪威奥斯陆峡湾的奥斯伯格附近，有一处叫露沃·戈克斯塔德农场的地方，也出土了具有同样戏剧性的遗存。据人们传说，这里的一座大土墩里葬着一位国王，里边还有大量的殉葬宝物。1880年，当地人开始挖掘这座土墩，希望能找到墓中的财富。他们挖出的东西虽然没有很大的商业价值，但对考古学的价值却是无可估量的。他们挖出一条属于公元9世纪的一条北欧人的船只，长度超过23米（75英尺），几乎毫发未损地静卧在青紫色的粘土层上。粘土挡住了水分，在近千年时间里避免了船体木料的腐烂。在这条船的中央立着一间木头搭建的墓室，室内有一具北欧人首领的骨架摆放在一张床上，骨架旁边陈放着一堆死者最喜爱的服装。所有戈克斯塔德木船上的装备都幸存了下来，其中包括桅杆、船用圆材、绳索、龙骨墩、踏板和16对船桨。为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400周年，人们照原样精确复制了这条船，并于1893年驾驶该船进行了穿越大西洋的航行。



左图：在捷克共和国普列德莫斯提出土的一个猛犸象牙，上面粗略地雕有一位妇女的形象。那里发现了约1000头以上披毛猛犸象的骨骸，该遗址早在16世纪便为人知晓，被证明埋有丰富的骨骸和象牙工具以及垂饰和便携工艺品。

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的戈克斯塔德古船（属9世纪）的复制品。

为了取悦美国的挪威人社会，这艘"北欧人"号船是戈克斯塔德船的一比一的橡木复制品，并进行了横越大西洋直抵芝加哥的航行。此举旨在证明早在哥伦布之前，挪威人已有可能乘一条帆船到达美洲。

"北欧人"号由马格努斯·安德森指挥，于1893年4月30日离开卑尔根，上有12名水手，装载了1000瓶啤酒。航行当中经常遇到风暴，多亏船体吃水很浅，船身非常灵活，航速在正常情况下保持了10节或更高一些的速度。

安德森记录下"舱底和龙骨随着这条船的摆动而摆动，在凶猛的顶头浪中，龙骨上下颤动达四分之三英寸之多。但令人惊异的是，船体始终浑然一体，滴水不透。这条船的柔韧性也明显地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舷缘会扭弯达6英寸仍安然无恙"。

这一年的5月27日，在奇迹般的航行了28天之后，这条船安全抵达纽芬兰，并在1893年的世界博览会上成了万人瞩目的对象。船上的全体乘员后来以更传统的方式返回了挪威，"北欧人"号船本身则安放在芝加哥动物园里继续展出。

英国的湿地地带也吸引了考古学家们的注意。在英国西南部萨默塞特的格拉斯通伯里和米勒发现的公元前1世纪的湖上村庄，对公众想象力的冲击尤为明显。这些遗址是由一位当地医生阿瑟·布利德（Arthur Bulleid）在1892年到1938年期间发掘出来的，它们成了许多民众赖以想象铁器时代英国先民生活状况的基础。

探索新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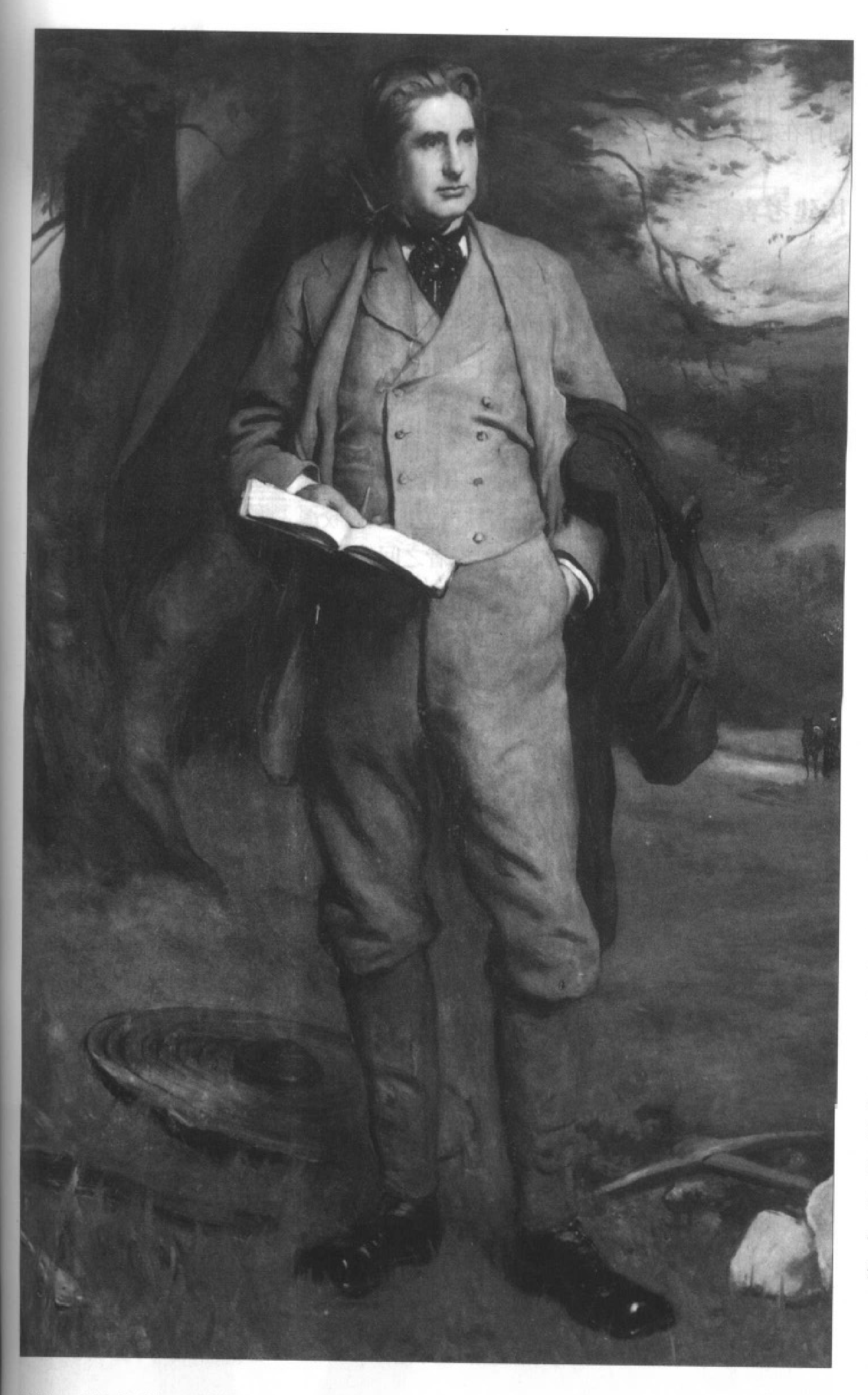
在19世纪最后25年和20世纪头25年间发生了考古学专业化的过程，其标志是对事物的"先后联系"（作为考古学重要的信息来源）有了日益深入的理解。尽管小心遵循了该时代的标准，但布利德的发掘并不符合较他年长的同代人奥古斯都·亨利·兰·弗克斯·皮特-里弗斯（Augustus Henry Lane Fox Pitt-Rivers）确立的新的专业化标准。

皮特-里弗斯早年是英国军队中的一名军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表现积极，被提升为少将。他对考古学的兴趣始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他驻防在爱尔兰。但在他于1880年继承多塞特郡克兰伯恩切斯的里弗斯大地产之前，并没有从事考古发掘的机会。财富使他摆脱了军事生涯，他把自己人生的最后20年奉献给了考古学——勘查了个人地产上的史前时代和罗马时代的遗址，制定出严格的发掘与记录的新方法。皮特-里弗斯把军事素养应用于他做的每一件事，他特别强调"普通器物"和"细微末节"对定年和解释考古遗址的重要性。他的成果发表在由他个人印制的4卷本豪华版《在克兰伯恩切斯的发掘》一书，该书出版于1887和1898年之间。

虽然皮特-里弗斯的田野发掘工作是极为少见的，但他对其他人的影响却因个人的怪僻和出名的严苛而受到限制。英国以外的人对他仍旧一无所知，尽管此时欧洲大陆上的人们也日益认识到这一点，即如果要编制可靠的史前史年表，就必须对发现物的前后联系进行认真的记录。例如，在塞尔维亚，米洛奇·瓦西奇（Miloje Vasić）于1908年至1912年间发掘了位于贝尔格莱德附近的文卡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他分离出了每一垃圾层中的发现物，并将构成这座土丘的各个时期的建筑遗物区别开来。文卡遗址的时序很快被确认为整个巴尔干半岛考古编年的标尺，无论是我们熟知的巴尔干南部地区和希腊的文化，还是中欧地区的文化，都能通过这一标准被联系在一起。瓦西奇也强调文卡遗址同爱琴海域的青铜时代的联系，甚至把文卡看作是爱琴文明延伸至最北端的体现。

在过去，墓葬通常只被当作博物馆收藏物的来源地，而现在由于人们认识到利用随葬物品可以构建起一个地区的年表，因而越发细心地对其加以记录。与居民点的堆积层（这类堆积物的特点是随意性强、逐步累积且往往被搅得乱七八糟）有所不同，墓葬能够提供某个特定时代所使用的纯属同代的人工制品。而且由于某些墓葬的随葬品明显多于其他墓葬，所以我们能够同样清晰地识别王室或其他显贵人物的身份。

在东欧，当圣彼得堡的考古学教授尼古拉·维塞罗夫斯基（Nikolai Vesselovskii）于1897年在高加索北麓山脚的马伊柯普挖开那里的大坟丘时，这种发掘墓葬的潜能开始戏剧性地释放出来。该墓内部有一座分作三间墓室的木制



皮特－里弗斯将军（1827－1900年）站在他刚获得的克兰伯恩切斯地产上（1882年），法兰克·霍尔绘。请注意将军手上的笔记本、脚边的鹤嘴锄以及青铜时代的盾牌和长矛头。

皮特－里弗斯身体强壮，精力充沛，脾气暴躁，支配着家庭成员及其考古助手们的生活。他的曾孙评价他是一位"具有极强个性、冷静、客观和严肃的人，从来不是普通人。他很明显受尊严驱使而非情感左右，崇尚忠诚而非爱情。"

与大多数早期古物学家不同，皮特－里弗斯的兴趣并不在于古典学和历史，而在于人类学、解剖学和地质学。尽管在对待其他种族的看法上，他是维多利亚时代引人注目的人物，但他在积极促进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结合问题上也很是有名。

他在1887年写道："如果说地质学把我们带回到人类历史从未想到过的时期，那么人类学则教会我们如何评测在墓葬中发现的骨骼化石的身高和体质特征，民族学则使我们能够了解我国原始居民的社会和物质条件，其方式是将他们的遗物同现代蛮族人的艺术作品进行比较。所有这一切对现在的史前史家来说，都成了不可或缺的学科。"

建筑，周围环绕石块铺设的墓道。每间墓室陈放着一具尸体。在大间的中央墓室内，葬物丰富，死者是一位男子。而在两边的小间墓室当中则分别安葬着两位妇女。三具骨骼都蜷缩着，四周是象征性的红赭石。在男性墓室中的发现极为罕见：一件四根金银立柱支撑的华盖，华盖正面饰有135只公牛和雄狮的形象。所有随葬物中包括一顶带有蔷薇花饰的金冠、玛瑙 、绿松石、金珠和金耳环、6只金银

戒指、17件金银及石质器皿、铜制工具，还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纺织品。这些古物明确显示了俄罗斯高加索地区和近东青铜时代的文化(公元前2500 - 2200年)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构建考古年表

19世纪末叶在诸如文卡和马伊柯普之类遗址中的大量新发现，有助于在汤姆森和沃索成果的基础上编制一个完整的年表序列。由于收集到越来越多的古物，相对年代得到了修正，“类型学”成了人们关注的重要目标。考古学家也许可以把某类古物（如青铜斧）的所有样本收集到一起，一般依循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原则把它们编成一个系列。假定这一序列与制作这些古物的顺序相一致，那么每件古物在年代上就和处在这个序列中的其他古物对应在一起。依循这个思路，还可以将这些古物同其他地区相应的古物类型加以比较，这样一来，丹麦的青铜斧就可以同德国北部的青铜斧进行类比，二者之间的联系以及偶尔的相互借鉴便可查验出来了。构建这些类型并非一件有把握的事，这是一种用纸牌搭成的房子，是建筑在一些并不可靠的假设基础上的。然而，只要谨慎处理，它们还是可以被用来构建出很有价值的编年系统，涵盖广大的时间和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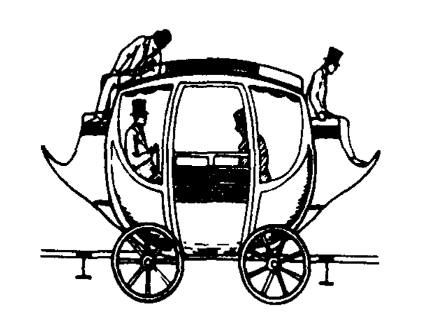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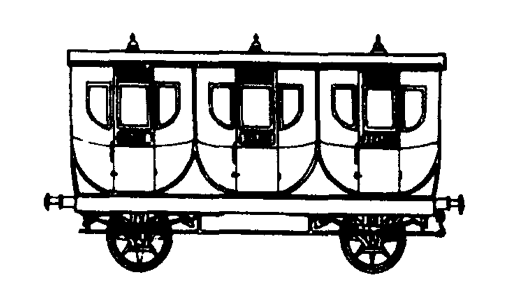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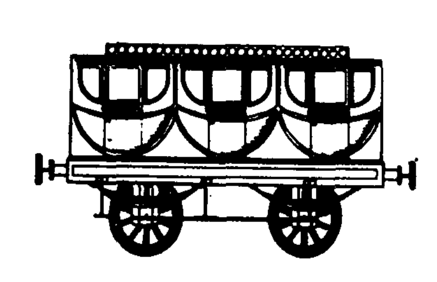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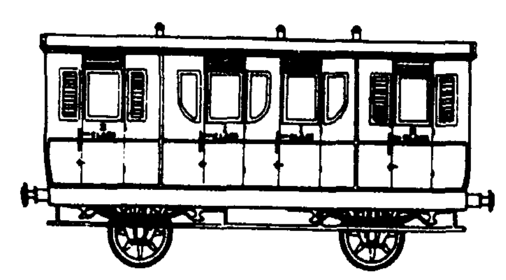
在整个19世纪的类型学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瑞典考古学家奥斯卡·蒙特柳斯（Oskar Montelius)。他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曾做过广泛的旅游，丰富的阅历使他能发觉人工制作器物在类型上的细微变化。当他考察从密封坟墓中出土的古物时，他注意到一些特定的形态总是同时出现，因而可以将它们置于编年序列当中。他曾用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来阐释他所使用的类型学方法，这就是关于火车车厢如何从马车车厢演化而来的说明，尽管岁月流逝，但火车车厢仍保留着起源于马车的各种痕迹。至19世纪80年代，他已能提出新的分期，将欧洲北部的青铜时代划分为6个前后承递的阶段，这是他对欧洲史前史研究的最持久的奉献。随后，他又把新石器时代划分成4个时期。



奥斯卡·蒙特柳斯(1843 - 1921年)，右立者，正由发掘现场的负责人伽布里尔·古斯塔夫森（Gabriel Gustafs - on)领着参观奥斯伯格北欧古船的遗址，时间为1904年。

蒙特柳斯是一位归纳者而非发掘者，他是欧洲考古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学术旨趣集中在整个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新石器、青铜和铁器时代的分期问题上。

他曾说他的基本目标是“对武器、工具、饰物、陶器及其装饰的每个主要系列进行分门别类的思考，以便确定它们的演化过程，发现这些类型——根据它们自身的标准来判断——的先后顺序”。

蒙特柳斯借用火车车厢的演化过程来说明类型学的原则。左上图是1825年间的英国车厢、左下图是1840年间的奥地利车厢、右上与右下图分别为1850年间的瑞典和德国车厢。

蒙特柳斯为田野发掘工作拟定的类型学处理方法现在仍被应用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考古研究。而其他学者则把注意力放在铁器时代上，它们将铁器时代分为两个阶段，名字取自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墓地（约公元前700 - 500年）和瑞士努查特尔湖岸上的拉登居民点（公元前500年至罗马人征服止）。后者是一处供人们祈愿的遗址，在那里发现了胸针、工具和武器，其中包括150把剑。有些剑还插在具有纹饰的青铜剑鞘里，作为对神的献祭，它们被抛入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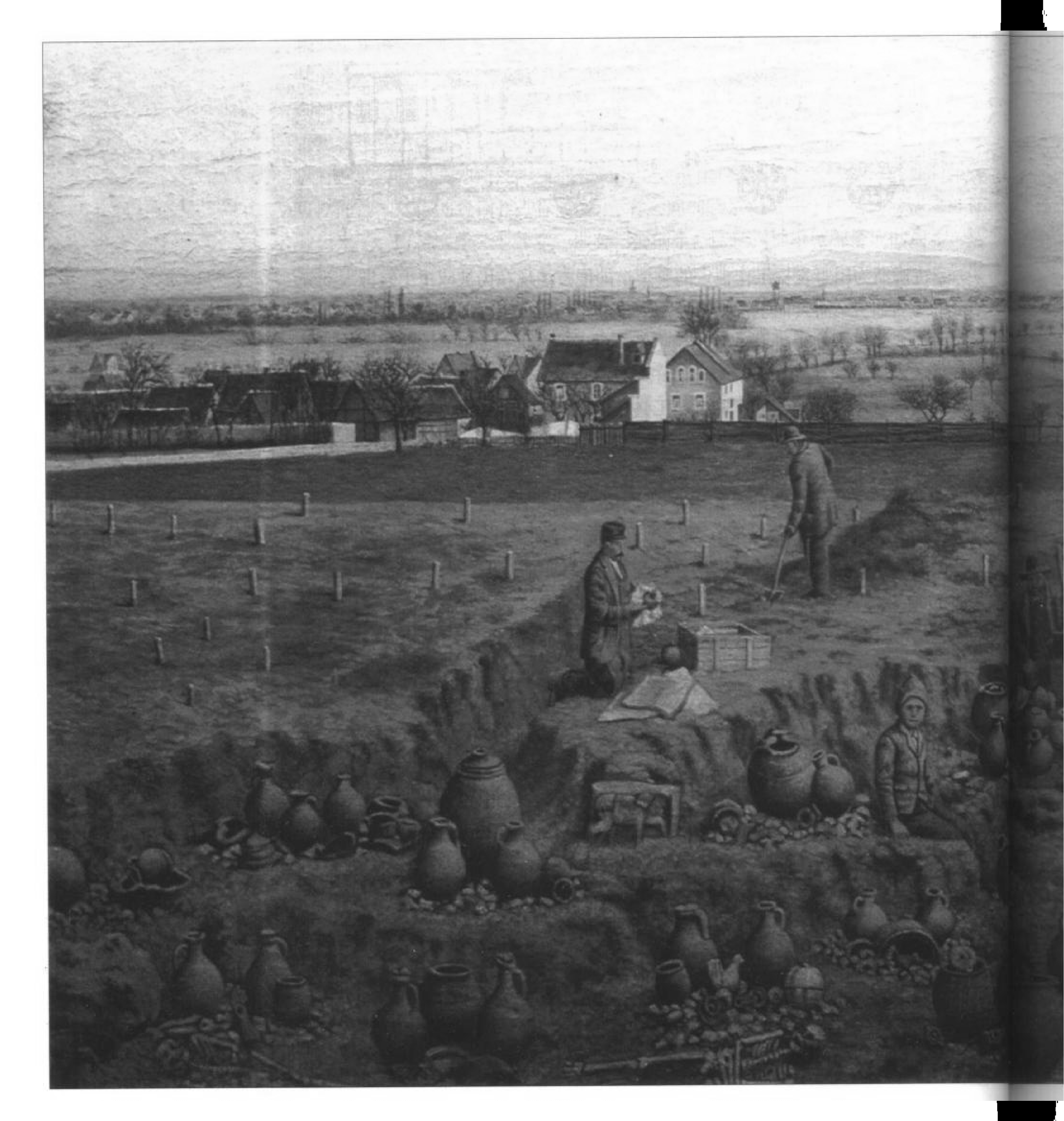
蒙特柳斯承认在不同地区发现的类似古物在年代上有可能互相交叉，他屡次试图把他拟定的北欧分期用在爱琴海地区和埃及的发现物上。他利用这一方法将欧洲青铜时代的下限定在公元前5世纪，认为这一阶段持续了1000年，因而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新石器时代的开端则划在公元前3000年。这一“简略的编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放射性碳同位素定年法以前，始终为大多数考古学家所采用。由于蒙特柳斯将爱琴海地区和埃及在编年顺序上置于优先地位，所以他还成了东方来源说的早期提出者。这种说法（认为整个北欧文明是从东地中海地区传过来的）后来在史前史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一直保持到20世纪60年代的晚期。

随后，蒙特柳斯的竞争者、丹麦史前史家索福·米勒（Sophus Müller）发展了类型学方法，以便说明各种发现物组合的复杂特点，其中包括器物的类型以及与之相关的建筑结构。也正是在米勒的著述中，人们发现了考古“文化”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这个概念后来被科辛纳（Kossinna）和柴尔德（Childe）用来描述分布在广大地区、具有统一性或反复一同出现的考古发现。在米勒的《欧洲史前史》（1905年出版）一书中，这个概念虽然表述得还不充分，但他在当时便已用“文化”一词来概括有关的一大批发现物。

因而，蒙特柳斯和米勒的类型学处理方法，在19世纪早期由汤姆森、沃索制定的三个时代的体系和舒哈尔特（Schuchhardt）、柴尔德于20世纪早期赖以建立其广泛综合体的区域序列之间，搭起了一座重要的桥梁。这些人的工作是学术性

的、超脱的，没有他们前辈或同代人的那种浪漫情调或民族主义色彩。他们划分的各个类型是“无个性特征的”，而且优先注意的是博物馆内的人工制品。这种头脑清晰的超然态度很容易令人想到用诸如“扩散”这样的抽象概念——各人工制品类型通过人们之间的接触而传播开来——来解释史前欧洲的文化演变。随着岁月的推移，这种看法的不足之处也日益明显，这就是现在的史前史面临着被简单化、变成相关遗址和人工制品间的简单排序的危险，而制作它们的人却看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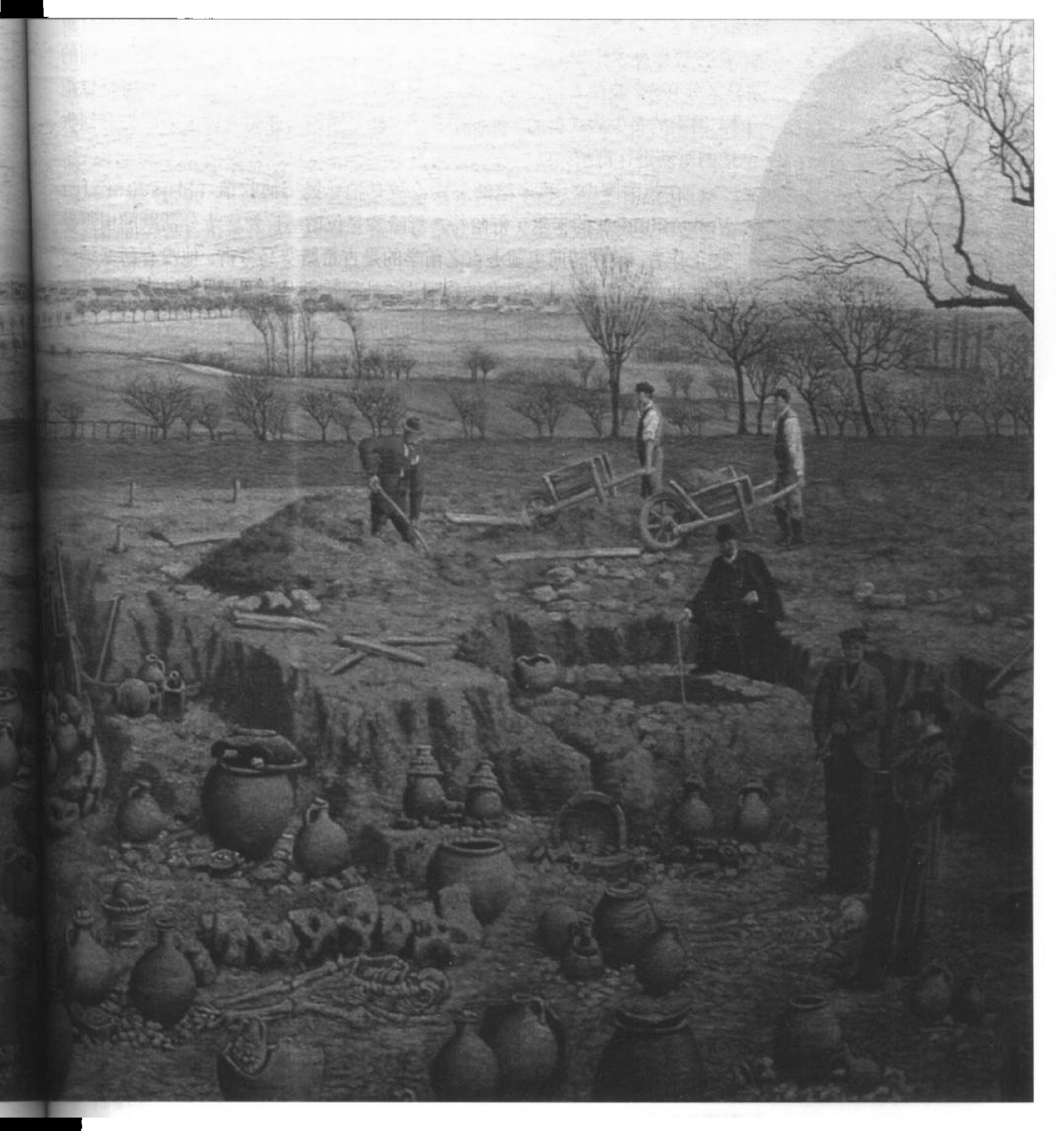
1901－1902年，对法兰克福附近布罗痕的罗马墓地的发掘。F·根施梅尔绘。



民族主义考古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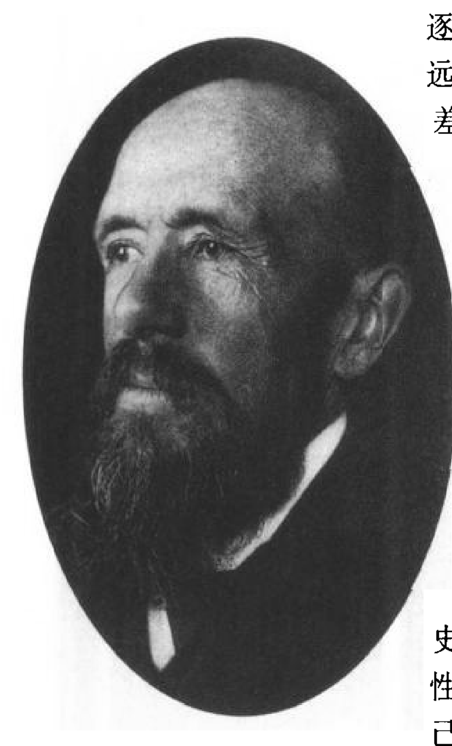
20世纪前半叶，曾经是一个世纪前考古学基本特征的民族主义重新出现，但这次是以极端的形式再现的，考古学成了宣扬人种及种族优越和领土所有权的论据。

这种民族主义考古学得以再现的关键人物是古斯塔夫·科辛纳（1858－1931年）。他原是比较语言学家，后转向到史前史研究领域，并于1902年成为柏林大学的德国考古学教授。科辛纳自己并不动手发掘，他只是从博物馆的藏品和其他



出版物中收集资料。他的方法——他称之为“聚落考古”——是把具有特色的发现物搭配到一起，确定它们的分类界限。如果出现清晰的地理差异，传布范围的发现物便被视为一个种族共同体的直接体现。从1895年起，科辛纳试图追寻日尔曼人的定居过程，因而专门研究了位于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地区，即中欧各帝国之间传统的分界地区。非日耳曼民族（如凯尔特人和罗马人）的重要意义则完全不予考虑。

至20世纪20年代，科辛纳的观点在德国之外引起了人们的警觉。1908年之后东欧一系列新国家的创立，对德国而言意味着领土的丧失。科辛纳的民族主义逐步地演化为沙文主义。“日耳曼人”古物的发现，无论这一发现离德国本身有多远，都被看作是领土权的证据。他开始把创新性的文化同被动受益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区分开来。波兰人和捷克人惊慌地注视着这一观念，他们领土的获得是以德国人领土的丧失为代价的。他们很清楚，科辛纳的著述是为德国以武力夺回失地的举动进行辩护。



卡尔·舒哈特（1859－1943年）

在德国国内，科辛纳的主要论敌是柏林民俗博物馆（Museum für Völkerkunde）的卡尔·舒哈特。舒哈特是位游历广泛、十分活跃的田野发掘工作者，他在转向史前考古之前学的是古希腊罗马考古。他没有科辛纳感兴趣的学科背景，所以科辛纳称他为“外行”，即不是真正的德国考古学家。当舒哈特创办了一份面向国内和国际的考古学期刊《史前史杂志》时，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科辛纳的回应是创建“德国考古协会”（后来称“德国考古学会”），其会刊为《曼努斯》①。

两人也在著述中展开论争。尽管没有提舒哈特的名字，但科辛纳的《德国史前史》的结论是针对他的。他的《最卓越的民族科学》（1912年）一书是论战性的著作，矛头直指从事古典考古、埃及考古和近东考古的学者，突出了作者自己对祖国的忠贞不贰。舒哈特的《早期欧洲》（1919年）一书则与之相反，是一部综合性著作，内容涉及整个欧洲和欧洲的所有史前及原始民族。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科辛纳和舒哈特两人都好像偃旗息鼓了。但在1928年，每人又都写出了一部重要著作，科辛纳的书名为《史前及早期历史时代日耳曼人的起源和发展》（1928年），该书是作者关于德意志领土所有权的登峰造极之作，结尾是对陆军元帅封·兴登堡② 的一篇感谢辞，卷首部分则载有兴登堡访问东普鲁士考古发掘现场的照片。同年，舒哈特发表了《德意志史前史》，他在书中把史前日耳曼社会看作是许多民族（包括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最终是罗马人）组合而成的集体。

科辛纳死于1931年。之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被纳粹政权体现了出来，史前史和考古学为国家服务的企图得到了实现。他的弟子，包括继他之后在1934－1945年担任柏林大学教授的汉斯·赖纳特（Hans Reinerth）在内，都在纳粹政权中担任要职。科辛纳对史前史的看法成了官方的观点，在第三帝国的学校中得到传授。舒哈特虽然坚决反对国家主义者对过去的解释，但仍作为一名受人尊重的、老资格的德国考古活动家活了下来。然而，他辞世前的那几个月却过得很悲惨。1943年，他在柏林里克特菲德的家连同自己的图书室一起被盟军的炸弹所摧毁，他痛心疾首，离开柏林去了卡塞尔。几个月后，他在卡塞尔去世，享年85岁。

① 曼努斯，古代日耳曼人的一个神灵之名——译者注。

② 德国魏玛共和国总统，于1933年授权希特勒组织政府，从而建立法西斯专制——译者注。

南欧的史前史研究

尽管北欧考古已有很长的历史，但令人吃惊的是，仅是在19世纪末，人们才开始对西地中海地区的史前史予以认真研究，这当中的关键人物是西班牙的亨利·西雷特（Henri Siret）和路易斯·西雷特（Louis Siret），以及马耳他的塞米斯托克利斯·扎米特（Themistocles Zammit）。

亨利·西雷特和他的弟弟路易斯原先在比利时读工程学。1880年，他们在一家西班牙采矿公司找到了工作，公司所在地是西班牙东南部的阿尔梅里亚地区。于是他们从1891年开始在那里发掘史前遗址，结果使一系列考古发现问世，包括铜器时代的居民点和米拉莱斯的墓地。米拉莱斯遗址始终是欧洲史前史的重要遗址之一，是阿尔梅里亚省的不毛之地、安达拉克斯河上方悬崖上的一个定居点。干砌的石块防御墙得到每隔一定距离便设立的一座牢固的半圆形塔楼的拱卫，给人的印象不像是公元前三千纪而是较晚时期的建筑。该墓地位于防御墙之外，由80个石砌圆顶墓组成，每个墓室包括一些人的遗骸，大概是一个家庭的合葬墓。正是在这里发现了铜斧、铜匕首以及象牙制品，从而使西雷特兄弟惊异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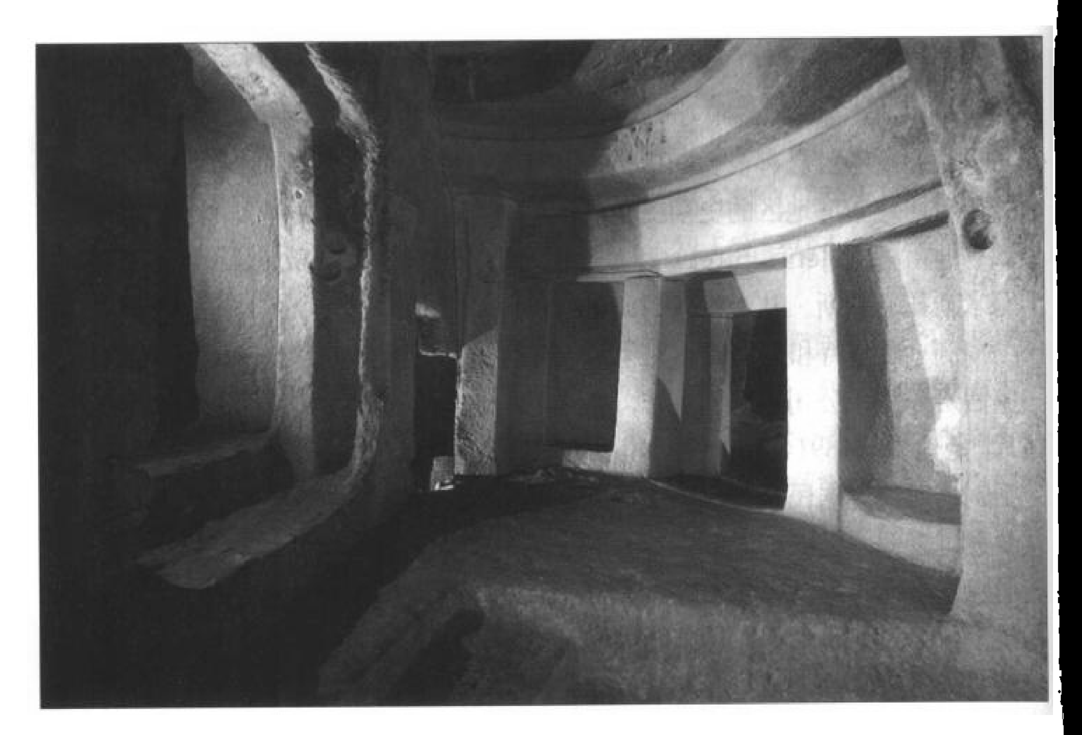
他们继续发掘该地区的其他遗址，包括一个设防村落埃尔·阿勒加，在该村房屋的地板下发现了大约950个石棺或陶罐。有些死者的头盖骨上戴着金冠或银冠。西雷特不知该如何解释他们的发现。他们没有任何精确定年的手段。他们起初认为一定是碰巧挖出了公元前一千纪在西地中海沿岸经营的著名商业民族——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但后来他们放弃了这一想法，得出了正确结论：这些遗址属于西班牙自身的史前农业社会。

一些年过后，马耳他成为意外的考古发现地。在19世纪期间，有报道说岛上存在一些神庙的废墟。英国考古学家理查德·考尔特·霍尔爵士（Sir Richard Colt Hoare，他对西塞克斯古墓的发掘工作更为有名）曾于1791年拜访过马耳他，并勘查了戈佐岛上的格甘提加神庙。19世纪20至30年代，格甘提加、哈伽尔钦、姆纳德拉的遗址得到发掘，所有提到它们的人都认为这是腓尼基人的遗存。1902年，人们在建造房屋时的一个偶然发现改变了所有这一切。马耳他诸岛气候干燥，为抵御夏季的干旱，传统式样的房屋下面都有一个在岩石上凿出的水槽。工人们在瓦莱塔[①] 郊区开凿一个水槽时，意外地打开了一间地下墓室，后来证明这是一处巨大的地下墓群，即哈尔·萨弗里尼地下陵墓的组成部分。在岩石上凿出的、宛如迷宫般的墓室和通道共分三层，最底层距地面有10米（33英尺）。发掘表明，至少7000具干尸在那里静卧了不知多少个世纪。凡是开挖这处古墓群的人，都会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它的外观上：雕凿出来的带有装饰的门口和螺旋状的甬道，墓顶构思很是复杂。自1907年起，这处地下墓群的考古工作便交由马耳他博物馆馆长扎米特负责。正是他，经过对哈尔·萨弗里尼及其附近地面上的塔尔辛神庙的发掘，奠定了马耳他史前史的牢固基础。最重要的是，扎米特证明了这些古建筑物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古老得多，它们属于公元前三千纪的新石器时代。

这些发掘同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展开的新发掘工作一道，推动了人们对南欧

① 马尔他首都——译者注。

马耳他的哈尔·萨弗里尼地下陵墓。马耳他人于公元前五千纪早期定居到岛上，在公元前四千纪和三千纪明显建成一系列新石器时代的神庙，如塔尔辛庙、哈伽尔·钦庙、姆纳吉德拉庙。这些供举行仪式之用的庙宇均为石质建筑、内设庭院、有时正面建筑为两层楼。在石灰岩上凿出的哈尔·萨弗里尼地下陵墓的墓室，有可能与矗立在陵墓上的一座巨石神庙的各房间相对应。



史前考古的热忱。从此，吸引考古学家们注意力的不再仅仅是罗马人的遗存了。随着20世纪时光的缓缓流逝，这一地区的史前史逐渐同欧洲其他地区的史前史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庞杂的欧洲历史模式中的一个空白从此得到了填充。

古典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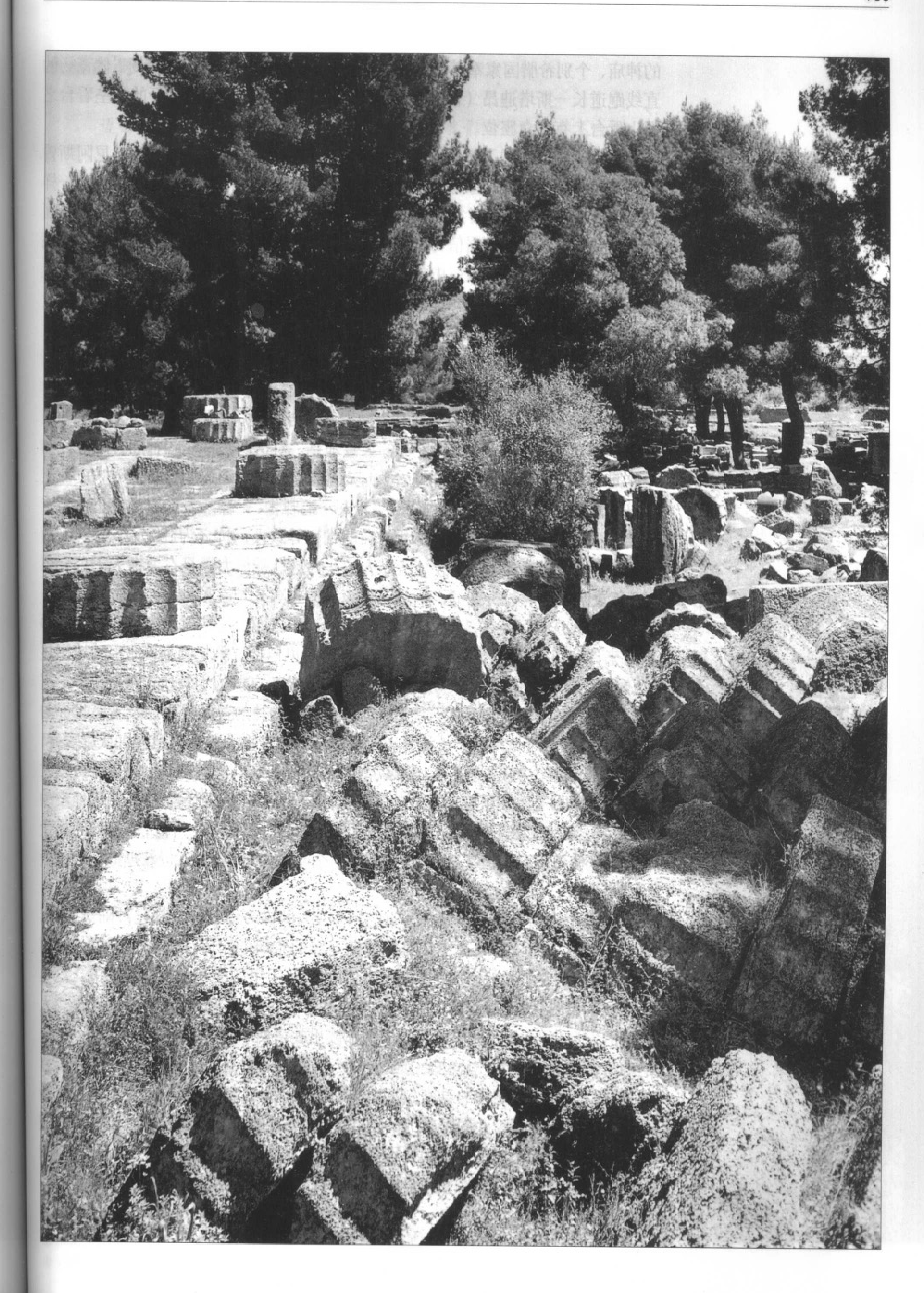
希腊于1828年摆脱了土耳其人的统治，这为北方考古学家们造访古典文献记载的各个重要遗址提供了可能。一些重要庙宇（曾被当作希腊世界体育比赛的中心地），如奥林匹亚和特尔斐的神庙，以及雅典和科林斯等城市，很快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遗址是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和著名的希腊戏剧的发生地，如雅典城。它们也曾在地理学家兼历史学家波桑尼阿斯的《希腊游记》中被描述过。该书是公元2世纪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应当感谢波桑尼阿斯，因为他的记载，才使发掘者能够有的放矢地寻找并发现了古典文献中曾经提到过的建筑物。由于古典作家们的兴趣所在，所以在探索活动的早期，人们很自然地主要着眼于对神庙的发掘。那里也是供奉神灵的宗教物品的储藏地，并且还是泛希腊的体育竞技比赛的遗址，曾经吸引过希腊世界各地的居民。

右图：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圆柱，因一次地震而崩塌，时间在菲迪亚斯雕塑的宙斯像于公元前4世纪被移走之后。该遗址由于被淤泥和沙土构成的很厚的洪水堆积层所覆盖，所以在德国考古学家于19世纪70年代重新发现它的时候，各部分建筑和大理石雕塑几乎没有遭到破坏。

在巴台农庙建成之前，这个建筑是希腊最大的神庙。它的样式属多利安式，按埃利斯城李邦的设计建造，材料是当地产的石灰岩（约在公元前470－450年）。

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奥林匹亚引起了德国考古学家们早期的兴趣。他们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那里发掘。该地是希腊主神宙斯的崇拜中心，其中心是一座拥有巨大柱廊的神殿，面积28 × 64米（92 × 210英尺），自公元前5世纪始，庙内便供有菲迪亚斯雕塑的、难以忘怀的宙斯神像。在挖开中世纪洪水造成的淤泥层之后，发掘队员发现了整个神庙的地基以及因地震而塌倒的神庙石柱。在波桑尼阿斯曾经描述过的三角墙浮雕的残片中，有一些以神话题材为基础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和著名会战的生动刻画。从奥维德的诗文中得知，那场会战是在醉醺醺的坎涛尔人和拉皮忒斯人之间展开的，二者都属于帖萨利[1]的原始山地部落。墙面上的浮雕则描绘着赫拉克勒斯[2]的业绩。进一步发掘还出土了宙斯之妻赫拉

① 位于北希腊——译者注。
②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译者注。



的神庙、个别希腊国家奉献的宝物，以及古典时代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体育场的直线跑道长一斯塔迪昂（合192.28米或630英尺），处于两边平行的土垒看台之间，看台上有观众座位。

奥林匹亚的发掘工作进行了很长时间，不断有新的发现面世。波桑尼阿斯曾提到菲迪亚斯用黄金和象牙塑造宙斯雕像的工场，那是一座同神庙内厅本身一样大小的建筑。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座建筑的遗址和建筑残片，其中包括一个上面刻有古代铭文的陶杯，据信为古代铭文："此为菲迪亚斯所有"。在遗址的其他地方，出土的献祭物品堆积层中包括盔甲和青铜三脚制品（三腿青铜锅，一些腿上有浮雕装饰）。一件祭品上刻着铭文，人们发现这是公元前490年指挥马拉松战役的雅典将军米尔提泰奉献的礼品。

德国考古学家还在雅典积极开展了发掘。早在1835年，路德维格·罗斯(Ludwig Ross)就提出雅典存在着一座较早期的巴台农神庙。1885年至1891年，他们在卫城开展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勘查了巴台农神庙周围的基础，发现了一座较早期神庙（属于公元前6世纪）的大片地基。对这两座神庙和神庙外墙之间的填土进行探测后，发现里面埋藏着大理石雕塑，即闻名遐迩的科莱———一度屹立在这座城市保护女神圣殿中的若干年轻女子的雕像，某些雕像的服饰上仍然留有彩绘的痕迹。一尊男性雕像或称科洛斯的发色导致人们称之为"金发小男孩"。由于它们几乎没有受到风雨侵蚀，所以人们认为这些雕像大概是在波斯人于公元前480年攻陷城市时被拆毁的、后被返回该城的雅典人埋在了地下。

法国人选择了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作为发掘对象，这是荷马诗歌《阿波罗颂》和后来许多作家所描述的神谕的处所。这其中也包括波桑尼阿斯，他生动地记述了公元前279年由高卢人发动的一次侵袭如何被超自然的干预所击溃的情景。据说阿波罗也进行了干预，让石块滚落下来。这里的神谕曾经吸引遍及希腊世界的求神问谕者，各个城邦及其统治者本人都热情地在这块圣地上建造房屋或纪念碑。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曾到这里请求神谕，问是否可以发动战争，以阻遏波斯居鲁士大帝咄咄逼人的势头。当他得到保证说：如果他发动战争，"一个伟大的王国就要被摧毁"之后，他向神庙奉献了一件价值连城的足金礼品，这使他的名字成了富足和虔诚的代名词。但当他真的入侵波斯时，被摧毁的却是他自己的王国。

波桑尼阿斯和其他作家描述过的特尔斐[①]的许多建筑物，都已被陆续发现。这当中包括上面饰有阿提卡英雄提修斯浮雕的雅典的宝库，据说它是用公元前490年缴获的在马拉松登陆的达提斯统帅的军队手里的战利品建造起来的。这里还发现了希腊保存状况最好的跑道，两边的看台可容纳7000人。在特尔斐最令人炫目的发现之一，是西西里岛盖拉城僭主波里扎洛斯奉献的一尊青铜战车驭手像，这尊青铜像是为纪念在运动会上赢得的一次胜利而塑立的。在阿波罗神庙附近，发现了巨大的青铜蛇像的基座，这尊铜像是公元前479年在普拉提亚会战中联合抗击波斯人的各城市共同奉献的。它的原型是三条邪恶的蛇纽缠成一根柱子，被一个黄金三脚架钳制在那里动弹不得。公元4世纪，它被运往君士坦丁堡，安放在该城的竞技场中。蛇像的残部保留了下来，发掘期间出土了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蛇头。

① 位于希腊中部的圣地，因阿波罗神庙而闻名——译者注。

右图：精明的实业家，40岁左右的亨利·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年)，摄于在圣彼得堡经商期间。由于购买了淘金者的金沙，他在加利福尼亚淘金潮中发了另一笔财。

谢里曼精力充沛，善于自我标榜，是渲染夸张的能手。他自己承认他"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吹牛，不懂装懂……但这给他一生带来了无数的好处"。

无论如何，他所具备的考古天分却是毋庸置疑的。后来的阿瑟·伊文思曾把谢里曼描绘成一个"身材瘦削、面如土灰、甚至有些发黑的人、穿着国外制作的、扎眼的服装、正因为如此——我感觉他非常奇特——他看上去像是从土里钻出来的"。

腊青铜时代的发现

迈锡尼无疑是个小地方，那时的许多城镇在我们今天看来并不十分壮观。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诗人们和一般传统所谈到的关于那次远征规模的有力证据……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对特洛伊的远征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远征。

对于公元前5世纪撰写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的修昔底德来说，荷马在《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中所描述的这个事件属于遥远的过去，因为根据计算，特洛亚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但希腊人把荷马史诗视为历史记载，部分的原因是他们的那些英雄时代的祖先为后人遗下了一份有形的遗产。例如，在阿哥利特地区，波桑尼阿斯曾亲眼目睹了迈锡尼：

部分环形的城墙留了下来，包括矗立在那里的狮子门。他们说这是昔克罗普斯①的创造，是他们建造了提林斯城……在迈锡尼的废墟中，有一个泉眼称波希亚，还有阿特莱乌斯及其儿子们居住的地下房间，他们在那里看守着存放他们财产的宝库。有阿特莱乌斯的坟墓和那些从特洛伊返回家园的人的坟墓，他们被埃基斯托斯所杀……克里坦奈斯特拉和埃基斯托斯则埋在离城墙稍远些的地方。他们不适合葬在墙内，因为阿伽门农和同他一起被杀的人安葬在那里。



希腊的许多早期旅行家，曾经访问过迈锡尼和提林斯的青铜时代的废墟，埃尔金（Elgin）将公元前14世纪埃特莱乌斯的宝库，即迈锡尼统治者的葬身之地——最大的圆顶蜂窠式地下石砌坟墓正面的雕塑移到了它处。但18世纪和19世纪的学者却主要对古典时代的遗址和文物感兴趣。尽管很明显，“昔克罗普斯”的建筑——由于城墙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以至后来希腊人把它们归结为荷马笔下的独眼巨人所为——肯定属于史前时代，但英雄时代本身却被认为是神话。关于荷马史诗中的情景具有历史根据这一点，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曾是不可接受的，而谢里曼却对此坚信不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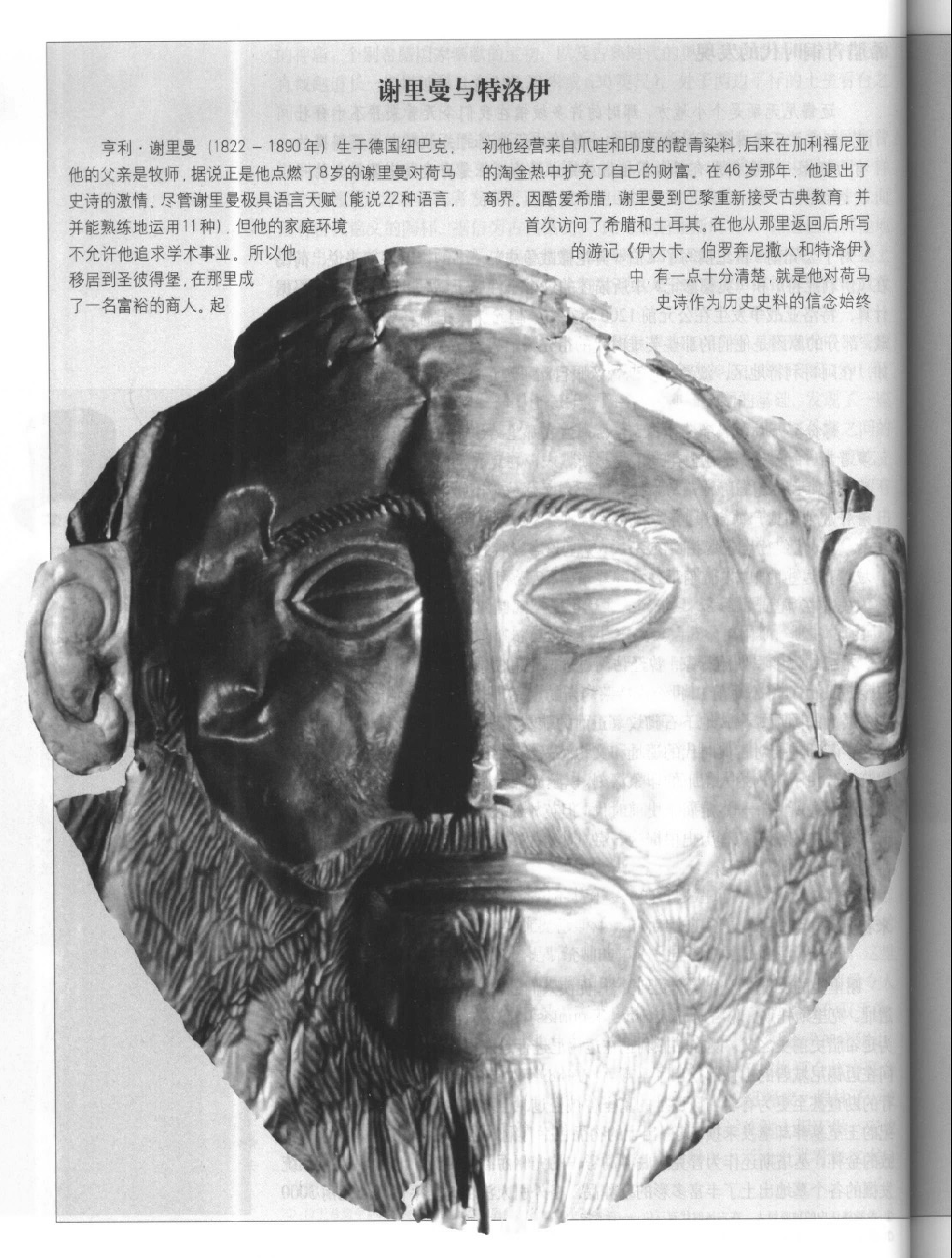
米诺斯的克里特

谢里曼的发现在整个欧洲受到赞誉，促使人们进一步去寻找爱琴海地区的史前遗址。克里斯托斯·聪塔斯（Christos Tsountas）在这方面尤其积极。他通常被认为是希腊史前史之父，既在帖撒利也在迈锡尼进行过发掘，并于1877年至1902年间在迈锡尼城砦的山顶部挖出了宫殿。他在1889年对拉哥尼亚②瓦菲奥的陵墓所进行的勘查甚至更为有名。该遗址的墓室曾被盗过，但墓室地面下边的公元前15世纪的王室墓葬却毫发未损。其中出土的物品包括青铜武器、珠宝饰物和两盏极为精致的金杯。丛塔斯还作为昔克拉底群岛考古的先驱而载入史册。他在19世纪系统发掘的各个墓地出土了丰富多彩的墓葬品，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年代在公元前3000

① 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在古风时代有三位——译者注。
② 南希腊的一处小平原——译者注。

谢里曼与特洛伊

亨利·谢里曼（1822－1890年）生于德国纽巴克，他的父亲是牧师，据说正是他点燃了8岁的谢里曼对荷马史诗的激情。尽管谢里曼极具语言天赋（能说22种语言，并能熟练地运用11种），但他的家庭环境不允许他追求学术事业。所以他移居到圣彼得堡，在那里成了一名富裕的商人。起初他经营来自爪哇和印度的靛青染料，后来在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中扩充了自己的财富。在46岁那年，他退出了商界。因酷爱希腊，谢里曼到巴黎重新接受古典教育，并首次访问了希腊和土耳其。在他从那里返回后所写的游记《伊大卡、伯罗奔尼撒人和特洛伊》中，有一点十分清楚，就是他对荷马史诗作为历史史料的信念始终



是坚定不移的。

为了说服怀疑论者，谢里曼于1870年开始对希萨克利小土丘——占地不足两公顷，俯瞰安纳托利亚东北部的达达尼尔海峡——进行了初次发掘。英国古物学家弗兰克·卡尔沃特曾于5年前在该地挖掘过，并识别出该地为特洛伊遗址。由于对发掘成果印象深刻，谢里曼于1871－1873年带着150人的队伍重返希萨克利，以便挖掘一些横穿土丘的大沟。这次发掘的垂直深度达15米（49英尺），加之地层复杂，谢里曼起初颇感困难。但他最终辨认出4个彼此衔接的青铜时代的"城市"，其中第二座城市是被大火焚毁的。他得出结论，这就是希腊人曾经围攻并夺取过的特洛伊城。这一结论在1873年5月，即在他的这次发掘即将结束时，似乎得到了证实。当发现了一批惊人的金银器皿和珠宝首饰，即所谓的普里阿姆的宝物①后。他迅疾将这些宝物偷运出土耳其。

土耳其政府对此十分恼火，谢里曼不可能在特洛伊继续发掘了。此后的1876年，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爱琴海地区，即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锡尼。波桑尼阿斯曾说阿伽门农及其伙伴葬在迈锡尼的城堡内，谢里曼完全相信波桑尼阿斯的说法。他渴望出名，这次则如愿以偿。由于他发现了公元前16世纪的王室竖穴墓——现在已知它们早于阿伽门农好几个世纪——以及一些保存完好、打制成形的黄金面具，谢里曼使一个文明得到重生，他对荷马史诗的信念得到了验证。他特别写道一颗头骨：

> 罩在沉重的黄金面具下，令人惊异地保存下来……双眼仍明显可见，嘴巴也完好无损。由于压在上面的巨大重量，其嘴巴张得很大，露着32颗美丽的牙齿……这个男子必定是在35岁前去世的……关于发现了一具几乎完整保存下来的英雄时代男子尸体的新闻……立刻不胫而走，传遍了阿哥利特，为了观看这个奇迹，有数千人从阿哥斯、诺普里亚和邻近村落涌来。

1884年，谢里曼再次来到伯罗奔尼撒。他这次看中了位于迈锡尼以南15公里（9英里）远、濒临大海的提林斯。波桑尼阿斯曾赞美过由独眼巨人建造的提林斯的宏伟防御墙，一些早期的旅行家，如爱德华·多德韦尔（Edward Dodwell），也描述过它，但这个遗址还没有被发掘过。谢里曼同他的助手、颇有能力的威尔汉姆·德普费尔德（Wilhelm Dorpfeld）一起弥补了这个疏忽。他们在城堡中发掘出"传奇般的提林斯国王的巨大宫殿"。谢里曼写道："从现在起直到永远，若出版一部有关古代艺术的书，里面没有收入我画的提林斯宫的平面图，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也有一些失败。谢里曼没能发现斯巴达的墨涅劳斯和海伦的宫殿，他寻找奈斯托在派罗斯的宫殿的活动也一无所获。派罗斯宫是由美国人卡尔·布利根（Carl Blegen）在本世纪发现的。谢里曼特别遗憾他没有买下克诺索斯的遗址，他本来"希望在那里发现迈锡尼文明的发源地"。在整个考古活动中，特洛伊的诱惑始终是不可遏制的。谢里曼于1878－1879年返回特洛伊，1882年又再次去往那里。伴随他的是德普费尔德。后者弄清了特洛伊遗址的层次，证明实际上有7个"城市"，如我们现在所知，其存在年代大体上在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间。谢里曼在当时便困惑不已，因为他未能发现迈锡尼希腊和特洛伊文化Ⅱ（被当作《伊利亚特》中所说的设防城市特洛伊）之间存在任何他所希望看到的密切联系。他在1889－1890年恢复了发掘活动，最终在特洛伊文化Ⅵ中发现了迈锡尼的陶器。他本来也许会在第6层居民点中，发现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似乎更像是荷马笔下的城墙遗迹，但他后来不幸患病，于1890年死于那布勒斯。

谢里曼对古代遗址独具只眼，但他在结识德普费尔德之前所采用的考古发掘技术是很粗糙的，尤其是在特洛伊的早期发掘期间，他破坏的东西比他发现的东西还要多。他不是讲老实话的人，对他写的书籍、日记、笔记和书信加以比较后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对此，他一定已意识到了。尽管他做事并不得体，而且喜好争吵，但他的主动、他的敏于宣扬和迅速发表成果的做法却给爱琴考古以永久的推动。正像他的合作者鲁道夫·维科（Rudolf Virchow）所写的："（特洛伊）也许仍然隐匿在地下，它可没有指导他的探铲的想象力。"

左图："阿伽门农的金面具"，由谢里曼发现于迈锡尼的第五座竖穴墓中。其面部特征意味着它是人的肖像，而非仅仅是一种程式化的象征。面具高26厘米（10.25英寸）。

① 普里阿姆为特洛伊国王——译者注。

阿瑟·伊文思（1851－1941年）像，威廉·理奇蒙德爵士绘于1907年。如果说谢里曼可以戏称为暴发户的话，那么阿瑟·伊文思的学术经历则可说是无懈可击。他自孩童时代便在古典氛围当中受到熏染，曾于1859年陪同富有的父亲约翰·伊文思爵士访问过布歇·德·彼尔特在法国阿布维尔的发掘现场，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件燧石工具，当时他才8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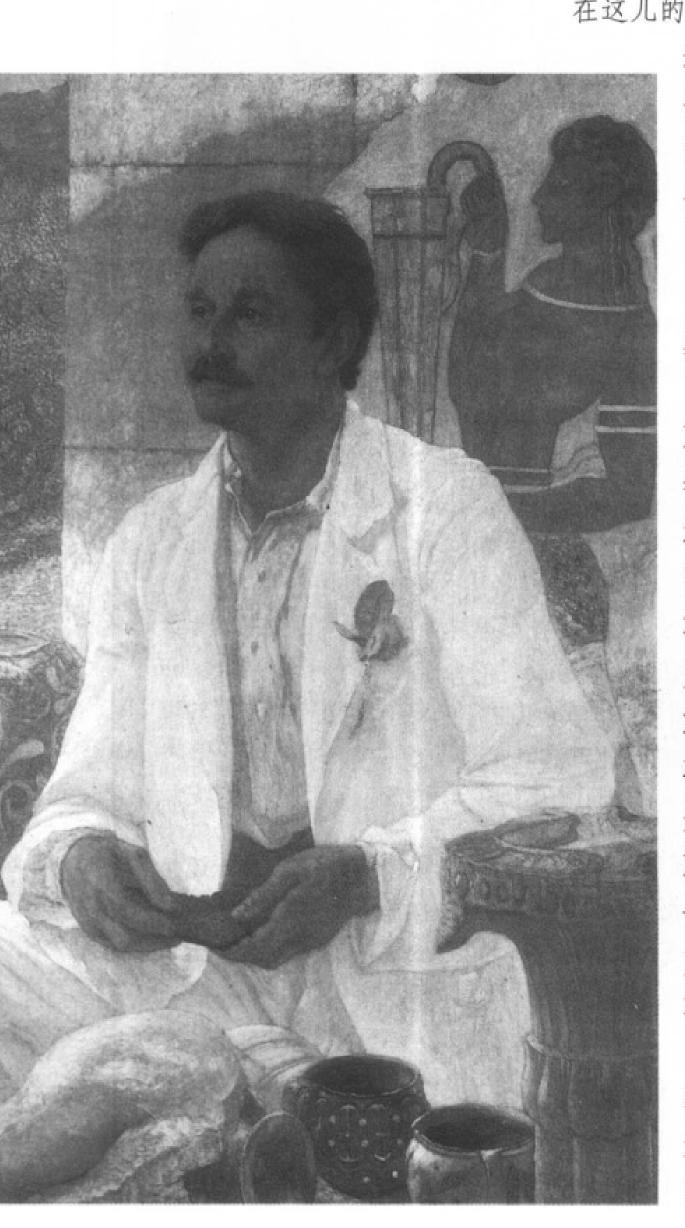
伊文思如同谢里曼一样四处搜寻古代遗址，同谢里曼一样不是步行就是骑马跋涉于荒芜的地带。

年代以来的大理石小雕像，这类雕像在本世纪受到盗墓者的广泛洗劫。

克里特由于直到1898年仍被奥斯曼帝国所占据，处于西方影响之外，所以对这个岛屿的考古发掘工作也被长期忽略。谢里曼曾意识到赫拉克利昂附近有可能是克诺索斯宫的遗址，但他未能买下那块土地。它留给了英国考古学家阿瑟·伊文思。伊文思在1900－1935年间挖出了宫殿遗址。阿瑟·伊文思曾就读于牛津大学，是富裕的史前史家约翰·伊文思的儿子。他起初从事记者职业，在20来岁时担任《曼彻斯特卫报》驻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特派记者。他研究巴尔干地区的古物，返回英国后成了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的管理员。自1884年至1908年间，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

伊文思为特洛伊的发现所激动，他于1883年在雅典结识了谢里曼。10年之后，当他为购买古物而返回那里时，他在雅典跳蚤市场上看到的印章使他确信，迈锡尼人具有自己的象形文字体系。这促使他到克里特访问，因为印章据说是从那里来的。1894年春，第一次见到克诺索斯后，他在日记中他抒发了自己对该地的印象：

> 在这儿的一个叫塔·皮塔里亚的地方，有迈锡尼人的城墙遗存以及一些通道（那里曾发现过很大的陶罐），斯提尔曼和其他人记录过它们。根据目力所及来判断，它们非常复杂，但斯提尔曼却推测它几乎不可能是迷宫本身。（后记：不，我认为进一步发掘的话，它一定是迷宫）。



伊文思做出决定之后，立即询问这块地的价格。关于这笔交易的谈判一直拖到1900年，直至克诺索斯最终成为他的财产。

伊文思并非一位经验丰富的发掘者。他得到苏格兰考古学家邓肯·迈肯奇（Duncan Mackenzie）的帮助，迈氏是1896－1899年间在米洛岛佩拉柯皮的英国考古队的成员。伊文思陆续雇用了50至180个工人，为发掘做了周密的准备。他的同父异母姊妹琼曾经评论道“它的花费可以用以挪士的所有装着果盐的瓶子和所有指甲刷的价值来衡量。”伊文思虽然对克诺索斯的发掘前景非常乐观，但他也没有预想到他的期望会这样快地成为现实。在3月23日开始发掘后才一周，他已发现了“一种烧制过的黏土条，形状很像是石凿，虽说一端已经破碎，但上面带有文字，看上去像是些数字”，证明这是有文字的社会。伊文思已经确信，这个地方就是“前迈锡尼时期”的一处王宫，是一个清晰可辨的早期文明——克里特文明的故乡。他已为这个文明起好了名字，即“米诺”文明。米诺取自传说中的国王米诺斯，据说在米诺斯的宫殿下面有一座迷宫，人身牛头怪便生活在那里，后来它被提修斯所杀。

1905年，发掘工作基本结束，伊文思开始系统研究出土的文物，包括富丽的壁画、雅致的石瓶和装饰精美的陶器。其结果是在1921－1936年间出版了《米诺斯的宫殿》一书。伊文思在书中十分精彩地阐释了自己关于米诺文明的看法。在1922至1930



克诺索斯的女性壁画。伊文思的保存方法十分完善。由于热衷于将这处伟大的遗址传给后代，并相信他的发掘是终极性的，他在有生之年，对米诺斯宫的重建工程进行了监督，并指导修复了残缺不全的壁画。即使在今天，这一成果仍能激起参观者的热情。

年间，他还做了一件颇有争议的事，就是对重建的宫殿加以彩绘装修，包括中央庭院、国王的房间、王室成员的居室，以及用石柱装饰的双斧大厅。今天游人看到便是装修过的宫殿。米诺斯宫始建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约公元前1700年经地震后得到完全重建。后一直存在到大约公元前1370年，随后被彻底破坏。

英国的埃及学：寻找摩西热

尽管在19世纪70年代末，马利耶特的古物工作部为埃及考古确立了某些章法，但这个学科在这里仍然首先属于史料学，考古学家的工作是为语文或文献学家的研究提供文献资料。这种史料学的偏向在1880年代由于一系列基于《圣经》"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的发掘而进一步得到加强。1882年3月，三角洲勘查基金会（后来更名为埃及勘查学协会）成立，把一些学者与其他对埃及考古同样感兴趣的人，如作家阿迈里亚·爱德华（Amelia Edwards，他的作品《沿尼罗河上溯

弗林德斯·皮特里在近东

弗林德斯·马修·皮特里（1853－1942年）是在近东发掘的第一位真正的考古学家。他精力充沛，办事认真，具有数学般的严谨学风，并且是自学成才，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正规教育。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给考古发掘和古物分析，尤其是陶器分析，带来了崭新的处理方法。他的这一成就源于他很早就对度量衡学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对地表的古建筑物进行过测量。

关于皮特里，有无可数计的奇闻轶事。他被当作一个怪人，对与考古技术相关联的每种行为都固执己见，如刷牙的正确方式，洗一次澡要多少水量（不超过5英寸深）。大多数这类故事涉及他在埃及的发掘营地施行一套俭朴的、斯巴达式的内部管理办法。1900至1904年间，他在阿卑多斯四季不停顿地挖掘时，习惯于把尚未食用的食品罐头埋起来，等到下个季节再把它们摔到墙上，以检测罐头的好坏，因为早期制造的罐头的质量是难以预测的，若罐头因摔而爆裂，那么就显然没有达到标准。

1911年，与皮特里在卡切迈什一道工作的劳伦斯曾报道说：皮特里营地的人们"在扔掉罐头里边发绿的硬皮后，兴高采烈地吃着从每周打开的罐头里倒出的食物。"即便如此，"这位教授也是这个营地中的伟大人物，他大约5英尺11英寸高，头发花白，胡子呈灰色，粗率而富有活力，当激动和讲话速度连续很快时，声音便会嘶哑"。

皮特里是在13岁时，由于读到他家的朋友、皇家天文学家查尔斯·皮亚兹·斯密（Charles Piazzi Smyth）写的一本书《我们在大金字塔中的遗产》，才对埃及学感兴趣的。皮亚兹·斯密是一位英籍以色列人，他认为英国人是"创世记"中提到的10个流散的部落之一，基泽的大金字塔不是由盲目崇拜偶像的埃及人建造的，而是在神灵监督下建成的，只要利用他设想出的"金字塔的尺寸"以及金字塔通道和墓室的比例，就能够预测到未来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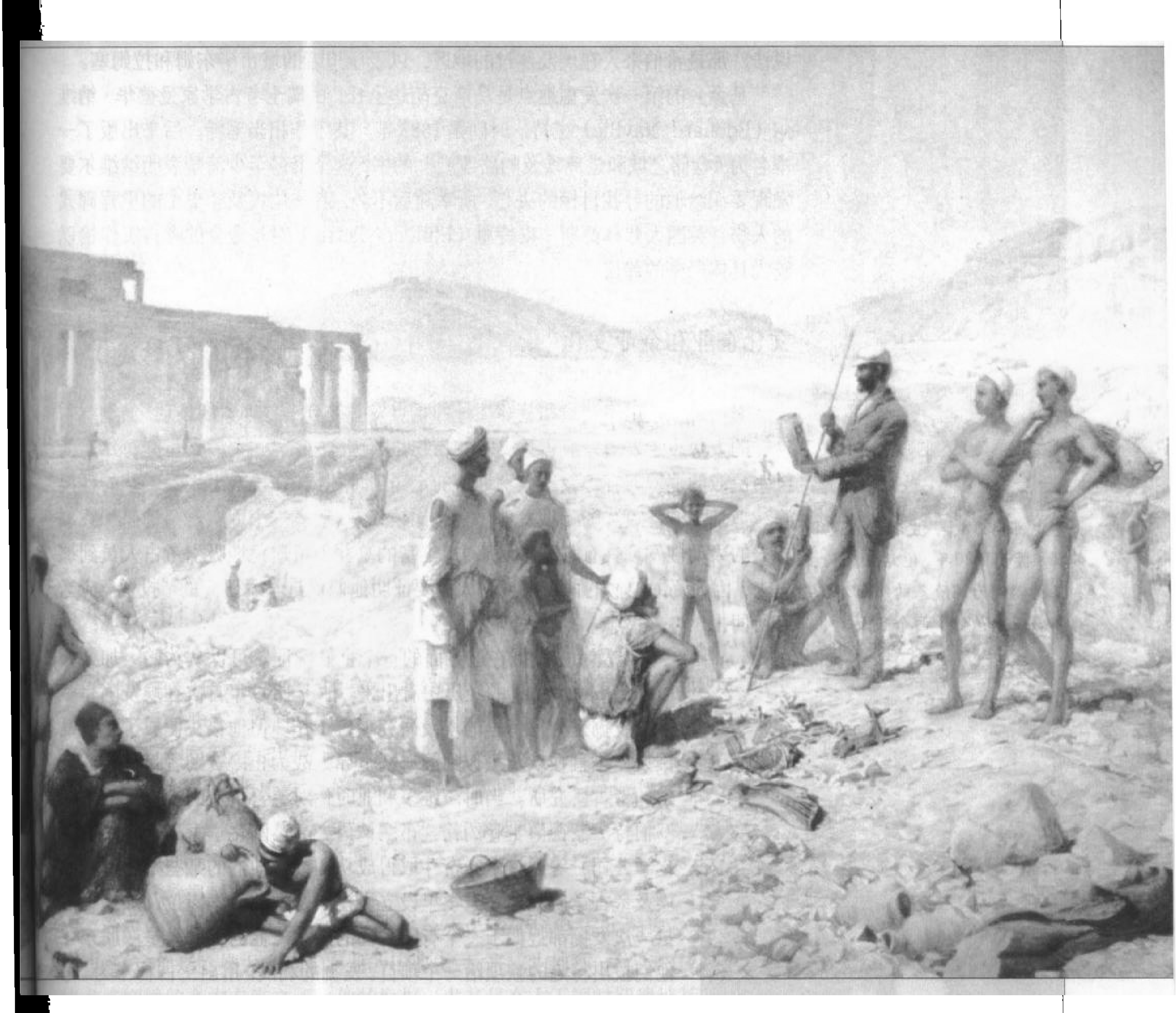
皮特里起初对他的观点表示某种程度的赞同，但他明白，对"金字塔的尺寸"和皮亚兹·斯密的其他量度进行核实，需要对金字塔进行比迄今已做过的任何测量都要更精确的测量。皮特里在年轻时代对诸如巨石阵之类的英国古建筑进行高精度的测量（一般利用他自己开发的技术）之后，最终于1880年11月动身去埃及，以实现他的测量金字塔的计划。在1881－1883两年时间里，他生活节俭，睡在基泽高地上的一个古代凿出的岩洞陵墓当中，不在乎什么跳蚤出没和夜间的犬吠狼嚎。他的工作成果是对第四王朝（约公元前2575－2465年）的三座金字塔首次做了精确测定，证明无论是皮亚兹·斯密的金字塔的尺寸还是他的结论，都是不可信的。更重要的是，这次测量确立了记录埃及和其他地区古建筑的新标准。

皮特里的能力和精力得到皮特－里弗斯将军的认可，他于1881年到基泽拜访了皮特里。但更有意义的是，埃及勘查基金会以及阿迈里亚·爱德华也认可了他，这个机构和爱德华成了他的保护人。在1884至1886年间，他发掘了一系列尼罗河三角洲地带的遗址，其中著名的遗址有塔尼斯（约公元前1070－712年的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王朝的首都）、诺克拉提斯（公元前664－525年即第二十六王朝期间希腊人的一块殖民地）。

皮特里为该基金会和其他基金筹集团体工作，他成功地在埃及最重要的一些考古遗址上从事发掘达40多年并不断发表他的发掘成果。他发掘的重点项目中包括阿卑多斯第一、二王朝王室墓地（约公元前3050－2686年）、中王国时期的埃尔拉珲镇（约公元前2023－1633年）、位于埃尔—阿马尔纳的法老阿克纳坦的临时首都（公元前1350－1334年）。但比特里对考古学的贡献远比这些成果大得多。他对考古的技术和方法进行了创新，还培养出整整一代近东的考古工作者，这些才是他的主要成就。

皮特里对考古学直接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非常独到和新颖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发明了我们现在称之为"顺序年代法"的处理手段，他称这种做法为"系列断代法"，这是一种为大量出土文物提供年代关系的基本技术。当皮特里于1895－1899年在埃及南部的考古遗址，如纳浛达、阿巴迪亚和胡（狄奥波利斯·帕尔瓦）发现不熟悉的陶器及其他古物时，他先是把它们解释为发现一个新的入侵民族的证据，该民族在第一中间期（公元前2181－2040年）进入埃及。然而，人们很快弄清了这些发现原来属于新石器时代，属于目前所称的前王朝时期（公元前3150年以前）在埃及出现的一些文化集团。一旦皮特里接受了这种新解释——这是他从未认真考虑过的——他那活跃的头脑便开始考虑如何给这些陌生的材料以最适宜的编年。

他的解决办法是从这三个遗址中挑选900座带有不同类型陶器的坟墓，这个数量不到墓葬总数的四分之一。每座坟墓用一块厚纸板条来代表，厚纸板条分成9



部分，每一部分表示一种主要的陶器类型。然后皮特里拿起这些纸版条，通过眼睛观察，开始分门别类，把一些带有相近类型的陶器的坟墓归并到一起。这种分类系统的根据是假定每一种陶器类型都具有一种"生命"，在其"生命"期间，它被人使用，直到它演变为不同的类型或被人抛弃而失去效用。随后，再把分出的所有类型划分成50个相等的小组，皮特里赋予它们"系列断代法"的编号，即从30排到80（从30开始是为了给更早的类型留有余地）。于是他为自己发掘出的坟墓拟定出了编年系列，尽管它们还不能说是绝对年代。

皮特里利用原始考古证据构建可行性年表的尝试，为研讨埃及前王朝时期的历史确定了一个基本框架，把一件无价的分析工具赋予了致力于处理相近材料的考古学家。今天，是计算机而非900块纸版条，成了材料分类的工具，但正是皮特里第一次正确地将统计法引入了考古学。

上图：弗林德斯·皮特里发掘拉美塞乌姆，这是他在尼罗河西岸的底比斯发掘的一系列神庙之一，时间是1895年12月。亨利·瓦利斯作画。

一千英里》是19世纪80年代畅销书)，汇集到了一起。该基金会的目的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的盐碱沼泽地带进行田野发掘工作，因为在那里“无疑埋藏着《圣经》所载的、已消失的历史时期的文献”，特别是在“歌珊”土地上，按“创世记”的说法，那是希伯来人在埃及住过的地区；以及压迫者的城市毕东姆和拉姆塞。

基金会的第一次发掘地点是马斯克胡达土丘，由瑞士考古学家爱德华·纳维尔（Edouard Naville）主持，时间是1883年，其工作相当毛糙，后来出版了一本名为《仓储之城和逃离埃及的路线》① 的书，这个书名至少清楚表明纳维尔要发现委派给他的寻找目标的决心。所幸随后不久，有一位埃及学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英国人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对基金会的考古工作给以较为具体严密的建议。

文化企业和企业文化

对埃及大型王室建筑和墓葬遗址的重点发掘受到一些因素的推动。像纳维尔这样的人热衷于发现带有古代文本的古物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同每年遭受洪水泛滥的尼罗河谷地或三角洲地带的定居遗址相比，在位于上埃及干涸的沙漠边缘遗址上的建筑物和各种发现保存得比较完好。还有一个因素是与神庙和陵墓相关的轰动性发现具有强烈的诱惑力。丰富的墓葬不可避免地吸引考古人员到那里去，因为资助他们的博物馆或私人需要证明他们促进学术研究的“投资”应当有所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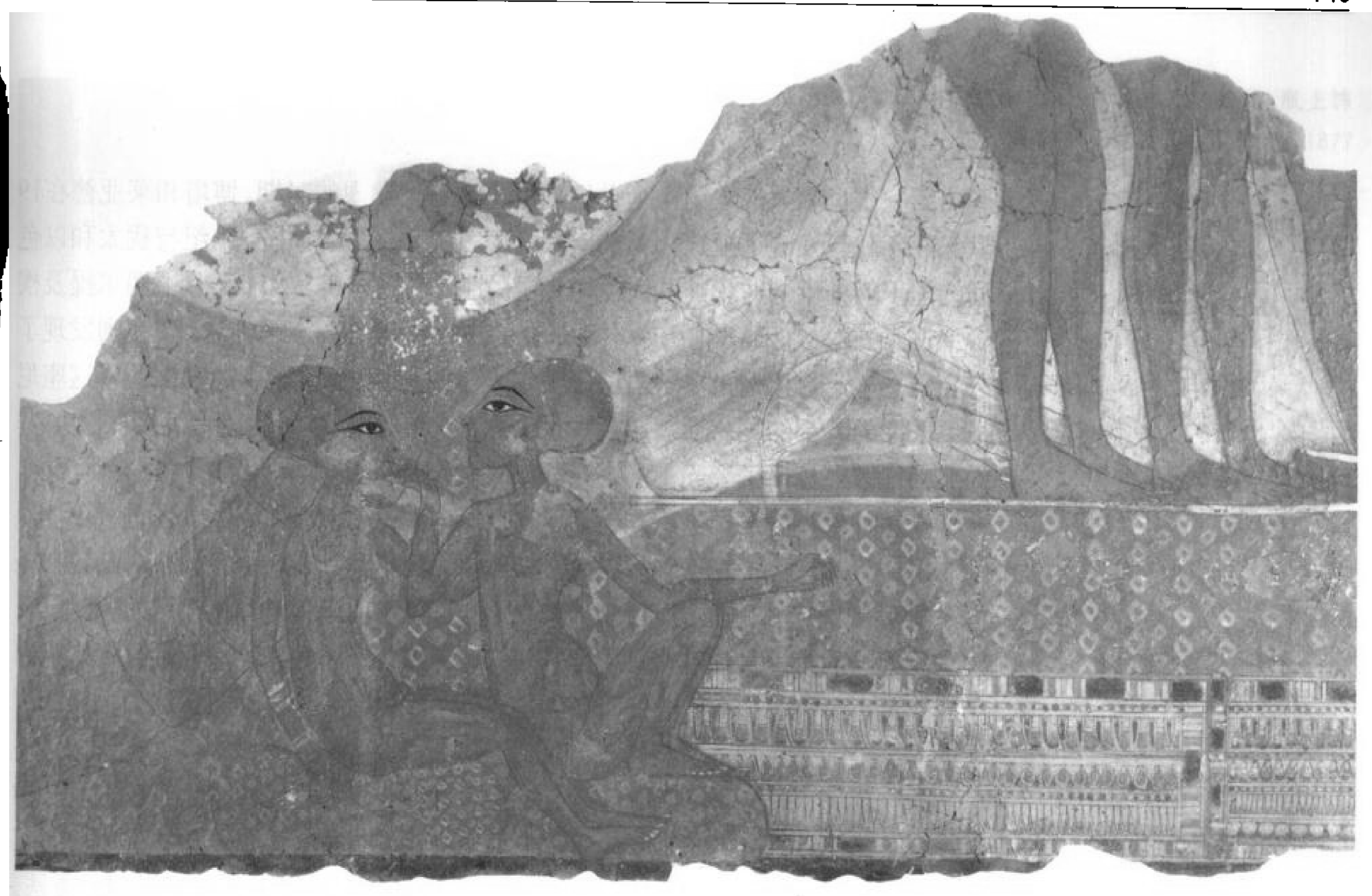


弗林德斯·皮特里在基泽，摄于1880年。他站立在人工开凿的岩洞陵墓的外面，他曾在墓内居住了两个冬天。

埃及考古发掘在这方面的一个良好例证，可以从约翰·加斯顿（John Garstang）的经历中看出来。他于1899年首次在埃及阿卑多斯的发掘是为皮特里的埃及研究项目工作。但他很快便成了独立发掘人，一直在埃及工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赞助者是利物浦大学的考古研究所。当时，维多利亚时代对慈善事业的指令，鼓励了罗伯特·蒙德爵士和约翰·布兰讷爵士（英国化学家，创立了帝国化学公司）等通过个人奋斗取得成功的人将他们的某些财产，捐助埃及考古学研究和在大学里设立讲授埃及学的教学岗位。加斯顿的每一次发掘都近似于一个有限公司的活动。他的资助人是“股东”，他们拨出特定的款项给一个项目。发掘的利润，用出土古物作为“每股红利”的形式加以分配，而且这些古物要以未被开罗埃及博物馆收走为前提。

埃及考古技术发展的一个主要局限是某些遗址规模巨大。全面清理堆积起来的大量黄沙和自庞大石质建筑上掉下来的碎石，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像皮特里和纳维尔这样的发掘者还有其他要担心的地方，就是如何组织和控制大量的——有时达数百人——当地劳工。深入细致地勘查城市遗址，仅是最近30年埃及田野发掘工作的重要特征，当时做不到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必须考虑尽量减少考古预算和尽量利用当地工人的廉价劳动力，同时也是因为考古人员还怀有探索陵墓和神庙以外的各种遗址的真诚愿望。

① 仓储之城指毕东姆城，在《圣经》中该城是存储埃及法老军械和粮草的城市——译者注。



载有埃赫那吞的两个女儿——奈芙露和奈芙芳弗露阿坦的壁画。皮特里于1892年在埃尔阿马纳的王宫中发现，时间约属于公元前1350年。

近东的美国人

1900年之后，在埃及勘查学会的重要成员中，美国人的数量明显减少，这主要是由于美国考古学家们越来越直接地参与近东的发掘工作。但谢天谢地，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们还是出现了，再加上美国的金钱投入，这使他们很快就能同他们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对手们平起平坐了。美国人在埃及的田野发掘工作得到报业巨头威廉·兰多夫·赫斯特的妻子弗比·赫斯特的资助，在对美国考古机构的善举中，石油大亨和慈善家约翰·D·洛克菲勒于1903年为建立东方勘查学会向芝加哥大学捐献了50000美金。

乔治·安德鲁·赖斯纳（George Andrew Reisner）是美国埃及学家中最出色的一位，他是哈佛大学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后来成为他那一代人中成果最卓著、技术最娴熟的考古专家之一。他的发掘，尤其是在古王国时期遗址基泽的发掘，包括挖出了拥有丰富随葬品的胡弗之母赫特弗莱丝（约公元前2551－2528年）的陵墓与门卡列（约公元前2490－2472年）在河谷中的神庙及金字塔，可归入本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大发现之列。由于第一阿斯旺水坝（1907－1909年）的修建而引起水位的抬高，他受埃及政府委托对受到威胁的努比亚古建筑进行了重要的勘查工作。1916－1923年间，他返回美洲之后，又去探索了美洛和那帕塔的金字塔。他重视对发掘和记录采取系统的处理方法，并通过在1908至1910年期间于撒马利亚（约公元前882－871年由国王奥姆利建立的北方以色列王国的首都）的发掘工作而把这种方法推广到了巴勒斯坦。

发现苏美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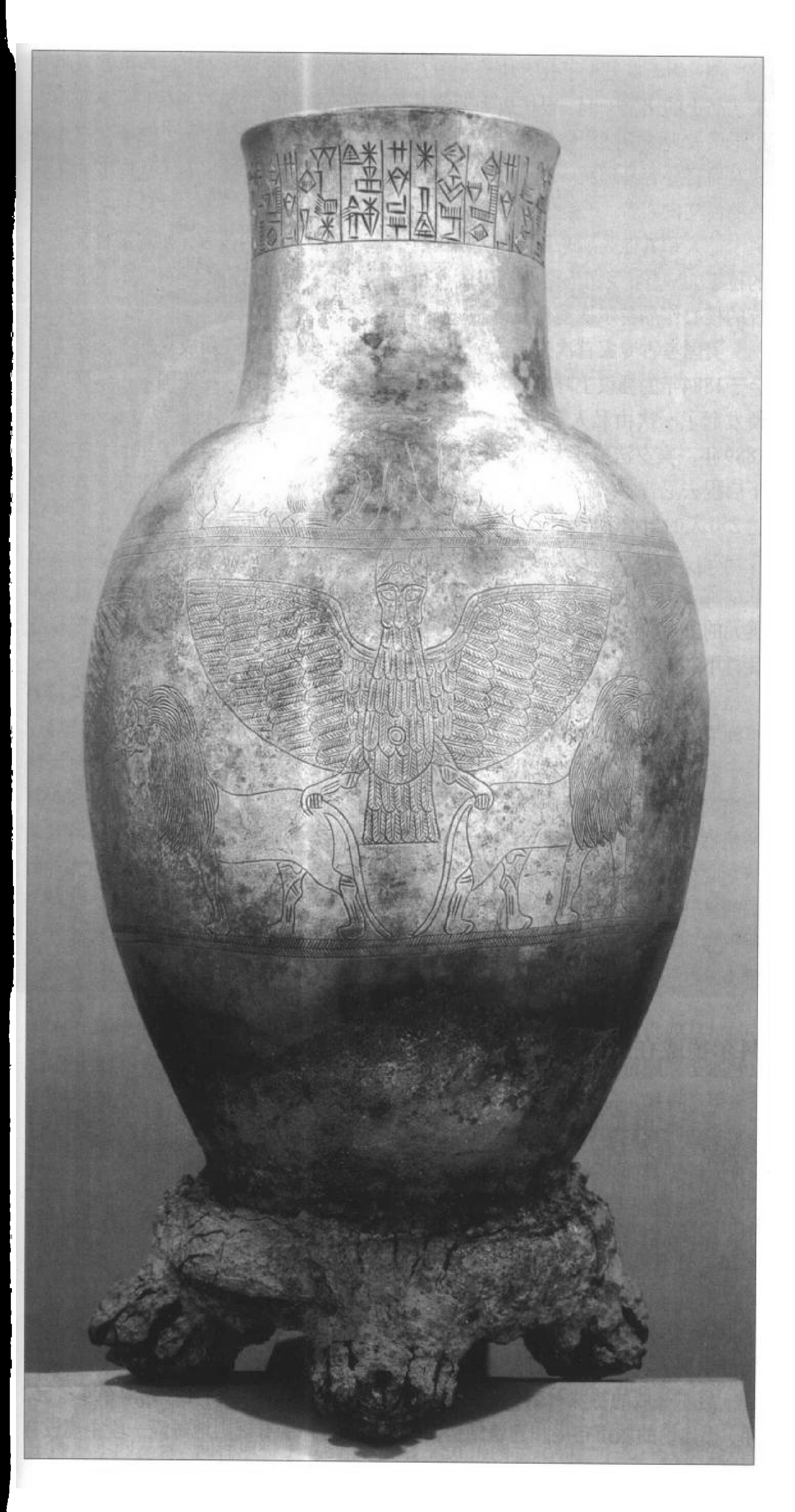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半个世纪是近东考古大发现的时期。博塔和莱亚德在19世纪40年代已发现了亚述国王的宏伟宫殿，揭示出在公元前一千纪与犹太和以色列的国王们处于同时代的强大亚述帝国的生活。但直到1860年，除了偶尔提及楔形字文献外，人们对其他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文化仍然一无所知。现在则发现了公元前三千纪巴比伦尼亚的居民苏美尔人，并且对巴比伦本身的发掘还将这座尼布甲尼撒的首都的雄伟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与此同时，在当今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北部地区还挖出了公元前两千纪的赫梯帝国和公元前一千纪的阿拉美亚王国。

在这种深入的发掘当中，欧洲政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也是很不体面的作用。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果是英国和法国保障了奥斯曼帝国的统一，其目的是为了对付俄国南进的压力。此后欧洲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存在得到强化，1871年德国的统一又使这个地区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角色。政治角逐直接影响到当地的考古研究工作：英法依旧在竞争，现在又加上了德国，随着这个世纪的逐渐逝去，美国人也加入了进来。

尽管铭文、建筑和具有“博物馆展示质量”的艺术品仍然是近东考古发掘的主要对象，但人们现在已更多地强调小型文物和发现物之间的层次联系。1900年以后，发掘有了更扎实的技术手段，特别是人们吸收了皮特里在埃及运用的方法。如同在欧洲的情况一样，这个时期出现了专业考古学家，设立了永久性的考古机构、学术团体和专门期刊，大学里设置了考古学的教职，有些是专门对近东考古而言的。

法国发掘者以及随后的美国发掘者取得了最炫目的成就，他们发现了较伟大的亚述和巴比伦国王还要早两千年的巴比伦尼亚的居民——苏美尔人。正是担任法国驻巴士拉副领事这一枯燥职务的欧内斯特·德·萨泽克(Ernest de Sarzec)，第一个选择了位于巴比伦尼亚南部的泰罗作为发掘地，因为有刚从这个遗址出土的文物被人带到古物市场上出售。德·萨泽克使用自己的钱，买通了半自治的当地统治者而非奥斯曼的官员，于1877年开始了对泰罗遗址的发掘。1881年他在卢浮宫举办了一次展览，公开宣布了自己的成功，法国国民议会还就购买他的发现物所需的款项进行了表决投票。

泰罗遗址被证明是古代基尔苏即苏美尔城邦拉伽什的一个主要市镇的废墟，属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那是一个战争频仍、盟友反复更迭的动荡时期。德·萨泽克把注意力集中在该城的主神宁吉尔苏的神庙上。他在诠释这座泥砖建筑物时，遇到了他的前人曾经遇到的困难，但他能够区分出神庙内部的一些主要层次。在较晚后的发现中，有6尊公元前22世纪的拉伽什统治者古迪亚的雕像，被刻画成指导神庙重建工作的建筑师和经文抄写者。在较低的、时间上要早4个世纪的文化层中，出土了丰富的艺术杰作，其中最有名的是一块鹫碑。这块石碑的一面刻画着宁吉尔苏神用一张网罩住拉伽什的死敌，而另一面则刻画着拉伽什的军队投入战斗、兀鹫咬噬着战场上的死尸，以及准备掩埋堆积如山的阵亡敌人尸体的可怖场景。其他重要发现还包括一个饰有牛及狮头鹰的由国王恩铁美纳奉献给宁吉尔苏神的银瓶，另有拉伽什各个时期的国王贡献给这位神灵的一系列饰板。



苏美尔人的银器，瓶上饰有狮头鹰。德·萨泽克于1877－1900年间在泰罗发掘时发现此物。瓶颈周围刻有奉献铭文，间接提到公元前25世纪晚期在位的拉伽什国王恩特美纳，这使得银器有了比较准确的制作年代。

德·萨泽克出土了几万块公元前三千纪的楔形字泥板文书，这些书写材料同工艺品上的铭文一起，很快成为理解苏美尔政治史和经济组织的依据。莱亚德在尼尼微发现的亚述王室图书馆收存有阿卡德－苏美尔语字典，所以苏美尔语本身相对而言要容易理解一些。泰罗发掘出土的材料表明，苏美尔人才是楔形文字体系的最初发明者，正是他们将自己神庙的经济活动记录了下来。这种文字后来被阿卡德人和其他人所采用，苏美尔语成了一种礼拜仪式的语言，如同基督教世界的拉丁文一样。另外它还保存着古代的一些神话传说，比如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传统的核心作品吉尔加美什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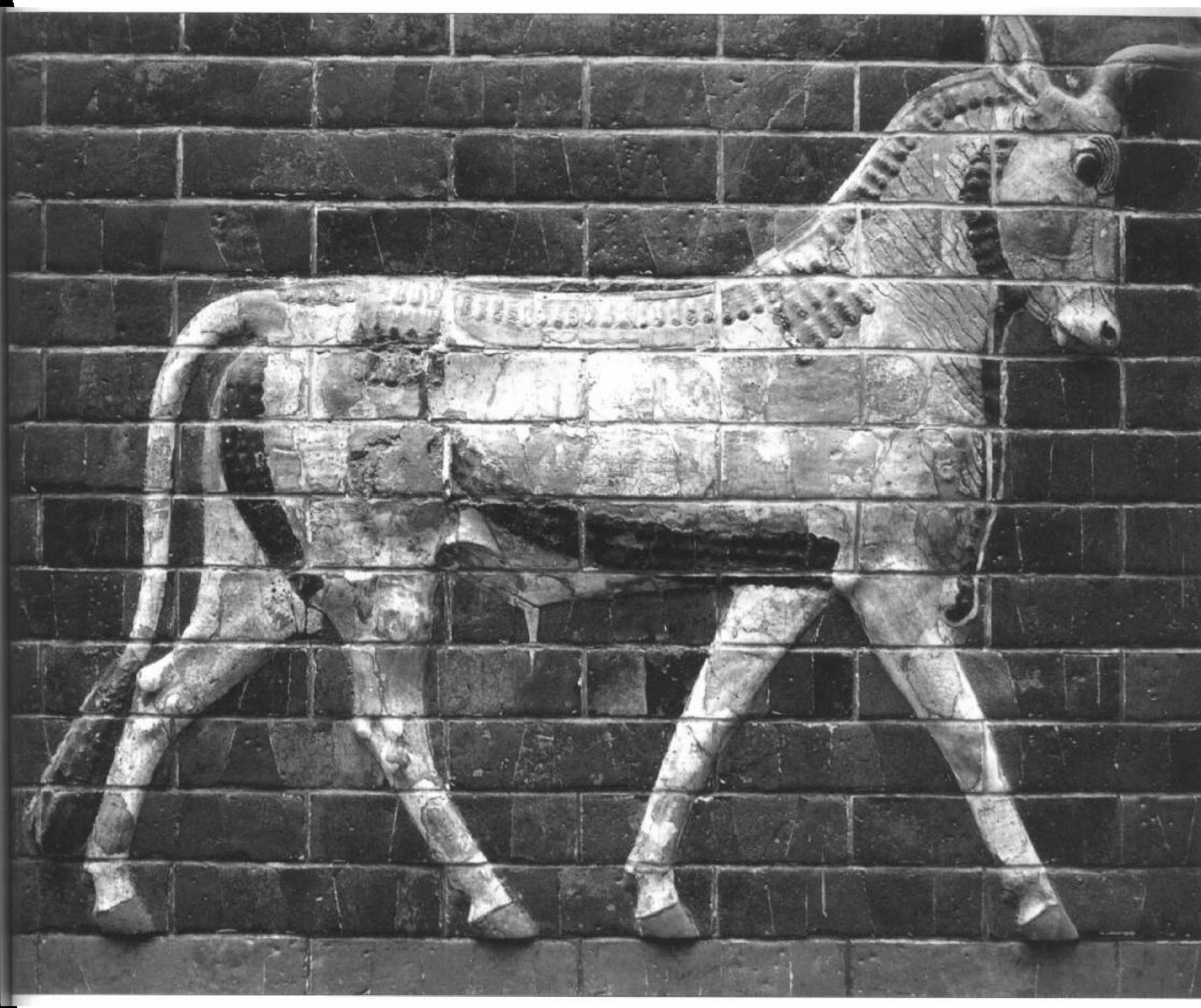
美国考古专家首次进入这个地区是在19世纪80年代。新成立的美国东方学会于1884年的会议上呼吁对美索不达米亚进行一次考察之后，美国考古学研究所便发起了一次由私人赞助的旅行。在费城还设立了一项巴比伦尼亚探察基金。188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支探险队在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的领导下启程去尼普尔。彼得斯没什么经验，对阿拉伯语一无所知，不晓得如何控制多达250人的当地工人队伍，就是美国人本身的相互关系也十分紧张。每个人都忧心忡忡，条件十分恶劣：死了一个人，头一个季度是在阿拉伯人的一次袭击造成的混乱中结束的。在这次袭击中，“有一半马匹被烧死，枪支、鞍囊和价值1000美元的黄金落到劫匪手里，但所有古物却幸存了下来。在疯狂的阿拉伯人的狂呼乱舞下，这次探险活动最终收场了……”

在以后一些年里，条件有所改善。宾夕法尼亚的探险队设法在1889至1900年间展开了连续的发掘工作。他们最显赫的成就是出土了30000块楔形字泥板，其中许多是在尼普尔的抄写学校里写就的文本，包括苏美尔人的神话和其他宗教作品。这一切使我们能够系统地窥见到苏美尔宗教的情况。一些属于晚后时期的文献也被发现。即使在今天，这些加喜特王朝的行政记录仍旧给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时期巴比伦尼亚史（公元前1595－1157年）的最详尽的信息。而公元前5世纪的穆拉树银号（古代巴比伦的大商号和银号——译者注）的经济记录，则对了解阿黑门尼德王朝统治时期的巴比伦尼亚打开了一扇窗户。当时，即使是拥有大量土地的波斯人也不得不向银号借贷以支付他们的税款。

科尔德威在巴比伦

尽管德国考古学家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迟来者，但他们很快便给此地的考古带来了强有力的、持久的影响。1887年，柏林的普鲁士皇家博物馆对巴比伦尼亚的两处遗址的发掘工作予以资助，发掘负责人是罗伯特·科尔德威（Robert Koldewey）。这是一位坚韧不拔的建筑师，是在近东进行系统发掘工作的先驱。起初，科尔德威对发掘泥砖建筑的工作并不熟悉，但他很快便学会了该如何做，并受新成立的德国东方学会之命去发掘巴比伦城本身。他在那里的发掘工作开始于1899年，一直延续到1917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断，但他的考古队在那场战争期间，一直支配着德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活动。

科尔德威的特殊贡献在于他揭示了尼布甲尼撒在位期间（公元前604－562年）巴比伦的城市布局和建筑结构。这座城市的外墙有规则地每隔一段距离设有



塔楼，环绕的面积约达850公顷，如希罗多德所说，城墙宽度足以供四马拉的战车在上面转弯。外墙里边是一座由城墙拱卫的内城，这是巴比伦帝国的圣地和王室的心脏地带，可通过伊斯塔尔门，经一条供仪典游行的大道进入其间。伊斯塔尔门是座高大的、用釉面砖建成的拱形门楼。釉砖墙上装饰着模制成型的龙和牛的形象。尼布甲尼撒的南部宫殿恰好屹立在大门之内，各个巨大的庭院四周有数百个房间，其中王室住所同大门一样，装饰着用釉面模制砖块砌成的浮雕。科尔德威认为，宫殿中有一处由圆顶房屋与水井构成的地下建筑组合，带有水压提升装置的痕迹。在宫殿东北角，有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巴比伦空中花园的遗存。

科尔德威发掘泥砖建筑的技能使他能够分辨出不同时期的建筑，理清该遗址上各时期建筑物之间的复杂的先后关系。他以这种方式在城市的莫尔克斯区发现了属于立法家汉谟拉比（公元前8世纪古巴比伦帝国的创立者）时代的早期定居点。1902至1914年间，瓦尔特·安德烈（Walter Andrae）把同样的技术应用于阿淑尔的发掘，同样取得了成功，发现了公元前两千纪和一千纪的大批公共建

上图为釉面砖砌成的公牛，出自巴比伦仅存的伊斯塔尔门的残骸，时间属公元前6世纪。这座生动的蓝色门楼最初约有23米（75英尺）高，饰有成排的、黄白相间的牛与龙。按照巴比伦人的记载，还有一些“威风凛凛的巨大青铜牛和龙的雕像”守护着大门。在科尔德威发掘之后，这里的砖块被一一拆了下来。目前伊斯塔尔门在柏林的近东博物馆内得到复原。

筑。每座建筑物都依次进行了探查、清理、拍照和画出平面图。然后清除掉这些建筑废墟，以便考古工作者能够把注意力转移到位于其下部的、时间更早的层次上去。对伊斯塔尔庙和阿努阿达德神塔组合的深入勘查，识别出始建于公元前三千纪初的老城的不同层次，这与法国人仍在泰罗发掘的拉伽什城属于同一个时代。较早的伊斯塔尔各庙宇的建筑布局以及在该层次上发现的许多人工制品的风格，为博塔和莱亚德此前发现的亚述的庞大古建筑提供了早期的比照对象。

法国人在苏萨

自公元前4000年到中世纪，苏萨城一直静卧在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平原上，是近东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也是理解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兰文明的关键。威廉·洛夫特斯在19世纪50年代勘查了该处遗址。法国土木工程师马西尔·丢拉弗于1884－1886年跟随其后，发掘出阿黑门尼德诸王的圆柱大厅阿帕达纳，使“射手壁缘”以及其他阿黑门尼德时期的若干件著名美术作品恢复了原状。

法国人此时垄断了在波斯的考古活动，拥有他们的发掘出的全部古物的所有权。他们在伊朗西部进行过广泛探查，但其发掘工作则集中于苏萨。在那里，他们持续干到1979年伊朗革命发生为止。当最先出土的房屋显露出坐落于土丘顶部的城堡端倪时，人们采用的发掘技术还是很粗糙的。1200名左右的工人分成若干小队，其主要任务是迅速移走随意认定的5米厚的土层。据说经验已经证明，“如果工人们把厚达5米的土抛进手推车，埋藏的材料也许就不会受到损害”。苏萨自公元前5000年到伊斯兰时代初期的各史前文化层以及为人类所占据过的一个漫长序列虽然还有缺漏环节，但毕竟被辨认了出来。还出土了由古代苏萨居民从巴比伦尼亚掠夺来的众多两河流域的美术作品，最著名的是一块载有汉谟拉比（公元前18世纪的巴比伦尼亚的国王）法典的石碑。石碑上部刻有国王在太阳神和正义之神沙马什面前祈祷的场面，法典宣布巴比伦尼亚依从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则，以使“强者不致压迫弱者，把正义赋予孤儿和寡妇”。

大英博物馆的远征

1860年之后，虽然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研究工作因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成就而黯然失色，但在19世纪70年代，我们还是看到了由一位自学成才的亚述学家乔治·史密斯领导的三次颇引人注目的远征。他辨认出属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的半传说中的乌鲁克国王吉尔加美什的史诗片段，他同时还对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楔形字文书进行了分类。史诗故事中有一部分明显与“创世记”中有关挪亚和大洪水的记载相似，神灵以亚指示乌塔纳皮什提姆造一条小船，以便他的全家及其所有牲畜都躲到船上，在恩利尔神将要降下的世界大洪水中能够幸免于难。“看下面第三段”，史密斯写道：

> 我的眼睛盯在这段关于船只搁浅在尼西尔山的描述上，接着是关于放出鸽子的段落，它因找不到栖身之地而飞了回来。我一下子明白了，我在这里

至少发现了一段迦勒底人关于大洪水的记述。

1872年，史密斯给《圣经》考古学会作了一次演讲，激起了公众的巨大热情，《每日电讯报》为他提供了1000英镑，以便他去寻找有关吉尔加美什传说的其余部分。史密斯接受了这笔款项后赶赴库云吉克，用一周时间便找到了必要的楔形字文书。当《每日电讯报》拒绝支付额外的资金之后，他返回大英博物馆，为后来进一步的两次探险活动筹措经费。他雇了600名工人，在先前发掘所留下的残留物中筛滤出大量的断简残篇。只是在后来，他的好运到头了。1876年的夏季酷热当中，他从摩苏尔穿越沙漠，在阿莱坡因染霍乱而去世。

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发掘工作随后便由霍尔穆兹德·拉萨姆主持。他在19世纪40年代是莱亚德的助手。在50年代作为英国驻亚丁领事被"放逐"之前，他独立从事发掘活动。他那野蛮的发掘策略同他的各次发现一样令人记忆犹新。拉萨姆在1879至1882年间在遍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土耳其东部地区广为挖掘，常常同一时间发掘若干个遗址。他为大英博物馆收罗到数目可观的古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有亚述国王沙尔马奈色三世（公元前858－824年在位）的王宫大门，发现于尼姆鲁德附近的巴拉瓦特。这些包铜的大门"饰以各种题材的浮雕，如会战场面、凯旋游行、宗教表演"等。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拉萨姆的不朽贡献是在巴比伦附近的古代城市西巴尔遗址上发掘沙马什庙。他在那里挖出了坐落在神塔四周的几近200间房屋，找到了几万块楔形字泥板，内容涉及这座神庙的行政管理和法规记录。尽管这些泥板未经烘焙，极易破碎，但它们很好地揭示出了巴比伦尼亚在公元前一千纪中叶的经济生活。

拉萨姆最终离开美索不达米亚是在1882年，他那笨拙粗糙的技术当时已经过时。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随着他的离去，土耳其开始规范奥斯曼帝国范围内的考古活动，建立了一座皇家博物馆，专门负责收存新发现的文物和授予外国人发掘许可证，外国人一次只许发掘一个遗址。

赫梯人

欧洲人对安纳托利亚的探索早在19世纪便已开始，最初到那里去的是一些收集古物的旅行者，如法国人查理·特谢尔（Charles Texier），他于1834年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博哈兹科依找到了一处巨大的废墟，他起初认为这是居鲁士大帝于公元前6世纪击败克洛伊索斯的地点——普特里亚。那里有一道宏伟的石墙，圈绕的面积达180公顷（445英亩），城墙上有一扇大门，上面饰有雄狮。除此之外，特谢尔还在亚兹利卡雅发现了一处崇拜遗址，岩壁的正面装饰着莫名其妙的象形字和一些人组成的队列。有关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部发现的类似古建筑的报道，在随后几十年里陆续传到欧洲，这一点逐渐变得很明显，即在这里存在着先前未曾料到的古代文化。

19世纪70年代晚期，英国东方学家阿奇巴尔德·塞斯（Archibald Sayce）和爱尔兰传教士威廉·赖特（William Wright）分别独立提出，新的安纳托利亚文字应当属于《圣经》和亚述及古埃及史料中提到的赫梯人。塞斯甚至设想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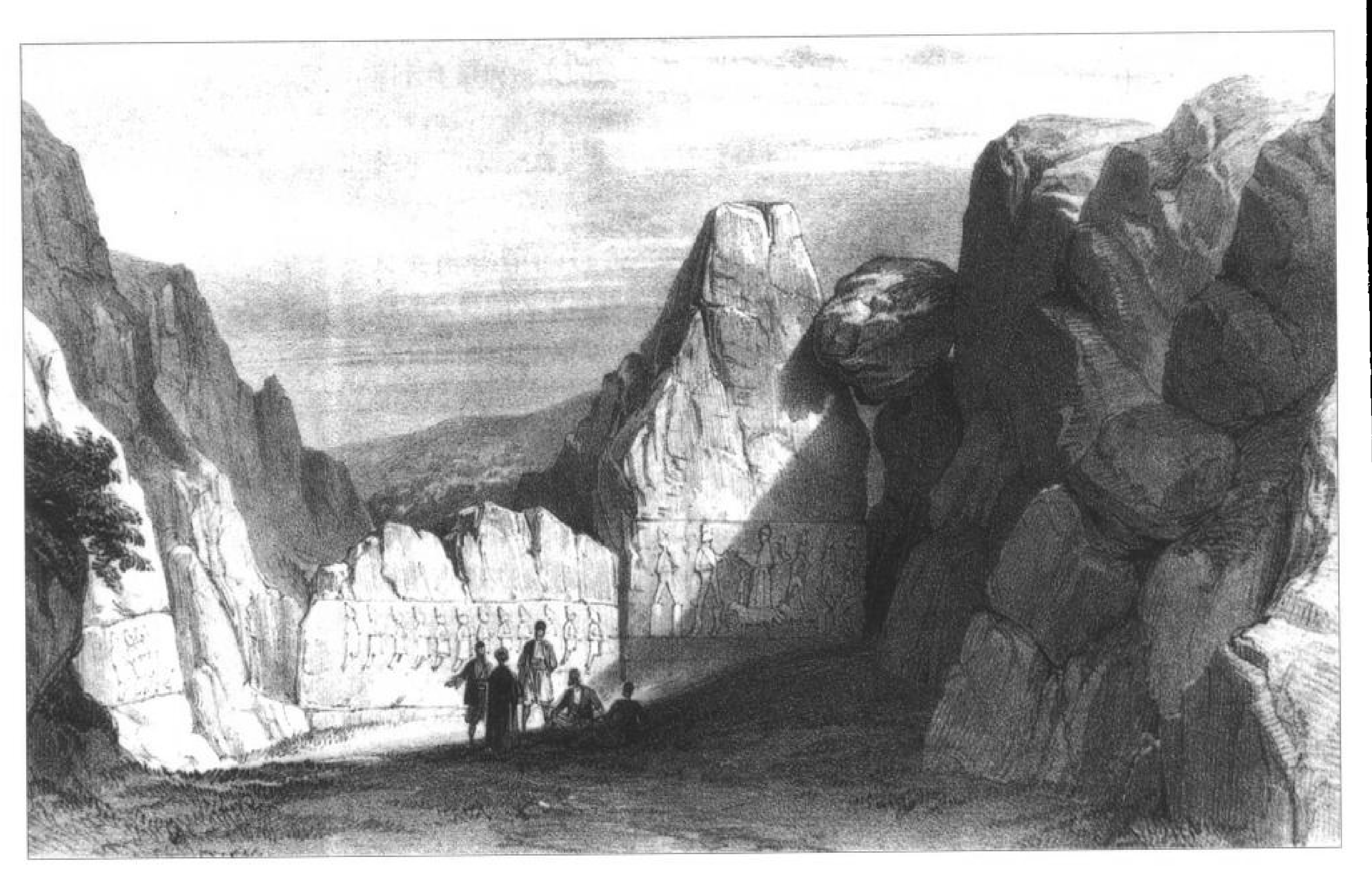
过一个赫梯帝国。他的看法对于谨慎的学者来说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热烈争论仅仅是在19世纪80年代才有所低落，当时人们在埃及的阿马尔纳发现了公元前14世纪的外交信件，上面明确提到了赫梯帝国。阿马尔纳的书信是用阿卡德楔形字写成的泥板，由埃及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各附属国的统治者们写给埃及法老的，有些书信极力表白自己对埃及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忠诚，即使有赫梯的利诱也不为所动。其他的一些书信则涉及到赫梯的侵略、为写信人的无能进行辩解:

> 卡梯（赫梯）国王正待在努赫卡什，我惧怕他。上天阻止他进入阿木鲁。如果他攻打图尼普，那离他现在待的地方只有两天的路程。所以我惧怕他，我因此要待在这里，一直等到他离去。

埃及和赫梯之间的某些信件甚至使用了“兄弟”之类的客套话，两国还寻求以和亲的形式缔结联盟。

阿马尔纳书信将赫梯帝国明白无误地标到了古代近东的地图上，但它们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许多自土耳其南部和叙利亚北部遗址出土的象形字文书和风格古朴的雕刻都属于铁器时代的王国，即公元前12至8世纪，也就是《圣经》所记载的赫梯。然而，阿马尔纳书信反映的赫梯却属于青铜时代晚期，要早几个世纪。即便是在那时，赫梯帝国也越出了它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故土，向外扩张到了叙利亚。他们在家乡遗留下许多古建筑、美术作品和铭文，这些遗址后来被铁器时代的赫梯人，即很快得名为新赫梯人的后来者所占据。因此，考古工作的使命将是通过挖掘来发现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赫梯文化有哪些不同。

岩石中凿出的亚兹利卡雅神殿，位于博哈兹科依附近，属公元前13世纪。人们认为由人物组成的横列浮雕——其中某些人根据铭文可以识别出他们的身份——系赫梯国王图德哈利亚斯四世在位时的作品。总之，从这些浮雕上能够看到60多个这样的人物。



德国、英国和法国考古学家同时接受了这个挑战。菲利克斯·封·卢森（Felix von Luschan）于1888年在土耳其东南丘陵地带的金基尔利开始挖掘。在罗伯特·科尔德威（后来巴比伦城的发掘者）的帮助下，他发现了一座由设防宫殿构成的铁器时代的城堡，并在这个城堡周围收集到了足够的样本，表明这处遗址的基本布局是城堡的周围形成了市镇。这处遗址上的宫殿及其入口遗迹首次证明了“新赫梯”艺术的特点，而阿拉姆语的铭文则对深入了解那个时代的国际政治，尤其是为叙利亚在公元前9－8世纪反抗亚述扩张的历史提供了证据。

英国人是在卡尔奇美什展开工作的。这是一座赫梯城市，位于俯瞰幼发拉底河的一个渡口处，自公元前2000年代初期始该城便落入叙利亚的控制之下。第一次勘查工作由大英博物馆的一支探险队于1878年进行。戴维·霍格思在1908年和1914年间则在伦纳德·伍莱（Leonard Woolley）和劳伦斯（Lawrence）帮助下，对卡尔奇美什进行了更加充分的发掘。年轻的劳伦斯生气勃勃，刻苦耐劳，挖掘时常穿的工作服是一件色彩鲜明的夹克衫和足球短裤。他们的工作集中在城堡和叙利亚－赫梯城市的内外城上，特别关注的是雕刻和铭文。城堡建在一个宽阔的平台上，有巨大的阶梯可以拾级而上。城堡中立有刻画着神灵、祭司、武士和国王的成排的浮雕，象形铭文的解说词穿插其间。伍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伦纳德·伍莱、劳伦斯与一块浮雕的合影，1912年摄于卡尔奇美什。

卡尔奇美什浮雕的最终命运是个令人伤感的故事。英国探险队在1914年离开土耳其时，把它们留在了遗址上。但1920年新划定的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把这个遗址分成了两半，伍莱伤感地写道：“一位驻守在杰拉布鲁斯的土耳其军官决定移走这些石头……许多浮雕被打碎了，其余的被装上火车车厢，但是被拉去垒筑堤坝。它们在那里保留到1921年或更晚。有些浮雕被人偷走并卖掉了，大英博物馆最终买到了一件狮子的头像（真令我作呕），少量其他作品则被卢浮宫收存。”



"在一座土耳其战俘营里为其他战俘苦中取乐，写作了"他的《死亡之城与鲜活的人们》一书，书中他这样描述这个遗址：

> 你站在石板铺成的路面上或鹅卵石铺成的院落里，这些磨光的石头自从卡尔奇美什在2500年前被付之一炬以来，还从没有被人的足迹接触过。在你周围和你的上方，是一排排雕刻的图形、神灵、动物、战士和纪念已被忘却的国王们的铭文。有古老的神像、宽阔的阶梯和门槛，大门的灰烬仍然堆在门槛的角落里。柱基（柱身是西洋杉）和青铜柱顶呈网状和石榴花状。深红色的秋牡丹点缀在石岩之间，爬在宫墙或神庙墙上的蜥蜴懒洋洋地晒着太阳，春风把灰尘洒落到这座至尊的城市废墟上。

右图：耶路撒冷的圆顶清真寺和旧城。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于1867－1868年对该城地下穿凿的通道所进行的考察，应属最早的地下考察之列。

据《伦敦新闻画刊》报道，在贞女喷泉和西罗亚水池之间有一条长520米（1700英尺）的泉水通道特别难以通过，简直是险象环生：

> 水道的高度从西罗亚水池向上开始缩小，直至在某些地方降到不超过16英寸或20英寸高。沃伦中尉及其助手伯特里斯中士，以及一个同他们一起的农民或阿拉伯工人，不得不背朝下平躺着向前蠕动，一只手拿着测量工具、铅笔和笔记本，嘴里叼着点燃的蜡烛，艰难地经过一段散发着臭气的水流，有时水深达12英寸。他们用了4个小时才穿过这条水道，很有可能溺死在一股水位突然抬高的水流之中。

对该遗址的深入研究确认，这里曾经存在过一系列更为古老的定居点，年代可再向前推4000年。尽管卡尔奇美什仍然是北叙利亚的一个重要考古地点，但现代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界正好穿过这个遗址，导致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再也没有人到这里发掘。

青铜时代的赫梯文化在1906年之后变得被人熟知起来，这是由于胡格·温克勒（Hugo Winkler）在赫梯首都博哈兹科依（古代的哈图沙）发掘的结果。在这里，有段伸展开来的长达6公里（3.7英里）环行的城墙，城墙圈起来的面积计有180公顷（445英亩）。城墙内另有一设防的内城，占地80公顷（198英亩）。温克勒先对内城进行挖掘，很快便发现了神庙和宫殿以及10000块泥版，上面既写有赫梯语的楔形文，也写有阿卡德语的楔形文。但他缺乏技术能力，不能把博哈兹科依理解为这样一个考古遗址，即在晚期青铜时代（约公元前1500－1200年）的赫梯帝国以前，有人已在这里生息过两千年了。这个任务仅仅到了1931年才被完成。当时，科特·比特尔（Kurt Bittel）恢复了德国人在博哈兹科依的发掘工作，这是一项极其成功的、一直到今天仍在继续执行的长远计划。

从博哈兹科依出土的赫梯楔形字泥版文书再次提出了释读的难题。这一次的破译功臣是捷克古文字学家弗里德里希·赫罗兹尼（Friedrich Hrozny）。赫罗兹尼利用适当的名字、表意符号（代表一件东西或思想的楔形字符号）和同源词（在不同语言中具有相同含义、发音类似的词）辨认出赫梯语属于印欧语系。到1915年，他结束了这一基本分析。博哈兹科依的泥板所蕴含的信息量，要大大超过阿马尔纳档案和埃及铭文之类浮在表层的史料，通过它们可以构建起赫梯历史的基本脉络，赫梯帝国的画面得到了充实。只有赫梯象形文字至今仍然是个谜。这个秘密直到1947年土耳其东南部的卡拉提普的阿拉姆－赫梯语的双语铭文被发现才得以破解。

圣地上的士兵和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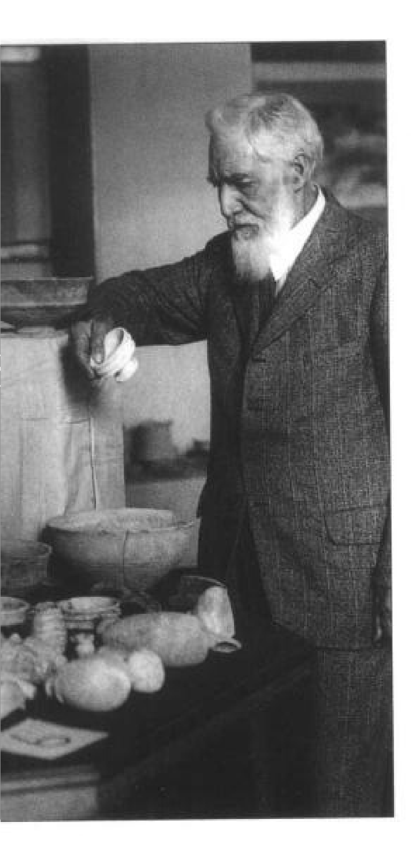
主要因为1854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欧洲人才注意到巴勒斯坦这块圣地上的凄惨状况。黎凡特地区的古迹不如埃及和亚述的古迹那么引人注目，也没有古代语言需要破译，所以它在早期受到人们的忽略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熟读《圣

经》的公众脑海中，仍旧具有一种对古代巴勒斯坦的潜意识。这种意识不断受到像伯克哈德发现彼特拉城之类事情的刺激。《旧约全书》所起的旅行指南的作用曾鼓舞一批《圣经》研究者（如美国的爱德华·鲁宾逊）成为历史地形学家。鲁宾逊从1838年以后在圣地上工作，并正确地识别出了100多个古代遗址。

发掘工作展开的比较晚后。早期发掘仅着眼于耶路撒冷，1851年路易斯－菲里森·德·索西（Louis-Felicien de Saulcy）在那里清理了一些崖墓，他想当然地将这些墓葬的年代确定为大卫王时代（现在已知它们属于希律王时代，较大卫王时代晚1000年）。10年以后，拿破仑三世仿效早些时候他叔叔在埃及的探险，发起了一次对腓尼基的考古调查活动，考察队的领导人是神学家厄内斯特·勒南和德·索西。瑞南考察了黎巴嫩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在毕布罗斯、西顿、提尔和阿沃德进行了挖掘，虽为卢浮宫收集到大量古文物，但对这些遗址的理解却不甚了了。1863年，德·索西返回耶路撒冷，一边进一步清理墓葬，一边在圣地哈拉姆·埃什－沙里夫的城墙下发掘。在这里，希律曾于基督在世时建起一座自己的神庙，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夫阿巴德·阿尔·马利克（685－705年）则修建了圆顶清真寺。德·索西在这两大宗教的圣地进行发掘，激起了当地犹太人的反对，在欧洲也引起了人们的流言蜚语。

英国是通过1865年在伦敦成立的巴勒斯坦考察基金会介人这个地区考古活动的。该基金会利用娴熟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军事测量人员，成功地绘制出了高精度的圣地地图。基金会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调查耶路撒冷的地形，但这方面进行的不太顺利。1867年首次开始的发掘是由皇家工兵部队的查尔斯·沃伦中尉主持的（他后来成为警察局长，因抓获碎尸犯杰克而闻名遐迩），他在这里采用了正规的军事挖掘技术。沃伦在哈拉姆城墙下打出隧道，确定希律神庙和哈拉姆·埃什－





弗林德斯·皮特里在他首次于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举办的巴勒斯坦文物展上。1930年摄于伦敦。图中陶器出自埃尔－法拉土丘，这是他在此前8个月发掘的一个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的居民点。

沙里夫圣地是在很厚的考古堆积物上修建的，而堆积物则填满了整整一道深谷。他还发现，这些石工工程有可能是所罗门在公元前10世纪修建的第一座耶路撒冷神庙的遗迹。

皇家工兵部队还被基金会用来进行绘制地图的科考活动。1864年，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勘查了由希西家（约公元前713－686年）在耶路撒冷的地下岩床中开凿出的隧道和水槽系统，这是为了对付亚述人的一次围城而建造的。1868年，威尔逊在法国开始开凿苏伊士运河之前对西奈半岛展开了考察。1871－1877年，另外两位专家——当时才20岁的霍雷肖·基钦纳（后成为勋爵）和克劳迪·康德勒——率领的一支队伍对巴勒斯坦西部进行了全面测绘。在同一时期，美国地图绘制师测绘了约旦东部，剩下的地图测绘工作最终是由德国测绘队于1901年完成的。最后在1913年，霍格思在卡尔奇美什发掘的助手伦纳德·伍莱和劳伦斯测绘了内格夫。虽然他们进行的是考古学测绘，但这些地图仍然十分重要，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助于埃伦比的部队同土耳其人展开巴勒斯坦会战；它们还把巴勒斯坦与叙利亚区分开来，确定了巴勒斯坦北部和东部的界线，而在1948年成立的以色列国则将这些界线正式化了。

1890年之后，人们对巴勒斯坦遗址的考古前景有了更深的认识，当时巴勒斯坦考古基金会请到了弗林德斯·皮特里去耶路撒冷之外进行发掘。为了给巴勒斯坦考古工作创立一个编年结构，皮特里采用了自己在埃及开发的严格的发掘标准和序列定年技术。他选择的遗址是埃尔－亥西土墩，这是一座典型的近东土墩，30多米（100英尺）高，有叠压起来的许多文化层。在仅仅6周的时间里，皮特里识别出11层叠压起来的居民点。他将这个遗址同已经确定的埃及陶器序列加以比较，得出了这些文化层属于公元前1670－450年的结论。

在埃尔－亥西，皮特里成了近东考古学家中第一个通过地层学方法绘出遗址各个断面的人，并且是第一个将他的发现同图中的个别层次联系在一起的人。他在此基础上对人工制品尤其是陶器作了分门别类，首次为巴勒斯坦考古制定了一个年表，从而为将来的所有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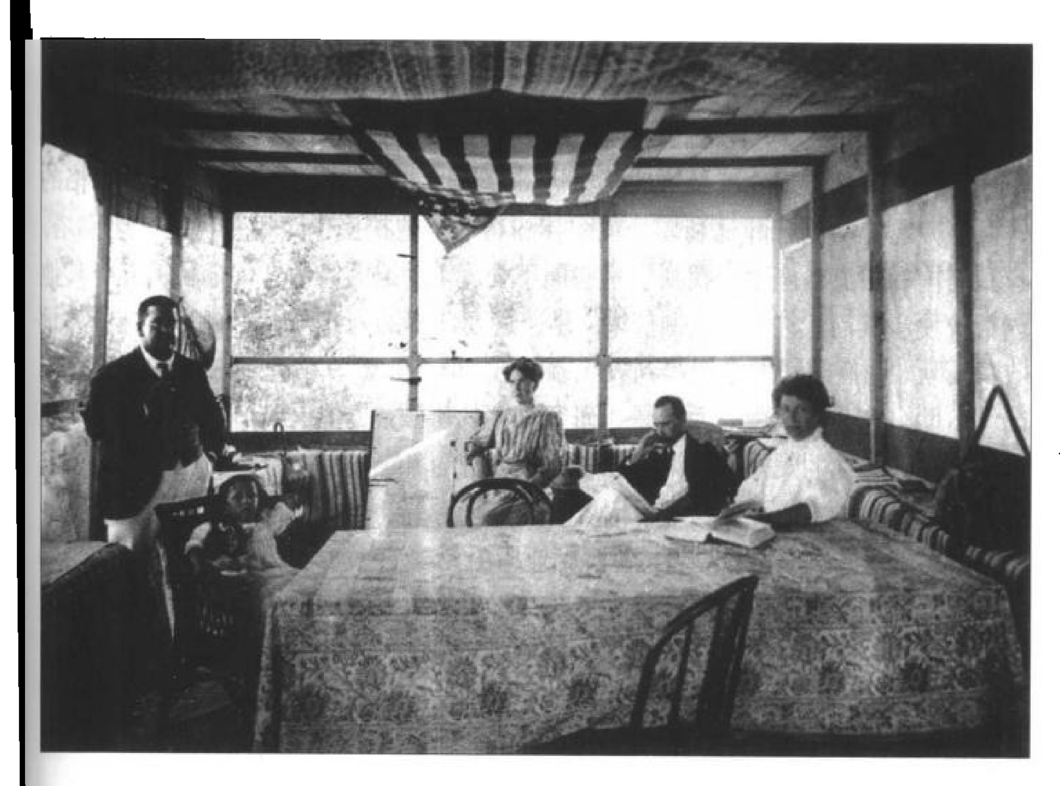
尽管皮特里在埃尔－亥西的发掘硕果累累，但他在1926年以前便没有再回过巴勒斯坦。使他感到灰心丧气的并不是生活方面的种种不便，如他在自己的帐篷里发现了毒蜘蛛，还有蝎子，水井离遗址有9.5公里（6英里）远，煮饭时锅里如死水一潭，“一次等于做了三道菜，汤是汤，鱼是鱼，青菜还是青菜”。最让他感到难受的还是当地人的敌视，敌视在这次发掘活动的尾声达到了顶点——考古队遭到当地土匪的残暴抢劫。

重新回到埃及并没有给皮特里带来改进他的地层学发掘法的动力。他的大多数工作都着眼于单个时期的遗址。当他确实在发掘一个多时期的遗址时，复杂的地层又使得他几乎无法做出记录。这是一种失败，这种失败将成为他于两次大战之间在巴勒斯坦工作的标志。然而，皮特里对考古的深入理解使他与同代人（如纳维尔）产生了明显的不同。纳维尔的嗜好是古建筑，但他的发掘因漏掉有关出土的陶器和小文物的记录而臭名远扬。由于认为对个别文物的位置加以记录是在浪费时间，纳维尔曾有过一句有名的话“你恐怕也可以为一块葡萄干布丁里的各个葡萄干的位置拟定一个计划。”

虽然埃尔－亥西有了地层记录，但大多数本来需要严格加以管理和记录的具有多层次的巴勒斯坦遗址，仍旧受到粗笨的挖掘。爱尔兰考古学家罗伯特·麦卡利斯特（Macalister）在1902到1908年间发掘了巴勒斯坦的重要城市杰泽，他监督200名工人劳动，只有一个埃及工头作为助手。他沿着遗址的东部边缘挖了一道12米（40英尺）宽的壕沟，直抵岩床之上。然后又在西边挖了一道同样的壕沟，从第二道壕沟取出的废渣土填到第一道壕沟当中。麦卡利斯特以这种方式逐步向土丘中央靠拢，最终发掘了遗址的3/5。他对于是否记录小件发现物的态度与纳维尔一样，认为“任何恰好埋在土丘中的普通物件的确切位置，一般是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难怪在两次大战之间对改进考古学标准做出重大贡献的英国学者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曾说：若将巴勒斯坦“同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相应地区相比，这里恐怕是在考古学的名义下犯下最多罪恶”的地方。

美国考古学家弗里德里希·布利斯（F.Bliss）于1891年接过了皮特里在埃尔－亥西的工作，修正了皮特里的一些结论，发现了巴勒斯坦的第一块楔形字泥板。该泥版记载了一支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埃及驻军，年代相当于阿马尔纳泥版所在的时期。1894年，布利斯转移到耶路撒冷，对一座石砌防御工事的遗存进行隧道挖掘的探测，发现该工事也属于青铜时代晚期，恰好是大卫在大约公元前996年攻下这座城市之前的一个时期。

20世纪头10年，考古发掘日渐增多，欧洲人和美国人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这一地区的考古活动中来。在1900至1902年间，布利斯和麦卡利斯特挖掘了从青铜时代到罗马时代的4处不同时间的遗址。之后，麦卡利斯特开始在杰泽工作。奥地利人恩斯特·塞林（E. Sellin）和德国人哥特里伯·舒马赫（G. Schumacher）发掘了塔阿纳克土墩，发现青铜时代的防御工事、一座神庙和由40块楔形字泥版组成的档案材料。1903年，由于德国巴勒斯坦协会提供了充足的经费，舒马赫移师麦基多去发掘那里的青铜时代的城镇。1907年，塞林以维也纳科学院的名义开



美国考古学家乔治·赖斯纳（G. Reisner，1867－1942年）在巴勒斯坦撒马利亚的发掘工作室中，约摄于1910年。从左往右依次为：赖斯纳、他的女儿玛丽、一位不知名的妇女、考察队的建筑师克劳伦斯·S·菲舍、玛丽·赖斯纳太太。

赖斯纳是位非常细心的发掘者，30来岁便确立了自己的声望。当时他率领加利福尼亚大学探险队到科普托斯墓地进行发掘。1907年至1910年，赖斯纳在下努比亚地区为埃及政府工作，处理因第一阿斯旺水坝水位抬高而受到威胁的古建筑。

他在努比亚的考古调查非常成功，以至赖斯纳被称为“美国有史以来产生出的最伟大的考古学家”。1914年，他成为哈佛大学考古学教授，直到去世，他一直都在哈佛担任教职。

始挖掘耶利哥。第二年，即1908年，美国埃及学家赖斯纳来到这里，开始发掘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王国的首都撒马利亚。赖斯纳为地层复杂的巴勒斯坦遗址制定了新的、令人难忘的发掘标准，他在这方面做的事情甚至较比特里还要多。这些标准连他自己的助手都很少达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没有中断近东的考古活动，但考古学家本身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劳伦斯和其他英国考古学家一道为情报部门工作，而他却作为“阿拉伯的劳伦斯”而赢得了不朽的声望。霍格思成为开罗阿拉伯局的局长，伍莱以战俘身份度过了一段时间。科尔德威在巴比伦坚持到1917年，然后抢在摩得将军的部队之前逃之夭夭。当和平于1918年降临在政治形势已大为改观的近东时，许多考古学家返回故地，致力于解决战前遗留下来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对印度的考古调查

在考古学的历史上，对印度的发掘活动开展得相对晚后，而且时断时续。印度南部的巨石古建筑最先引起人们的注意，时值1819年。当时巴宾顿（J. Babington）在马拉巴尔打开了当地的一些墓葬，发现有铁器制品、陶器和珠子。虽然他没有能力辨别出土古物的文化层，但其他发掘还是接踵而来了。语言学家和行政官员菲利普·米道斯·泰勒（P.M.Taylor）在19世纪50年代挖掘了海德拉巴以及印度中部和南部其他地区的巨石墓，他特别小心地遵循当时既定的考古标准，观察殉葬物品所在的地层，推论说他发现了“由东凯尔特人或斯基泰人构成的、伟大的雅利安人游牧部落”。然而，大多数巨石墓的发掘工作都不可避免地是在当时粗野精神指导下进行的。在1821年马德拉斯有个法官利用犯人挖了一座墓，除了发现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古剑，一个陶瓶，据说里面便没有任何东西了”。其他人则直接把发掘当作一种解闷寻乐的消遣。这些活动与同时代英国境内的掘墓活动一样，除了对收集古董有促进作用之外，可以说再没有什么其他积极意义。

在印度北部，早期发掘者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佛塔上。佛塔是砖砌建筑，里面有间安放神圣遗物或经书的墓室。1830年，独立的锡克国王兰吉特·辛格的军队中，有位叫勒·薛瓦利埃·范图拉的将军，他挖掘了旁遮普邦的一座佛塔，进到塔内的中央台座上，找到了一些属于公元1世纪的铸币、黄金和铜斧。其他人很快便步其后尘，大肆挖掘佛塔，足迹远及北部的阿富汗。他们的动机仍然是收集古玩。他们热切地希望得到人工制品，尤其是得到在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或公元1世纪铸造的钱币，而不是想研究早期的佛教建筑。

随着破坏性的发掘日益增多和古建筑自身的日渐破败，最终引起人们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古迹，并鼓励对印度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这项行动的著名支持者是西北省份的军事调查员和总工程师亚历山大·坎宁安(Alexander.Cunningham)将军。他请求印度政府对遗址和古建筑进行系统的考察，理由是“发现和公布所有现存的古建筑和雕刻遗迹以及伴生的钱币和铭文，比起出版18卷《往事书》(梵文史诗)内含的那一大堆垃圾来说，也许更能说明印度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以及其本国内部的历史”。正是这个请求最终导致了印度考古调查署的建立。

自19世纪中叶到1947年印度独立，印度的考古学与英国政府的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印度的第一任总督坎宁爵士是亨利·莱亚德的赞助人斯坦福德·坎宁的堂兄弟，他于1860年成立了考古调查署，将印度北部划为它的责任区。第二年，坎宁安被任命为临时考古调查员，负责对那些“最值得注意的遗存及其可以追溯到的历史，以及仍存在的有关它们的传统记载，做出精确的描述”。这个职位在1866年被废除了，但在1870年又重新设立了这个职位，并且头衔变为更显眼的印度考古调查总监，总监可以配有几个助手。坎宁安在这个岗位上任职到1885年退休为止。

任命坎宁安的委员会备忘录在1862年的《孟加拉亚洲学会期刊》上发表，上面清晰地阐明了英国政府的动机：

作为一个具有文明素养的统治力量，如果我们继续允许这样一些调查领域，如比哈尔的佛教旧都遗存、密密麻麻点缀在德里周围平原上的废墟（密度比罗马平原还大）以及其他许多遗址，仍未受到较迄今已做过的调查更为详尽的调查的话，那将是不光彩的。迄今为止，这方面的每件事都是由私人做的，它们既不完善，又无章法。倘若欧洲各国政府像我们这样治理印度，是不允许出现以上情况的。

坎宁安对印度古代具有持久、浓厚的兴趣。他在为《古代印度地理》一书（献给亚述学家亨利·罗林生的一本书）的写作做说明的时候这样写道：

我个人也对印度北部做过非常广泛的旅行……我在印度南方没看着什么东西，我在印度西部仅参观了孟买，看了著名的伊勒方塔和坎哈里的洞穴。但在印度担任长达30多年的公职期间，早期史和地理学是我闲暇时的主要研究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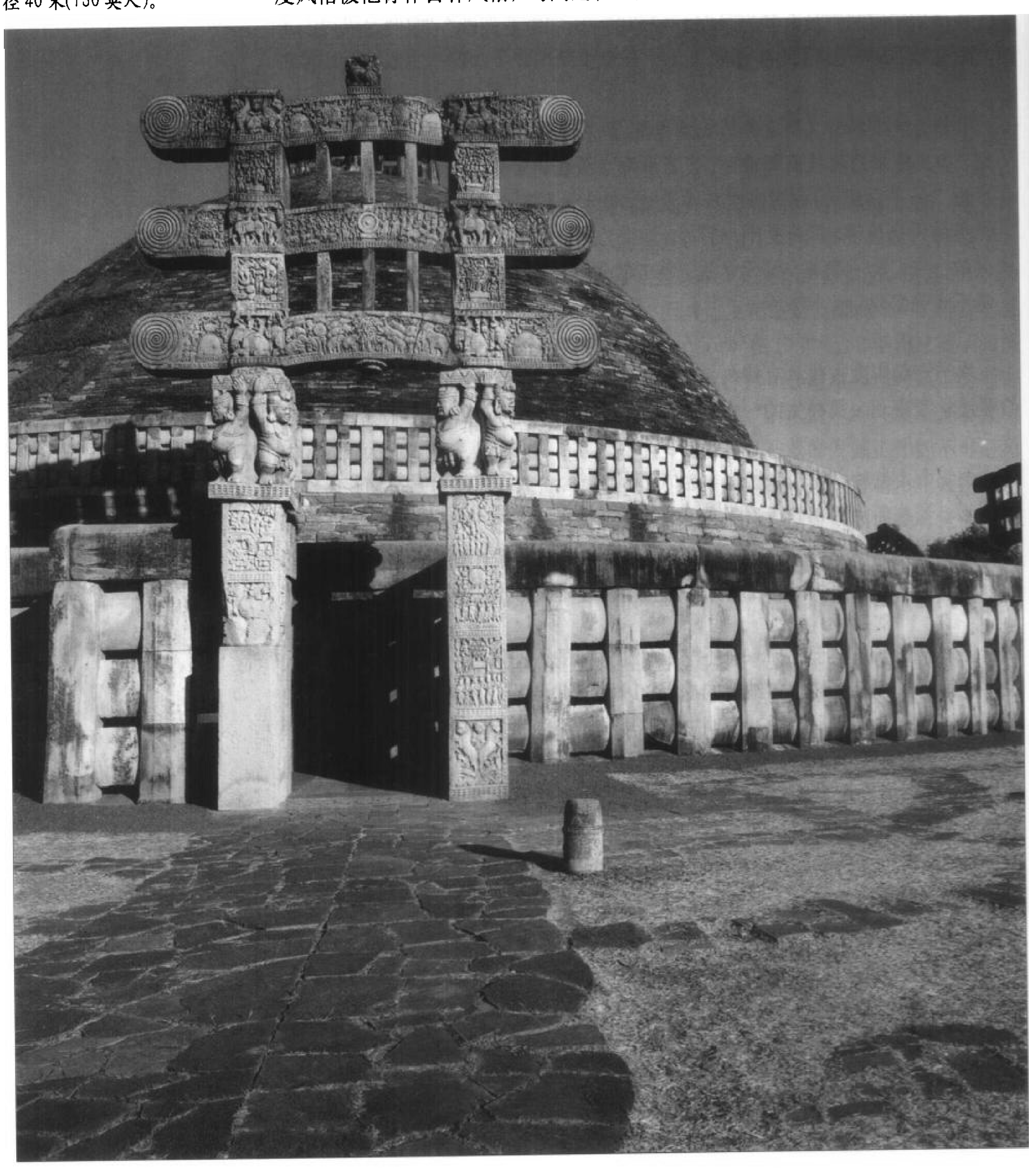
但坎宁安不只限于旅行，他还挖掘了北方邦的一些佛塔，如19世纪30年代在佛陀第一次布道之地萨尔纳特的挖掘，19世纪40年代在桑奇（又称比尔撒）的发掘。他还收集了罗马钱币，证明古代印度同地中海世界存在着贸易联系。

坎宁安在任期间，印度考古调查署依照军事调查的方针实行年度测绘和发掘计划，或从事由设在黎凡特的巴勒斯坦勘查基金资助的地图绘制工作。关于考古遗址和地表上的古建筑目录的编制，则借助于古代文字史料中的有关记载，如印度史诗、希腊和罗马作家对印度的记述以及西行取经的中国人的记录。列入最后一类记述的是中国取经僧人法显和玄奘对印度的描述，他们在公元4世纪和7世纪走访过佛教史上的所有著名的遗址。在主要遗址上进行的有限的发掘，使这种基本属于地形学的研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准确性，同时也使古建筑、雕刻和铭文为人所知，并为古文物的定年提供了借以断定日期的钱币。尽管考古调查署的负责范围在1874年扩充到印度西部和南部，但坎宁安本人直到他于71岁退休为止始终致力于解决北印度的问题。以这种方式，他发现了许多重要遗址的位置，其中十分有名的是犍陀罗首都与商贸中心塔克西拉，它坐落在靠近印度河源头的喜

位于北印度桑奇的圆顶佛骨塔。这是84000座此类陵墓中的最著名的一座，由孔雀王朝的皇帝阿育王(约公元前270－232年)所建。尽管起初的材料是砖头，但后来这座圣墓又被包上了石头，周围建起了石栏杆。塔高18米(60英尺)，直径40米(130英尺)。

马拉雅山脚处。

坎宁安的主要贡献是将人们通过调查而获得的对古代印度的认识加以系统化，开发出一个与考古新发现相适应的编年结构。印度古代被划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即婆罗门教时期（约公元前500年以前）、佛教时期（公元前500年－公元1200年）伊斯兰教时期（1200年之后），坎宁安承认这种简单的分期不可能完全符合印度古建筑所显露出来的那种极为多样的风格特征，他于是设计出了更为复杂的第二套模式来辨别印度建筑和伊斯兰建筑并以此为判定它们的年份。最古老的印度风格被他称作古朴风格，时间定在公元前1000－250年，包括各种类型的“原



始建筑”以及与佛陀和亚历山大大帝有关的地点。他关于最古老的印度建筑不会早于公元前1000年的观点，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还在流行。

坎宁安是在地层学的发掘原则被制定出来之前从事考古工作的，也是在考古学除了利用文献史料、铭文、钱币、建筑物或美术作品风格来定年之外尚不知其他定年手段的时期展开自己的工作的。即使有这些不利条件，他对印度的古物仍具有极强的悟性。在挖到一座桑奇佛塔内的砖头台基后，他为发现的人工制品感到吃惊。它们被有意安放在一间小墓室当中，作为基本的存储物品。它们中有“各种类型的红色陶器和黑色陶器”，尤其是那些涂有黑色金属釉的陶器。今天这种黑釉陶器被称作“北方的磨光黑陶”，定年在公元前500年以后，它证实了坎宁安为这座佛塔设定的最初年代（公元前3世纪）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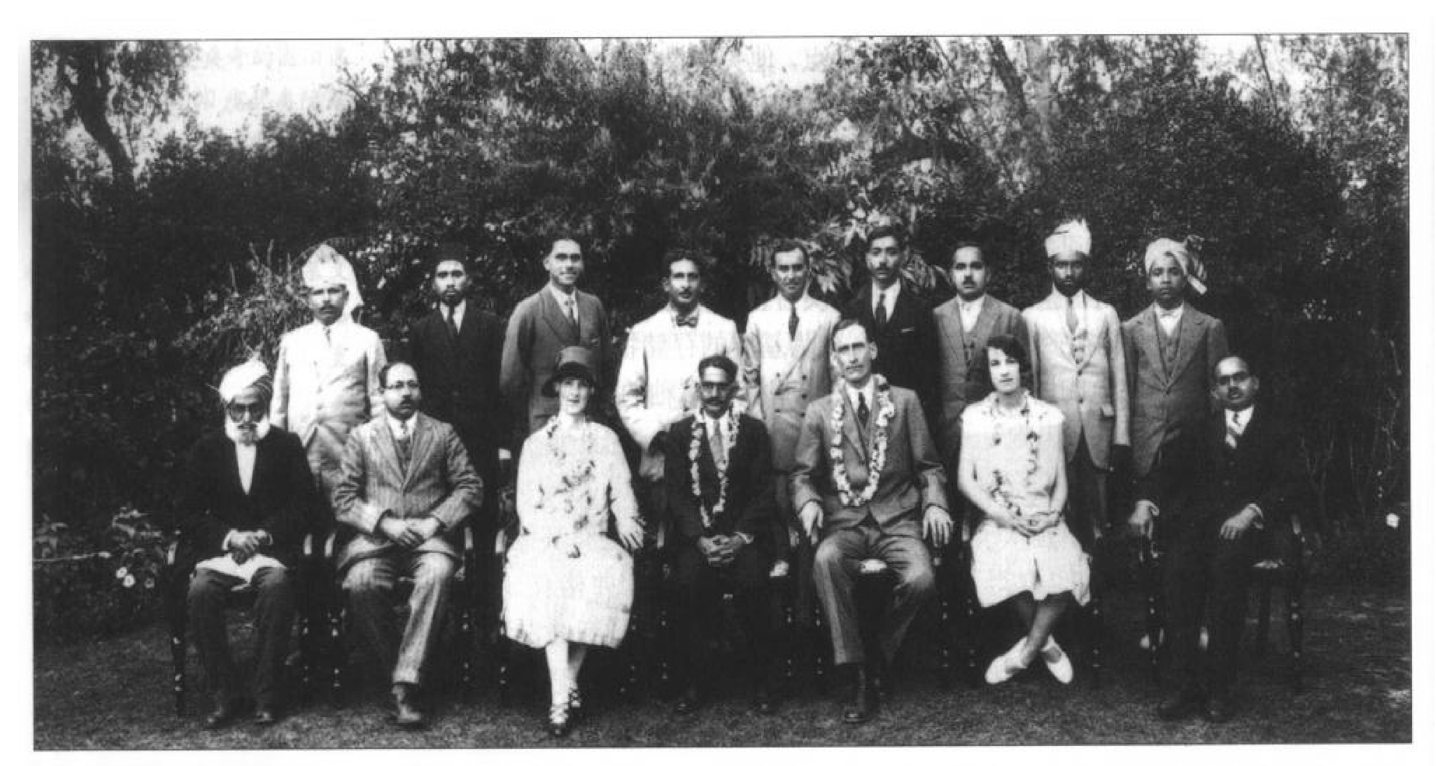
印度考古学的基础并不是坎宁安一个人奠定的，在他之前还有其他人，此外他在考古调查署的助手们也取得了很重要的成果。詹姆士·弗格森（James Fergusson）和詹姆士·布格斯（James Burgess）撰写了许多详细的古建筑考察报告，对佛教遗址上的建筑遗迹的考察尤其详尽。但坎宁安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位主导人物，他第一个呈请政府进行考古调查，然后又付出他的精力和热情，以保障调查事业的成功。他所写的《比尔撒佛塔》一诗（1854年作）中的下列诗行或许可以作为他整个考古经历的写照：

一切皆无，除了佛塔本身始终在戏弄
那时光的不懈努力之外；
它们默默无言、傲然挺立，
永久依赖着它们祖先打下的坚实基础，
就像是笼罩在魔幻中的座座城市；
直到来自一个遥远国度的一批好奇的撒克逊人，
打开了封存达两千年之久的宝库。

坎宁安的继承者詹姆士·布格斯作为调查总监，在他退休前又继续了3年的调查工作（1886－1889年）。随后进入一个停滞时期。这个时期持续到年轻的约翰·马歇尔于1902年接任该职时才结束。

马歇尔的年代

正是在19世纪中叶，印度悠久的过去才被首次发现。早在1842年，米多斯·泰勒（Meadows Taylor）提到自林苏伽出土的一把石斧，并将这把石斧同欧洲史前石斧进行过比较。他继续收集石制品，同时对德干高原上的石墓展开发掘。1862年，他发表了发掘成果，附有一些平面和剖面图解。1860年，东印度铁路局总工程师H.P.勒梅热勒（Lemesurier）在一些村落的树底下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磨光石斧。最后，1863年5月30日，“印度史前史之父”、印度地理考察协会的罗伯特·布鲁斯·富特（Robert Bruce Foote），在马德拉斯附近的帕拉瓦拉姆的一个碎石坑里，发现了一把旧石器时代的手斧。那年晚些时候，他返回出土



约翰·马歇尔爵士同他的妻子、女儿及印度考古调查署的成员在一起，约摄于1920年的塔克西拉。自1902年起，马歇尔重组了调查署，首次招募了一些印度人。他还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包括编制古代遗存的目录，保护古建筑，扩大博物馆的公共设施，在塔克西拉、桑奇和佛陀首次布道之地贝拿勒斯附近的圣地萨尔纳特之类的早期历史遗址上广泛发掘。

地点，并于1864年再次到那里发掘，发现了更多的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富特将他的发现告知约翰·伊文思，当时化石人的思想在欧洲被人接受才不过5年时间，因此他很自然地推断：欧洲和印度的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制造者属于同一时代的人。

有一位名叫阿希巴尔德·卡莱尔（Archibald Carlyle）的自然主义者和地质学家，他曾作为一个王公之子的教师来到印度，但后来很快成了考古调查署的第一助理。虽然人们在这时一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古典历史上，但卡莱尔早在1867年就开始收集石器，如箭镞和细石器。后来，在恒河河谷上方的摩哈纳·帕哈尔的石棚中，他发现了一些具有强烈的古朴风格的绘画，表现着“古代石器制作者们的生活情景”。他辨别出画面上的动物和狩猎的景象，显然还有一些携带着弓箭、长矛和斧头的人。他得出结论说，这些绘画出自不同时期，包括了数千小型石器或细石器制作者所在的时期。虽然他在1883年以前一直没有公布这些发现，但卡莱尔承认：某些摩哈纳·帕哈尔的绘画一定是史前的作品，时间上要早于在欧洲发现的史前石画艺术。

1902年，印度考古调查署的命运随着约翰·马歇尔（1876－1958年）担任新近恢复的调查总监一职而重新好转。马歇尔曾在剑桥大学读古典学，当时已是一位成熟的田野工作者，因为他曾在希腊、克里特和土耳其从事过发掘工作。他在较长的任职期间（1902－1928年）使考古调查署重新焕发了活力，他致力于保护次大陆的古代遗迹和进行发掘工作，提供新的考古信息。人们放弃了19世纪对大型古建筑加以清理的做法，这利于对较一般的民居遗址展开有所控制的发掘，以及对陶器和其他发现做出系统的评估。当马歇尔对他在查尔萨达（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塔克西拉附近）的工作做出报告时，他提供了一个专门的章节谈及陶器的分类，希望“这也许对那些在北印度无数的土墩中埋头发掘的人具有特殊价值，因为在那些土墩的表面始终能找到陶器的碎片，它们对判定地下遗存的年代是最有用的参照”。这种把陶器作为一种定年尺度的趋向，受到早期东地中海考古标准的推动，并且成为马歇尔的系统处理方法的特征。

同坎宁安一样，马歇尔个人的兴趣集中在印度北部，因为这里与古典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的工作始于对佛教早期遗址的调查，在方法上着眼于较早的时期。在北方邦阿拉哈巴德附近的比塔，马歇尔"在印度首次出土了保存良好的房屋、店铺和街道的遗存，时间属于孔雀帝国时代（公元前3世纪）"，并且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小件古物……有助于我们把早期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具体化"。同样重要的是，在比塔的发掘，发现了不同时期居住遗迹的层次系列，时间自孔雀帝国时期（公元前3世纪）以前始，直到笈多王朝时期（公元四千纪中期）。马歇尔的早期工作一再得到报道，其质量不亚于在亚洲和地中海其他地区的任何同类工作，他以这种方式很好地实现了自己重振印度考古的意向。

马歇尔后来用了许多时间在巨大的城市塔克西拉本身进行发掘(1912–1936年)，甚至从考古调查总监一职退休后仍继续了他在那里的工作。这处遗址位于现在的巴基斯坦西北部，有多样的土丘，其中有些是佛塔和寺庙，有些是多层重叠的定居点。马歇尔挖出了大片设防的城区、城镇的街道、住房、佛教寺庙和学校，再现了一座地区性首府城市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5世纪这1000年时间里所具有的特征。对塔克西拉的发掘为理解北印度的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是马歇尔考古生涯的一座丰碑。

对远东的探索

长期以来，欧洲许多探险活动都把中亚和中国作为自己的目的地，各博物馆和资助人在为自己的展室征集艺术品的时候彼此之间常常勾心斗角。大英博物馆、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东京自然博物馆和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都从国际冒险家们（如斯文·赫定、阿尔伯特·封·勒科克和奥勒尔·斯坦因）的盗掠行为中获益匪浅。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中国西北的塔里木盆地。这个地区散布着废弃的商贸市镇，在公元后的头7个世纪里，丝绸之路曾经逶迤曲折地围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而过，从而将中国和欧洲联系在一起，。

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于1895年率先开始了对这一地区的考古探察活动。1902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又有另外7次远征紧随其后，其中德国人4次，日本人2次，法国人1次。赫定得到瑞典王室的资助，在1899年发现了位于楼兰的汉朝边塞，从那里运走了大量的古代手稿。虽然他在战时的亲德立场受到人们的严厉谴责，人们嘲讽他道："不管你发现了西藏还是中国，那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但这些发现还是给他带来了许多荣誉。为德国资助者效劳的法国人封·勒科克在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劫掠同样不择手段，他竟把富丽堂皇的壁画从墙上劈下来。这些壁画是他在一次山崩期间发现的。他曾写道："突然，简直难以置信，在我左右两侧裸露的墙上，我看到了色彩绚丽的壁画，它们鲜亮的颜色就好像是画家刚画完似的。"柏孜克里克佛窟中的壁画最后收在了柏林人种博物馆，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毁。

英国东方学家奥勒尔·斯坦因在1901年对丝绸之路进行了他的首次考察，在和田周围的废弃城镇遗址如8世纪的丹丹乌里克（Dandanuilik）进行了发掘。在第二次考察中，斯坦因发现了大量佛像和壁画，并于1907年在中国西北部的敦煌

千佛洞内找到了一个藏经洞，该洞约从公元1000年起便用墙封了起来。他的许多虏获物，包括20000卷经卷抄本，都成了大英博物馆的藏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足足花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为它们编目。对于某些文物，如和田刺瓦克的91尊佛像，他不得不留在发现地，并重新将它们埋藏起来，希望日后返回时能够专门建立一座博物馆。斯坦恩曾悲伤地写道："盯着那些经我之手出土的雕像，再次一尊接一尊消失在掩埋它们许多世纪的荒沙下"，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第二种类型的考察较少罗曼蒂克，它们是伴随着欧洲人殖民远东而展开的。定居下来的英国人通常是在教会、商贸企业或政府的资助下，很快建立起皇家亚洲学会的各分支机构。皇家亚洲学会是就有关东方的认识开展交流的关键组织，起初在香港出版自己的学报（1847年），随后由上海出版（1859年），再后在新加坡（1878年）和朝鲜（1900年）。欧洲人对当地古物的描述也在其他出版物中得到发表，尽管他们赖以解释其考古发现的参照标准并不是始终正确的。例如在日本，W·高兰（Gowland）发表了他在担任明治天皇顾问时调查的一系列土冢的报告。因为这些属于公元5世纪晚期和6世纪的土冢有巨大的石砌墓室，墓室顶部的石块重达70吨，高兰便很不适当地把它们同欧洲的类似发现相比，将它们归之为石板墓。他写道："在封土下的石板墓里，还能看到与布列塔尼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墓葬存在着一种联系。墓道一般是南向或东向的，始终没有朝北方向的。"在

最后的探险家

奥勒尔·斯坦因（1862－1943年）是亚洲考古史上最伟大的探险家①，一位从早年便开始跋涉的、不知疲倦的旅行家。他生于布达佩斯，在德国和英国大学中学过东方语言和古典考古学，后来到印度，在1887年成为拉合尔东方学院的院长。在拉合尔，他研究并发表了《克什米尔诸国王的梵语年代记》一书，开始漫游克什米尔和印度的其他地区。

斯坦因的考古声望有赖于他于1900－1920年间到中国土耳其斯坦进行的三次长途旅行。那是由他首次揭示出来的一个遥远的地方。土耳其斯坦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三面环绕高山峻岭，一面是戈壁沙滩，一度曾是穿越中国和北印度之间的亚洲内陆，再上行至伊朗并最终抵达东地中海的商路经过之地。2000年前，这条路上的商旅往来特别频繁，当时佛教就是经过亚洲内陆传入中国的。1300年前，佛教于盛唐文化时期又再次传到中国。

斯坦因一路或乘马或步行，记录下各个遗址，进行过试探性发掘，经受了沙漠中的酷热和山区里的严寒，甚至还因此冻掉了自己的几个脚趾。但他的成果是显赫的。他发现了汉朝于公元前2世纪修建的早期中国长城的遗迹，这段长城是为抵御游牧民族对商人的袭掠而建的。商业城镇的废墟，如尼雅和丹丹乌里克，显露出印度文化在这里的强有力影响。斯坦因发现了佛教寺庙、饰有雕塑和源自甘德哈兰的具像派美术作品，还发现了写在木板、桦树皮、羊皮、棕榈叶、纸张和丝绸上的古文献。他还访问了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部边缘的千佛洞。在那里他通过一些暧昧手段，获得了藏经洞内无数佛教经卷中的早期中文译本和公元9世纪的大批帛书。当藏经洞的门被打开的时候，他写道：

> 在那位道士的小油灯的昏暗光亮中所展露出的一切，令我睁大了眼睛。扎得结结实实的一捆捆手稿出现在面前，漫无规则地层层堆起，正像后来的测量所显示的那样，从地面和填土处算起，足有10英尺高，接近500立方英尺那么大。在大约9平方英尺的小屋内，几乎没有给两个人留下站立的空间……我对这些古代崇拜的遗物和学术遗产，能够经受岁月的所有磨难而幸存下来这一点，毫不感到奇怪，因为垒起的墙壁将它们封存在了凿出的室内，而这里又是一片令人生畏的荒山秃岭。它们被牢牢地封闭起来，避开了这片干涸的河谷中即使有也很少的潮气。

斯坦因还对亚洲远西部的考古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贡献，即便这种贡献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他在1910年加入印度考古调查署之后，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进行穿

① 我国考古学界通常把他看作是大批盗劫敦煌遗书、文物的始作俑者。参见龚良主编：《中国考古大发现》，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第96－98页——译者注。

所有外国居民当中，只有在日本的美国动物学家爱德华·莫尔斯、在中国的瑞典人约翰·甘纳·安特生对远东考古学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日本是第一个采用西方考古学形式的远东国家。古文物收藏与研究于1876年由于发布第一部文化财产保护法而在国家基础上得到开展。第二年便看到了日本的首次考古发掘，发掘者是美国人爱德华·莫尔斯，他后来到帝国大学（今天的东京大学）执教。正是莫尔斯对东京附近的史前大森贝冢所进行的发掘工作，第一次发现了绳纹时代的或以绳纹为标记的陶器，这是日本后冰川时期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绳纹文化（约公元前10000－300年）的特色器物。就像查尔斯·达尔文于1880年所高度评价的那样："一些日本绅士已经收集到这个群岛上的贝冢的可观的材料，并在（莫尔斯）的帮助下对史前墓冢进行了调查。这是日本科学未来发展的一个最令人鼓舞的征兆。" 然而，根据那个时代的看法，莫尔斯以为绳纹陶器和手工制品系北海道岛上的土著虾夷人所造。直到1936年之前，仍未能确定它们的真正年代。今天，已知有上万个绳纹文化的遗址，其中大多数属于史前时期且在具有大量坚果或野味食品及紧靠具有丰富鱼贝资源的沿岸地区。

1907年在京都大学首先开设了考古学课程。1913年，成立了在滨田耕作领导下的考古学系。在伦敦弗林德斯·皮特里处学习之后，滨田返回日本，1917年他在对大阪绳纹－弥生时代的耕遗址的发掘中，首次利用了欧洲式的地层学分析法，



越俾路支进入伊朗南部的考察旅行，发掘记录下了众多史前遗址并对它们一一采样。如同在他之前的坎宁安与其他人一样，他也对亚历山大大帝穿过印度西北部的路线进行了重新勘查。

他的不倦的旅行最终使他穿越伊朗西部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他在那里循着自都拉·尤洛珀斯到叙利亚的帕尔米拉的古代道路跋涉了一番，报道了许多后来成为主要发掘地点的重要遗址。他在喀布尔去世之前，已年届80，正在为阿富汗的又一次旅行进行着准备。

奥勒尔·斯坦因护送其掠获的文物珍品离开阿卜德勒(Abdal)前往喀什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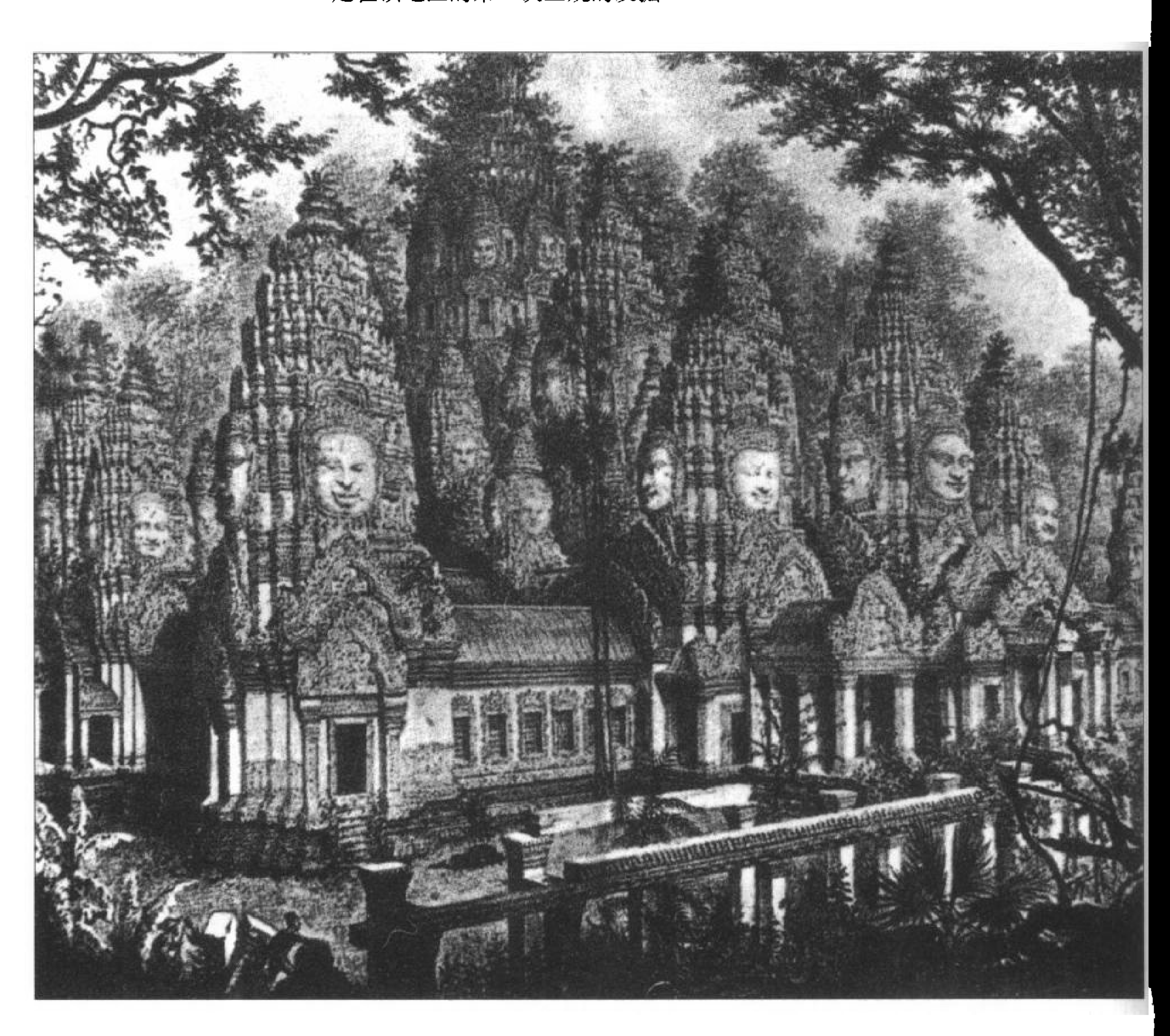
吴哥窟外墙的南门，出自路易斯·德拉波特的《柬埔寨漫游记：高棉的建筑》（1880年）。

1432年，吴哥被遗弃在丛林中。在16世纪和17世纪，对它并不理解的欧洲人“发现”了它。随着法国人于19世纪在印度支那的考古活动的开展，吴哥成为古建筑艺术研究的主题，但系统的考察和发掘仅是在近些年才展开。

并写出了第一部日语考古学教科书。

在东南亚或当时法国人所称的印度支那，法国的殖民活动引起了对古代废墟尤其是对吴哥古迹的广泛调查，因而也形成了该地区的考古学。1889年，远东法国学院成立，它是在雅典、罗马和开罗所开设的其他同类学院的翻版，穆塞·路易斯·菲诺特担任首任院长，该院以他的名字命名，但现在已更名为河内国家博物馆了。这个学院最终成了收藏东南亚青铜器和古代艺术品的最大宝库。1900年，该地区卓越的考古先驱亨利·帕尔曼提耶对占人（越南南方人）和高棉人（柬埔寨人）遗留在地表的古迹展开了第一次全面调查。帕尔曼提耶积累了大量绘画、照片和地图资料，后在公元9世纪建造的巨大的占人宗教中心同登进行了挖掘。

印度支那协会的地质处也主持了考察工作。1902年，亨利·曼苏（Henri Mansuy）通过在柬埔寨中部三隆森的发掘，确定东南亚地区存在过青铜时代。三隆森位于吴哥窟东南约150公里（93英里），是一座高6米（20英尺）的土墩，在那里出土了陶器、贝壳、磨光石制工具、贝壳和石质首饰、青铜制品以及铸造模具，证明该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约公元前3000－1000年）。这是在该地区的第一次正规的发掘。



然而，亚洲殖民地的考古并非由欧洲人独家担当，复兴了的日本天皇政府也把自己高看成远东的救主。在1910年吞并朝鲜半岛之后，日本处心积虑地着手"启蒙落后的朝鲜人"，像法国人在东南亚的做法一样，企图通过语言教学、"道德"教育和改写历史，把当地居民变为这个殖民国家的国民。于是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也就很自然地为此目的而开展起来。

东京大学的人类学家鸟居隆藏无论到哪儿都骑着头毛驴，这一时期他领导了多次赴远东大陆和台湾的考古活动，在朝鲜进行过20多次田野调查的旅行。这种活动不可避免地主要集中在地表古迹上，如东南亚的庙宇、石板墓、土冢、土木工程和朝鲜半岛的碑铭等。鸟居第一个将朝鲜石板墓划分成两种类型：用小型石头支撑的大圆石墓，分布在南方；支立在很高的石板上的石板墓，分布在北方。他还对地方宗教信仰非常敏感，记录下一块他在朝鲜西南部遇到的竖石纪念物，这是"与石板墓同时代的古迹，今天居住在它周围的人仍把它视为神物，对它顶礼膜拜，祈望它能祛病免灾"。

探索非洲与非洲的人种学

瑞典自然学家安德斯·斯帕尔曼(Anders Sparrman)大概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展开发掘活动的第一人。他曾与本国人卡·汤伯格在东开普地区一道狩猎和种植，曾全身一丝不挂(除假发外)地在河里游泳，为了寻找罕见的标本还曾从陡峭的山坡上滑下。1776年他出于好奇，发掘了一座位于大菲什河岸边库克豪斯附近的石丘，但一无所获。自斯帕尔曼所处的时代起，旅行家、殖民地管理者、士兵、商人和传教士们就开始零星地提到石画艺术，但对这些艺术形象的评析却是按欧洲人的标准进行的，把它们看作是原始生活——狩猎及同邻人械斗——的生动写照，为愉悦消遣或记载大事而画。没有谁问过当地居民——这些美术作品意味着什么。

在真正的非洲考古开始之前，至少是在布歇·德·彼尔特关于在法国发现史前石制工具的说法于1859年得到科学证明的前一年，托马斯·霍尔登·鲍克上校显然已认识到：在南非发现的这类工具属于南非古代的工具。随着人类拥有远古时代的看法在欧洲被广泛接受，非洲殖民地出土的石制工具便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

昆虫学家路易斯·彼林格是早期最有名的收藏者之一，为了研究南非葡萄园中的病虫害，他于1879年离开法国。他对考古学的兴趣在那里得到发展，并于1906年成为开普敦南非博物馆的馆长。彼林格很喜欢在他的桌子上摆放一些未贴标签的醒目的标本，戏剧性地展示它们，以吸引来访者的注意。他的《南非石器时代》一书(1911年)记载了已知的石制工具的范围，并将它们同欧洲的发现作了比较，但他的根据是错误的假设(在当时却是很自然的)，即非洲和欧洲的工具拥有相同的文化起源。这种比较因缺乏任何定年的证据或考古背景的联系而显得牵强。与欧洲不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没有新石器时代或青铜时代。在许多地区，石器时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甚至到了20世纪引入铁制工具时才终止。

大津巴布韦

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大津巴布韦的石墙，一直既作为政治象征又作为考古遗迹矗立在那里。尽管津巴布韦山位于今天的津巴布韦东南部，在大约公元500－900年的铁器时代早期第一次被人占据，但我们现在知道，它的最早的几段墙属于公元1000年左右，当时操马绍那语的黑人农民迁入了这个地区。在那之后，约1270至1450年间，大津巴布韦成了庞大的马绍那帝国的首都，该帝国向西扩张，进入博茨瓦纳，囊括了从赞比西河到德兰士瓦北部之间的广大地带。对这时的南非来说，社会组织建立在阶级划分的基础之上，统治阶级和平民之间存在着明确差别，津巴布韦的国王通过控制与东非海岸进行的黄金、象牙贸易而累积起了巨大的财富和威望。

西方世界知道大津巴布韦，要感谢一个名叫卡尔·毛奇的爱好冒险的德国青年地理学家。他于1866年第一个在博茨瓦纳的塔提发现了南非的黄金。毛奇虽然是为《圣经》中有关所罗门王的宝库的记载（《列王记》卷一，第九章，第26－28节）所吸引，颇为浪漫地抵达这个地区，但他的旅行准备还是很周密的。为了自我保护起见，他穿上一套宽松的皮衣，戴了顶皮帽子，足登镶满饰钉的皮靴，内着厚法兰绒内衣裤，携带了一把防晒的伞和一支左轮手枪。

1871年9月5日，在到达津巴布韦山之后，他惊奇地发现了未用砂浆垒砌的围墙，足有6米（20英尺）高，还有一座比墙还高出一半的圆锥形塔楼。毛奇从倒塌的门楣上砍下一块木头，认为它与自己随身携带的铅笔的木质是一样的：

> 它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即我们得到的这块木头实际上是西洋杉木，它除了出自黎巴嫩之外，不可能出自其他任何地方。再者，只有腓尼基人能够将它们运到这里。所罗门再进一步用大量西洋杉建造了神庙和他的宫殿。此外，希巴女王也访问过这里，考虑到津巴布韦或津巴奥或辛巴奥是阿拉伯文的写法（我对希伯莱文一无所知），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那位建造了围墙的伟大女人有可能就是希巴女王。

尽管那块木头事实上是当地的硬木，而且毛奇也只能对该遗址的年代加以猜测，但他对希巴女王的庞大废墟所作的有声有色的描述，却引起了欧洲公众的极大兴趣。关于这个废墟的起源连同早期葡萄牙旅行家各种添油加醋的神话，即使在今天依然流传着。

欧洲人开始“涌向”非洲，人们轻易地相信关于宝物的荒唐传说。这些废墟也激发了一个精明的英国政治家和金融家希斯尔·罗德斯的想象力，他与人共同创办了德比尔矿业公司，并在1890年成为好望角殖民地的总督。罗德斯的大英南非公司拥有大津巴布韦所在的地区，他开始认为废墟是腓尼基人的，废墟象征着对一种优越的殖民势力的需求，殖民势力可以帮助土著“黑非洲”人脱离蛮夷状态。

1891年，公司为古物学家J·西奥多·本特（Theodore Bent）的进一步调查提供了赞助，本特曾在中东做过广泛的旅行。尽管本特一开始相信大津巴布韦的起源需要到非洲之外的地方去寻找，但他还是试图对此保持一种灵活的态度，他承认“所罗门王和希巴女王的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对我们来说已经听得如此腻烦，以致若不是不得以的话，我们永远不想再听到他们”。他虽然对遗址上的发现概括出一些“当地的”特点，但最终还是确认这些废墟同任何已知的非洲民族都没有关联。

10年之后，也就是1902至1904年，记者理查德·尼克林·霍尔（Richard Nicklin Hall）受命整治遗址，以便为游人服务。他清除了树木和草丛，还清理掉许多没有经过地层记录或内容记录的考古沉积物。霍尔视大津巴布韦的建造者为赛伯伊人或腓尼基人以及他毁坏遗址的做法，促使设在伦敦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出资组织了两次更严格的调查。

第一次调查是在1906年，由弗林德斯·皮特里的学生戴维·兰德尔·迈克弗（David Randall MacIver）率领，确定这个遗址属于中世纪，源于非洲土著之手，但他没能拿出决定性的证据。只是由于格鲁德·卡顿－汤普森（Gertrude Caton-Thompson）于1929年进行的第二次考察，才出土了有确切年代可证的人工制品（出自相连的地层）。卡顿－汤普森写道：“对我来说，每一个细节看上去都具有典型的班图特征……你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成熟的文明……表明这里存在着原生的、具有很高程度的国家组织和令人惊异的手工业。”

于是在殖民思想和考古学家的看法之间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冲突，考古学家的标准是国际社会通行的标准，但他们却是白人解释者，承担着解释黑人历史的任务。

黑色文明的思想令那些在矿业和农业中依赖廉价黑人劳动过日子的人非常厌恶，即使成名的学者也无法避免这种成见。1929年，曾在4年前因发现"缺漏环节"第一块南方古猿化石而获得国际声誉的古人类学家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跳出来，在大庭广众之下猛烈抨击卡顿-汤普森。《南非泰晤士》报道说达特"以一种令人吃惊的粗暴口吻表达了他的见解……他的发言充斥着极不理智的愤怒，矛头指向那位惊愕的主席……说他除了让卡顿-汤普森小姐理论的支持者发言外，其他人谁也不叫"。这种暴躁的反应使文雅的卡顿-汤普森极为反感，以致她拒绝继续在南非工作，甚至在30年以后她还写道："根据我在津巴布韦的经验，我更喜欢不那么感情用事的考古学"。

1965-1980年，在白人罗德西亚独立期间，考古学家们发现，大津巴布韦明显成了一个政治问题。1969年，国会议员哈特利上校激烈批评对参观者展示该遗址的方式，抨击关于"这些废墟最初是由罗德西亚土著建造的"的思想，认为"这有可能成为津巴布韦非洲人同盟党羽们的一个非常流行的观念……而它其实完全是个假设……人们的这种倾向，尤其是国家历史古物委员会成员中的这种倾向……应当得到纠正"。有些考古学家感到他们的工作受到威胁，便离开了这个国家。

在今天的津巴布韦，许多人认为这些废墟仅属津巴布韦黑人所有，他们援引津巴布韦总统的话说："要求一个白人来解释大津巴布韦，那对我们的文化简直是个嘲弄。"有关大津巴布韦的故事仍在继续，它证明政治和经济条件在如何决定着对过去的阐释。



右图：从空中俯瞰大津巴布韦废墟。它在公元14世纪是庞大的马绍那王国的首都，其鼎盛时期能容纳18000人之多。该遗址分为三部分：首先是在陡峭的花岗岩山坡上建造的石围墙（如图所示），墙内似乎是国王、王室成员和主要官员的居所。其次是一个中央区域，包括"大围墙"和坚固的圆锥形石塔。再次是位于周围的城镇，最初的房屋用木杆泥巴搭建，茅草盖顶。

尼日利亚艺术

如果对于石制工具和实在的废墟的感知，尚且受到戴着有色眼镜的欧洲解释者的歪曲，那么非洲的艺术就等于完全被人们视而不见了。尼日利亚具有丰富的手工艺术遗产，如精美的工艺头像、雕像和木制饰板、陶器和青铜器，有些工艺品的年代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一千纪，但它却特别容易受到伤害。

非洲艺术在欧洲首次引起轰动，是因英国海军1500人的远征军于1897年进行的惩罚性远征把大量西非青铜器和象牙雕刻带回到国内。从15世纪晚期欧洲人到达那里之前——直到19世纪，以制造近乎真人大小的头像和饰板为代表的贝宁传统的青铜铸造一直十分活跃。英国人在那里发现了一座丢弃的城市，城内艺术品的数量与人牲的数量一样令人吃惊。他们收集到大约2000件青铜器，包括160尊头像以及数百个经过雕刻的象牙和一些动物雕像。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首批研究非洲的人类学家之一，德国人列奥·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开始了他的“非洲内陆的远征”，此次远征实际上是要掠夺这块大陆的美术遗产，以满足欧洲收藏者在这方面的喜好。即使在今天，这种劫掠仍没有绝迹。一些非洲最著名的美术作品，例如属于大约公元前500至公元500年之间的、具有鲜明特色的“诺克”赤土陶像，在尼日利亚中部乔斯高原坡地的采矿时被偶然发现。倘若这些陶像未被人收集的话，恐怕也就毁坏殆尽了。但由于缺乏有关发现的相关证据，致使我们很难解释它们。残破的四肢和躯干意味着某些头像最初属于如真人大小的塑像的一部分。当时的大多数尼日利亚



1897年的贝宁城。英国拉森将军率领的惩罚性远征军的成员及其战利品，包括象牙和青铜器等。为支付远征的开支，它们在几周时间里便被运到了英国，但很快便流散到各地了。

皮特·里弗斯得到了许多一流的青铜器，他同时尖锐地指出：“由于这次远征如通常一样，没有伴随任何科学考察人员负责对历史事物和古物问题的调查，所以不可能获得有关这类问题的任何可靠的信息。”

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需要为自己的行动做道德上的辩解，他们在被丢弃的“血腥之城”中发现了令人震惊的屠杀，至少其中有些屠杀是在他们接近城市时突然发生的。

远征军的一个成员写道：“称它为城市是不合适的，它是一座陈尸房，所有房子的周围和街道上都是死去的土著人，有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有些被吊死在树上，其他人则死在搭起的台子上……在王宫的正面，一些木桩被拖倒在地，上面捆扎着木头横杆。在这类木架子上绑着活人，他们要么因饥渴和炎热而死，要么被太阳晒干或被食肉的猛禽吃掉。”

远征军的另一个成员对他们发现的一切所作的解释则似乎更加清晰：“像这些土著们所干的把活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习俗，源于我们的救世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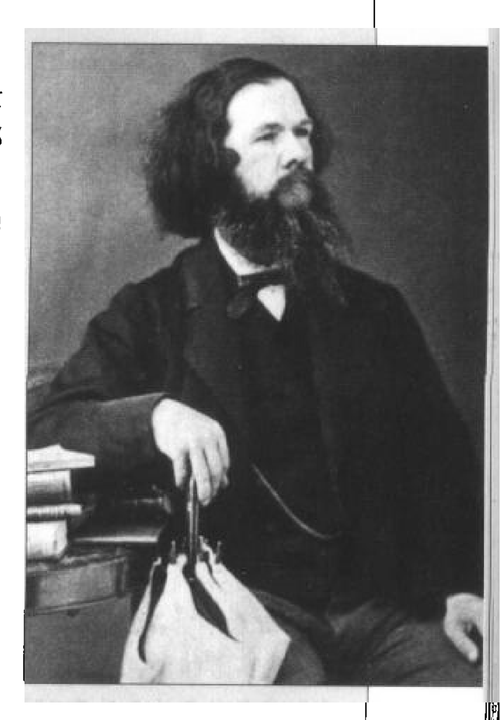
黑大陆的梦想家

威廉·布列克（Wilhelm Bleek，1827－1875年），一位开明的德国文献学家，1861年成为开普敦的乔治·格雷图书馆馆长，是19世纪晚期对于一概抹煞非洲历史的僵化做法表示坚决反对的主将。

1870年，布列克得知有一批来自北开普的/Xam布须曼人罪犯正在泰伯湾修筑一道新的防波堤，他意识到这是他记录正在迅速消失的/Xam语（符号"/"意思是指作为布须曼语特征的若干吸气音之一）的难得机会。于是他说服开普殖民地总督准许其中的一些犯人住在他家里，他把自己一生剩下的时间都奉献给调查布须曼人文化的事业。布列克和他兄弟的媳妇露西·劳埃德逐字逐句地记录下了总共长达12000页左右的关于布须曼人生活、仪典和信仰的叙述。他被授予一笔国家津贴，以便继续他的工作。随后他又得到一些世界级科学家（包括达尔文、赫胥黎和李耶尔）给予的一笔资金。

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布须曼人的民族学研究的兴趣不断加深，他们把这种研究视为解释非洲过去的一种手段，布列克的记载于是在被人们忽视了几十年以后又重新得到了肯定。

他的记载具有巨大影响，对研究布须曼人的石画艺术作用尤大。它们为这样一种论点提供了论据支持，即大部分石画作品基本上是宗教性质的，与原始巫师们的梦幻经验有关。



人对接受欧洲文化更感兴趣，而并不怎么关心他们祖先的"未开化的文化"。直至20世纪晚期，这种态度才改变过来。

大洋洲的石器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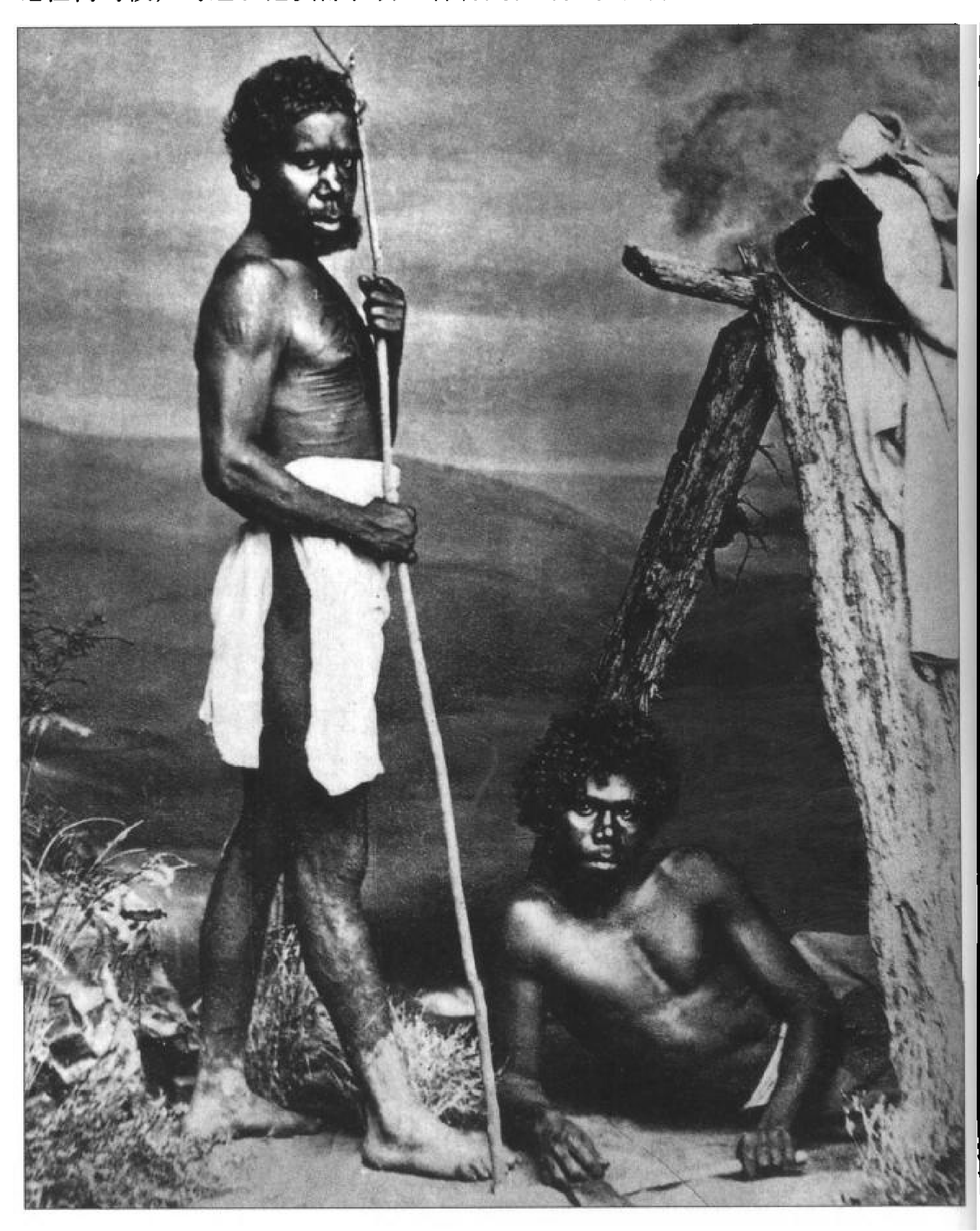
19世纪，人类学家对澳大利亚的兴趣，集中在那些幸存的特别是在塔斯马尼亚生活的所谓"遗留的蛮人"身上，这些人被看作是文化进化过程早期阶段的代表。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鲍德温·斯潘塞（Baldwin Spencer）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

> 澳大利亚是各种生物——往往是在其他地区已经灭绝或被其他更高级的生物所取代的原始的古老生物——的家园和避难所。这不仅适用于鸭嘴兽和袋鼠，也同样适用于当地土著居民。正如孵化自己的蛋卵和无力地吸吮着幼仔的鸭嘴兽所表明的那样，一只哺乳动物所做的一切和土著居民向我们所展示的一切，至少从广义上讲是一样的。早期人类在学会读书写字、驯养动物、栽培作物和利用金属工具之前，必定就是这个样子。澳大利亚还存在着对仍停留在石器时代文化水平上的人类加以研究的可能性。

上述关于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观点意味着他们作为科学的样本，比起已经顺利进入20世纪的现代人类来说具有更大的价值。他们对科学的意义如此之大，以至西方世界的科学机构竞相搜集他们的骨骸遗存。由于土著居民被看作是活化石，所以人们很少注意调查真正的澳大利亚史前史这一点便可以理解了。但是从欧洲

人在澳大利亚建立第一个殖民点开始，就有人对土著居民的起源进行过思考。很早就有人认识到澳大利亚土著和塔斯马尼亚土著分属两个不同的阶段，大陆土著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发展阶段，因为他们有家犬和磨光石制工具，而塔斯马尼亚人缺乏这两者，所以被划为“旧石器时代”。

由于塔斯马尼亚人缺乏航海工具，他们只能在低水位期间从大陆涉水穿过陆桥进抵塔斯马尼亚，因此这两个阶段的模式寓意人类是在很久远的古代进入澳大利亚的。但更精确的推测是不可能的，因为并没有对土著居民遗存加以定年的手段，也没有在不同工艺品类型前后承递基础上构建一个文化序列的方法。土著居民石制工具形状的多样化被归结为原材料的缘故，而非由于样式或功能的原因。因为干旱和洪水意味着大量沉积物可能在澳大利亚迅速堆积，引起地形的快速改变，所以没有把握说在较深层发现的人工制品就必定更为古老。人们已知在澳大利亚曾经存在过一些有袋类物种，包括袋狮、犀牛般大小的袋熊、巨袋鼠，但无论任何时候，对遗址挖掘都表明土著居民和许多动物群并存于过去的某个时间。



“早期人类必定就是这个样子”。19世纪晚期在照相馆中拍摄的一张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照片。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半个世纪，人类学家们在研究“遗留的蛮人”——土著居民的同时，许多先前曾被允许居住在相对隔离地区的土著部落却受到了更多的压迫。

农民们希望阻止土著人口的增长，希望夺取土著居民保留地所占据的土地，他们想方设法地驱逐占有土地的土著。城镇居民也要求试图定居在他们周围的土著居民的家庭搬迁到其他地方。

结果殖民政府便采取了十分可耻的行为(特别是在澳大利亚西部)：强制性地重新划定少量大规模的、进行高度规范管理的土著居民保留地。臭名昭著的穆尔河定居地于1916年建立，那里的人口一度超过1300人。

因此已有的证据仍然是难以捉摸的。

19世纪后半叶在澳大利亚进行的最著名的发掘，旨在确定位于维多利亚州西部的一组低矮土丘的年代和功能。现在已知它们的年代属于近2500年间。1884年，长老教会的牧师彼得·迈克弗森发表了他用20年研究这些土丘的成果，把它们同现代灰烬的堆积相比，提出它们可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的，也许不到几百年就形成了。然而，1869年，一位关心维多利亚州土著居民福利事业的农民和业余动物标本剥制师詹姆士·道森（James Dawson），挖掘了一座土丘，以确定它有什么功能。他根据自己遇到的地层学材料提出：这些土建工程不可能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炉灶，正像一些土著老人说的那样，它们肯定是一些古人居住过的遗址。

猎取恐鸟①的人

在新西兰，对毛利人起源的思考同样众说纷纭。一位名叫沃尔特·曼特尔（Walter Mantell）的考察者是第一个发掘者，他于1852年挖掘了奥塔戈北部的遗址阿瓦莫阿。已灭绝的无翼恐鸟的遗存是在1843年首次发现的，自那以后从一些遗址中又出土了多次，但第一个证明古人捕猎恐鸟的人是曼特尔，曼特尔甚至在他挖掘的遗址上用一个古代的炉灶做实验，烹煮了猪肉和鳗鱼。他写道："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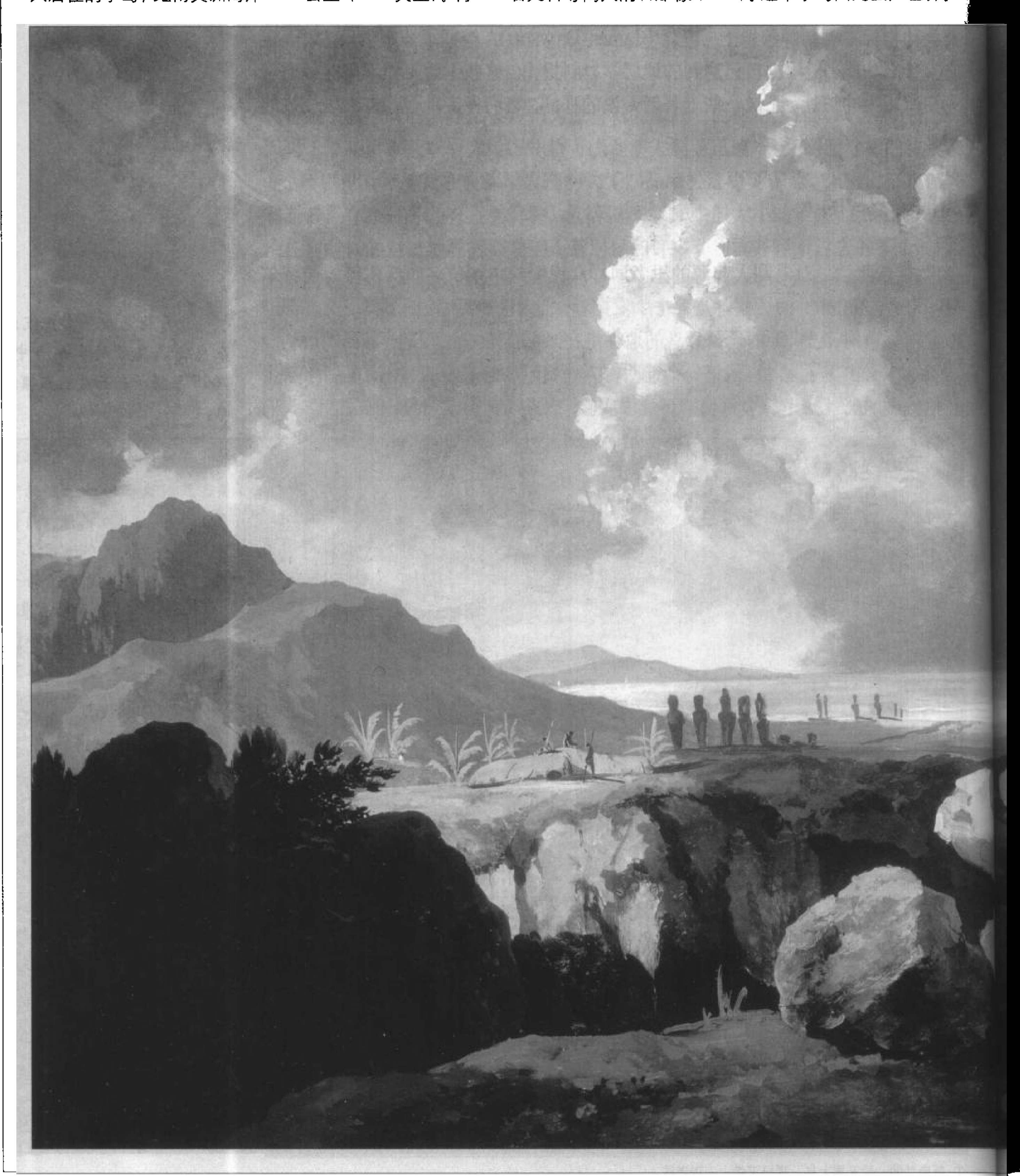
业余化石搜寻者正沉浸在发掘恐鸟骨的乐趣当中。1895年摄于新西兰里弗顿海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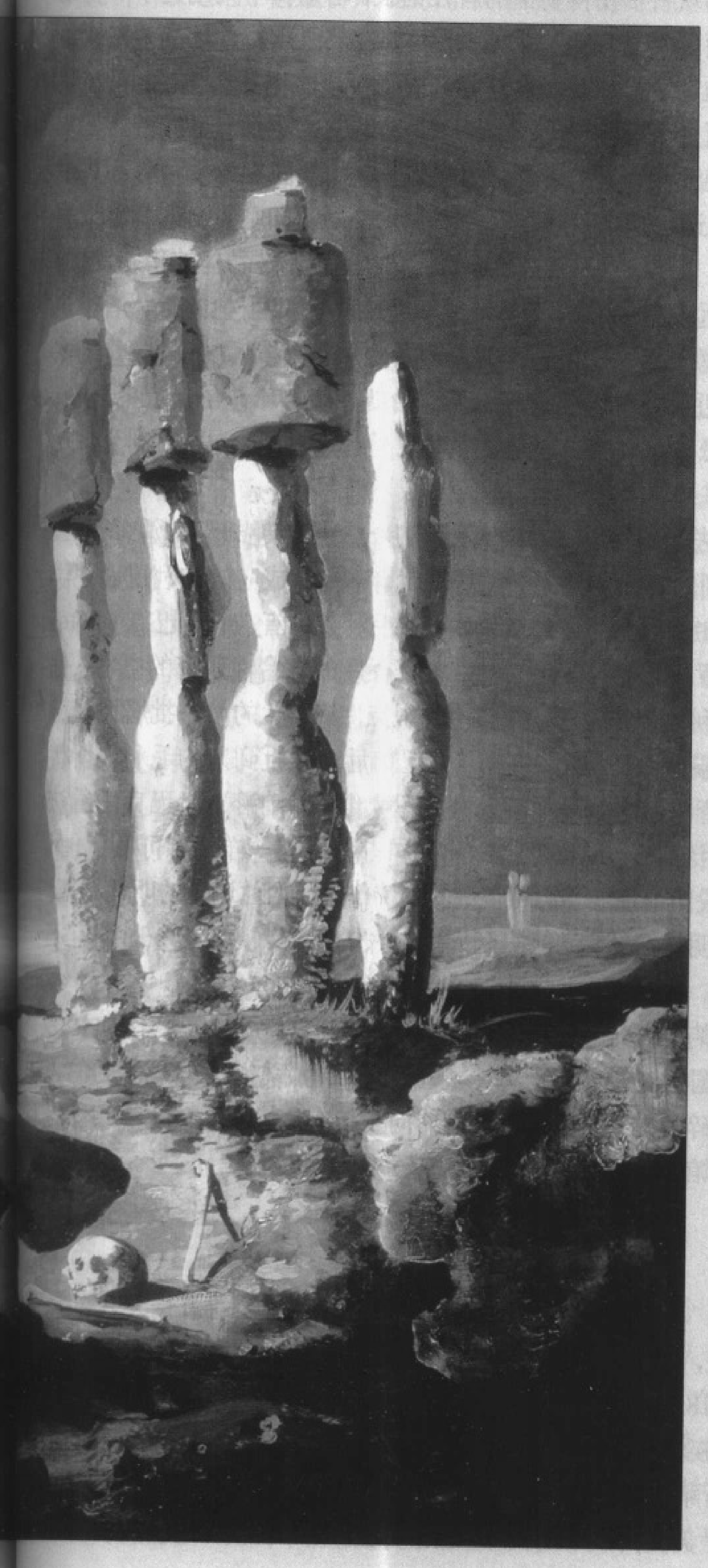
① 新西兰的一种无翼大鸟，现已灭绝——译者注。

复活节岛

复活节岛虽是太平洋上的蕞尔小岛，但却是世界最著名的考古遗址之一。该岛是玻里尼西亚最东边的一个有人居住的小岛，距南美洲海岸3700公里（2300英里）。荷兰航海家雅各布·罗格文于1722年复活节那天首次登上这个岛屿，发现它整个是一个石器时代的巨大遗址，散布着几百尊高大的石雕像（moai）。这个小岛因此蜚声世界。



它的早期的拜访者，包括库克船长在1774年的访问，都对雕像的起源和建造技术感到诧异，他们为后来者留下了关于岛上早期居民的颇有价值的信息。一艘德国炮艇猎犬号(Hyane)上的水手于1882年在此进行了最初的挖掘，他们为柏林凯瑟琳博物馆收集了许多材料。但最早的具有真正考古意义的工作，是由美国的一支队伍进行的。他们在1886年用了11天时间，乘坐一艘美国船马希坎号抵达这里，此行他们记录下了555尊雕像和113个台座以及为数众多的洞穴、村落和岩石艺术遗址。



英国妇女凯瑟琳·劳特利奇（Katherine Routledge）是一位勇敢的先驱人物，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复活节岛上待了17个月。她是第一位对制作雕像的采石场加以研究的人，除了许多发掘之外，她还在171平方公里（66平方英里）方圆的岛上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她决心尽可能多地收集信息，甚至冒险进入麻风病人定居地采访老年岛民，以便了解他们的记忆和习俗。

1955－1956年，由冒险家托尔·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率领的一支颇为张扬的挪威考察队又到这里展开了新的考察和发掘。海尔达尔首次在岛上用放射性碳同位素定年法测试年代，他推测人类是在公元头几个世纪来到这里的，他采集了一些花粉样本，试图重构过去的环境。他还就采石、运输和竖起雕像等工序进行了有趣的实验，企图弄清史前时代的岛民是如何从事这些工作的。

海尔达尔对复活节岛考古最为不朽的贡献之一，在于他使美国史前史家威廉·马洛伊（William Mulloy）加入到了他的科考活动中来。马洛伊将他的余生贡献给了这座岛屿，成为该岛考古的主要权威。他第一个对遗址加以复原，重新将一些雕像竖立在台座（ahu）上，并用干砌方式重建了用于仪典的村落奥隆哥。

他深深地迷恋这座岛屿的氛围，他的情感与凯瑟琳·劳特利奇的情感相差无几："在复活节岛……那些过去的建造者的身影仍然留在岛上……整个空气中都飘荡着不复再现的宏大目标和巨大的能量。"

复活节岛的古迹。由库克船长探险期间的画家威廉·霍奇斯（1744－1797年）绘。请留意散落在雕像脚下的骨骸。

大家都闻到了恐鸟那微妙的肉香。”

到了19世纪70年代，6处新西兰的遗址已提供了古人猎取恐鸟的证据。这种鸟非常之大，似乎高达4米（13英尺），但它至少从16世纪起便已灭绝了。这提出了关于这类遗址是否留有古物和猎手特征的问题。于是发生了热烈的争论，主要的推动者是德国地质学家尤利乌斯·封·哈斯特（Julius von Haast），他于1858年来到新西兰，成为坎特伯雷博物馆的首任馆长。哈斯特本人勘查了一些遗址，获得的证据表明有两个明显有别的文化阶段：如在靠近坎特伯雷的拉凯亚河口处，有一个很大的营地遗址，他在那里区分出一个较早时期的文化层，特点是出土了恐鸟骨、土灶和石片工具。较晚后的一个时期的文化层则有磨光的石制工具。受欧洲已发现的灭绝动物与石片石器伴生的影响，哈斯特提出毛利人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他们进入新西兰的时间要晚于一个尚不知磨光石器和家犬为何物的“旧石器时代的”民族，正是这些更为原始的民族才是恐鸟的猎杀者。

哈斯特描绘的有关远古时代恐鸟猎取者的画面引起了争论。他的批评者很快便举出了颇为晚近的恐鸟证据以及伴随有磨光石器的恐鸟猎取者的遗址。作为发掘位于克赖斯特彻奇附近的波尹特洞穴的结果，哈斯特最终修改了自己的观点。在波尹特洞中，人们在恐鸟猎取者的文化层中发现了磨光石制工具，时间至少要回溯到600年前。

发掘活动是了解过去的一种手段，但人们早期的发掘兴趣却没有延续下去。到本世纪末，它被对毛利人口头传说的关注所取代。1892年成立的波利尼西亚学会，旨在记录被认为正在衰亡和消失的文化残迹。毛利人学者彼得·巴克（Peter Buck，即特·兰基·希罗阿）是对新西兰史前史进行新的综合性研究的主将，他的依据是似是而非的毛利人传统说法。按照他的观点，新西兰的第一批居民是源自美拉尼西亚的原始马瑞维人，这些人在14世纪前后被大批到来的毛利人所替代，马瑞维人本身作为查特哈姆诸岛上的毛利奥里人继续幸存下来。巴克的看法在20世纪20年代被人广泛接受，以致考古学几乎同古物研究一样无事可做了。只有颇为显眼的毛利人的设防遗址或开沟和筑垒的围墙作为新西兰地貌的明显特征，尤其是作为北部地貌的明显特征，尚能引起人们很大的考古兴趣，这一时期有不少详细的发掘方案出台。

太平洋上的各个岛屿，从本世纪初以来便有一些孤立的考古发现，例如1909年在瓦托姆岛，一位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奥托·迈尔教父，成为首次发现著名的人称拉皮塔陶的印纹陶器碎片的人，后来这种陶器向东传布，甚至远至斐济和萨摩亚。夏威夷的主教博物馆是这一地区大多数考古工作的基地。

美洲的考古

到19世纪晚期为止，北美考古已主要掌握在一些机构手中，如设在华盛顿D.C.的史密斯索宁学院。1879年，这个学院从国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20000美元的资助，用以建立美国民族学研究所。在这个成功的背后，有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他就是将担任该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的约翰·韦斯利·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少校。鲍威尔是美国内战中的英雄，在希劳会战中失去了一支胳膊。1869

年，当他率领一支探险队深入科罗拉多河谷和穿过美洲大陆“最好的地理剖面”大峡谷的时候，他成了一位闻名全国的人物。

鲍威尔是地质学教授，曾担任美国地理考察协会会长，但他的学术兴趣却不仅限于岩石构造。他长期以来关注于民族学和考古学，并对印第安人的习俗、语言和信仰，尤其是大峡谷北部的派尤特人的文化进行过研究。在担任美国民族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他最初开展的两项活动之一是应国会要求，对中西部的土墩建造者进行研究，并派遣年方22岁的弗兰克·汉密尔顿·库欣（Frank Hamilton Cushing）到新墨西哥州去研究印第安人的一支祖尼人。库欣尽管没有受过正规的民族学教育，但他曾有4年半时间（1886－1889年）发掘美国西南部沿亚利桑那州希拉河中游一带的史前遗址，随后又很前卫地提出，该遗址的墓葬和建筑风格的多样化，表明这是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这有力地证明了他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潜力。

哈佛大学皮伯迪博物馆的成立时间（1866年）要比民族所稍早一些，但该博物馆也在这个时期显示出了活力。1875年，年轻的动物学家弗雷德里克·瓦尔德·帕特南（Frederic Ward Putnam）被任命为博物馆馆长。帕特南既是管理者，又是精力充沛的考古发掘人，他率先领导了对俄亥俄河谷地带各个土墩以及美国西南部、墨西哥和南美洲古代遗迹的调查。他撰写了400多篇论文，是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民族学展览部分的组织者。他还帮助建立了芝加哥自然史博物馆，并于1903年帮助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设立了西海岸的考古学课程。

美国西南部受到美国考古学研究所的特别关注。1880年，该所派遣出生于瑞士的考古学家阿道夫·班德利尔（Adolf Bandelier）到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调查印第安人的村落。班德利尔采用文献研究和民族学、田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特别注意对圣菲周围地区的考察。他随身带着一队科奇提印第安人，或步行或骑马，穿过帕加里托高原向北行进，经过深不可测的熔岩峡谷和刀砍斧劈般的火山台地，直到里奥格兰德，然后进入布满茂密松树、橡树和白杨树的弗里乔勒斯峡谷，在谷底发现14世纪和15世纪的4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村落遗址。班德利尔在关于这些遗址以及他访问过的其他遗址（如派科斯）的报告中，呼吁人们注意废墟的脆弱性，注意在美国西南部考古和中美洲考古之间进行特定的比较。1916年，在受到伐木工人和牧民的多年反对之后，弗里乔勒斯遗址终于成了名为“班德利尔国家古迹”的考古保留地的中心，班德利尔的工作因此得到了社会的永久承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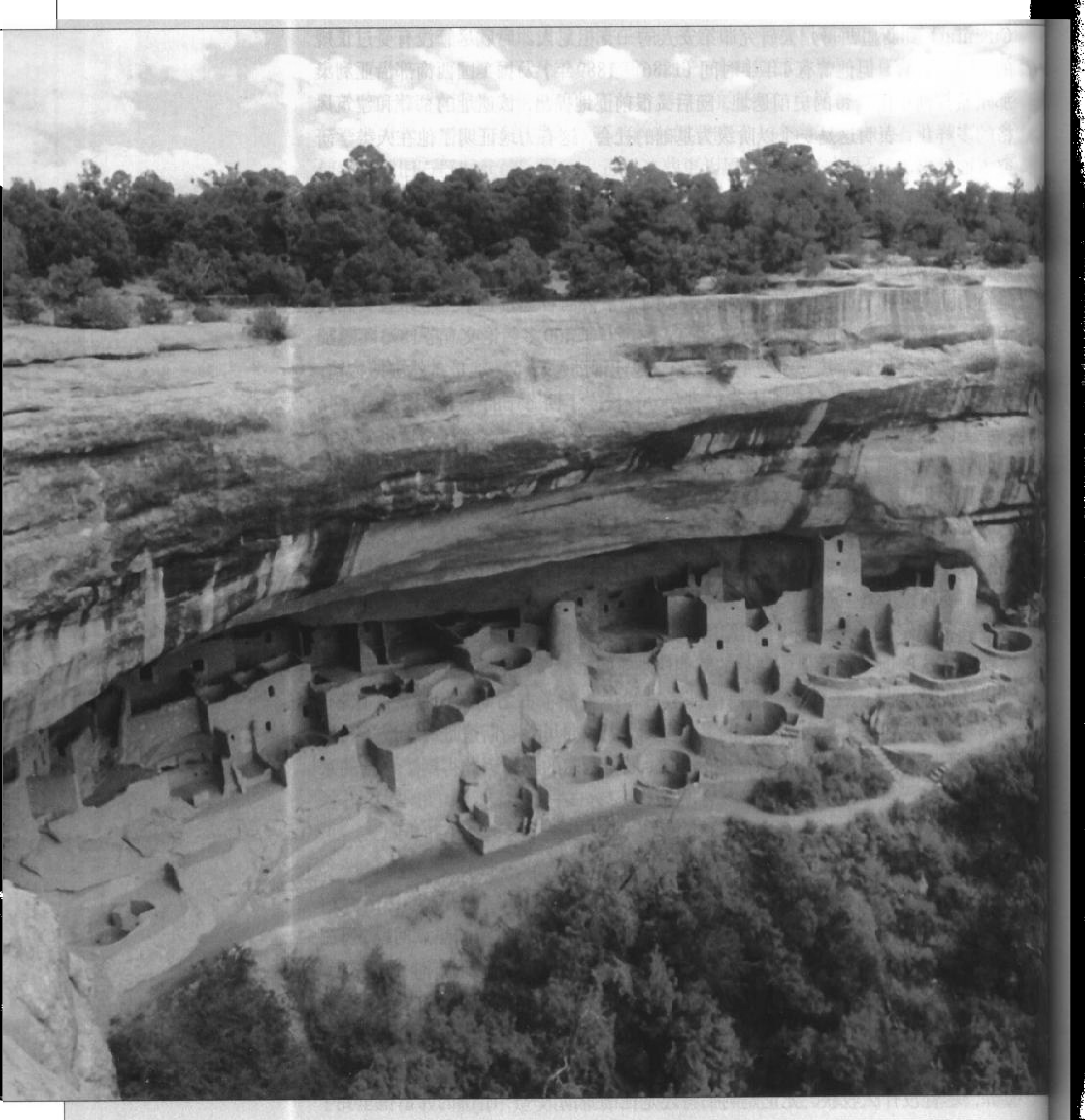
最早的美洲人

人类是在什么时候首次抵达美洲的？这是迄今一个多世纪的热点问题，现在也没有彻底解决的迹象。1859年随着欧洲最终接受了人类具有远古时代的说法，对考古感兴趣的一些美洲爱国人士便面临着一种挑战：在他们自己的大陆上找到相应的人类远古时代的证据。在第一批迎接挑战的人中有查尔斯·阿博特（Charles Abbott）医生，他于19世纪70年代在新泽西的个人田产上发掘了一些墓葬，尽管没什么收获。无论是阿伯特还是他的赞助人——哈佛的弗雷德里克·

弗德台地

弗德台地（"绿色的桌子"）上的阿纳萨基人废墟十分令人瞩目，每一位参观者都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它坐落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的一处因火山喷发而成的顶部平整的广阔台地上，由断崖峡谷和茂盛的桧类植物及松树构成，高出它旁边的沙漠约300米（1000英尺）。

欧洲人发现的弗德台地的第一个遗址是巨大的"悬崖宫殿"。1888年12月18日，对印第安人废墟颇感兴趣的牛仔理查德·韦斯瑞尔和他的连襟查理·麦森在乘马寻



① 公元2至8世纪的印第安人的古代文化之一，因该文化的创造者善于编织竹篮而得名——译者注。
② 印第安人或舞女作为三角裤衩穿的一种遮羞布——译者注。

找走失的牛时，发现了这个地方。两人在阵雪中，借着微弱的光线稳步攀登，直至登上平台顶部的一个十分有利的地点。正在他们向前眺望峡谷的时候，一个令人吃惊的景象展现在他们的眼前：对面峡谷陡峭的石壁上，有一块巨大的石檐遮住了雪花，石檐下鳞次栉比地矗立着大量精雕细凿出来的房屋和塔楼，看上去像是一座很久以前被人遗弃的城市。

他们骑马绕过峡谷的前部，一路下到建筑群里，徒步浏览了一个个的房间。房顶上依然吊着木料，墙壁上仍有涂抹上去的灰泥。布满谷粒和陶器碎片的地面上横卧着死人的骨骸。韦斯瑞尔写道："看上去居民把他们拥有的一切东西恰好都丢弃在了最后使用它们的地方。"

今天，弗德台地是一个以阿纳萨基遗址而闻名于世的国家公园，在整个美国属于游人最多的遗址之一。它有4个楼层，200间崖屋，现在定年为13世纪，始终是占地20000公顷（80平方英里）的国家公园的核心部分。该公园总共有4000处史前遗址，范围从竹篮文化[①] 的洞穴房屋（半地下结构，属公元一千纪早期）到1150－1300年间的印第安普韦布洛文化的大型村落，它们大多数建在为数众多的分割台地的深谷之中，一般位于悬垂的石檐之下。

"阿纳萨基"一词出自纳瓦霍语"敌人的祖先"，是被广泛用来概括荒凉的西南部"四角"地区（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科罗拉多和犹他州的交会之处）的印第安人史前居民的一个术语。阿纳萨基人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种植玉米、豆类和南瓜，因为他们生活于干旱的沙漠地带，所以其史料的保存状况非常之好。谢天谢地，不仅像玉米粒这样的植物遗存因干旱少雨而幸存下来，而且连用丝兰植物、羽毛、纤维绳编织的衣服、草鞋、甚至自然风干的木乃伊也都保存了下来。由于韦斯瑞尔以3000美元的价格，将他从废墟中挖掘出的"崖居者"的制品卖给了丹佛历史学会，他的发现越发名噪一时。此后，这种有机物的良好保存状况吸引来了大量考古学家和参观者。

在岁月流逝中，阿纳萨基人逐渐开发出复杂的陶器、建筑和农业技术：建筑物变得越来越大，也更加结实，人们在一个木框架上覆盖树条并抹上泥巴，周围圈上规整的石墙。最宏伟的废墟，如悬崖宫殿和恰科峡谷，是属于普韦布洛遗址文化的第三层也是最后一层（约公元1100－1300年）的真正市镇。在那之后，大概由于干旱致使阿纳萨基人的农业经营发生了很大的困难，从而被迫放弃了"四角"地区。

主要是因为非法挖掘导致阿纳萨基古迹的流失，弗德台地于1906年成为美国第一个致力于保留考古遗址的国家公园。有意思的是，正是像理查德·韦斯瑞尔这样的业余人员在美国西南部轰动一时的发现，激发了公众对考古的的兴趣，因而这类发现首先引起了公众对考古学的制度化支持。韦斯瑞尔是早期考古专家中的典型人物，他起初不过是一位手持铁锹的牛仔，挖掘古文物是为了出售获利，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变成了一位货真价实的史前史专家。他利用地层学的方法展开发掘和发表成果，并把当代印第安人集团和他们的阿纳萨基祖先进行比较。在他晚年所写的一些信件中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 *在这些（竹篮人的）藏身之地，发现了他们各种年龄和性别的尸体、脚上穿的鞋子、头发、腰布②、雪松茎皮制作的围腰布、套在他们脖颈上的串珠。他们全被包在一种兔毛毯子（一种与羽毛编织物类似的织物）中。之后，（还发现）他们裹着一种 像是秘鲁人使用的那种干尸布或袋子布。这种布是用丝兰纤维织成的，是一种质地很好的布料。在头颅上方，有个扁平的小篮子，直径约20英寸，发现时一般保存情况良好。阿帕奇③人今天仍制作同样的篮子……*

探索者兼科学家巴隆·古斯塔夫·诺丹斯基尔德出身于瑞典一个显赫的家族，1891年来到美国西南部，当时他还是一位22岁的学生。像他这样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往往要同韦斯瑞尔这样的业余考古家一道工作，其任务之一是帮助他们写发掘记录。出人意料的是，正是诺丹斯基尔德企图携带自弗德台地出土的古物（包括精美的彩陶及一具以上的干尸）返回故乡瑞典一事，对1906年发布的古物法案予以最终的推动，促成了弗德台地国家公园在这一年的辟建。此后韦斯瑞尔转移到查科峡谷，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贸易据点，并在普韦布洛班尼托进行了4年的发掘。虽然他的活动引起政府和州行政官员的反对，而且他同土著印第安人的关系也恶化了起来，但他仍然继续挖掘，直到1910年因钱财方面的争端，他被一愤愤不平的纳瓦霍人射中头部死去。

左图：弗德台地的"悬崖宫殿"，共有200多间房屋，23个圆形会堂④，能够容纳400多人居住。这些会堂起初都有顶盖，需借助阶梯经一个小开口才能入内，它们在各建筑物的前面形成一块平坦的空地。该遗址建于13世纪。

③ 印第安人的一支，现役美军武装直升机之一的名称便源于此——译者注。
④ 美国西南和墨西哥等地印第安人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译者注。

帕特南，都认为人类是在最后一次大冰期收尾时进入北美的。但他们的看法在当时赞同的人很少，因为直到1926年，石片石器才最终与大冰期晚期已灭绝的动物骨骸一道被发现。但即使在那时，一些颇有影响的学者、如1902年起便担任美国民族学所所长的威廉·亨利·霍姆斯（William Henry Holmes）和捷克出生的体质人类学家阿莱斯·赫尔德里卡奇仍然对此持有明确的怀疑态度，他们极力要把已有的看法说成是异想天开。

到了19世纪末，专业考古人员日益将注意力转向比较严谨的研究工作，如对史前采集者和狩猎者遗留下来的贝冢进行系统的发掘。要知道，正是这类遗址，才促使人们把从欧洲引进的地层学方法应用于美洲考古。由皮特－里弗斯在英国和弗林德斯·皮特里在埃及开风气之先的层级发掘法假定，在一个土墩的每个层次中出土的古物序列，都与其周围地区的史前文化的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序列为判断其他比较简单的遗址提供了参照的标尺，并允许从时间上构建一个区域性的年表。

曾于19世纪70年代在阿留申群岛挖过贝冢的威廉·多尔（William Dall）的发掘工作，对引进地层学技术具有特殊的影响。另一个在这方面颇具影响的人是马克斯·乌勒（Max Uhle），他是出生于德国的考古学家，晚年被誉为“秘鲁考古学之父”。他曾于1903年发表对圣弗朗西斯湾的埃米里维尔贝冢的地层发掘报告。然而，问题并不能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首先持反对态度的是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他强烈否定乌勒提出的每一地层变化都是实际文化变迁的指示器的看法。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地层学发掘法才真正流行开来，这有赖于此前马纽尔·伽米奥（Manuel Gamio）于1911年在阿兹卡波扎尔科（位于墨西哥城附近）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也有赖于克罗伯的学生内尔斯·纳尔逊（Nels Nelson，曾与乌勒在加利福尼亚一道工作过）于1913－1915年在新墨西哥州加利斯泰奥盆地普韦布洛废墟展开的成功发掘。反对意见随后便销声匿迹了。为了编年的目的，人们积极改进这项技术，其中由阿尔弗雷德·基德尔（Alfre Kidder）在西南部圣菲附近的佩克斯普韦布洛遗址进行的大规模发掘，最为引人注目。

中美洲的诱惑

马雅文明在其古典时期（约200－900年）支配着尤卡坦低地地带260000平方公里（10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把科潘、帕兰克、提卡尔这样壮观的城市废墟，连同作为一种丰富的建筑艺术遗产的高耸入云的金字塔，一并遗留在雨林之中。斯蒂芬斯和凯瑟伍德早在19世纪50年代便已去世，但他们充满浪漫气息的作品却依然充满了活力，刺激着人们向往中美洲废墟的那永不衰减的兴趣。马雅文化富有的特色，使人们对它趋之若鹜，以至马雅考古很快便理所当然地成了一种专门的事业，几乎成为美洲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这种情况迄今未变。

继斯蒂芬斯和凯瑟伍德之后的一代，很自然地把考察的焦点集中对在马雅城市的发现及系统描述上。在各相关机构中，哈佛大学皮伯迪博物馆是马雅考古的中坚力量，它得到着迷于马雅历法的波士顿富翁查尔斯·鲍迪奇的赞助。自19世



皮伯迪博物馆于1893年展开的第二次科考活动。考察队员正在对科潘的第26号土墩进行早期清理。

纪70年代起，许多考察队从坎布里奇（哈佛大学所在地区——译者注）出发，去洪都拉斯发掘科潘——这已是凯瑟伍德对科潘石雕做出震惊世界的报道之后近50年的事了；有的去挖掘附近的基里瓜——这是受到考古学全面研究的第一批马雅文明的中心之一；有的去探索马雅低地，以便寻找新的遗址。

其他国家和机构也迅速加入了进来，参与考古研究和田野发掘工作。伟大的德国考古学家爱德华·泽勒（Eduard Seler）通过将考古学和人种历史学——对西班牙人的年代记和地方文献加以研究——的系统结合，第一个揭示了马雅史前文化的秘密。他对马雅石碑的研究有助于查清马雅历法的基本细节，他小心谨慎的合理解释，在马雅文化的研究领域开创了一个更加科学的新时代。

在从事田野发掘的人员当中，有一位自己负担经费的英国人阿尔弗雷德·玻希瓦尔·莫兹利（Alfred Percival Maudslay）令人称奇，他是自筹资金进行考古的带头人。莫兹利是个离职的年轻的殖民官员，乘蒸汽船孤身来到中美洲，希望在温暖的气候中度过冬天。他于1881年在基里瓜遇到的石雕对他影响极大，以至使他把自己的余生都贡献给了马雅的考古事业。尽管他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但他先前没有任何美洲考古的经验。他在抵达那里后，起初不得不利用斯蒂芬斯的著作作为指南。他拜访了科潘，然后充分利用他在殖民地积累的经验，雇了一些当地的脚夫，经过17天的艰苦跋涉，走过不见人迹的雨林地带，奔向十分遥远的目的地提卡尔。他在复活节那天抵达提卡尔之后，登上了5座令人头晕目眩的金字塔中的一座，发现塔身已被矮树丛湮没，台阶残破不

全，布满树根和腐烂植物的塔身十分滑脚。站在塔的顶部，他发现自己就像是漂浮在一望无际的树海上。

> 我进入的每个屋子都有方形的门口，顶部是美果榄木的横梁。所有屋子都是用石头和胶泥建造的。在金字塔顶端的房间内，有精雕细刻的横梁，但侵蚀得十分厉害，以致无法辨认出上面的形象是什么……森林覆盖了一切。清理工作是我远不能胜任的，看来很少有希望拍出令人满意的照片。毫无疑问，我正站在一座相当大的城市遗址之上，它比斯蒂芬斯提到过的一切城市都要大。尽管房间宽敞且数量众多，但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雕刻或装饰作品的迹象。

莫兹利用了5天时间来清理金字塔，测出塔基边长为51.2 × 55.9米（168 × 184英尺），塔高36.6米（120英尺）。他认为顶部的房间是一间庙堂，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这些建筑中没有任何崇拜偶像或其他崇拜对象的痕迹，但我对西班牙征服者经常提到的它们是神庙这一点并不怀疑。"金字塔群集在一个一度是露天广场的周围，广场上有一些石雕板装饰物，上面刻画着戴有羽毛头饰的人物形象。显然，这些金字塔标示着这里是城市的中心。

> 整个城市呈长方形平铺开来，各处在海拔高度上都有区别，地面成梯田状，斜坡处是仔细垒砌的方形石块。有些房屋保存状况良好……但能看到建筑物处于不同程度的破败状态，有些通常只是些方块的石头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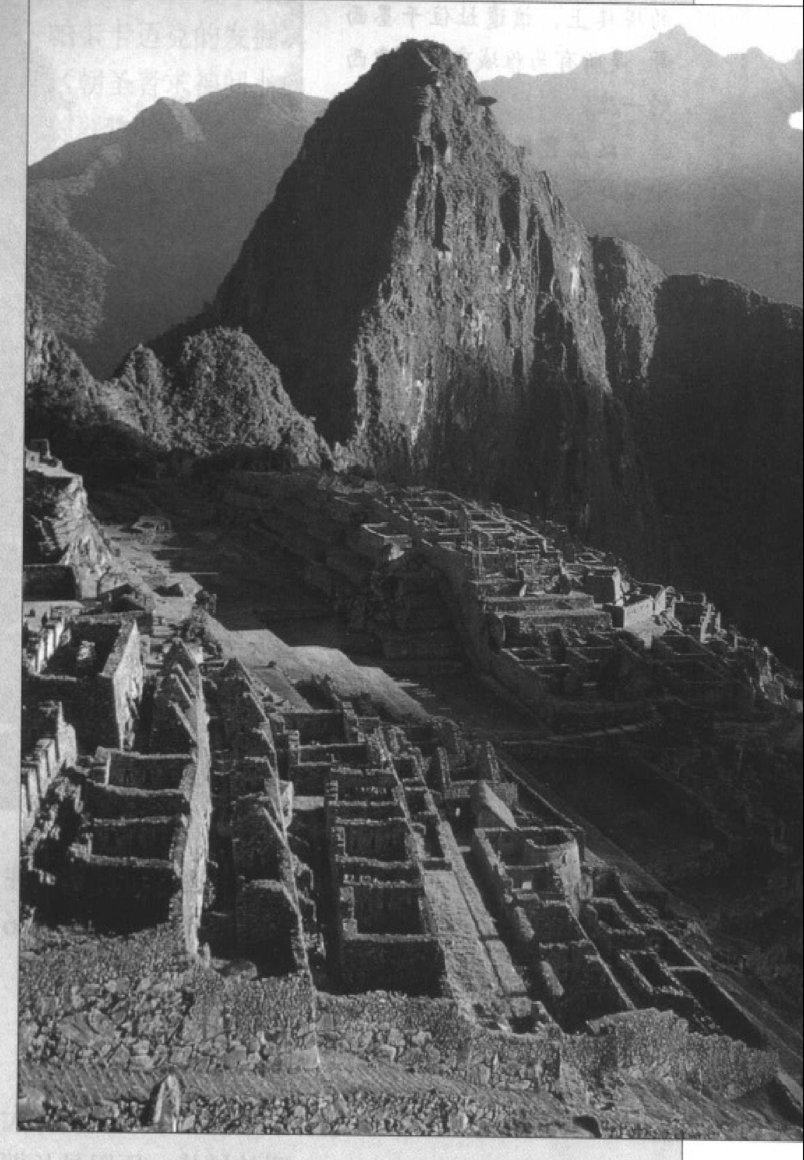
莫兹利属于最早利用摄影术记录考古遗址的人，虽然庞大的装备需要用骡马驮运才能穿过雨林，但他还是在10年多的时间里，继续考察了危地马拉、墨西哥和洪都拉斯的马雅废墟。他对科潘、奇琴伊察和帕兰克遗址加以描述和绘图，并且是第一批访问距离遥远的古典时代晚期遗址——位于乌苏马辛塔河边的亚赫奇兰的人。他从欧洲运来石膏，专门制作了马雅雕刻与铭文的纸型及石膏制品，后来又雇了一位助手对他的成果加以描绘和着色。到1895年的野外工作结束为止，他已积累了大量纸型和石膏模型以及照片、平面图、绘画和文字记录，它们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为大英博物馆所收存。他晚年生活在英国，把注意力集中在马雅历法和文字上。这种高深莫测的象形文字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最终破译。

像泽勒和莫兹利这样的考古学家，在古代马雅遗址上发现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对时间流逝的关注不亚于对他们自己的关心。他们留下了数百座石质古建筑，上面雕刻着看上去十分难解的象形文字，冗长的铭文刻写在金字塔的墙壁、楼梯、纪念碑和石柱上，甚至还有一小部分古代的抄本，躲过了西班牙征服时期天主教神父们焚书的浩劫。考古学家们很快认出了数字的用法，这些数字用小条和小圆点表示，始终具有相同的结构。他们发现了马雅人的历法，更贴切地说，是发现了马雅人的一些历法。占主导地位的长时段历法按照5个周期计算时间：巴克坦（baktun），144000天；卡坦（katun），7200天；坦（tun），360天；尤纳尔（uinal），20天；金（kin），1天。利用这种累积计数法为古迹确定的日期，可以精确到日。

马丘比丘：逝去的印加城市

当马雅文明的魅力把考古家和公众弄得神魂颠倒的时候，南美洲的考古发现，尤其是那些属于秘鲁安第斯文明的考古发现，同样使人难以忘怀。一位名叫海勒姆·宾厄姆（Hiram Bingham，1878 – 1956年）的耶鲁大学的青年史学家，重新发现位于印加人的神圣河谷——乌鲁班巴河谷上方的马丘比丘居民点，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马丘比丘坐落在崇山峻岭间一个高达2500米（8000英尺）的马鞍形的狭窄的石山脊以及一座陡立的较小山峰瓦伊纳皮楚峰上。即使在今天它也仍然是世界上最壮观的考古遗址。

宾厄姆靠骑骡子或徒步向北跋涉，从库斯科进入乌鲁班巴河谷，他想出了一个虽不浪漫却简单实用的办法，就是花钱雇佣能够找到印加废墟的当地印第安人，如果他们发现的古代遗存特别有意义，则付给他们双倍的工钱。从现代的普魁乌拉村出发，向上攀登一段险峻的山路之后，他的探险队沿着一条穿越茂密的丛林的小河前进，最终来到了一片空地。前面，在茂盛的树丛上方，出现了一些宾厄姆从未见过的最出色的印加建筑遗存。



> 在我们前面有一块巨大的岩石，高耸在一眼泉水之上。我们的向导没有误导我们。一座印加庙宇的废墟位于树下，它的侧面挨着或部分环绕着一个巨大的圆形花岗石，圆形花岗石的一头靠近一个小水池…… 当我首次看到这座非凡的神庙时，时间是1911年8月9日下午的晚些时候……我们没看到一间小屋，四周几乎没有一丝声音。这是一个举行古代神秘崇拜仪式的理想场所……最后，我们发现那个地点，在提图库西时代，印加祭司在那里面朝东方，欢迎升起的太阳，“他们向它伸出双手”，“向它抛掷飞吻”，“这是一种表示最深切的敬意和服从的仪式”。

宾厄姆在第二年返回马丘比丘之后，把居住在废弃建筑物中的土著家庭统统赶走，然后对这个遗址展开清理。当他的工人们试图割除植物的时候，一些毒蛇从树上掉了下来，引起一场虚惊。他们将遗址上的树木焚烧之后，展现出来的是一处印加人的定居地，其建筑之精致及壮丽的程度，完全可以与它所处的令人惊叹的险峻位置相提并论。当为他的探险活动提供资金的国家地理协会首次发表了他所拍摄的照片之后，这个遗址迅速成为秘鲁和印加帝国延续至今的一种基本象征和形象。

宾厄姆认为马丘比丘是印加帝国最后的都城、业已消失的城市韦卡班巴，印加人在这里抵御西班牙人的入侵，一直坚持到1572年。我们现在知道他的看法是错误的。有趣的是，真正的韦卡班巴是由探险家格恩·萨沃于1965年发现的，它位于一个叫做埃斯皮里图·潘帕的遗址上，刚好离宾厄姆本人于1911年放弃搜寻的地点不远。宾厄姆对印加王朝的发源地坦普－托乔的识别也是错误的。现在认为马丘比丘的台地、房屋、陵墓和宗教遗迹更有可能是第一个伟大的印加皇帝帕柴库提的地产。尽管宾厄姆宣称西班牙人并不知道这个遗址，但事实上它曾被收载于16世纪的西班牙人的财产记录之中。

宾厄姆因在秘鲁的访古成就而赢得声誉，这种声誉后来成了他的政治资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法国担任飞行员，之后成了康涅狄格州州长和美国的参议员。

阿尔弗雷德·玻西瓦尔·莫兹利（1850－1931年）在帕兰克那独一无二的4层宫殿的塔楼上，该遗址位于墨西哥，是所有马雅城市中最靠西的一座。

这座宫殿有许多房间和小型庭院，与其说是世俗的居所，不如说更像是礼仪性的建筑。它既有供奉的牌匾，又有神灵和人的泥塑。塔楼是用来观测天象的。



因此科潘遗址上的石柱D，即凯瑟伍德最有名的石版画的主题，可以被精确地确定为公元736年7月26日所建。这个发现为后来的马雅考古奠定了新的基础。

安第斯文明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美洲马雅文明的魅力又受到了秘鲁安第斯文明的挑战，原因是长期隐匿在浓密丛林中的壮丽的印加人马丘比丘遗址的发现，很早就得到了《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报道。这个在全世界激起人们想象力的事件，使得马丘比丘遗址的发现者、大学教授海勒姆·宾厄姆一举成名，由此进入国会山，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当宾厄姆声誉日隆时，在秘鲁沿岸从事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们却没有那么得意，他们正倾尽心力地重构前印加文明的文化序列。主要是由于迈克斯·乌勒(Max Uhle)在1892至1912年间所做的努力，秘鲁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具有考古学综合研究价值的地区。乌勒首次遭遇安第斯史前史是在他同旅行家阿尔芬斯·斯图拜尔会面之时，后者不久前刚从玻利维亚丘陵地带提提卡卡湖附近动人的提亚华纳科废墟归来，那里曾是一个向南扩张到智利和阿根廷的短命帝国的首都。该遗址上曾经人口稠密，拥有精雕细刻的神灵、超自然的生灵雕像及举行仪典的广场和金字塔，这一切构成一个神圣的区域，在许多世纪里（300－1000年间）吸引着朝圣者的到来。乌勒和斯图拜尔一起撰写斯图拜尔的记录，并于1892年发表了他们的成果。同年，乌勒动身去往秘鲁，在这个国家连续待了20年，为

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当构建地区年表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乌勒致力于地层学发掘法，并根据正确的演化序列对发现物加以分类，就像他在加利福尼亚做过的那样。他于1896－1897年对利马附近巨大的礼俗遗址和都市遗址——帕卡卡迈克的发掘具有特殊意义，那里在被西班牙征服之前一直是整个安第斯地区朝圣者求神问卜的中心。乌勒根据地层学方法进行挖掘，能够对依时间而变化的器物风格加以分门别类的排列。在印加遗存的层次之下，他发现了类似提亚华纳科式样的人工制品，但他认为这些制品的质量不及他所熟悉的那些原作。他称它们为“仿制品”，将它们用在自己制定的地区编年序列中，处理为秘鲁沿岸地区前印加时期的特点。他以这种方式，在帕卡卡迈克遗址基础上编制出安第斯考古的第一份具有深远意义的年表。乌勒进一步北移到莫奇卡和钦穆遗址，对后者的发掘使他的工作延伸到高原地区，甚至达到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智利。他为安第斯文明拟定的框架使整个南美考古学发生了一次革命，这个框架只是在最近才被其他解释所取代。

1860到1920年这段时间，许多方面可以被视为考古学发现的“黄金时代”，充满了史无前例的发现——从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作品到帕卡卡迈克的器物，从迈锡尼到马丘比丘，这个时代回响着考古史上许多最伟大的名字——拉尔泰、谢里曼、伊文思、皮特里、乌勒。但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看到了一种比较消极的倾向，也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极端民族主义是一个在后来给考古学投下丑恶阴影的幽灵。

第六章　考古学成熟的年代（1920－1960）



20世纪中叶，考古学在多方面发生了革命。重大的考古发现继续面世，如图坦哈蒙墓、哈尔迪斯的乌尔墓地、拉斯考克斯洞穴这样罕见的发现，同时其他领域以及科学的进步也对这个日益成熟的学科具有更大的意义。航空摄影术、花粉分析法，最重要的是放射性碳同位素断代法，在考古研究中发挥了有巨大作用。



“多奇妙的东西啊。”1922年11月26日，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和卡那封(Carnarvon)勋爵在帝王谷图坦哈蒙墓的前厅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卡特写道：“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一天，而且肯定是像我这样的人再也甭想第二次遇到的一天。”

把点燃的蜡烛从那扇大门的小洞伸过去，借着那闪烁的光亮，他慢慢地分辨着“那些奇异的动物、神像，前厅里简直到处都是黄金的闪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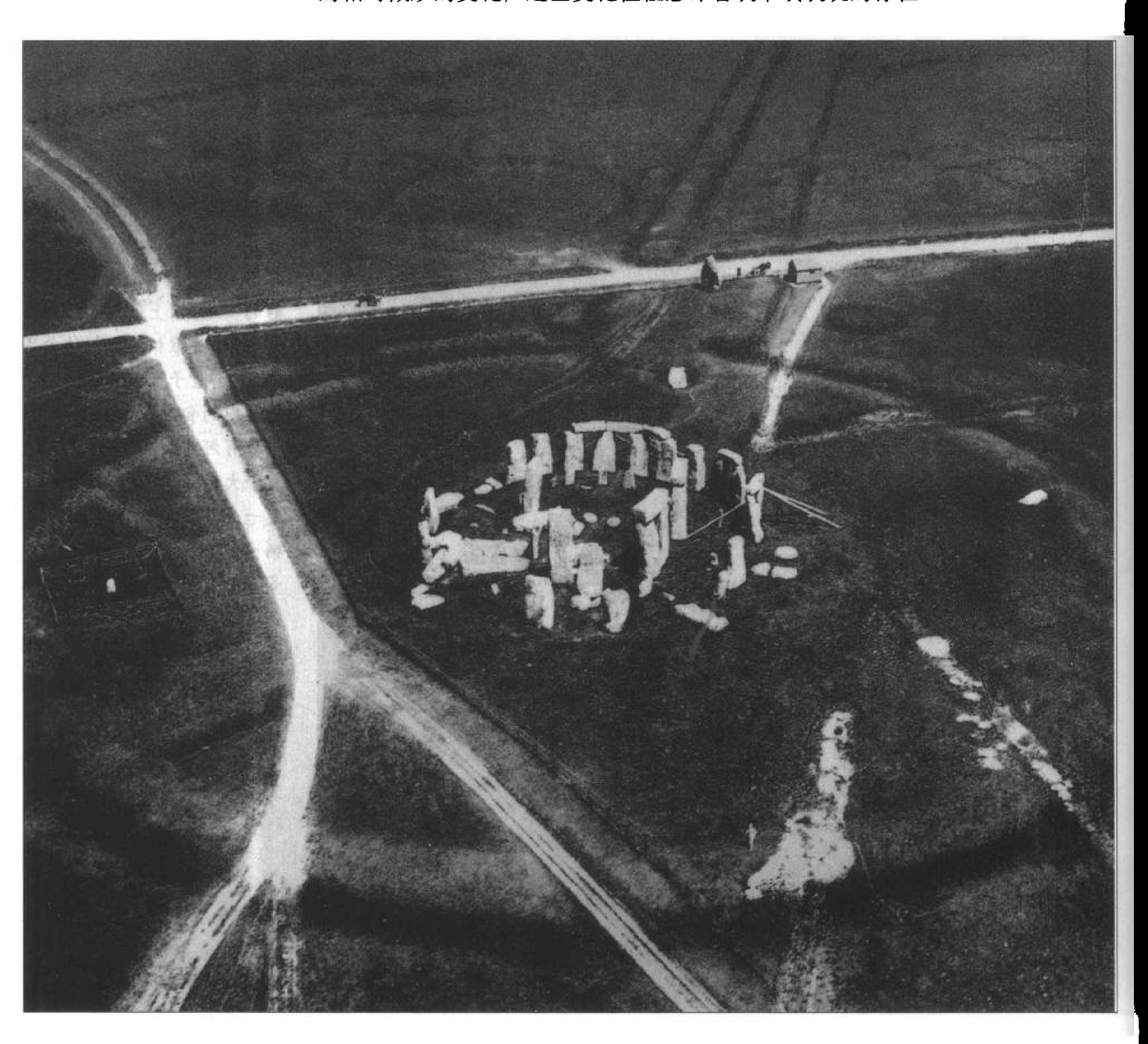
墓室的前庭很小，刚好进深8米（26英尺），3.7米（12英尺）宽，但堆满了来世的用品。正前方是一张镀金的床，床架呈牛的形状，撅起一条拱形的牛尾。床上是一堆杂乱的家具，床下堆积着木制的食品盒，每个盒子上都用墨水刻写着盒内的食品名。再往前是一张饰有河马头的床架，上面放着个大箱子，它下面的阴影处是一个黄金宝座。图左侧是两辆鎏金的木战车，上面有丰富多彩的装饰，为放入陵墓而被拆散开来。

这是考古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重大发现，自从墓主——19岁的法老于公元前1325去世葬入此墓以来，他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惊动。

虽在某些国家，这些方法被极权主义政权所滥用，但这一时期的考古学却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和受到人们日益广泛的欢迎。

新的专业化趋势

在欧洲，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几十年，是一个新技术不断问世、新发现层出不穷的时期。最激动人心的新思路之一就是从空中摄影勘查。这一方法的潜力是在19世纪晚期首次被人认识的。第一批空中摄影的考古照片涉及巨石阵，是从一个由地面升空的气球上拍摄的，时间是1906年。飞机的发明无论对军事摄影还是考古摄影来说，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各方均利用这项技术侦察和测定敌人的位置。在和平时期，这一点非常清楚，即空中的视野开阔，看地貌像是看一张地图，更有可能看到地面观察者看不到的一些规则匀称的东西。尤其在较暗的光线下，航空摄影可以侦测出土木建筑、土壤或庄稼收成的相对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往往意味着坟堆或坟坑的存在。



航空摄影由于具有上述明显的优点，因此很快便在欧洲和近东被广泛地应用于对古代遗存的调查。在英国，这一方法的主要支持者是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克劳福德（O.G.S.Crawford）。他于1928年出版了有关英国南部史前遗址的一本经典影集《从空中俯瞰韦塞克斯》。航空摄影术也被法国和德国考古学家们所使用，但由于当时飞机稀少，飞行成本较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航拍作为考古学工具的潜力并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航空勘查即取得了激动人心的成果之一：军官约翰·布雷德福德在南意大利塔沃里耶尔平原上，发现了200多个被土封存的、以前无人知晓的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

随着专业考古工作者数量上的增加，以及采用了更加严格的分析和发掘技术，地面的考古工作越发复杂起来。这个时期考古界的一个具有领袖气质的人也是军官，他就是英国人莫蒂墨·惠勒（Mortimer Wheeler）。他继承皮特－里弗斯的军事传统，要求发掘过程中遵守发掘纪律和保持灵活反应，要使用小铲子而非使用锹或铲。他强调指出，挖掘一个考古遗址意味着对它的破坏，他坚持必须详尽地记录并迅速地发表结果。他特别强调主要以剖面图形式记录一个遗址的地层序列，认为这是鉴定遗址年代和解释问题的关键。

惠勒对军事遗址特别感兴趣，发掘了一些位于英国南部和法国北部铁器时代的山区要塞。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他于1934－1937年在多塞特郡发掘了巨大的“少女城堡”。该城堡约建于公元前500年，在5个世纪里曾被人占据且加以改造过，直到罗马将它摧毁为止。惠勒的影响并非仅仅限于西欧。1943年，他被任命为印度考古总监。在5年任职期间，他惊人地改善了次大陆的考古发掘与记录技术。他还培训出一整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考古工作者，以便在他离去之后能够继续顺利地开展该地的考古工作。

考古学在20世纪30和40年代变得更为科学，还有赖于另一个途径，即环境专家对考古发掘和田野勘查工作的参与。在斯堪的纳维亚，对过去环境的关心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当时像沃索这样的考古学家们，研究了冰川时期的地质变化对史前社会的影响。到了19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的考古学家已能够进行最初的地貌研究，把一个特定时期的遗址分布情况——起初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同特定土壤类型的分布情况加以比较。这种“地貌处理方法”将遗址的地理分布、考古文化的传播与多样的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这种方法在英国引起了特有的共鸣。18和19世纪英国的田野调查研究长期有一个传统，就是强调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地貌景色，看作是理解过去生活的前提条件。森林与田地规模的大小、所种农作物的多样性、气候的性质等，这一切都是至关重要的考查因素。

在北欧，花粉首次成了破解史前环境之谜的一把钥匙。本世纪初叶，过去植物可以通过花粉遗存的形式保存下来这一点已被人们认识到了。斯堪的纳维亚的科学家伦纳特·封·波斯特（Lennart Von Post）此时开发出一种技术，即通过计算每个假定的主要样本层中的花粉颗粒的数量，来复原古代植物的状况。从20世纪30年代起，这种方法在考古项目中，尤其是在发现物非常稀少、需要想方设法汲取每一种残留信息的情况下，起了重要作用。花粉分析与对动物骨骸及其他有机物遗存的认真研究相结合，为了解远古生活的状况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

左图：巨石阵，1906年由沙普中尉从军用气球上拍摄，这是对英国考古遗址的第一次空中拍摄。

巨石阵大道在地面上是看不到的，主围栏四周留下的圆沟在照片上表现为暗色的、尚未干枯的草带。再注意右侧巨石牌坊中有一个是用木柱斜支着的。

从1908年起，意大利军队的工程人员也开展了相应的气球摄影。到1911年，无论是罗马广场还是奥斯提亚港都有了空中拍摄的照片。

在美国，靠近圣路易斯的卡霍吉亚于1922年成为空中拍摄的第一个史前遗址。

早期运用花粉分析法的一个重要范例是对史前农业的调查。最初的欧洲农民是如何种植庄稼的？是在清理过后的林地上还是在空地上？丹麦孢粉学家乔安纳斯·伊韦尔森（Johannes Iversen）是这方面的先驱，他力求通过研究泥炭沼的花粉序列方式来解答这些问题。在奥德鲁普·莫斯，他找到了答案，这就是环境变化是依循由茂密的森林变为开阔的草地或田地，然后再复归为森林这一方式进行的。他由此得出结论：早期农民拥有的土地是焚毁森林后形成的，他们在那里垦殖两年或三年，当土壤肥力衰退的时候，便迁往新清理出的土地。这种对奥德鲁普·莫斯的个案研究，尽管在今天为更新的成果——即它的变化序列在新石器时代的欧洲绝不具有普遍意义——所修正，但在当时却具有巨大的影响，它表明花粉分析法能够多么有效地揭示我们迄今完全无法了解的史前人类生活的真实状况。

在英国，起初受训为地理学家的考古学家们采用了相当不同的环境处理方法。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克劳福德（O.G.S.Crawford）利用航空摄影研究考古遗址和自然环境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此同时，希瑞尔·福克斯（Cyril Fox）则率先绘制了详细分布图，以自然地理条件为背景标出了不同时期各处考古发现的位置，并且还对各地区彼此相连的阶段加以比较，以便绘制出有关早期人类文

莫蒂墨·惠勒

莫蒂墨·惠勒爵士（1890－1976年）是20世纪的考古学巨匠和伟人之一，他是一个严格的军官、放浪不拘的纨绔子弟及喜好恶作剧的公子哥儿的混合体。

他的大部分田野发掘工作集中在英国本土上的罗马帝国之前以及罗马帝国期间的遗址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他便发掘了科尔切斯特（卡姆洛都努姆），随后又发掘了卡纳封、布雷肯和凯里昂的罗马军团要塞，发掘了圣阿尔班斯（罗马时代的韦鲁拉米乌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又在约克郡的斯坦维克广泛调查了铁器时代的防御工事。

惠勒是一位十分严格的发掘者，始终喜欢自己亲自动手。他具有艺术家的目光，善于捕捉细微末节；他具有士兵的坚定品格，一板一眼地进行严格的挖掘和记录。他为记录目的而把遗址划分为若干方块、方块之间留有隔障的系统方法，即所谓“惠勒的方格”，现在看来许多方面已经过时，但仍在世界各地的考古发掘中被广泛地使用。

除了发掘之外，惠勒还致力于加强英国考古学的机构建设。他于1926和1944年间负责管理伦敦博物馆，在1948年伦敦大学考古学研究所成立一事上作用甚大，他担任该所第一任所长，称这个研究所是“考古科学的实验室，未来的考古工作者在其中可以学到该专业的基本知识”。

惠勒的最大长处之一是热情，他以自己对这门学科的强烈情感感染了到访的参观者和自愿的发掘者。作为领导人物，他始终重视团队精神的意义。在少女城堡发掘现场的人，每个周五晚上都要在当地酒馆里玩撞柱游戏，同时，他们还在晚餐后的良宵，围着城堡的墙绕圈，边走边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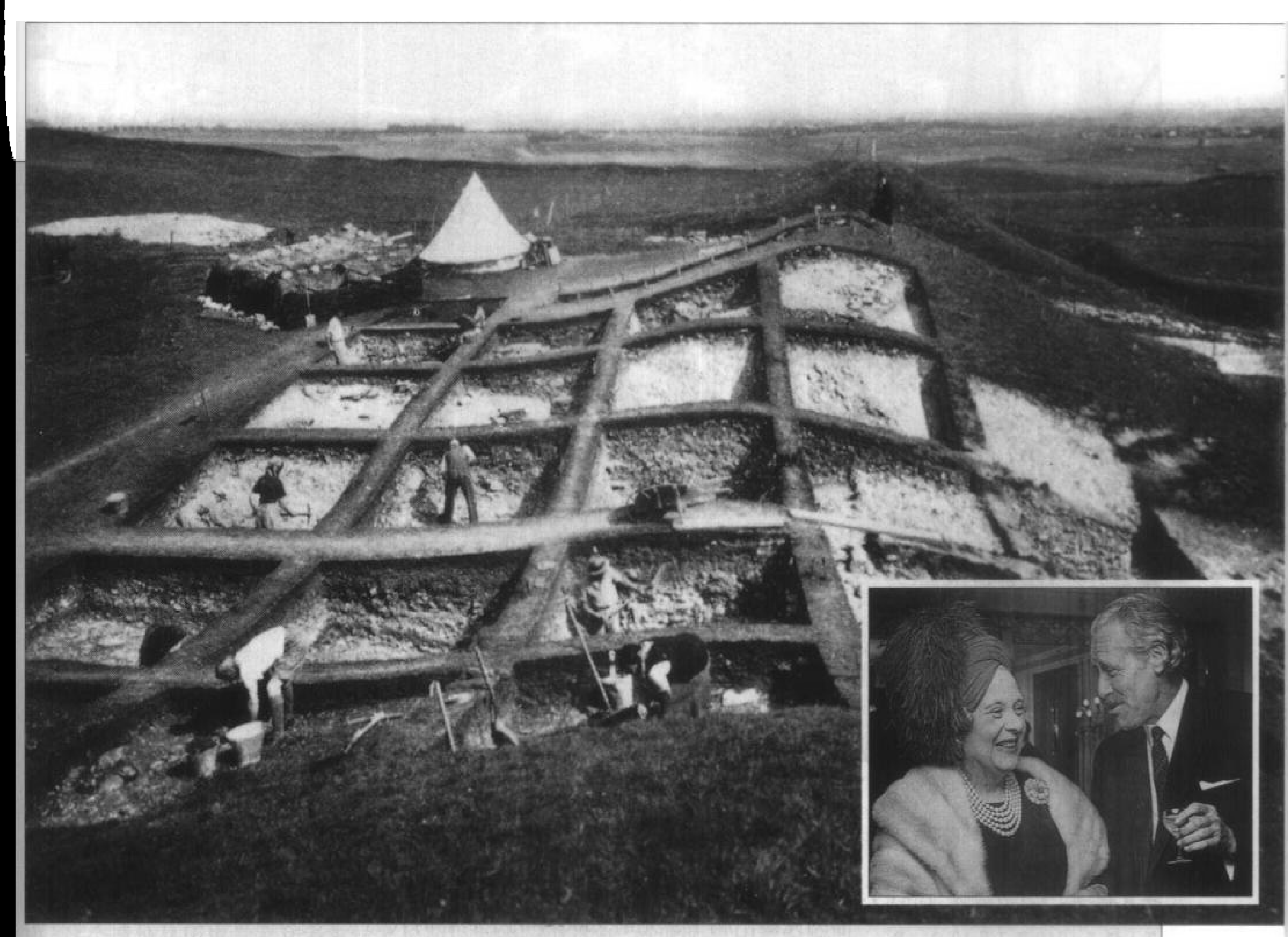
但惠勒也是一位讲究方法的田野工作者，他对考古发掘工作的性质进行了精心的思考。发掘一个遗址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真正要实现的目的是什么？他对在历史和考古学之间可能建立的联系尤感兴趣。在发掘少女城堡期间，他发现一组墓葬，其中一座墓葬的一根脊椎柱上嵌有罗马人的弩箭镞。他把这类的死者看作是这个遗址上的最后一批守卫者，他们于公元43年抵抗了罗马军团的侵略，战死后被幸存者匆忙地掩埋在这些公墓里。此前早些时候，在发掘韦鲁拉米乌姆时，他一直在寻找公元前54年反抗尤里乌斯·恺撒入侵的不列颠人首领卡希韦劳努斯的首府遗迹。

惠勒在其漫长的考古生涯中始终强调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问题，坚持认为考古学家有义务以“简明扼要、生气勃勃、直截了当的散文形式”向社会通报他们的工作和成果，以此作为对纳税人的回报，因为正是他们的金钱最终支撑了大多数的考古活动。他的著作文笔绚丽多姿，思路明晰睿智，形式与内容结合得天衣无缝。他还通过演讲和在报纸上撰写文章，将个人发现的意义与激动的心情转递给更广泛的民众，他的个性以及他在考古科普方面所具有的技能，使他在电视这一新型媒体上大获成功。

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考古智力竞赛节目“动物、植

化盛衰消长的图表。他从剑桥区开始了大规模的考察。1932年他在《英国的个性》一书中非常贴切地把英国划分成为两部分，认为英国东南低地地区较东南高地地区的社会更易于受到欧洲大陆各种思想传播的影响，所以高地地区在文化上较为保守。

在1952年－1974年的剑桥大学任考古学教授的格拉汉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则提出了一种更加圆熟的观点，即把考古学与环境研究以及民族学研究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自20世纪30年代始，克拉克一直致力于对史前史采用基本的经济分析方法，坚持认为考古学的目的不是把古物分类存放到博物馆中，而是为了从比较的角度和世界的范围内理解人们在过去是如何生活的。他认为史前社会不只是在一种清晰的生态背景下运行的，而且也是由不同的经济、社会组织和宗教信仰成分构成的，尽管它们彼此间存在着关联并且相互依赖。克拉克虽然具有国际头脑，但他也相信人类的史前生活最好是通过对单个遗址的缜密研究来加以



物和矿物之谜"中的表演，使他成为1954年度BBC（英国广播公司）的首位电视名人。

1926年在多塞特郡少女城堡东边入口处发掘时所采用的"惠勒的方格"法。方框的挖掘要在同一时间、同一平行的层次上展开，四边都要详细地勾画，为的是对考古的层次序列提供一个永久性的记录。

右下角的插入图为很得太太们欢心的惠勒同浪漫小说家芭芭拉·卡特兰德在一起。摄于1965年。



班克亥德的罗马要塞，位于苏格兰西南部的达尔斯文敦。剑桥大学航空摄影的先驱肯尼特·圣约瑟(1912-1994年)摄于1949年7月12日。圣约瑟独自发现了数千处前所未知的遗址。

理解。他是利用花粉分析之类科技手段的先驱之一，这项技术是由他的合作者——古植物学家哈里·哥德文从斯堪的纳维亚介绍到英国来的，最著名的范例是在1949－1951年对斯塔·卡尔遗址的研究上应用了这项技术，该遗址位于英国北部约克郡，属于公元前9000年的中石器时代。

斯塔·卡尔遗址在考古证据和考古分析方面堪称一座里程碑。同瑞士的“湖上村庄”一样，这是一处湖边遗址，木制工具和其他有机类古物因浸泡在水中而得以保存下来，若在别的地方则早就腐烂完了。在发现物当中，有一些骨头或鹿角尖状物，用切割下来的鹿角制作的鹤嘴锄头，以及带有鹿角残桩的成年鹿的前额骨，人们把它解释为面具。克拉克对植物和动物遗存进行了周密分析，由此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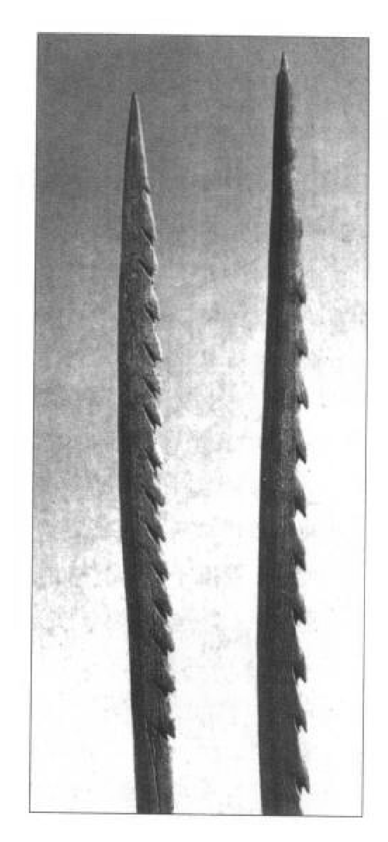
原出了该遗址的古人类生活的细部情况。他得出结论说，这是一处由游荡的狩猎和采集者在冬春季节占据的遗址。他们猎取马鹿、狍子、麋鹿。此外还发现了家犬以及诸如野牛、野猪和獾之类林居动物的骨骸。花粉分析及水浸树干的遗存表明，湖边在冰盖消退以后基本上是一片森林景色，最一般的树种是桦树。作为人类活动的重构之地，斯塔·卡尔遗址不仅为研究狩猎和采集者的生活设定了一个新的尺度，也为小心谨慎地发掘和分析并不显眼的考古遗存提供了一个新的标准。考古学已经成熟壮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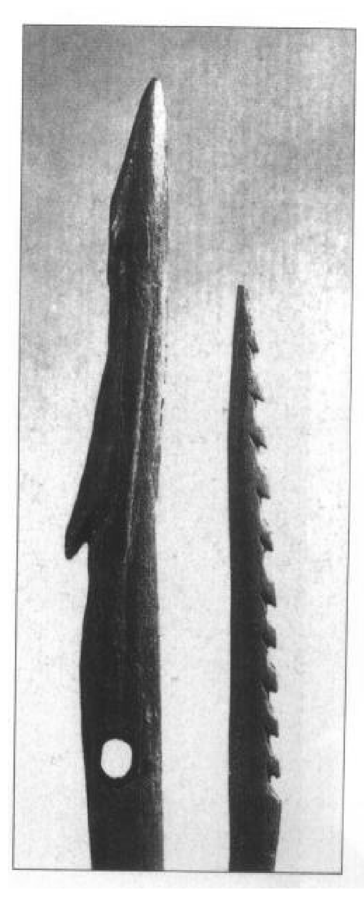
对植物遗存进行植物学研究的方向在这一时期也已确定，该研究不仅可以复原过去的环境，而且能够获得有关史前饮食情况的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丹麦和其他国家均出土了一些保存良好、其胃内成分可用作分析材料的人类尸体，如托兰德人。这些发现对植物学研究给予了新的推动。人们能够重现、烹饪和品尝一种相当于史前人类食用过的稀粥，这就把新颖真实的考古信息带给了普通民众。

托兰德人死时身上除了一根腰带和一顶小帽子之外，完全是裸露的，没有任何随葬物。而埋葬在英格兰东海岸萨顿胡的一座古墓中的那个盎格鲁－撒克逊人领袖（约公元625年），与之相比则有很大的差别。倘若不写这个发现，那么关于这几十年欧洲考古学的叙述将是不完整的。萨顿胡遗址是由剑桥大学考古学家查尔斯·菲利普斯于1939年发掘的，当时正处于战争的阴影之下。该遗址证明是一座船葬墓，也是那时史无前例的出土古物中最丰富的英国考古发现地。那条船本身已经无影无踪了，但其钉在一起的重叠着的木支架的痕迹则保存了下来，据此可以复原出这条船的大概形状。船的中部堆着丰富多彩的随葬品，有完整的佩剑、盾牌和头盔，有宽阔的金皮带扣，以及一些斗篷钩，上面饰有血色的石榴石。还有一些法国金币（船上虚幻的桨手每人一枚）以及来自远方拜占廷的银盘。

在萨顿胡——多半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英格兰时的早期统治者之一、东盎格里亚的莱得沃尔德的墓葬——细心审慎的发掘和记录技术使考古学不再像一个世纪之前那样，只是搜求奇珍异宝的手段，而成为一种对前所未有的发现所进行的有所控制的科学的调查。惠勒直接承继皮特－里弗斯的事业，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具影响力的英国科学考古的主将。然而，在欧洲大陆，与他的努力不相上下的却是德国考古学家，他们强调敞开发掘，从整体上揭露范围更大的地区，以发现建筑物的布局和其他结构，揭示它们之间的空间和年代关系。这一切成了德国式考古方法的特点，并由一位在20世纪30年代逃避纳粹迫害的难民格哈德·伯休将它引入英国。伯休于1938－1939年在英国南部挖掘一个叫小伍德伯里的铁器时代（公元前4－2世纪）的农庄时，显示了这种方法的功效。

敞开发掘法也被丹麦考古学家保罗·内隆（Paul Nörlund）所接受，并被应用到他于1934年开始的在特雷勒堡（西兰岛南部的一个环形土建遗址）的发掘中。这个遗址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长期思考的一个对象，已证明是10世纪晚期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一个军营。大型的土建工程显然十分规整和对称，由4个对应着的入口分成4个等份，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内隆发现了营舍建筑内的凸面木柱的柱洞。这次发现使人们对北欧海盗时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排除了有关蛮族军队混乱无序和无恶不作的神话，说明北欧海盗时代的丹麦是一个中央集权的、





用鹿角制作的公元前九千纪的一些带刺鱼叉，出土于斯塔·卡尔的中石器时代遗址。

泥沼中的尸体

北欧泥炭沼里的泥炭尸体保存着有关史前时代的可怕记录。尸体的皮肤、头发、指甲、甚至胡须茬和眉毛都被酸性水质泡成了棕褐色并被保存了下来。这些人或者是陷入泥淖而被淹死的，或者更常见的是被人杀死后又被有意扔进泥沼的。

这类泥炭尸体中最有名的一具是1950年在丹麦发现的"托兰德人"，年代属于公元前3世纪。这是一个罪犯或是某种祭典的人牲，曾被事先勒死，然后抛入了泥沼。对他胃内成分的分析发现，他最后吃的食物是一种包含有大麦、亚麻子、蓼类植物、阔叶野草、黄春菊的粥，没有肉食。这就是说他喝的粥是用未经仔细处理的大麦和亚麻之类农作物做成的，这些农作物中的草籽还没有同谷粒适当地分离开来，当时死刑犯进食的也许就是这种食物。

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曾对北方的日尔曼人部落进行过评论，说"叛徒和逃亡者要被吊死在树上，懦夫和鸡奸者则被按在柳条编的篱笆下，扔进泥淖"。

欧洲记录的关于埋在泥沼中的人数是相当可观的，丹麦有166人，德国有215人，荷兰有48人。他们中的极少数被发现时保存状况良好，于是最终结局就是被陈放到了博物馆中。英国和爱尔兰大约有120人，最著名的一个是所谓林多人，1984年发现于柴郡的一处石炭沼内。他被杀时25岁左右，系公元1世纪，头部受到两次猛烈打击，被绞死，最后还被割掉了喉咙。

当发现托兰德人的时候，可用的技术手段只能完整地保留他的头部。1948年发现的林多人则通过现代干燥和冷冻技术，被完整地保存在了大英博物馆。

林多人。最近发现的英国泥炭沼尸体，是在对泥炭的商业性开采中出土的。死者失去了一条腿，身体的其他部分因上面泥沼层的压力而变形，但却相当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有组织的国家。

关于蛮族人的传统偏见——如我们今天所知它出自古典作家和早期基督教作家的偏颇记载——也受到了相应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20世纪50年代对德国南部铁器时代的要塞赫尼堡的发掘。这次发掘涉及凯尔特人，他们于大约公元前600－500年占据了这个约3公顷（7.5 英亩）大小的遗址。人们辨认出了环绕三角形的赫尼堡高地——一处俯瞰多瑙河的断崖绝壁——的防御工事。19世纪晚期，在对其邻近地带的墓冢进行发掘时已有一些珠宝和青铜器皿出土。然而，直到1950年，考古人员才开始对要塞进行第一次系统的发掘，指导者是图宾根大学考古学家克特·彼特尔（Kurt Bittel）。令彼特尔惊奇的是，他发现要塞南面和东面的防御工事虽然如他所料，是用木材和粗石块修建的，但很长的西部防御工事却是以石灰石为基础的地中海类型的城墙，墙身由干泥砖砌成，中央有一个入口，墙间有一些四方型的供瞭望用的塔楼，总共有10座。能看出这是一种希腊式的防御工事，在阿尔卑斯山北部还不曾见到过。从这里出土的阿提卡的黑色陶器和广口酒瓶表明，赫尼堡的统治者大概是通过马西里亚（现代的马塞勒斯）而与地中海世界发生紧密的商贸接触的。马西里亚是罗纳河口的一个希腊殖民地，建于公元前600年左右。

纯金的皮带扣、带有交错在一起的动物饰纹、出自英国萨福克郡萨顿胡船葬墓、属公元7世纪早期。从这个图样上能看出有一个黑色合金镶嵌物（硫化银）。

这个皮带扣长13.2厘米（5英寸）、重400多克（14盎斯）、属于欧洲历史上装饰艺术的杰作。



赫尼堡出土的材料是业已出土的其他令人诧异的远距离交往的证据的佐证，即证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在霍米切尔出土的证据。那是一座周长接近80米（260英尺）、高14米（45英尺）的墓冢。在木材建造的墓室中，有一架4轮马车的遗存和一位死去的首领人物的遗骨，随葬有各种人在阴间生活所需的奢侈用品，如马具、弓箭、一口青铜大锅、用中国丝绸镶边的织物，这是中国丝织品在欧洲出现的最早证据。

1953年，北方凯尔特人和东地中海之间存在联系这一点，在法国东部越发显著地表现出来。当时，一位名叫雷恩·乔弗罗的法国地方学校的老师，在布尔甘迪的维克斯发掘了一个不算很大的石冢，证明是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一位公主的墓地，墓内也有马车、马具和青铜碗，但这次除珠宝外还发现了其他随葬品，包括一件希腊工匠制作的重达一磅（450克）的精美金饰环，以及一些阿提卡黑陶酒杯和一把埃特鲁里亚人的青铜酒壶。墓室中最抢眼的是一只巨大的希腊krater（勾兑酒的大杯），高160厘米（63英寸），是明显的赏赐之物。环绕杯颈处饰有条带状的浮雕纹饰，刻画着希腊步兵和战车兵，杯口有一个盖儿，上立一个小的妇女人物雕像。这是古代世界幸存下来的最大件的青铜酒具，它多半是赠予强大的凯尔特统治者的一件外交礼品。

石器时代的史前史

20世纪前半叶，人们对西欧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发掘。考古学家的主旨仍然是通过年代学、类型学和地层学为过去建立秩序，这时他们很少注意到考古发现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尽管挖掘技术得到了改善，但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它们仍然过于简单。发掘者的工作进展十

分快速，他们仅仅重视较明显的层次，在许多场合收集的仅是大型哺乳动物的遗骨，而很少留意人工制品的相对位置，小件骨骸和石制工具的碎片则往往被弃之不顾。

一位开风气之先的法国人是学校教师德尼·佩隆尼（Denis Peyrony），他于1901年在多尔多涅省发现了马格德林时期的丰德高姆艺术，后来他成为设在莱斯埃兹斯乡村别墅的国家史前史博物馆的馆长。他以地层学方法展开挖掘，坚持尽可能地在同一时间里充分收集一个文化层内的人工制品。因得益于发掘经验的积累，佩隆尼第一个认识到：在穆斯特时期——尼安德特人时代——的各具特色的石制工具制造业当中，有些显然是处于同一时代的。当假定每一种石器制造业在时间和技术上都是独具特色的，并都以特有的顺序模仿其前人的说法流行的时代，这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发现。他阐明了各个石器制造业在梭鲁特时期（约公元前19000－16000年）和马格德林时期（约公元前16000－10000年）的循序渐进的关系。通过对弗拉塞和上劳格里豪特隐蔽岩石墓的发掘工作，他认识到奥瑞纳时期（约公元前40000－28000年）比起步日耶原先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佩隆尼的处理方法是把它分成两个平行的发展期——奥瑞纳文化和佩里哥尔文化。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弗拉塞还发现了两个成年尼安德特人和4个孩子及婴儿的墓葬，其中一处墓葬里放有一块雕凿过的、带有许多杯状痕迹的石头，它成为早期“艺术”的一个重要范例。

虽然佩隆尼属于欧洲第一批发表有关自己所发掘的遗址平面图的人，如他发掘的勒富尔涅·杜迪波尔（1932年）遗址平面图便显示出埋桩的洞眼和石器的布局，但他的理解却因他依赖于小规模挖掘而受到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从表层向基底切割以获取大量的地层样本，势必无法认清发现物所具有的较为广泛的相互联系。更适宜的技术是水平推开的大范围的敞开发掘，这种在德国和东欧确立的方法，在法国已被应用于对罗马时代遗址和巨石墓的挖掘当中，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也没有为旧石器时代考古所接受。战后研究石制工具的一位主要专家弗朗哥·波德斯多次承认敞开发掘法适用于具有单一文化层的露天遗址，但否定它对诸如他在多尔多涅省挖掘一些洞穴和石棚的使用价值。在派克·德·希亚兹和康伯－格莱纳尔这样的遗址，他宁愿按一平方米或小于一平方米的方框进行发掘，仅是在遇到某些结构性遗迹时才水平地扩大发掘范围。

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旧石器时代的发掘已成为由多学科队伍所进行的艰苦的大规模的“解剖”工作，关系到把一个遗址的各文化层置于生物和环境的背景之下的问题。考古的目的现在已不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把主要气力用在发现器物上。现在更注意对较薄的文化层加以整理，找出每一件人工制品，收集代表性的动物骨骸、花粉和沉积物的样本，以供实验室分析之用。

类型学问题——根据适当的演化和编年顺序对石器加以分类——对于专家们来说仍然是优先考虑的基本问题。莫尔蒂耶、步日耶、佩隆尼拟定的方案首先是基于器物的形状来划分工具的类别：有些器物的名称与这些器物具有的假定功能有关（例如刮削器或凿刀状打火刀），而其他一些标记则仅仅是描述性的（齿状或月桂叶状）。换句话说，由每一工具的“集合体”构成的清单，乃是一份与人类活动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目录集。由单个层位或遗址上的有关发现组成的各个集合



男性尼安德特人的遗骸，1909年发现于多尔多涅省拉弗拉塞属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棚中。遗骨之间仍保持着解剖学上的合理关系，膝盖屈起到腹部高，头偏向一边。

1909至1912年间，在弗拉塞发现了4个孩子（包括1个胎儿和2个新生儿）的骨骼残片，一起发现的还有一成年男子和一成年妇女的骨骸，他们也许是孩子的父母。几十年后在同一遗址中又发现了第7具骨骸，也是一个孩子的骨骸。

体，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这是人为先评估出来、然后再根据风格和年代的相互关系将它们分门别类地组合成地域性的序列。整个分类工作是建筑在"化石指标"的思想基础上的：考古学使用的各具特色的工具类型与古生物学家所使用的化石类型是相同的，这些工具类型被挑选出来，成为每一种文化传统的特征。简而言之，旧石器时代考古开始与自然科学联姻，它的资料配置则依循地质学的框架结构，这导致人们将古物视为"历史的化石"，与自然界的化石相提并论。的确，在许多人看来，燧石也许可以被比作人类，因为它们有自己的进化过程，也能产生混血的后代，而且与它们被使用时的文化条件没有多少关联。

至20世纪50年代为止，法国研究旧石器的专家们已经制定出了"类型明细表"，允许对大量的考古发现进行计量分析。按照所选择的"化石类型"是否存在这一简单标准来加以分类的做法，逐渐被对一些工具集合体的整体研究所取代。工具的界定更加严格，依据的不再是工具的形状而是制作工具的技术。于是人们便能绘制出显示不同器型在一种工具集合体中所占百分比的简单图表，这有利于对各遗址之间以及各工具集合体之间加以比较，发现它们实际存在的差异和相似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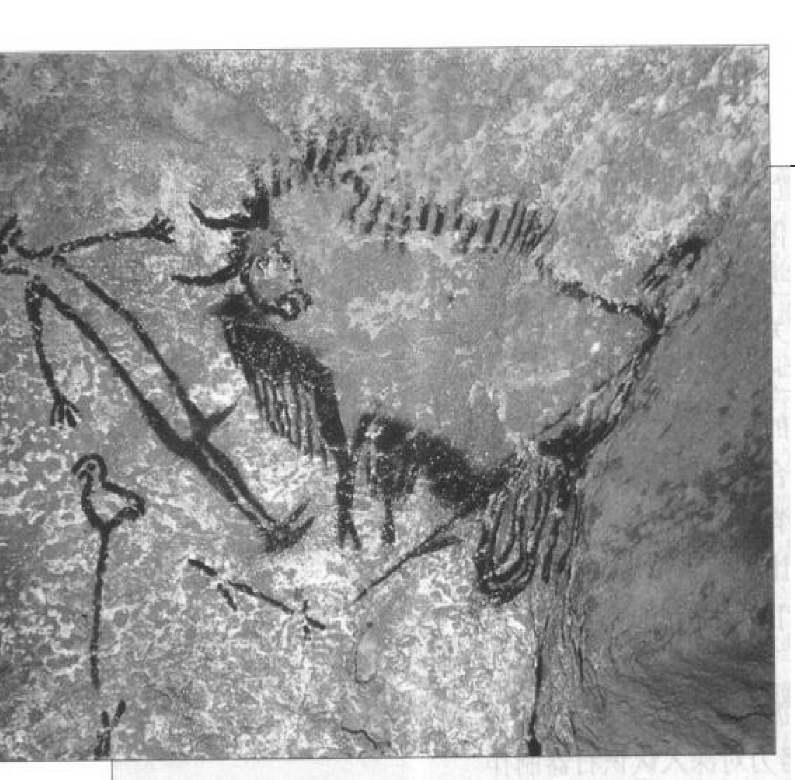
考古分类的认识也因对石器的复制实验而得到修正。波德斯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以娴熟的技艺打制出犹如剃刀般锋利的燧石刀。他的努力对深入认识石器制作技术有很大意义，表明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制造业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不存在整然有序的先后承继关系，或者与环境变化也没有什么关联。普遍流行的传统并不是纯粹以单线方式依次传承的，看来更多的是以一种家族谱系的形式呈树枝状或逐渐衰落状衍化的。波德斯特别提出要对穆斯特时期（约公元前180000－30000年）重新定义，否定有关这一时期是单线的无所变化的统一体的观点，而是将它划分成4个截然不同的、彼此有所重叠的文化传统（特点是存在不同的工具类型以及它们各占的百分比有所不同），他把这一切归结为文化差异或种族差异。这一理论在后来一些年份里成为论争的热点问题。

关于旧石器时代的新发现一直持续不断，业余考古学家和专业考古学家仍旧

是这些发现的主角。1931年对德国西南沃格尔赫德的古斯塔夫·里克洞穴的发掘，出土了一系列著名的奥瑞纳象牙雕刻动物，包括猛犸、野牛和精巧的野马像，存在时间至少在30000年以前，属于已发现的最古老的此类古物之列。同样值得纪念的是1939年在罗马南部蒙特希塞奥的一个洞穴中的发现，当时发现的是一个尼安德特人的头盖骨及颌骨，曾有几十年的时间，它被错误地解释为同类相食的原始仪式的证据。现在人们认识到这个洞穴可能是个土狼的巢穴。

法国也发现了一系列大冰期时代的极其重要的洞穴装饰艺术作品。1922年发现的派克摩尔洞穴中，约有60个绘制的或雕刻的动物形象，时间约属公元前25000－10000年间，其中包括许多猛犸形象和一块绘有著名的“斑点”马的板条。1923年在位于比利牛斯山区的蒙特斯潘洞穴，又发现了洞壁雕刻及一些泥像、浮雕，其中包括长约1米（3.3英尺）多的类似斯芬克斯的熊状动物。最著名的一次发现是在德军占领时期的自由区内的拉斯高，这是世界上所知的一处最美不胜收的洞穴。

虽然这一时期在西班牙所发现的岩石艺术不能与拉斯高或阿尔塔米拉的艺术相媲美，但路易斯·彼里科特·加西亚（L.P. Garcia）于1929－1931年在巴伦西亚沿岸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帕尔帕罗洞穴进行的细致发掘，却出土了大量被装饰过的骨头以及5000多块小石片，上面雕刻或画有动物的形象，包括马鹿、野山羊和羚羊之类。在北部的巴斯克乡间，1916年开始执行一项巨大的工作计划，主持人



拉斯高

法国拉斯高洞穴是迄今发现的大冰期时代最为壮观的艺术画廊。它位于多尔多涅省蒙提格纳附近，由4个10来岁的男孩于1940年偶然地发现。当时这几个孩子在树林里发现了一个洞，于是便冒失地钻了进去。深入洞内后，他们在电筒光的照明下，开始注意到洞壁上的色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这里怎么会有令人难以置信的600幅绘画和接近1500件的雕刻作品，而且都是清晰得惊人。

通常人们以为拉斯高的洞穴艺术是在大约17000年前一次创作出来的，但它们其实更有可能是由许多不同年代的作品构成的。在宽敞的“公牛大厅”内，最醒目的作品是4头高达5米（16英尺）的巨型黑色公牛像，这是已知的尺寸最大的旧石器时代的美术作品。洞穴里还有为数众多的野马和鹿的形象。此外有一条狭窄的通道，通道两侧和顶部同样饰有壁画，通道上还留有一些凹陷的座眼，是供搭设木头架用的。

拉斯高于1948年对公众开放，但10年后人们认识到，每年10万观光客的呼吸、身体热量、尤其是他们的鞋子将藻类和花粉带到洞里，已对洞穴艺术造成了破坏，洞壁上因此而生出一块块的绿斑，甚至出现了白色的结晶体。1963年，拉斯高洞穴关闭。绿斑实际上得到根除，结晶体得到了控制，但公众却永远不能再大批地进入洞内了。取而代之的是在附近复制了一个名为“第二拉斯高”的展洞并于1983年开放，仍然每年吸引来几十万参观者。

上图：拉斯高的壁画：槿侧“投掷者”。一头已经流出内脏的野牛在攻击一个鸟头阴茎状的男子。旁边有只立在木杆上的鸟，它也许是代表一种加大投矛力量的简单装置。

是耶稣会神父乔斯·米奎尔·德·巴兰迪亚兰（Barandiarán）、体质人类学家泰勒斯弗罗·德·阿兰萨迪（Aranzadi）和地质学家恩里克·德·埃古伦（Eguren）。他们共同挖掘了一些重要遗址，如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桑蒂马迈洞穴，它以一条非常出色的壁画而闻名于世，上面绘有6头野牛和一匹野马。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突然终止了这项工作。当佛朗哥的军队进入这个地区时，巴兰迪亚兰不得不借助小船逃到比利牛斯山的法国一侧，然后以流亡者的身份在那里一直待到1953年。

为国家服务的考古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欧洲考古学的停滞，几乎使这门学科徘徊不前达10年之久。尽管有个别人继续在航空勘查等领域施展他们的才能，继续通过旅行和语言研究去发现他们先前未知的有关这个世界各部分的知识——这当然有利于考古学科的长远发展。然而，发掘工作却由于一些主要人物的关系——如惠勒返回军队，在北非指挥一个坦克营——而停了下来。博物馆的收藏因轰炸或劫掠而遭到破坏，谢里曼在特洛伊发现的古物于1944年从柏林消失，直到50年之后，即苏联解体之后，才在莫斯科重新露面。

对于考古学的这些破坏和混乱，西欧却幸免于难，它避开了20世纪30年代对中欧和东欧考古发现和考古思想具有摧残作用的重要意识形态——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的直接影响。

党对“过去”的控制

十月革命对俄罗斯帝国考古学的冲击在列宁在世时并没有显现出来。变化是在10年之后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崛起而出现的，是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体化和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运动（至少600万人在这场运动中丧生）的一个副产品。考古学同所有历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许多自然科学部门一样，现在要为国家服务了。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中欧和东欧的田野发掘工作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迫停顿了下来。在俄国，还要加上两次革命、毁灭性的内战和饥荒。列宁于内战期间，即1919年春天签署了一项法令，成立一个取代帝国考古委员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最终成为人们所知的国家物质文化史科学院或GAIMK。与它的前身一样，该机构并未设在莫斯科，而是设在圣彼得堡（彼得格勒，后来称列宁格勒）。

在20世纪20年代，当发掘工作得到恢复时，起初依循的仍是革命前习见的路数。彼得·彼得罗维奇·叶菲缅科（Pyotr Petrovich Efimenko）于1922－1923年在科斯提昂基继续他的工作，他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专家，注定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苏联考古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期间（1921－1928年），苏俄允许有限度地恢复资本主义，政府并不干预考古活动，地区性的考古组织于是在全俄各地纷纷建立起来。1928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变化随之而来。该计划宣告了工业化和全面实现社会经济变革运动的开始。第二年，党控制了科学院，罢免或逮捕了被认为敌视新政权的科学院成员，抨击考古学为

反动派和“资产阶级”科学的堡垒。1929－1930年冬，苏俄国内地区性的考古组织被取缔，地方上的考古学家遭到秘密警察的逮捕。

党通过列宁格勒的国家物质文化史科学院进行控制，任命了俄国考古界的新领导人——尼古拉·雅柯夫列维奇·马尔（Nikolai Yakovlevich Marr）。马尔不是考古学家，而是才华横溢的语言学家，早在1917年以前便已确立了自己在学术界的声望。他是科学院中极少数从一开始就热烈赞同革命的著名成员之一，曾获得共产党的奖励。他现在已是一名党员，属于第一批谴责“资产阶级科学”的人之列，要求彻底清理考古学这个反动领域，以利于建筑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物质文化史”的发展。

由于马尔的庇佑，苏联考古学领域的意识形态倡导者的角色，于1929年传到弗拉基什拉夫·伊奥希弗维奇·拉夫多尼卡斯（V.I. Ravdonikas）身上。在一次号召建立“马克思主义物质文化史”的演说中，拉夫多尼卡斯为创立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物质文化史为基础的革命考古学迈出了第一步。接踵而来的是激烈的争论，较老的考古学家因他们的反动观点而受到指名道姓的谴责，被贬斥为“孟什维克唯心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者”。有些人遭到逮捕，随后或被放逐，或被枪决。随着列宁格勒派的胜利，莫斯科最著名的考古学家瓦西里·阿列克希维奇·戈罗佐夫（V.A. Gorodtsov）被撤销了职务。田野发掘工作几乎完全停止，考古学领域发表的文章充满了关于理论问题的争论。与外国学者的接触和从国外进口资产阶级的考古学文献均被禁止，俄国研究人员逐渐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

虽然斯大林主义实行了强有力的中央控制，但即使在这一时期，非意识形态化的考古活动仍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例如在1936－1940年之间，察尔卡考古探险队对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的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陵墓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交的考古成果架构是完全非意识形态化的，同当时世界各地考古学家采用的比较方法和编年方法没什么两样。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位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山脉帕祖里克的完全冰冻的坟墓首次由谢尔盖·鲁丹科于1929年发掘出来，该墓后来在1947－1949年又再次得到发掘。帕祖里克土冢（或称刻冈 kurgans）因墓葬保存得极端完好而闻名于世，其年代处在公元前6至4世纪之间，随葬品中有一些最早的关于世界上赌博和吸食大麻的证据。该墓在墓主下葬后便很快渗水，水流进墓室并冻结起来，尸体从而因永久冰冻而不致腐烂，同时被保留下来的还有5000件随葬品，包括服装、皮鞋、毛皮制品、羊毛织品、毛毯，甚至还有中国的丝绸。[①] 在一个土冢中有一口木制棺材，棺中的尸体是个男子，四肢和胸部仍然带有动物和鱼类的文身。在另一土冢的墓室内，挂着装饰性的纺织品，陈放着一辆马车和几匹挽马的尸体，马身上有整套的马衣，包括羽毛状的头饰和带有流苏的色彩明亮的马鞍垫布。尽管发掘是在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下进行的，但帕祖里克的土冢是本世纪最令人震惊的发现之一，大概是南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的首领墓地。在那里出土的举世闻名的古物，被陈列在圣彼得堡的赫尔米塔格博物馆（Hermitage Museum）里加以展出。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争论于1930年代急风暴雨般展开的同时，一种新型的东欧考古学开始形成。西方的目标和方法被否定了，西方学者对地层学和类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由毛毡、皮革、毛皮制品、线毛和黄金制成的马鞍垫，自帕祖里克一号土冢出土，图案显示一只半狮半鹰的怪兽正在袭击一头山羊。垫子边缘的垂饰是程式化的公羊头和长角的老虎，以及染成红色的整齐的马毛。年代属于公元前5世纪。

西伯利亚的永冻地带将帕祖里克大批无与伦比的有机物保存了下来，如木头、皮革、毛皮制品、动物角、甚至包括丝绸。一些小袋子里装着奶酪、种子，以及显然出于神秘目的而保留下来的头发和指甲。

在帕祖里克出土的细颈瓶和山羊皮酒壶，也使人联想到希腊作家在谈到斯基泰人饮用未经稀释的纯酒习俗时所表现出来的恐惧。对于他们来说，“以斯基泰人的方式饮酒”仅仅是喝得酩酊大醉的一种委婉说法。正像诗人阿纳克利昂在公元前6世纪所写的：

> 让我们今晚不要再次在
> 大呼小叫、幺三喝六的喧嚣声中
> 像斯基泰人一样烂醉如泥，
> 让我们适度地小醉，
> 热情地演唱我们最最美妙的歌曲。

型学的强调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在研究旧石器时代的专家中间，这种批评尤甚。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物质文化的历史，它摈弃西方学者优先注意人工制品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从整体上重构各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模式。这种理论结构源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吸收了他们所处时代的人类学家们的成果，才形成了他们关于“原始社会”或部落社会的思想。这是一些19世纪晚期的社会进化论者的成果，其中最有名的是美国学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所设想的不同阶段的演进模式，在摩尔根看来所有社会都是按照这一模式，从蒙昧时代经野蛮时代再进化到文明时代的。

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专家们对如何把社会进化理论应用于特定的考古遗存而争辩不休。叶菲缅科和他的学生巴维尔·伊奥希弗维奇·鲍里斯科夫斯基（P.I. Boriskovskii）的成果最终证明要比拉夫多尼卡斯的令人信服。在1932年的著述中，

鲍里斯科夫斯基提出：自旧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现在也许可定年在公元前40000年的一个时期里）始，“处于野蛮状态的人类”向着“首次可以界定的社会组织”阶段展开了革命性的社会转型过程。由于他是摩尔根著作的忠实拥护者，所以他把这种“首次可以界定的社会组织”看作是建筑在母系基础上的氏族社会，把摆脱蒙昧状态的转变视为“一次辩证的飞跃”——苏联社会集体化和正在发生的剧变的一种反映，并将西方持反对意见的考古学家斥为“欧洲资产阶级迁徙论者”。这些理论发展具有双重的效果。苏联研究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家由于更多地注意社会和经济领域，在这方面他们领先西欧考古学家们几十年。但是他们却被束缚在一种出自19世纪的过时的解释框架当中，没有人敢于对此提出修改或否定的意见。

然而在短期内，发生在苏联考古学界的这种战略转移——它公开宣称自己的目标不再是物质的人工制品，而是更加靠不住的史前社会和经济的观念——很快便开始有了收益。从20世纪20年代晚期开始，考古学家开始广泛地水平开挖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记录发现的“生活层面”、窖藏和房屋的复杂特点。诸如此类的特点在西方是很少见的，因为人们对洞穴和石棚的挖掘规模很小，所以即使它们的确存在也很难被辨认出来。

在1931－1936年，叶菲缅科在科斯提昂基的一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里，发现了一座大范围的被他称之为“长屋”的长形建筑的痕迹，其长度竟有100米（330英尺）之多。它的特征是直线式的灶台布局，周围环绕着大小不等的窖坑。这种长屋是同摩尔根关于易洛魁印第安人的生活记载中所描述的母系氏族社会关系最为紧密的结构类型。所以对于叶菲缅科来说，这一发现证实了苏联人的新型理论

苏联学者的大思路

苏联学者雄心勃勃地从整体上重新构建过去社会的目标——最终是无法实现的——导致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发掘。苏联考古学家第一个发现了完整的旧石器时代的住地和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出土了大批中世纪的城镇遗址。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们的考古活动遍及欧亚大陆，不仅恢复了操斯拉夫语的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化史，而且恢复了巴尔干地区、高加索地区、中亚和西伯利亚的文化史的探寻。

在各次发掘中，横向挖开的规模非常之大。即使是在今天，在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各个国家里，考古学家们仍倾向于对一个遗址进行广泛挖掘，其规模远比西方学者所做的要大得多。而且他们较少依赖采样统计，对实验室的技术分析也仅仅是有限度地加以利用。这不仅是由于那里的决定现代发掘策略的统计学家、材料学家和环境学家的数量相对不足，而且大规模发掘的多种好处对此也起了很大作用。

中亚考古研究的历史是这种苏联式处理方法的一个范例。过去10年时间里，在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发掘出土了一种范围广大的、迄今无人知晓的青铜时代的文化，时间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或公元前两千纪早期，人称“奥克苏斯文明”，名字取自目前阿富汗和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奥克苏斯河。在这里的许多遗址上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数百座墓葬和几千件古物。一些纪念性的建筑物被完整地发掘出来，还出土了雕像、独具特色的印章、大量金属制品和一座真正的装满陶器的仓库。

但我们几乎对奥克苏斯文明的环境情况一无所知，也几乎不知道这一文明利用动植物的情况，对它的石器技术、制陶术和金属制作技术也知之甚少。西方考古学家为他们的方法、缜密的理论以及他们撰写的论文而感到骄傲，苏联考古学家则为他们的发掘、他们发现的古文物以及他们在自己书中所展示的丰富的文化史而感到自豪。显而易见，东方和西方有大量的东西是可以互相学习的。

卡尔·兰伯格－卡洛夫斯基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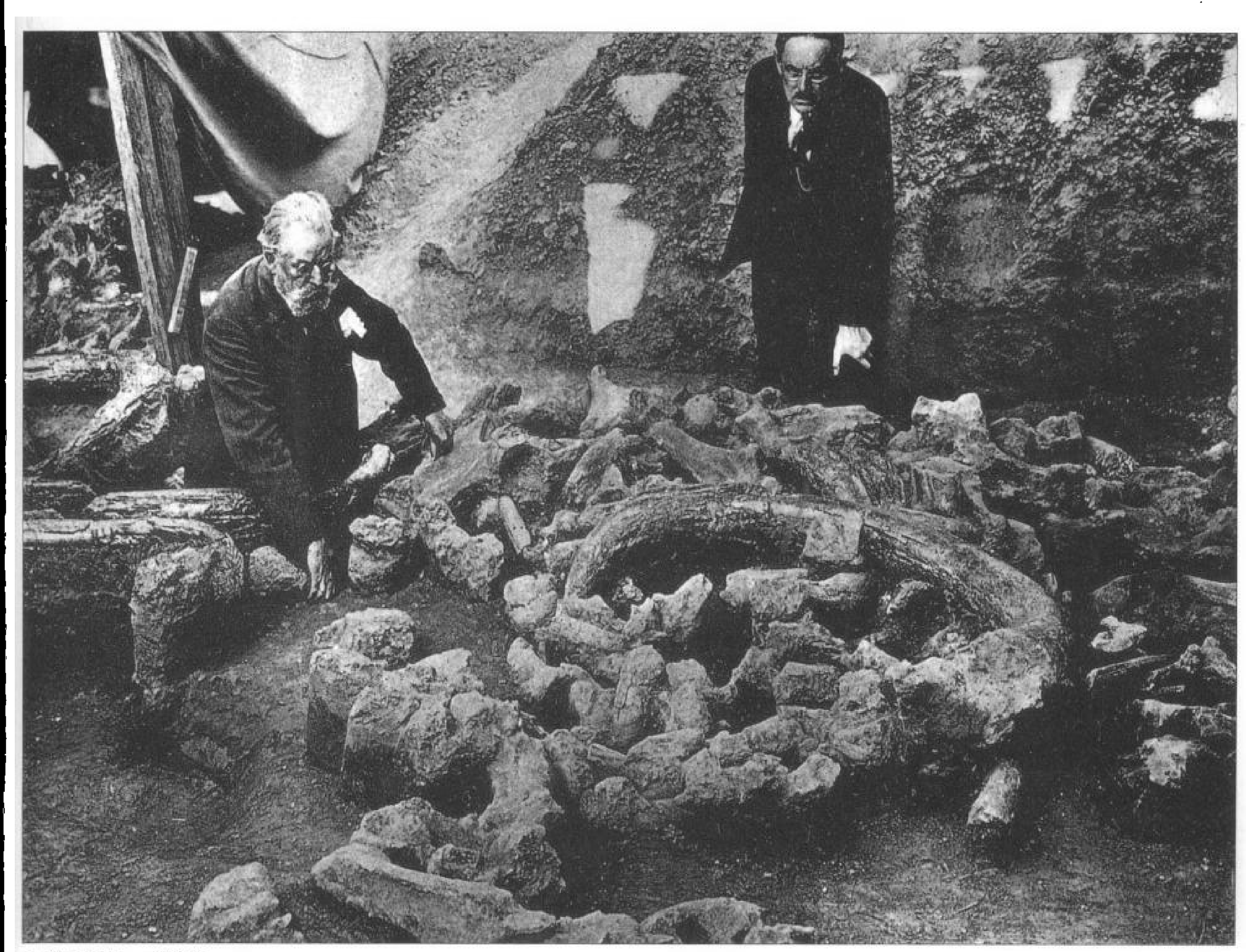
框架。1937－1939年，鲍里斯科夫斯基以及其他年轻的苏联考古学家又发现了新的旧石器时代的“长屋”。但是自1930年代末叶以后，这类发现便不再出现了。今天，旧石器时代“长屋”遗存的真实性尚未得到准确的验证，它很有可能是意识形态狂热的结果，而非对出土遗存加以认真评估的产物。

然而，从东欧露天遗址的大规模水平发掘中所获得的非常真切的信息，受这类偶然性的虚假信息的损害还是很小的。尤为令人信服的是，在整个苏联境内都遇到了其他类型的旧石器时代的建筑，其中最使人难忘的就是后来在科斯提昂基和一些其他东欧遗址中发现的用猛犸骨和象牙搭建的圆形住所。

中欧本身一般没有受到发生在东欧的意识形态热的影响，正规的发掘活动在日益增多。卡雷尔·阿布索隆（Karel Absolon）于1924－1926年在多尔尼·韦斯托尼克——一处坐落在马拉维亚迪耶河畔[1]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营地——的发掘，出土了著名的“韦斯托尼克的维纳斯”像，即一尊精巧的女性小陶像，只有11厘米（4.5英寸）高。紧接着第一尊科斯提昂基的“维纳斯”像和1923年发现的猛犸象牙之后，在中欧和东欧陆续出土了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可携带的艺术制品，“维纳斯”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5年，先前因具有西方资产阶级内涵而遭到摈弃的“考古学”这一概念，在国家物质文化史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被正式恢复使用。理论讨论和尖锐的争辩不再支配着考古学著作了，田野发掘工作也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恢复。1935年之后，

法国史前史专家康德·亨利·贝古恩（C.H.Begouën，左边的蹲者）访问卡雷尔·阿布索隆在多尔尼·韦斯托尼克的发掘现场，1928年。他们正在考察堆在一起的猛犸骨头，这些骨头可能是一座小茅舍的部分建筑材料。



① 位于捷克——译者注。

再没有一位考古学家遭到逮捕，革命的变革时期进入了尾声，“马克思主义物质文化史”于是又演化为一种更为僵化的苏联考古学。

冷战时期的考古学

中欧和东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了巨大损失，列宁格勒本身曾经遭受了两年半的包围，其痛苦的深重是现代任何其他城市都不曾经历过的，有一百多万人死在围城当中。博物馆的藏品被摧毁，遗址受到破坏，考古学家死于非命。在波兰，每4个史前史研究者中就有1人死去。在捷克斯洛伐克，溃退中的德国军队于1945年纵火焚烧了米库拉夫城堡，毁灭了从一些重要的马拉维雅遗址（如普莱德莫斯提）出土的古文物藏品。

轴心国战败后，中欧被苏联军队占领，中欧又被置于新的政治控制之下，各共产党政权在1945年以后，一般按照苏联的路线重组了各国的研究和教育机构。尽管学术机构拥有十分宽松的人员编制和充裕的资金支持，但现在是在党中央的控制之下，考古学家们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培训。

中欧的考古学在战后的境况应当说还是相对较好的，因为它的政治意义微不足道，所以受到的干预很少。苏联的影响只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在考古技术和理论以及组织和资金等问题上。在这一时期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有许多新的遗址发现，在多尔尼·韦斯托尼克，大片文化遗址在1947－1949年首次得到挖掘，这使得姗姗来迟的发现——猛犸骨建造的居住地得以重见天日。

在苏联，自从1935年以来便处于“休眠”状态的关于考古学理论的争论，由于对尼古拉·马尔著作的猛烈抨击而突然复活了。马尔在1934年过世之后，他的著作继续受到政治和学术机关的认可。但在1950年6月20日，苏联公民惊讶地在《真理报》上读到了约瑟夫·斯大林本人谴责马尔的报道。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们随之对“马尔主义”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如叶非缅科于1953年在他的新版《原始社会》一书中，以尖锐的批判取代了该书旧版中对马尔的赞美。从根本上说，这是更大的政治趋向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的反映，马尔的失势无疑是一件好事，这使苏联考古学从许多因政治理由而强加在它身上的无用概念中解放出来。因为斯大林的谴责源于莫斯科的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于是苏联的首都现在重新获得了对考古学的控制。列宁格勒科学院被改组为莫斯科物质文化史研究所的一个分部，拉夫多尼卡斯被迫退休。

右图：“希特勒的巨石阵”。这大概是史无前例的最充分的史前史伪作。它根据恩里克·希姆莱1935年的命令所建，利用了奴隶和强制性的劳动，构成萨克森的一处规模宏大的异教巨石纪念碑。希姆莱曾在此举行过有上万追随者参加的盛大仪式。

该遗址由4500块屹立的巨石组成，以双行排列，营造出一些穿越威悉河与阿勒尔河交汇处（位于下萨克森地区的沃登）附近的林地的大道。在一些地方，这些大道设有开口，并用巨石组成一个个圆圈。

这是追思在这个遗址上被查理曼大帝杀害的4500名萨克森战俘（782年）的纪念碑，是对基督教世界表示蔑视的一种姿态和对异教反对者的一种纪念。

纳粹的考古学

国家社会主义党于1933年夺取德国政权，在整个德国考古史上开启了一个最耻辱的阶段：考古学家与极端民族主义政府之间结成了最紧密的关系。自愿委曲求全的史前史家们是不久前去世的科辛纳的弟子们和其他（更具讽刺意味）直接想在这个千年帝国中谋求饭碗的人们的混合体。对他们加以栽培的中央机构的首脑是纳粹思想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和秘密警察头子恩里克·希姆莱。1933至1945年间，这个并非神圣的同盟出于政治目的而对历史进行了极大的歪曲。

1933至1935年间，德国设立了8个新的史前史教授职位，大部分由科辛纳的弟子充任，如柯尼斯堡大学的巴隆·伯尔克·封·里赫特芬。诸如《日耳曼人的遗产》之类的新的通俗期刊纷纷发行；一些电影，如《史前的火焰》和《关于东日耳曼人的痕迹》被拍摄出来，以颂扬日耳曼的史前史。公共资金大批投入考古研究和对各种发现的出版当中，历史研究享受到过去从未有过的来自官方的尊宠。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构建古代日耳曼人殖民于大陆各地并优于其他欧洲民族的过去。虽然科辛纳已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东欧和中欧的铁器时代，但在他于1931年死后，人们却企图证明日耳曼人的根在新石器时代，甚至还可能更早；有人还想证明在这种“更加伟大的德意志”中，贯穿着一条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线索的雅利安人的遗产。

在纳粹政权当政的最初一些年份里，人们看到了许多权力斗争，考古学也不能幸免。德国的主要考古机构罗马－日耳曼委员会的领导人格尔哈德·伯苏，因拒绝接受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于1935年被解职。其他具有犹太血统的考古学家也被扫地出门。那些留下来的考古学家则缄默不语，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



绝不是所有人都同纳粹沆瀣一气。科辛纳的老对头卡尔·舒克哈德至死都在一言不发地工作，另有许多人保持着低调，避免卷入政治纠葛。但随着时间推移，战争日益迫近，洁身自好、避免过多卷入已变得更加困难。到了1941年，当科辛纳的一个学生厄内斯特·沃赫尔对其老师的所谓“聚落考古”说法提出批评时，这种打破一言堂的举动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

在纳粹党内，内部的权力斗争最终引起官方在考古事业上的派争。一边是罗森堡的宣传办公室，另一边是希姆莱的秘密警察总部。两人都有自己的打算，都想创立执行其个人政策的组织。罗森堡在考古部门的主要合作者是科辛纳在柏林的继承人汉斯·雷纳特，雷纳特是德国史前史联盟的主席，成立该组织是为了利用历史为政治和爱国主义目的服务的。在《日耳曼民族史前史》（1940年）一书中，雷纳特谈到日耳曼人在遗传方面无与伦比，现代日耳曼国家有权侵占日耳曼人在过去一度居住过的任何土地。同科辛纳一样——不过他现在有邪恶的纳粹国家撑腰——他也对那些他不满意的同事展开了激烈的个人攻击。

罗森堡和雷纳特最终证明自己极为蠢笨，以至于大多数考古学家都向希姆莱寻求官方支持。在希姆莱的领导下，已成为“国中之国”的秘密警察把弘扬日耳曼遗产和传统视为其优先实施的工作目标之一。1935年，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事业，希姆莱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机构SS-Ahnenerbe（祖先遗产局），这是由难以数计的各级部门组成的、囊括了几乎所有历史科学（从哲学和各个人文学科到地质学和民族学）的庞大纳粹官僚机构的一个标记物，一种考古学的怪诞的变体。在罗森堡醉心于炮制他的种族理论的同时，希姆莱却本能地更倾向于浪漫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处理方法，即把日耳曼人的过去处理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民族信条的一部分，其核心是种族认同性。祖先遗产局以足够的资金资助了一些大规模的、专业性的发掘，如对霍米切尔墓冢和在施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海塔布的发掘，后者是一处北欧人的贸易中心，具有丰富的墓葬，年代在公元800－1050年间，另外还有一些因水浸而幸存下来的木建筑。祖先遗产局出版了一些专著，意在通过考古学来说明日耳曼人的优越性。希姆莱还把考古学家，包括亚历山大·朗斯多夫和维尔纳·巴特勒网罗到自己的亲信班子当中。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德国的大部分考古研究限于停顿，但战争也造成占领区的遗址被发掘。例如在1942－1943年，一支秘密警察特遣队被派往俄国，负责在南俄和高加索地区寻找史前“日耳曼人的”遗存。纳粹考古学家还接管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博物馆，重新布置了馆内的藏品，以反映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波兰罗兹（占领期间的利兹曼斯塔德）博物馆的新管理者把过去未曾见过的窖藏钱币和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制品“疏散”到了德国，当地出土的一个公元3世纪的所谓比亚瓦骨灰瓮也被挑了出来，因为它饰有纳粹党徽的卍字记号，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史前史的、源远流长的象征符号。

一些重大发掘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农业化的东欧极力想进入工业化时代。农业机械化威胁到墓葬遗存，与新的公路、铁路和工厂建设联系在一起的土木工程将先前未

知的许多遗址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结果导致在相当不利条件下展开大量的抢救性发掘。在这种背景下，这个时期看到的对一些“大型遗址”的发掘，表现为大规模地经年累月地水平开挖一些关键性的遗址。由于对过去人们如何居住、工作以及饮食问题的逐步强调，这类发掘的一个逻辑性的结果——旨在发现建筑物和日常生活的证据而非各种器物的要求就变得突出起来。在20世纪30年代，无论是在中欧还是东欧，大型考古发掘还被用作提供失业救助的一种途径。

有两次大规模的发掘，即对科隆－林登特尔和比斯库平的发掘，造成的影响特别巨大。科隆－林登特尔遗址是人们于1928年在科隆郊区建造一座公园时发现的。在那里，首次出土了一个具有完整布局的早期农村遗址。1931－1934年在维尔纳·布特勒（Werner Buttler）展开的发掘中，100多名工人将一些长土沟的表土移走，然后对沟内的考古要点做出精心规划，接着进行了小心翼翼的挖掘。仅在第一年，挖开的面积便超出21000平方米（5.2 英亩），出土了复杂多样的长方形木质建筑和庞大但不规则的地窖，部分环绕着水沟和木栅栏。65个窖坑被解释为“坑屋”，40个建筑物——有标准模式，即5排柱坑，一度支撑着竖立的墙柱——被解释为“谷仓”。这种解释在1932年得到加强，当时雄心勃勃的巴特勒着手“在现代欧洲的那些由原始农民居住的定居点”收集民族学材料，找到了一些半地下的居所范例并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现了一些立柱式谷仓。

到1943年科隆－林登特尔的发掘结束为止，总共挖掘的面积计有3公顷（7.4英亩），即180 × 220米之多，对一处遗址做这样大规模的挖掘，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对于发现物和遗址布局的记录在当时也是唯一的，遗址报告提供了专家们想要知道的所有细节。但仍然存在一个基本问题，即布特勒始终坚持把窖坑解释为住房，立柱式建筑解释为谷仓，对连一般人都能意识到的常识嗤之以鼻。正像当时在波兰挖掘一处类似遗址的工人们所评论的：“假如他们住在如此泥滑的洞坑里的话，那他们得弄断自己的腿。”

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问题才算搞明白了：长方形的木质“长屋”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和人们的住所，而窖坑则至多是墙泥取土的地点。

布特勒挖掘科隆－林登特尔时所表现出的娴熟技能和创意是无可争议的，这个遗址确立了发掘和发表成果的新标准。然而，布特勒对史前和他所处时代的“原始农民”所具有的本能偏激却反映了他身上较阴暗的一面。他于1930年参加了纳粹党，随后在希姆莱的总部工作，1938年他接受哥廷根大学教授职。1940年，他在法国的一次行动中被杀。

发掘波兰中部比斯库平的关键人物是约瑟夫·科斯切夫斯基(Józef.Kostrzewski)，他是波兰的第一位考古学教授。从20世纪20年代中叶始，波兰爱国者科斯切夫斯基便发现自己同极端民族主义的德国考古家（如封·里赫托芬）发生了冲突，里赫托芬的观点是否认奥德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土地是“原始波兰的土地”。比斯库平是在1933年发现的，它对于这场争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在编年上属于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这是一个重要时期，能决定奥德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土地上的史前居民，是更像“日耳曼人”还是更像“斯拉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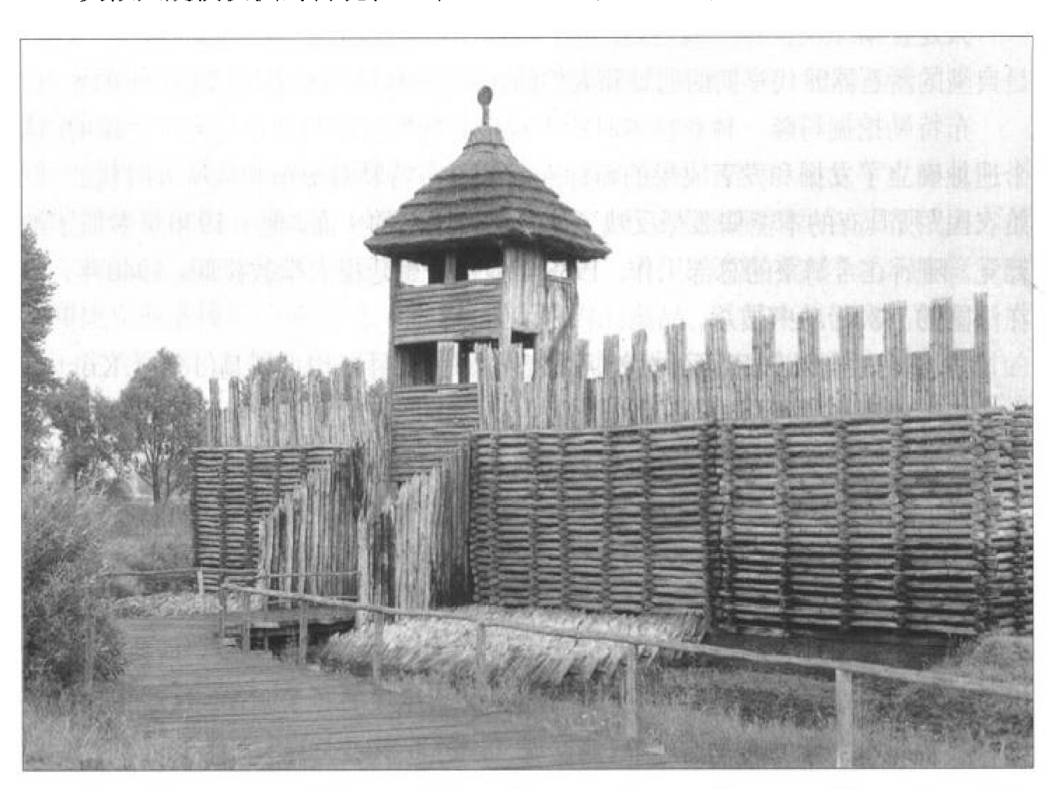
科斯切夫斯基对假设的“被水淹没的房屋”屋顶展开了调查，这些屋顶位于比斯库平湖内半岛上的芦苇丛中。他发现了一道堆积起来的木头防波堤。第二年，

在该遗址挖开了500平方米（600平方码）的工作面之后，他知道自己挖到了一处重要的属于公元前5 – 6世纪的岛屿定居地，其周围环绕着木头和土垒的围墙以及一道防波堤。围墙内沿有一条环营寨的道路，连结着一些用木材铺设的平行街道，将定居点分割成若干街区。沿着每条街道建有13排房屋，总数有100多座，每一座房屋建筑包括一间带灶台的大房和一间小些的寝室，入口处还留有一个盛放东西的小前庭。人们用一个军用气球从150米（500英尺）的空中为遗址拍照，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和地形学家蜂拥而至，对发现的丰富有机物和堆积物进行分析。比斯库平还成为第一批表现考古发掘活动的一部电影的主题。

科斯切夫斯基认为，比斯库平的居民是斯拉夫族人，这一观点惹恼了他的德国论敌。但在波兰，这个定居点却因它的规模和罕见的良好保存状况而广为人知，引起了公众的很大兴趣。水浸条件意味着所发现的木制及骨制品的范围是很特别的，包括犁铧、马车、小舟、织机、木梯、长柄勺、锥子。在东欧，环境和经济问题首次得到科学的调查，人们发现这里存在着小麦和其他作物以及一系列的家养动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波兰的考古发掘工作。科斯切夫斯基转入地下，纳粹占领了波兰并于1940 – 1942年由秘密警察负责展开了新的考古调查。科斯切夫斯基已得出结论说比斯库平是因洪水泛滥而被放弃的，但秘密警察的考古学家却主张该处居民亡命他乡是因为明显具有军事和体质优势的日耳曼入侵者“猛力向南扩张”所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是预想得到的。战后，虽然对该遗址的发掘在波兰共产党政权的支持下继续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但遗址的政治意义最终消失了。比斯库平现在已发展成为一个考古旅游的圣地，每年吸引来大批的波兰小学生和日益增多的外国游客。该遗址的围墙、街道和某些房屋在它们原来的位置上得以重建。

类似大规模发掘的传统在整个20世纪50和60年代都在东欧继续流行，其中



比斯库平主门入口，在1934 – 1938年的发掘基础上为现代观光者重建。精心制作的、方框结构的木墙，环绕着这座铁器时代早期的岛民定居点、营寨周围有一条直接通到寨内的路。大约公元前400年被放弃之前，这个遗址包括了100多座房屋，房屋井然有序地坐落在木材铺设的街道两侧。

以保加利亚的科拉诺沃和波希米亚的比拉尼的发掘最为引人注目。科拉诺沃的土丘本身就很大，有12米（40英尺）高，250米（820英尺）宽。乔治·格奥尔基耶夫（G.Georgiev）于1947年开始对它的发掘揭示出了7个文化期，范围大约在公元前6000－3000年间，即使在今天，它仍是理解巴尔干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早期过渡的关键序列。比拉尼文化涉及面广，但本身规模却不很大，它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点，与科隆－林登特尔文化同属于“线状陶”阶段早期。它是在1952年因深翻土地而被发现的，1954至1967年间由波修米尔·索德斯基（B. Soudsky）主持发掘。它的面积很大，有85公顷（210英亩）之多，其中百分之八得到了充分挖掘。如同在同一时期的荷兰遗址上的情况一样，同时揭露大片区域，可以使各个房屋群从整体上得到研究。出土的房屋总数有100多座，辨认出多达25个居住阶段。与科隆－林登特尔相同，比拉尼遗址确立了一种趋向：从此以后，在发掘东欧和中欧早期农业居民点时，对大片区域加以揭露已成为标准的做法。

放射性碳素断代法的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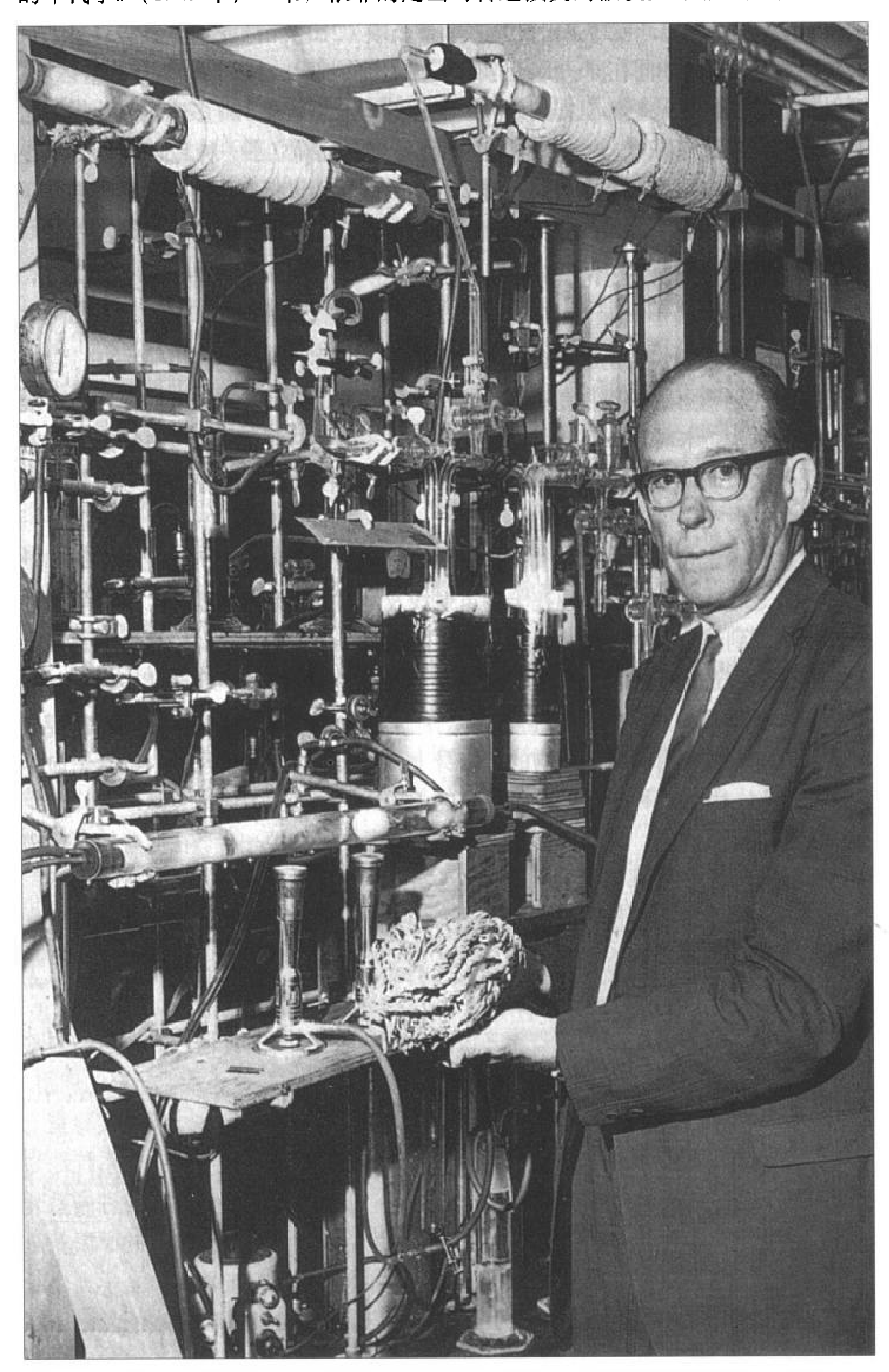
放射性碳素断代法是20世纪考古学领域里取得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它对任何发现或创新思想的作用都是革命性的、极其深远的。它为通常封存在考古堆积层中的木头、木炭、骨头之类有机物提供了一个绝对年代，使考古学家摆脱了必须花费大量时间整理并为其材料定年的工作，现在可以去追寻新的思路和提出更重要的问题了。

放射性碳素技术是由芝加哥大学的科学家威拉德·利比（Willard Libby）于1949年公之于世的，他的旨趣在于宇宙射线及其对地球环境的影响。考古学家们很快便认识到这一技术的潜力，而利比则因此赢得了诺贝尔奖。作为一种直接定年的方法，它适用于各种有机物，至少在理论上能够确定80000年以内的年代。碳14（^{14}C）是一种活跃的放射性同位素，产生于大气之中，能被植物的光合作用所吸收，并传到食用了这些植物的动物身上，或直接传给其他动物。所有生命都包含有碳14。因为这种同位素是不稳定的，它以一个已知的速率衰减，每5730年减少一半。换句话说，在5730年里，这种同位素要丧失掉一半。在活着的有机物中，任何碳14的损失都会得到补充，数量始终是恒定的。但死去的有机物却不再吸收碳14，因而它的数量不断衰减。由于衰减的速率是已知的，利比便发现他能够通过确定一个死去的有机物身上残留有多少碳14的方法，测出它存在于多少年以前。

放射性碳素断代法对于考古学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但它对美国和西欧的作用从一开始就比对东欧的作用大得多。因为这一技术是原子武器研究的产物，所以东欧的考古学家始终很少用到它。尽管铁幕后的第一座放射性碳素实验室于1955年在列宁格勒建成，但直到1961年以前，东柏林的实验室还未能系统地为大量样本定年。如果他们要利用西方的实验室，那就需要有硬通货或各种关系开路，而在冷战期间这两个条件基本上是不具备的。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在东欧地区的器物类型学上已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他们把器物类型学当作断代的手段。对于由舒哈特（Schuchhardt）或柴尔德（Childe）发表的每一个综

合性的重要结论而言，都有数百个精心整理的地区陶器序列和其他富有特色的器物作为论据。因此，人们倾向于把绝对定年看作是考古学实践的一种辅助的甚至是无关紧要的形式。

所以可以想见，对放射性碳素断代法始终持反对态度的人士是中欧人和东欧人，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是海德堡大学的史前史家弗拉基米尔·米洛伊契奇(Vladimir Milojčić)。他的史料翔实的鸿篇巨制《中欧和东南欧的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学》(1949年）一书，依靠的是当时普遍接受的假设，即靠近贝尔格莱德



威拉德·F·利比（1908－1980年），放射性碳素断代法的发明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比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原子弹研究，致力于分离铀同位素的工作，并研究宇宙射线不断轰击地球时产生高能量中子的亚原子粒子。

这项技术在战后的芝加哥大学得到了改进，利比是这所大学的化学教授（1945－1954年）。该技术真正面世是在1949年。10年之后，放射性碳技术对于世界考古学的巨大潜力便很快明朗化了。

1959年，利比转到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作，第二年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

这些年来的考古学的发展，已反复证明了利比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该技术已成为无法替代的为古文物（如埃夫伯里的巨石圈、阿尔塔米拉的洞穴壁画、都灵的裹尸布和林多人）定年的方法。世界各地都设立了放射性碳素实验室，今天只需一枚小麦粒就足以测出古文物的可靠年代。

附近温卡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巨大土丘（于1908 - 1912年发掘）是爱琴海地区青铜时代早期文明的一个前哨地点，预示着铜器和青铜冶炼术很快将传遍西欧。这一认识为蒙特柳斯的欧洲史前史晚期的“简略编年”提供了支持。米洛伊契奇争辩说，无数的中欧文化可以通过温卡而同得到翔实史料支撑的爱琴文化序列联系在一起。

然而事情很快便弄清楚了，原来有些地方出了问题。20世纪50年代首次运用放射性碳定年的一些样本来自荷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如果说“简略编年”是正确的，那它们的年代就应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而事实上，它们出现的时间是公元前4000年。这是一个用碳14方法很快便可测出的年代，于是问题变得很清楚：要么放射性碳技术本身有缺陷，要么“简略编年”过于简略。结果西欧把信任票投给了放射性碳断代法，并开始对其考古资料和编年进行重新审查。而东欧则对此感到惊愕，如米洛伊契奇就否认放射性碳断代法，并且相当准确地指出了它的某些早期缺陷，而其他人则干脆对这种断代法采取视而不见的办法。

直到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在东柏林实验室开始为来自巴尔干和东欧的大量样本定年的时候，中东欧考古界对“简略编年”的支持才逐渐消失。温卡的年代被证明要早于爱琴地区青铜时代早期——具体地说是特洛伊时代早期——至少1000年，它的早期青铜冶炼术很明显是由当地开发出来的，而不是自东地中海传过来的。米洛伊契奇的怀疑主义仍然长期存在，但其他大多数在中欧和东欧工作的考古学家则由于放射性碳断代法的确凿证据而迅速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接受了新的“较长的”编年。到1970年，这里的几乎所有的考古学家都对放射性碳断代法的有效性表示满意。

古典世界的大型发掘

20世纪中叶古典考古的特点之一是对“古物鉴定”（对博物馆中的材料进行编目和分类）的重新强调，再一个特点是旨在调查古代世界城市生活和政治制度的大规模田野发掘项目日渐增多。两次重大的发掘战役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展开的，这就是美国人对雅典广场（agora）和北非罗马城市的发掘，其中挖掘大莱普提斯和萨布拉塔的活动最引人瞩目。

雅典自希腊独立战争以来一直是古典希腊考古工作的焦点，但人们仅仅对卫城北部做过一些零碎的调查，这座古典城市的政治和商业中心——广场便坐落在那里。1890 - 1891年，修建雅典至派里厄斯[1]的铁路工程对这处遗址有所触动。但只是到了1922年，随着大量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遭到驱逐，考古人员才决定对这个地区进行系统发掘，而不是为了房地产的开发。由于得到洛克菲勒石油利润的资助，美国古典学院从1931年至1940年在这里展开了发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掘工作又得以恢复。

这次发掘的面积非常之大，而发掘现场又是这座古代城市生活的中心，正像人们所预期的，发掘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广场上的建筑物参照围绕中央公园的曼哈顿的方式，被安置在一个中央开阔地周围，虽然它们本来不是这样排列的。感谢公元2世纪到过广场旅游的波桑尼阿斯留下的极其有用的描述，许多建筑物被

① 雅典城南的海港，属雅典的一部分——译者注。

戈登·柴尔德

维里·戈登·柴尔德（1892－1957年）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学家。他生于悉尼，终生是位社会主义者，最初热衷于澳大利亚工党，年轻时移居英国，在那里从事了考古学。后来他成为爱丁堡大学考古学教授（1927－1946年），之后又担任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所长（1946－1956年）。柴尔德是个容易交往的人，但又是很有些古怪脾气、形单影只的人。他在退休后返回澳大利亚，很快就在他出生地附近的兰山跳崖自尽了。他留下了一个令人心酸的字条供发表，上面说到他因不再能有效地工作而感到沮丧，他希望避免因自己年迈而成为社会的负担。

柴尔德的考古名气来自他对诸如农业的起源、城市与文明的兴起等重大问题的迷恋。他分别给这些过程起名为“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他认为在三个地区，即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剩余财富比人口增长得快。在这里的城市中，人口的增长造成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的出现，贵族的地位因他们控制着剩余财富以及已存在的农业灌溉体系而得到巩固，这些地区的农业灌溉体系本身使农业能够供养起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



戈登·柴尔德和可爱的小熊。小熊是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大学学生送他的礼品。

也正是柴尔德发展并大众化了考古学的“文化”概念，把它定义为特定时间和地点范围内的一组人工制品，看上去是一个独特的民族或种族集团存在的考古证明。这个概念在欧洲虽已存在了20多年，但是是柴尔德系统地定义并使用了这个概念，他的《欧洲文明的开端》（1925年）一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相信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文化构成多样化的原因在于同其他文化的接触，即扩散或人们向新的地区的迁徙。

柴尔德对这种文化观点的坚定态度反映在他坚持认为史前欧洲的社会变化基本上是由于扩散引起的这一点上。在他看来，扩散的源头来自东地中海文明，后来该文明经多瑙河地区向欧洲传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关于扩散是文化变革动力的看法得到进一步完善，他日益认识到各社会内部经济力量的重要性。这一看法是他于1935年首次访问苏联之后得出的，这使他成为比较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柴尔德不喜欢人们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史前学家，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是他的传记作家们热烈争辩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他并没有一味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单线分阶段进化的思想，他强调扩散是史前社会变化的动力。

有一点很清楚，这就是柴尔德不接受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模式，他宁愿把它作为他的某些著述的前导，如在《人类创造自己》（1936年）和《历史上发生了什么》（1942年）所做的那样。而在其他著作中，他则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背景。在他最后20年的著述中，人们则几乎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影响了。

正像保守的考古学家们所指出的，尽管柴尔德倾向于左翼政治，但他却是非常真挚的，他没有完全超脱肉体感官的享受。他是科学协会的会员，而又似乎很欣赏人们称他为“红色教授”。有一个故事大概是伪造的，故事说的是柴尔德惯于在大庭广众下，如在考古学大会的早餐时，阅读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但在那份报纸的里面藏着的却是他真正要看的，即一份右翼组织的机关报《每日电讯报》。

柴尔德著作中的一个严重缺陷是他对欧洲之外某些地区史前史和考古成果的轻视，特别明显的是对于美洲，他不相信美洲文化属于人类文化史的主流。对于其他地区，由于他周围世界的不断变化也必然引起一些观点的修正。他的早期著作对印欧人起源的理解（如在《雅利安人》（1926年）一书中他的一些结论）显然是种族主义的。所幸在后来的著作中，他成功地抛弃了这一立场。



奥克尼的斯卡拉·布莱遗址，属约公元前3100－2500年，柴尔德最著名的发掘现场。第7号房屋的中央炉床表现为一个凹槽，凹槽过去一点是石头“衣橱”，两边分别是用石头垒成的方框形状的床。墙壁上的凹进处显然是放碗的地方。

柴尔德始终不是一位硕果累累或心甘情愿的田野发掘工作者，他从事的最有名的一次发掘是在奥克尼群岛对斯卡拉·布莱的新石器时代石建村落的挖掘。他的名声主要来自于对欧洲考古所进行的广泛的综合研究活动，以及他撰写的一些生动的考古通俗书籍。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写的早期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对东欧的兴趣。他于1922年首次到多瑙河流域旅行，参观了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遗址和博物馆。在准备撰写《欧洲文明的开端》和《史前时代的多瑙河》（1929年）的一些年里，他曾多次到访这些地区。他的后一本书贯穿着他的文化从近东经巴尔干传播到西北欧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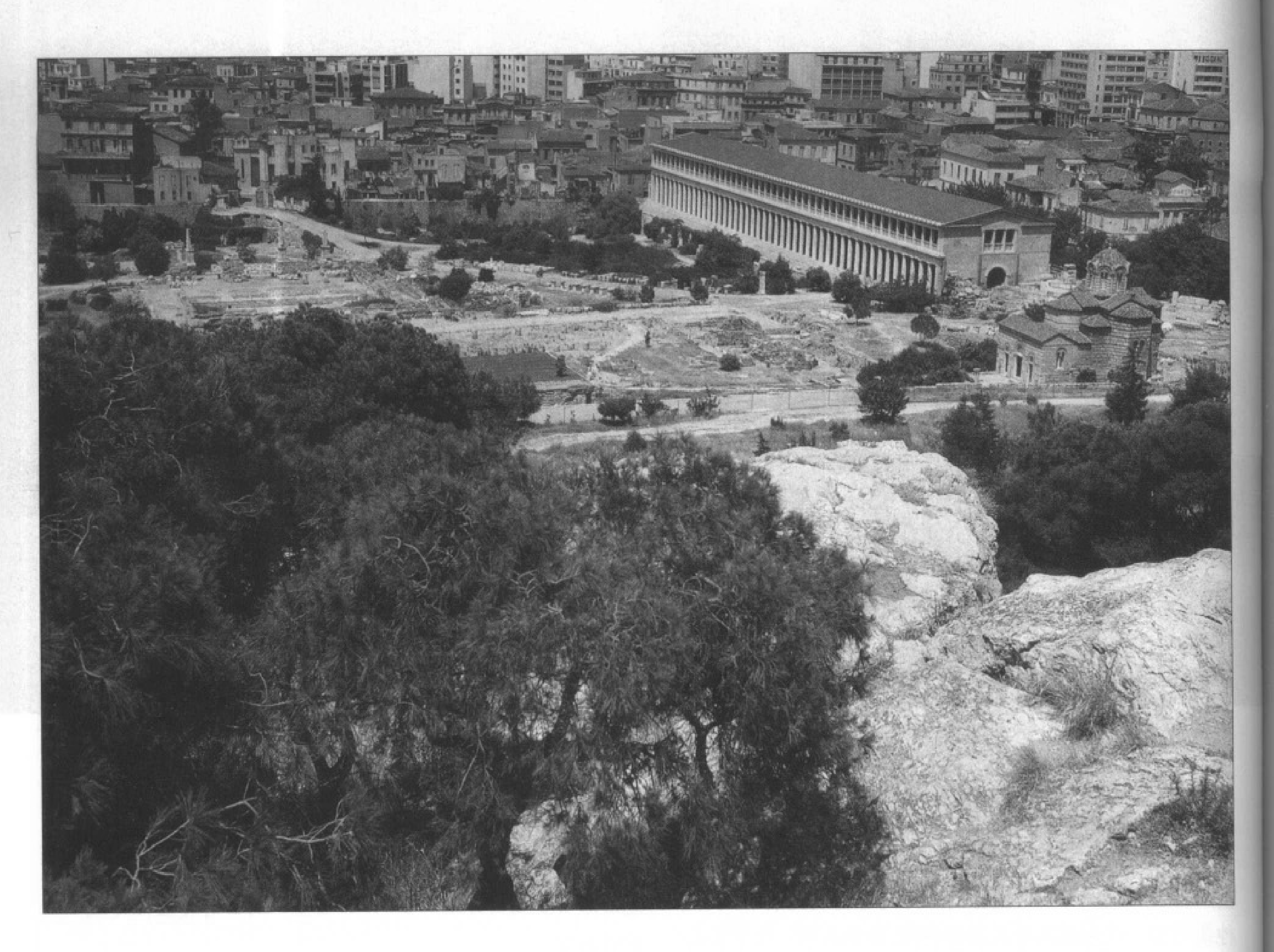
当时，东欧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对于西方有教养的考古学家来说，语言不通是个问题，旅游条件也难以令人满意。

由于柴尔德很快掌握了大多数中欧语言的阅读能力，这使他有可能广泛地阅览考古文献。他获得的这一技能是令人羡慕的，已经达到娴熟的状态，但他在地名方面的语法错误又表明他还远不够火候，他的发音听起来简直可怕。他坚持同外国考古学家说他们本国的语言，结果常常闹出笑话来。

柴尔德第一次访问苏联时在那里待了12天，当时苏联考古学刚好从马尔分子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进行的清洗中开始复苏。与此同时，芬兰考古学家阿尔尼·塔尔格兰也访问了苏联，因他记述了这些清洗，于是被永远禁止迈进苏联的大门。柴尔德则持比较通融的观点，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够三次到苏联访问，并在20世纪50年代参加了“与苏联发展文化关系协会”，这是苏联的一个“前沿”组织。

这样做的部分原因似乎是一种姿态。柴尔德是一个喜欢显示自己熟识东欧事务的人，他的书信中有时会直截了当地用古斯拉夫字母书写俄文名字。

柴尔德为促进英国和美国考古学家对中欧和东欧考古的兴趣出力甚多，这种兴趣现在随着冷战的终结而迅速增长。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的扩散观念已被新的证据（史前欧洲的农业、贸易和社会分化均有独立的起源）所推翻。但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两部主要著作，即我们熟知的《欧洲文明的开端》和《史前时代的多瑙河》，仍然是世界考古学的经典著作，经受住了近几十年如潮水般的新发现的考验。



上图：雅典广场，20世纪城市发掘的巨大成就之一。

这一宽阔的公共广场始建于约公元前600年，在公元582年或583年斯拉夫人攻陷雅典之前，它一直是这座古代城市的社会、商业和政治的中心。在罗马，帝国广场始终没有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过，广场上的那些千疮百孔的主要建筑，也在整个中世纪幸存了下来。而在雅典，情况就迥然不同了。

美国人从1931年开始发掘。发掘了3年之后，广场的准确位置还不知道。今天，已有100多座建筑被识别出来，古文物出土了18万件。它们被收藏在右侧重建的115米(375英尺)长的斯多亚柱廊中。

辨认出来。沿着西边一线，在赫法斯托斯①（在很长时间里人称提赛昂）的多利安式的神庙之下有一些建筑物，民主政体便诞生在这些建筑物里。它们是方型的Bouleuterion，即建于公元前约500年的议事会堂，大厅三面是为500名议员设立的一排排的座位，他们每天都要在这里开会，审议新的立法。公民陪审法庭和各委员会的房间也在其他地方被辨认了出来，人们甚至识别出了临时监狱，苏格拉底于公元前399年就是在那里喝下毒芹液死去的。这个地区如此重要，以至到了罗马时代仍在继续建设。一座叫阿格里帕的奥迪昂的音乐厅建了起来，它的听众席宽达25米（82英尺），能容纳1000人。看上去奥古斯都甚至把一座起初位于阿提卡乡间的神庙（建于公元前5世纪）移到了广场并使之成为帝国崇拜的一个中心。

1952－1956年，为了收藏美国古典学院的各种发现和考古记录，一座曾于公元267年遭到破坏的位于广场东侧的两层柱廊建筑按原样得到重建，这就是2000多年前由帕加玛国王阿塔勒斯（公元前159－138年）送给这座城市的斯多亚②柱廊。

越过地中海是北非的滨海地区，这里的利比亚在20世纪30年代是意大利的占领地，而不是一度对许多保存良好的古典建筑出资展开考古调查的美国的石油产地。基莱奈、大莱普提斯和萨布拉塔均被广泛发掘，出土的一些很好的废墟，被用作墨索里尼合法占领这个地区的历史依据。莱普提斯最初是在大约公元前600年建立的，由于它是军功赫赫的皇帝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193－211年）

① 古希腊的火神——译者注。

② 古希腊的建筑形式名，以有屋顶长柱廊为特点。哲学史上的斯多阿（斯多葛）学派便出自雅典一座斯多阿式的公共大厅——译者注。

希腊陶器和陶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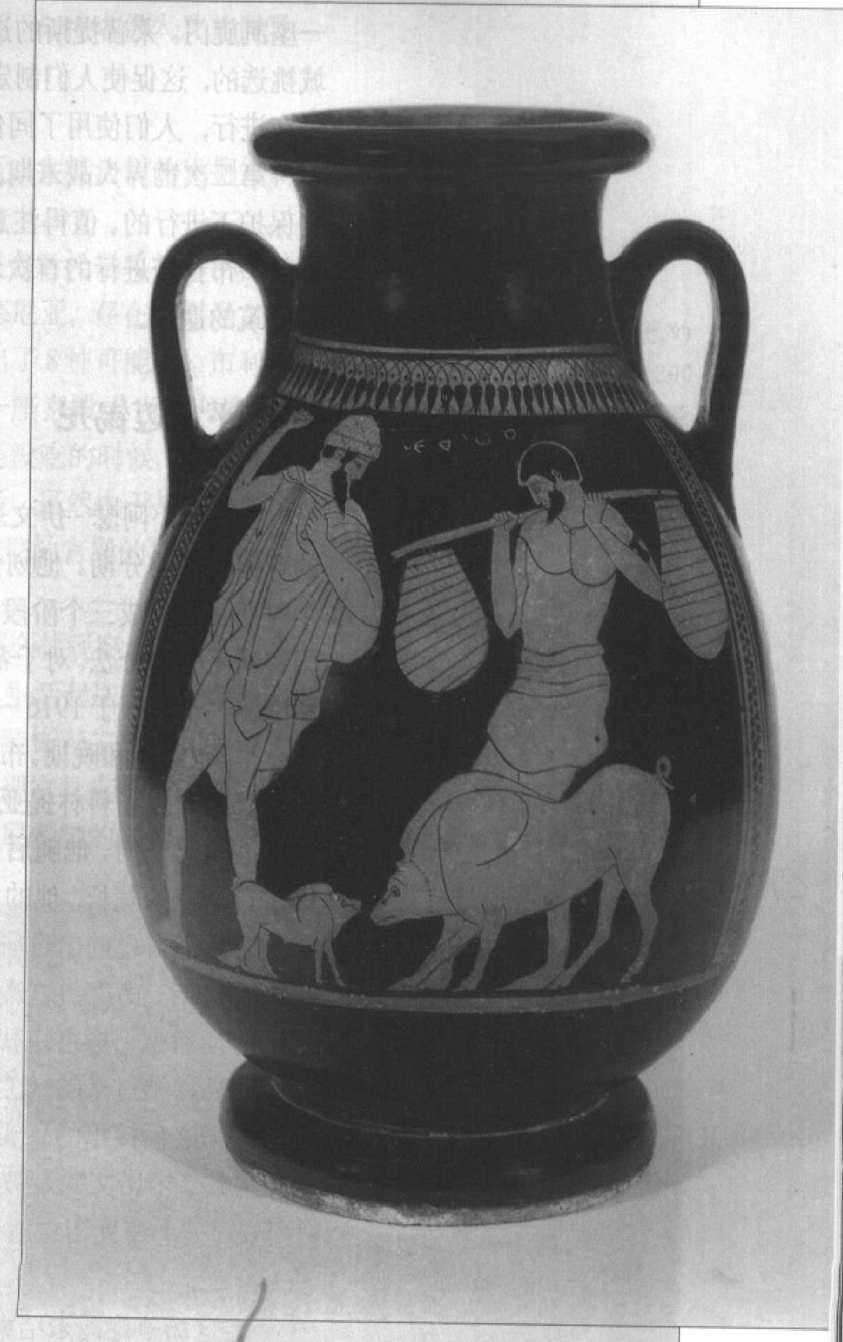
在古物鉴定领域，牛津大学艺术史专家约翰·比兹里(John Beazley, 1885 － 1970年) 爵士在古典考古方面做出了最引人注目的工作。他因识别出绘制彩陶的佚名工艺家而成为陶器分类的一位先驱。

比兹里的目的是从大量希腊陶器收藏中勾沉索隐，这些藏品是由汉密尔顿和其他人设法收入欧洲博物馆(如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的。辨别这些材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它们在风格上十分多样，所以将它们划分成"严肃的"或"颓废的"等类别是毫无意义的。但德国学者曾提到某些陶器带有简短的铭文，包括一些明显的"签名"——由一个工艺家名构成的简略文本，之后跟着一个动词epoiesen或egraphsen，意思是"由某人制"或"由某人画"。这使纯粹依据签名的作品来对陶器进行初步分类成为一个可行的方法。

通过对个别工艺家的难以察觉的细微特点——他们描绘眼睛、胸部肌肉或战车轮子的方式——进行辨析，比兹里改变了鉴定古代制陶术的方法。他可以把"没有签名的"的陶器加到"有签名的"陶器资料库中，不失时机地将从来没有在工艺品上签名的工艺家辨认出来并给他们起一些名字，如与风格特点有关的名字("肘部外向")，与收藏陶器的博物馆有关的名字("柏林画家")，与现在或先前的所有人有关的名字("画家路易斯")，或与某个场景的关键特点有关的名字("画猪人")。成千上万的阿提卡黑陶和红陶正是以这种方式划分为各个工艺家的作品。

对其他材料也用同一种分析加以分类。比兹里本人用这种方法划分出埃特鲁里亚的陶器，科林斯、东希腊和南意大利的制陶术被学者们运用同样的方法归之于不同的佚名画家。一些人甚至试图将比兹里的方法推广到公元前三千纪的昔克拉底群岛的小巧玲珑的大理石雕像上，通过它们现在的收藏地给雕刻家命名的方式将已知的样本分类。因为大多数古物出自盗墓者之手，没有发掘记录，所以像"高兰德里斯的主人"这样的名字，便只好等待更精确的划分了。

约翰·比兹里是一位手工艺品运动成员的儿子，所以毫不奇怪，他如同鲁斯金 (Ruskin) 和莫里斯 (Morris) 一样，希望歌颂那些用粗陋方法创作出艺术杰作的手工艺人。但手工艺品的价值却并不一定仅限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或卡普亚的作品。比兹里的成果是出类拔萃的，他给杂乱无章的大堆古代材料带来了秩序和定年。但他始终是一位古物鉴定家，没有留下其他人能够仿效的方法论。我们因为他的工作而能更好地欣赏陶器艺术，但令人沮丧的是，他的"工艺家们"始终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的虚幻人物。



阿提卡红陶酒瓶，比兹里给它的命名为"画猪人"。图中画的是乡下景象，有两个男子、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通常认为图中人物是奥德修（左立者）和放猪人尤迈奥斯。在奥德修从特洛伊战场返回家乡的途中，是尤迈奥斯帮忙将那些向奥德修妻子佩奈萝普求婚的男人们赶出了他的宫殿。该陶瓶制作于约公元前 470 － 460 年。

的出生地，因此据说是特别重要的城市。塞维鲁给这个城市的诸多恩惠中包括新建的公共浴池——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的“狩猎浴池”，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浴池本身的灰泥装饰——这是一种公共讨论场所和长方形柱廊大厅的合成体，再加上一座凯旋门。莱普提斯的进口大理石上刻写着铭文，显示这块大理石是专门为该城挑选的，这促使人们制定出一个研究罗马大理石贸易的计划，该研究计划今天仍在进行，人们使用了同位素分析法，力求发现主要采石场的位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意大利人离开了利比亚，新的发掘工作是在英国摄政的保护下进行的。值得注意的项目包括英国考古家卡斯林·坎扬对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萨布拉塔进行的首次地层学发掘，这次发掘出土了一些重要的罗马民用和宗教建筑的遗存。

重新评定迈锡尼

1905年，阿瑟·伊文思根据他在克诺索斯的发掘，提出了一个有关克里特岛的青铜时代的分期。他划分出三个主要时期——米诺文化早期、中期和晚期，每个时期又细分成三个阶段。他参照的模式是提供了绝对年代的埃及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的分法。对于希腊大陆而言，相应的年表是由阿兰·韦斯(Alan Wace)和卡尔·布利根于1916－1918年设计出来的，三个同样的时期定名为希腊青铜文化早期、中期和晚期。布利根当时是设在雅典的美国古典学院的院长，他于1915－1916年发掘了科林提亚的科拉库史前遗址，出土了构成希腊青铜时代文化编年基础的陶器序列。他随后又挖掘了一些阿哥利特的青铜时代遗址。韦斯是雅典英国古典学院的院长，他的发掘是在拉哥尼亚和帖撒利，但很快转而对迈锡尼的建筑史开始了自己的出色研究。1921－1923年以及1939－1955年间，他为一些防御工事定年，考察过宫殿并发掘了大量房屋和坟墓。

韦斯和布利根很快就确信，“尽管米诺文化是源头，但迈锡尼文明并非只是从克里特岛移植过来的，它是经过人工栽培的克里特的枝条，嫁接到野生的希腊大陆的树干之后接出的果实”。然而阿瑟·伊文思却认为，米诺人曾经征服过或者殖民于希腊，米诺文明是被移植到希腊大陆的。激烈的学术争论的种子就这样播种了下来。关于在克诺索斯有可能找到迈锡尼文明的影响的看法使克里特派大为恼火。

在这场争论尚未结束之前，布利根接受了特洛伊的挑战，即重新确立它作为爱琴海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关键遗址的地位。谢里曼和德普费尔德已移走了特洛伊土墩的大部分土方，但没有触动遗留的部分。1932－1938年，布利根对这些工作进行了检验，改进了遗址的地层分析，从而证明了特洛伊9个“城市”中的每一个都由若干文化层系列组成，在时间上涵盖了青铜时代。但无论怎样，大凡发掘过特洛伊的人都不能漠视荷马。布利根确定：德普费尔德认为属于荷马史诗中的城市——特洛伊IV，是被地震摧毁的。而他称作特洛伊VIIA的时期似乎更有可能是城市被焚毁的时期。在这里，房屋挤压在一起，几十个陶瓶堆在地板上，显然这是居住地遭受了围困的迹象。一些骨骸的存在意味着特洛伊的陷落。布利根因此得出结论：

当一个人看到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时，它就不会再对历史上是否真正发生过一场特洛伊战争表示怀疑了。在那场战争中，亚该亚人的联盟或迈锡尼人，在一个公认的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国王的统帅下，与特洛伊人及其同盟者展开了战斗。

他或许应该知道，这种怀疑并没有销声匿迹。最近，在特洛伊的发掘重新恢复了，但荷马史诗中的情节仍旧像过去一样难以捉摸。

1939年，布利根再次来到希腊。因为派罗斯的国王奈斯托是攻打特洛伊的希腊人中的最强有力的首领之一，所以布利根相信在美塞尼亚，存在迈锡尼文明的一个重要中心。在田野发掘期间，借助出土的陶器列出了8种可能性，布利根选择了其中之一："如果你是一位迈锡尼国王，你就要建一座宫殿。"当他在埃帕诺·英格利阿诺斯山丘上发掘的时候，甚至第一天的午饭还没吃的时候，他已经发现了名副其实的石墙、残缺不全的壁画和带有铭文的泥版。虽然由于战争关系，这里的发掘直到1966年才完成。但他的关于这是一座迈锡尼的宫殿的推断被证明是正确的。

除了复原再建之外，派罗斯不像迈锡尼或提林斯那么壮观突出，但它的遗址保存状况较好，并得到了更细心的发掘。存在接待室、生活起居室、贮存油酒的仓库、档案室和一座神庙的事实使人想起了米诺斯宫，装饰着主要房间的壁画更加强了这种印象。但浏览一下派罗斯的布局，人们会发现它具有希腊迈锡尼宫殿的基本特征。沃斯和布利根精确地判定米诺文化对迈锡尼希腊的影响是十分有限

派罗斯的迈锡尼时代的王宫，属公元前1300－1200年。这幅华丽的觐见厅的复原图，显示了厅内有圆柱、中央炉床、御座以及描绘着神话动物的壁画。从外院进入大厅要经过右侧的大门。

尽管外墙使用了块石，但宫墙主要是用木材和碎石建造的。地板、天花板和内墙抹有灰泥，涂饰着丰富多彩的绘画，带壁画的墙上还饰有迈锡尼和米诺风格的花纹。



第六章

的。

在欧

石器
从欧
然而
欧洲
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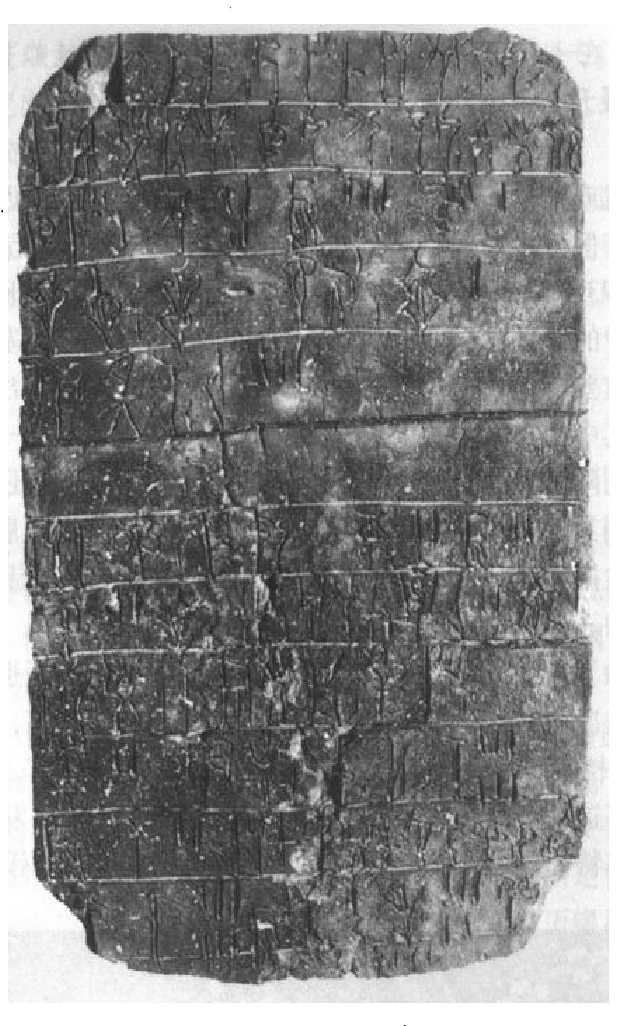
线形文字B的破译

谢里曼所发现的文明的成熟性使伊文思确信，迈锡尼人肯定是熟谙文字的。他在克里特旅行期间，曾得到过一些雕刻过的印石，但直到他于1900年开始发掘克诺索斯之时，他的推断才被证明是正确无误的事实。伊文思发现了几千块泥版文书，它们被那场可怕的摧毁宫殿的大火烧得坚硬无比。对它们的研究表明：在克诺索斯，先后有三种不同的文字。出自早王宫时期的文件使用的是克里特象形字。这种文字后来被线形文字A所替代，随后线形文字B又取代了线字A。线字B是在克诺索斯接近毁于大火时被使用的。象形文字和线形文字A的文书后来在克里特的其他遗址中也有发现，但线形文字B已被证明是曾在迈锡尼希腊的王宫中使用过的文字。

刻写在泥版上的某些符号显然是数字，书写员还利用了象形文字，人们往往可以将它们分辨出来。所以很明显，这些文献中的大部分是宫廷官僚机关的管理记录。然而，破译它们的尝试却屡屡遭到失败，尽管学者们前仆后继，频频出击，象形文字和线形文字A至今仍未被释读。但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却在1952年破解了线形文字B。文特里斯不是考古学家，而是一名建筑师，他对爱琴文明的爱好始于14岁，当时他听了阿瑟·伊文思的一次演讲。1940年，当他刚好18岁的时候，他撰写了一篇论文，认为文本的语言是埃特鲁里亚文。战后，文特里斯恢复了对线字B的研究。他在1951年写道：他尽管注意到“克诺索斯和派罗斯的泥版文书多少有可能是用希腊文写的”，但他接着补充说“我感到我们迄今已看到的米诺形式已使这一点成为不可能”。直到1952年6月，他才认真考虑文本的语言可能是希腊语。他很快就相信他已经解开了密码。他请求剑桥大学古文献学家约翰·查德维克（John Chadwick）予以帮助，然后他们一道发表了一篇论文，详细阐述了他们的发现。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此事，但布利根却幸运地尝试了一下这种新译法。他利用了一块文特里斯不曾见过的、由他自己于前一年夏天在派罗斯发现的线字B泥版。他能读懂这块泥版的大部分内容并能够通过形状确认一些词的特征。这个事实说服了布利根，随后也逐渐说服了大多数学者，使他们相信文特里斯的释读基本上是正确的。

当然，并非所有迈锡尼文书都能一下子得到破译，破译过程仅仅是个开始。线字B泥版本身只是一种记事本性质的东西，是暂时性的笔记，也许最终会销毁。古代的文书一定还会使用一种类似纸草的中介来进行永久



线形文字B泥版文书，公元前13世纪。

记录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档案材料中没有外交条约或书信的原因。然而这些文本明白无误地说明，在米诺的克诺索斯的最后一批统治者是迈锡尼希腊人，他们控制了克里特的大部分地区。文本对了解迈锡尼国家的经济特别有益，这一官僚经济的复杂性是人们从来没有想到的。各个宫殿均有一支高度专业化的劳动队伍，原料的供应和产品的生产都有严格的监督。这不是村舍的小工业，克诺索斯宫为了获取羊毛而饲养着10万只绵羊，派罗斯宫拥有400名依附的青铜匠人。书吏们甚至列出奉献给神祇的礼品一览表，这为我们记下了诸神的名字。但神像本身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因为宫殿在这些泥版文书拟好不久便遭到了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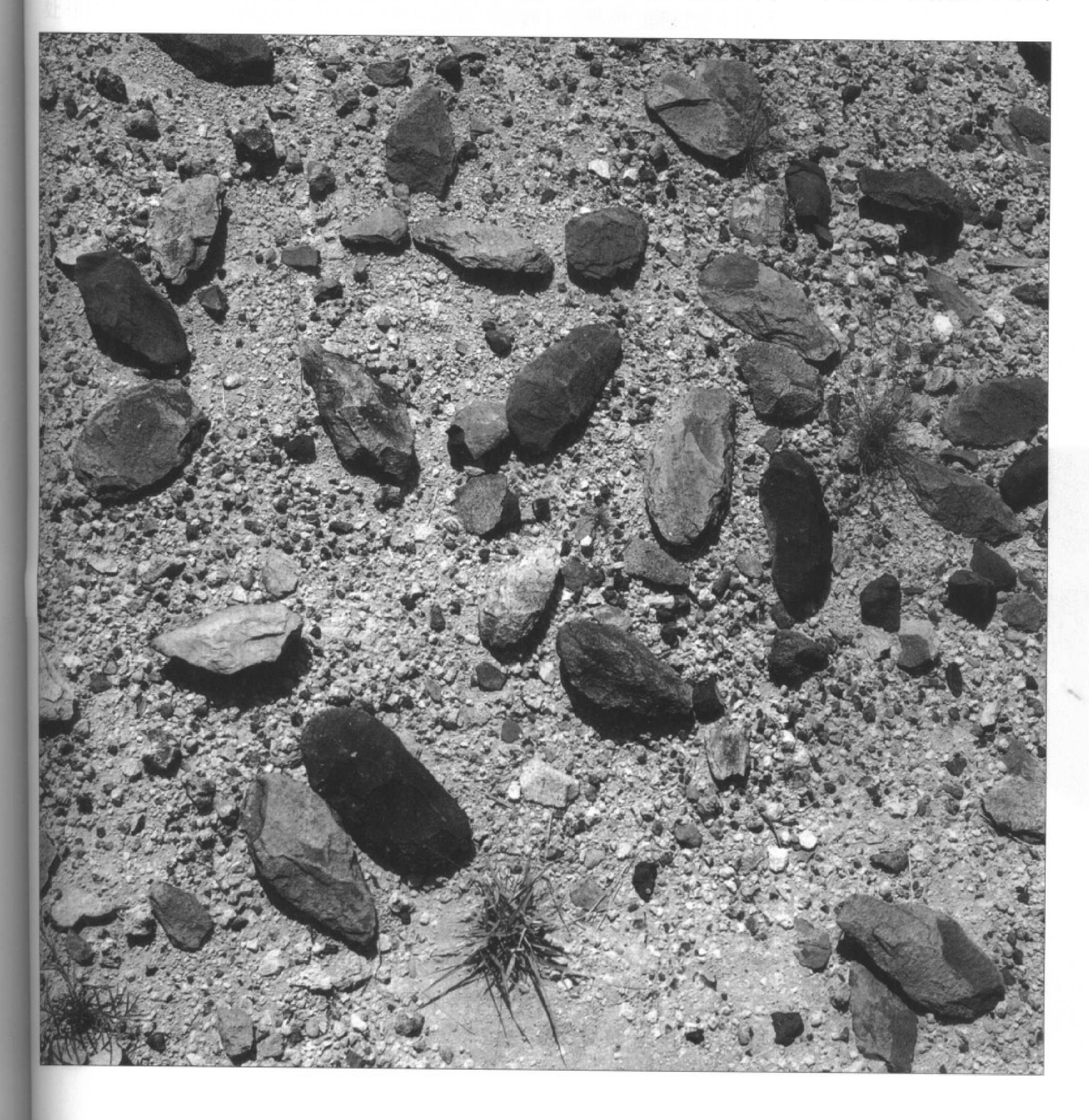
查德维克目前仍致力于研究线形文字B，而迈克尔·文特里斯却因一次车祸于1956年不幸身亡。是文特里斯改变了爱琴考古。

的。1952年，线形文字B的破译为此提供了证据。

在欧洲之外：旧石器时代的历史

在非洲，最初的专业考古学家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石器时代，并通过与欧洲石器的对比，力求勾画出石制工具的年代序列。人们希望寻找民族迁徙和技术是从欧洲传播而来的线索，此时人们把迁徙和扩散看作是所有知识和发明的来源。然而，约翰·古德温（John Goodwin）认为需要有适用于当地的术语学而不是欧洲的术语学。他同C·封·里埃特·洛（C.van Riet Lowe）——一位改行为考古的土木工程师——在他们合著的《南非石器时代的文化》一书中（192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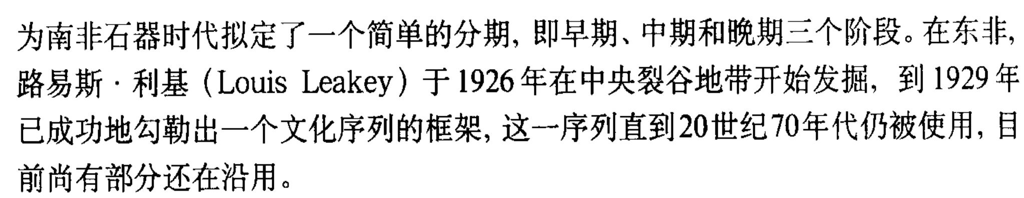
肯尼亚南部的奥勒盖塞里，非洲最重要的阿舍利文化遗址之一，由玛丽·利基和路易斯·利基发现于1942年。该遗址定年为公元前约90万–70万年，出土了数千件手斧、刮削器和一些其他人工制品。



多萝希·加罗德（1892-1968年），摄于1925-1926年发掘直布罗陀的“魔塔”石洞之前。

她在曾经出土过穆斯特时期燧石工具的堆积层中，发现了属于一个尼安德特人的儿童头骨，这开启了她作为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的历程。随后她便开始了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库尔德斯坦、保加利亚和法国的考古发掘。

1939年，她成为剑桥大学迪斯尼考古学教授，无论是在牛津大学还是在剑桥大学，她都是第一位女教授。她的继承者格林·丹尼尔评论说，她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熟练的发掘工作者，一位无所畏惧的田野工作者”。



为南非石器时代拟定了一个简单的分期，即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在东非，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于1926年在中央裂谷地带开始发掘，到1929年已成功地勾勒出一个文化序列的框架，这一序列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被使用，目前尚有部分还在沿用。

西亚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发掘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田野表面考察开始的。只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具有重大意义的发掘活动才得以展开，剑桥大学史前史学家多萝希·加罗德（Dorothy Garrod）在朱迪亚的舒克巴的发掘颇为有名。她发现了对农业起源具有重要意义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纳土夫。这是妇女在早期考古学领域取得的一次成功。1929 - 1934年，她同动物骨骼专家多罗西娅·贝特（Dorothea Bate）合作发掘了两处洞穴遗址，即巴勒斯坦卡尔梅勒山的雅法（海法）附近的塔班和埃尔瓦德洞。

这两次发掘与同时在埃斯－斯库尔附近的各项发掘合到一起，部分奠定了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基础。加罗德拟定了一个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新石器时代开始为止的很长的石片石器制作业的序列，时间跨度超过20万年。由于在卡尔梅勒山的各种发现无论其形式还是技术，都与西欧旧石器时代的工具有着许多类似之处，所以加罗德用法国术语把它们归类为“阿舍利”、“穆斯特”和“奥瑞纳”石器。贝特从事的动物志的工作也同样重要。她除了要叙述史前人类食用的动物之外，还试图把卡尔梅勒山同人们熟知的西欧气候变化的结构联系起来，以理解不断变化的更新世的气象条件。这大大有助于她们对发现物的定年。她考察了扁角鹿与瞪羚的数量比例的变化，认为扁角鹿数量的比例高，反映出存在着更多的林地，因此也就存在着更湿润的气候，而瞪羚的比例高则意味着存在开阔的大草原和较干旱的气候。



同样重要的是，塔班和埃斯－斯库尔洞穴出土了11个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遗骸。这种发现在巴勒斯坦地区不是第一次了，加利利海附近的扫提亚洞曾于1925年出土过一个伴随着穆斯特时期的石制工具的尼安德特人的化石；20世纪30年代早期又在靠近拿撒勒的一个叫作加弗泽赫的洞穴里发现了早期人类的化石。但卡尔梅勒山的遗骸是有意以胎位式的屈身加以埋葬的，体现了人类对于死亡的一种回应。对该时代的分析表明，这些骨骸在生物学上属于“进化过程中变动较大的时期”的一种人，因为他们显示了尼安德特人的典型特征，如很大的眉脊；同时又带有现代人的特征，如具有明显的下巴和较高的前额。即使在目前关于现代人起源的争论中，这些发现物仍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证据。

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阿尔布雷赫·鲁斯特（Albrecht Rust）在大马士革附近贾布鲁德的惊人发掘对卡尔梅勒山的工作做出了补充。加罗德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黎凡特地区工作的其他人一样，是根据既定的西欧旧石器时代的序列对发现物进行分类的。战后，随着贾布鲁德考古报告的发表，对发现物需要重新进行评估。鲁斯特识别出两种处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行将结束时和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片石器制造业，而加罗德在卡尔梅勒山却没有发现类似情况，这与欧洲分期序列的任何阶段均不吻合。加罗德对塔班的材料进行了重新分析，于是发现了两种石器制造方式，其中一种的打制技术和器形近似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奥瑞纳石刀，她将其称为“前奥瑞纳式”。由于“前奥瑞纳式”的年代比奥瑞纳式本身要早5万

多年，所以人们对它的意义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20世纪60年代，摩西·斯特克里斯（Moshe Stekelis）对黎凡特地区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发表了著名的新解释。当时他挖掘了约旦河谷地带的尤柏迪亚，出土了粗糙成型的砍砸器，即在一块天然小圆石的一边打出锋利的刃口，它们同在东非奥杜威峡谷等遗址发现的远古石器极为相似。另外还出土了动物骨骸、手斧以及用简单的薄石片制作的其他工具。所发现的动物类型表明，这个遗址的年代可能有140万年之久。

中亚旧石器时代的考古要比近东其他地区发展缓慢一些。突破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人拉尔夫·索莱茨基（Lalph Solecki）挖掘了伊拉克扎格罗斯山脚下的沙尼达洞穴，发现扎格罗斯和黎凡特地区的旧石器之间，虽然细微之处有很大不同，但还是具有广泛的相似性。他还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的墓葬，随葬品有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片石器。对骨骼化石的研究表明，其中一个尼安德特人的面部一侧曾遭到猛击，但保住了性命；后来一只手臂又丧失功能，可能已无法照料自己。然而，或许是靠着其家庭的供养，他却活到了相当可观的年龄。还有一个尼安德特人，如同填充在他的墓葬中的花粉所提示的那样，是伴随着一些花环安葬的。索莱基对这一人文证据留下深刻印象，他涉足了那个时代的大众文化，将自己的通俗性著作取名为《沙尼达：最初的爱花人》（1971年）。

在南亚，存在旧石器时代文化一事在19世纪便由富特这样的先驱们加以确认了，但定年问题直到20世纪30年代对与旧石器时代工具相关的地质条件进行系统调查之前，仍然是不清楚的。一支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联合考察队对旁遮普北部的博德瓦尔高原进行了调查，发现了砾石制作业，根据它们先后在沿苏阿河一线的碎石层和黄土堆积层中出现的情况，可以将它们置于一个粗略的年代序列当中。通过把苏阿河的地质序列与克什米尔地区更新世冰河时期的幕[1]联系在一起，而后者看来与阿尔卑斯冰河时期的四个阶段相适应，所以根据这种结合也可以赋予这些石制工具以粗略的定年。

近东和南亚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如同在欧洲发现的情况一样，集中在带有很厚的天然沉积物和人类文化层系列的洞穴上。含有几千年人们偶尔居住痕迹的、内容充实的堆积层从整体上得到挖掘，通常厚度总有1米（39英寸）多。然后，人们不是从石器的整体出发、而是按个别类型（如手斧）的制作技术或存在与否来分析工具制作的特点。自20世纪50年代起，旧石器时代的研究标准变得更加复杂，而且这种变化还在日益加快。博德斯（Bordes）用他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类型学方法对出自黎凡特地区穆斯特文化遗址的所有工具进行分析，他的处理方法很快成了标准，直至今天仍被用于世界各地、各时期遗址中的打制石器制造业。

就20世纪对旧石器时代的认识而言，远东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地区。在这里，有关石器制造的演化问题和人类的进化（从原始直立人祖先到现代智人的进化）问题均是争论的焦点。特别是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一组直立人化石——自1929年始在中国北方的周口店出土了40余个个体直立人的化石——引起了人们对人类本身起源的新的广泛探索。

直立人最初是在1891年在南亚发现的，发现者是年轻的荷兰医生尤根·杜布

① 地质学术语，指某个地区或地貌的地质史中发生的一个或一系列事件——译者注。

右图为伊拉克的沙尼达洞穴，索莱基的考古队在洞穴地面以下4米（14英尺）多深的一块古代落石下面，发现了一个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定名为沙尼达1号人。

后来有关人员在实验室里对患有关节炎的骨骼化石进行检查，结果令人吃惊。这位化石人的右臂萎缩，导致整个胳膊残废。这是50000多年前的一个已不能狩猎的尼安德特残疾人，因别人的帮助而幸存下来的证据。

这个头骨的后部似乎在孩童时被有意弄成了畸形，根据人类学文献的记载，这种情况大概是用硬衬垫或带子牢牢绑扎后造成的；另一种解释说，它也许是利用一根头带在人头上加一些负荷造成的，人们知道在肯尼亚的基库尤人就有这种习俗。

此外，索莱基注意到："我们为上下门牙有明显的磨损特征而感到不解……这可能是这个人用他的牙齿来帮助他那只完好的胳膊而造成的。这使我们想起了爱斯基摩人，他们在制革时也是广泛利用自己牙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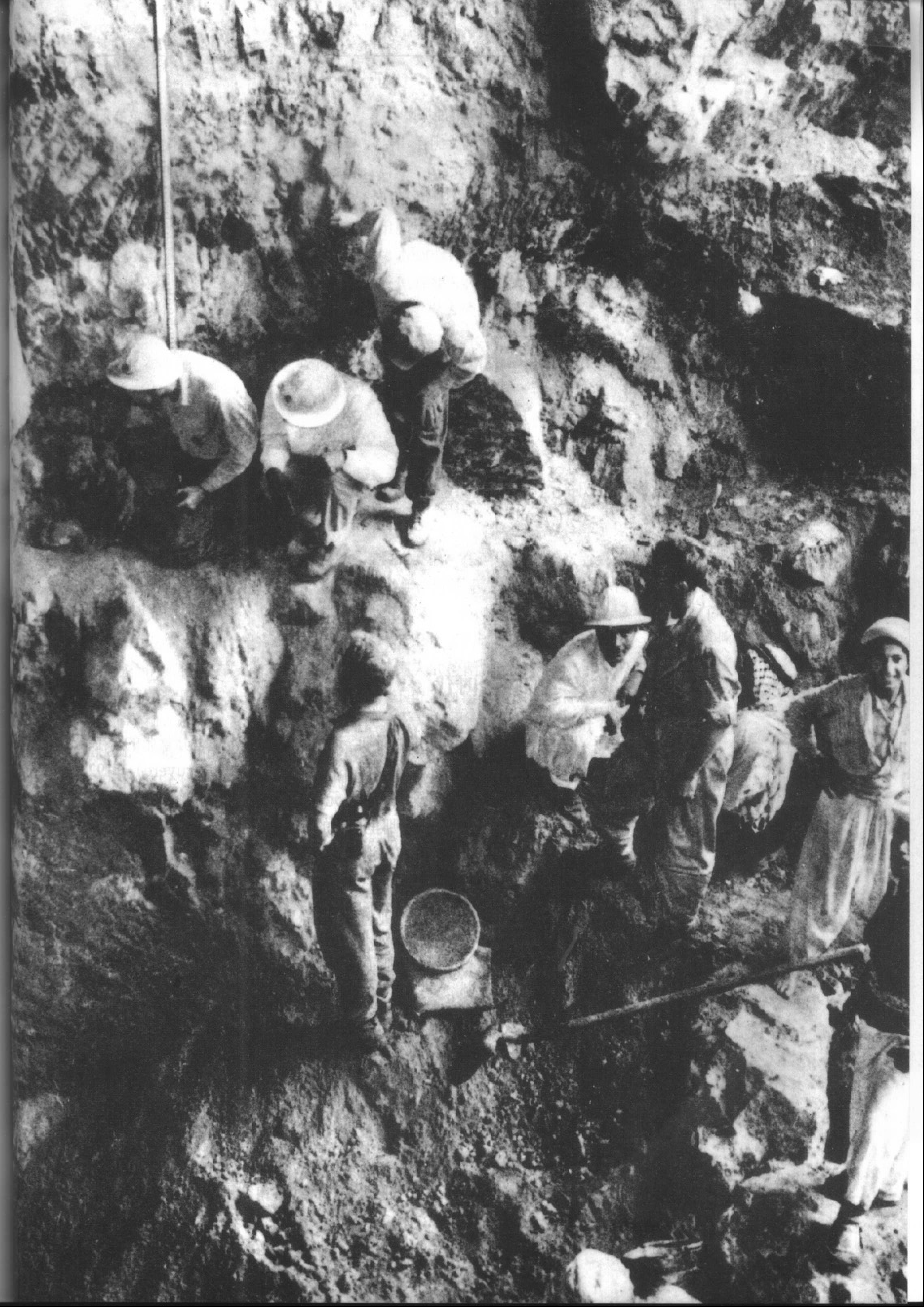
瓦。他确信："已变成化石的人类祖先可以在亚洲找到，因为所有的无尾猿——值得注意的是类人猿——都生活在热带地区。由于人类始祖是逐渐脱掉毛发的，所以他们必定要继续居住在温暖的地区……"杜布瓦从1887年起在印度尼西亚荷属殖民地的一所医院里工作，在此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去寻找爪哇的洞穴。当地工人从一个大理石采石场挖出的一件化石是他的第一个"发现"。在那之后，他便于旱季开始在特里尼尔的梭罗河碎石层中展开自己的发掘。1890－1892年，运气颇佳的他在那里又发现了他要找的东西：一个猿人的头盖骨、大腿骨和两枚臼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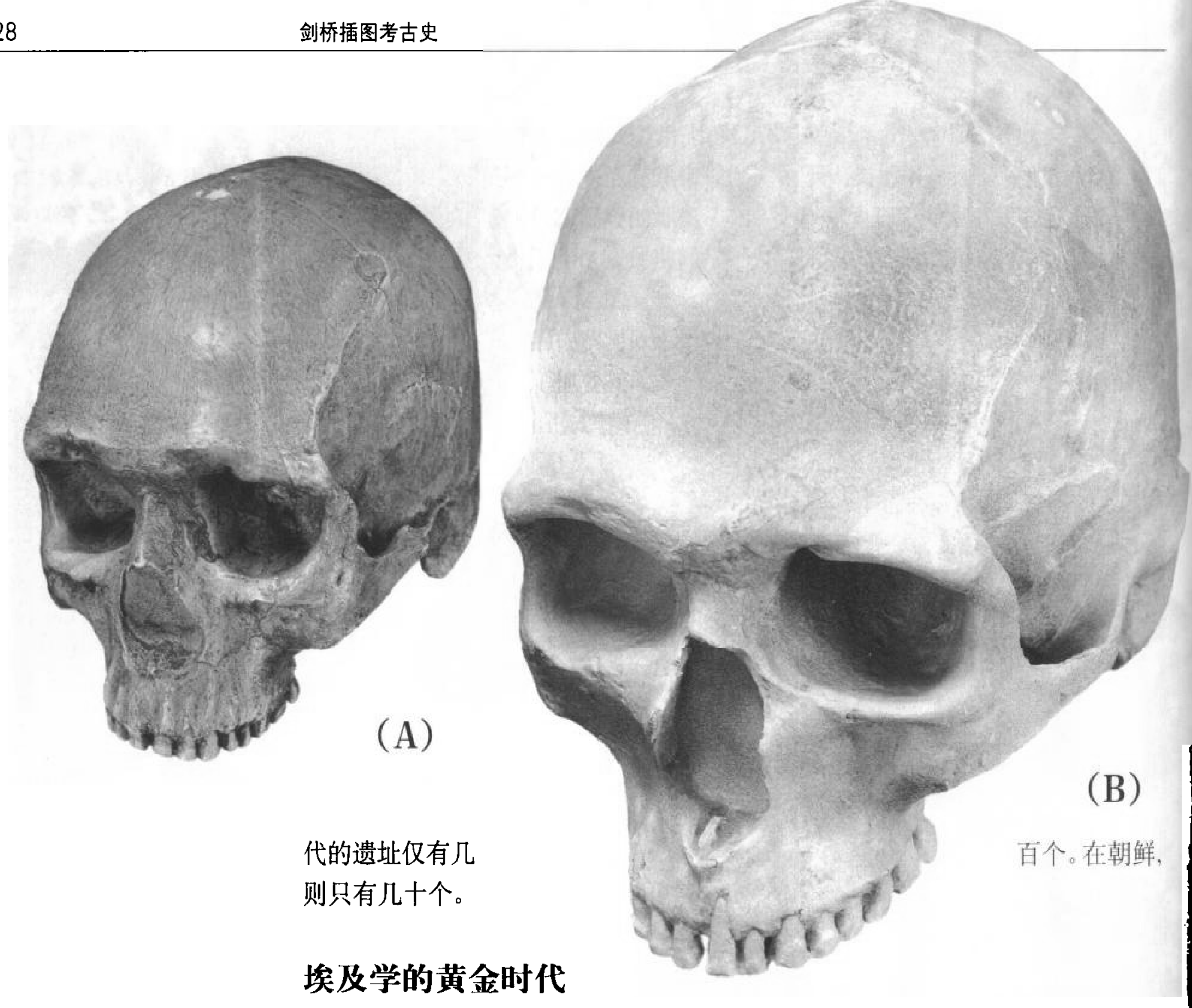
1894年，杜布瓦正式宣布发现了一种介于人猿之间的过渡形式——直立猿人。在很快定名为"爪哇人"之后，直立猿人在世界上被迅速确定为人类的始祖。在随后一些年里，又不断有新的发现，如中国猿人即北京猿人或北京人，莫佐克托人或"莫佐克托小孩"，梭罗猿人或梭罗人，迈甘猿人，"瓦德加克人"等。所有这些远东的化石现在都被看作是人类早期的一个种类——直立人，其特征是身体矮壮强健，具有粗大眉脊的厚重的面孔，以及较先前更古老的祖先要大的脑容量（约900－1225毫升）。远东直立人化石现在还成为有关现代人（智人）是如何形成的问题的争论中心。许多学者对新近的基因研究成果印象深刻，他们设想直立人于12万－4万年以前、在世界范围内被一个来自非洲和西南亚的新种所取代，这就是所谓"第一个女人"（Eve，夏娃）或"出自非洲"的假设。然而某些熟悉远东化石人的生物人类学家否定这种取代理论，因为在中国能看到早期人类独立的地方性的进化过程。他们把出自中国南方的马坝人、柳江人等化石看作是向现代人过渡的表征，很像西方的尼安德特人，反映此地的人种存在着正常的进化过程，居民保持着地区的连续性。

在远东，如同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一样，石制工具较之化石在考古记录中占有更多的篇幅。第一个系统记述旧石器时代工具类别的人是哈佛大学史前史专家哈兰姆·L·莫维斯（Halam L.Movius）。他发现它们的特点是"各种砍砸器、砍砸工具和手斧等石核工具占有压倒优势，同时结合一些简单的、未经预先加工的石片和石核"。莫维斯发明了"砍砸器－砍砸工具传统"的术语，用来概括亚洲北部和印度次大陆东部的石器。他认为这种传统与西亚、非洲和欧洲的传统形成对照，后者以加工显然不错的手斧为特征。

亚洲由于缺乏手斧和精致石片的制作技术，所以亚洲石器制作的传统在几十年里被人们看作是粗笨和简单的，是流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石器制作传统的一个穷亲戚。这种低估的做法最近受到反驳。虽然出自东亚一些遗址——特别是朝鲜半岛的村谷里——的"手斧"做工粗陋，但人们认为，东亚石器时代的技能和劳动大概更多地用于竹器或木器的制作当中，而不是用于制作精致的手斧。在中国大陆，至少有两种主要的石器制作传统，即或者是较重的石核工具，或者是小型的石片工具占有优势，看来它们是与不同的生态资源背景相适应的特定的工具组合。

20世纪在东亚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数量和范围明显依国别而有所不同。几乎所有的化石始终出自中国的喀斯特地区即石灰岩地带。那里因化学变化而生成的洞穴和水坑，不仅吸引着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进驻其间，而且使人类化石和文化层后来免遭侵蚀。日本的情况却相反，由于酸性的火山灰土壤，它没有什么骨骼化石保存下来。大多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工具也出自中国。但日本拥有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现在已达到2000个之多。在中国，记录在案的旧石器时





代的遗址仅有几百个。在朝鲜，则只有几十个。

埃及学的黄金时代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个时期，埃及的考古工作是十分紧张的。在靠近底比斯的代尔·埃尔－麦迪纳，伯纳德·布吕耶尔（Bernard Bruyère）于1922－1951年间展开的发掘，将新王国期间（公元前1550－1070年）建造帝王谷王室陵墓的工人居住的村落挖了出来。那里出土的有关日常生活的文献材料——许多是简短的记录，刻写在陶器碎片或平滑的石片上——反映出了高度的文化教养，给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一些明显为现代人所关心的问题的无数机会，如个人关系、邻里之间不和以及工作场所的各种问题等等。某些史料是愉悦和淫秽的，比如有描写情人之间的："如果你醉醺醺地回来，躺到你的床上，我将揉摸你的双脚，孩子们会躲到门后头。"其他材料则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忿怒的情绪：

> 致书吏奈克汉姆特：为什么你竟有如此丑陋的行径？除了妄自尊大，谁的话你都听不进去。你简直不是人。你不像其他男人，使自己的老婆怀孕。你虽然极为富有，但却一毛不拔，没给任何人东西。

布吕耶尔需要轻轨车来运送大量自遗址挖出的碎砖烂瓦，他发现了街道、70多座房屋以及建造了3000年之久的工匠及其家人的坟墓。以这种方式，代尔·埃尔－麦迪纳成为古代近东社会文献材料最为丰富的社会之一。

然而对于公众来说，埃及考古的刺激之处仍集中在死亡、黄金和法老上。这

种观念现在由于迄今为止两个最富有成果的考古发现而得到了加强，这就是1939年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塔尼斯发现的王室墓葬以及由哈佛大学的卡特在1922－1928年间对未经触动的幼王图坦哈蒙（约公元前1343－1325年）陵墓的发掘，那是一次蜚声世界的发掘。

塔尼斯（桑·埃尔－哈伽尔）是尼罗河三角洲规模最大、意义最为重要的考古遗址。当法国埃及学家皮埃尔·蒙泰（Pierre Montet）于1928年开始对这里展开发掘时，它事先已被皮特里（他的计划是挖掘神庙）和马里耶特（他出土了中王国时期重要的王室雕刻）挖掘过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趋逼近的这个时期里，蒙泰在阿蒙神庙辖区内的发掘证明了作为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王朝（约公元前1070－715年）国王住地的塔尼斯的重要性。这次发掘工作最富戏剧性的阶段始于1939年2月，当时他发现了一个深井，通到下面，与后来证明是一座带有4间墓室的石砌陵墓连在一起。陵墓未被盗掘，一口巨大的红色花岗石棺椁是苏塞奈斯一世（公元前1031－991年）的安葬处。椁内有一黑色花岗石套棺，是重复使用的较早时代的物品，存在年代比死去的法老早200多年。套棺内还有一金银内棺，盛敛着业已腐烂的国王的木乃伊，国王脸上覆盖着一个优雅的金面罩。不远处是苏塞奈斯的妻子、儿子及其继承人阿迈奈莫普（公元前993－984年）以及后来的法老绍什克尔二世（约公元前890年）的灵柩，在这里人们再次看到了一个黄金面罩和安放在一口鹰头银棺当中的木乃伊，另外还发现了大量珠宝，包括金手镯、胸饰和项链。

塔尼斯的发掘，如同代尔·埃尔－麦迪纳、图坦哈蒙的陵墓以及几乎所有当时在埃及进行的其他考古发掘一样，仍旧受到外国人的控制。但随着1952年的革命，这种情况逐渐开始有所变化。如果我们看一下位于阿斯旺以南的荒凉的边境地区努比亚（现在处于纳赛尔湖的下面）的话，这一点尤其明显。当阿斯旺水坝的加高问题在1902和1970年间几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抢救很快将要沉入水下的遗址的工作便展开了，但工作的主导权却掌握在西方人手里。美国人乔治·赖斯纳（George Reisner）发起了“第一次努比亚考察”活动（1907－1911年），得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资助。而“第二次努比亚考察”活动（1929－1934年），则由两位英国支持的考古学家瓦尔特·埃默里（Walter Emery）和莱斯理·柯万（Leslie Kirwan）主持。只是在第三次也就是最引人注目的加高水坝的建设（1960－1970年）时，抢救努比亚遗址的工作交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所以至少在概念上发掘工作变成国际性的了。

对于埃及考古学家来说，第一个明显的成功发生在革命之后两年，即1954年5月，当时埃及古物署的卡迈尔·埃尔·马拉克在大金字塔脚下打开了一个用石板盖着的、密封了4000多年的地洞。“我闭上了自己的眼睛，”马拉克后来写道，“当我闭上眼睛时，我闻到了一股香味，一股非常非常神圣的香味。我闻到了时间……我闻到了世纪……我闻到了历史。当时我确信船就在那儿。”那是一条完好保存下来的法老胡夫（公元前2551－2528年）的出殡船。被分解成1224块木头，与缆绳、筐子、席子垒在一起，共有13层。修复人阿尔迈德·尤素福·莫斯塔法用了16年的时间来重新建造它。正像今天在一座专门为这个遗址建筑的博物馆中所显示的那样，船长44米（143英尺），一根横梁有6米（19英尺）长。有6对

左图图(A)是早期现代智人的头盖骨，出土于北京附近的周口店，时间属公元前约28000－18000年[1]；图(B)是出自捷克共和国普雷德莫斯提的智人头盖骨，属公元前约24000年以内。

关于中国现代人头骨化石的样本是由当地直立人演化而来的，还是在10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而来的争论仍在激烈进行。

与周口店的直立人[2]遗存共生并伴有10万多件石器——大部分是石片、刮削器和砍砸器——的事实，使这个遗址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即使许多最好的化石（包括14件头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在无法解释的情况下丢失了，其重要意义仍丝毫未能减损。

这个遗址很复杂，是一个石灰岩洞的迷宫。洞中的沉积物非常坚硬，往往需用气钻处理才可松动。文化层内的火灰和鹿、象、马、水牛的骨骸均表明，这个洞穴在70万至50万年前曾有人长期居住。现在总计发现了40多人的骨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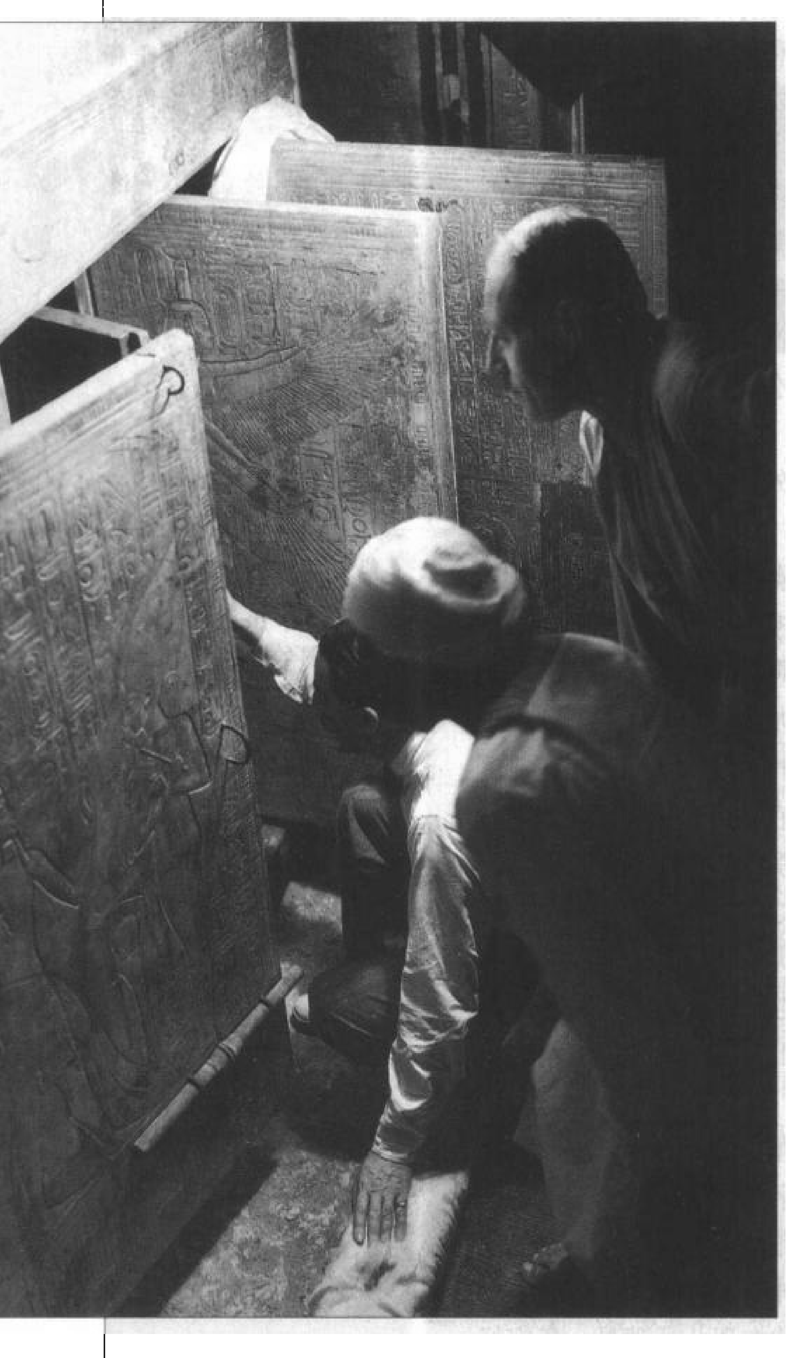
①此处的“早期现代智人”应为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编者注

②此处“周口店的直立人”应是指北京猿人——编者注

金光闪耀的图坦哈蒙墓

对于霍华德·卡特来说，发现图坦哈蒙墓是他30年里醉心于古埃及研究事业的顶峰，他后来再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事。

卡特（1874－1939年）是英国诺福克郡的一位贫穷的动物画家的儿子，是杰出的发掘人和长于描绘的美术家，也是一位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脾气暴躁和孤独的人。他主要是靠贵族赞助人的帮助而展开自己的专业生涯的。他17岁开始工作，为英国埃及学先驱弗朗西斯·列维林·格里菲斯（Francis Llewellyn Griffith），临摹贝尼哈桑凿岩墓的墙画。一年后，他很幸运地在弗林德斯·皮特里指导下，在埃尔－阿马尔纳有了第一次发掘的体验。埃尔－阿马尔纳是由信奉异教的法老阿克纳坦（死于公元前1337年）在上埃及建立的为时不长的首都，阿克纳坦有可能是图坦哈蒙的父亲。



霍华德·卡特正蹲在第二个木质椁室的几扇门口，三层椁室套着图坦哈蒙的木乃伊和他的石棺。封泥在3000多年里始终未被破坏。与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助手派基·卡兰德和一个埃及工头。

1899年，卡特成为上埃及古物总监，这是埃及古物署设立的一个重要的新职务。随后又对下埃及也有一个相似的任命。但卡特在这个位置上并没有待多久。1905年，在孟菲斯附近的萨卡拉墓地，一些喝醉酒的法国游客同古物署的卫兵发生争吵，卡特动用武力赶走了游客，平息了事件。游客们因此感到受了侮辱，因而通过法国驻开罗领事要求道歉。卡特由于性格倔强而拒绝这样做，因此辞职而去。

作为一名富有经验但工作前景堪忧的埃及学家，卡特现在非常幸运地遇到卡那封的第五代伯爵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 1866－1923年）。这是一位有些懒散但极为富有的英国贵族，早年酷爱赛马和赛车，中年时热衷上了考古。卡那封曾于1907年在底比斯进行过小规模的发掘，但他很快就认识到他需要一位类似卡特这样的考古学家，以提高他的工作的可靠性和把握技术方向。在5年时间里（1907－1911年），卡特和卡那封发掘了位于尼罗河西岸的底比斯的私人墓地，并在1912－1913年将他们的工作推广到了尼罗河三角洲地区。

然而在三角洲地区的发掘令人失望，所以在1914年得到一份最令人垂涎的埃及发掘特许证，即发掘帝王谷的权利，就弥足珍贵了。卡特于1915－1916年开始在帝王谷中工作，清理已知的阿蒙赫特普三世和哈特舍普苏的陵墓。到了1917年，他的活动便仅仅集中到对一座古墓的搜寻上，这就是图坦哈蒙墓。

因为不知道墓地在何处，卡特认为这位法老的陵墓是隐蔽起来的，多半没有被盗过，一定存在于附近的某个地方。一无所获的5年过去了，任何一个性格不那么坚强又缺少良好的资金援助的人都可能会放弃这种搜寻，但卡特说服卡那封继续争取下一个发掘季的特许权，并且如果需要的话，继续为他本人的工作提供资金。他想要调查帝王谷底的那块唯一未经挖掘的地段。这是位于拉美西斯六世墓前面的一块不大的三角地，之所以保留未动是为了方

便游客们接近那座拉美西斯六世的陵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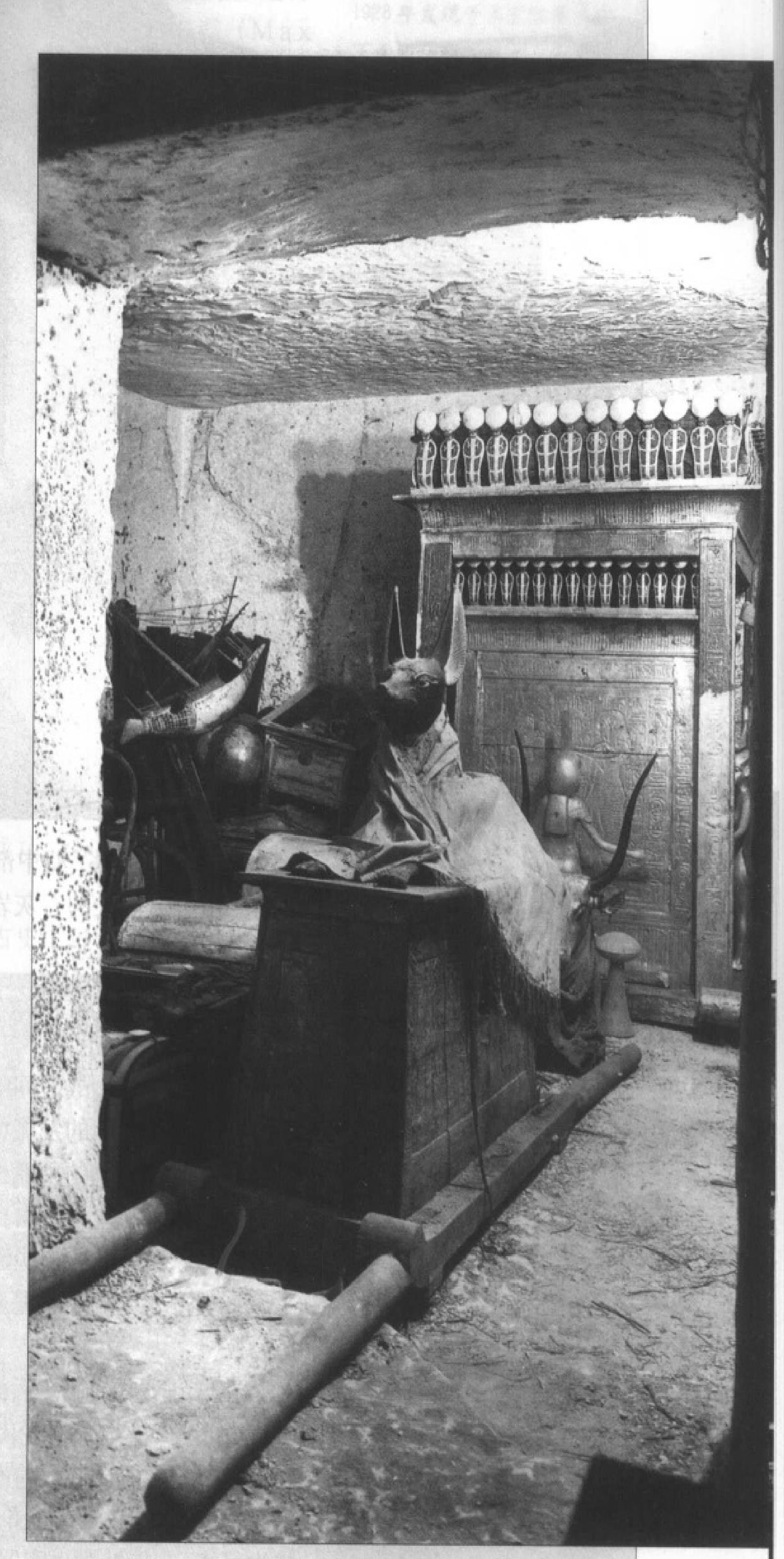
发掘是在1922年11月1日开始的。3天过后，卡特在古代工人的临时屋舍下面发现了第一道通向图坦哈蒙墓的石阶。第二天，他到达用胶泥封堵的入口处，并向远在英国的卡那封发电，通告他的发现。很快这一发现就成了世界上的重要新闻。最后，在11月26日，卡特同远道赶来的卡那封为伴，打开石门进入了陵墓，他们眼睛都凝视着前厅——这是考古史上伟大的时刻之一：

> 起初我什么也看不见。墓室内的热气夺门而出，致使蜡烛闪烁不定。但现在当我的眼睛逐渐习惯了室内光线时，屋里的各个细节就缓缓地从迷雾中浮现出来：奇异的动物、雕像和黄金，到处都金光闪耀。此刻——对于站在旁边的其他人来说，这也许是永恒的一刻——我惊异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卡那封勋爵已等不及了，焦急地问："你能看到什么吗？"我能做的一切就是设法说出这句话："是的，奇妙的东西。"

更奇妙的东西是随后知道这个前厅仅仅是4个主要的房间之一，每一间都如卡那封所写的，堆满了"床、箱子和各种可以想见的东西"。墓室本身证明是陈放法老木乃伊的地方，法老有3层棺，内棺是纯金的，还有一口沉重宽大的石英棺，另有3个镀金的木质椁室，一个套着一个。

最初的激动一旦过去，卡特便要面对如何处理这一巨大发现的问题。约36000镑资金是卡那封和一家与《伦敦泰晤士报》有关的报纸（尽管这份报纸在政治上很愚蠢）捐助的。不久卡特集合起一支由来自世界各地博物馆的专家们组成的强大队伍，其中有来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著名摄影师哈里·伯顿（Harry Burton）和来自开罗的化学家及文物保护专家阿尔弗雷德·卢卡斯（Alfred Lucas），后者在附近塞提二世的空墓中建立了一个田野实验室。对数千件墓中出土文物加以记录、保存和运往开罗的工作慢慢地展开了，这项工作使卡特和他的考古队用去了10年时间。

当人们在古墓中忙碌的时候，1923年4月5日，卡那封勋爵因蚊子叮咬而引起的脓毒性肺炎而在开罗逝世。关于"图坦哈蒙的诅咒"的传说随之产生。大约16年后，卡特本人在他自己的紧靠伦敦海德公园的优雅寓所中溘然长逝。退休后的他在伦敦十分孤独且疾病缠身，但他在考古学圣殿中的地位却永垂不朽。



披着亚麻寿衣的豺，象征阿努比斯神，守护着通向宝库的入口。它的后面是镀金的棺椁，棺椁里边是图坦哈蒙的遗骸。



皮埃尔·蒙泰（1885－1966年）在查看法老苏塞奈斯一世（公元前1039－991年）的丧葬面罩。它是用不到1毫米厚的金片制作，上面镶嵌着天青石和黑白两色的玻璃。

随葬物丰富的苏塞奈斯墓在1939年被挖开之前一直原封未动，这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一座完全未被惊动过的法老陵墓。除了法老本人的随葬品外，陵墓中还包括他的一个将军万德杰巴恩德杰戴特、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阿迈奈莫普的随葬物，阿迈奈莫普葬在附近一间原为他母亲准备的墓室中。此外还有至今尚不清楚的法老绍什克尔二世的随葬用品。

约30件金银器皿——碗、盘、酒杯、细颈瓶、平底锅属于最丰富的发现物之列。

6.5-8.5米长的划桨，船中部设有领航人的船舱。旁边另一个类似的船坑则没有被触动，由一道巨大的石灰岩石块封存着，供将来的考古学家们利用。

苏美尔人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里，考古学在近东地区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充裕的资金和长时间的发掘使得大量发现问世，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这种令人激动的现象是从较早的莱亚德和博塔时期以来所不曾见到的。通俗的考古出版物比任何时候都多，尤其是出自伦纳德·伍莱笔下的作品。这是一位精力充沛、富有色彩的作家，发表过一些流行的著作，记述了他在迦勒底人遗址乌尔的工作，以及乌尔王室墓地的丰富墓葬。他出版过一本著名的考古学导论《挖掘过去》（1930年）。

在这副公开的面孔后面，是考古学注意力的转移，它开始告别神庙和宫廷美术，以便更广泛地观察古代世界的生活。在类似乌尔这样的遗址上，各次考察第一次着眼于揭示古代城市的大布局，追溯城市布局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发现它繁荣和衰落的线索。战前在巴比伦开发出的处理泥砖的新技能，使得对发掘进行适当分层成为可能，它能够测出陶器和其他家庭用品在风格上的变迁，考古学家迅速确定了不同地区陶器风格的演进模式，在放射性碳素断代法出现之前，他们利用这种古物序列来测定相对年代。这种古物序列有时甚至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经许多挖

掘而产生的陶器和其他人工制品的地层序列，成为意义最为重大的成果。

由于技术性文献日益关注陶器及其制作的年代问题，一般公众也就越来越冷落考古学了。侦探小说家阿伽塔·克里斯蒂在其丈夫马克斯·马洛温（Max Mallowan）于叙利亚从事考古活动期间时常陪伴他，她在《美索不达米亚谋杀案》（1963年）一书中塑造的一个人物，抱怨说考古学似乎过多地关心陶器而不是制作它们的人。在《来，告诉我你怎么过活》（1946年）中，她充满感情地取笑陷入困惑的丈夫和一般倾心于学术的考古学家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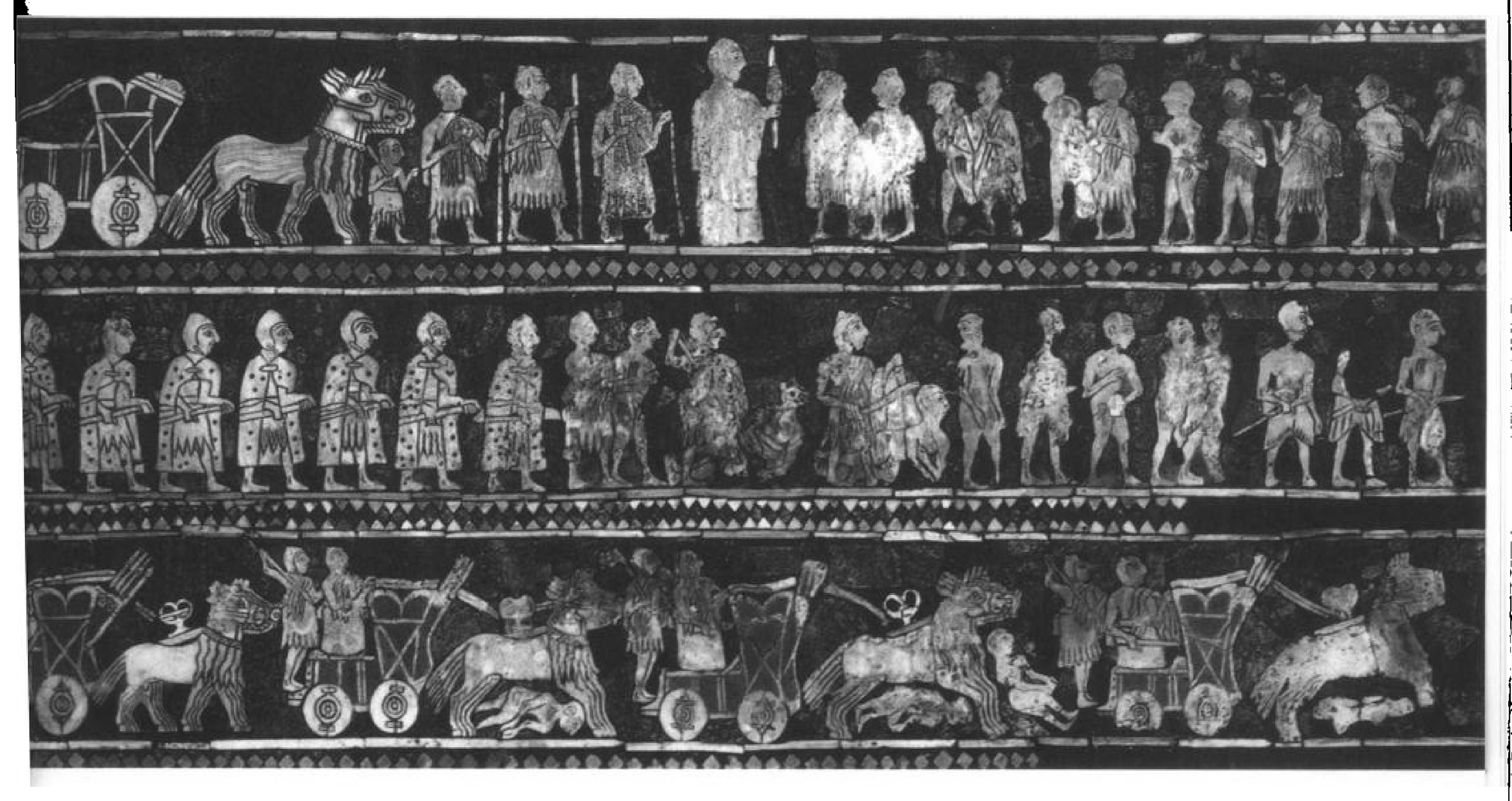
> 他说："我在寻找史前时代的
> 古老陶罐，然后我用许多许多的方法
> 来测量它们。再后来
> 我像你一样开始写作，
> 我的话要比你的长两倍，
> 而且远比你博学多才。
> 它们证明我的同事们都错了！"

正是伦纳德·伍莱率领的英美考察队对迦勒底乌尔的探查，比起在两次战争之间的任何其他发掘都更富有成果，它拂去了覆盖在考古学上的学术尘埃，使广大公众激动不已。从1922年到1934年，伍莱着手挖掘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尔，这使他对苏美尔人有了新的理解。他绘制出有关这个城市历史的一幅全景画，其开端是在几近7000年以前的史前时代，结尾至这座城市在基督降生前后被最终放弃。关于该遗址的技术性描述，篇幅足有10大卷，其成功的程度可以同伍莱的那本通俗作品《迦勒底人的乌尔》（1929年）相媲美。

乌尔的王室墓地是伍莱最难忘的发现，挖出了考古史上最令人惊异的宝库之

所谓"乌尔标准"，最初是一把小竖琴的音箱，伍莱在1927－1928年发现于王室陵墓当中。在下面两块镶嵌板上，苏美尔步兵正驱赶着前面的裸体战俘，由中亚野驴套拉的实心轮战车断后。在顶部的镶板上，国王在接见俘虏，他自己的战车未乘人，由一个侏儒般的马夫牵着。年代在公元前约2600－2500年，这件镶嵌细木的作品是用珍珠母雕刻的人物组成的，镶在天青石的背景上。

伍莱写道："木头底托已完全烂掉了，镶嵌物的小片尽管在土里保持着它们相应的位置，但却相当松散……去除泥土而不致进一步弄乱这些镶嵌物的任务是如此仔细，以至一次仅能处理大约一平方英寸，每一片清理后都被尽快上蜡，但是周围的泥土同滚热的蜡液混合一起，致使镶嵌板的表面一片模糊。当最后从土里取出镶板时，我知道我们已发现了一件非常美好的东西，但却很难准确地说出它到底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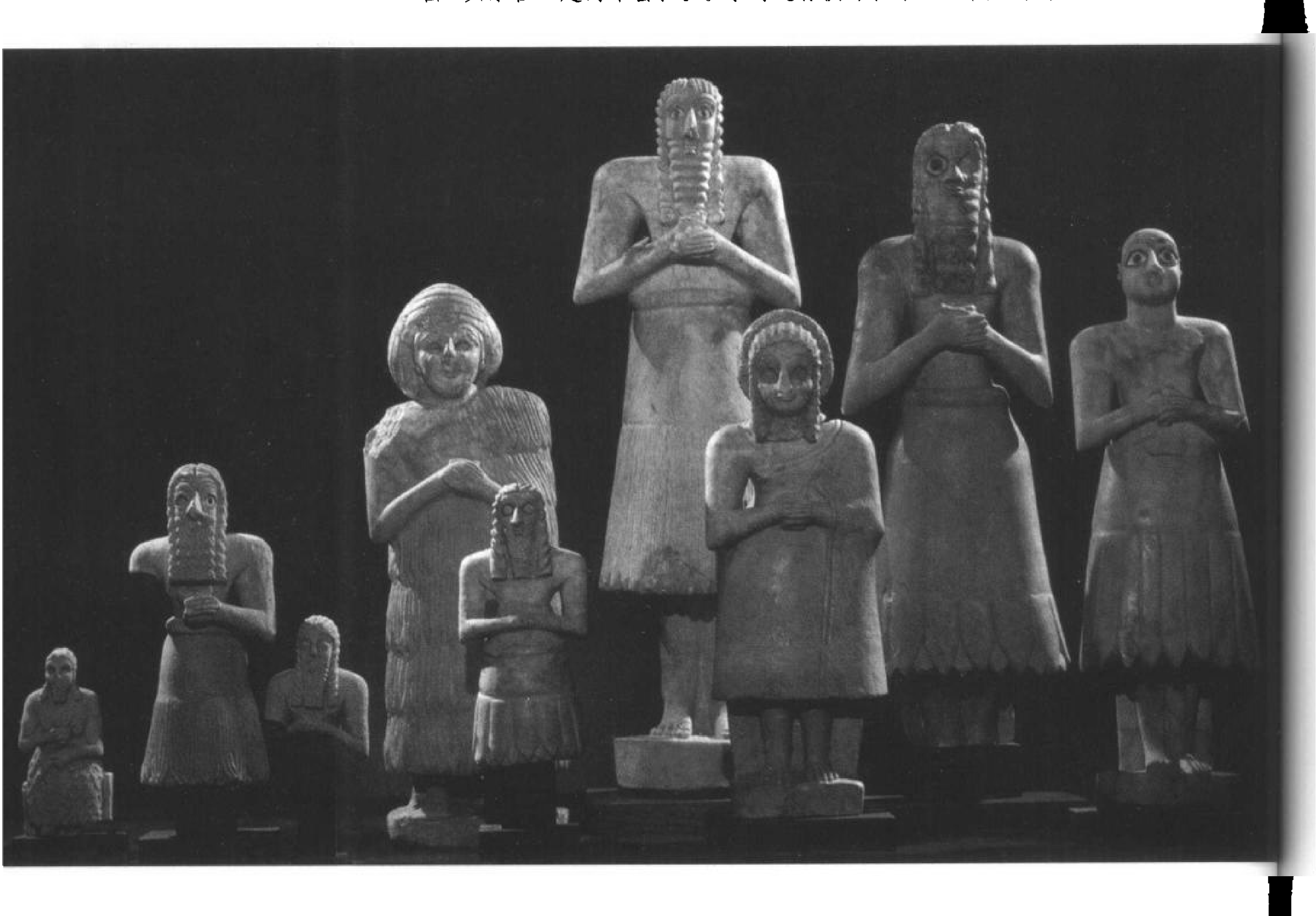


一。这座城市的居民在500年里，一直在满是垃圾堆积物的靠近大神塔的一片空地上掩埋死者。伍莱在这片墓地上发现了2500座坟墓，其中大多数没有多少随葬品，只有一些陶罐和日常生活用品伴随着死者。其他坟墓里的随葬品较丰富，有铜制工具、武器及进口的宝石。极少数墓内——乌尔早王朝时期王室的陵墓——随葬物多得难以令人置信，它们放在石砌的地下圆顶墓室中，由一条陡峭的坡道与地面连结。

有些王室陵墓在古代就遭到盗掘，但仍残留着一些美妙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比如和“乌尔标准”一样的一块用珍珠母和天青石装饰的镶嵌板。其他工艺品包括金银器皿和珠宝，一顶天然金银合金的头盔，武器，饰有金牛头和镶有动物演奏音乐场面的竖琴，还有在丛林中抓获的公羊图案，镶嵌着珍珠母和其他宝石的游戏板，圆柱印，贝壳和石头制成的化妆盘，以及其他的贵重物品。

更加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与王室成员安葬相关的丧葬仪式，伍莱在他的《苏美尔人》（1928年）一书中描述了他发现的一切：

> 国王的下葬要伴随着对人牲的滥用。墓坑的底部堆满了男人和妇女的尸体，他们似乎是被人带到这里，就在他们站立的地方被杀掉的。在一个墓内，有一些头戴铜盔、携带长矛的卫兵人殉，倒在通向墓内的陡坡下方。正对着墓室尽头处是9位宫女，戴着精致的黄金头饰。入口前方是两辆四轮大车，由3头系在一起的牛套拉。驭手的遗骨横卧在车上，牛头的附近则有牛夫的



遗骨。

另一墓内殉葬有68个女仆和6个男仆，仍然穿着宫内的艳丽服装。伍莱把这里称作“祭坑”，他评述道：“目击这些牺牲品的遗骸，望着压碎或破损的头骨上铺撒的黄金花瓣和绚丽多彩的小珠，那景象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但在发掘一个像去年冬天挖的那种巨大祭坑时，我们并没有完整地看到它是什么样子，而只是在一定时间里搞清楚了其中的一部分。”

王室墓群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公元前三千纪的苏美尔人的认识。尽管伍莱发现了晚后时期的神庙和平民的住宅，包括公元前两千纪早期汉谟拉比时代的一个完整居住区，但他在发现早王朝时期的城市一事上却所获甚少。另一支赴伊拉克的考古队在这方面则要幸运得多。和同时代对雅典广场的挖掘一样，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得到了约翰·D·洛克菲勒的资金支持，于1930到1936年对巴格达东北部迪亚拉盆地中的卡法杰和阿斯马尔丘展开了发掘。考古队由艺术史家亨利·法兰克福（Henri Frankfort）率领，出土了早王朝时期稠密的居民区。居民区内，围绕院落形成的房屋群落沿街道和小巷拥挤在一起。某些死者就葬在他们自己房屋的地板之下，通常在圆顶的砖砌墓室中还安放一些随葬品。在不同时代（公元前3000 - 1800年之间）修建的一些神庙和宫殿也被挖了出来。在阿斯马尔丘，最令人难忘的是阿布神的庙宇，那里有一些隐藏神灵及其崇拜者雕像的地方，高1米（39英寸），它们传递给现代参观者一种有力的感觉，即那些睁大双眼、现出敬畏神情的苏美尔人感到了神灵的存在。

在乌鲁克，德国考古家朱里乌斯·乔丹（Julius Jordan）有过长期的发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这种发掘持续进行，其注意力尤其集中在宗教建筑上，即苏美尔女神埃南那的庙宇——恩那庙上。这项工作发现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开端，时间几乎比乌尔王陵早1000年。在这个时期里，苏美尔神庙为保存自身活动的遗迹而首次发明了楔形文字和圆柱印章。

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史前史

马克斯·马洛温先前曾与伍莱一道在乌尔工作，1927年又帮助英国考古队重新发掘尼尼微。他挖了一道直到生土为止的窄沟，距土墩表面26米（85英尺）。他发现了厚达21米（70英尺）的位于著名的亚述王宫和神庙的层次之下的考古堆积层；从较低土层中出土的早期的彩陶，与先前在哈拉夫土丘和卡凯米什发现的陶器属同一类型。马洛温因为希望发现更多的诸如此类的早期文化，所以随后便挖掘了附近的遗址阿帕奇亚土墩。他取得了明显成功，出土了属于哈拉夫文化的早期农村遗存，这一文化在公元前6000 - 5000年间曾流行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在阿帕奇亚，房屋呈锁孔形状，有一个周长9米（30英尺）的圆形房间，经一条长方形的过道进入室内。外边是碎石铺设的小胡同，穿行于各家各户之间。村里还有一些面包炉，比烧制精细陶器的炉窑要多一倍。陶器上的几何形彩绘花纹色彩斑斓，精美绝伦。1935年至1939年间，马洛温转移到叙利亚北部，挖掘了巨大的查加尔巴扎土墩，在那里他找到了哈拉夫文化与公元前四千纪至三千纪

左图：石灰石雕像——崇拜者，眼睛是用贝壳镶嵌出来的，芝加哥大学考古队在20世纪30年代发掘期间，发现于伊拉克的阿斯马尔丘（古代的埃什努纳）。雕像年代属公元前2700年左右。

不戴帽子，膝盖以下裸露着，并对欧洲人习以为常的胡子、长统靴和遮阳帽大惑不解的美国人来到近东后，标志着一种巨大的变化。这时的欧洲机构里的英国考古学家塞顿·劳埃德曾提到：

看来狠不得把一便士掰成两半使，以保证他们田野发掘的开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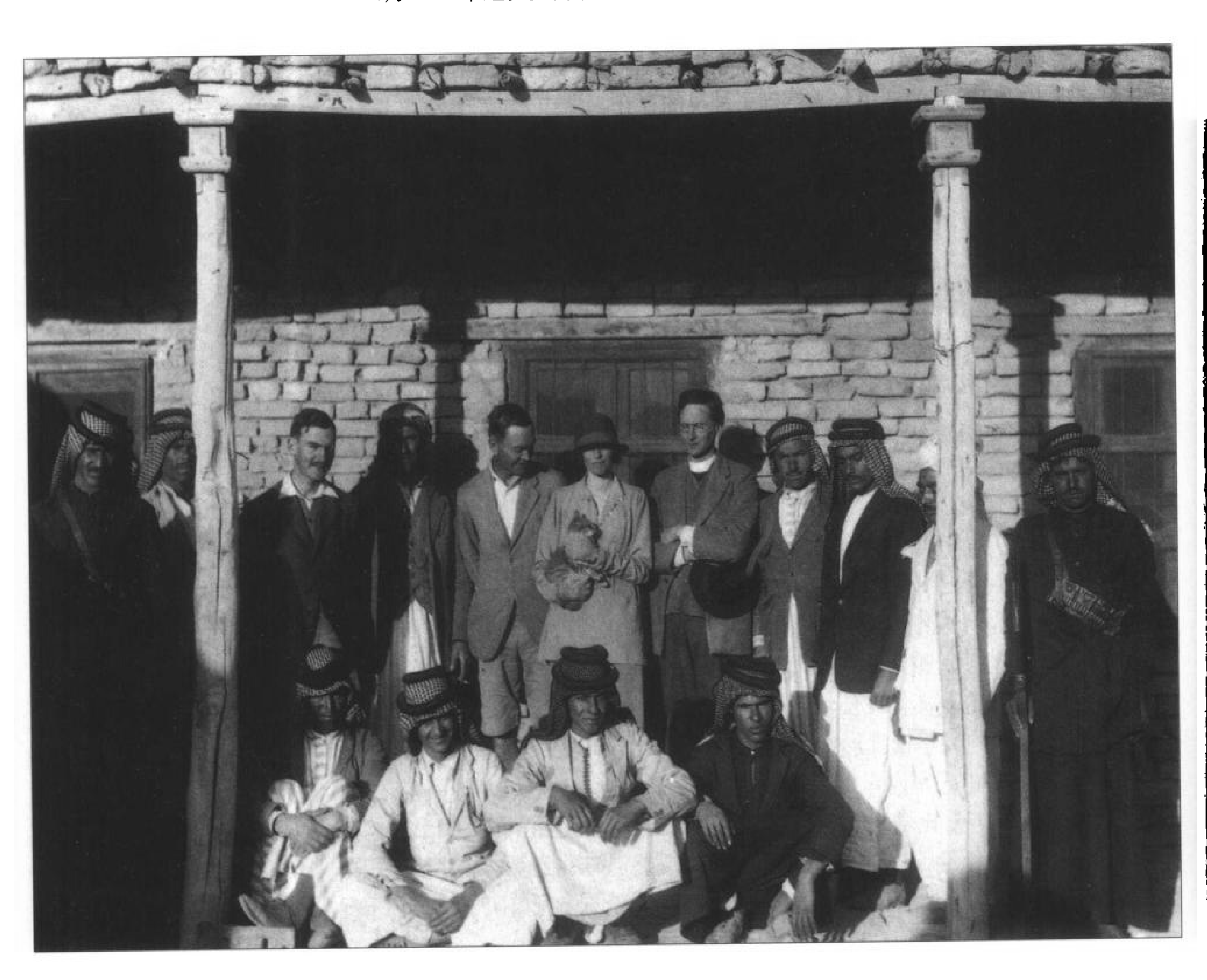
结果，特别在英国的营地上，就形成了一种个人吃苦耐劳的传统，作为对实际田野工作中发挥超经济因素和施展最大潜力的唯一选择。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这种情况由于有富裕的由美国大学资助的、装备精良的考古队的到来而越发明显起来。在它们中间，值得注意的是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考古队，现在正致力于在整个近东和中东建立一个细密的研究站网……

在巴格达以东40英里远的阿斯马尔土墩，建立了一个拥有装备齐全的摄影工作室和实验室的沙漠站点，它成为发掘最有价值的苏美尔遗址群（离最近的现代居民点有20英里远）的中心。

的苏美尔人具有联系的证据。他的发掘还在史前史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在查加尔巴扎遗址的较低层次中，有一个属于哈拉夫文化的村落。在此村落之下的文化层中，马洛温发现了与此前在巴格达北部萨马拉出土的陶器属同一类型的彩陶。这一发现——萨马拉陶器或萨马拉文化比哈拉夫文化要古老——成了目前构建起来的有关近东的完整认识体系的基础。

如同在埃及那样，法国人在叙利亚始终像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人一样活跃。20世纪30年代，安德鲁·帕罗特（André Parrot）开始挖掘占地600公顷（1500英亩）的哈拉里土墩，这是古代马里城遗址，位置在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叙利亚境内。这个项目一直进行到今天。帕罗特的工作揭示了两个主要的文化期：公元前三千纪中期（早王朝时期）和公元前两千纪早期（古巴比伦时期）。辛里－林姆（公元前1782－1759年）的古巴比伦王宫有300个房间，它收存的档案材料使我们有可能对汉谟拉比时代产生一种新的理解。这些档案反映了一个重要王国的行政和外交关系，即这个王国处在一个尚没有单个力量能够独霸西亚的时代。约20000块楔形文泥版文书——该时期政治经济史的基本史料——揭示了这个国家外交关系和军事战略的变化，它的贸易关系、经济组织和技术状况，以及定居社会和游牧社会之间存在的有时不大融洽的关系。

从1929年起，克劳德·谢弗（Claude Schaeffer）挖掘了青铜时代的沿岸城



市拉斯沙姆拉（古代的乌伽里特），开始了另一项持续至今的法国研究计划。尽管乌伽里特自从公元前约6000年至公元前约1200年间几乎一直有人居住，但谢弗却对该城市最后两个世纪的历史予以了特别的注意。乌伽里特在这个时期是赫梯帝国的附属国。这个城市的一大半得到了发掘，挖掘出了宫殿和精致的墓葬、神庙和私人住房，以及一个距此几英里远的港口。乌伽里特的艺术，尤其是出自宫殿和神庙的艺术作品，证明它融埃及、赫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成分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清晰的叙利亚风格，这与它作为一个长距离贸易的中心地位是相适应的。

从乌伽里特还出土了无可数计的泥版，包括行政记述和宗教、文学作品，它们有力地说明了赫梯和埃及帝国争霸期间叙利亚北部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它们还记录下了神话和宗教文化，犹太一神教最终是从这些神话和宗教中脱胎而来的。乌伽里特诸神代表自然的力量，关于他们的神话涉及生殖能力、生死循环——在任何农业社会都能够得以幸存的重要神话内容。作为雷雨之神，巴力是乌伽里特最重要的神祇，许多神话都谈到他同死亡和不育的斗争。“亚哈[①]是安利之子，在上帝的眼皮底下作恶，超过了其他所有在主面前的人……他在巴力的庙堂中为巴力建起一个祭坛。”（《列王记》第Ⅰ卷，第16章，第30－32节）。《旧约全书》中对巴力和有关雕塑形象的这种敌视表明，巴力崇拜在古代黎凡特的宗教文化中是多么根深蒂固。

左图：马克斯·马洛温（1904－1978年）、后排左起第三人、1926年在乌尔考古实习期间。照片摄于考古队队部的阳台上，中央三人是伦纳德·伍莱、凯瑟琳·伍雷和考古队的碑铭学专家埃里克·伯罗斯。

他们构成了一组对比鲜明的很奇特的三重唱。马洛温后来回忆道：“在发掘期间，伍莱始终和蔼可亲、温文尔雅和十分友善，但又如所有成功的考古发掘领导人一样，在某件事上他又必须是一位暴君。不过他始终是公允的，从来不做对他来说过犹不及的事”。

“他的妻子凯瑟琳·伍莱始终陪伴着他。她个性很强，独断专行……她的第一次婚姻是一场灾难。蜜月过后没有多长时间，她丈夫就在大金字塔下开枪自杀了。她嫁给伍莱并非情愿，她需要一个男人来照顾她，但却不想过肉体上的婚姻生活。凯瑟琳是位有天赋的女人，当她喜欢做一个女人时，是非常迷人的，但是猫……”

伯罗斯是位超凡脱俗的神父，来自牛津的耶稣会。他是位越发可爱的人物，“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我在乌尔周围漫游”，马洛温回忆，“总能看见伯罗斯戴着他那顶黑帽子，蹲在我们那个没有房顶的露天厕所里，参观大神塔顶部的人都能对此一览无余。”

《圣经》考古

皮特里于19世纪90年代引进巴勒斯坦的地层学发掘方法现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他自己在1926年返回这个地区后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他重蹈他在近40年以前在埃尔－亥西土墩所摈弃的老路，无视近些年来在挖掘巴勒斯坦土墩方面所取得的技术进步。这一点在他发掘埃尔－阿祖尔土墩时表现得特别明显（1930－1934年），他处理这个遗址使用的仍是前一代人的方法。这位近东考古的巨人现在所具有的“影响，就技术方面而言，大部分……已陈旧过时了”。

虽然某些早期的发掘者（如赖斯纳）使用了复杂的技术，但在黎凡特地区的发掘标准仍然是很低下的，如同惠勒在他的自传《发掘不止》（1955年）中所尖锐评述的一样：

> 从西奈边界到米吉多，再到毕布罗斯和北叙利亚，我所见到的一些技术标准在近25年的大不列颠是无法忍受的……对地层进行科学分析是现代发掘的主要基础，但在这里几乎就不存在。发掘工作是在一种挥霍放任的、因而是具有破坏性的状态下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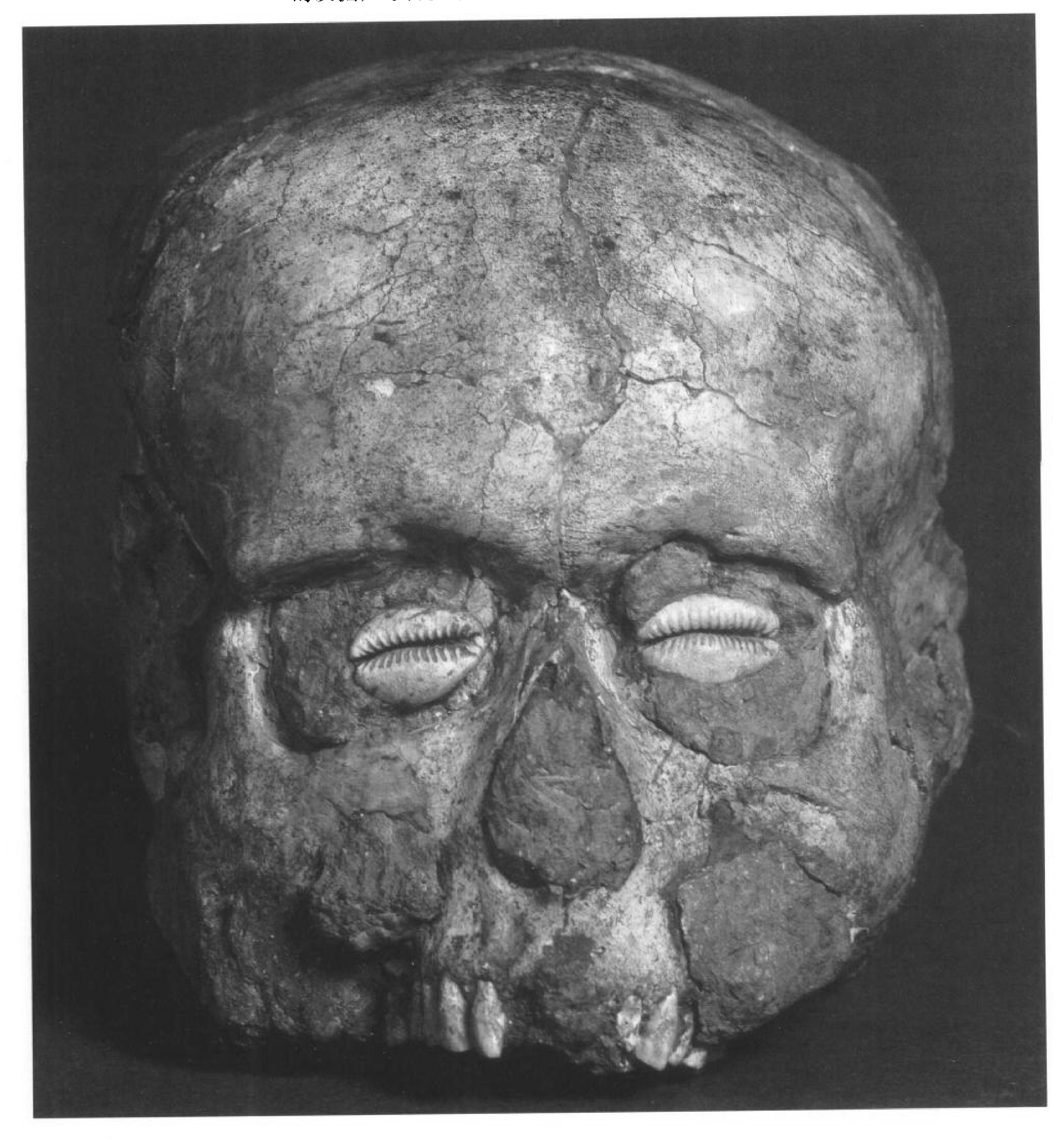
詹姆士·布雷斯特德（James Breasted）率领的芝加哥大学考古队于1925－1939年对米吉多（《新约全书》中的哈米基多顿[②]）的发掘便以挥霍浪费而闻名，考古队的住地甚至修筑了网球场。布雷斯特德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开始发掘工作的，这就是从顶部到底部逐层地发掘整个土墩。但米吉多因为是一个庞大的遗址，有大约17米（55英尺）高，占地超过5公顷（12英亩），所以这样做在实践中是行

① 圣经《旧约全书》中背叛耶和华的以色列国王——译者注。
② 基督教经书所说的善恶大决战的地方——译者注。

不通的，特别是在经济大危机期间经费短缺的时候。即便如此，这次发掘工作还是挖出了遗址上层的5个城市（定年在公元前1000至350年），在某些地段挖到较深的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层（距今近5000年）。一些最惊人的发现属于公元前10世纪。发掘者们发现，这一时期该城镇建成的很大一部分建筑物是国王所罗门的马厩，这证明了《圣经》中的记载，即“所罗门把战车和骑兵集合在一起，他拥有14000辆战车和12000名骑兵，他将这些部队驻扎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城市当中”（《列王记》第Ⅰ卷，第10章，第26节）。

1931－1935年，一支英国考古队对北部的以色列王国首都撒马利亚展开新的发掘，考古队中包括一位以坚韧不拔而闻名的女考古学家卡特琳·凯尼恩

凯尼恩在耶利哥发掘出的人头骨，约属公元前8000－7000年。这具干燥头骨的一些特征是用泥土加工过的，上面抹了胶泥，并被涂上了颜色。眼窝处嵌入玛瑙贝壳充作眼睛。



（Kathleen Kenyon），她曾在英国惠勒主持的对罗马遗迹的发掘中受过培训。这种训练重视严密的地层学分析，挖掘要依循每一新暴露出来的文化层的波动曲线，同时要测量挖掘现场，画出将不同发掘地块分离开来的隔离线。现在凯尼恩把这套方法运用到近东，首先用在对撒马利亚的发掘上，后来又用在两个最复杂、最具发掘价值的巴勒斯坦遗址上：一个是耶利哥，一个是耶路撒冷。在撒马利亚，发掘验证了赖斯纳先前的结论，发现了城墙环绕的王家城堡，这是由国王安利和亚哈按腓尼基样式建造起来的。这些建筑物里出土了华丽的、原本是装饰木制家具用的象牙雕刻镶嵌物，还出土了希伯来人的陶片，即刻在陶器碎片上的铭文，记载着交纳的税赋。这座城市的辉煌历史在公元前721年结束，亚述军队攻下了这座城市后，城中居民如鸟兽散，逃到尼姆鲁德、歌珊（哈拉夫）以及其他地方。

在耶利哥，凯尼恩于1952－1958年发现的证据表明，这一土墩的文化遗迹可以从青铜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推前到冰河时代末期（约公元前10500－9000年）的纳吐夫文化。但正是在这里发现的有防御墙环绕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聚落（存在于大约公元前9000－6000年），才产生了惊人的结果：耶利哥从此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凯尼恩很快在纳吐夫文化层的上方，发现了一个农村，村民还没有使用陶器。如她所称，这一“前陶新石器”文化有一些令人吃惊的地方。在其早期阶段，一堵高3.6米（12英尺）的石墙和一道深至岩床的大沟环绕着方圆4公顷（10英亩）的定居点。一座塔楼高9米（30英尺），用石块建造，内有楼梯，背依村落的围墙而立。这是一座不朽的石砌建筑，凯尼恩把它看作是一处防御工事，但现在更为合理的解释似乎是用来分流洪水的装置。

在前陶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房基下的墓葬中有时包含着人头骨，死者的面部被用泥做成模型，眼窝处嵌入玛瑙贝壳充作眼睛。20世纪30年代在耶利哥较早期的发掘中，还发现了一些真人大小的泥像，泥像的面部也用类似的方式来表现。凯尼恩则挖出了一些附加的残片。最近在约旦埃恩伽扎尔遗址的发掘已进一步地发现了同样风格的例证。

在发掘撒马里亚和耶利哥之间的一段时间，凯尼恩继续在英国和北非发掘。但对她而言，就像对其他考古学家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他们在近东的研究。但伊拉克是个例外。在这里，英国考古学家塞顿·劳埃德（Seton Lloyd）发掘了哈苏纳——扎卜河上的一个早期农业村落。他发现了比马洛温在阿帕奇亚和查伽巴扎尔所确认的哈拉夫文化还要古老的一种新石器文化。有些哈苏纳的陶器上有彩饰；有些则比较粗糙，只有一些刻饰。还有一些同查伽巴扎尔遗址最底层出土的陶器相同，彩饰具有撒马里亚风格。战后对其他遗址的发掘确定：哈苏纳文化开始于公元前七千纪，这类农村是目前已知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早使用陶器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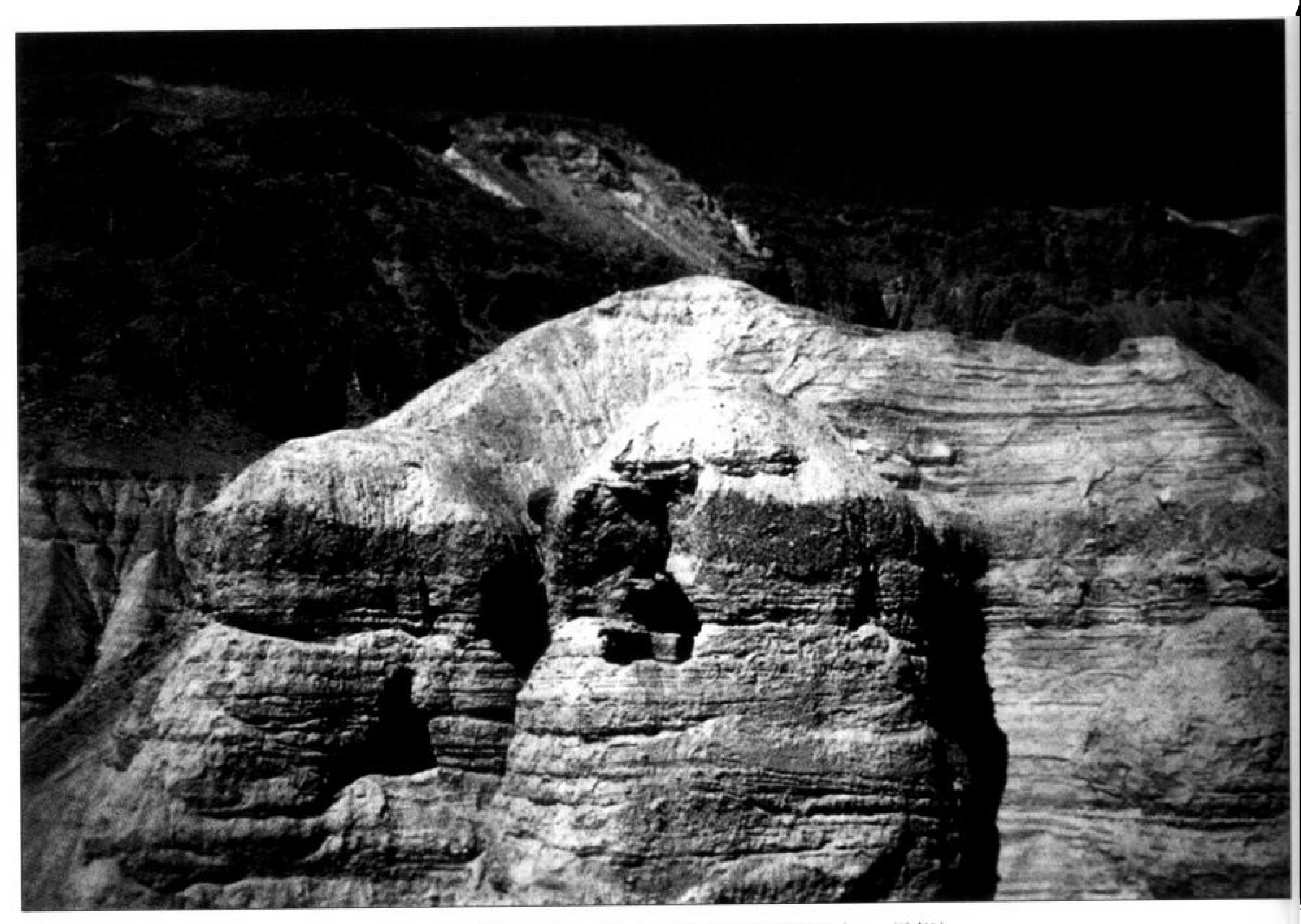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给近东带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和平”时期和缓慢而艰难的恢复期。考古工作重新开始，但同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间相比，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发掘的遗址为数很少。战后考古学的成就总的说来也没有先前的成就那么显著。发掘者们继续致力于发现那些未经盗掘过的、含有丰富随葬品的坟墓，以及秘藏的珍贵文物和精美绝伦的早期艺术。但在1945年之后，随着认知框架的确立，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填补一些空白上，比如为迄今研究薄弱的

地区制定可靠的年表，对比较遥远的地区——从未形成过类似美索不达米亚那样的先进文明的地区——进行调查。

以色列：探索自己的根源

早在1914年，随着犹太考察学会的建立，犹太学者便在巴勒斯坦考古活动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1922-1948年)，他们主要致力于发掘犹太墓地、犹太教会堂和定居地。以色列国家成立之后，以色列考古学家牢牢地把握了主动权，他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黎凡特地区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文化层，尤其是以色列人到来和定居下来的历史证据。第一代以色列考古学家中最著名的是伊格尔·亚丁(Yigael Yadin)，他是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在以色列立国的早期他是一位士兵和考古学家，后来则是一位政治家。亚丁影响到整整一代以色列考古学家，使以色列考古学成为面向更广阔的世界的学科，在当代的以色列境内挑选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发掘遗址，确定它们在《圣经》史和放逐期后的历史[①]中的地位。两个最具政治意义的遗址就是马萨达和夏琐。

夏琐是青铜时代中期和晚期迦南地区的最重要的城市，自公元前18世纪起进入繁盛阶段。它拥有设防良好的卫城，俯瞰着占地80公顷（200英亩）的庞大的“低地城市”。它于公元前13世纪被摧毁，后来恢复成一座铁器时代的设防城市。亚丁在他所作的关于1955 - 1958年的发掘报告中，根据《圣经》的线索曾对夏



① 指犹太人摆脱巴比伦之囚状态、即放逐状态以后的历史——译者注。

琐考古进行了解释，把它的毁灭归结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约书亚记》第11章、第13节），而铁器时代夏琐的防御工事则被认为是出自国王所罗门之手。

对于犹太考古来说，1947年和1952至1955年间偶然发现的一组写在羊皮纸和皮革上的非凡文献，同样具有巨大的意义。这些文献是在死海岸边库木朗附近发现的，分藏在11个洞穴内的陶瓶里，是《旧约全书》各卷的抄本以及对《旧约全书》的注释，比以前所知的抄本要早1000年。它们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和阿拉米文①抄写的，成文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00年之间。人们认为它们是在紧急关头秘藏起来的文献，属于犹太教的一个崇尚禁欲苦行的教派，即已知的大概以库木朗为基地的艾赛尼派。艾赛尼派在公元66－73年的犹太人暴动期间，被罗马军队镇压。

波斯和中亚

除了巨大的阿黑门尼德王朝的中心波斯波里本身之外，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很少有人知道波斯考古。已发掘的为数极少的遗址，只在一片黑暗的地图之上投射了一丝光亮。20世纪30年代，罗马人格什曼（Ghirshman）发掘了一个含有史前居民点的基扬土墩，该遗址位于伊朗洛雷斯坦省的扎格罗斯山中，年代在公元前5000至1000年间。后来他又在连结中国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大呼罗珊路上的希亚尔克土墩展开发掘。法国人对波斯考古的传统垄断最终是由恩斯特·赫茨菲尔德（Ernst Herzfeld）打破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在伊拉克发掘过萨马拉，现在则在西南部的法尔斯省从事挖掘工作。后来，即1931－1939年，他开挖了波斯波里。

中亚的情况与此类似。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考古学家才发现了公元前三千纪的青铜时代文明，分布在土库曼斯坦的卡拉库姆沙漠边缘一线。苏联考古学家同时广泛发掘了一座占地25－30公顷（50－75英亩）的城市阿尔廷－戴普，该城有城墙护卫，有特征明显的居住区、手工业区和公共活动区。阿尔廷－戴普大概是一批分别控制着一块绿洲的小型城市国家之一。一个带阶梯的平台高约12米（40英尺），或许是一座美索不达米亚大神塔式样的神庙的基座，构成为这个社区宗教仪式的中心。一些象牙和方形印章使人想起在哈拉帕发现的同类古物，它们证明这里与印度河流域有着贸易联系。

在阿富汗与苏联的边境一带，法国考古人员取得重要发现，如在巴克特里亚的奥克苏斯河畔的埃卡努姆，发现了古希腊人的城市。该城约建于公元前300年，建造者大概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亚洲的继承者塞琉古一世。在东方的希腊化城市中，我们对这个城市了解最多。这次发掘出土的城市是按希腊样式建造的，有卫城、剧场和体育馆以及总督的宫殿，殿内铺着马赛克地板。还发现了许多古文物，如陶器、雕塑、铭文和钱币，它们均起源于希腊。但这座城市的其他成分是波斯式的，或者说甚至是美索不达米亚式的。例如，一座神庙具有传统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地板布局和建筑细节。埃卡努姆因此是亚历山大试图创建一个结合希腊与波斯文化的新社会的考古体现，说明希腊对北印度的影响来自巴克特里亚，而这个问题是坎宁安和马歇尔在世时印度考古调查署优先注意的问题。

① 古代西亚的一种通用语言——编者注。

左图：库木朗的洞穴，公元1世纪的死海古卷便藏在这些洞内。某些古卷被放射性碳素断代法确定为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的作品，因而它们在被藏匿时就已经很古老了。

现在我们知道，大量的古卷和残片可以分成三类：除开缺漏的一卷之外的整个《旧约全书》的抄本；一些《圣经》之外的著作，如《挪亚书》；特定的宗派性著作，如所谓的《训诫指南》、《战争卷》和8米（27英尺）长的《寺庙卷》。正是最后这类著作提示人们，这些古卷从整体上说是一个严格的犹太教派——艾赛尼派的文献，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曾经记述过这个教派。

对古卷的解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极其激烈的学术争论，而古卷的出版速度如同蜗牛爬行般的缓慢。此外，考古学界关于库木朗社会的性质也存在分歧。

死海古卷在当代世界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至今其意义仍无减弱的迹象。古卷在1993年被宣布为巴勒斯坦民族的文化财富，这激起了犹太复国主义社会的愤怒。

当同一支法国考古队在巴克特里亚东部发现了绍尔图盖居民点时，印度文明和中亚的联系问题便进一步成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所关注的焦点。这个居民点出土的建筑物、陶器、刻印以及其他人工制品，同哈拉帕出土的古文物非常相似，以致人们认为这个遗址是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哈拉帕的一个殖民地，是一个穿越高耸入云的兴都库什山、距离印度中心地带约650英里的哈拉帕文化的前哨据点。法国考古工作者在巴基斯坦继续展开的发掘已对这一看法提供了进一步支持，因为他们在梅赫加尔以及印度次大陆西部俾路支山乡的其他地方发现了一种丧葬崇拜，其中包含一些典型的中亚物品，年代属于阿尔廷－戴普文化鼎盛期刚过的一个时期。许多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巴基斯坦的墓葬和窖藏反映了中亚人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向南部迁徙的历史。

还是在梅赫加尔，法国人发现了一种很漫长的早期文化史，时间可回溯到公元前七千纪。它也显示出：在一个简单的农耕社会内部，手工艺和专门化的职业得到了发展。在其最早的阶段，梅赫加尔是农村，种植小麦和大麦，没有陶器或家畜，但却有既定的长距离的交往联系，输入进来异乡他处的蓝玉和海贝壳。早在公元前五千纪，这个村子就拥有依靠输入的原材料进行加工的金属加工术。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村子开始制作陶器，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专业化的陶器制作中心。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为止，它制作的陶器制品已流行于这个地区。梅赫加尔遗址的最为重要之处，是它对说明印度文明的起源具有特殊的意义。

印度文明

右图：摩亨佐·达罗城堡，从西北部拍摄。该城堡建在一个巨大的泥砖台基上，由一道高13米（43英尺）的砖砌堤防抵御印度河的洪水，构成这座城市民事、宗教和行政活动的中心。它的最显著特点是有一个大澡堂，事实上是一个用沥青黏合的砖砌游泳池，供仪式性的净化之用。池深3米（10英尺），底部面积12×7米（39×23英尺）。

城堡东侧的下面是经严格规划的城市，由两层的房屋构成，能容纳大量人口，人数估计约有35000－40000。

在这张照片上，有一座兴建于公元2世纪的佛教寺庙，用城砖建造，已被遗弃了几千年之久。高出其他古建筑许多的，是一些塔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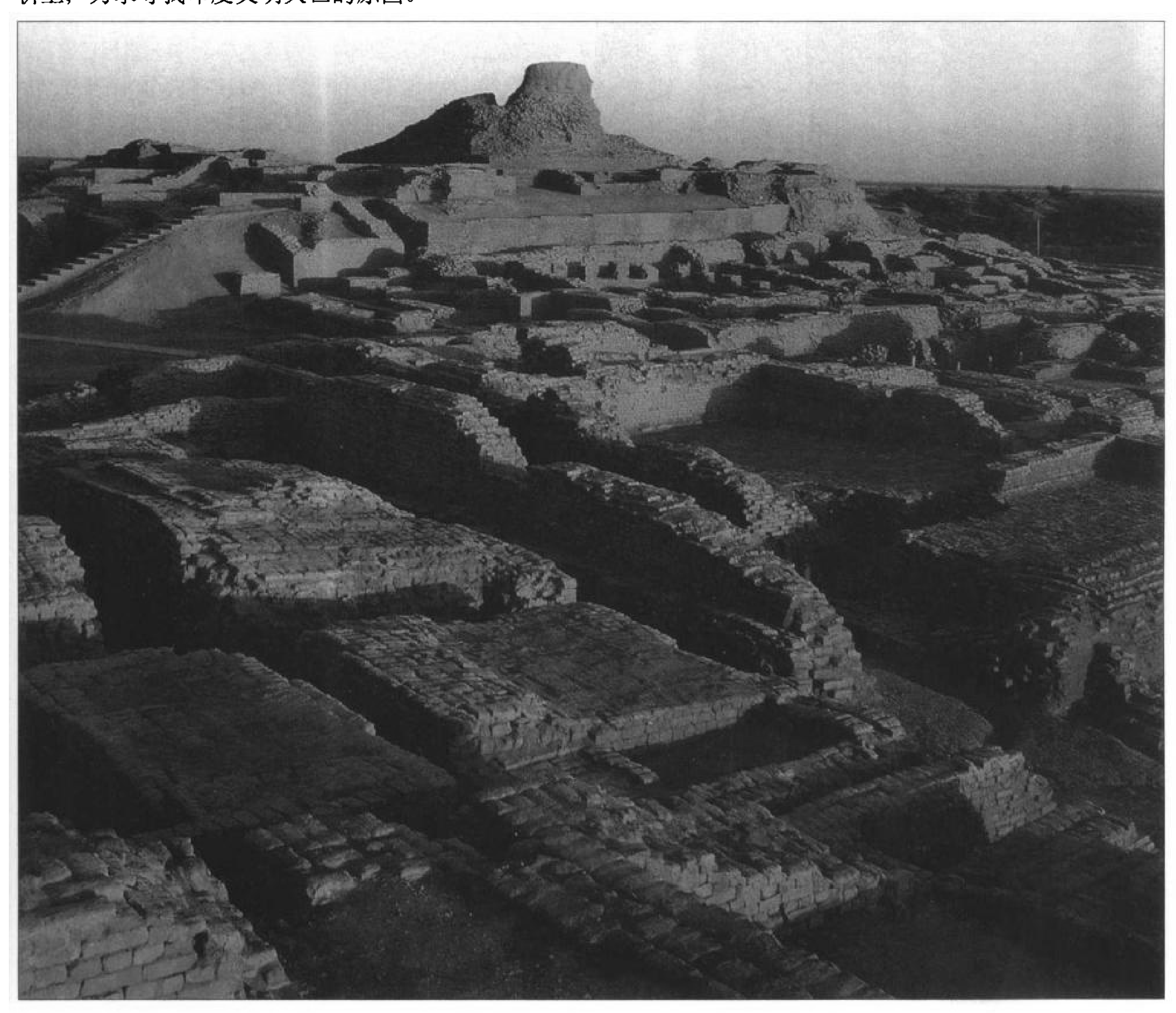
尽管马歇尔的个人兴趣在于塔克西拉和印度北部边远地区的希腊人，但他的注意力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却明显地有所转移，这是因为他认识到了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古代伟大的文明之一，即约公元前2500－2000年的印度文明——的意义。这两处遗址在19世纪中叶已被认为是古代的城市。在旁遮普省的哈拉帕，土木工程师威廉·布伦顿（William Brunton）在19世纪50年代修筑卡拉奇至拉合尔的铁路期间，曾洗劫过这座占地80公顷（200英亩）的古城，目的是搜罗熟砖，供铺设铁路路基之用。他的工人们收集到一些作为印度文明特点的方形磨光石印章，坎宁安在1856年访问这里时曾购买过这些印章。尽管他对这个遗址很古老这一点有所察觉，但他对印度历史编年的想法以及他对历史考古的优先注意，妨碍了他去发现这个遗址的全部含义。他把它定年在公元一千纪早期。

达亚·拉姆·萨尼（Daya Ram Sahni）自1920年起开始在哈拉帕展开系统发掘，很快便发现了遗址所具有的史前特征。几乎与此同时，在信德省的摩亨佐·达罗，1922年开始在那里进行发掘的R·D·班纳基（Banerji），在一座佛塔下面发现了史前居民点。这些在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首次发掘，出土了带有铭文的印章、彩陶和其他人工制品，它们同先前人们所知的印度文物完全不同。考古调查署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积累起来的印度考古知识，没有改变坎宁安的看法，即印度次大陆已知的最早古迹只能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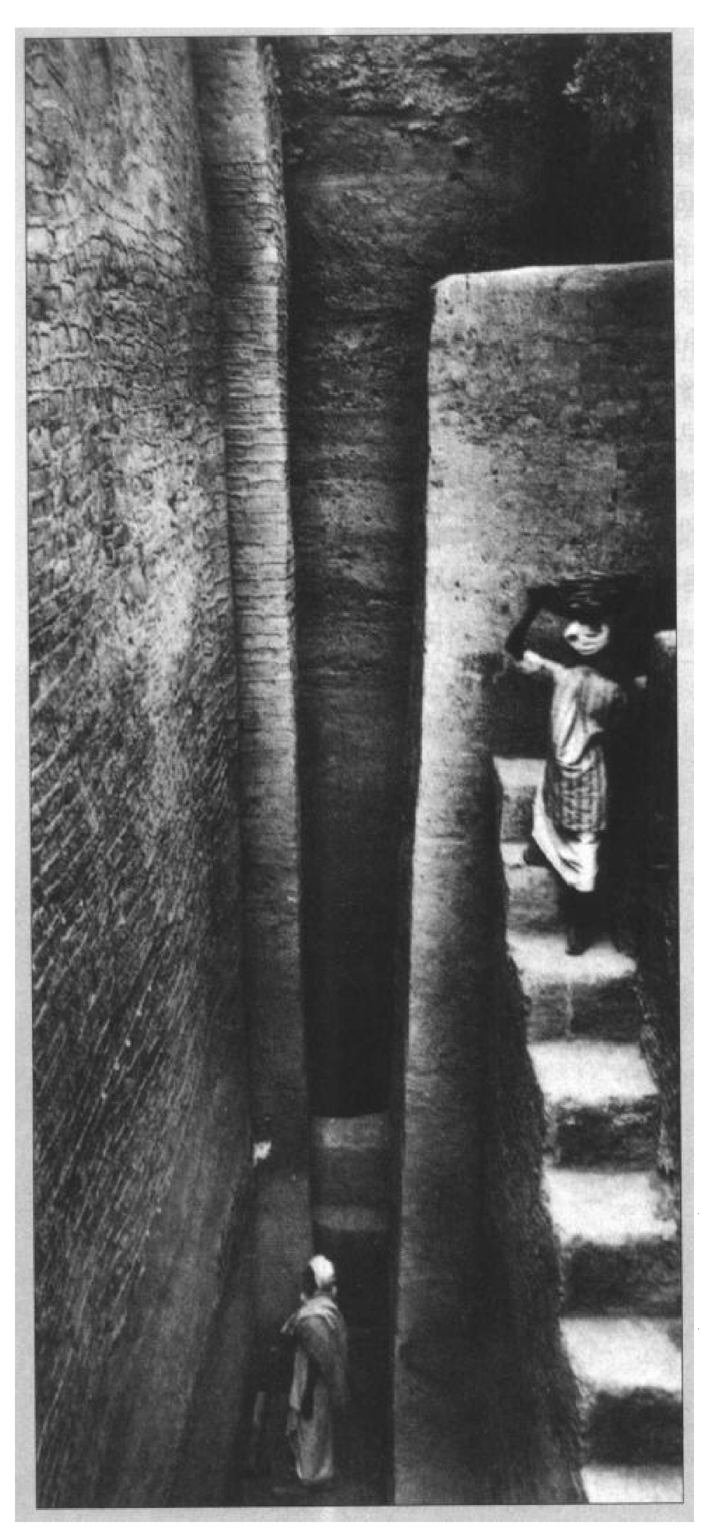
面对一个明显的新的文明之谜，马歇尔于1924年在《伦敦配图新闻》上描述了萨尼和班纳基的成果，如他后来所写，希望"通过拥有广大读者面的期刊为中

介，我也许能成功地吸引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家对它们的年代和特征提出某些解释。我很高兴地说，我的这个希望立刻就实现了”。在随后几期杂志中，一些苏美尔考古的专家注意到了伊拉克出土的文物，这些文物为新的印度文明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年代，即属于公元前四千纪或三千纪。

在随后的20年里，考古人员又对印度文明进行了紧张的调查。在摩亨佐·达罗的发掘延续了10年，这些发掘起初是在马歇尔的指导之下，后来则由一位具有在伊拉克和巴林进行过比较年代研究经验的考古家厄内斯特·麦凯（Ernest Mackay）主持。同一时期，奥勒尔·斯坦因和N·G·马宗达（Majumdar）进行的发掘挖出了另外一些不仅属于印度文明，而且属于印度和山区周边地区的前人或邻人的遗址。马宗达于20世纪20年代对印度平原西部边缘地区的实验性发掘，发现在朱卡尔的陶器上有一种“颓败的”印度陶器风格，层次在典型的印度彩陶之上。另外在阿姆里，他出土了一种前印度（或早期哈拉帕）文化。马宗达在1938年被土匪所杀，当时他正在科尔塔山寻找早期遗址。莫蒂墨·惠勒在1944年被任命为印度考古总监，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初始阶段的发掘工作。惠勒在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一直挖到1946年，工作集中在城市建筑古迹和深入的地层学分析上，力求寻找印度文明灭亡的原因。



莫蒂默·惠勒和印度考古



审慎地探索过去。惠勒在印度南部阿里卡梅都(右图)以及在今天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哈拉帕(上图)的发掘。尽管哈拉帕的宏伟城墙是用比土坯更易保存的熟砖建造的,但当前地下水位上升所带来的盐碱和腐蚀性矿物质正威胁到这座废墟的基础部分。

莫蒂墨·惠勒对1944到1948年间的印度与巴基斯坦考古具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至今没有完全消失。他于1938年应邀考察印度考古调查署的状况，该署自马歇尔在9年前退休之后就陷入停滞状态，近东考古学家伦纳德·伍莱已对此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指出缺乏训练是问题的关键。伍莱写道:

> 发掘是随心所欲的，无论开挖一个新遗址还是清理一个已经提供了一些基本信息的旧遗址，都不是出于良好的科学理由……在我访问过的每个遗址上，都有证据表明，工作是以业余方式展开的，尽管那里的人的确想做好工作，但他们没经过充分训练，也没有经验，不知道高质量的工作是什么。

1944年，由于利比亚的陷落而脱离军职之后，惠勒中校经伍莱提名，被任命为印度考古总监，并一直担任该职到1948年。惠勒公开宣布他的工作目的有两个：在考古学上发现继印度北部印度河流域文明之后的是什么文明；对罗马同印度南部的贸易进行调查，以便为这个地区编制一个具有扎实基础的文化年表。为了实现这些目的，他还计划培训"将使我们获得成功的年轻一代的"发掘技能，即培训考古调查署的印裔成员的发掘技能。

惠勒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在塔克西拉和其他遗址上用地层学的发掘方法训练学生，并挖掘了印度北部和印度南部的遗址。考古史家格林·丹尼尔回忆道:

> 惠勒办的第一所考古学校"是各种教义和人种的混合体。他热切地提议大家忽略其宗教和饮食上的偏见。学校有一间餐厅，有些学生对它有所抱怨。他以军人般的激情对他们发表讲话说：'我们在这里都是同样的人，我对锡克人、帕西人、印度人和穆斯林一视同仁，我们都是印度的考古工作者，如果你不喜欢这一点，就请你卷铺盖回家去。'结果没有一个人离去。对于所有忠诚和倾慕于他的学生来说，他逐渐成了一个半人半神的印度教导师式的人物。"

在北方的哈拉帕城堡，惠勒发现了早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居民点的痕迹，用证据证明了这座城市雄伟的防御墙存在三个阶段，并在城墙和印度河之间的地方发掘出一个巨大的谷仓，占地达840平方米（1000平方码）。为了调查罗马在印度南方的贸易，他于1945年挖掘了位于泰米尔纳德邦科



罗曼德尔沿岸的阿里卡梅都，在那里发现了自地中海输入的属于公元1世纪的货物，包括光亮的阿瑞底姆红陶餐具①、酒瓶、玻璃、灯罩和凹雕宝石，此外还发现了一座仓库及其他建筑物。惠勒得出结论：这些发现"结合在一起表明，阿里卡梅都是希腊罗马和古代泰米尔作家提到过的正规的'雅瓦纳'或西部的商站之一"。在这个商站层次的下面，惠勒又发现了一个定居点的遗存，伴生有磨光的黑色和棕色陶器，这是先前在内地发现的所谓"巨石"墓中的一种陶器类型。这一发现促使他于1947年挖掘迈索尔的布拉马基里，这是一处既有"巨石"墓又有同期居民点的遗址。

在南亚的具体条件下，"巨石"这个术语对于欧洲史前史家可能会有误导，因为它适用于说明瓮葬和坑葬及用石头建筑的箱形石墓。到了惠勒的时代，许多考古学家在南印度已经挖出了这类坟墓，其中颇有名气的是亚历山大·罗亚（Alexander Roa），他在20世纪初期挖掘了一处占地400多公顷（1000英亩）的大墓阿迪塔那鲁，墓中的死者被装殓在大瓮中，随葬物包括陶器、石制器皿、金冠、铁剑和青铜装饰品。罗亚不懂得如何为这些墓葬或任何其他的巨石墓定年，但他估计它们不会早于大约公元前250年。

惠勒在布拉马基里的工作证明，他在巨石墓中发现的陶器位于最上层的居民点之下，各个文化层中包含一种当地制作的陶器，系罗马阿瑞底姆餐具的模仿品，其年代只能在公元1世纪，这意味着较低层的居民点和"巨石"墓肯定出现在基督降生之前。在这个基础上，惠勒将印度南部的"巨石"文化划定在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这个推断被后来的研究成果所纠正，事实上它应前推到约公元前1000年。

他的四年任期因印巴分治而过早结束，惠勒返回巴基斯坦，在1949－1950年间充当了一名兼职考古工作者。在这个时期，尽管他取得的成功及从前，但他还是设法在卡拉奇建立了国家博物馆。他对南亚次大陆考古学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其中最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就是他强调一丝不苟地认真发掘，坚持考古研究的职业道德。他孜孜不倦、循循善诱地向人们传授他的挖掘方法，即按照一种严加控制的、由"惠勒方框"组成的网格展开发掘。他的学生们在一代人时间里一直坚持这些方法，严格恪守了地层分析的标准。

① 意大利古城，以生产红色陶器而闻名——译者注。



这种第一代人的工作揭示了成熟的印度文明的性质，其方式是强调文化的统一性：最为显著之处是它的熟砖建筑，以及自然分割成的清晰的两部分——城堡和居住区组成的城市布局。在哈拉帕，惠勒挖出了一堵令人印象深刻的防御城墙，高达9米（30英尺），墙基处宽14米（46英尺），在他的发掘照片上，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深坑，瘦长结实的工人们头上顶着装满“战利品”的箩筐，熟练地保持着身体的平衡。惠勒回忆道：“当我们的鹤嘴锄刨开一堆碎砖烂瓦时，气势雄伟的城堡的巨大城墙第一次显露出来。印度文明的历史特点在我们眼前正在发生演变。艰苦的劳动，飞扬的尘土，心脏负荷过重，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比哈拉帕遗址保存完好的摩亨佐·达罗城堡，是建筑在一个高6米（20英尺）、占地8公顷（20英亩）的巨大砖头平台上的。它的结构包括一个通风良好的大谷仓，一个3米（10英尺）深的用柏油勾缝的水池，即所谓的“大游泳池”，多半是供宗教净化仪式用的。还有一片房屋群，马歇尔解释为祭司的居住区。摩亨佐·达罗低地上的城市面积超过100公顷（250英亩），沿着由主要街道构成的棋盘状规整的布局分布开来，街道宽达9米（30英尺），周围是居民住房和窄小的胡同。个人住房单元围绕一个院子而建，包括一间到十几间房，有通向房顶和上层的楼梯。在某些居住区，陶器匠、贝壳手镯匠人、珠宝匠、铁匠和其他手工艺人的作坊，点缀在住房中间。

摩亨佐·达罗，严格规整的街道布局和居民建筑，精心设计的厕所、贮藏设施和其他市政工程，使人对这座城市的城市规划和社会组控能力留下深刻印象。印度的人工制品，无论是大是小，也似乎是整齐划一的。着色的陶器、石片工具和金属工具、磨光石印章，以及其他刻有铭文的文物在整个信德省和旁遮普省似乎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此外，宗教似乎在一个国王兼祭司统治的社会里是政治权威的主要源泉。马歇尔对那些似乎与当代印度信仰类似的艺术作品感到震惊，他强调说：

> 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宗教从特征上看是极印度化的，几乎无法同现存印度教区别开来，或至少无法同印度教的某些方面，即同万物有灵论、湿婆崇拜以及母神——仍是流行宗教中最具影响的力量——紧密相联的某些方面区别开来。

印度于1947年的独立和分治把大部分哈拉帕文化区留给了穆斯林的巴基斯坦，这种情况鼓舞印度考古学家去发掘信德和旁遮普南部及东部的哈拉帕文明遗址。20世纪50年代在古吉拉特邦展开的遗址发掘出土了哈拉帕文化的一些重要居住地，其中包括在坎贝湾的洛特尔遗址发现的一个大水塘，发掘者把它解释为停靠海船的船坞。在对德里周围恒河排水区域的众多遗址所进行的对比调查也表明了哈拉帕文明向东延伸的程度。印度晚后的居住遗址则在规模上有所萎缩，缩小为村落，丧失了哈拉帕文明的许多最突出的特点，如使用的文字、度量衡、刻印以及精致的艺术。尽管这些居住地本身是农民和手工匠人组成的小村子，但无论是古加拉特还是德里地区的地方陶器，都很明显地是由哈拉帕的彩陶风格演化而来的，这暗示着印度的文化传统具有连续性。这种情况虽然到公元前二千纪便终止

了，但印度北部的铁器时代文化此时却从这些业已褪色的哈拉帕文明中脱胎而生，坎宁安在一个多世纪前想要查明的印度青铜时代城市和佛教时代城市之间的联系，就这样得到了解释。正是这一联系有助于证明马歇尔和其他人的假设，即印度文化的许多传统内容早已在公元前三千纪的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中就已存在了。

远东

中国现代考古学是由一位瑞典地质学家约翰·安特生（Johan Andersson）的工作开端的。安特生当时任职于1906年成立的中国地质调查所（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1921年，安特生和他的考察队因在周口店和仰韶村的发现，识别出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周口店位于北京南部约100公里（60英里）远[①]，是个露出地表的石灰岩地带。那里至少有25处有名的发掘遗址，出土过直立人和现代人化石，同时出土的还有石制工具、食物遗存和个人装饰品等。

中国考古学起源于地质学，这一点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影响。野外勘查和地层学发掘方法作为适用的田野工作法，由此缓慢地传入中国，但为了对出土文物加以比较和定年，安特生的"类型化石"（type fossil）处理法也在继续使用，这对有效地把握复杂的文化关系造成了障碍。然而，在体质人类学领域，安特生的这支由他的同事们——包括加拿大的戴维德森·布莱克（Davidson Black）、弗兰兹·魏登赖希（Franz Weidenreich）、特尔哈德·德·夏尔丹（Teilhard de Chardin）——组成的国际队伍对早期中国人口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这处遗址上发现第一块直立人化石的裴文中是研究骨骼损伤的先驱，他能把人为造成的伤痕同食肉动物或其他自然物造成的破损区别开来。

哈佛大学毕业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回到中国后，对位于现代安阳西北部的著名商代晚期都城殷展开了发掘。殷墟包括一个没有围墙的神庙建筑群、王室墓地、手工作坊区、贵族与平民的居住地，在那里出土了汉语最早的文字记录——向神占卜凶吉的铭文，大多数刻在牛肩胛骨和龟甲上，这就是所谓的"甲骨文"。

对旧石器时代和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的研究，是由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所分别进行的，科学与历史编纂学发生了矛盾，这个事实意味着中国的考古学是一个独立分开的领域，其结果是新石器时代受到了忽视。1953－1955年，发现并发掘了西安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半坡村，随后它成了一个吸引游客的游览圣地的象征，这有助于使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分期序列的中间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期解释体系中，假定社会从早期的母系阶段、经父系阶段再到奴隶制社会的直线进化，半坡被用来说明早期"母系社会"和氏族组织。在遗址博物馆内展开了敞开式发掘，现场被罩在一个如机场飞机库般大小的建筑物里，挖出了带壕沟的村落、沟外有陶窑和墓地。

日本也有类似的兴趣分工，对远古史前史的研究传统上集中于西部，研究中心是京都大学；对狩猎和采集社会的研究则更多地集中在东部，研究中心是东京大学。导致这种分工的一个原因是大多数古墓是在日本西南部发现的，而已发现的百分之八十的绳纹文化遗址则位于东北部。无论是对绳纹文化还是古墓文化的解释，都为在8世纪的一些宫廷记录（早期国王的陵墓和祭神的绳纹器物、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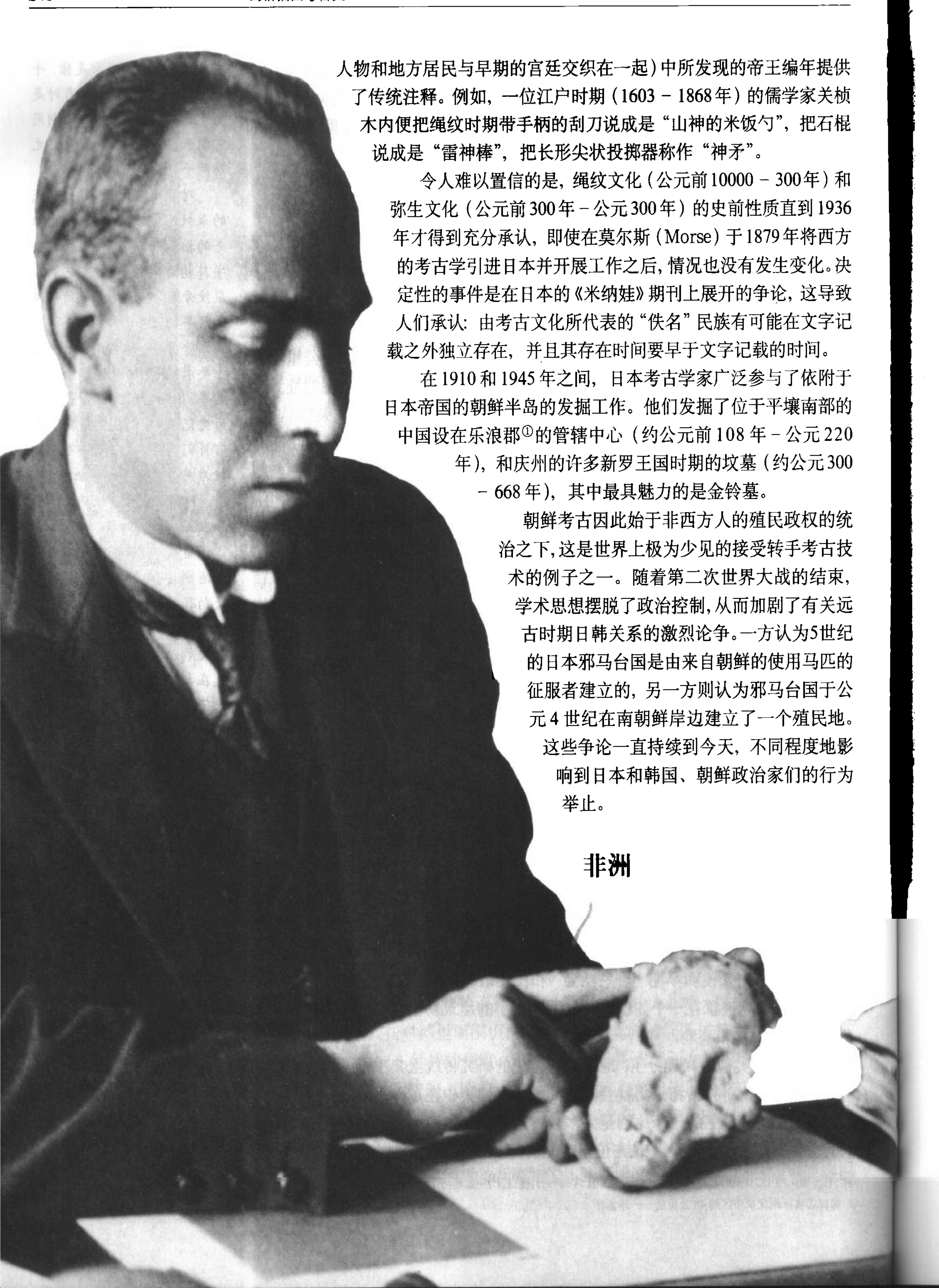
① 周口店实际距北京市区约48公里远——译者注

商代卜骨，通常是猪、牛和羊的肩胛骨或肋骨，有时是龟甲骨，中国北方的商王朝用它们来祭神占卜，时间在公元前两千纪后期。

对卜骨加以烧灼而造成的裂纹形状被解读为王室祖先的指示，这种信息由2000个字符构成的表意文字记录在裂纹旁边。它们是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汉字。

卜骨——通常刻有一个占卜要求、占卜的效验和卜者的名字，因而它们是中国最早的历史记录。它们提供了商王和官员们的年表，以及一些王室极为关心的事务——牺牲、战争、狩猎、出生、疾病、降雨和农业——的细节。

自从1928年以来，在河南省的安阳小屯村已发现了大约20万片甲骨。最初的一些甲骨是在药铺中发现的，刻有铭文的肩胛骨和龟甲是由村民在翻地时发现并卖给药铺做药用的。学者们对甲骨的来源加以调查，又发现了被当地居民不经意动过的大量埋藏地点。随后即对这座商朝晚期的首都展开了系统的发掘。



人物和地方居民与早期的宫廷交织在一起）中所发现的帝王编年提供了传统注释。例如，一位江户时期（1603 - 1868年）的儒学家关桢木内便把绳纹时期带手柄的刮刀说成是“山神的米饭勺”，把石棍说成是“雷神棒”，把长形尖状投掷器称作“神矛”。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绳纹文化（公元前10000 - 300年）和弥生文化（公元前300年 - 公元300年）的史前性质直到1936年才得到充分承认，即使在莫尔斯（Morse）于1879年将西方的考古学引进日本并开展工作之后，情况也没有发生变化。决定性的事件是在日本的《米纳娃》期刊上展开的争论，这导致人们承认：由考古文化所代表的“佚名”民族有可能在文字记载之外独立存在，并且其存在时间要早于文字记载的时间。

在1910和1945年之间，日本考古学家广泛参与了依附于日本帝国的朝鲜半岛的发掘工作。他们发掘了位于平壤南部的中国设在乐浪郡[①]的管辖中心（约公元前108年 - 公元220年），和庆州的许多新罗王国时期的坟墓（约公元300 - 668年），其中最具魅力的是金铃墓。

朝鲜考古因此始于非西方人的殖民政权的统治之下，这是世界上极为少见的接受转手考古技术的例子之一。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学术思想摆脱了政治控制，从而加剧了有关远古时期日韩关系的激烈论争。一方认为5世纪的日本邪马台国是由来自朝鲜的使用马匹的征服者建立的，另一方则认为邪马台国于公元4世纪在南朝鲜岸边建立了一个殖民地。这些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日本和韩国、朝鲜政治家们的行为举止。

非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考古人员在非洲许多地区开始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当时，这块大陆上还没有发现任何早期人类的遗存，对其划定年代几乎是不可能的。考古人员因此把精力投入到了阐明地区文化序列的工作当中。然而到了1960年，在南非和东非发现了人类祖先的化石，这个地区因此被确定为“人类的摇篮”，新近开发的放射性碳断代技术则提供了年代范围，非洲考古学从此壮大和成熟起来。

关于非洲是人类摇篮的思想来源，如同许多其他科学思想一样，可以追溯到达尔文。在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1871年）当中写道：“很有可能，从前在非洲曾居住着已灭绝的、与大猩猩和黑猩猩非常相近的类人猿。正像这两种类人猿现在是最接近人类的动物一样，我们早期的祖先有可能就生活在非洲大陆之上。”杜布瓦于19世纪90年代在亚洲发现早期人类化石一事，使科学家们推测早期人类起源于亚洲。发现尼安德特人之后，欧洲也被视为人类进化的重要地区。达尔文关于在非洲有可能找到人类起源的证据的看法被认为是不现实的，直到1924年在南非、1959年在东非发现了人类祖先的遗骨之后，他的预见才得到证实。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解剖学家，他于1923年到南非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讲授解剖学。1924年，当达特在一个婚礼上致词的时候，他收到了两个木盒，里边装着自布克斯顿石灰矿出土的化石，该矿位于距金伯利北部80公里（50英里）的塔翁村附近。达特忘记了婚礼，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盒子。他在第二个盒子里发现了一个颅腔模型或一个头盖骨内腔模型，它与另外一个包含着一个化石头盖骨和上下颌骨的石灰石块相符。“我站在那里，”他后来写道，“就像任何贪婪地紧紧抱着他的黄金的守财奴一样，拿着这具头骨……我敢确定，这是古人类学史上的最有意义的发现。”达特用了几个星期耐心地进行剥离工作，直到这年的12月23日，他才设法将头盖骨同石灰石基体分离开来。“浮现出来的是一个幼儿的面部，一个有全部奶牙的幼儿，其永久性的臼齿正处在生长过程当中。我怀疑是否有任何父母在圣诞节之时，对他的后代的骄傲程度会胜过我对我的塔翁婴儿的这种感情。”达特对塔翁化石的描述登载在1925年2月出版的《自然》杂志上。他将化石命名为非洲南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认为它是“介于类人猿和人类之间的一个已经灭绝的猿类。”

达特一夜之间成了名人，但来自学术界的反应却是毁誉参半的。当约翰·斯科普斯因在田纳西州戴顿的一所学校中讲授进化论而遭到指控（所谓斯科普斯“猿猴审判”）并在报刊上广为报道时，对塔翁化石的“审判”也在主要的学术期刊上加以展开。问题主要是塔翁化石在解剖学上令人感到困惑。1925年间流行的观点是所谓“缺漏环节”，即猿人应该脑容量较大而颌骨和牙齿则与猿类似。这种观点得到了1912－1915年在英国发现的伪造的皮尔当化石的佐证。另一方面，塔翁化石的脑容量同猿一般小，却拥有看上去像人的颌骨和牙齿。

达特感到他被学术界所拒斥，只是在他的学生菲力普·托拜厄斯（Philip Tobias）的鼓励下才能继续从事他的早期人类的研究工作。托拜厄斯后来描述了自东非出土的第一例早期人类遗存，并在1947年召开的关于史前史和第四纪研究的第一届泛非大会上为他支持南猿的立场进行了公开辩护。这一辩护主要是因为罗伯特·布鲁姆（Robert Broom）和其他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发现，

左图：他得到了古人类化石。雷蒙德·阿瑟·达特（1893－1988年）正拿着“塔翁婴儿”的头骨——科学界所知的第一块南猿化石。1925年，在发现化石几天之后，这个消息便被公之于世。他对化石做出了正确解释，在尚未发现同类化石的情况下，将它解释为介于猿与人之间的一种形态。

达特的成果起初遇到了怀疑的反应，当时大多数古人类学家的带头人——他们中许多人在当时受到皮尔当赝品的欺骗——批评对化石的科学描述和达特的进化论断。

英国人类学家阿瑟·凯斯爵士（Arthur Keith，1866－1955年）向《自然》杂志的读者似乎很有把握地说：“对模型的考察……将使动物学家感到满意，（达特的）说法是荒谬的。这块头骨是一个年幼的4岁的类人猿头骨，它与现生的两种非洲类人猿——大猩猩和黑猩猩有许多极为相似之处。所以在把它划入类人猿种属这一点上，是毫无疑问的。”

只是到了1945年，一直很不得意的达特才再次从事古人类学的田野发掘工作。学术界广泛承认非洲南猿是在1947年。

① 汉武帝时灭朝鲜北部的卫氏政权，设乐浪等四个郡——译者注

即在位于高坦省克鲁格斯多普附近的斯托克方坦、斯瓦特卡兰斯和克罗姆德莱发现了更多的南猿化石。这些化石中包括一种体格结实的古猿，现在称之为南方古猿粗壮型或傍人属粗壮型。

利基夫妇在奥杜威峡谷

路易斯·利基（1903－1972年）是一位英国传教士的儿子，出生于肯尼亚，在剑桥大学获得非洲史前史的博士学位。在大学就读期间，他的头部在一次橄榄球比赛中受伤。在遵从医嘱休学期间，他参加了大英博物馆组织的一个考察队，到坦桑尼亚去寻找恐龙化石。从那之后，他决定从事寻找化石的工作，放弃了做一个传教士的想法。1926年，他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科考活动，虽然他曾受到学者的告诫，认为他到非洲而非亚洲去寻找这类化石是愚蠢的，但他还是坚持要到东非去搜寻早期人类的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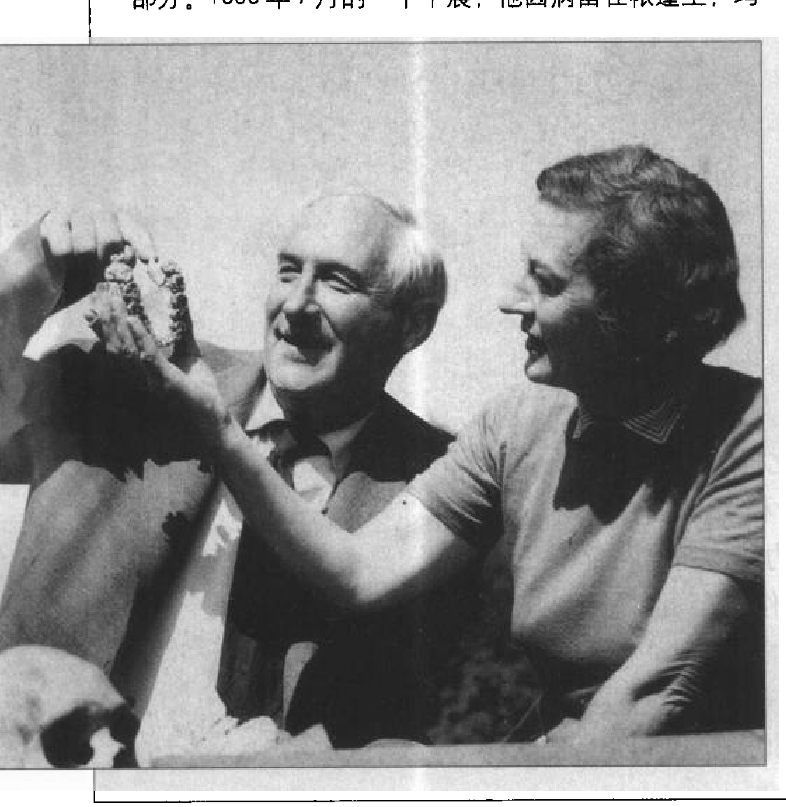
利基同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一道，在东非的各个遗址上工作了几乎半个世纪，仅仅偶尔注意到其他地区。他被认为是许多学科的权威，如对肯尼亚的吉库尤人的人类学研究、信息收集分析工作，以及对狗和热带鱼之类杂七杂八问题的了解。1940年，他成为内罗毕的考林顿博物馆馆长，1962年则担任该馆的附属机构——史前史和古生物学研究中心的名誉主任。

路易斯·利基喜爱的遗址是奥杜威峡谷，这是坦桑尼亚北部的一处古代湖泊的遗址，是东非大裂谷的组成部分。1959年7月的一个早晨，他因病留在帐篷里，玛丽领着一些达尔马提亚人去峡谷中考察。她注意到峡谷边缘蚀露出一个头骨的部分碎片。她细心地在这个地方挖出了400多块骨头残片，并将它们复原为一个成年南方古猿的头盖骨。路易斯很快给它命名为 Zinjanthropus boisei，即属名叫“东非人”，种名叫波伊斯。种名的命名是为了表示对查尔斯·波伊斯（Charles Boise）的尊敬，因为是他资助了这项研究。利用钾－氩分析技术将化石测定为179万年前。对这类化石今天使用不同的名称：南方古猿、傍人属、粗壮型，人们更为熟悉的称呼是“Zinj”，即“亲爱的小男孩”，或“瘪嘴人”（因其长有一颗大臼齿而得名）。

据说利基颇为失望，因为化石属南方古猿而非早期人类。随后，当1961年在奥杜威峡谷发现定年在170万年前的已知的最早人类遗存时，他才感到了欣慰。这些化石被划为“能人”（Homo habilis），因为利基认为他在奥杜威最终发现了第一批简单石制工具的制造者。

发现“亲爱的小男孩”激起了人们对整个东非早期人类的研究热潮，现在这个地区已是此类研究的主要地区。正像玛丽·利基在他的自传《揭示过去》（1984年）中所叙述的：

> “亲爱的小男孩”之所以对我们如此重要，原因是他左右了公众的想象力，而不是仅仅因为他使古人类学家激动不已，并激起了学术争论。假如我们没有戴斯·巴特勒和他的摄影机在现场记录头盖骨的发现和发掘过程，做到这一点或许要困难许多。由于“亲爱的小男孩”被拍成了很不错的电视片，所以广大公众似乎“置身在他出土的地点”，如在现场一般激动。正是……由于头骨对大众的冲击，再加上这一发现的位置是在丰富的、未经触动过的原生水平矿床上……这才使国家地理学会相信，利基和我及奥杜威峡谷是值得投入大笔资金的，其数量简直超出了我们最荒诞的梦想……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人能比得上路易斯更善于利用“亲爱的小男孩”这类发现所具有的公共宣传价值，并由此发掘出了资金筹集的潜力的。



路易斯·利基和玛丽·利基正高兴地展示东非人的上腭骨化石，时间在1959年发现这块化石后不久。



查尔斯·麦克伯尼（Charles McBurney，1914－1979年），北非石器时代考古的先驱之一，同他的朋友一起摆出维多利亚时代探险者的姿态，摄于利比亚的哈亚弗提亚（1951年）。

自右向左依次是：约翰·布莱金、查尔斯·麦克伯尼（坐者）、查尔斯·伯尼、戴维·珀汉姆和阿卜杜勒——考察队的阿拉伯厨师。

1959年，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一个世纪之后，另一种非洲古猿化石改变了有关人类起源的思想。在路易斯·利基和玛丽·利基（Louis and Mary Leakey）经过几近30年的不懈研究后，第一块东非南猿化石在奥杜威峡谷重见光明。

非洲考古学的形成期始于第一批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到达那里之后，他们中有许多人曾在剑桥大学史前史家迈尔斯·伯基特（Miles Burkitt）门下学习过。这一时期有个领唱主角大轴的人物，使非洲考古引起了国际注意，这就是不知疲劳为何物的阿比·步日耶（Abbe Breuil）。他不只是非洲史前史的先驱，而且也是世界史前史的老前辈。他在南非进行过广泛的旅行，发表过他对岩石艺术的解释，认为岩石艺术是一种感应巫术。步日耶的《史前非洲》一书出版于1930年，是第一部概述非洲史前史的作品。非洲的考古学家戴斯蒙德·克拉克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阿比说过的话，他闭着眼睛，仅凭感觉来判定我出示给他的自赞比西

右图：自昆士兰州西北部的里弗斯雷出土的石片石器，这是土著居民石器中最一般和最普遍的类别。

出土的一些两面器，他可以告诉我，它们代表着阿舍利文化的哪个阶段。”

大洋洲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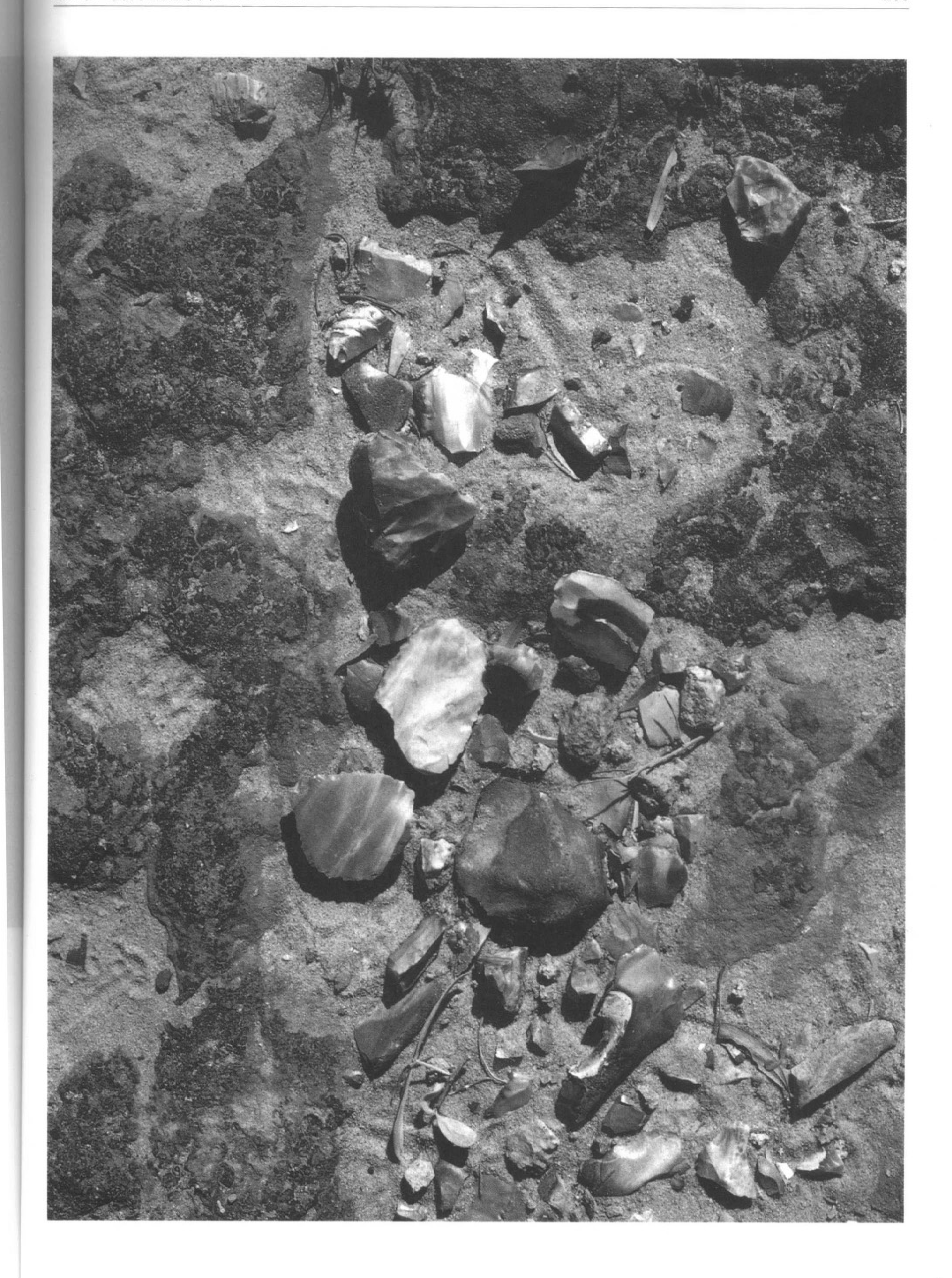
澳大利亚在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局限在两个人身上，这两个人支配着它的考古事业，这就是悉尼澳大利亚博物馆的弗雷德里克·麦卡锡（Frederick McCarthy）和设在阿德莱德的南澳大利亚博物馆的诺尔曼·廷达尔（Norman Tindale）。他们的主要贡献是证明了土著居民占据这块大陆期间，这里的文化和环境发生了变化。

1929年，廷达尔发掘了位于南澳大利亚墨累河畔的戴文当斯石棚，这是澳大利亚史前史的一次重大突破。他发现了一系列彼此不连贯的文化层，每层中都包含着一些人工制品和骨骸，显示石器和动物类型随时间而发生着变化，这是人们第一次认识到在澳大利亚存在着一个文化演变的序列。1936年，麦卡锡也以悉尼附近的拉普斯通石棚出土的石器序列证明了不同时代发生的变化。在这些开创性发掘的基础上，两人对澳大利亚史前文化的变迁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而又在许多方面具有同等价值的解释。

直到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的史前考古主要由各博物馆控制，这些博物馆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考古研究的中心和民族学材料的主要收藏地。还有一些业余的古物收藏家，尤其是在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南澳大利亚。其中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考古调查的潜力，并强烈地受到一种信念的影响，即土著人的工具制作完全取决于原材料的性质。

这一时期麦卡锡和廷达尔在澳大利亚的史前史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的经历显然非常相似。两人起初均在各自的州立图书馆就职，后来都转到博物馆工作，在进入人类学领域之前，都曾致力于自然史材料的收藏活动。两人都认识到考古技术对调查土著人过去和落实发掘计划的潜在能力。两人都与澳大利亚及海外（特别是同美国）科学机构建立了学术联系，例如廷达尔与美国体质人类学家约瑟夫·B·伯德塞尔（Joseph B. Birdsell）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两人都认识到东南亚对澳大利亚史前史的意义，都曾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遗址和人工制品进行过调查。他们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廷达尔绘制的澳大利亚部落地图基于田野工作和图书资料的研究，现在仍被广泛采用。麦卡锡和他的合作者对土著人石器所进行的分类，仍旧是今天石器分类依照的标准。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也有极少数的其他人从事考古研究。美国人类学家D·S·戴维森（Davidson）和体质人类学家N·G·W·麦金托什（Macintosh）发掘了澳大利亚北部的一些遗址。在维多利亚博物馆，地形学家爱德蒙德·吉尔（Edmund Gill）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确定土著居民遗址的年代。他做出了两项特殊的贡献：头一项是他参与了对墨尔本附近的凯勒出土的头盖骨（1940年）加以定年的工作，吉尔根据他对这个地区地形地貌的认真分析，认为这些遗存大约属于15000年前；第二个贡献是他率先利用了放射性碳素断代法。他第一个发表了对一个澳大利亚遗址所做的、用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1955年，他又提出了一个依据地形和考古遗址编制的年表。



博物馆的馆长们和业余古物收藏家们也支配着新西兰的考古事业。亨利·德威尼什·斯金纳（Henry Devenish Skinner）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的父亲是为政府工作的调查员，同时也是玻里尼西亚学会的创立人之一。他激发了斯金纳对毛利人遗址的兴趣。在加利波利会战之后，他从新西兰远征军中退役，到剑桥大学学习人类学，导师是A·A·哈顿。1918年他返回新西兰，在奥塔戈大学谋到了一个大学博物馆馆长助理的职位，并担任了人种学的讲师。斯金纳在剑桥大学的论文内容是对查塔姆诸岛毛利人的物质文化的研究，论文说明这些毛利人是玻里尼西亚人，揭穿了关于他们是被后来的毛利人驱赶到岛上的美拉尼西亚人的一支的谬论。1919年他最终以偷渡者的身份访问了查塔姆诸岛，因为他乘坐的船是不允许携带乘客的。

斯金纳首先是一位人种学家，他为物质文化的比较研究拟定了新的标准。他在哈顿和美国人类学家的影响之下，把文化领域的观念引入了新西兰，确立了玻里尼西亚手斧分类的基础。尽管他个人的兴趣在于物质文化，把发掘主要看作是填充他列举案例的一种手段，但他还是强烈主张开展田野考古。无论如何，他的确在美国以及在少女城堡向惠勒学习过田野发掘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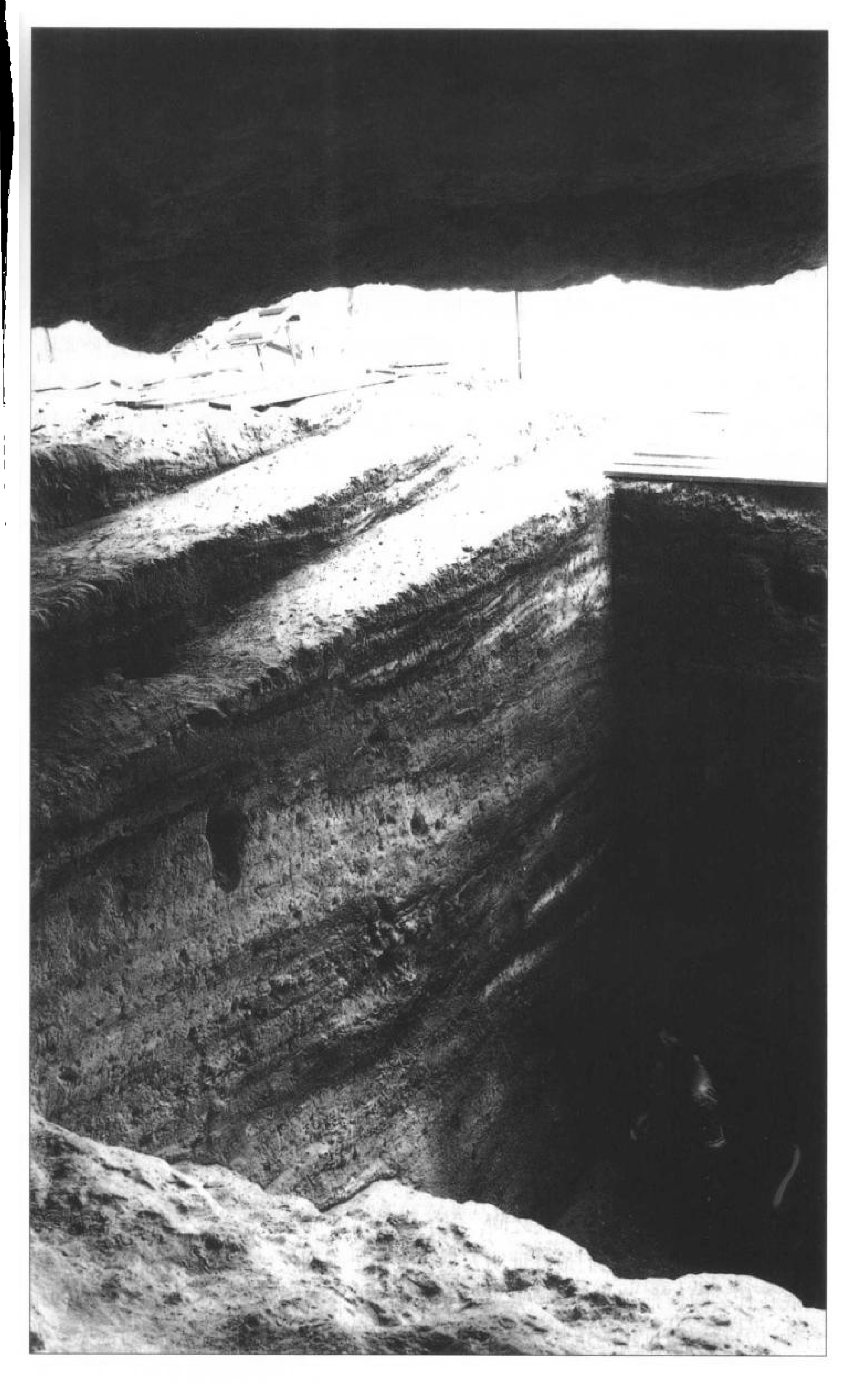
斯金纳最著名的一位学生是在坎特伯雷博物馆工作的罗格·达夫（Roger Duff）。他对一个重要的恐鸟猎人的遗址维罗巴进行了发掘，这个遗址包括墓葬和贝冢，是由一个男学生在1939年发现的。达夫证明，维罗巴居民在体质特征上是玻里尼西亚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他民族曾在毛利人到来之前占据过新西兰。他还提出把新西兰史前史划分为两个时期，早期是恐鸟猎人时期。达夫最大的成果是撰写了一部有关新西兰史前史的、重要的综合性著作《毛利文化的恐鸟猎人时期》（1950年）。

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到来，澳大利亚和大洋洲考古学在发掘方法和处理途径上经历了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放射性碳素断代新技术及其潜力的冲击。正是约翰·马尔瓦尼（John Mulvaney）和杰克·哥尔森（Jack Golson）分别将这种新思路和新方法引进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而奠定了运用新方法对整个大洋洲地区进行考古的基础。他们尤其强调利用精确的发掘技术，将有可能提供长序列定年的遗址挑选出来加以发掘，以便解决一些有关古代居民变化和文化变迁之类的基本问题，同时对石制工具之外的证据也十分关注。

1954年，哥尔森[①]在奥克兰大学考古学系执教史前考古学，这还是这门课及这个教职在该地区的首次设立。他从英国来到新西兰后，利用自己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迅速着手实行一项发掘计划及培训田野调查和发掘的技术人才。他把自己的活动集中于迄今为止一直被人忽视的北岛（尽管大部分毛利居民在那里居住）。他对最初曾由哈斯特于19世纪70年代挖掘过的莫阿宝音洞穴展开发掘，显示出了他精确的田野发掘技术，揭露了由于一个世纪任意挖掘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哥尔森还在像考里角这样的遗址上展示了大规模的露天发掘技术。

尽管他在1961年离开新西兰赴澳大利亚，但他在7年时间里却变革了这个国家的考古学。他极大地改善了田野技术的标准，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不只注意对器物和沿岸贝冢的研究，而且注意到结构、聚落类型和生存条件。

① 英籍考古学家，1892年4月1日生于澳大利亚的悉尼——编者注



约翰·马尔瓦尼面对5000年之久的文化堆积层，摄于南澳大利亚墨累河畔的弗罗姆斯·兰丁，时间在1956年的第一个发掘季。

尽管马尔瓦尼已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史前史的先驱，但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的努力却受到他个人视听闭塞的局限：

他后来回忆道："我从来没有体验过土著社会，事实上，我怀疑我是否曾经遇到过一个土著人。除了极少数博物馆的馆长和业余石器收藏家（主要是些水平参差不齐的个人）之外，我接触到的专家简直寥若晨星。当时的两个主要的权威——麦卡锡和廷达尔远离我600英里或450英里。我依赖于国外的建议……（因为）当时访问澳大利亚的人是很少的，戈登·柴尔德是第一个，那是在他孤独地返回故里（悉尼）的时候。"

在田野考古方法发生变革的同时，在新西兰史前史记述中曾占统治地位的毛利人的口头传说却遭到了质疑。这次质疑的带头人是一个叫安德鲁·夏普的公职人员，他对毛利人口碑历史和在太平洋诸岛之间存在经常性航行的说法的历史基础表示怀疑。他提出的取代意见是：新西兰是被偶然殖民化的，“大船队”的传统说法是后人的编造。虽然夏普关于太平洋航行性质的观点证明是错误的，但他对毛利人口碑历史的真实性所做的批评却被广泛接受，这有助于澄清现代对新西兰史前史的处理方式。

在澳大利亚，正是约翰·马尔瓦尼确立了史前考古学的牢固基础。他起初是墨尔本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但因受田野考古魅力的吸引，而到剑桥大学学习，意在能够熟练掌握适用于澳大利亚史前史的良好的现代考古技术。1953年他返回墨尔本大学，在讲授古典历史的同时，他引入了一门史前史课程，随后10年间又着手实行一项严格的田野考察、发掘和分析先前考古工作的计划以及开展对土著人历史的文献研究。他于1956年进行首次发掘的地点，是墨累河畔的距廷达尔曾挖过的戴文当斯遗址几英里远的弗罗姆斯·兰丁。

1961年，马尔瓦尼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澳大利亚的石器时代》的重要论文，文中全面分析了以前的所有考古工作，严厉批评了麦卡锡和廷达尔所做的早期概括。他对以往的工作清理得极为彻底，以致这篇文章标志着澳大利亚考古学与过去的决裂和新的开端。从那时起，澳大利亚的史前史家们感到，他们已无需注意在马尔瓦尼之前的人们的努力了。

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还看到了对太平洋列岛考古日益增长的关注。长期以来人们便假设，在太平洋列岛进行考古是浪费时间，因为人类占据这个地区的时间太短，以致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再加上台风、海潮和酸性的土壤或许会毁灭仅存下来的那些微不足道的考古材料。然而在1950年，通过放射性碳素断代法对瓦胡岛库里奥奥石棚出土的、丰富多彩的人工制品的定年表明，人类定居在夏威夷群岛的时间至少要早于1000年前，这是人们没有想到的。1952年，具有鲜明特点的新卡里多尼亚的拉皮塔陶器首次被确定了年代，通过与分散在斐济、汤加和瓦托姆岛上的类似陶器进行比较，一种史前考古文化被划分了出来，这一文化在民族学方面十分明显地介于美拉尼西亚文化和玻里尼西亚文化区之间。

对美洲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之间，位于新墨西哥州和科罗拉多州的一些重要考古遗址得到了发掘，它们最终证明人类在更新世晚期便已生活在北美大陆了，但到底在什么时候抵达北美这一点却仍是不清楚的。诸如科罗拉多州的林登梅尔和丹特以及新墨西哥州的布莱克瓦特德拉和福尔索姆之类遗址，已成为确定克罗维斯和福尔索姆时期——北美最早的界线分明的旧石器时代印第安文化阶段——的基础，两个时期分别定年在约公元前9500－9000年和9000－8000年。

福尔索姆遗址是由一个原是奴隶的黑人牛仔乔治·麦克坚金于1908年发现的。当时他正在检查围栏，见到了从一段路堤上露出的史前野牛骨。但他在1926年之前并没有报告这件事，只是当科罗拉多自然史博物馆馆长和北美研究早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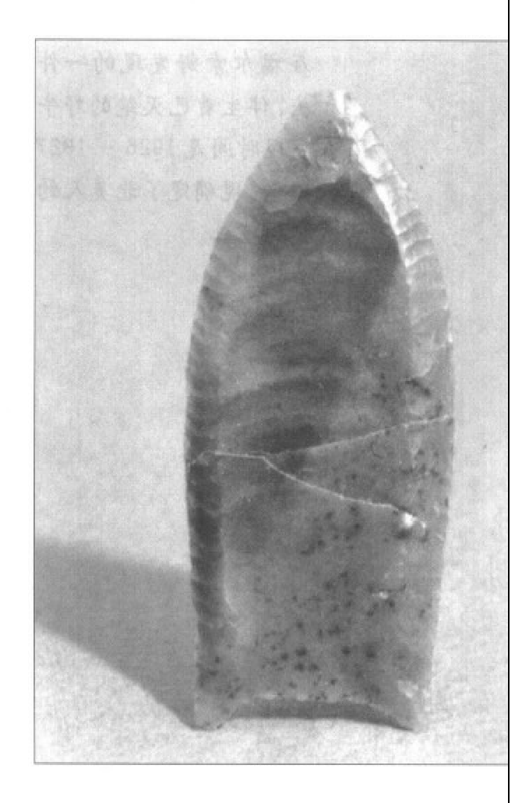
类的伟大先驱之一杰希·菲金斯，为搞一次展览而派人去福尔索姆复原一具山地野牛头骨时，此事才为世人所知。在这个遗址的更新世的堆积层中，人们还发现了带凹槽的石矛头和骨骸。然而，有相当多的学者不愿承认这一发现的正确性。直到1927年更多的石矛头在这个遗址中被发现后，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动物遗骨和人工制品的结合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人类出现于新大陆的“更新世壁垒”从此被打破了。

在中美洲，马雅研究继续抓住了大多数考古学家的注意力，但对墨西哥中部高地和南部瓦哈卡州的新调查也已展开。基于马雅历法的年表扩大到把整个中美洲都包括了进来，尽管事实上其他地区的文化序列并不完全适合马雅模式。

在马雅地区的研究工作是由设在华盛顿的卡内基公共机构控制的。1914年，精力充沛的考古学家席尔瓦努斯·莫利（Sylvanus Morley）说服卡内基公共机构开始对马雅史前史展开长期的研究。这项事业并非像当时和现在的大多数研究项目一样仅集中在一个遗址上，而是试图研究该地区各时期及所有的马雅遗址。1929年，阿尔弗雷德·基德尔（Alfred Kidder）成为这项研究的总负责人，他曾在美洲西南部开展过广泛的考古活动。本世纪初期，基德尔发表过一次著名的声明，称西南部考古成了一只“已被吸干的橘子”；作为西南部考古的奠基人之一，他建议考古学家应放弃阿纳萨基遗址。他本人则动身前往“液汁”比较充裕的墨西哥低地地区，尽管他对这个决定感到遗憾。“我只是希望”，他后来懊悔地说，“我能返回那个美妙的国家，再一次用它那丰富的果汁润湿我的嘴唇，对那里进行的半个世纪的研究，只是万里长征开头的几步”。在基德尔的指导下，卡内基项目得到认真系统的实施，问世了一些插图精美、资料翔实的出版物。该项目一直持续到1958年，在马雅日历、陶器风格和建筑的基础上，成功地确立了马雅文明的基本演化序列。

在此期间，莫利成为马雅考古最重要的人物，他关于马雅的意见在当时被普遍接受。他把马雅看作是一个在僧侣统治阶级控制之下的平静社会。僧侣们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观察和记录时间的流逝。所有得到翻译的马雅文献都是象形文字记载的历法和有关日期的数字，这个事实无疑影响到了他的这个观点。莫里低估了马雅象形文记载含有历史内容的可能性。这些观点还以更极端的形式为英国考古学家埃里克·汤普森（Eric Thompson）所采纳。继莫利之后，汤普森最终成为他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马雅问题专家。汤普森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受雇于莫利，在墨西哥的奇琴伊察工作。他把自己一生的剩余时间都用来研究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早期史。他一概否定任何有关马雅作品含有历史内容的看法，或者说他坚决反对马雅象形字有可能具有语音性质，嘲笑了对立面的所有意见。

尽管对墨西哥河谷的研究曾远远落后于对马雅的研究，但在1908年，考古界对前者的研究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应归功于美洲研究学院的爱德华·赛勒（Eduard Seler）、哈佛大学的阿尔弗雷德·托泽（Alfred Tozzer）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共同努力。赛勒是该学院的首任院长，1910年由伯阿斯接任。博厄斯雇了一名才华横溢的年轻考古学家马纽尔·伽米奥（Manuel Gamio），教授他科学的考古方法。伽米奥运用地层学方法在墨西哥河谷进行了精密的发掘，为墨西哥高地制定出第一个地区性的陶器演化年表。1917



边缘带有凹槽的“福尔索姆尖状器”。约11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居民使用的典型矛头，捆绑在木杆之上。这是自新墨西哥州标准遗址出土的19件尖状器之一，同时还发现了已灭绝的长角野牛（Bison antiquus）的骨骸。遗址位于一处古代沼泽地的边缘，发现时间是1926 – 1927年。

福尔索姆的旧石器时代印第安人的文化，以及更为广泛流行的、稍早些的克罗维斯文化，被认为是在西班牙人初次接触印第安人的时期里生活在美洲（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的众多部落集团的祖先。

然而，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放射性碳素断代法被发明之后，为这些文化定年才成为可能。



在福尔索姆发现的一件石矛头，伴生着已灭绝的野牛骨，发现时间是 1926 – 1927 年。这一发现确定了北美人的古代史的基础。

年，他在中美洲最大的考古遗址和前墨西哥时期的一个国家的首都特奥提华坎(Teotihuacán)，开始实行一项雄心勃勃的项目。可惜的是，这个项目始终没有完成。但伽米奥的工作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另一位伟大的墨西哥考古学家是阿尔方索·卡索(Alfonso Caso)，他于1927年出现在考古舞台上。卡索在中美洲文化的第三大中心瓦哈卡河谷开始发掘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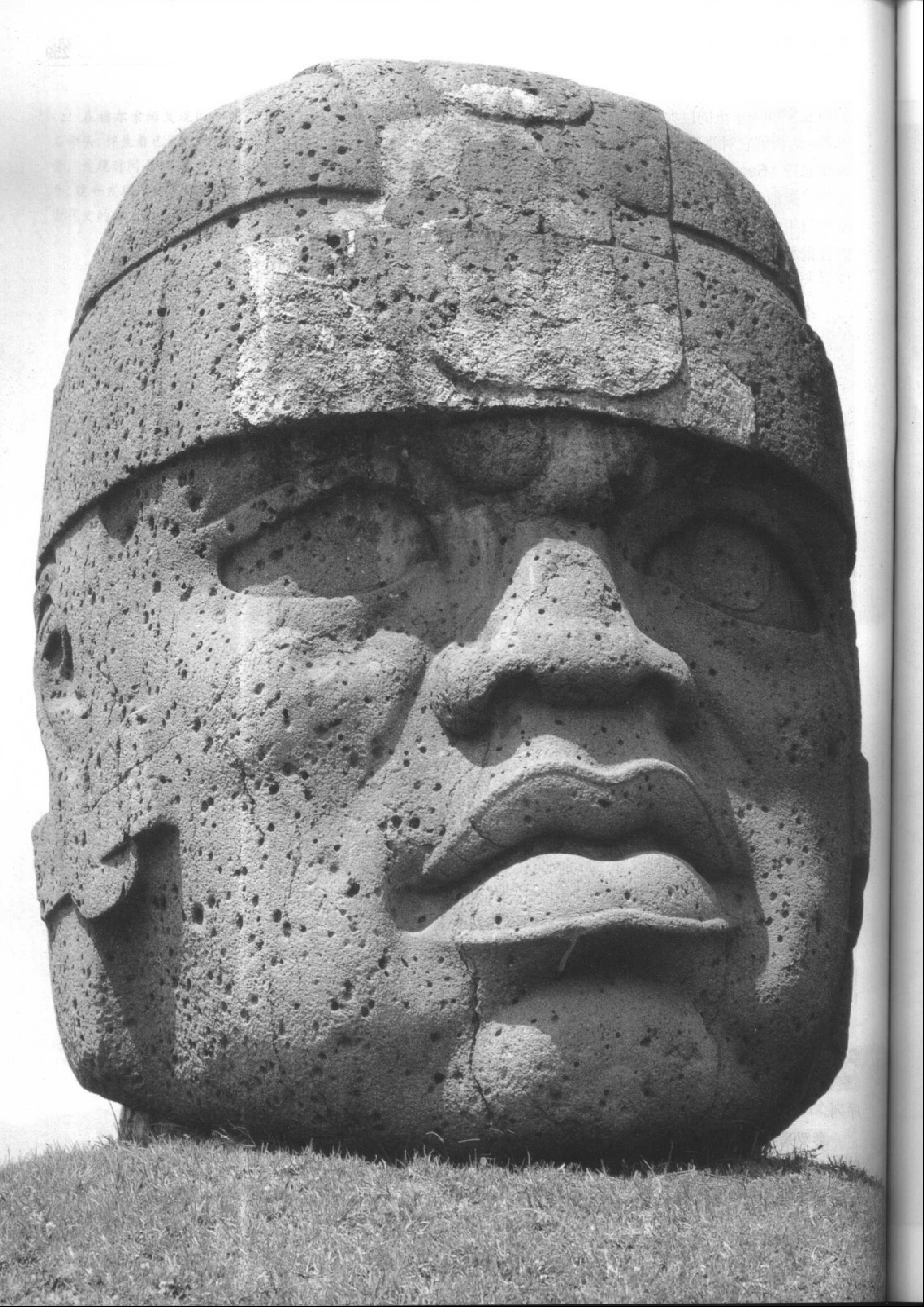
同时在蒙特阿尔班的巨大遗址上展开了广泛的发掘。他还对历法研究具有极大的兴趣，认识到它对马雅学家的实用意义。大约就在这个时期，美国考古学家乔治·瓦里恩特（George Vaillant）也在马雅地区工作，然后转向墨西哥河谷，这使他成为中美洲考古中极少数兼通这两个地区的学者之一。他不仅拟定出这个地区的基本编年，而且还是企图把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同另一地区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的首批考古学家之一。他还对一些新发现具有浓厚兴趣，这些发现似乎在时间上要早于马雅和特奥提华坎文化。

20世纪30年代，奥尔迈克文明在海湾沿岸地区被发现，最初的证据是发现了巨型头像，即用高达3米（10英尺）的巨大玄武岩大圆石雕刻而成的栩栩如生的人头。这些头像的特点是平滑，以便于滚动。但它们的面部却使人异想天开，从而提出了非洲文化影响到中美洲的理论。第一个重要的奥尔迈克文明的中心是圣劳伦佐（公元前1200－900年），距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的海湾沿岸50公里（30英里）远。大量的玄武岩是从75公里（45英里）外的图斯特拉山用船运到遗址来的。在那里，它们或被雕刻成雄伟的头像，或被凿琢成巨大的石板，有些石板被用来建筑与一系列人工湖连结在一起的、庞大的排水系统。圣劳伦佐作为最主要的奥尔迈克文明中心，在公元前10世纪被东北100公里（60英里）远的拉万塔（公元前1000－500年）所取代。拉万塔拥有一座主要的金字塔，坐落在一个神圣的广场上，广场侧面矗立着两个土墩。

奥尔迈克文化也因带有清晰花纹（扭在一起的、半是美洲虎、半是人婴饰纹）的玉雕而闻名。这类工艺品在中美洲是远距离的广泛贸易的物品。因为奥尔迈克是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复杂文化，考古学家们为此就它是否是中美洲的"文化之母"及随后而来的所有伟大文明的先导问题展开争论。今天，奥尔迈克仅被看作是存在于那个时代的一些相关文化中的一种而已，其中每一种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种都有它独具特色的历史。

在秘鲁，由于新发现了一些遗址和文化，所以研究工作继续集中在修正由乌勒（Uhle）确立的编年序列上。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尤其认识到乌勒工作的重要意义，将它作为他自己的地区编年的基础。结束了在帕察卡迈克的工作之后乌勒继续发掘秘鲁的其他地区，他收集的大多数古物都陈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考古学博物馆中。克罗伯和他的同事们在那里用了几年时间研究它们并将成果公之于世。当克罗伯于1925－1926年去秘鲁工作的时候，他已对沿岸地区的手工制品序列耳熟能详了。在这次也是他第一次旅行中，他访问了北岸和南岸的遗址，并对南岸纳斯卡地区的一些遗址进行了发掘。在1942年重返秘鲁之后，他拜访了他从前没看到过的沿岸和高地的部分地区，写出了第一部有关秘鲁史前史的文化综合作品。根据乌勒的成果，再加上他的个人观察和秘鲁考古家朱里阿·C·泰罗的工作，克罗伯提出了第一个由3种层次风格（察文、提亚华纳科和印加）组成的、并点缀着其他一些地区文化特色的一般发展序列。

泰罗是位非凡的考古学家，他的同事们自愧不如。他是土生土长的秘鲁人，曾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从这一头到另一头，挖遍了这个国家的遗址，大概访问过每一个已知的重要遗址或令人感兴趣的地区。他对秘鲁考古学的了解程度简直比



这个专业的其他人的认识加在一起的还多，但他述而不作，很少把自己的认识写到纸上。他最著名的工作是对位于秘鲁北部安第斯山中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神庙遗址——察文的发掘。察文显然是一个宗教中心，朝圣者要长途跋涉到那里向神庙奉献祭品。察文式样的人工制品和宗教象征广为传播，为确立在安第斯山区最早流行的风格类型提供了依据。泰罗还发掘了帕拉卡斯墓群，墓葬中含有丰富的与察文相关的手工制品，这进一步说明了察文影响的重要性。

秘鲁中部高地上的瓦里（Wari）也是泰罗关注的对象，他发现这里是乌勒的所谓“模仿”风格的源头。现在知道它是在众所周知的印加帝国出现之前的7个国家中的第一个安第斯大帝国的首都，该帝国控制着现代秘鲁沿岸和高地的大部分地区。泰罗还附带挖掘了位于纳斯卡谷地的一个重要的瓦里祭献遗址帕切科。他在那里发现了数吨压碎的陶器堆积物，包括用6种或6种以上颜色绘制的、具有瓦里神祇形象的大瓮，形状如美洲驼、人头或人脚的陶器皿，以及众多其他瓦里陶器艺术的精品。泰罗如此忙忙碌碌，以致他竟没有时间发表他的发现。克罗伯对泰罗不发表个人成果一事专门予以指责，他认识到泰罗更适合于为报纸撰写短小精悍的文章，而不适合于撰写学术专著。结果，泰罗的大部分成果随着他的去世而湮没无闻了。但是他为了使自己的发现能为其他学者的研究使用，他在秘鲁建立了3个博物馆，其中最有名的是利马的国家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博物馆，泰罗本人死后则被安葬在馆内的一个庭院里。

泰罗最为自豪的就是他在察文的工作，以及在1940年于察文神庙的上方修筑了一个小型博物馆。馆中会集了许多该遗址出土的精美石雕。1945年1月16日的夜里，附近阿温拉湖决口，洪水夹带着泥土和石块将小博物馆及其所有藏品一扫而光，藏品散落在邻近村落的街道和房屋周围，而察文大神庙上则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淤泥。泰罗遭到沉重打击，他回忆道：“艺术家和考古家的梦想就这样荡然无存了。”之后不久，他便去世了。据说他是由于心脏病发作而死的。

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是安第斯山考古非常活跃的年代，其原因是美国考古学家把新的地层学考古原则应用到发掘工作当中。温德尔·贝内特（Wendell Bennett）在提亚华纳科首次应用了地层学发掘方法。哈佛大学的戈顿·威利（Gordon Willey）率领一支考古队对拉丁美洲的重要地区——秘鲁的维鲁河谷进行了首次考察。自1954年起，约翰·罗（John Rowe）在秘鲁南部沿岸地区实施一系列项目，旨在充实克罗伯的概括、完善那个总的年表。他利用伊卡河谷的临时序列作为基础，设计出的一个适用于整个安第斯地区的出色的编年方案，至今仍在使用。

当考古学家在地面大步迈进时，航空摄影对史前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重要的视角。20世纪30年代，罗伯特·史皮（Robert Shippee）和乔治·R·约翰逊（George R.Johnson）在秘鲁做了一次空中旅行，飞到北部沿岸上空，在圣河河谷发现了一道他们称之为“秘鲁长城”的遗迹。他们飞向南方山区的这个过程中，差点儿损失了一架飞机。他们从古老的印加首都库兹科地区的主要废墟上空掠过。几年之后，美国人保罗·科佐克（Paul Kosok）开始以极大的热情对古代秘鲁展开空中考古调查。调查当中，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纳斯卡极为罕见的地面标志上。

生态研究尽管在英国早就确立为一个方向，但在北美却发展得十分迟缓。有

左图：巨大的玄武岩头像，戴有“头盔”，面露愁容，这成为位于墨西哥低地地带韦拉克鲁斯州的奥尔迈克文化的特征。该文化约存在于公元前1200－400年。据认为这些头像是奥尔迈克统治者的，它们普遍具有扁鼻与厚唇，但每个头盔却有自己独特的装饰样式。头盔大概是为了在战争和正式球赛中提供保护用的，这种类似篮球赛的球赛相当残酷，使用一个实心橡胶球和一个专门兴建的球场，曾经广泛流行于整个中美洲。比赛还要求有防护手套、厚皮带和护膝，败方的队长有可能要成为胜方的牺牲品。

整个奥尔迈克文化的特性，在马修·斯泰林（1896－1975年）于20世纪30年代发掘之前，尚未被人们认识。只是到了1956年，随着放射性碳素定年的首次出现，古典马雅文明的独立性才被确认。即使在今天，人们对奥尔迈克的了解几乎完全出自在两次大战之间发现的三处遗址：拉文塔（1925年）、特莱斯扎珀特斯（1938年）和圣劳伦佐（1945年）。现在因开采石油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拉文塔出土了4个巨大的石雕头像，特莱斯扎珀特斯出土了两个，圣劳伦佐则出土了8个，其中最大的一个高2.85米（9.3英尺），重20多吨。

纳斯卡的线条

克罗伯于1925年在秘鲁纳斯卡地区工作时，便注意到一条条看上去像是小路的线条延伸到广阔的沙原地带。保罗·科佐克于1940年进行航空摄影时看到了它们，并对它们进一步展开调查。这些小路的修造质量十分惊人，立即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他来说，这一点似乎很清楚，就是如此既直又长、指向天边的线条必定是服务于某种天文目的的。1941年，科佐克使一位住在秘鲁的德国数学家玛丽娅·赖歇对这些线条产生了兴趣并为此来到纳斯卡，开始对这个地区展开一次认真的调查。此后，她把余生都用来说明和绘制这些线条，寻找太阳和星辰排列的证据。

赖歇是第一位认识到某些线条构成动植物形象和几何形状的调查者。一天，她独自在沙原上绘制她曾注意到的一组标志图样，她发现一些螺旋状的不规则线条同这组标志连结在一起。当意识到它们构成一只长着根卷曲尾巴的猴子形象时，她放声大笑起来。

随后，她以难以抑制的热情，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形象。她经年累月在沙原上工作，露营在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到镇子里购买补给品，或者干脆居住在附近废弃的房子里。纳斯卡的居民起初以为她有神经病，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不仅尊重她、敬佩她的执著精神，而且待她就像待一位忘却了凡人琐事的当地圣人。

感谢赖歇及其后继调查者的工作，我们现在知道，这些表面看上去漫无定制、随意盘桓在沙原上的线条原来是有一定之规的。制作这些标志其实相当简单，就是移去沙床上面略带暗红和暗棕色的石头，露出下面浅色的砂子。许多直线是从"线条中部"开始的，通常是从某个小土堆或山脊边缘开始，从这个基点朝不同方向放射出若干线条。有些线条和太阳在某些重要日子，从地平线上落下的地点连结在一起，看来大多数是与沙原上的神圣地点相连的神圣之路。在一些线条的中心仍能看到遗留下来的、供祭献之用的破碎陶器。这些线条存在的时间极为长久，从约公元前200年直到公元16世纪，这意味着这些线条是在一个十分漫长的时期里制造并被使用的。

沙原上的动物形象类似于公元1－400年间的彩陶上的图案，暗示着这类线条制造的时期要短暂一些。动物形象一般是由一条单线构成的动物轮廓，没有交叉。各线条提供了入口和出口，以便它们用作小路。一个人既可在一个动物形象上漫步，一路上围着它转，也可从小路上出来。所有这些因素意味着大多数线条具有某种仪式的目的。但在过去也有人提出了许多其他解释，有"伪实用的"解释，认为线条象征一种灌溉系统或织布机纺出的线；也有荒诞的解释，认为它们是供外星人





访问地球时的着陆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挥手示意的人”，高32米（105英尺），制作于纳斯卡的一个山腰处。玛丽娅·赖歇称它为“猫头鹰人”，并推测它象征着月亮。

些考古学家在20世纪40年代为解释人类行为而开始注意到环境。随着重构环境的重要意义变得明朗化，人们加强了对动物遗存的关注。例如，提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就对20世纪50年代早期自南达科他州以及北美大平原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骸进行了死因分析。那里惨死了大批野牛，从而为调查者提供了大量骨骼样本。瓦尔多·韦德尔（Waldo Wedel）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首先开展了环境对当地人口作用问题的研究。稍后，埃米尔·豪里（Emil Haury）对亚利桑那州的重要遗址温塔纳洞穴，在旧石器时代的环境进行了认真的重构工作，参与人员包括植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其他专家。然而，利用环境因素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做法，仅仅是在人类学家朱里安·斯特沃德和莱斯利·怀特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所开始的进一步的理论工作之后才大力推行。



发掘加拿大奥尔特河水坝附近的斯米特遗址内被杀的野牛骨骸，时间属2500年前。

遗址位于艾尔伯塔南部，距一个著名的屠杀水牛的遗址即所谓的“水牛屠场”几公里远。“水牛屠场”自公元前约3700年起便几乎被连续使用，通过把野牛大群地从悬崖上赶下而杀死它们。

斯特沃德提出：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内核，“它的形形色色的特征是与它的生存活动、经济状态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很大程度上是由周围的自然环境决定的”。他特别支持“多线进化”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一个社会对环境制约会做出回应，其采取的确定形式并非是由环境本身事先设定好了的。对于怀特而言，任何社会文化系统均由三种成分组成：技术－经济成分、社会成分和意识形态成分。在这些成分当中，技术－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它决定着另外两种成分的地位。按照怀特的分析，人类文化因而“首先是一种能源的驾驭并使它为人类服务的机制”。

到了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环境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已趋向成熟，因为在这几十年里，美国公众面对着因忽视环境而带来的负面后果。由于环境意识的提高，像考古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学科，开始更加自觉地注意自然环境对人类行为的重要作用。

与环境考古学同步发展的是“分析考古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在北美考古学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两个重大事件：放射性碳素断代法的发明和瓦尔特·泰勒（Walter Taylor）的著作《考古学研究》的发表。早在30年前，树木年轮定年法便已开发出来，但它的应用基本上限于美国西南部。随着放射性碳素断代法的问世，考古学破天荒地有了一种绝对的、普遍适用的定年技术，并开始注意到年代学以外的问题。继放射性碳素定年革命之后，在新大陆接踵而来的就是出现了对最早的聚落和生存条件的研究（戈顿·威里对秘鲁维鲁河谷的研究）。

就考古学理论而言，泰勒的《考古学研究》（1948年）一书造成的革命性影响可以与放射性碳素的作用相提并论。泰勒的书概括了人类学家对北美考古学发展所表达

的全部不满。他强调指出，考古学家应当超越对人工制品的分析、超越仅把制品划分成一些空间和时间范畴，并力求了解印第安人是如何制作它们的做法。泰勒拥护“结合性的”处理方法，这种方法对过去的一种文化加以整体研究，以便能够充分地理解它。泰勒认为，只有通过对人工制品的数量、分布状况以及各个遗址的内在特点展开极为具体的研究，才能实现上述目的。由于对美洲考古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的尖锐批评，如阿尔弗雷德·基德尔，导致他的书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但在20世纪50年代，年轻的考古学家们（如路易斯·宾福德）开始探索一种最终发展成为进程考古学的处理方法—— 一种基本上是“全新的”考察人类过去的方式。

到1960年为止，考古学已发展成了一门健全的、蒸蒸日上的学科，手头拥有各种新技术以及前所未有的可供处理的广泛材料。但许多考古学家、尤其是英美的考古学家，已开始对这个学科的传统处理方法表示不满。目前，理论首次成了一个令人关注的举足轻重的焦点问题。这门学科的目的和实践在今后30年里将会得到根本性的调整。

第七章　新技术和众说纷纭的考古学说（1960 — 1990）



最近几十年考古学从古代遗物中提取信息的能力迅速提高，使用的技术手段——包括计算机、卫星、数据及样本分析技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广泛；与此同时，资源也越来越宽广，种类也越来越多，从“纯粹研究”扩大到废物回收工程，包括在开动推土机前先做文物探察和发掘工作。在这种背景下，理论的分



黄金陪葬面具，眼睛是用绿宝石做的、带有红色痕迹。秘鲁的奇姆文化（12－13世纪）。

在上一代学者手中，考古学的研究范围从显赫人物扩大到历史上的普通民众，包括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和在乡村与城镇附近谋生的手艺人。

发展中的美国和英国考古学越来越注重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认识论问题，甚至不惜牺牲其传统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

于是，诸如此类的艺术杰作虽能把普通观众吸引到众多博物馆和艺术馆，却逐渐受到许多专家的嘲讽，认为它们与考古学的主流格格不入——充其量只能当作博物馆长们、富有的收藏家们和变幻莫测的国际艺术品市场上的玩物。

歧演变成方法的分化，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共存共生，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

科学与考古学

几乎在考古学的每个领域，人们都能看到科学的巨大影响。大家是通过遥感技术、鉴定年代的精巧仪器和高技术装置看到这种影响的，但是，自从自然科学问世以来，考古学家们确实从中借鉴了许多技术。

测定年代

准确的年代鉴定是考古学的核心问题。考古学家们通常把年代鉴定技术分为如下几类：首先是相对法和绝对法，其次是直接法和间接法。如果只需确定一件物品的年代比另一件久远或较近，这种技术就是相对年代鉴定法，它是考古学家们使用时间最长的方法。反之，如果按纪年法，用ＢＣ（公元前）/ＡＤ（公元后），或ＢＰ（近代，1950年以前）确定器物的年代，这就是绝对年代鉴定法。直接年代鉴定技术要求确定器物或上面的物像特征的年代，间接年代鉴定法只要求确定大致的年代。显然，绝对年代的鉴定技术最为可取。最著名的鉴定技术是年轮鉴定法和放射性碳素断代法。前一种方法是人们发明的第一种绝对年代鉴定法，后一种方法是应用泛围最广、世界各地都可采用的方法。

树龄学或年轮鉴定法是美国西南部的天文学家安德鲁斯·道格拉斯于20世纪



新石器时代梅斯·豪(Maes howe)的甬道式坟墓,位于苏格兰的奥克尼。墓室的顶部呈拱形、非常壮观，大约建于公元前2700年。70年代用放射性碳定年的结果表明，西欧的这片巨石建筑群与地中海东部文化，例如迈锡尼希腊文化，没有任何联系，它们比后者要早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初发明的。其原理很简单，即：树木每年都长出一个年轮，其大小和结构是由当年的气候决定的。由于每年的气候都稍有差异，年轮的结构也就稍有不同。生长在同一地区的树的年轮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考古学家能够根据同一地区老树的一层层年轮确定绝对纪年。考古学家可以把一种古树样本——例如房顶的梁木——送到实验室，参照树木年轮图确定梁木的采伐年代。这种技术在美国西南部非常适用。但是，人们在北美和欧洲的部分地区也用这种技术鉴定年轮较少的木器。

利比于20世纪40年代发明了放射性碳年代鉴定法，而后人们不断改进这一技术。例如，70年代晚期，人们发明了气体计数器，较小器物的年代因此也能得到鉴别。后来人们又研制出AMS（质量分光加速器）程序，用于计算碳14原子本身。这种技术的成本比传统技术高，但是鉴定结果却准确得多。它不仅适用于较小器物，而且能把放射性碳的测定范围扩大到8万年前。

新发明令人欣喜不已，但新鲜劲过后，人们便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放射性碳技术也有一些问题。对于某些时期，放射性碳素断代法测定的结果不大可靠——与文献或树木年轮法确定的明确年代有很大不同——因为碳14在大气中并非是恒定不变的，因此，有必要校正测定的结果，把"放射性碳纪年"转换成公历纪年。这种"校正"把西欧史前史的巨大古代遗址的时间推得更远，否定了它们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文明有任何联系。因为测定结果表明，西欧巨石时代的坟墓比所谓的地中海原型悠久得多，几乎不可能是来自"更高等"文化的过客们修建的。

放射性碳素断代校正技术尚未影响到东欧。尽管西方学者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在《文明之前》一书中根据修正技术重新解释了东南欧冶金术的起源。但是东欧的考古学家尚未接触到放射性碳校正技术，仍然根据错误的放射性碳素断代法编制年代序列，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他们与世隔绝，不了解校正法变革引起的理论争议，二是因为他们很晚才知道放射性碳素断代法，并把它囫囵吞枣地接受下来。放射性碳素断代法需要系统地做些修正，这就为坚信"短期编年"(short chronology)来自历史的人带来一线希望。但是它还不足以推翻20世纪70年代以来流行甚广的放射性碳断代法。

放射性碳素定年不仅是如何解释考古问题的一场革命，而且促进了放射性绝对年代鉴定技术的发展。考古学家们现在能够鉴别出陶器的绝对年代、灶台的使用、黑曜石工具的制作、甚至石制艺术品的生产情况。对材料的年代做出具有说服力的鉴定，几乎不再是不可攻克的难题了。

植物与动物

分析考古发掘地的动植物遗骸非常重要，它能使人们洞察发掘地的环境、当地居民的饮食以及人们在周围寻找食物的方法。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才意识到动物骨骸在理解历史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此之前许多考古学家们只满足于探明发掘地的历史有多久，几乎不大关注骨骸，充其量数一下物种的数量，有时则区分一下野生动物与家畜。在英国，格拉汉姆·克拉克的作品大大促进了环境研究与动物骨骸研究，并最终发展成由剑桥史前史专家埃里克·希格斯(Eric Higgs)领导的羽翼丰满的"远古经济学派"。在考古学领域，"动物考古学"或"考古动

怀俄明州，大角山的魔轮。中间是一个D型石堆，向外延伸出28根碎石构成的辐条。轮的外沿还有6个较小的石堆。

魔轮是典型的西北平原产物。它们可能是为了纪念某些重要人物，在显灵和其它仪式中起某种作用，也可能是边界标记或航海标记，或者是为了观察天相，如冬至和夏至等，其作用与日历相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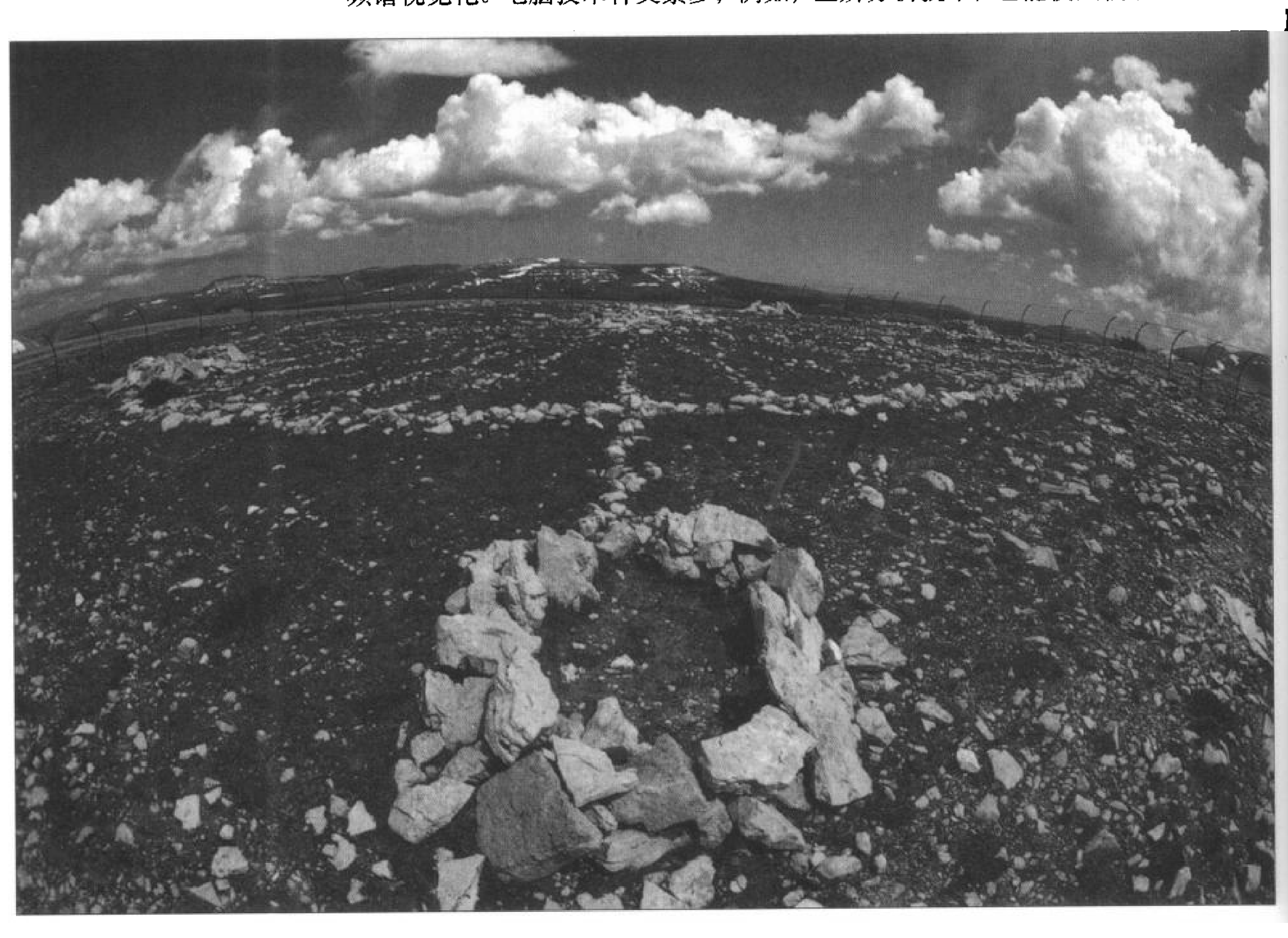
人们用放射性碳技术测定出有些魔轮已有5000年历史。

物学”成了颇受尊重的专门学科。到了20世纪70年代，专家们能够通过骨骸中残存的各种碳及其比例重建远古人类的食谱，于是“根据食物判定物种”的古老格言被赋予了新意。近一时期，人们把碳的研究与锶/钙比例的测量结合在一起，把时间推进得更久远，例如，人们曾经认为属高大强健的更新世灵长目的东非人(zinjanthropus)是素食者，后来才证实他们是杂食者。

1960年以后，古植物学渐渐变成一门独立的学问，专家们在了解世界农业的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古植物学重点研究了大型植物标本（宏化石）和花粉之类的微型植物残骸。前者并不是每个考古发掘地都能发现的，通常只在气候条件特殊的地方才能发现，例如在美国西南部干燥的印第安村落遗址里，往往都能找到玉米穗轴。反之，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见花粉微粒，它们是植物的再生体，有一层坚硬的外壳保护，能够生存上千年，故而考古学家们才能在考古遗址的土壤中找到花粉，甚至从石磨等工具上找到花粉，并鉴别出它们的品种和类别。

数据与抽样分析

60年代以降，人们开始使用数字技术和电脑，以便简化考古诠释。考古学家这样做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存储大量数据，并把它们转化成较简单、较易理解的模式，最简明的例子是制成图表，人们利用图表把考古现场里各种工具的频谱视觉化。电脑技术种类繁多，例如，区辨分析技术，它能使人们从2000个视



哈什多夫

农耕、采石和工业建设很可能毁掉考古遗址，不幸的是，现代世界最重要的考古工作就是拯救濒临毁灭的远古遗址。在欧洲中部，近期最令人瞩目的考古遗址都是在工农业建设工地上发现的。

哈什多夫位于德国南部的斯图加特附近，它的丰富墓葬可以上溯到铁器时代初期，大约公元前550－500年。中欧地区近期发现了几座墓葬，被称为"君主坟"，这是其中的一座。在德国南部，霍恩纳斯伯格的凯尔特人的山上要塞四周有一圈这样的墓冢，但是它们几乎全部都在古代或现代被盗挖过。1977年，一位业余考古学家报告说，在霍恩纳斯伯格以西10公里（6英里）处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迄今无人知晓的墓冢。

虽然哈什多夫古冢曾经高达6米（20英尺），但在风雨侵蚀下，人们几乎看不出它与四周的地面有什么差别。19世纪以来人们在这一地区做过详细的考古发掘，却一直没有发现它。风雨侵蚀和农耕使古冢濒临毁灭，直到1977年人们才决定对它进行全面挖掘。幸运的是，这座铁器时代初期的王冢未曾遭过洗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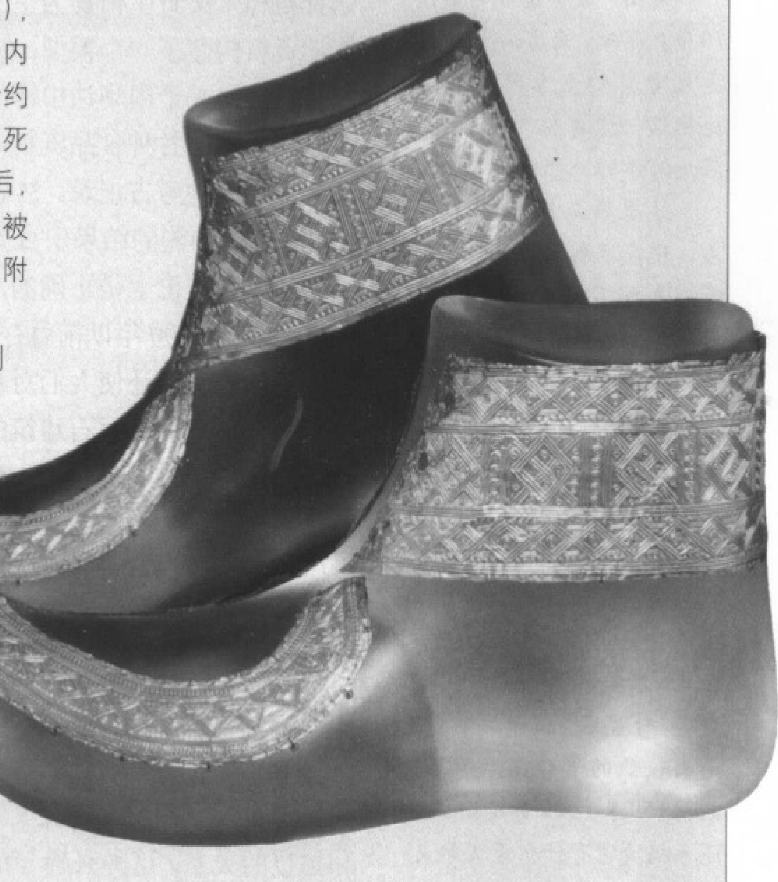
古墓挖掘的工作面直径60米（200英尺），11米（36英尺）见方，2.5米（8英尺）深，里面埋有两口木质棺材，外棺是用橡木做的，7.5平方米（25平方英尺），内棺4.7平方米（15平方英尺），1米（3英尺）深。内外棺之间用石料充填，古墓里填满了这种石料，总计约50吨。不幸的是，墓室的顶部承受不了石料的重压，死者下葬后不久，尸体尚未腐烂，墓室就坍塌了。最后，坟冢建成后，加工金、铜、铁等器物剩余的下脚料也被当作填料封进墓里，这表明许多陪葬物都是在古冢附近的作坊里制造的。

墓室里的陪葬物多得令人吃惊，不仅有金属制品，还有木制品、皮革制品和纺织品。棺材里的男尸身高1.80米（6英尺），头上戴着一顶圆锥型的桦树皮帽子，脖子上戴着一只金项圈，胸上有一只小袋，口袋里放着一把木梳，一只铁剃刀，五块琥珀，三只鱼钩。他躺在一把铜制的躺椅上，椅子有毛纺织品做的装饰物，专家们在欧洲凯尔特人的墓葬中从没发现过类似现象。座椅是由八个伸出手臂的女子铜像支撑。躺椅背面和侧面刻有马车浮雕和舞蹈浮雕。死者的服装甚至鞋上都有许多黄金装饰物，包括胸针、袖饰和镶嵌花边。

死者身边有一把铜壶，专家们认为它是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腊移民点制造的，上面的装饰物是三头狮子。墓室的墙上有九只喝水用的角，壶里的残物表明里面曾盛过蜂蜜酒，壶中还有一只小金碗。

墓室另一侧放着一辆木制四轮马车，外面包有一层铁皮，还有两套马具。在凯尔特人的君主坟里，马车并不罕见，但它的包铁却与众不同。把附件算上，马车全长4.5米（15英尺），车箱的重量较轻，车轮较大，每个车轮都有十根轮辐。

根据发掘情况看，哈什多夫古冢属于凯尔特考古中的"图坦哈蒙陵墓"类型。不论根据什么标准，人们都能窥视到铁器时代的贵族的生活和丧事的规制。



哈什多夫君主坟中出土的鞋，上面有0.2毫米厚的金箔镶嵌装饰物，它的几何图案很精致。请注意鞋眼。君主的项链和臂章都是用较重的黄金制的。

频点上提取10种测量数据，寻找视频模式或簇。这些模式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远古人类的行为。第二个目的是检验考古推论的有效性。例如，人们可以根据数据对比两种石器，看它们有多少相似之处，如果差别较大，就需要重新考察造成差异的原因。

20世纪早期的考古先驱们已经意识到，必需具备一定的数据分析能力，才能对考古现场或一个地区进行抽样分析。但是，直到1950年以后，美国的阿尔伯特·斯波尔丁（Albert Spaulding）才证明数据分析程序与考古推断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新问世的进程考古学采纳了他的许多观点。有时，由于时间和资金不允许做百分之百的全面考察，人们只好考察或发掘一个遗址中的局部或一个地区的局部。数据抽样分析要求考古学家给探察区域内的每个抽样单元或抽样地带以同样的抽选机会，只有这样，抽样调查的结果才能准确地反映整个地区的情况。

电脑与模拟

在20世纪60年代，电脑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容易使用，考古学家们很快认识到了电脑具有模拟研究的能力。模拟就是构建一套复杂的模型，考古学家只要改变其中的一个变量，就能测算出它对本系统各个部位的影响。

构建这样一套模型当然不需要功能强大的电脑，20世纪70年代的考古学家们设想出几种模式，电脑程序只要能描述出这些模式即可。大卫·赫斯特·托马斯为模拟北美西部大平原的肖肖尼人构建的生活模型就是一个好例子。肖肖尼人以狩猎和采集野生植物为生，能在极为艰苦的贫瘠的环境中生存。托马斯根据民族学资料构建了一个模型，然后用考古资料验证模型的有效性，这些考古资料全都出自一份关于内华达中部的瑞斯谷地（Reese Valley）的详细研究报告。只要改变输入电脑的各种食品资料，电脑就可以预测出人类行为的各种结果。每种结果都会产生一种考古记录。然后，再用发掘现场出土的资料验证这些预测。托马斯发现，模型预测的结果中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可以在考古中得到证明。所以，他的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说明了肖肖尼人的基本生活模式和居住模式至少自公元前2500年以前就存在了。

电脑的应用还使人们对众说纷纭的史前人类的生存状态有了新认识。天文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就巨石建筑的地点及天文意义提出了种种假说，上古天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领域。例如，20世纪70年代，天文学家约翰·埃迪(John Eddy)研究了穆斯山上的史前魔轮的天文学意义，怀俄明州的这个2600年前的巨大魔轮是由锥形石堆集而成，有许多条石头定位线。埃迪认为这些定位线是夏至的定位图，也是阿尔德巴兰星、莱格尔星和天狼星升起的图标。

上古天文学

考古学家们对上古天文学重新产生了兴趣，他们研究史前建筑与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关系，这种兴趣与前辈考古学家们对数量、重量和数据的兴趣巧合在了

右图：波罗德加的石圈。70年代早期，亚历山大·托姆重点考察的上古遗迹之一，他把这一遗迹作为他研究巨石几何学的一部分。

这里原先约有60块巨石，现在只剩下27块较小的了。在巨石四周的沙石上凿出壕沟需要耗费80000个工时——即100个男劳力连续工作3个月。

波罗德加位于英国最北部的奥克尼平原。托姆测出这一石环的半径是51.83米（170英尺），除了9个之外，其余的巨石离圆周线的误差都在0.5米之内。

“彗星石”位于巨石圈东南面较低的平台上，距离巨石圈150米（500英尺）。人们还未搞清它有什么天文意义。

一起。早在18世纪，斯蒂克利(Stukeley)就发现巨石建筑的主轴与夏至处于同一直线上。今天，占卜者和节日游客都知道了这一点。19世纪晚期，皮特里(Petrie)和皇家天文学家诺尔曼·洛克耶爵士(Norman Lockyer)都想在巨石的布局中找到与天相吻合的直线。但是，直到美国天文学家杰拉尔德·霍金斯(Gerald Hawkins)的《巨石建筑解密》(1965年)出版后，这种观点才被正式提出来。此书利用电脑做了复杂的计算，提出巨石建筑是巨大的史前日历，是用来预测日蚀和月蚀发生的时间的。

这种理论虽然诱人但有严重缺陷，故而遭到许多考古学家的反对。但是他们无法随便抹杀亚历山大·汤姆(Alexander Thom)的研究成果。汤姆是一位著名的工程师，他耗时多年测量英国和法国西北地区史前的石堆与石环。汤姆收集



的数据资料数量惊人，他要说明这类建筑的建造者们使用了共同的测量标准，他把这种标准称为“巨石尺”，相当于2.72英尺（829毫米）。他提出，虽然多数观察者认为石环很不规则，杂乱无序，但它们却是以复杂的几何形体为基础的，应用了毕达哥拉斯的三角学知识。最后，他与洛克耶和霍金斯一样，确信这些石头建筑是巨石时代的观察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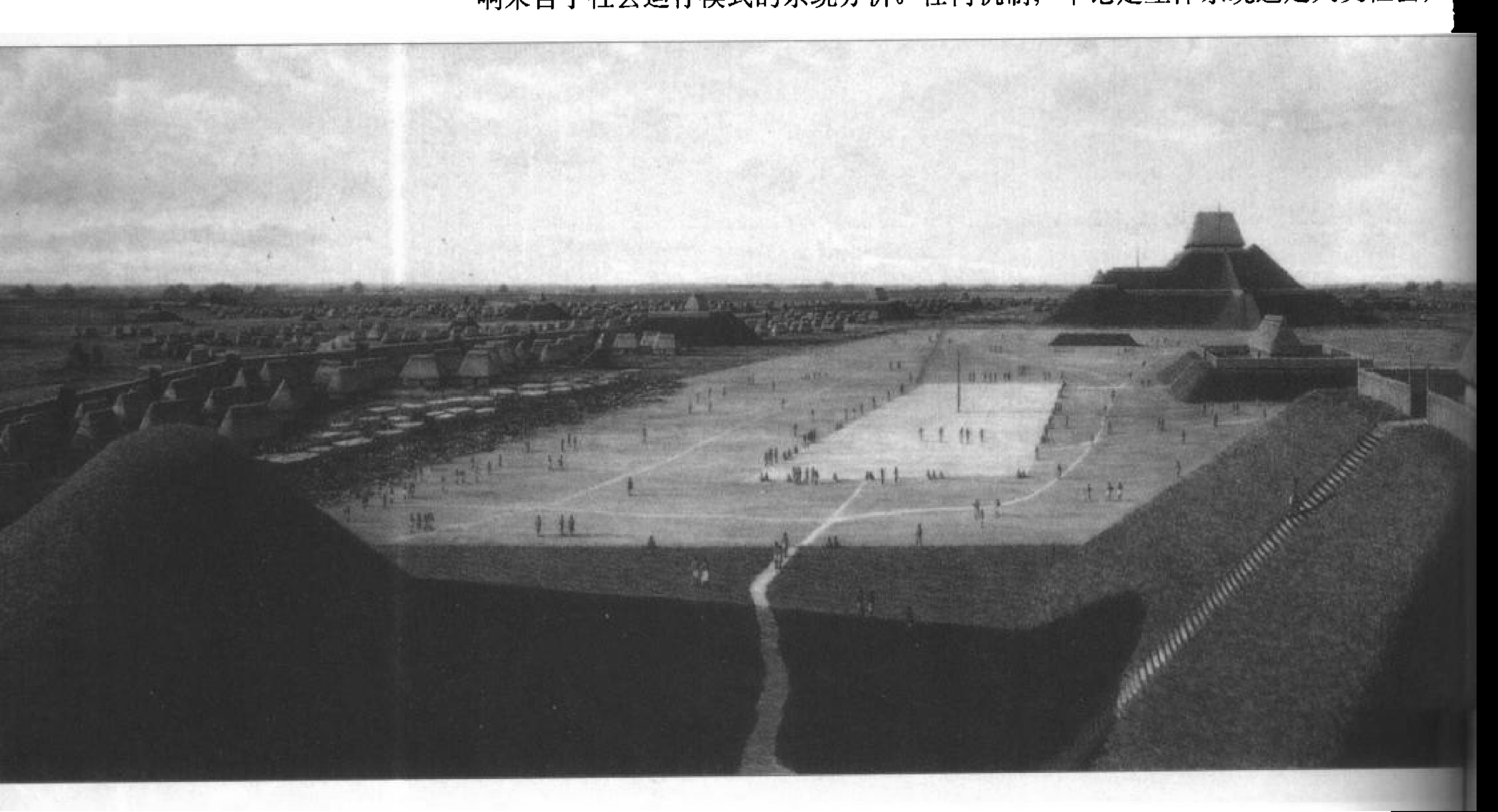
从1967年到1978年，他为证明自己的结论援引的例子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许多考古学家认为巨石尺和从考古现场推导出来的复杂的几何学不能成立。但是，汤姆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连最顽固的怀疑论者也不能否认：他开辟了一条重新审视史前巨石建筑的意义及审视建造者的思想和信仰的新途径。

考古思想

进程考古学

1962年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在一篇文章中首先向世界提出了“新考古学”或“进程考古学”的概念。他的观点论述严谨，颇有新意。在随后的20年里，他的观点受到一群青年考古学家的拥护，以至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进程考古学大有主宰整个考古学科、令所有观点都俯首称臣的势头。它的目标很简明：考古学应当与历史学分开，独自成为一种显科学，为从人类学角度理解人类行为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宾福德看来，历史学阻碍了考古学的发展。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进程考古学受到了三方面的影响。首先，它注重环境和文化唯物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得到了人类学家怀特和斯特沃德的支持。第二个影响来自于社会运行模式的系统分析。任何机制，不论是立体系统还是人类社会，



只有通过各个单元的相互作用才能运行。这些单元的关系意味着任何一个单元发生变化都要对其它单元产生可以预测的影响。从原则上说，一个社会模式就像一个电脑系统，只要改变一个元件，其它元件都会受到牵连——比如，自然环境、人口密度或技术水平发生了变化，宗教活动也会发生变化。

这种方法的倡导者是美国的肯特·弗兰纳里（Kent Flannery）和英国的大卫·克拉克(David Clarke)。肯特·弗兰纳里分析了美洲中部的玉米产业，并取得了典型数据；大卫·克拉克的《分析考古学》(1968年)为考古理论勾划出一个以系统为基础、涵盖范围甚广的模式。人们研究文化的多样性，并认为多样性是对不同功能和适应需求的反应。宾福德重新评价了法国的莫斯特石器制造业，并提出了这一观点。他不像博尔德（Bordes）那样把不同群体的差异视为不同文化或人种的差异，而认为群体差异可能是因为人们为不同目的使用不同的工具造成的。这种观点并不新鲜。早在1939年，唐纳德·汤姆森（Donald Thomson）就论证过：如果按照传统的考古学假设分析澳大利亚土著人的住所遗迹，考古学家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同一地区同时生活着不同的群体，因而他们就无法根据在不同季节所做的不同的考古记录去辨识任何一个单一群体。

宾福德的观点具有革命性，他提出了一种验证考古解释的方法。这种方法源于进程论者受到的第三种影响——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即卡尔·亨普尔(Karl Hempel)极力推崇的科学方法模式。亨普尔认为，为了做出科学的解释，必需从一般原理推导出假设，然后再用经验数据和独立数据对它加以验证。

进程论的实践者们坚持认为考古解释的价值评判应当比较科学。然而，宾福德选择的方法却是一种演绎－法则论的方法，或假设－演绎论的方法，这种方法颇有争议，甚至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人都无法统一意见。许多人摈弃了亨普尔的观点。不少考古学家则对引入该学科的哲学观点——即使他们并非对此一无所知——拿不定主意。于是出现了两种有趣的反应。一些人接受宾福德的方法，全然不管他的方法是否有科学效用。另一种人则既不赞同宾福德也不附会亨普尔，对两种革新全持怀疑态度。

1974年，弗雷德·普洛格（Fred Plog）用考古新方法对亚利桑那州北部的研究令人佩服。他的策略无懈可击。普洛格先把过渡期问题孤立开：公元前750年左右，制篮人文化正向普韦布洛文化过渡，其标志是制陶技术、建筑和以玉米、豆类、南瓜为基础的农业技术渐趋成熟。他把这个问题与较一般、较普遍的过渡联系在一起，与农业的起源联系在一起，由此他发现了一些变量，觉得可以用这些变量——人口（规模、构成、密度）、（专业分工形成的）差异、（不同活动与作用的）整合、（生存及各种活动中消耗和获取的）能量——解释过渡期。为了了解皮伯罗社会的变化，普洛格在考古资料允许的范围内检验了所有变量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尽管他承认无法对变化做出结论，但仍然把进程考古学的全部信条应用于实践并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可供验证的假说，让读者评判他的推理和论据。

60年代，宾福德的部分追随者在进程论的大旗下独辟蹊径。例如，普洛格与约翰·弗里茨(John Fritz)企图根据考古分析探索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律，但是他们什么规律都没发现，只在1968年发现了一种被富莱诺利讥讽为“米老鼠规律”的东西。“米老鼠规律”不证自明。例如，布须曼人（Bushman）住所遗址的大

左图：卡霍吉亚（Cahokia）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北部圣·路易斯附近，是美洲最大的古城，时间大约在公元1100-1150年。

人们只要谈论美洲中西部史前史的变化就会谈到这个居民点，它当时的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城邦国家的水平。

这片复原建筑是从南向北拍摄的，东面是大集贸市场，西面是在护堤上建的祭司庙。上层人物们的住所和店铺在城寨的中央，四周有木栅栏。普通市民的住房和田地在城寨外面，向四面八方延伸出约一英里。

许多考古学家把卡霍吉亚称作“酋长国”，虽然没有发现文字证明，但是考古学家们都认为它是某个国家的首都，存在于公元925－1200年间，而且相当强大。

在挤满人的平坦的市场附近有一百多个护堤。密西西比河冲积平原上的居住遗迹表明，那里曾经人口密集。根据中西部古墓出土的陪葬品的形状和200多具陪葬人牲等证据看，当时的社会是等级森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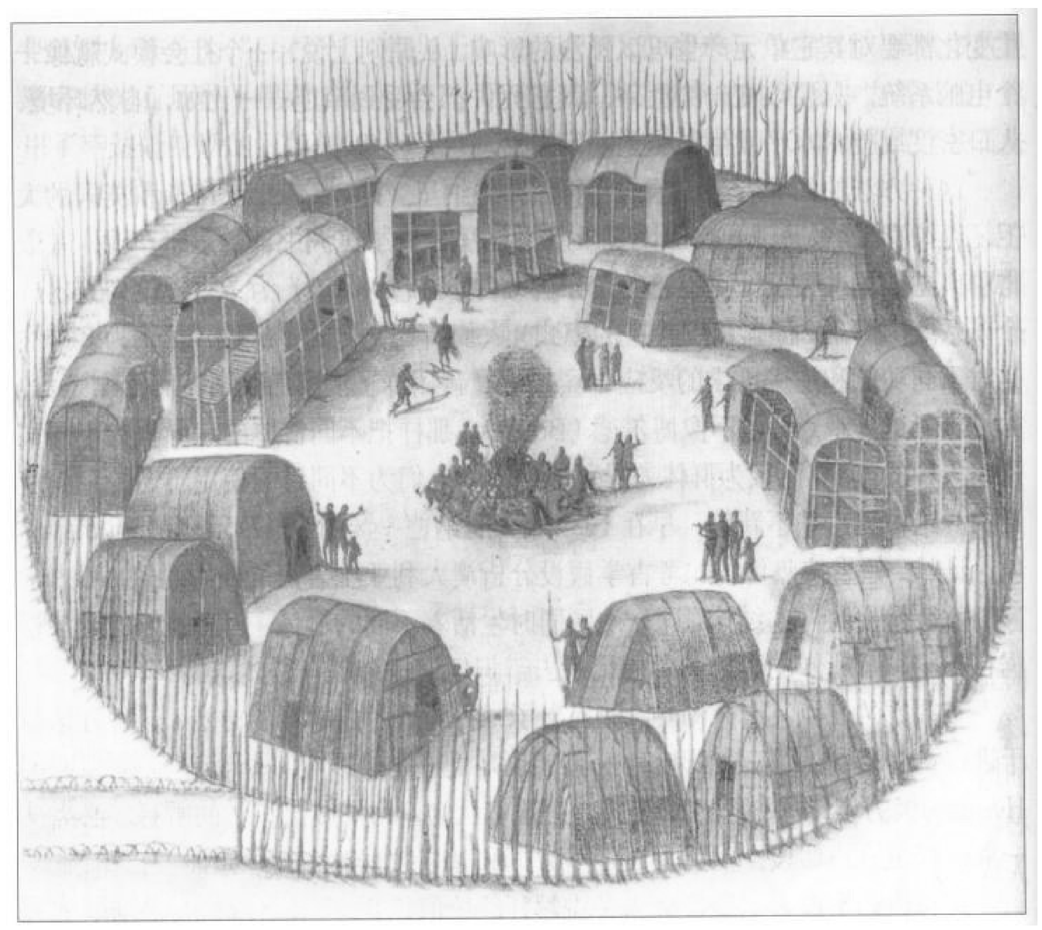
城市规划、金字塔形护堤、卡霍吉亚文物上的人物形象等都暗示出它与中美洲关系密切，因为卡霍吉亚位于密西西比河畔，这条河是通往墨西哥湾的主要水道。

进程考古学的核心在于确认考古记录如何反映人类从前的古怪行为和如何提出最有价值的问题。

这是印第安人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居住点，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探险家和艺术家约翰·怀特于1585年画的。它正是考古学家们期望在综错复杂的残存物中找到的教学实物，他们需要探索这种遗物的微妙之处。

怀特描绘了美洲印第安人生活中稍纵即逝的片刻。这是白人定居“波姆奥克城之前，他们（印第安人）住房的真实形状，房顶上盖着席子，有些则盖着树皮。房子不是用墙而是用密集的杆子围起来的。”画中栅栏内有18栋房子和一群阿尔冈昆人。

有时一件不具代表性的、很小的器物也能告诉我们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表现出某一社会团体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提出一些具有实践意义的问题要人们解释。今天，考古事业的全部范围已变得比较清晰。



小与房屋的数量成正比，或者“当居住地的人口增加时，地窖的数量也相应增加”。

为了回敬这种理由充足的怀疑论，宾福德提出了“中距离理论”，把研究的重点从为什么文化随时间变化（不论变化怎样有限，从常理或一般原则上看，变化都是清晰的）转移到考古记录怎样才能反映早期人类行为上来。此后，他费尽心机地去理解过去的人类行为，发表了详实的作品，分析了狩猎－采集社会及其物质文化，解释了考古记录产生的原因。

如何解释这类问题在当代考古学领域里是最令人动心的，其最终目的在于了解行为过程：古人为什么必需那样做。但是，在提出问题前，考古学家必需了解另一个问题：考古遗迹被挖掘前的变化过程。早在进程派考古学家之前，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类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只有进程派考古学家才对这一方法做了系统的界定，并把变化过程单独抽出来进行研究。美国考古学家迈克尔·施佛把这一学科定名为“行为考古学”。施佛关心的是怎样把对考古记录产生重大影响的东西分离出来，他把这种影响称为“变态”，既有自然的变态——例如土质的恶化，也有文化的变态——例如后人从考古遗迹中取走物品。

最后，80年代又出现了一种“中距离理论”：“遗址外”考古学。“遗址外”考古学不注重较大的考古现场——它们大都不符合规范，而把注意力放在器物的分布和场景的特点上。比如，在东非，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人类早期丢弃的营地。“遗址外”考古学家力图弄清人类行为在某一地区的整体分布，以便进一步认清地貌变化对考古记录的影响。

进程考古学及其分支全都源于北美，世界其他地方的学者们并不认同。英国

剑桥大学的史前史专家大卫·克拉克(David Clarke)的思想与进程考古学倡导者们的观点最接近。说来有趣，但也颇费猜想，要不是他只活了38岁，谁知道他的观点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克拉克曾明确表示他想根据系统论创立一种独一无二的考古理论。然而，他从未主张过研究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律——而这一点正是进程学派的特点之一。他也没有把自己的观点与汉普尔的模式结合在一起。

进程考古学从来没有像其崇信者那样主宰过考古学界，虽然它的影响在60年代后渗透到了整个学科。这种理论使考古学家们相信考古学有能力研究人类行为——尤其是在美国，因为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知识领域还是在体制上，考古学都被视为人类学的附庸。进程考古学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前得出结论的质量和效用，使人们认识到考古解释必需注意客观性。正是由于宾福德大力倡导明晰的科学的方法，美国考古学界才在最近30年里花了大量时间去考虑考古知识的现状。

后进程考古学

进程考古学在北美风行一时，难免引起强烈反应。剑桥大学的考古学家埃恩·霍德曾在克拉克手下从事科学与实证研究。70年代晚期他的思路大变。他与学生共同推出一种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后进程”考古学，承认社会习俗与学术实践有联系。

尽管后进程考古学源于剑桥大学，但是，其他地方的考古学家独立研究出的一些方法也被归入其中。例如，美国的马克·莱昂内(Mark Leone)就用了多年时间研究意识形态在考古学家诠释过去时的作用。他在一篇论文中详细地分析了威廉·帕卡(William Paca)的花园，这篇文章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威廉·帕卡是18世纪马里兰州阿纳波里斯的富有公民。他的花园看上去自然天成，但实际上是精心构思的产物。莱昂内认为，帕卡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全都建立在奴隶制上，但他主张给奴隶自由。花园的“自然化”恰好为他内心的矛盾戴了一副面具。当然，这种解读可能是考古学家臆想出来的，有人认为既然花园为私人所有，那么只有帕卡及其家人与朋友才知道它所包含的意识形态信息。然而，莱昂内却借此说明考古学家起码应当考虑一下帕卡花园之类的文化与考古遗址的关系，考古学家不应当仅仅研究技术和生活水平等传统问题。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

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对过去做出考古诠释。故而，马克思主义考古学试图通过审视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例如，技术及其控制、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来理解社会变化的机制。这些矛盾表现为不同社会-经济阶级之间的斗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则被用于控制社会中的劳动者。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们公开声称其考古学具有政治性，其他考古学家则不承认这一点，他们宁可把专业工作与政治信念分开。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不注重经济基础的首要作用，而是强调意识形态在决定社会变化时具有的重要作用。“法兰

克福学派”推出的批判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科学中很流行，在大约十年后竟然进入了考古学讲坛。这种理论认为，所有知识都不能与政治无关，否则，任何考古言论的客观性都值得怀疑。这种观点会引起两种潜在的反应。第一，如果有些书籍声称古代文明的世俗起源之外还有超世俗的起源，那么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们可能会认为，这种观点与专业考古学家的意见具有同样的效力，故而，它不承认人们对过去所做的判断。第二，更恶毒的是，它容忍人们像写小说那样重写历史，允许人们篡改历史，把屠杀犹太人的历史记录说成是犹太人的宣传，有些反犹主义分子曾经这么做过。尚未全面接受进程论和实证论的考古学家们都必需正视这类反对意见。

西方的新动向

考古学的基本矛盾在于它要了解过去，却只能研究现存遗物。由于所有的考古遗址都存在于现时，为了再现过去，考古学家们只能利用类比法，或通过试验性的工具制造和其他技术再现史前人类的行为。

类比法的应用

考古学中最早使用的类比法是人种学类比法，这种方法起源于19世纪，当时的原始部落被视为“活化石”和史前人的再现：例如，企图驯化驯鹿的北方民族被当作欧洲旧石器时代猎鹿民族的参照信息源。在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之类的古物收藏家那里，人种学类比法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然而，它却为种种考古假说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源，许多考古数据的验证都有赖于这种资源。

实验考古学和人种考古学为解析考古记录提出了其它假说。实验考古学必然要复制或使用出土工具甚至考古遗址，只有这样，才能验证关于工具制做方法和功效的假说。早在19世纪，人们就意识到这种方法的价值，拉尔泰、卢伯克、皮特－里弗斯都曾用石制器具和挖掘工具做过实验。在北美，克罗伯做了大量研究，包括复制伊什用过的传统技术。伊什本是加利福尼亚雅伊部落的印第安人，1911年由于部族内部的大屠杀被迫逃入白人世界。后来丹麦考古学家伊韦尔森(Iversen)于50年代研究了石斧砍树的效率，他发现，3个人用仿制的史前石斧在4个小时内砍倒了500平方米（等于600平方码）橡树林。

今天，实验派考古学家做了大量复原过去的工作。在北美洲，唐纳德·克拉布特利(Donald Crabtree)于70年代首开复原石器工具的先河。同法国的波迪斯一样，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的工作也具有革命意义，他用电子显微镜扫描石器利刃的磨损程度，分析出了磨损的特点。基利复制了各种类型的史前石器，然后用它们切、砍不同的材料，得到了不同材料和用途与石器磨、碰形成的“印痕”。然后再把这些印痕与真正的史前器具利刃上的磨损加以比较，由此鉴别出不同石器的功能。实验结果很能说明问题。例如，他发现英国克拉克顿旧石器时代的器具分别用于伐木、剥骨、切皮和割肉。

类比系统。一对因纽特男人和女人，摄于1914年。

同其他所谓的“原始人”一样，他们被屈辱地视为仍然过着史前生活的活化石。现在，因纽特人——通过人种考古学——已经成为研究考古记录如何产生、如何诠释和观察的宝贵资源。

根据物质文化再现史前人类的行为，考古学家需要人种学资料。但是人种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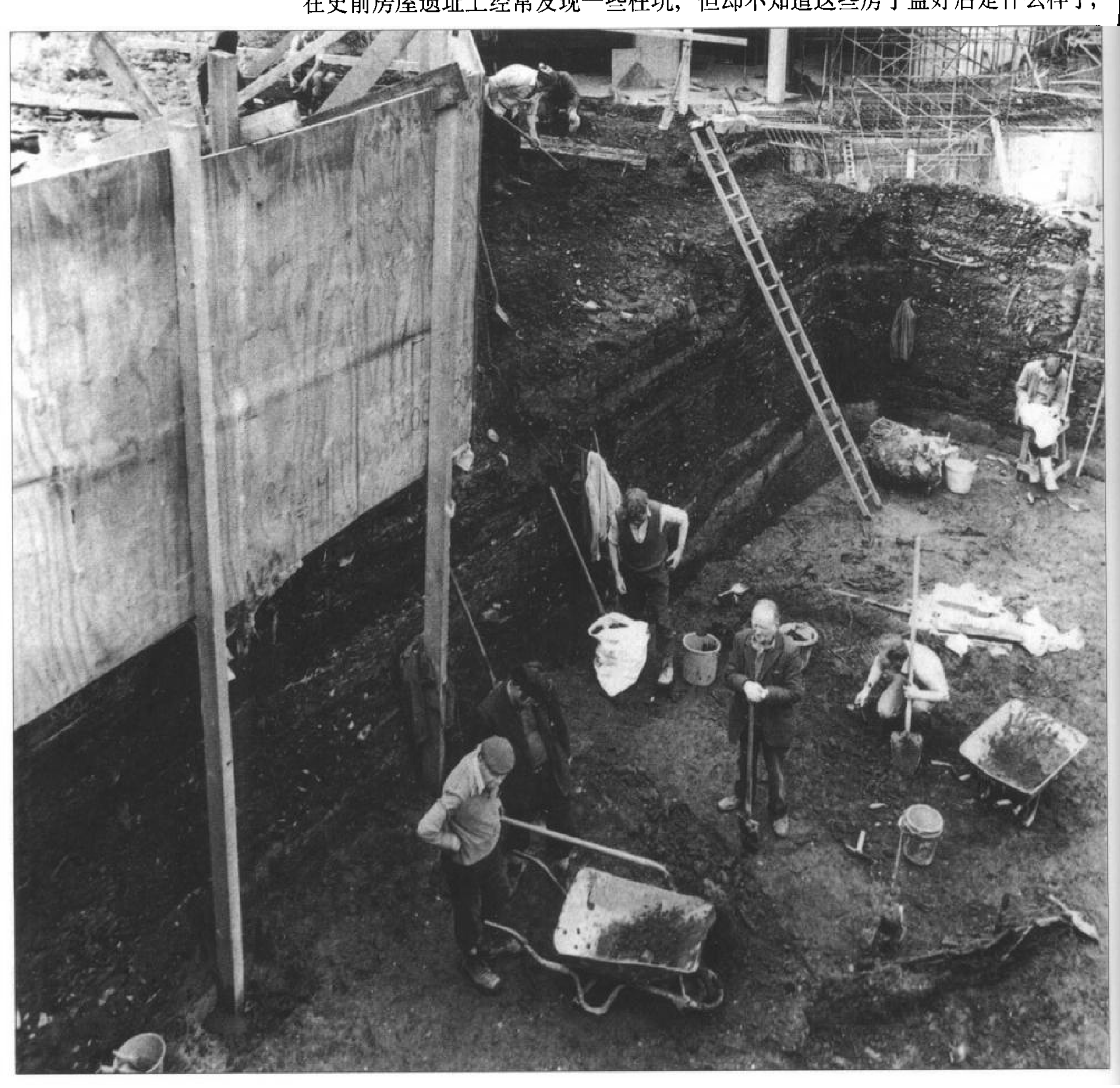


无法提供他们需要的资料，于是，人种考古学便出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汤姆森(Thomson)对土著人生活的研究说明这种研究大有潜力可挖。但是，直到70年代，考古学家才开始了大规模的人种考察，其直接目的是要搞清楚不同类型的人类文化行为能产生什么样的考古记录。例如，美国考古学家约翰·耶伦(John Yellen)研究了非洲昆族人，深入了解了他们在住地附近组织的各种活动。威廉·拉恩杰(William Rathje)研究了亚利桑那州塔克森的垃圾处理工程，结果表明，详细研究美国现代城市的垃圾处理，能使人们看清都市居民的生活行为。这一结果令人吃惊。

实验考古学

与此同时，欧洲人对复原古建筑和古农场的实验也越来越感兴趣。考古学家在史前房屋遗址上经常发现一些柱坑，但却不知道这些房子盖好后是什么样子，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都柏林。最近，考古工作者在都柏林的伍德·奎多次挖掘了被水浸泡的遗址，人们对这一斯堪的纳维亚港口发达的贸易关系和生活状态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一港口在公元10到12世纪相当发达。都柏林城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公元917年建立的。就种类和质量而论，这里发现的文物比迄今挖掘出的任何斯堪的纳维亚城市的文物都好。



住进去的感觉如何。如果不做实验，人们的猜想只能是猜想而已。1965-1967年，这一想法被付诸实践，人们按照在考古遗址上发现的柱坑设计并建造了6套木结构的茅草房。人们仔细研究的这种房屋，进而理解了不同结构的优点以及取暖问题和隔音问题。在一个极端实验中，人们把其中一栋房子烧毁，然后把里面的残物与考古时经常碰到的出土器物进行比较。

在英国南部，人们耗时20年做了一个相似的实验：复建一个铁器时代的农场，不仅要复建农场上的建筑物和附属物，还要复建农田、庄稼和牲畜，汉普郡的巴特瑟古农场种植铁器时代的谷物和其它作物，在仓库和白垩石地窖里储藏产品。谷物按照史前时代的形式种在长方形的小块农田里，用德克斯特牛牵引简单的犁，这种牛与铁器时代的牛很相近。巴特瑟实验不局限于史前农业，还重建了铁器时代的圆形房屋和一个实验性的烧制陶器的窑炉。

实验甚至扩大到复原古罗马的洗澡堂，相对说来，这种建筑结构比较容易了解。在德国的萨克斯顿，人们重建了一座罗马澡堂。人们还试着给它点了火，但是过了好几天才烧到所要求的温度，而且消耗了大量木柴。有一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木柴多了，温度太高，木柴少了，火就灭了。人们至今不知道古罗马人是怎样保持衡温的，哪怕只维持摄氏40度的中等温度和100度的湿度。

都市考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市考古蓬勃兴起，其起因部分是由于60年代的经济腾飞，部分是由于清理战后的那些受到轰炸的废墟及重建工作。其结果既是一场欢乐也是一场悲剧。一方面，我们更多地了解了伦敦、汉堡这样的中心城市的早期发展情况，如果没有这种发掘机会，我们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发掘工作使人们看清了新建筑群造成的毁坏简直就是一场悲剧。世界城市史的大量证据已经永远不复存在。

毁掉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城中心之前必需支付一些补偿金，以此用作重建新区前的考古工作的基金。在英国，人们发现了古罗马时代的最早的木制码头。在约克郡，人们在铜门一带发掘出斯堪的纳维亚人古城的一部分，它被浸泡在水里，有很多有机物的残骸，包括木制工具和生活用品。在欧洲其它国家，人们在现代城市的下面亲眼目睹了同样不期而至的全新的考古信息：在巴黎，为了修复卢浮宫，人们必需挖掘埋在宫殿下面的中世纪古堡，它现在已被陈列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在塞纳河下游巴黎的波西区，人们在开发新区前提前做了考古挖掘工作，发现河畔有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居住点，挖出了公元前四千纪的木船残骸。

作为长期考古发掘规划的组成部分，城市中心地区的发掘工作已揭示了很多东西，提供了很多历史见证，英格兰南部汉普郡的温彻斯特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考古学家在布鲁克街挖掘出中古建筑群的布局，它与当时的文献记录密切相关，这说明了建筑的价值。过去的文献描述了那里曾经发生过的活动。

湿地考古

在过去30年里，考古学的一大革新就是重新关注湿地。这种创新的起因之一是人们意识到大规模的抽水工程和泥炭采掘等商业活动威胁到沼泽地和水泽地下

诺夫哥罗德

诺夫哥罗德位于俄罗斯西北部，圣·彼得堡南约100英里（160公里）。诺夫哥罗德发掘工作始于1929年，1951年后仍时断时续，前后将近50年。挖掘诺夫哥罗德是俄罗斯最大的考古工程。

这项工程出土了大量罕见之物，尤其是木制房屋和木板街道，此外还有皮革、木制器皿、乐器、甚至玩具。中古时代的诺夫哥罗德建在夯实的黏土上，它的木制结构避免了水浸。人们对较大的建筑用材做了年轮分析，确认它们的树龄在15到25年之间。那里出土了140个作坊，它们分别生产皮革制品、首饰、鞋、金属制品和玻璃制品等器物。诺夫哥罗德是一个重要商业网的中枢，其产品远销北欧甚至印度洋地区。

诺夫哥罗德的房子全是用木头建造的，而且是用一些基本的预制件组合而成，很可能是两层或三层的建筑。这些房子并不毗连，每栋房子都有一个用木栅或柳栅围成的院子，街道表层全都铺有木板，其方法是沿着街道铺上三到四根粗圆木，然后把直径为40-50厘米的圆木劈成板材，一块挨一块地横铺在上面，盖住整个街道。人们在圣·考斯玛斯和达米恩路一带发现了28条街道，根据树龄学鉴定法测算，最早的街道建于公元953年，最晚的建于1462年。

在诺夫哥罗德发现的最宝贵的文物是七百份"树皮文"手稿，成文年代在11世纪中期到15世纪早期。普什科夫城也曾发现过树皮文，它是用桦树皮做的，先把桦树皮煮一下，然后把粗糙的部分剥掉，用骨针或金属针在上面铭刻文字，不加墨汁。树皮文的内容涉及世俗法律、政府文献和商业讨论，它们的文字水平出乎预料的高。

目前只挖掘了诺夫哥罗德古城的百分之二，考古学家们估计在这座现代城市之下还有20000片树皮文有待发掘。

木材城。诺夫哥罗德三一教堂附近的挖掘工作。



面埋藏的遗物。丹麦、英国和法国的重大发现都说明欧洲湿地考古有很大潜力。在丹麦，人们挖掘了台伯林德·维哥。这个地方是6000年前的古代居民区，人们发现了一些木船和一把带有装饰图纹的船桨。在英国南部的萨默塞特郡，人们发现了一些用木材铺建的穿越沼泽地的古路，并对其中一些路段做了仔细的研究，确定了它们的铺建日期、建筑方法和当时周围的环境。这项工作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采用了树轮鉴定法确定古路修筑年代，结果表明，其中最古老的一条路——所谓“甜美之路”——建于公元前3807年。这一结果给人以深刻印象，使湿地考古学在当代野外考察工作中有了一个清晰的雏形，考古学界称之为“湿地革命”。

水下考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轻型潜水设备的研制成功，水下考古得以实现。水下考古可以重新发现淹没在水下的文物和遗址，尤其是沉船。沉船的价值在于它们为人们窥视古代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因为它们是“时间之船舱”：历史瞬间的“快照”。虽然盗猎之徒给这种活动带来了恶名，但是，今天的水下考古工作主要是由一些有良知的、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干的。轻便水下呼吸器的问世，使潜水员能够独立地对水下考古遗址进行探察和发掘。

同陆上考古一样，考古学家必需根据历史文献和当地人的通报才能找到水下遗址。质子地磁测量仪之类的遥感器或水下摄像机都得瞄准水下遗址。水下发掘的记录、搬移与传统的陆上考古一样，操作时得格外小心。水下操作动作缓慢，风险较大。最后，被发掘的文物一旦与空气接触很容易腐蚀变质，所以必须做些处理，以便减缓甚至终止腐蚀。

水下考古的初次突破是在地中海进行的，乔治·巴斯（George Bass)等先驱人物借用科学技术发掘了古代和近代船舶，显示了科学技术的力量。现在，这种方法在世界各地广为应用，并且不受气候的影响，甚至可以应用于苏必利尔湖和拉布拉多湖那种水文情况复杂的地方。近年来，潜水竞赛兴起了，它意味着人们将会发现并报告更多的水下遗址——在地中海一带，1945年以来人们发现了1000多艘沉船——但是，一些非法发掘也造成了破坏。近年来，人们研究出遥感摄像技术，并把它应用于海边的浅水处，它意味着深水遗址也可以被识别出。

古罗马时代，大规模的食品运输主要依靠海路。酒和橄榄油则装在陶罐或“安弗拉”（amphorae，一种双耳细颈陶器——译者注）里运输。这意味着人们很容易用仪器识别出沉船。在意大利吉格里奥岛附近，专家们在一艘公元前6世纪的沉船上，不仅发现了希腊大陆出产的精美陶器，还发现了大量金属铸块和埃特鲁里亚出产的罐装橄榄油；一艘公元前4世纪马约卡的伊尔·赛克沉船内装有雅典陶器，上面带有粗糙的迦太基图文，这意味着，船货——包括酒——虽主要出自希腊，购货的商人却是腓尼基人。反之，装运粮食和其他有机物的沉船却不易被发现，虽然古代资料说这类商船不少，但是，它们的数量与运载的货物量几乎没有多少关系。人们只找到一艘粮船，而且是在古罗马时代之后沉没的。

沉船使专家们不得不对考古文物分布理论做出修正。显而易见，同一艘船上可以有不同地方的货物。墨西拿（Messina）海峡波提赛罗附近一艘公元前5世纪

文多兰德

近一个时期，原古罗马西部行省的文多兰德的考古发掘成效最高。文多兰德位于英国北部，哈德里安长城以南。

早在1702年就有人注意到文多兰德要塞的残存物，但是直到1930年这里才开始了首次发掘工作。1970年以后，人们挖掘了一座军用澡堂，出土的残存物中有头发卡和梳子，这表明，使用这座澡堂的不仅有卫戍部队，还有妇女。在这个据点之内还有一座驿站或旅店，它是为沿着哈德里安城墙巡逻的军官使用的。

文多兰德的出土文物全都被水浸泡过，因此也就成为对四周环境的证明。卫戍部队显然以肉食为主：牛肉、羊肉、猪肉，甚至还有鹿肉。没有多少有关农业的证据，尽管人们吃的白菜是一种蔬菜，并且还找到了许多榛子壳。出土的有机物则有鞋、皮革和纺织品残物。

最有价值的则是1500份文献，一些是写有文字的木片，文字是透过蜡刻写上去的，还有一些碎木片上的文字则是用墨汁写的，可以借助红处线摄像术阅读。这些文物，尤其是在罗马帝国北部行省出土的文物，在文多兰德考古工作开始之前尚不为人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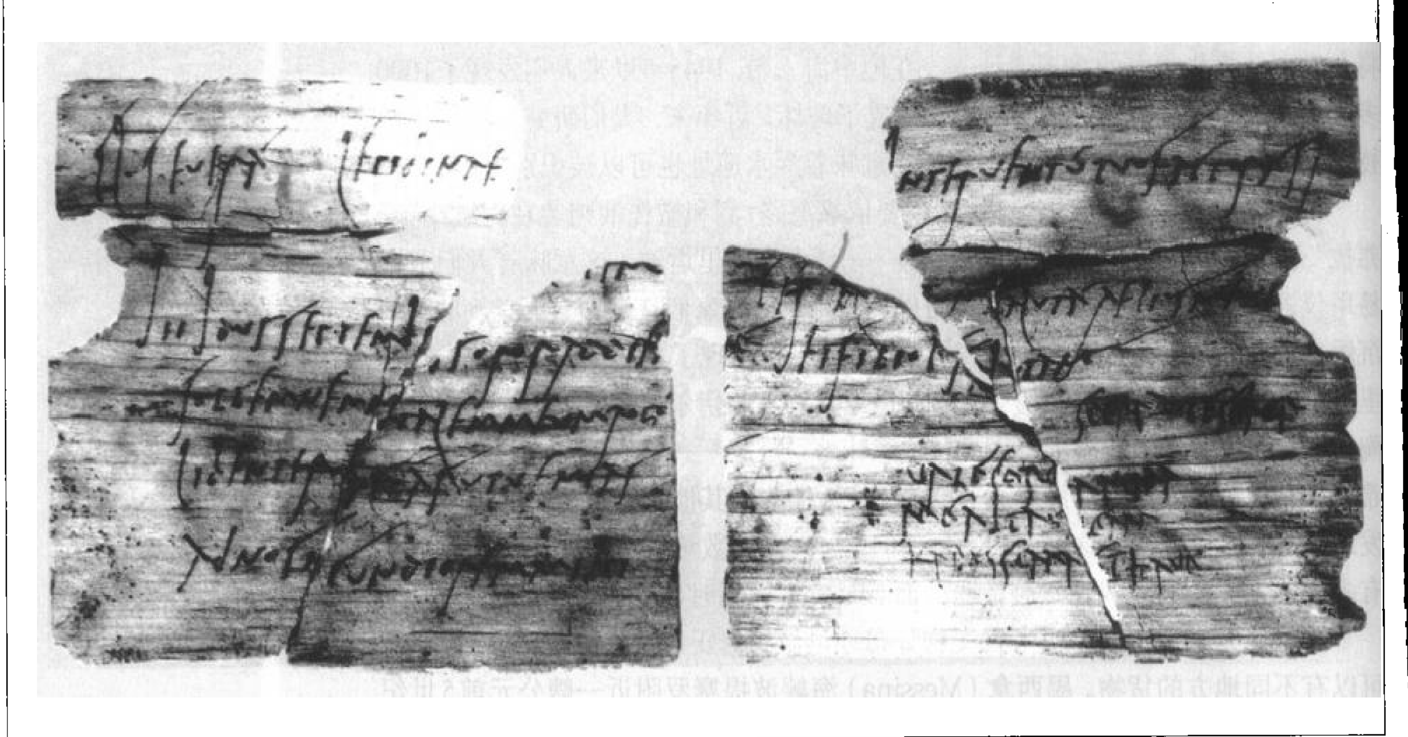
有些文件纯属私人文件，例如文件提到了L·纳拉图斯·马瑟留斯（"最高贵的总督大人"），据有关文献记载，他是公元101年到公元103年的布列塔尼省总督；还有一封致苏尔皮西娅·莱皮迪娜的信颇为引人注目，莱皮迪娜是文多兰德驻军司令官弗拉维修斯·赛得亚里斯的夫人，写信人是她的朋友克罗迪娅·赛弗拉——附近要塞司令官阿里尤斯·波罗修斯的夫人。信中写道：

> 克罗迪娅·赛弗拉向莱皮迪娜致意。我谨向您发出诚挚邀请，9月11日是我的生日，敬请光临，您的到来将使寒舍蓬荜生辉。代我向您的赛得亚里斯问好。我的阿利尤斯向您及您的儿子们问好。我还期待着您妹妹的光临。我的最亲爱的好姐妹，愿我们一切都好。

文多兰德出土的最重要的木片上写有军事账单，提供了向军队发放军饷的信息。由于可以把它与出土的其它物件进行对比，其意义尤显重大。这些信件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们提供了当地拉丁俗语的信息，词汇的拼写与当时的经典作家的拼写有很大差异。把这种不列颠式的写法与古罗马人在埃及纸草上的写法加以比较也是很有价值的。

下图为口授的邀请苏尔皮西娅·赛弗拉出席克罗迪娅·赛弗拉生日庆典的信件。右下角的签名好像出自赛弗拉本人。如果确实的话，它就是现存最早的出自妇女的拉丁文手迹。

考古挖掘总监罗宾·伯雷写道："我初次见到小木片上用墨汁写下的文字时又惊又喜，如果我不得不在又脏又潮的地沟里消磨余生的话，我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再次体验到这种发现的惊喜。"



乌鲁·布鲁恩——青铜时代的沉船

公元前14世纪，一艘从塞浦路斯驶向爱琴海的船，在乌鲁·布鲁恩海岬附近——土耳其南部的危险海域——发生了海难，它因漏水沉入海底。20世纪晚期，一些采集海绵的潜水员发现了它。1984年之后，乔治·巴斯和一只来自得克萨斯州诺基卡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系统地发掘了这艘沉船。

在考古学家看来，沉船的优点很多，里面不仅有大量同一时期的沉积物，而且经常会有意外的发现。此外，有机物在水下比在陆上保存得好。乌鲁·布鲁恩的情况就是如此。人们在沉船里发现了杏仁、橡子、松果和数以千计的橄榄、无花果、石榴子，还有整整一吨树脂。树脂可能是用来制做葡萄酒或香油的。

船货大部分是金属，250个牛皮袋里装满了塞浦路斯青铜，至少有6吨重，此外还有锡和钴蓝玻璃矿沙。玻璃、象牙、河马牙、埃及乌木，可能是想让迈锡尼工匠制成首饰的。沉船遗址中还发现了金银首饰、青铜器具和武器。

考古学家们无法推测这艘船的国籍，因为船员的遗物中有迈锡尼人的、塞浦路斯人的、埃及人的、巴比伦人的和加喜特人的铅封，还有出自迈锡尼希腊、塞浦路斯和近东的陶器。虽然船上肯定有商人，并且是一艘驶向爱琴海某一港口的皇家商船，但情况究竟如何却不得而知。



潜水员在从乌鲁·布鲁恩水下公元前14世纪的沉船中搬运装有青铜矿沙的四角“牛皮袋”，每袋重达60磅（27公斤）。此外还发现了一些锡矿沙。

一个采集海绵的潜水员在土耳其南部卡斯附近的海底峭壁下面发现了一堆矿沙，此后，人们又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它的残骸星散在水下50米（165英尺）的海床上。

人们把沉船中的残物与陆上考古遗址的残物加以比较，觉得这艘船可能是从叙利亚或塞浦路斯驶向小亚细亚的罗得岛或希腊大陆的。紧靠海岸的航道很可能是青铜时代后期在地中海东部运输铜的海道，它大大缩短了水上航行的时间。

下左图：阿纳物·拉明·安波莱尔（1917–1977年）和安德列·勒鲁瓦－古兰（1911–1986年）在奎西的波什莫尔的洞穴，1975年。

下右图：西班牙北部埃尔·卡斯蒂罗洞穴里难解的"符号"，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0000年至10000年。勒鲁瓦－古兰认为它们是"完整的符号"，故而是雌性符号。洞穴里的其它绘画与刻纹——显然是后人在漫长时期里一点点地添加上去的——包括50个红色手印、大量方形符号和155个动物图形。同一座山上还有一个拉·帕西加洞穴，里面有440幅动物图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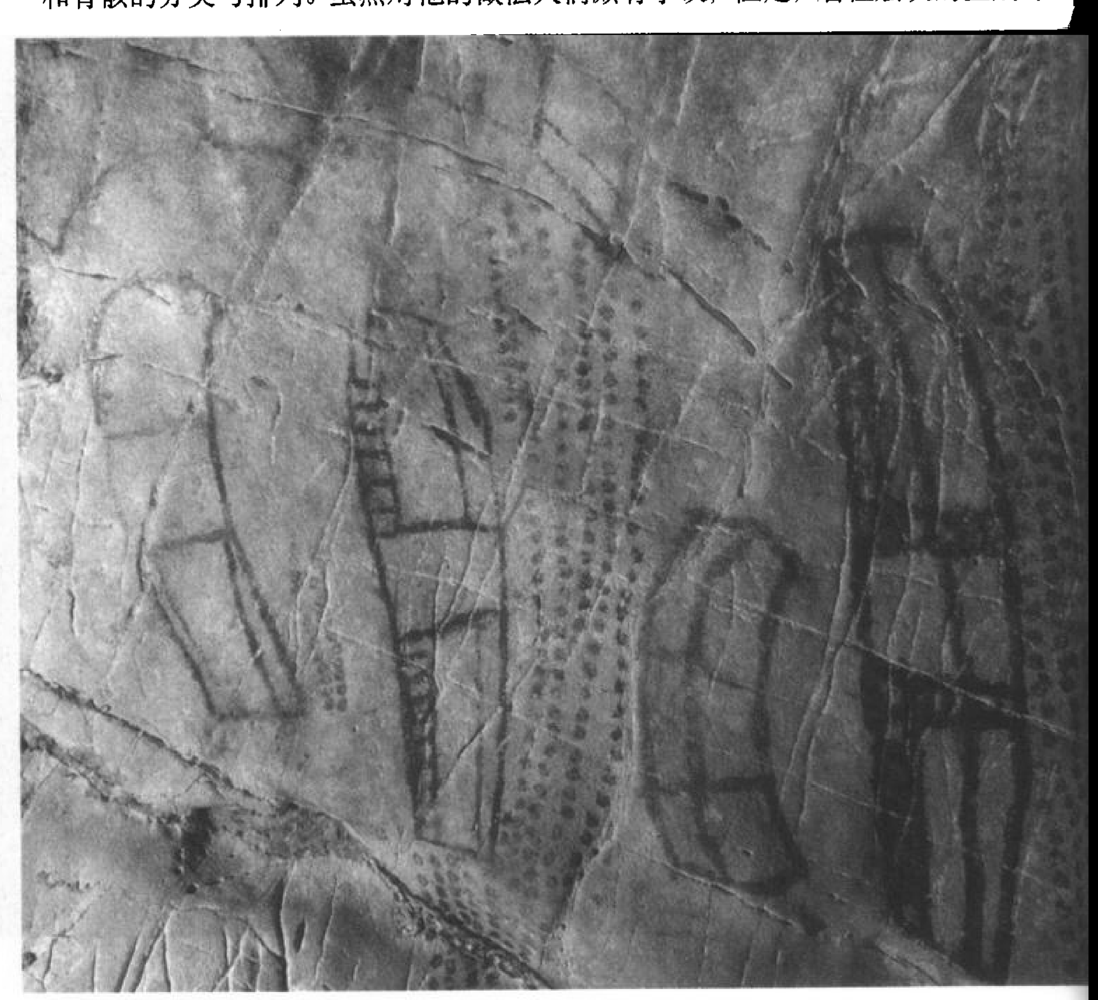
的沉船就是一个例子：它的罐装货来自地中海东部的不同城市，而盛东西的精美陶器和银矿石却来自雅典。这样的沉船和船货引起了有关古代世界经济的争议，扩大了人们的研究范围。

石器时代考古学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法国史前史学家安德列·勒鲁瓦－古兰（André Leroi-Gourhan）和弗朗哥·波德斯主宰了西欧的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工作。勒鲁瓦－古兰是一位人种学家，他最先对考古学产生兴趣。由于他无法亲自到海外做人种学实地考察，1944年他让学生们从事发掘工作。他渐渐地把考古学当作人种学的一个分支，主要关注人类行为和人种分析。就像阅读文献是历史学家的基本工作一样，勒鲁瓦－古兰也把发掘工作当成一种基本工作。

勒鲁瓦－古兰对阿西－苏尔－居尔（Arcy-sur-Cure）的岩洞做了细致入微的发掘（1946–1963年），1964年以后，又对巴黎附近的潘瑟旺露天驯鹿场进行了仔细的考察。他花费了巨大气力，在每个活动区域里里外外地翻了一遍，用人种学的类推法研究了史前人类的杀牲方法，并对制造工具的过程做了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说，他把文物当作人类行为的源头进行研究：从原材料的选择、工具的制造，一直到最后弃而不用。他对工具磨损的痕迹、燧石和器具的修补全都做了分析，研究它们的制造过程，他的研究重点是史前人类的生活，而不是石器残片和骨骸的分类与排列。虽然对他的做法人们颇有争议，但是，居住层次的鉴别却





与人类某一较短时期的生活有关，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群体在每一居住层次上生活时都做过一些事情，这种方法可以发现他们做过什么事情。

勒鲁瓦－古兰在旧石器艺术领域里同样颇有影响。20世纪50年代，他与阿纳特·拉明·昂珀雷(Annette Laming-Emperaire)同时摈弃了步日耶的传统观点——步日耶认为洞穴艺术只不过是人们随便涂抹的形象的累积——并依据最简单的人种学类比法，把它们看作"狩猎巫术"或"繁殖巫术"。古兰则认为所有洞穴都具有同质结构，根据同一蓝图装饰而成。他按照洞穴艺术的时间顺序，把它们严格划分为若干风格类型。他提出的假说是：洞穴艺术的动物和"符号"可以被分成雌性符号与雄性符号。洞穴艺术发展到这一步就迅速过时，但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它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能够激发人们反复思考旧石器时代艺术的方方面面。

同样是在法国，美国考古学家哈兰姆·莫维斯(Hallam Movius)从1958年到1964年对艾兹山阿伯利·帕塔德(Abri Pataud in Les Eyzies)丰富的旧时器时代的石屋做了发掘，了解了许多不同时期的居民如何利用和适应生存条件、如何开发周边环境的精确资料。这一时期，欧洲人取得了无数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有意大利爱色尼亚的发掘工作，那儿有一个约公元前73万年前的分层清晰的旧石器时代的早期露天遗址，里面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石制工具和零散的动物骨骸；1968到1976年，德国西北部旧时器时代的居住地也出土了数百片马格德林时期的岩石饰片，上面刻有动物和风格独特的女人图纹。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在西班牙北部进行了重要的洞穴发掘，有些

复原的冰川时期的小屋，位于基辅附近的迈兹里克，1965年以来人们已发现了4个用猛犸骨骸建造的小屋。这些小屋是由数百块猛犸骨头和獠牙建成的，大体成环形，直径约为5米(16英尺)。中央有一堆火塘残物，其它火塘——常常是由打制的石块堆砌而成——则在外侧，附近有一些较大的坑，里面有动物残骸和人工制品。

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和莫拉维亚，人们也发现过类似的用猛犸骨骸建造的小屋，建造时间全都在最后一次冰川时期，大约在25000年到14000年之前。



工作是与来自北美洲的考古专家合作完成的。人们从1976年起开始发掘伯格斯的阿塔波加，起码出土了24具骨骸，他们介于直立人与尼安德特人之间。这一遗址出土的1000具人类骨骸占了欧洲出土的全部前尼安德特人骨骸的百分之九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腊在旧石器考古地图上是一块空白。60年代，埃里克·希格斯(Eric Higgs)领衔对其西北部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考察范围包括考金诺皮罗斯、阿斯波罗恰利科和卡斯特利萨。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冷战气氛渐趋缓和，苏联考古界不再与世隔绝，不再敌视西方考古学家的观念与方法。苏联考古学家们终于掌握了放射性碳定年技术，解决了埋藏较深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层不清的问题。但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他们的实验室对石器时代文物的年代鉴定数量有限，由于过分依赖冰川时代无树地区的骨骸考证，他们的许多年代鉴定都不准确。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南部，考古工作者发现并发掘了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露天遗址，在乌克兰的迈兹里克的一些遗址发现了用猛犸獠牙和骨头建成的小屋以及火塘、储藏窖和制造石器的地方。

地中海世界

20世纪60年代进程考古学兴起，当时有人认为它与古典考古学没有什么关系，部分原因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物质文化只是古典文化的一小部分。但是，人们逐渐提出了一些新问题，采取了一些新策略，其中一个研究重点是通过宗教、文字和城镇遗址研究古希腊城邦。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从艺术史借鉴了较成熟的“审视”形象的方法，增强了人们对古代世界的形象的理解。

传统观点把考古学视为包括语言、文学和历史的古典传统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进程考古学被视为对古典主义者地位的挑战——进程考古学认为古典考古学家们只不过做了些分类工作——批评他们的学科是“描述每一种东西，并在有限的范围内分析、合成，但没有做任何解释。”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在经典遗址中获得的材料的数量，若能在文字资料和历史资料中得到印证，那就意味着其它考古学分支的模式和理论方法也能得到鉴定。对于特殊类别的考古资料的存亡、匠人与妇女的作用和功能、作为商品交换组成部分的生产成品的长途贩运等，这一点也至关重要。

史前史专家研究了青铜时代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情况，他们借鉴了进程论的观念和技术。无论是文献资料还是考古证据都清楚地表明青铜时代的贸易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这种贸易是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统治者的地位可因获得异国他乡的商品而提高。在公元前2000年的地中海东部地区，商业大都是以交换礼品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以谋利为目的的商贸形式进行。但是礼品的交换并非仅是象征性的，它们的数量很大——例如，原材料常以批量形式赠送。这种贸易在考古学发掘时大都无法看到，因为有机物全都坏损了，它们只能在沉船等特例中才能见到。

古代陶器不大可能成为交换的主要物品。但是由于它们不易彻底损坏，且存世量较大，因此考古学家们可以根据陶器的分布情况重建地中海的贸易通道，并确定其年代。有时，输入到考古遗址内的陶器产地较清楚，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佛吉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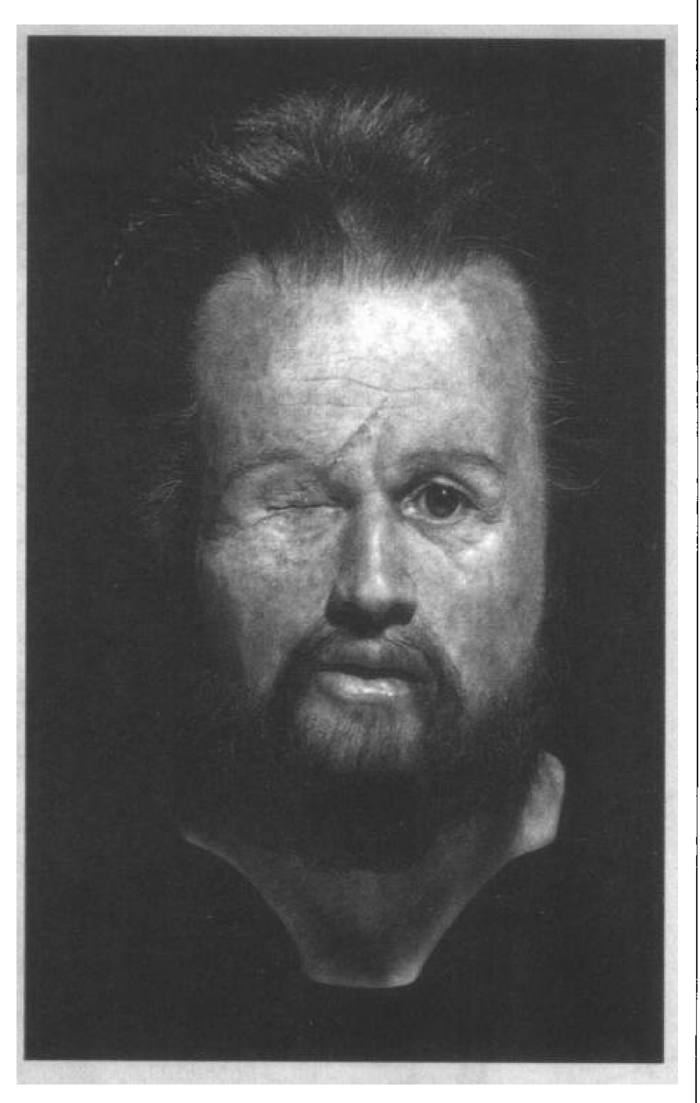
古典考古学家们①经常寻找与历史事件相关的考古遗址。最近，希腊考古学家马诺里斯·安德罗尼克斯(Manolis Andronikos)在希腊北部的重大发现举世瞩目，他找到了马其顿王腓力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一世的故地。

1977年，安德罗尼克斯在探访马其顿人的墓地时进入了佛吉纳的一座巨大坟冢，坟冢里面有一个结实的墓室，墓室口的上眉柱上刻着狩猎场景。两座大理石门仍在原处。人们把里面的土清理完后发现了一个小祭坛，有马做牺牲的痕迹——这使人联想到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普特罗克勒斯的葬礼。

墓室被打开后，发掘者们发现了许多银器、盔甲，还有一个大理石匣子，他们认为匣内存放着死者的骨灰。墓室里还有一些家具残片，上面曾镶嵌有象牙和玻璃装饰品。人们打开盛有骨灰的大理石匣子时大吃一惊，里面有一个金盒子，又名"拉麦克斯"，上面有一颗星形浮雕，它是马其顿王室的象征。匣子打开后，人们发现骨灰全都包在一块紫色的布里，上面放着一个镀金的橡木花环。

人们又打开了第二个墓室，里面有一个大理石棺和一个用金质桃金娘植物叶编成的花环，石棺里也有一个金质"拉麦克斯"，里面的骨骸也用绣金丝的紫色布包裹着。

墓室的规模，陪葬品的丰富，"拉麦克斯"的星形浮雕，都意味着这是一座马其顿王室成员的坟墓，因为人们都认为佛吉纳是马其顿王朝早期国王们的家园阿迦的故地。陪葬品的风格说明它们是公元前340年-325年的产物，所以，安德罗尼克斯确信他找到了马其顿王腓力二世（公元前382-336年）的坟墓，腓力二世是亚历山大一世的父亲。



法医学专家理查德·尼夫按照这种意见研究了主墓室中死者的骨骸，他根据头骨遗骸复制了死者的面容，死者的右眼瞎了——据有关记载，腓力的右眼是在一次攻城战役中被箭射瞎的。这幅复原像在古代名人的骨骸上添加了肌肉，为安德罗尼克斯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塞浦路斯昂克米出土的古代车形爵就具有明显的迈锡尼风格，而这种风格的爵大都出土于地中海东部，而不是希腊。这就意味着它们是在塞浦路斯制造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即：爵是从其它地方输入的，那就与迈锡尼陶器风格的不一致，只能说明生产制造中心无法确定。

对陶器的科学分析揭示出了复杂的交换模式，这是其它方法无法揭示的。例如，借用显微镜观察陶瓷碎片是一种确定粗陶来源的低廉但有效的方法。对于爵这样结构精细的器物，从上面提取一点微粒做化学分析就可以确定其黏土的准确出处。例如，人们已经证明车形爵不是塞浦路斯的产物，而是从阿哥利特输入的。

对于今天的古典考古学家们来说，要想测量典型遗址出土的陶器和其它器物的容量，电脑是不可或缺的工具。由于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赞助，电脑

① 这里的"古典"为西方学界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通称——译者注



技术能使庞贝的考古残骸复现,它复制的电脑辅助图像再现了公元79年该城毁坏前夕的建筑风貌。虽然古典考古学家们争议纷纷,电脑模型却有助于估算古代城镇的规模,尤其是古罗马城的规模。

铁拉火山

1939年,希腊考古学家斯皮里宗·马利纳多斯(Spyridon Marinatos)提出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是由于铁拉火山爆发而毁灭的。几乎没人同意他的意见。但是马利纳多斯对自己的观点坚信不移,为了找到证据,他开始在铁拉探寻遗址。1967年,他开始在该岛南部海滨阿克罗提利进行发掘,终于发现了一座被埋葬在火山灰下的“史前庞贝”。

虽然阿克罗提利不是米诺斯殖民地,而是昔克拉底人的居民点,但深受克里特文化的影响。出土的房屋都是二到三层的建筑物,融合了米诺斯建筑风格。室内彩绘壁画艳丽,风格和技巧也具有米诺斯风格,陶器则都是从克里特输入的,甚至线形文字A的直体写法、重量和长度单位也源于克里特。

废墟中没有发现人的骨骸,居民们显然在火山灰埋葬家园前就已逃离。那场火山爆发似乎也毁掉了位于铁拉南部100公里(60英里)的克里特。有人认为海啸淹没了沿海遗址,但多数破坏实际是由火灾引起的,海啸不可能冲毁克里特岛南部。还有人认为火山灰中的有毒物质毁掉了克里特。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大多数火山灰被风吹向东面。火山爆发无疑伴随着地震,但是米诺斯人的克里特经历过多次强烈地震都得以重建。

马利纳多斯把火山爆发的影响与克里特的毁灭联系在一起,不过,后来他本人对这一观点也产生了怀疑。有趣的是,正是对阿克罗提利的发掘使他对自己的观点产生了怀疑。问题很快就清楚了,早在那场灾难发生前30到50年,居民就已背井离乡,火山爆发与城市的毁灭并非发生在同一时期。目前还没有什么证据,但是爱琴海的考古学家们认为迈锡尼人毁掉了米诺斯文明,桑托里尼(Santorini)[①]火山的爆发大大削弱了米诺斯人的实力,迈锡尼人很可能是在此之后征服克里特的。

埃及与近东

20世纪60年代专业考古人员的数量大增,欧洲内外考古工作的步伐也大大加快。工业界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劫难后开始恢复元气,科学成果成了冷战时期军备武库中的筹码,考古工作比较容易获得研究基金。考古专家们的注意力渐渐转向古代社会的功能、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复杂社会形成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的生活秩序恢复正常。许多需要长期考察的遗址发掘项目被迫停顿后也得以恢复,例如法国人在塔尼斯的工作。但是,动用工程机械的重要工程在埃及的数量与日俱增,人们也更加关注如何保护受到威胁的古代遗址和记念性建筑。

左图:铁拉壁画的细部,描绘了一个采藏红花的女人,此画出自编号为Xeste 3的巨大三层楼。

① 亦即铁拉岛——译者注

拯救努比亚

在北欧工作的考古学家们认为埃及学专家们太幸运了，因为他们发掘的遗址全都位于干燥、无水的沙漠中。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准确。不错，埃及南部的许多遗址（尤其是墓葬）位于沙漠边缘，沐浴在天然环境的保护中。但是，它们会受到人为的破坏。在欧洲和北美，建设工程能够破坏价值很高的考古遗址；在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工农业开发也使丰富的考古遗址面临危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54年埃及政府和苏丹政府决定大幅度提高阿斯旺水坝的高度。修建新水坝的目的在于控制尼罗河水季节性的涨落，增加农业生产，提供低成本水电。工程完成后，阿斯旺水坝上游将出现一个巨大的人工湖，约500公里（300英里）长，10公里（6英里）宽。努比亚的纳赛尔湖（Nasser）以下将全被淹没，这一地区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考古遗址。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本世纪初修建了一些较低的水坝，产生了所谓的“拯救”考古学或“援救”考古学。阿斯旺新水坝建成后，水坝后面的水位将提高63米（207英尺），许多遗址都会受到威胁，包括两座最著名、游人最多的古代建筑阿布·辛拜尔（Abu Simbel）神庙和菲莱(Philae)神庙，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它们发掘并复制出来。有些最重要的努比亚遗址，尤其是第二瀑布附近用砖土修建的中、新王朝的城堡群，比如布亨，只能淹没在纳赛尔湖水下，任其消解。努比亚拯救工程最重要的目标是把一组新王朝时期的寺庙从危险地带迁走，这些寺庙是埃及法老时代在南部殖民点修建的。

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2个国家参与了“拯救努比亚遗址国际行动”。这项工程从1960到1980年整整持续了20年。人们拆了一组努比亚寺庙，并在大坝附近重建，另一组寺庙被迁往瓦迪·埃尔－苏布亚，还有一组被迁往阿马达，第四组被迁到了卡图姆博物馆的花园里。阿布·辛拜尔庙和菲莱庙是古代埃及人修建的最重要的两座寺庙，它们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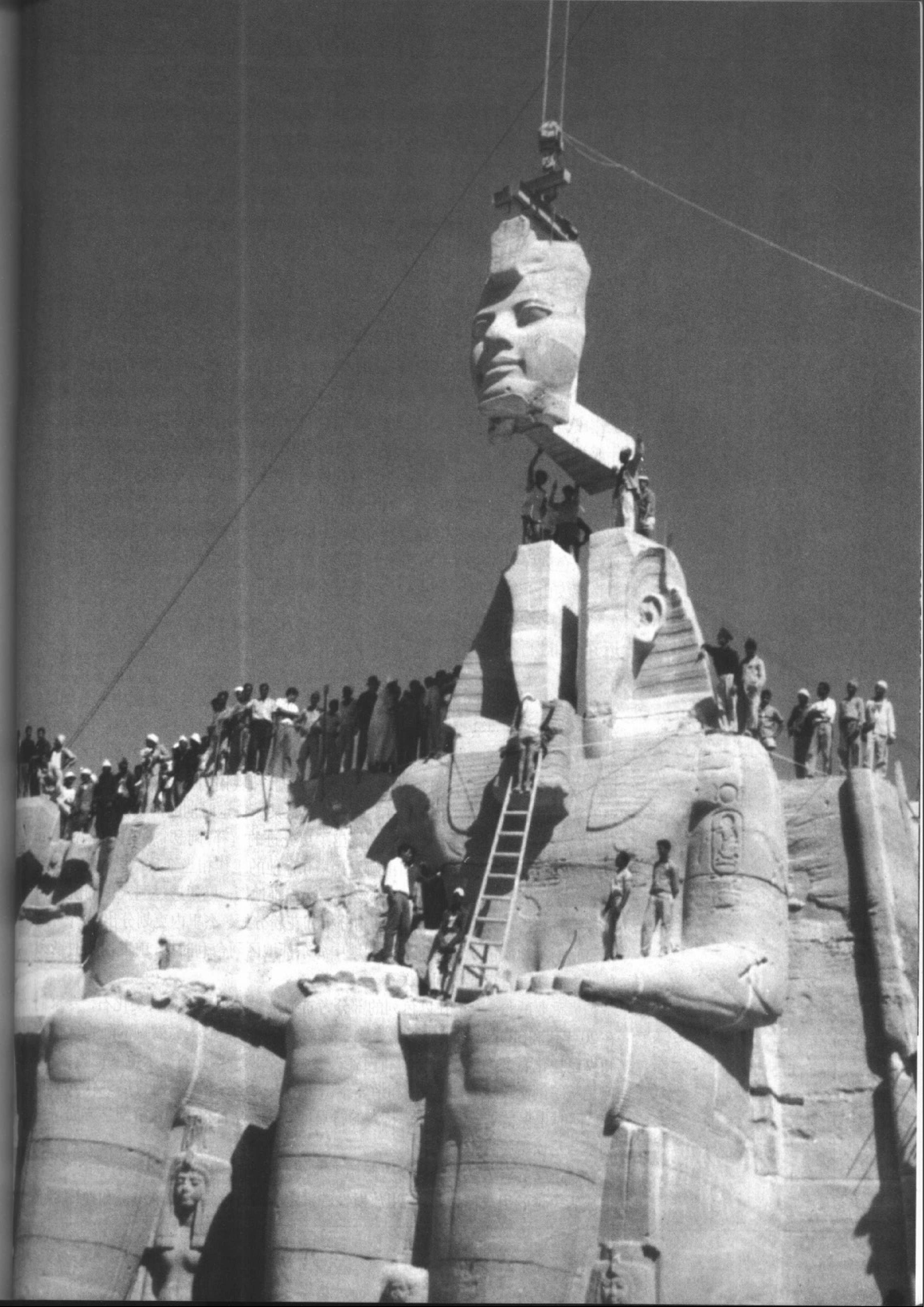
右图：拯救公元前13世纪拉美西斯二世时代的阿布·辛拜尔庙，工程得赶在纳赛尔湖水位提高之前。1964年，寺庙被提升到64米（210英尺）的山崖上方。这一现代工程应用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是最大胆的土石工程。

人们在重建的寺庙后面修筑了一个巨大的混凝土框架，把寺庙的主体和祭坛围起来，保留了原先的线型结构。3000年来，每年夏至和冬至时阳光照在寺庙上的光影与拉姆西斯二世身体及祭坛上众神的身体正好等长，这一特征也保留了下来。

阿布·辛拜尔的搬迁问题很多。这两座寺庙（它们都是公元前1290–1224年拉美西斯二世时期建造的）与其它建筑不同，不是用可分拆的砖块垒成的，而是在岩石上凿成的，每座寺庙都是山体的组成部分。阿布·辛拜尔规模太大，给人们出了一道难题。主庙内部大小适中，外部却规模宏大，由三座（原先有四座）帝王的坐像构成，每个坐像高30米（100英尺），宽35米（116英尺）。阿布·苏比亚也是努比亚下游唯一的重要的寺庙，把这些脆弱的沙石建筑淹没在水中任其损坏简直不可想象。但是，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易事。从1959年到1962年，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人们提出了各种建议，但经过辩论后全被否定了。

最后终于通过了解决方案，工程耗资3200万美元，方案是把寺庙从岩石上切割下来，然后再安放在湖泊上方。拆卸工作始于1963年4月1日，比水位第一次升高早5个月，1968年9月全部完工。人们不仅把拆卸的阿布·辛拜尔重新安装起来，并且在寺庙外又增加了一道混凝土结构，美化和再现了建筑物的原来风貌。

菲莱庙的问题相对简单。它位于尼罗河的一座小岛上，岛上有一组相互呼应的寺庙群，其中最重要的是伊西丝女神的寺庙。菲莱庙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约在公元前380年到公元400年间）最著名的朝觐圣地之一。同阿布·辛拜尔的解



决方案一样，人们把这组寺庙群转移到另一座岛上去，重建庙群周围的环境。迁移的线路没绕多少弯子，从1977年到1979年耗时两年稍多。阿吉尔基亚岛不受河水泛滥的影响，重建工程的重点是重建四周的景观，人们力图使它与菲莱的景像大体相仿。这项工作耗时5年，从1972年一直延续到1977年。它同阿布·辛拜尔一样，成为人类智慧的胜利成果，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参观。

以色列考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于1948年建立的以色列国，在近东引起了巨大冲突。四场战争接踵而起，小规模冲突连绵不断。阿拉伯人抵制以色列国的存在，与西方各国政府的关系极为紧张。故而，考古工作大受影响。但在以色列本土，考古工作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要为犹太人拥有巴勒斯坦的合法性提供证据。发掘工作成为“一种启示，一种把民族的古代建筑和自然风光联系起来的不可撤销的契约”。马萨达是建筑在悬崖峭壁上的古代要塞，它的发掘是一个典型例证。对以色列来说，马萨达不仅仅是一处考古遗址，而且是爱国激进分子的最后根据地，他们“把马萨达当作不屈不挠的象征，1900多年来，这一象征激励了数百万人……现代以色列应征入伍的军人都登上马萨达宣誓“马萨达永远不再陷落！”马萨达就像锡安山一样成为一个民族的过去与未来的象征。

近东的旧石器时代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近东的旧石器时代研究从考古发掘中大受裨益。法国考古学家在寻找居住层时发明了几种精细的方法，并把这些方法用于地中海东部诸国的考古遗址上。例如，雅克·蒂克西埃（Jacques Tixier）从1969年到1975年在克沙·阿吉尔（Ksar Akil）进行发掘，他划定了很多“生活层”（在不到1米深的土层内分出了15层），每一层都是某一特定时期的产物。

一些更复杂的分析方法使人们做出了更先进的解释。阿瑟·杰里内克(Arthur Jelinek)在1967年和1972年间重新发掘塔布，他的工作相当细致，把所有2厘米（0.8英寸）以上考古物品的位置都绘入一幅三维地图，以便透过洞穴里的沉淀物进行地质分析、地质形态分析、动物分析和花粉分析。杰里内克划分出80个“地床”，它们的地质沉积物有助于阐明地中海东部地区阿舍利时期、前奥瑞纳时期和莫斯特时期远古产业之间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人们在以色列的部分考古遗址里发现了大量人类化石，专家们在20年代和30年代就编制了人类化石目录，1960年在夸夫兹发掘的阿姆德化石和克巴拉化石又为目录增加了新内容。形态学表明一些化石属于尼安德特类型，但是从解剖学角度看，夸夫兹和斯库尔出土的人类化石标本具有许多现代人的特征，同时也保留了一些尼安德特人的特点。多数研究者指出，在解剖学方面这些标本与尼安德特人很不相同。

解剖学界有人认为现代智人起源于非洲，这种观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化石也成为争论的组成部分。人们用放射性碳素定年法重新测试了夸夫兹和斯库尔的

马萨达

在以色列，马萨达是最受世人瞩目的考古遗址，它位于死海西岸，高出死海水面400米（1300英尺）。威廉·奥尔布赖特说："从考古学对国民生活的影响看，马萨达的历史意义无与伦比，它始终是独一无二的。"

马萨达是20世纪后期最典型的"政治"考古发掘的例证。伊格尔·亚丁（Yigael Yadin）清楚地认识到它的政治价值。亚丁的发掘工作从1963年延续到1965年，他主要考察了希律大帝(Herod the Great，公元前37-34年)的城堡式宫殿，这座宫殿也是帝王的私人隐居之地和避难所。马萨达包括一栋别墅，一个绘有精致壁画的澡堂，仓库和管理中枢则建在高地的另一侧，它们的地面铺有马赛克，此外还有几栋供人居住的大型建筑。拜占庭的僧侣们曾经占据过这一地方，并在公元6世纪增建了一座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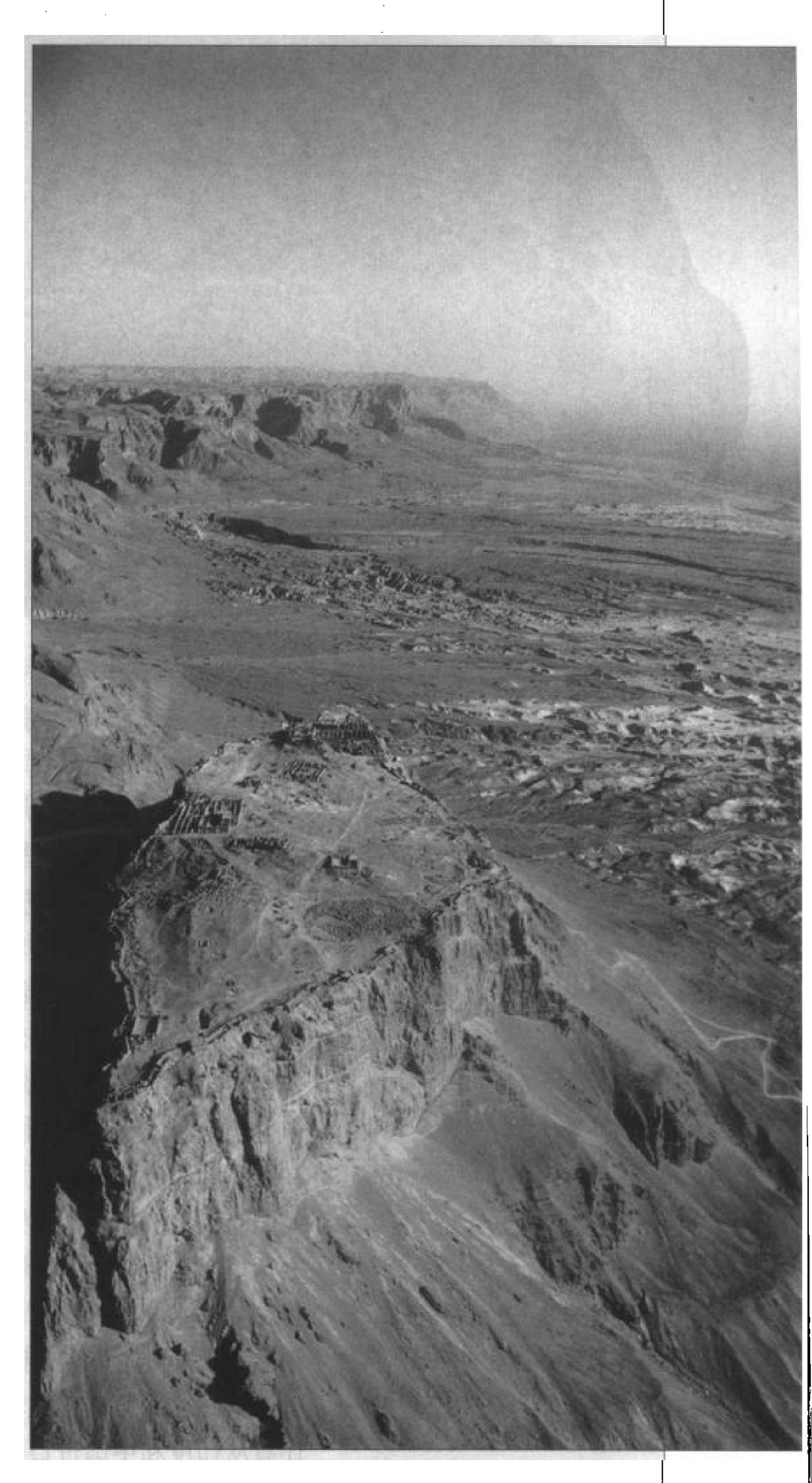
公元66－77年，为了抵抗罗马军队，犹太军队曾奋起坚守马萨达。亚丁最感兴趣的是与防御战有关的几栋建筑。他发现了被杀戮者的骨骸和一个碎陶片，上面刻着Ben Yáir（本·亚尔）的字样（本·亚尔很可能是率军抵御罗马人的犹太爱国者领袖。），此外还有一些钱币，上面刻有希伯来文"为了锡安的自由"，多本《圣经·圣歌》，还有写在羊皮手卷上的《利未记》和《传道书》。

亚丁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以色列建国前他是哈加纳（Haganah）抵抗组织的成员。1948年战争期间，他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高级指挥官。从军队退役后，他全力以赴从事考古工作。对于他乃至全体以色列人来说，马萨达的最后抵抗都是一个重大事件。

历史学家弗罗维尤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描述过罗马人围攻这座要塞的时间和方式，那场战争无法回避。960名战士宁愿集体自杀也不肯向罗马军队投降。他们决定：

> 宁可光荣死去也不苟且偷生，不自由毋宁死……他们以集体自杀的方式面对罗马人的进攻。他们的勇气和视死如归的气概令世人惊叹。

发掘工作不仅对《新约全书》的考古学家来说至关重要，还唤起了全世界犹太人的关注，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人们后来对出土文物做了详细研究，对集体自杀的传说和亚丁的解释提了许多问题。不论怎样，马萨达始终是犹太人抵御外辱、历尽磨难的有力象征。



化石标本，确定它们的年代介于4万前至10万年前之间。塔布恩的尼安德特人也属于这一时期。新的年代定位与解剖学特征使许多人认为夸夫兹化石与斯库尔化石代表了一种早期人类，他们在解剖学上与现代智人相同，并与当地的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同一时期。很可能这两个群体适应了不同的气候——尼安德特人适应了较寒冷的气候，现代人适应了较温暖的气候——随着冰川时代气候的变迁，他们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漫游活动。

文明的起源

在近东，近期考古学越来越关注的两个问题是：探索前代人留下的地理或纪年悬隔，充分考证农业的起源和城镇及城镇政府的起源。这是文明发展道路上的两个关键问题。新发现的石油财富和政治联盟使一些国家迅速走向现代化，但这些国家力图保持自己的古老传统，所以它们加快了考古研究的进程。现在，多数近东国家都建立了古代文物的管理机构，并在大学里开设了考古课程。

海外组织提供了重要的基金。1975年，人们在伊朗就进行了17次考古调研和30次考古发掘。在设拉子以南波斯湾沿岸沙漠地带的西拉夫，英国考察队发现了萨珊波斯时代和早期伊斯兰时代的一个著名海港。中世纪穆斯林地理学家们曾经记述过每年商船都编队驶离西拉夫前往中国的广东，在沿途的印度洋和南亚港口停泊。西拉夫是印度洋商贸活动的重要中转站。公元9世纪，巴格达的哈里发们在商贸活动中聚敛了大量财富。这座城镇占地约一平方英里，气候炎热，城市的蓄水池中不得不储存大量的水，并从外地购买大量食物。沿海滩设立的集市长达1公里（0.6英里），每一段都专营一种商品，例如铜制品。塞拉夫还有居住区，巨贾富商在一些居住区内为自己建造了豪宅。陶制品有蓝－绿色的釉罐，这种釉罐产于伊拉克，在东非沿海地带也可以找到，此外，还有从印度和中国进口的陶制品。

阿姆德1号头骨，出土于以色列哈以法东北部的瓦迪·阿姆德。1960年发掘出5个尼安德特人骨骸，这是其中的一个，生活年代大约在50000年前至40000年前之间。它是一个男人的头骨，这个男人死亡时年龄大约25岁。从人类学角度看，这块头骨与在塔布恩和沙尼达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遗骨非常接近。

放射性碳素断代法引起一场革命，人们可以借此重新审视纪年问题以及欧洲与非洲的文化渊源问题，但是这种方法对近东考古学界的影响却很有限。世所公认的亚述、巴比伦和赫梯等的纪年是根据楔形文字记载的帝王世系和编年史确定的。每个帝王的年代都可以依照不同的时点用倒推法计算出来，尤其可以按照有关金星的天文记录和希腊、埃及史上的重大事件倒推出来，一直推算到公元前三千纪。这样的编年史比放射性碳鉴定法准确得多。所以在近东诸国，人们认为利

比的技术是多余的，他们很少用放射性碳素断代法鉴定年代。直至今日人们只在叙利亚和土耳其东部用放射性碳14技术测定过公元前四千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闪族人遗址——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史前考古学家，尤其是研究没有文字的美索不达米亚远古部族的考古学家比较欢迎放射性碳素鉴定法，因为史前考古学没有文字记录可供参考。在南亚，人们用这种方法为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印度西部文明确定了年代——那儿留下的文字至今无法破解——放射性碳素鉴定法的准确性是传统文字风格分析法无法匹比的。

最初，进程考古学对近东的影响同样很有限：人们主要关心建筑、古代文本和陶器的编年与排序。20世纪60年代以降，越来越多的青年考古学家对艺术史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它是传统考古技术的依据——大为不满，他们试图采用具有明显科学色彩的方法，这种方法在美国和英国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许多考古学家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古代社会的两个重大转折点上：什么原因使原来靠狩猎和采集野生食物为生的群体转向农业和动物饲养业，什么原因使由农民和牧民构成的独立村庄衍生出官僚监管体制、政府税赋体制以及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

在土耳其中部，这一时期发掘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早期农业居民点是卡塔尔·胡育克。卡塔尔·胡育克遗址的规模之大、结构之复杂令人吃惊，这座大约公元前6250年到5400年间的居民点占地21公顷（50英亩），房子是用夯实的土砖和木料建造的，被围在结构紧凑的院墙里。村子里没有街道，这表明人们是在村里的房顶上穿行的。许多房间装饰着色彩艳丽的壁画，还有一些房间配备了凳子、平台和制成标本的牛头装饰物。用黏土制成的小雕像，尤其是生育女神的小雕像，说明了村民们的宗教信仰。人死后被葬在地板下，里面有许多陪葬物，包括绿松石、黄铜、海贝和精制的燧石，有些物品的产地无法确定。卡塔尔·胡育克很可能还控制着黑曜岩和火山石英的贸易，这些东西在远至贾利克的遗址中都有出土，卡塔尔·胡育克似乎在发展商品交换关系中获利不菲。商品交换把西亚广大地区联系了起来。人们根本没想到这座新石器时代的城镇社会能有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机制和这么多的财富。在英国考古学家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laart)发掘卡塔尔·胡育克时，唯一可与这个居民点相比的只有杰利克。自那以后人们发掘的其它遗址也都证明，当时的社会机制相当复杂，并已拥有了可观的财富。

文明、国家和政府的缘起标志着人类历史重大的转折，近些年来近东的考古学家们花费了不少气力研究这类问题。美索不达米亚南方的远古闪族人创造了一种国家体制，衍生出城镇、精心修建的宏大的寺庙和专业分工，如编织、记账、楔形文字的书写、造册等，还有森严的社会等级。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展没有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故而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人类历史上仅有的六七个“文明古国”之一。

近东的多数国家——不论是土耳其的赫梯还是伊朗的埃兰——都像是“后起的”国家：它们的楔形文字体系、艺术风格和宗教传统都说明它们是以模仿先进的邻国求得自身发展的。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乌尔、苏萨，在印度谷地的摩亨佐、哈拉帕，人们用过时的技术进行发掘，为原始国家和后起国家找到了考古证据。这些遗址出土的考古资料数量巨大，可以回答原始社会的起源和运作问题。

新观念引进了新的工作方法，人们可以借此重新分析旧的考古遗址。例如，

农业的起源

二战后，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布雷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与合作人布鲁斯·豪（Bruce Howe）对传统考古方法很不满意。"他们的想法与众不同，旧式考古学注重挖掘皇家墓室，为博物馆寻找精美的艺术品，而他们对此并不重视，而是提倡一种'观念－考古学'，它旨在透视广阔的文化－历史问题。古物除了当作理解人类生存方式的工具外没有任何意义"。在布雷德伍德看来，这种态度意味着必需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应主要从生态学角度考虑，还要根据辽阔的地理范围去考虑食品生产的起因。

他想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到托罗斯山和扎格罗斯山北部之间的丘陵地带找到与最初的农业村庄有关的证据。先祖们刚刚摆脱蛮荒、开始种植小麦和大麦，他们当然要住在"中间地带"。由于降雨等自然条件，早期农业无需灌溉，也无需砍伐森林。布雷德伍德相信中间地带的居民只有在发明了把谷物磨成面粉等不可或缺的工具后才会转而务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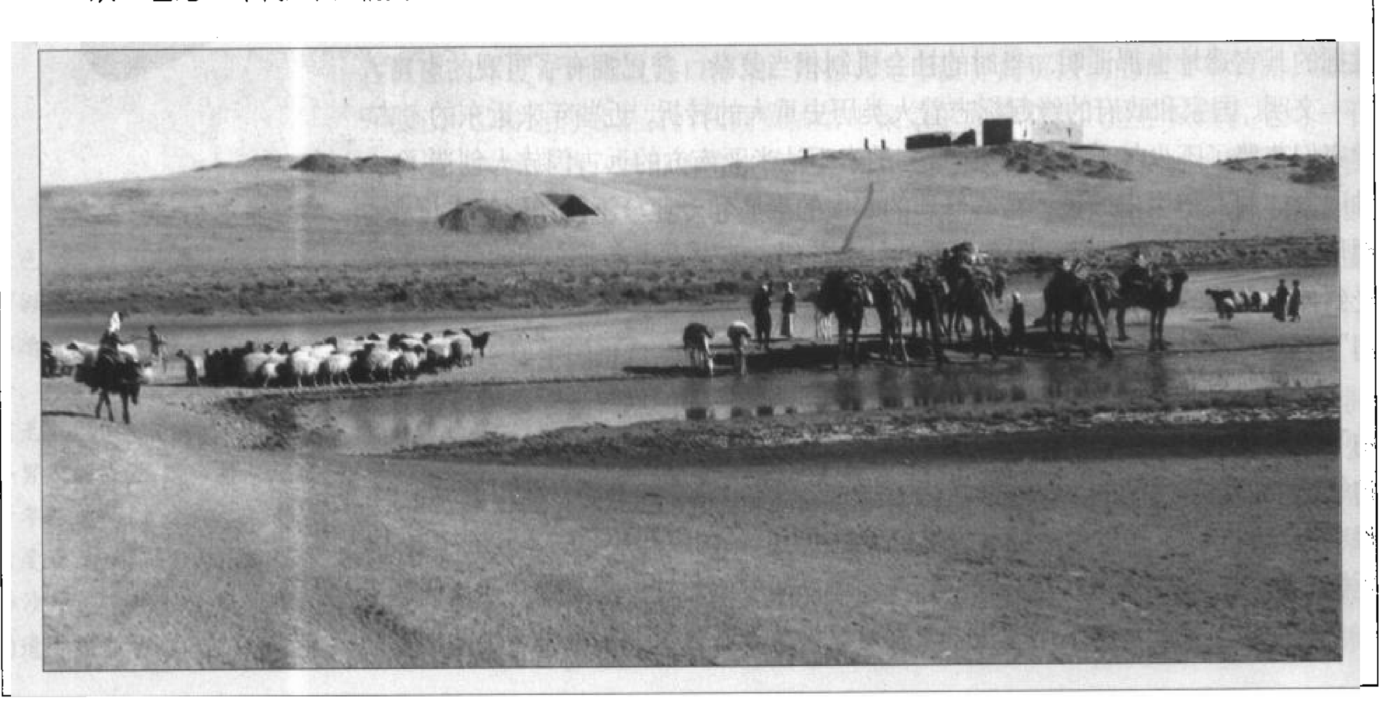
他带着这种想法率领一支由土壤专家、生物学家和骨骼专家组成的考察队前往伊拉克的查格罗斯山麓，在那里找到了一些遗址，发现了一些农业生活必需的工具。在一些考古遗址中，尤其是在耶莫，他们发现了公元前七千纪的遗物，确凿无疑地证明那时当地已有了农业和饲养业。耶莫是个占地近1.6公顷（4英亩）的小村庄，曾经有几百人住在那里。他们用夯实的土在石基上建造小房子，种植了小麦和大麦的早期品种，放牧着山羊和绵羊，尽管野生食物在他们的日常饮食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

从20世纪60年代起，人们突然关心起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来，从希腊到中亚和巴基斯坦，人们有许多重大发现，其成果使耶利哥和耶莫都黯然失色。发掘者们发现了先民们种植和驯养家畜的新证据及早期农村生活的新证据，他们描绘出一幅图画：最早的农业并不是"发明创造"出来的，而是因为环境改变了、人口增长了，人们不得不在经济活动中做出相应反应的结果。

70年代，剑桥大学的史前史专家埃里克·希格斯认为农业的发展并不快，正如柴尔德在《新石器革命》一书中所说，农业对于狩猎和采集的优势是逐步显示出来的，是一种长期趋势的积累——这种趋势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变得相当明确——人类对植物和动物的开发利用进程大大加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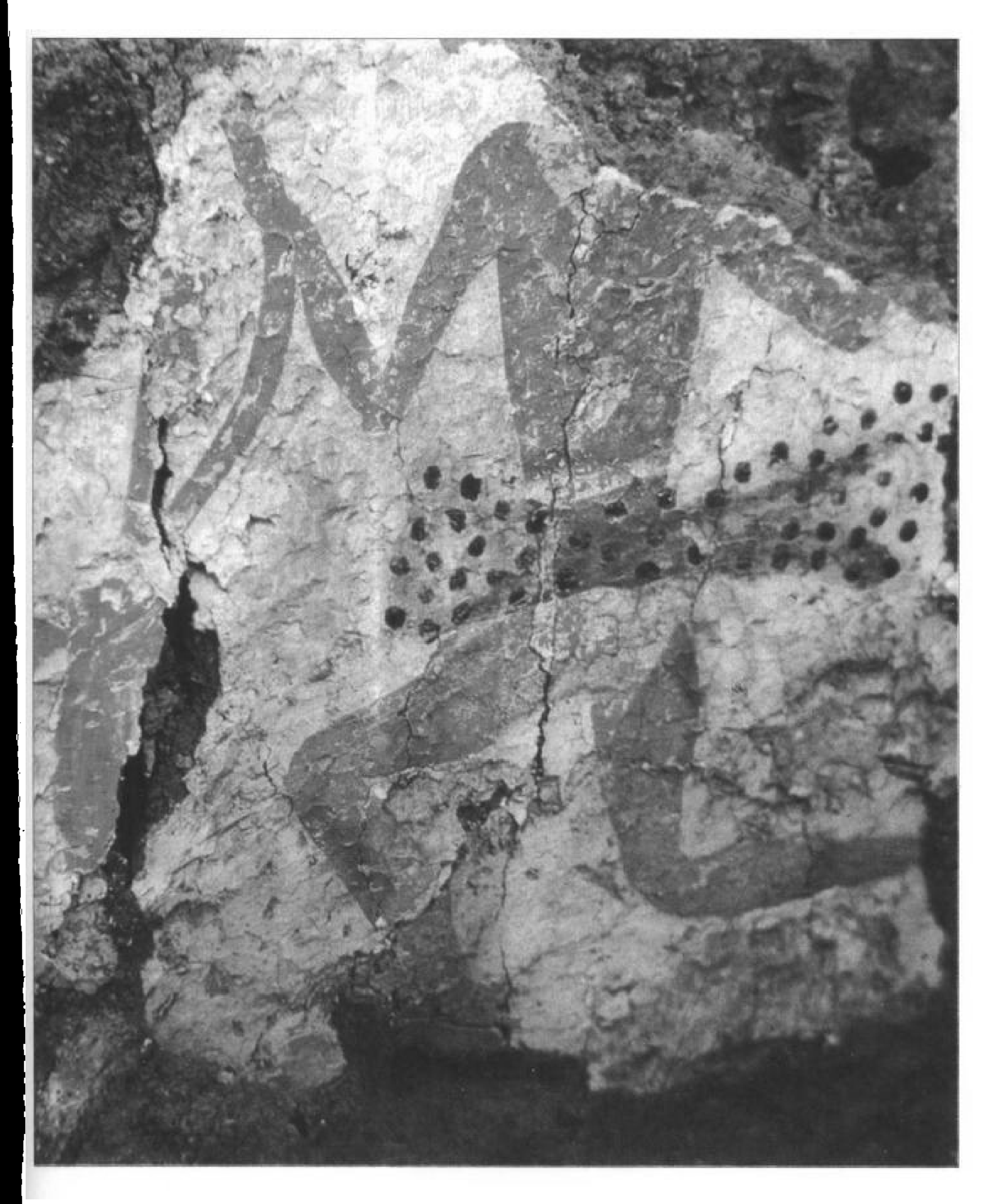
成效初显的野外工作激发了寻找和开发远古信息的新方法。希格斯一行创造了浮选法新技术。这种方法把细小的种子与挖掘出的土壤分开，因为种子能够揭示出遗传变化，说明早期农业试验给野生小麦、大麦和其它植物带来的影响。稍晚一些时候，即80年代初，分析远古人类遗骸中锶和其它化学成分的变化有助于测算出史前人类食谱中（野生的或种植的）谷物含量的变化。经过数十年研究，人们发现新石器时代的西亚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整个西亚都相继经历了这一进程。

阿布·哈利亚丘，叙利亚北部最早的农业定居点之一，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对它进行了挖掘，用浮选法筛选出大量炭化的植物遗骸，用干筛法得到了6万多粒可以辨识的植物骨骸残渣。



德国考察队在乌鲁克重新勘查了被发掘过的寺庙区域,在地表上找到了一些证据,证明这座城镇在公元前四千纪里占地200公顷(500英亩); 意大利和德国考古学家回到摩亨佐-达罗为这一遗址中尚未发掘的工艺制作区绘制了一幅平面图。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工作越来越精细, 人们在小块地面上小心翼翼地挖掘, 并且使用复杂的挽救技术恢复动植物遗骸。在伊朗西部的沙拉法巴德, 为了了解每年乡村生活循环周期的信息, 人们花费半年时间发掘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坑, 以便找到废物堆弃的情况。

传统发掘工作的目的是了解当地发生过什么事,或找到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工艺品及残存的纪念性建筑物, 它们仍然是最吸引人的重要发现。意大利考古学家在叙利亚北部的马提克丘对古代埃伯拉的发掘, 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这项发掘工作开始于60年代初, 旨在探索公元前二千纪中期的一座城镇, 最终却发现了一座更为古老的、公元前三千纪中期的城镇遗存, 其核心部分是一座用泥砖建的宫殿, 四周是带有廊柱的院子。遗址的文物相当多: 雕花木制家具的残片, 闪族风格的镶嵌石制品, 圆柱形的封印, 其原型也是闪族式的, 还有一些从埃及输入的



公元前六千纪里的壁画、出自卡塔尔·胡育克的狩猎壁龛, 画面上有一个男人在跳舞, 右手持一张弓、腰间围着一条带黑斑的粉红色豹皮裙, 脖子上挂着一条项链。迄今为止, 卡塔尔·胡育克出土的壁画艺术形式可谓绝无仅有, 其它地方都难能见到、它们的构图讲究几何对称, 通常较少见到人物场景, 其意义至今无人参透。

这是壁画的局部, 取自房柱的华丽的中楣。整幅图画是一幅狩鹿图, 上面绘有24个人物, 舞蹈者中有赤身裸体的杂耍者, 还有一个鼓手, 是用红白两色画的, 没有头。

石器，另有一块重达23公斤(50磅)的可能来自阿富汗的天青石。最令人瞩目的是一座密窖，里面藏有1.5万块楔形文字的泥版文书，它们秩序井然地放在被焚毁、坍塌的架子上。这些记录宫廷经济的文献是用叙利亚北部方言埃伯拉文写的，记录了一个强大、富有的帝国的经济状况，它的财富基础是数量巨大的羊毛纺织品和与土耳其东南部及美索不达米亚居民点的商品交换。马提克的发掘表明，叙利亚曾经出现过一些不为人知的城邦国，它们与美索不达米亚王朝的早期城邦国处于同一时代，在财富和发展程度上处于同一水平。

但是，同其它研究方法一样，发掘本身只能揭示历史的一小部分。托基尔·雅各布森（Thorkild Jacobsen）是亚述学专家，他的主要兴趣是从社会学角度解释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早在1937年他就开始“系统研究某一地区的现存传说，借助陶器表面确定居民点的年代，把它们绘制在不同时期的地图上，按照线性模式进行分类，这些模式代表了该地区远古时期的主要水上航道”。雅各布森本想获取一些有用的地形学信息，以便了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政治史和经济史，但是这种技术也可以揭示有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起源的信息。后来，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把这些方法应用到考察巴比伦的许多地方。他有能力详细追踪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众多居民点的历史，从7000年前一直到中世纪。他证明了城镇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主要基础，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口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中心地带，每座城镇占地至少40公顷（100英亩）。同样的研究表明，在印度谷地的人口分布较平均，农村和小城镇的人口大体相等，与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情况差不多。

同地中海地区一样，出土文物的物理特点和化学特点也可以提供一些新信息，说明异国他乡的原材料经历过何种长途贩运。物理与化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能够鉴定出原材料的产地和制成品的技术特征，进而对古代经济做出越来越成熟的结论。典型的例子是黑曜石来源的鉴定，安纳托利亚黑曜石的化学特点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黑曜石工具的化学特点大不相同。这一工作始于60年代，它揭示了新石器时代物品交换的模式。此后，人们还对公元前三千纪的复杂社会及近东陶器、金属和石制器皿的流通做了类似的研究。

远东

在老一代学者手中，远东考古学的新发展——包括熔岩鉴定学（确定火山灰的年代）、实验考古学、水下考古学和文物保存法——与其说是理论性的不如说是技术性的。

在日本，电脑的用途越来越广，人们用电脑建立数据库，存储所有已知的贝冢、锁眼形坟冢、铜镜、绳纹时期的小雕像和瓦当的数据资料。在发掘日本西部的古代宫殿时，瓦当的数据库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藤原京（公元696–710年）和奈良（公元710–784年）的6000种瓦当被编入目录，在重建工作中，一处遗址的许多瓦当被顺利的转用到另一处遗址。贝冢数据库主要是为绳纹文化时期的遗址建立的，专家们还重新评价了中古时代的贝冢，从中解读出古人的饮食习惯。专家们认为，锁眼形坟冢是成文史前的统治者们的坟墓，地位较低的贵族则使用

圆形或方形坟冢。他们分析了坟冢的分布，描绘出当地等级制的演变。分析铜镜则有助于推测生产工艺和富人之间的物品交换模式。

东亚地区也在采用实验考古法分析野外的动物遗骸和植物遗骸。例如，人们在上海附近寻找古代稻田，他们提取矿样，分析其中“植物蛋白石”（植物结石）的密度。所有草叶都含有植物蛋白石的微粒，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见它们。这种方法是日本人发明的。如果每克土壤中植物结石的密度超过5000单位，这种土壤很可能是从前的稻田。在日本北部，人们也用浮选法，并发现了一些古代种子的残骸，这说明古人曾经种植过“谷粟”，它是一种野草仔，其它地方的人很少把它当作粮食。

水下考古学在考察沉船时尤显重要。远东考古学家们对历史上的海上航道和船运陶瓷非常感兴趣。朝鲜以西的海面有个叫塞南①的地方，那里曾经有一艘中国元朝（公元1271-1368年）的沉船，从船上找到了大量陶瓷，青瓷（一种瓷器）和数量惊人的中国钱币（18.6吨）。日本琵琶湖底的粟津遗址的发掘工作，则利用了环境考古学、沼泽地考古学和水下考古学的综合技术。1980年以来，京都市考古中心一直在发掘粟津，研究它的两座贝冢，不仅整理了出土的木器和漆器，还整理了贝冢内的植物资料。考古中心使用了独出心裁的发掘技术，包括一种先用铁制隔离物将遗址



14世纪的青瓷或绿色石制器皿，它们是1976年在塞南的一艘沉船里发现的。许多瓷罐上带有莲花雕纹或蔓藤花纹（左图），或脊骨式的图纹（上图）。船是驶往日本和菲律宾市场的，上面载有大量陶瓷制品——总计17000件。

① Sinan的音译——译者注

围住，然后再把里面的水抽干的技术。

远东考古学家们有许多重大发现，他们在中国和朝鲜发现的古墓群里有无数陪葬品。从1973到1975年，人们在庆州发掘了公元300年到668年新罗王朝的古墓群——包括天马墓和在黄浪的大陵墓。天马墓之所以叫天马墓是因为墓室里有一幅画，上面绘有一匹飞马。死者头戴王冠，腰带上饰有流苏和珍珠。

远东考古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求证历史和民族，史前史的日常生活既是研究课题也是博物馆的展览内容。博物馆用模型或立体布景再现了许多古老的殿堂、住房和作坊，尺寸与实物一样大——以便让参观者“走进过去”。例如，汉城新建的国家民俗博物馆里有一个9世纪国都汉城的巨大模型，还有一个青铜时代的村庄模型，成田机场附近的日本国家历史博物馆有一个弥生时代的仿真粮仓，并配有一组锯木头的双人模拟像。中国和朝鲜的每一个省和直辖市都有博物馆，展示当地的古代生活，让参观者切身体验到自己的历史。这类建筑物的风格越来越富于



兵马俑

1974年，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附近，一位农民在打井时发现了“兵马俑”，它常被人们称作“世界第八奇迹”。它有7000个与真人一样大的陶俑，象征着护卫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的御林军。秦始皇死于公元前3世纪，平静地躺在一座离陶俑卫队不远的巨大坟冢里。

每个武士的头都不一样，人们可以根据它们推断出当时的发型、武器、马具和军士的类别。1号坑里的陶俑最多并曾遭受过火焚。现在人们用一个大棚把它保护了起来，它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1976年，中国考古学家们发现3号坑坍塌得很厉害，里面的许多东西遭到损坏。3号坑虽然比1号坑小，但是仍然长达21.4米（70英尺），宽17.6米（58英尺），深5米（16英尺）。坑里有68个武士、4匹马、一辆战车、34件武器。这座坑好像是军队的指挥部，坑中的陶俑代表了军事长官及其卫队。武士们至少比普通陶俑平均高出13厘米（15英寸），并排成战斗队列。

所有武士的头都不一样，面部表情差异也很大，但全都安放在按统一标准烧制的身体上。他们好像代表了中国的所有民族。大约半数陶俑的耳垂是圆的，还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陶俑的耳垂是方的，这一比例与现代中国人耳垂的形状很相近。陶俑的胡须共有25种，不同年龄、性格、脸型和职务的陶俑胡须各不相同。

考古学家根据发型、服装、盔甲、武器、马鞍、兵种了解了许多古代的信息。陶俑中有将军、军官、步兵、跪姿弓箭手、骑兵，还有600多匹陶马和100多辆战车。

多数武士很强壮，百分之九十身材高大，每位将军都是身材魁梧、体格健壮，肌肉发达。这是一支由精壮士兵组成的战阵，排列成中国古代军队作战的阵形。

想像。人们可以进入庆州的天马墓观赏精美的黄金文物，就像可以进入中国北京北面的明十三陵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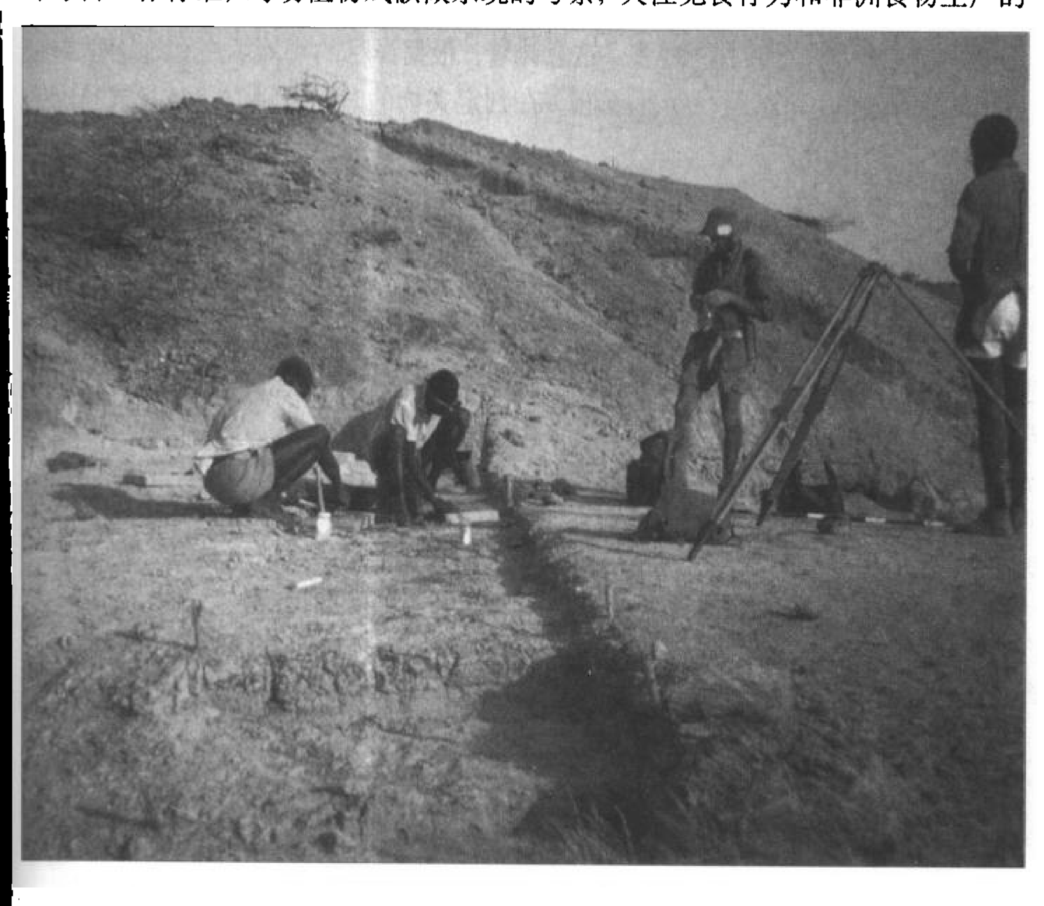
非洲考古学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非洲考古学蓬勃发展，考古资金较多，前往非洲的考古学家、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博物馆的专家也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在刚独立的国家，本土出生的考古学家也渐渐多了起来，他们对非洲的过去很有兴趣，尤其对铁器时代很有兴趣，其中部分原因是殖民者认为当地根本不曾有过铁器时代，部分原因是为了寻根。这类发展虽然重要，但是，与东非和埃塞俄比亚的考古成就相比，它们只不过是雕虫小技。1960年以降，考古学家们在东非和埃塞俄比亚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古人类化石和原始人类化石，有关报道经常成为世界各大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利基夫妇为《国家地理》杂志撰写的稿件拥有数百万读者，电视节目首次把古人类学带入全世界千家万户的起居室里。

新动向

这一时期进程考古学在非洲的影响仅限于南非，部分原因是进程论者注重文化系统内部的变化，对外部变化采取排斥态度。它反映了一种倾向：独立后的非洲考古学界想尽量发挥本地人的创造力和才华。

但是，环境考古学则较受欢迎，这种方法在非洲考古中应用甚广。例如，人们像剑桥考古学家克拉克和希格斯那样致力于研究远古经济问题，制定较高的野外考古工作标准，对动植物残骸做系统的考察，关注觅食行为和非洲食物生产的



哈佛大学考古学家格林·伊萨克（Glynn Isaac，1937-1985年）在肯尼亚北部的库比·弗拉工作。这里的化石极为丰富，沙石沉积物从图卡纳湖一直漫延到40公里（25英里）以外的鲁道夫盆地的火山坡上。令人惊异的是，就是在这片荒野上出土了大量早期原始人的遗骨，总计有150个原始人的遗骸，他们生活在250万年到100万年前，其数量比世界上任何一处遗址的数量都要多。

伊萨克本人对早期人类的社会行为很感兴趣，例如，他们怎样分享食物，怎样迁徙，怎样携带轻便工具离开家园跋涉到远方。

起源问题，在奥杜威峡谷和库比·弗拉等早期考古遗址发掘石器时代的“生活层面”，研究那里的动植物残骸，重建远古环境——所有这些考古工作都非常重视环境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自然科学观念进入了非洲考古学界，它们有助于从环境方面，而非社会和历史方面解释了文化的变迁和选择。外来影响只在解释铁器时代时才具有重要作用。

南非考古传统与非洲其它地方的传统不同，它是世界考古学的组成部分而非“民族”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后者在非洲大陆颇为盛行，它关注较近的时代，尤其是铁器时代。南非考古学家们在新出现的“后种族隔离”时代为自己制定出一幅蓝图，这幅蓝图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绝对年代鉴定

放射性碳素断代法和钾－氩鉴定法是现代非洲考古学的基石，也是确定年代的基础。1950年后，钾－氩鉴定法——它的依据是钾40和氩40的放射性衰变，主要用于测定火山熔岩和火山凝灰岩——给奥杜威峡谷等地发现的猿人化石做的年代鉴定出乎预料的古老，使东非成了研究人类起源的关键地区。与此同时，放射性碳鉴定法表明非洲石器时代的文化和技术与欧洲石器时代的文化与技术同样古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故而，非洲应当位于古人类发展的核心地带而非边缘地带。

在某些情况下放射性碳鉴定法有多种好处。西非考古学是“放射性碳鉴定时代的孩子”，因为那儿的全部重要发掘工作和研究工作都是1960年以后进行的。放射性碳鉴定法比较容易操作，而且这里人们也无法根据陶器或用其它材料制成的器物残片准确地确定出时间顺序。近些年来，高精度放射性碳素断代法有了新进展，但误差仍有三四百年之多。这意味着，根据详尽的陶器顺序和地层学单独做出的年代鉴定（常常不为人们重视）在判定文物的时间关系时，尤其是判定铁器时代文物的关系时，依然很重要。

夏娃是非洲人吗？

1970年以前人们认为体质意义上的现代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即原始人开始磨制刃器的时期——的欧洲，时间大约是35000年以前。但是新的鉴定技术以及在南非、东非和以色列新发现的化石都说明12万年以前现代人或早期智人就已经出现在这些地区了，他们与西欧远古的尼安德特人处于同一时期。80年代晚期，人们开始以线粒ＤＮＡ为基础进行遗传学研究——遗传物质只能从母体继承下来——根据这种观点，有人解释说全体现代人只有一个共同祖先，她就是“夏娃”，生活在20万年前的“非洲伊甸园”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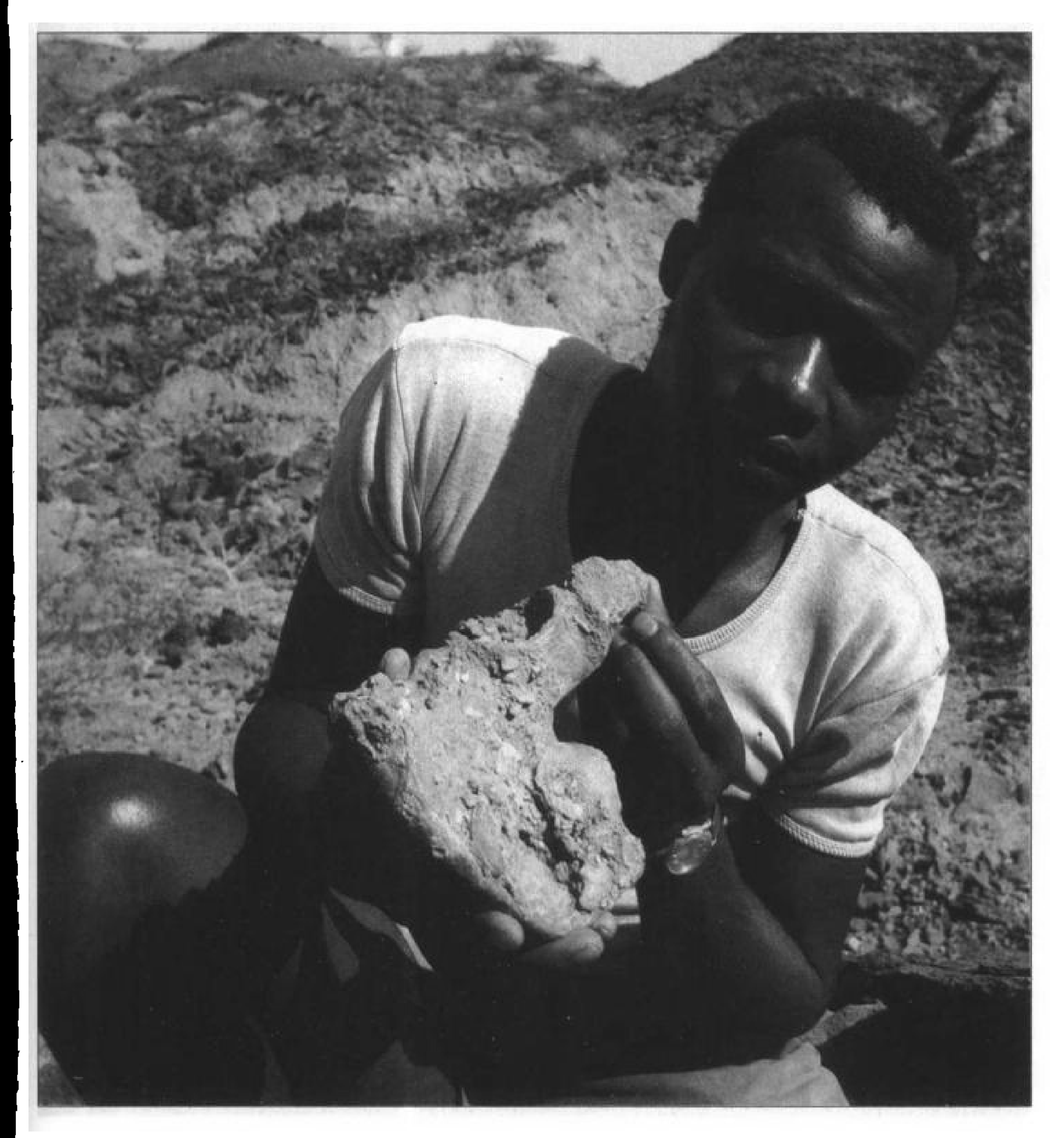
1992年有人指出这些研究存在数据错误。于是，“多元论”的支持者们大为兴奋，他们认为现代人是世界不同地区的猿人渐渐进化过来的，并非全都出自非洲。“非洲以外论”认为现代人最初起源于非洲，而后向世界各地扩散并取了代远古人；化石记录和遗传学研究都支持这种观点。

人类的起源

1959年利基在奥杜威出乎预料地发现了古代“瘪嘴人”遗骸，接着人们步其后尘，投入大量资金探寻人类的起源——尤其是在东非——他们找到了数以千计的化石，获得大量信息。这个故事的表演者至少有三种更新世灵长动物——人类的三种原始同类，此外还有研究它们的科学家。他们在野外展开了一场竞赛，那儿的化石不多，但国际名声很大，他们像化石一样影响了人类的演变观念。

1961年人们在奥杜威发现了最早的人类遗骸，它就是伯纳德·恩格尼奥(Bernard Ngeneo)发现的一块170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化石。恩格尼奥是利基的儿子理查德率领的考察队员，1960年以后，他一直在肯尼亚北部的图卡纳湖(从前叫鲁道夫湖)的库比·弗拉工作。虽然理查德十几岁时曾经发誓“决不干乃父的行当”，但20岁后，他却身不由己地步入化石领域，并最终成为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1968-1989年)和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中心主任(1989-199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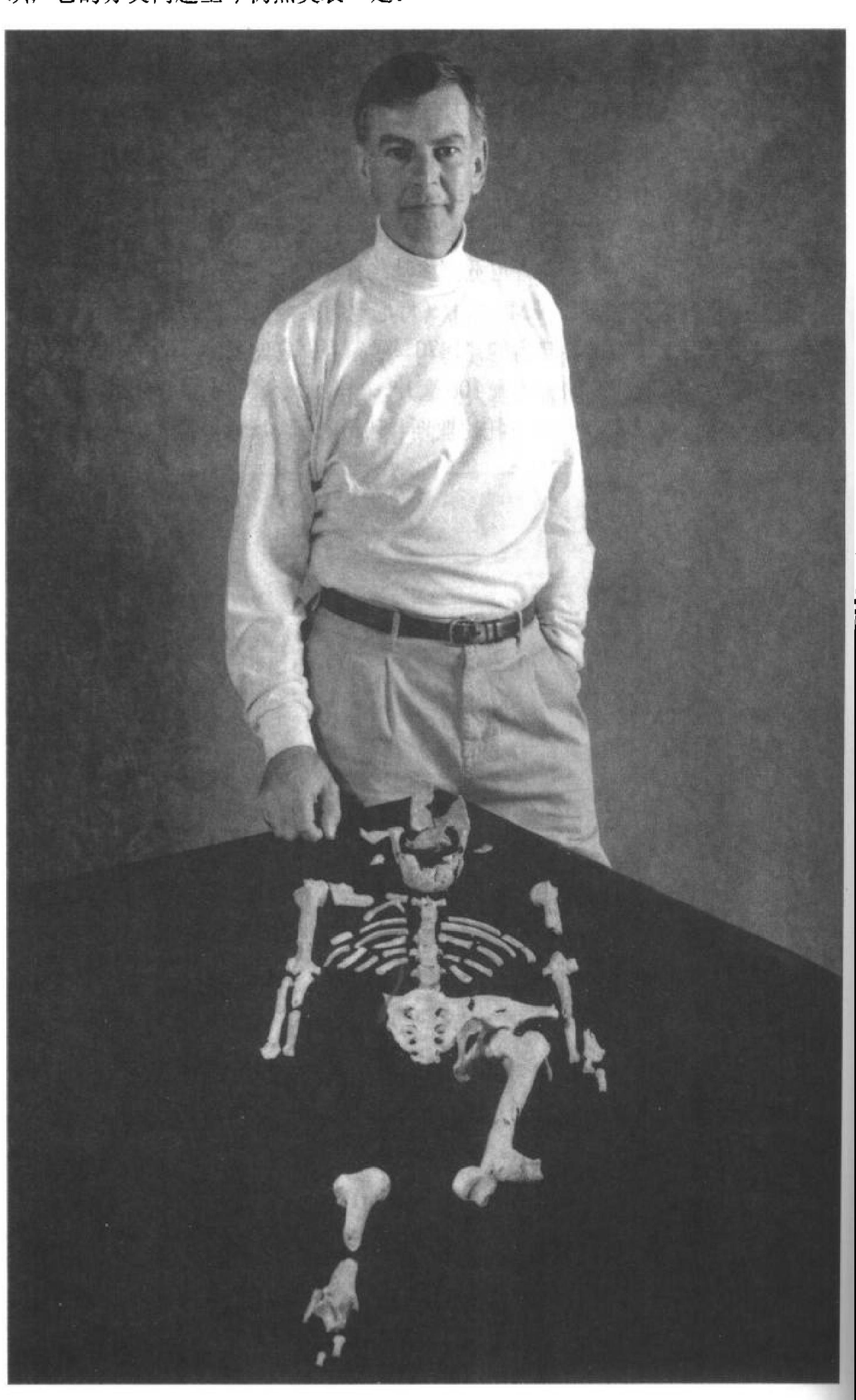
图卡纳化石的编号是KNM-ER(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鲁道尔夫东部的英语缩写)1470，后来成为世界知名的“1470”号猿人。它的脑容量较大，最初估计有800毫升，比一般能人的头脑大100毫升。当时，专家们确信它是最早的远古人类化石。古人类学家菲利普·托比亚斯(Phillip Tobias)甚至宣称这时的猿



1972年8月，伯纳德·恩格尼奥在库比·弗拉发现了颇有争议的第1470号化石。这块化石的大脑容量约800毫升，年代鉴定为300万年前，人类学界为此争论了10年。而后人们重新鉴定了这块化石，年代被定为200万年前，大脑容量为752毫升。

这块头骨化石刚发现时破碎不堪，专家们把300块碎片粘合在一起。为了找到严重腐蚀的碎片，他们在山谷陡峭的斜坡上像筛米一样一连干了好几个星期。

人已具备了语言能力。凭着这些证据，1470就是人类化石，理查德·利基小心翼翼地称它为Homo（拉丁文原意是“出土的人”）。人们最初估算它有300万年的历史。由于它比许多更新世灵长目化石都古老，专家们最初怀疑是不是从更新世灵长动物演化过来的。现在专家们把它的年代定为190万年前、与在奥杜威峡谷出土的其他猿人属于同一时代，1470号猿人的其它特征更像更新世灵长动物。所以，它的分类问题至今仍然莫衷一是。



我们最著名的亲戚：300万年前的“露西”的骨骸——她的学名叫南方古猿阿法种。1974年考古学家们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地区的哈达尔发现了她。站在她旁边的人是发现她的美国古人类学家唐纳尔德·约翰松。露西的发现证明远古人先学会两腿直立行走，而后头脑才发达起来并开始制造起工具。

“天呀”，汤姆·格雷喊道。他捡起的那件东西是一小片头骨的背部。几英尺远还有一块股骨或一块大腿骨。“天呀”，他又叫了一声。我们站了起来，看到山坡上还有一些碎骨：两块脊骨，一块骨盆骨——全都是远古人的骨骸……属于同一个人。

“真是难以置信，”我说：“太难以置信了。”

“上帝呀，你不能不信！”格雷喊道。“看，就在这儿！”他的声音变了调。我也和他喊起来。在华氏110度的高温下，我们又跳又蹦。尽管浑身是汗，我们还是旁若无人地在酷热的沙石地上搂抱在一起，又喊又笑。四周到处都是棕色的小颗粒，它们肯定属于同一个远古人。

拉依托里的脚印

人们在1970年以前认为，人类能够直立行走与大脑发育成熟和使用石器大体在同一时间。但是拉依托里考古遗址却提供了令人惊异的相反证据，这一遗址位于坦桑尼亚北部的奥杜威峡谷以南。

1976年9月的一天，一群科学家前往参观玛丽·利基的考古发掘现场。他们相互投掷干结的大象粪便取乐。一个叫安德鲁·希尔的人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他突然看见地上有一些奇怪的凹印。后来人们知道那是300万年前的动物在尚未干固的火山灰上留下的化石印痕。

这一发现虽然令人兴奋，但是1978年的另一个重大发现更加令人惊异。那是370万年前远古人留下的两行脚印的化石。它们显然是人类的脚印，因为从脚印可以推断出远古人的走路姿势，这种姿势与现代人在海滩上的走路姿势没有什么差别：大脚趾在一侧，其它脚趾在另一侧；大脚趾稍长，没有与其它脚趾分开，也不像大猩猩的大脚趾那么长。拉依托里的远古人骨骸表明脚印是更新世灵长类留下的，它进一步证明像露西那样的远古人已经能够直立行走。



人们在清理远古人的脚印。脚印是两个人留下的，一个大人与一个小孩，两人走路时几乎挨在一起。

玛丽·利基回忆说："发现这行脚印叫人兴奋不已。当时的感觉与发现远古人类重要化石的感觉不一样——比如，普罗猿化石或东非人——因为发现远古人的化石来得很突然，你立刻就能准确知道找到了什么东西。发现拉依托里的远古人脚印的情况则不一样，人们花费了半年时间才渐渐清理出它们的轮廓，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利基及其同事们一直在图卡纳地区进行野外考察，他们发现了大量直立人化石。此前，人们只在亚洲发现过这种化石。最令人吃惊的是"图卡纳男孩"的化石（WT-15000），它是1984年在纳里奥克托姆发现的。男孩约12岁，死于160万年前。他的骨架几近完好（只缺腿骨），非常罕见。这表明他体格强健，身材高大，超过6英尺。图卡纳男孩的化石是最早的直立人化石之一，与现代人几乎相同，只有脊椎骨、臀、和腿稍有差异。男孩的猿人先祖比现代欧洲人和北美人矮得多，而他却身高体大。如此显著的差异使人们把注意力转向200万年与150万年之间，专家们认为这一时期是人类在生理解剖上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

70年代，人们把注意力投向埃塞俄比亚北部的阿法地区。1974年圣诞节前夕，克利夫兰大学的古人类学家唐纳尔德·约翰松（Donald Johanson）发现了一块远古人臂膀化石，经过仔细勘察后，他又发现了数以百计的骨骸残片，全都属于一个身高1.1米（43英寸）的直立女人，它们凑成了她全部骨架的40%。1978年，专家们给她起了一个拉丁文学名：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南方古猿阿法种），但人们通常称她为"露西"，这个名字源于甲壳虫乐队演唱的一首歌"露西站在布满钻石的天空"，因为发现她的那天，考古队员们曾在营地演奏过这首歌曲。由于露西是当时发现的最古老、最完整的远古人遗骸，大家激动不已。专家们用钾-氩鉴定法确定她的年代为300万年左右。1975年，还是在哈达尔（Hadar），约翰松及其同事发现了至少13具远古人化石，既有成年人的、也有孩子的；既有女人的，也有男人的，体态比露西高大、年代超过300万年。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些骨骸是怎么聚集在一起的，但仍然把它们命名为"第一家庭"。

拉依托里的脚印和哈达尔的化石说明，早在350万年前，大脑容量与大猩猩极为相仿的更新世古人已能直立行走。这一年代比已知的石制工具早100万年。在埃塞俄比亚的中阿瓦什河谷发现的石制工具的年代为250万年。此前专家们认为直立行走与大脑的发育和工具的应用出现在同一时期——远古人的大脑越来越发达，手在行走中的作用越来越小、灵活性越来越高，并开始制造工具——这些发现改变了人们的看法。专家们认为直立行走是远古猿人演变成人类的第一步。

尽管专家们在细节问题上还有争议，但在过去30年里，人们掌握的人类起源的知识说明非洲是人类的摇篮。远古人与现代人属于同一个种属，他们至少在500万年前就出现了，而后分化成不同的支系。其中一个支系是一种体格粗壮的生物，也叫更新世猿人粗壮种，它们大约在100万年前或稍晚灭绝了。还有一个支系的身体稍轻，体态较纤细。这种更新世人猿分化成几个支系，与人类的关系较近，出现在200万年前。他们的技术行为和社会行为与今天的人种一样。

强大的狩猎人还是卑贱的食残肉者？

先民的遗骸旁散落着许多动物骨骸和石器，专家们曾经认为这些残物是先民狩猎时留下的。罗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撰写了《非洲的起源》（1961年），还有人撰写了类似的作品。这类作品把先民描写成噬生舔血的狩猎者。另一方面，有关"石器时代"采食者的传说也使人们认为捕杀凶猛的大型动物在史前

史中是非常重要的活动。但是人们很少提及原始社会的先民们时常捕杀小动物在篝火上烤食。事实上，人种学研究表明，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先民，主要以妇女采集的植物为食。狩猎只在北极地区才占有重要地位，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多少植物可供人类享用——但是人类是3万年前才到达北极地区的。考古学家考察了南非南部克拉西斯河口的一些遗址，研究了石器时代的动物骨骸和石制工具，结果表明，40000年以前先民们狩猎的效率相当低下。专家们还研究了动物牙齿对人骨造成的损害和早期石制工具在动物骨骸上留下的痕迹，结果表明，最先到达捕猎现场的往往是食肉动物，而后才是人。

这种新见解得益于1960年以后发展起来的“骨痕学”——它研究的是从动物死亡到被考古学家发现之间骨头的变化——人们在东非和南非发现了许多早期遗址。为了根据出土残物解释早期的人类行为，“骨痕学”问世了。C.K.布雷恩(C.K.Brain，又名“鲍伯”)是开创这门学问的先驱之一。他在南非特兰斯瓦尔博物

伊格布·乌克乌

在公元后的第二个千年期里，西非出现了许多复杂的社会群体，不仅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艺术和技术也有重大发展。然而，人们对公元一千纪的西非知之甚少。英国考古学家瑟斯坦·萧（Thurstan Shaw）在此方面贡献颇大。他解释了西非传统青铜工艺的起源，找到了社会权力集中和财富聚集的证据。虽然早在1938年，人们就在尼日利亚东南部原始天然林区的伊格布·乌克乌遗址发现了许多青铜器，但是直到1956-1960年萧才首次对它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发现它是世界上最不寻常的考古遗址之一。他说：“这是我从事过的精神最紧张的发掘工作……一是因为我马上就意识到碰上了非常独特、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是因为发掘工作是在非常危险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痢疾盛行……发现第一件青铜器后，有人企图在夜里将它从我的床下偷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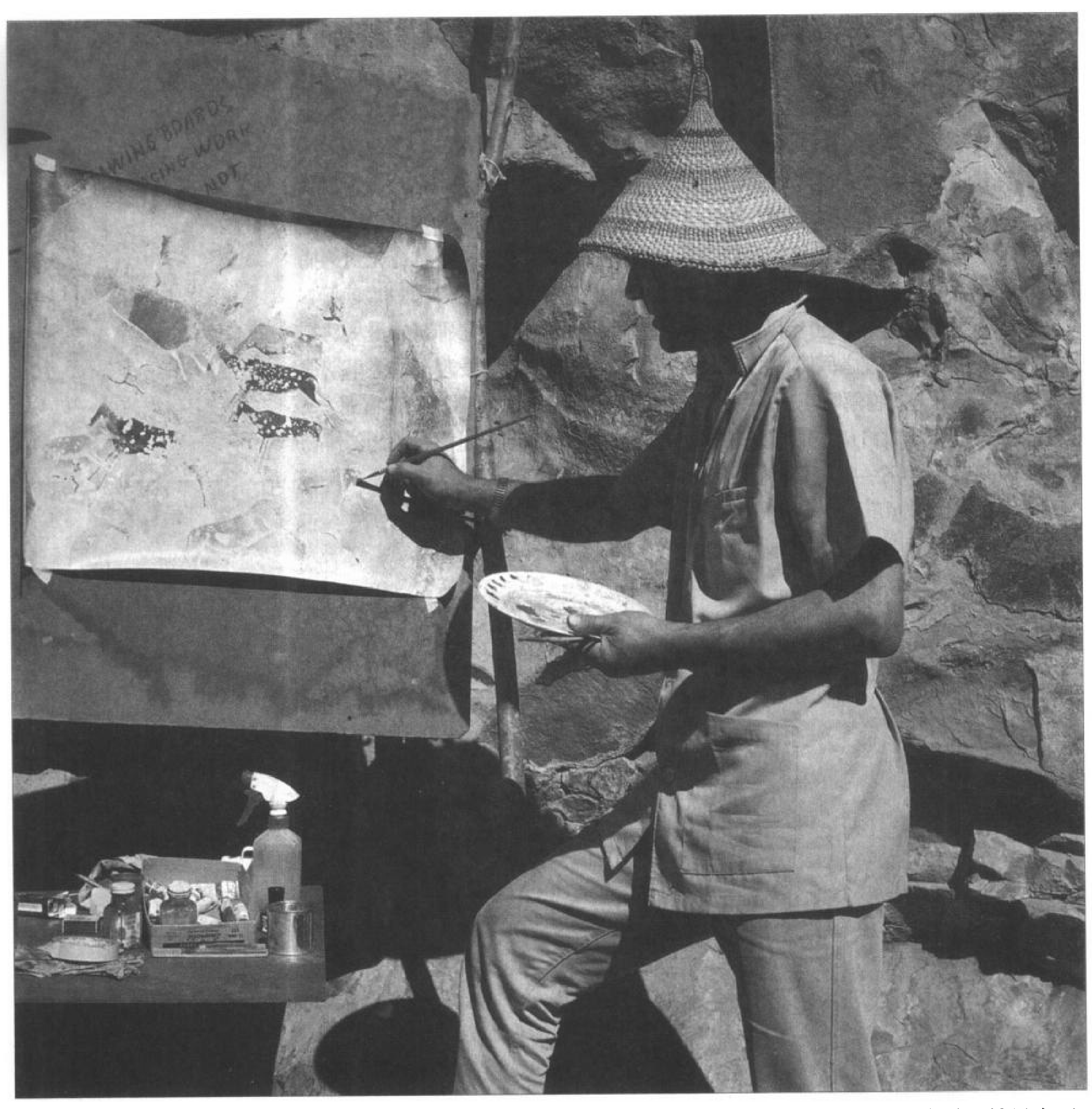


法布吉式的工艺品。这是一个装饰华美、用青铜铸造的神像底座，它是瑟斯坦·萧在伊格布·乌克乌发掘出的。底座两侧刻有男女人像，镂空雕壁上有蛇和蜘蛛图案。

萧发现了大量青铜器，全是用“去蜡法”铸造的。此外还发现了一些锻造精美、雕凿精巧的黄铜器物。放射性碳鉴定法确定它们都是公元9世纪或10世纪的制品。墓主的地位很高，陪葬物上有王权标志：一个青铜权杖，一个掸子，一块黄铜胸饰和一个王冠，此外还有10万颗玻璃和红玉髓珠子。其中一些东西很可能是与印度的商贸活动交换来的。

证据表明，那时当地已经有了手艺精湛的工匠。伊格布·乌克乌遗址文物的原料——铜和锡——来源不明。人们对这些金属的化学成分、熔化工艺和铸造技术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它们既非来自阿拉伯也非出自欧洲。

最近人们在尼日尔中部的冉恩-冉诺发现了工艺粗糙的含锡青铜和含砷铅的黄铜，年代鉴定为公元五六百年，这证明了西非那时已有自己的金属冶炼技术。



哈拉尔德·裴杰（Harald Pager，1923–1985年）正在纳特尔·德拉肯伯格的塞巴懊尼洞穴临摹三只狷羚的形象。南非纳特尔·德拉肯伯格地区的岩画最丰富。

裴杰是设计艺术师，他花费了很大气力临摹德拉肯伯格和布兰德伯格的岩画，整理出上千件岩画艺术品。

馆工作，研究鬣豹、鬣狗和箭猪在捕食猎物时给动物骨骸造成的损害，结果表明，早期的穴居古人像南非的斯瓦克兰人（Swartkrans）一样，很可能不是狩猎者而是易受动物伤害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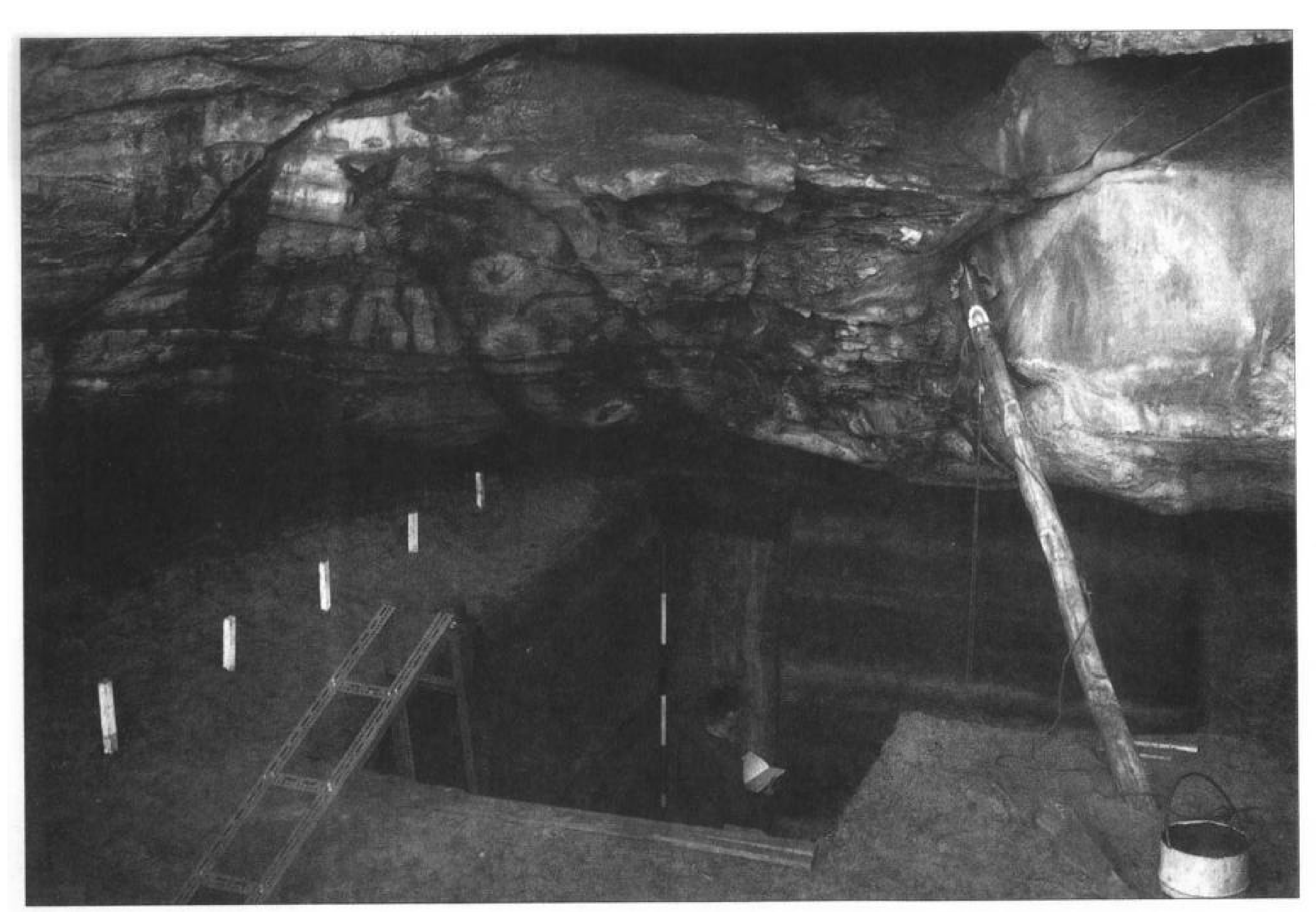
最近，关于非洲铁器时代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考证班图语系黑人农民的起源及他们在东非与南非的分布问题。1980年以来，人们采用了放射性碳鉴定法和陶片鉴定法，详细研究了当地的文化－历史顺序，确立了编写黑人史的基础。但是这种研究深受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的影响。白人种族主义者以陶片鉴定法确定的时间顺序为基础，用不偏不倚的考古学语言表述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神话，即从15到16世纪黑人农民与白人农民同时来到了“无人居住”的南非。然而事与愿违，他们的考古成果却证明了黑人农民早在公元200年就在南非定居了。

大洋洲：岛国世界的殖民化

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才对澳大利亚的考古产生兴趣，而仅过了10年,这门学科的情况就大为改观。人们获得的信息猛增，许多关于古人、自然和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早期殖民的新资料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有关土著人生活的人种学记录和历史记录含有的信息非常丰富，既有来自澳大利亚的，也有来自世界其它狩猎社群和采集社群的，这些信息使人们能够较清楚地理解考古证据。人们研究了土著人如何应对环境问题，尤其研究了土著人如何利用火应付环境的问题。结果发现，他们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艰苦，他们是善于用火、热爱土地的农民。新几内亚是进行早期农业开发的中心地区。人们在澳大利亚北部的阿赫姆兰发现了20000年前磨制的石斧，在努拉伯平原的库纳尔达洞穴发现了同时代的艺术品和地下燧石矿。这些发现使人们对传统史前史的欧洲中心论产生了怀疑。仅过了10年澳大利亚史前史研究就步入了世界舞台。

“中国墙”的鸟瞰图。干枯的曼古湖位于新威尔士西部，湖东岸的积沙不断向外侵蚀。澳大利亚最古老的人类遗址就在这里。1969年以后,人们在此发现了大量古人遗物，包括贝冢、墓葬和炉床，年代鉴定既有30000年前的，也有近期的。有一个编号为曼古1号的女人墓葬，年代鉴定为公元前24000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火葬墓。





1962年约翰·马尔瓦尼发掘了昆士兰的肯尼夫洞穴，这座洞穴是以长年在荒原上漫游的凯尼夫兄弟的名字命名的。

经过鉴定，出土物品的年代为19000年前，挖掘深度为3.3米（11英尺），出土了80件石器，22000块废弃的搁板，放射性碳素断代法确定的年代第一次证明澳大利亚在更新世时就已有了居民。

虽然有人宣称发现了一些年代更为久远的考古遗址——但是，最著名的古人类遗址是墨尔本郊区的凯勒——1960年，专家们初次使用放射性碳鉴定法，确定它的年代是在8700年前。仅隔三年，马尔瓦尼（Mulvaney）考察了位于昆士兰的肯尼夫岩洞，洞里有许多用模板绘制的岩画，岩画的绘制时期不同，但全部都在16000年以前。马尔瓦尼的考察队接到了皇家飞行博士服务中心转来的电报，说他们发现的东西属于更新世，马尔瓦尼非常吃惊，他怀疑电报上的数据有误，是否多报了一个0，要求服务中心再核实一下。第二天早晨“喝麦片粥的时候”，中心回电确认数字无误，是“12000”。10年后考察队在所谓的“中国墙”——位于新威尔士以西曼古湖畔不断向外侵蚀的沙丘地带，曼古湖的湖床已干——发现了石制工具和动物骨骸一类的人类遗物。这一发现把人类活动推到30000年以前。那时曼古湖和该地区的其它湖泊水富鱼肥，人们安居乐业，以水产为食，也在附近的平原上狩猎。而后10年，人们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其它遗址发现的远古遗物进一步证实了曼古湖发现的资料，这些遗址包括魔鬼洞和考西普。魔鬼洞是位于澳洲大陆西南角的一座石灰岩洞，考西普是位于新几内亚高原的露天考古遗址。1980年以后，人们相信澳洲人类史有40000年之久。到了9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澳洲人类史有60000年之久。

考古学家们都知道澳大利亚出土的人类化石与爪哇出土的直立人化石很相像。1968年体质人类学家阿兰·索恩（Alan Thorne）在维多利亚博物馆发现了具有远古人特征的骨骸。他追踪到骨骸的发现地，维多利亚北部的诺·斯旺普(Kow Swamp)，发掘了大量体格强健的古人骨骸和墓葬，年代为9000年到13000年之

间。曼古湖出土的人类遗骸则不同，它们比较纤细，与古加瓦人有很大差异。这些发现引起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更新世澳洲人的生物学亲姻特征和起源，以及他们与现代土著人的关系。索恩认为这些骨骸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殖民者，一种殖民者来自中国，另一种殖民者来自印度尼西亚。但是，他的观点受到了强烈批评，批评者认为他夸大了化石的差异，某些古代特征很可能是由文化活动造成的，比如，当地人有为婴儿系头带的习俗。

60年代的考古工作始于马尔瓦尼对肯尼夫洞穴的发掘，这些洞穴和山石居住地可能会揭示出地层序列，进而确定澳大利亚文化顺序的大体轮廓。马尔瓦尼在《澳大利亚史前史》(1969年出版)一书中把澳洲史前史分为较早的适应期和较近的创造期，其分野大约在5000年前，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工具是不是带有手柄。早期的各种工具被归类在“澳大利亚核心工具和刮擦工具”传统中，而近期的工具则被归类在“澳大利亚小工具”传统中。虽然这些术语不大通用，但还没人做过修改。

澳大利亚更新世的考古发现令人激动不已，它成了考古工作的主流。但是，考古学家们的视野开阔，他们对人类如何利用环境问题也很有兴趣。欧洲人到来之前，澳洲唯一的社群是狩猎者社群和采集者社群，这种情况使人们一开始就对人种考古学和人种史产生了兴趣，并把它当作解释澳大利亚考古记录的一种方法，一种理解世界各地狩猎者社群和采集者社群的方法。土著居民的艺术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因为它是人们迄今所知的世界上产生最早、延续最久的艺术传统，其源头可以上溯到40000年前。

廷达尔和麦卡锡两人都致力于研究土著人的生活传统，并为解释考古记录做出了贡献。汤普森(Thomson)的作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颇有影响，他描述了

塔斯马尼亚北部、西加麦隆山石灰石上的石刻。1968年莱斯·琼斯把它们从沙堆中挖掘出来。

最初专家们认为它们相当古老，与澳大利亚古人的石刻有关。现在人们确信它们的年代约在1350年－850年之前。



先民遗弃在不同遗址的石制工具的差异，认为它们的差异反映了先民活动的季节性变化。但是，多数澳大利亚考古学家们很久之后才认识到这种可能性。人类学家和美国考古学家最先验证了这种可能性，他们在澳大利亚北部和中部与过着传统生活的土著人一起工作。马尔瓦尼认识到历史资源的价值，它们能够解释土著人传统生活的诸多问题，尤其能够解释人口密集的东南地区的问题，那儿的生活传统最先遭到破坏。许多考古学家利用历史记录解释近期发掘的遗址。一些重要的人种考古学研究工作是在新几内亚进行的，最突出的是对石器工具制造问题的研究。

哥尔森（Golson）在新西兰考古学界很有影响，1961年他坚决要求改进野外考古技术，并把研究重点从传统物质文化转移到探察生存结构的证据上。考古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早期殖民者究竟把农业带到新西兰来，还是他们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农业，改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因为恐鸟为殖民者提供了狩猎的机会。还有一个问题也颇有争议，即战争的演变问题，欧洲人到来时这个问题在毛利人社会中相当突出，故而要对规模宏大的“帕”（pa）——带有防御体系的遗址——进行考察。由于研究的焦点转移到经济和社会问题上，细致的物质文化研究显得过时了。虽然哥尔森关注出土文物，他发掘的遗址地层也很复杂，但与物质文化有关的东西却不多。石器固然重要，但关注的重点已从研究类型转移到了研究石器制造技术和原材料的分布上了。

公众考古学

在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各州的压力很大，人们要求以立法形式保护土著人的考古遗址，后来发展到以立法形式保护历史遗址乃至沉船。70年代中期，每个州都制定了相关法律，联邦政府也成立了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随着立法的完成，各州都建立了管理文化遗产的专门机构，促成了考古契约的发展。

政府最初重点关注考古遗址。后来，澳大利亚考古工作不断受到土著人的强烈抨击。各州政府做出了各种反应，它们把土著人吸收进管理机关，要求管理机构做出有关遗址的决定前要充分考虑他们的意见，要求研究人员向土著人社团咨询，并把咨询结果做为批准考古发掘的必要条件之一。

澳大利亚考古工作与范围较广的保护运动关系紧密。1982年到1983年，政府计划在塔斯马尼亚西南的富兰克林河上修建一道水坝，而保护运动成功地阻止了这一计划。1983年，这个问题影响到联邦政府的大选，尔后，考古遗址问题被提交到最高法院。

1975年，新西兰通过了保护考古遗址的专项法律，并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新西兰历史名胜信托局”。同澳大利亚一样，这项法律扩大了公众的作用，促进了考古契约的发展。“毛利建筑与咨询委员会”在有关考古遗址和传统遗址的问题上起的作用越来越大。1993年，人们根据《历史名胜法案》修正案设立了“毛利遗产管委会”，所有问题都规范化了。

历史考古学

在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把考古学用于历史遗址考察而非史前史遗址考察出现得较晚。历史考古学能够补充文献资料，如果利用得当，还能描述出一般正史不愿记述的普通人的生活。专家们对澳大利亚殖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范围从遥远的乡村居民点到城镇建筑，从大庄园到关押囚犯的小屋，从华人的市场、花园到土著人的会堂。在澳大利亚水域发现的大量沉船也是考古研究的项目，最早的沉船可以追溯到17世纪荷兰与东印度地区的贸易。澳大利亚的历史考古学始于60年代中期。马尔瓦尼很可能意识到它的内在价值，1965年他一到澳大利亚国民大学就鼓励学生们开拓这一领域。最先开拓的考古工程有北方领地的马卡桑遗址，考察结果揭示出马卡桑的商人们是从印度尼西亚来的，几百年来他们常到澳大利亚北方海岸寻找海参（海黄瓜），因为中国对海参的需求量很大，一是用于烹调，二是用作春药。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最先开发的考古遗址有北方领地上殖民时代废弃的哨所埃星顿港，新南威尔士伊拉旺陶器制造场，还有弗兰德斯岛上于1832年为幸存的塔斯马尼亚土著人设立的威巴尔纳的居民定居点。

70年代，人们开始在西海岸考察沉船，尤其是考察17世纪和18世纪的荷兰沉船，并常获得出人预料的丰硕成果。发掘巴塔维亚就是一个例子。1629年，荷属东印度的一艘军舰在澳大利亚西面的海上沉没。考古工作者们从这艘军舰上打捞出许多财富，包括一座完整的门框，很可能是给新建的巴塔维亚要塞运去的。塔斯马尼亚的亚瑟港曾是罪犯的服刑地。70年代人们在这里进行了长期发掘。80年代，第一批主要的城市考古发掘是在悉尼进行的，地点在第一座政府大厦；人们在墨尔本市中心发掘了19世纪的一整座街区，找到了当时臭名远扬的红灯区“小罗恩”。发掘结果与人们在文献中读到的有很大差异。

巴布亚新几内亚

很久以前，太平洋的水位较低，有一条路桥把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连在一起。60年代的发掘工作显示，同澳大利亚一样，新几内亚的高原早在30000年前就有人居住。最近，考古学家们在所罗门群岛西北的俾斯麦群岛上发现了同一时期的遗址。然而，在10000多年的时间里，新几内亚的史前史与邻近的澳大利亚史前史背道而驰。澳大利亚是狩猎者和采集者的大陆，而新几内亚一些地区的农业则很发达，并养育了来自众多地方的稠密人口。

1959－1960年，人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央高原上发现了两座山岩住所，在此之前那里基本上没有考古工作。伊里安－加雅的情况同样如此，现在伊里安－加雅已经并入印度尼西亚。哥尔森亲自参加了高原上的野外考古工作，他鼓励学生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从事研究。不久后，他于1961年受聘到澳大利亚国民大学任教。从60年代到70年代，澳大利亚国民大学的师生承担了大部分野外工作，他们身在远方，在极端困难的野外条件下进行了考古的发掘和研究。

考古学家们认定早在更新世新几内亚就有了人类的踪迹。此外他们还集中精

力研究了另外两个重要课题：农业的发展和贸易的发端。哥尔森在库克开展工作，他发现10000年前左右那儿已有从沼泽地排水的大型水渠，证明当时已有农业系统工程。排水系统说明新几内亚高原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植物培育中心。欧洲人到来前，南海岸一带已经有了分工精细的贸易体系，不同社会群体生产和交换陶器、黑曜石、西谷和贝壳装饰品。人们还可以从当地的口碑历史中了解这种贸易体系的部分情况。考古研究表明，商贸活动早在2000年前就存在了。

殖民太平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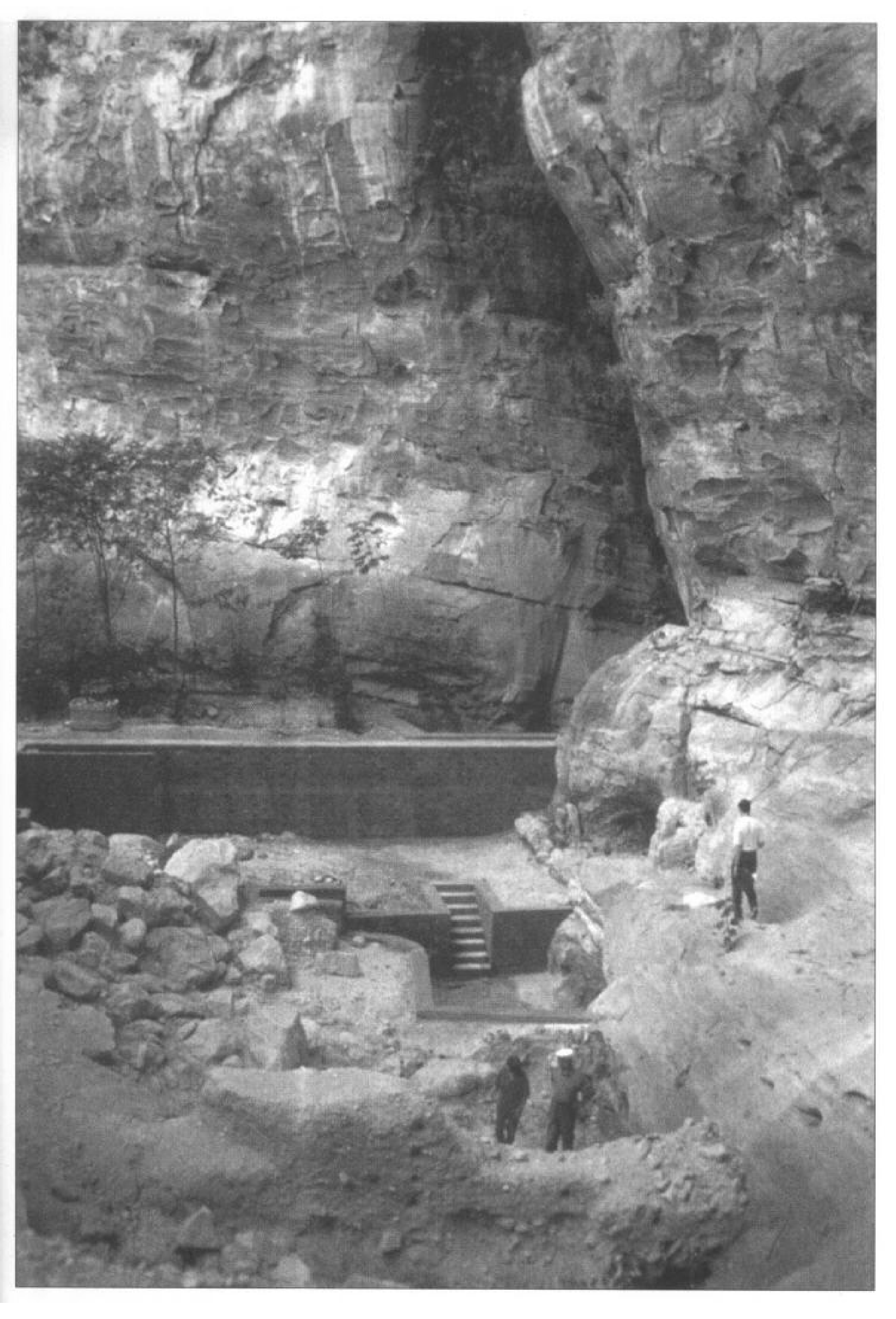
太平洋考古工作的重要课题之一是人们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到达太平洋诸岛并在岛上定居的。1960年前，人们大都认为现今波利尼西亚人的先祖是从西面，即从东南亚的岛屿上来到太平洋诸岛上的。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出土了装饰风格独特的拉皮塔陶器，它们的制作者就是波利尼西亚人的先祖。在60年代和70年代，考古学家们对拉皮塔陶器的年代和分布问题很感兴趣，因为通过陶器可以了解陶器制造者的生活方式。拉皮塔陶器可能出现在4000年以前，约2000年前消失了。那时，汤加和萨摩亚已经有人定居。随后几个世纪，波利尼西亚的航海者们到达了马克萨斯群岛、土阿莫土群岛和社会群岛。最后，他们成了夏威夷、新西兰和复活节岛上的殖民者。

波利尼西亚人怎样越海航行？是有目的的，还是偶然的？考古学家们对这类问题莫衷一是。专家们研究了传统航海体系和独木舟技术，并用电脑进行了模拟试验。1976年，“霍布勒”号从夏威夷启航驶向塔西提，对传统航海技术和太平洋诸岛居民的航海能力、开拓能力和殖民能力做了一次特殊的验证。

美洲

从前，专家们对美洲大陆上人类活动的起始年代问题颇有争议，今天依然如故。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尼德·吉东（Niede Guidon）和法维奥·帕伦蒂（Fabio parenti）在巴西发掘了皮德拉·弗拉达的最大的山岩住所，放射性碳鉴定其年代为40000年前，甚至更久远。汤姆·迪勒海（Tom Dillehay）在智利露天的沃尔德山考察时发现，该地13000年甚至33000年以前，就曾有人居住过。还有一些遗址的分析数据则比较保守——例如，宾夕法尼亚西部地层深处的米德克罗夫山岩住所，1973-1974年詹姆斯·阿多瓦西奥（James Adovasio）曾在此做过发掘——他提供的证据确凿，说明人类在12000年前或更早就在这里活动过。争议不断的原因是考古发现的遗物数量太少，地质变动的影响较难确定，出土文物很难划分到某一特定时期。最后一个原因，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卷入这场争议的考古学家们往往存有私心。

人们在老克罗盆地南部的玉孔地区发掘了蓝鱼洞穴群，找到了一些石制工具和冰川时期的动物遗骸。理查德·莫兰（Richard E.Morlan）和雅克斯·辛克马斯（Jacques Cinq-Mars）找到了少量工具，包括少量刃器。他们为出土骨骸做了鉴定，年代大约是公元前23000到10000年之间，但是骨骸与工具的关系却不



1978年到1988年，人们在巴西东北部的皮德拉·弗拉达发现了巨大的沙石住所。这是专家们在考察石壁岩画的年代时偶然发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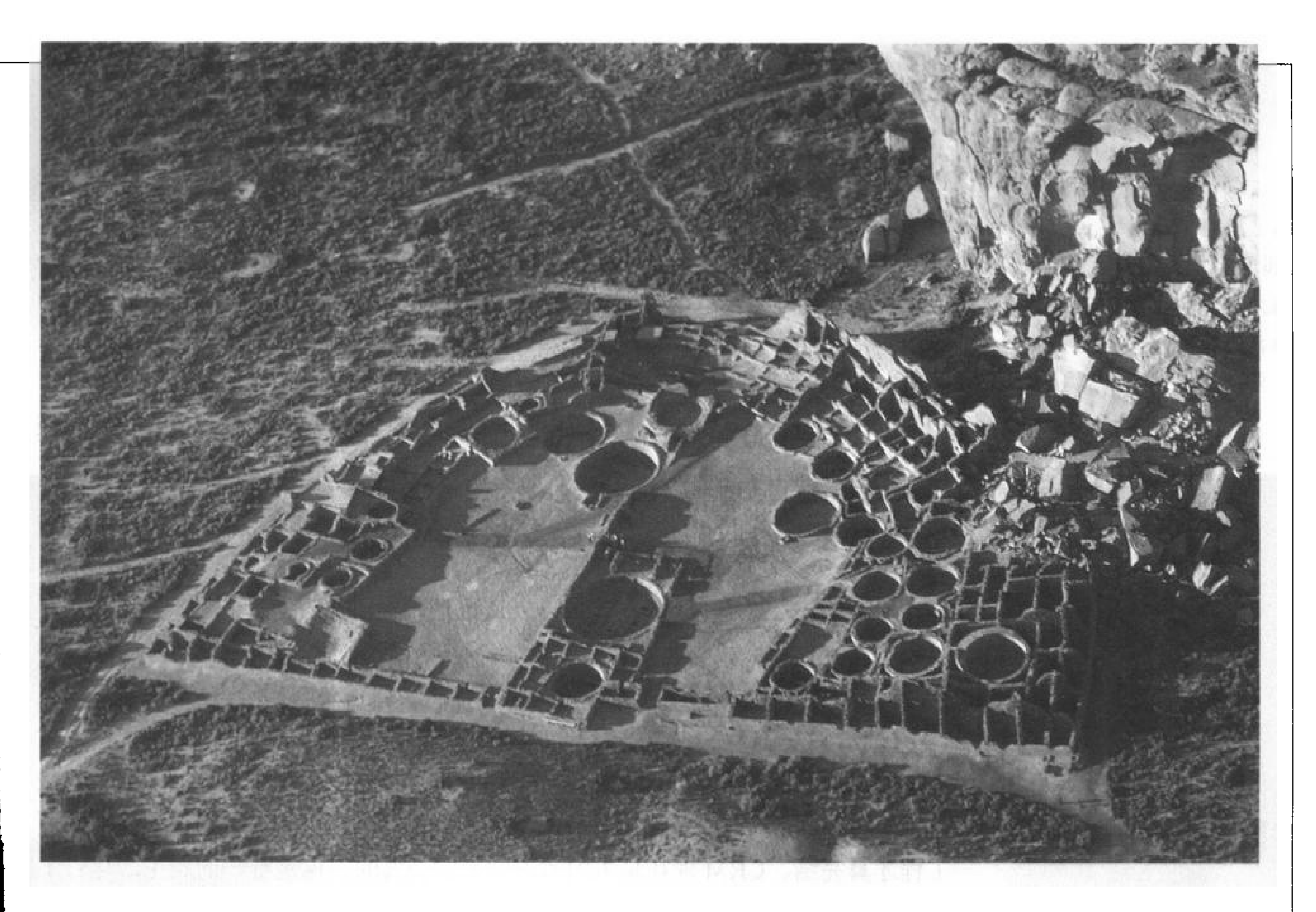
考古学家们最后公布的发掘结果把人类活动上推到50000年前——目前流行的正统观点是，15000年前甚至12000年前美洲才有人类活动。人们大都认为狩猎者群体和采集者群体最初是从欧亚大陆出发，穿过终年不结冰的白令海峡的陆桥到达阿拉斯加的。

专家们的争议非常激烈，关键问题是皮德拉·弗拉达的数以百计的含铁石英细砾或小圆石是人工制造的还是自然形成的，被发掘的“结构”——沙石石板或细砾的排列——是出于人工还是出于天成。

清楚。从1980年到1993年，人们考察了阿拉斯加地区的北部山麓和塔纳诺河谷的几个遗址，第一次用放射性碳素断代法为阿拉斯加考古遗骸做了年代鉴定，鉴定出它们与北美大平原的古印第安遗址属于同一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到公元前9000年之间。现在，除非人们承认专家们为蓝鱼洞穴出土器物所做的年代鉴定是正确的，否则，小型刃器制造期之前还应有一个弧型刃器制造期，这一时期与大平原及其南部的古印第安文化应有联系。虽然北美洲的考古学家们不断报告有价值的新发现，但是北部地区尚未发现有关人类活动的更早证据。

查科大峡谷和普韦布洛·班尼托





查科大峡谷位于美国新墨西哥西北的纳瓦约印第安人保留地。今天，这里气候干燥，草木不生。峡谷两旁耸立着15-40米（50-150英尺）高的峭壁，峭壁之间是时断时续的查科河冲积而成的沙石河床。大约1000年前，这里曾经是北美洲史前史上最辉煌、最成熟的文明中心之一。公元1000年前后，查科兴旺起来，成为阿那萨吉文化的重要中心，1130－1150年人们遗弃了它，遗弃它的主要原因是干旱。

大峡谷长24公里（15英里），峡谷内有13个阿那萨吉村庄，普韦布洛·班尼托是最大的村落。村落建筑稀疏零落，每个村落的房屋多达700间，还有34个"基瓦"(Kivas)，每个"基瓦"都是一个半地下的圆形结构，既是礼拜活动中心，也是社会活动中心。建筑这些村落使用了20万根木头，所有木头都得从远处的山上运来的。为了运到较高的建筑工地上，阿那萨吉人在峡谷两侧陡峭的岩壁上砍出了一级级台阶。

对阿纳萨吉人来说，观察天象相当重要。公元1054年6月的超新星记录保存在阿纳萨吉人的潘纳斯科村的岩画艺术中，查科的许多其他遗址都有天象记录：保存最完好的是法雅塔·布特，它是冬至与夏至的标志。

查科大峡谷有许多道路通往外地，路修得很直，质量也较好，一些道路长达96公里(60英里)，宽13米(43英尺)。许多道路保存较好，人们站在上面就能看清它们，因为它们只有几厘米的凹陷，而且只要能辨认道路的位置，就能通过详细调查找到路边的镶边石。道路把大峡谷的主要遗址和较小遗址（叫作"外围村庄"）连在一起。在整个系统中，外围村庄有其特殊作用。人们至今还没搞清楚道路网和查科系统的作用。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整个系统是一个经济实体，另一些人认为该系统是宗教活动的组成部分，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它是由一个封建社会或军事社会建造的。

美国最早的军事远征队曾经提到过阿那萨吉人的道路，但是直到1970年，人们才在空中对它进行了考察，了解到它的全貌。考古学家们最初使用了空中摄像技术，照片上显示出前人没有发现的道路。在这一成果的激励下，查科调研中心的遥感部门安排了更详细的摄影考察，使用了更敏感的设备和远红外电磁成像技术。空中考察耗时数年才全部完成，每次拍摄的图片都用实地考察和记录加以验证。现在考古学家们已经整理出北美最大、最迷人的史前建筑工程的全部图片。

左页为新墨西哥的查科大峡谷。

上图：大峡谷中阿那萨吉人的普韦布洛·班尼托村，村里有700间房屋。这两幅照片都是从空中拍摄的。

文化资源管理

在美洲，文化资源管理（CRM）一词指的是在公用土地上对考古遗址进行保护和研究。1906年的古代文物法案是联邦政府通过的第一项保护考古遗址的法律，尽管当时的国会还没有足够的资金强制执行这一法律。保护古代文物的新纪元始于1966年，那一年国会通过了国家历史文物保护法案，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保护文化遗址的的规划，由联邦机构和州立机构两级进行管理。1979年通过的考古资源保护法案规定，掠夺和破坏联邦土地上的考古遗址为犯罪行为，并要处以罚款。美国联邦法案只适用于联邦土地上的遗址，但是各州甚至一些城市也在它们的辖区内，制定了相应的遗址保护法。然而，这些法案并不适用于私有土地上的遗址，如何处置私有土地上的遗址完全是土地所有人的私事。1987年，国会通过了沉船法案，该法案规定沉船是历史遗址，任何商业企业打捞沉船的行为都是非法行为。

根据法律，如果不事先对评估开发或改造工程对考古遗址的影响，就不能对联邦土地进行开发和改造——不论是由政府安排的还是由私人团体安排的。这种工作是由为开发商服务的私人考古公司进行的，但需要联邦考古学家的监督。

CRM对美国考古界的影响不可低估。它使研究者们获得的信息量大增，对理解文化史和文化发展进程大有裨益。现在的文献记载比从前清楚，因为联邦法律规定，只有向联邦有关机构提交最后的专业质量报告并得到它的批复后，一项工程才算完结。CRM现在是美国考古学家们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雇主，尽管工程的质量、工资、收益和安全有很大差异。在今天的北美，绝大多数野外考察工作都与CRM有关。但是发掘工作只有万事俱备方可进行，因为它不仅需要动用大量的劳动力，而且还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

新考古学和拉丁美洲

随着专业考古学的问世，中美洲和南美洲出现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新问题。一方面人们花了不少气力编写地方志和文化史，另一方面还要解释在考古记录中发现的种种变化，而不是仅仅描述它们。人们通常把60年代的进程革命归功于宾福德。但是早在20多年前，克莱德·科卢克霍恩（Clyde Kluckhohn）就预见到了这一变革。科卢克霍恩目睹了中美洲考古界的现状，发现它与正统考古学格格不入，那儿的落后状态使他大为吃惊。他写道："我记下了这一深刻印象，该领域（指中美洲考古界）的学生们只不过是略知一二的古物收藏者。对于如此高度专业化的学科来说，他们只不过是门外汉。他们沉迷于鸡零狗碎的细节，然而却为之沾沾自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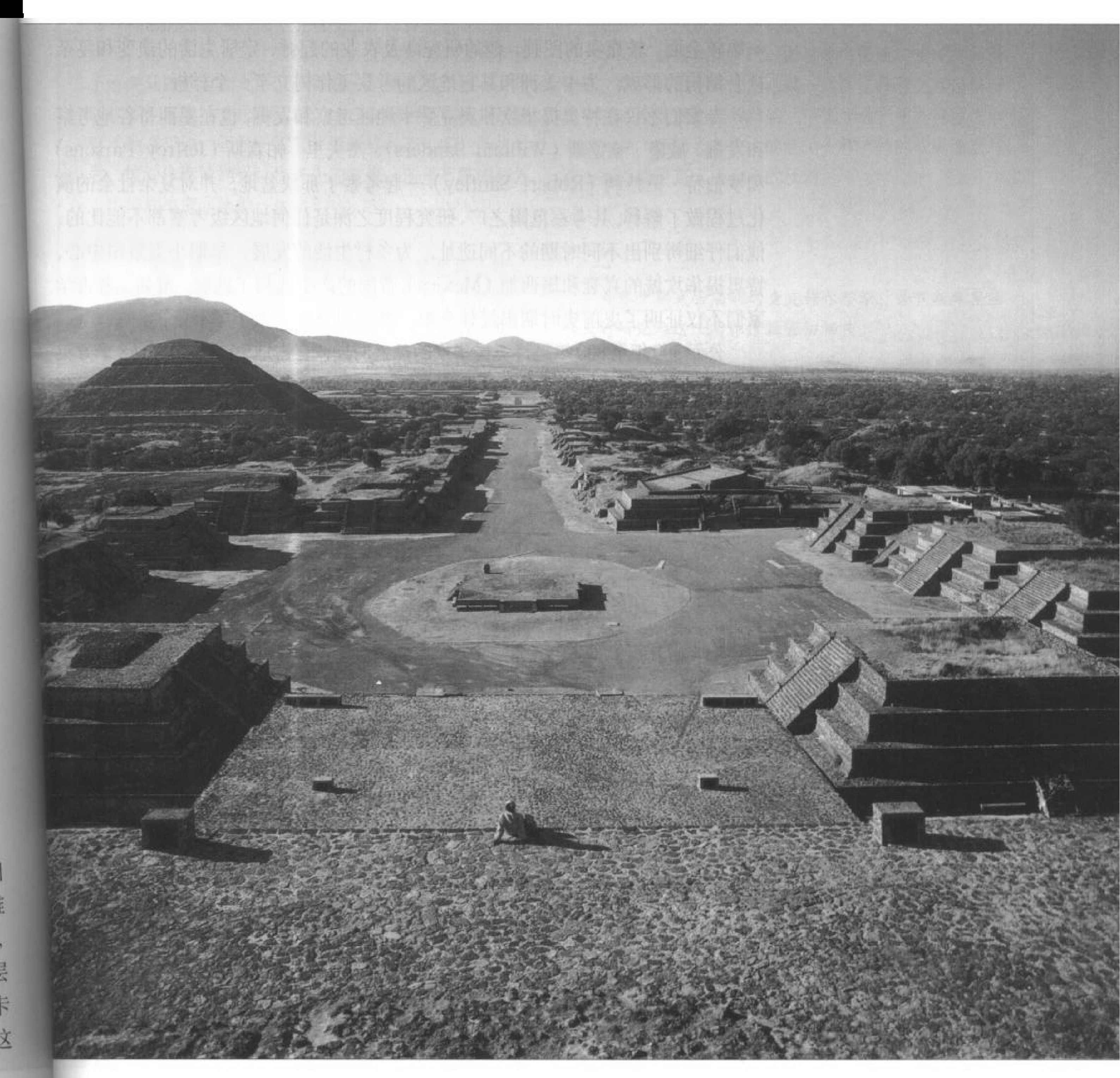
卡内基研究所经过30年的研究后拿出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过于关注事实与细节，对综合分析与解释问题则轻描淡写。1960年，卡内基研究所突然中断了马雅研究，转而对中美洲研究产生了兴趣：它想搞清农业的起源和玉米的培育问题，研究贸易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再现从前的定居点和不同权力阶层和富有阶层的日常生活状况。它研究高原地区时把特华坎峡谷也包含进来，对瓦哈卡（Oaxaca）和墨西哥峡谷的研究很快就超出了传统马雅文化的研究范围，当时这

些课题已经列入中美洲考古研究的日程表。

宾福德号召考古学家们集中精力研究人类史前史的三大问题，唯有考古学才能解决的三大问题，即人类的起源、农业的起源和复杂社会的产生。第一个目标只能在其它大陆解决，新世界的考古学家们则应解决第二和第三个问题。

玉米农业是新世界生存的基础，但是人们至今还不知道玉米的起源。中美洲很可能是最早种植玉米的地区，人们至今仍在中美洲种植一种名叫“利奥新特”(teosinte)的谷物，它是玉米的近亲。经过几番调查后，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麦克尼什(Richard MacNeish)认为特奥提华坎峡谷很可能是玉米的发源地。他想在那里找到玉米农业发端的证据。他没有把注意力全放在某个遗址上，而是考

墨西哥的特奥提华坎。站在月亮金字塔顶俯瞰“死街”的鸟瞰图。图片的左面是太阳金字塔。特华坎是先规划后建造的城市，也是工业社会前最大的城市之一。



察了整个地区，寻找那些干枯的洞穴，不仅想在洞穴中找到适于保存植物残骸的良好条件，还想找到几千年来的地层分层系列。他假定先民最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渐渐转向既靠狩猎和采集也靠人工培植的农作物为生，最后主要依靠农作物为生。为了找到足够的证据，他发掘了一些洞穴。他认为古人在公元前5200–3400年之前开始培植玉米，并把这一时期叫做"考克斯卡特兰"（Coxcatlán）时期。但是较新的放射性碳鉴定技术测定玉米培植期没有那么早。麦克尼什仍在进行发掘工作，以便找到最早的农作物培植期的证据。

弗莱聂里（Flannery）曾与麦克尼什在特奥提华坎峡谷一起工作，也曾与布雷德伍德一起研究过近东的早期农业。60年代中期，他曾系统地考察了奥克萨卡峡谷。他把具体遗址的发掘与整个地区的考察结合在一起，为当地史前史描述出一幅较全面、较充实的图画。他的研究涉及农业的起源、定居生活的演变和复杂社会结构的形成，为中美洲和其它地区的考察工作树立了一个样板。

专家们不仅在特奥提华坎和奥克萨卡地区考察和发掘，也在墨西哥谷地考察和发掘。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nders）、杰夫里·帕森斯（Jeffrey Parsons）和罗伯特·桑特利（Robert Santley）一起考察了那块盆地，并对复杂社会的演化过程做了解释，其考察范围之广、研究程度之深是任何地区级考察都不能比的。他们仔细辨别出不同时期的不同遗址，为乡村生活的发展、早期小型祭司中心、特奥提华坎城的兴衰和墨西加（Mexica）帝国的产生找到了证据。最后，考古学家们不仅证明了史前史时期出过什么事，并且对其原因做了解释。

公元300年至800年是特奥提华坎的鼎盛时期，它占地20平方公里（8平方英里），是新世界史前史时期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约15万。中央大街的一端是月亮金字塔，另一端是太阳金字塔，大街的两侧分别是主神庙和大生活区。特奥提华坎不仅控制着墨西哥谷地，还可能是占据了中美洲大部地区的帝国的首都，帝国的疆域东至墨西哥湾，南至危地马拉南部的马雅地区。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特奥提华坎一直是重大研究课题，专家们不仅要发掘遗址，还要绘制出它的平面图。在美国学者勒内·米龙(Rene Millon)和乔治·考吉尔(George Cowgill)的指导下，人们对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既使用了空中摄像技术，也使用了地面勘测技术。考察的目标之一是找到城市兴衰的证据，所以连地表上的陶片都做了精心整理。人们认为，城市中心形成后其规模就不断膨胀。区域考察数据表明，城市四周的乡村地区基本上没人居住过，所有人都搬到了城市里。专家们甚至在特奥提华坎发现了一个异邦人居住区，他们大都来自奥克萨卡。后来，这座城市被突然遗弃。米龙非常注意城市的衰落，他认为城市是突然衰落的，城市的衰落影响到了整个中美洲。

研究马雅故地的考古学家们对居民点的模式和马雅社会的农业基础兴趣颇浓。与在高原上考察的同行们相比，马雅学者们的条件很差，因为高原地势较高，气候干燥，植物很少，便于考察，而在茂密的丛林里考察马雅人的居民点则困难得多。但是，考古学家们——例如，帕特里克·卡伯特（Patrick Culbert）——的考察范围没有局限于遗址的祭祀中心，还扩展到了周围地区和数千普通百姓的简陋住所。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马雅人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一些学者则认为马雅人的生活要复杂得多，方式也很多。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人们相继破译了一些马雅象形文字，马雅研究有

普罗斯库里亚科夫与马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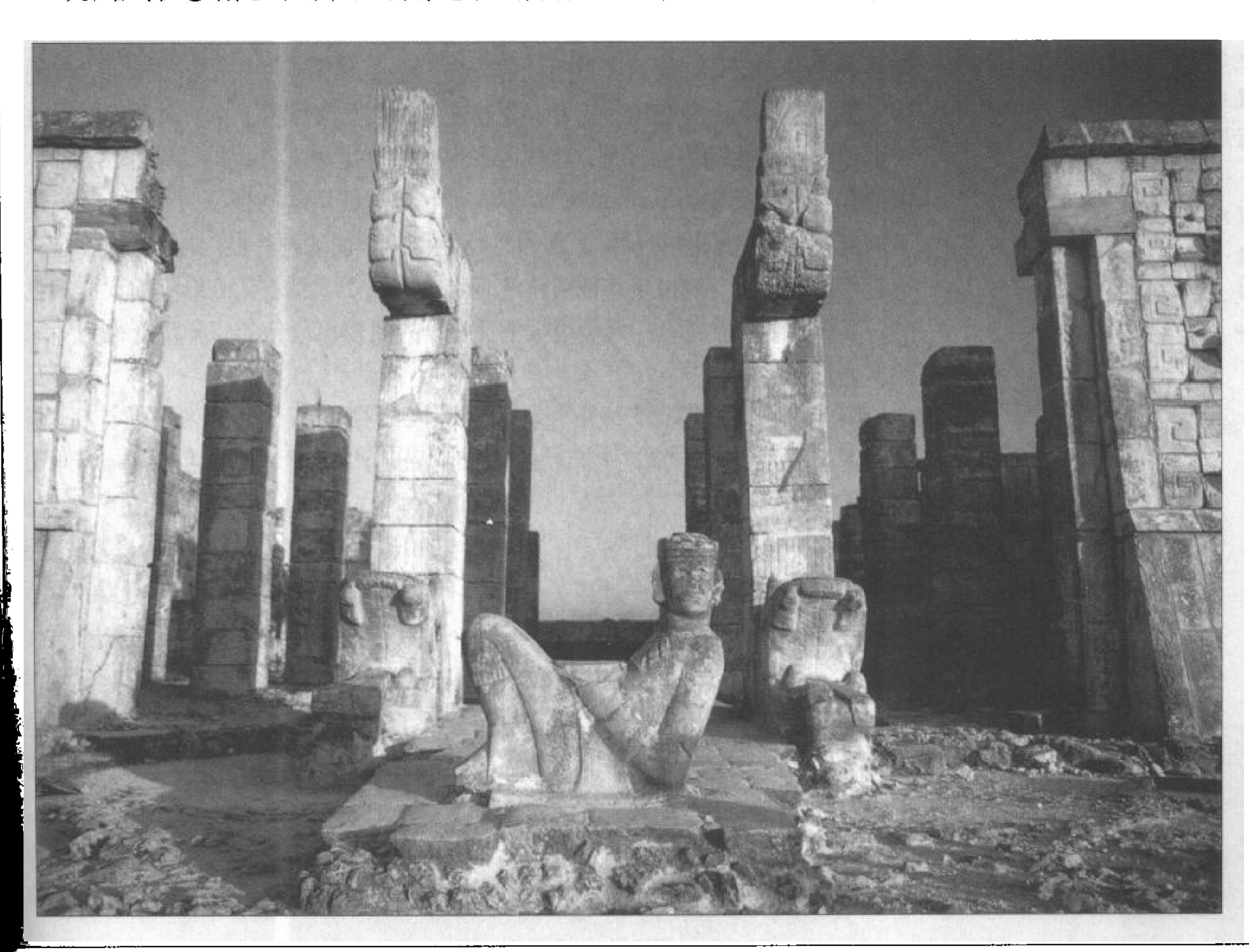
塔蒂亚娜·普罗斯库里亚科夫（1909-1985年）生于西伯利亚，她的先祖被彼得大帝流放到那里。她父亲被派往美国，监督军火制造。1917年革命爆发后他留居在美国。塔蒂亚娜在美国上中学，虽能讲俄语但不够纯正。她有一个外号叫"公爵夫人"，这个外号伴其一生。1930年，她从建筑学院毕业后就失业了，后来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博物馆当画家。

她曾前往皮得拉斯·尼格拉描绘马雅遗址上的复原建筑，这次观览改变了她的一生。此后她把余生全都用于研究马雅建筑和文字上。她是一个熟练的绘画者，反应机敏，喜欢独立思考问题，她在奇琴伊察和科潘建筑群里勤奋工作，画了一幅又一幅素描和遗址图。她去世后，悼词作者说她受过贵夫人的教育，但是严酷的野外工作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

她独自一人前往科潘，到那儿后感受到了野营生活的粗犷凄凉。她在欧洲有闲阶层的家庭中长大，看到营地的桌上堆满了酒瓶不禁吃了一惊。男人们吃饱喝足后通宵达旦地打扑克，星期六更是无所顾忌，她越发感到愕然。星期天的早晨，她对男人们的通宵胡闹大动肝火，打开古斯塔夫·斯特罗斯维克的房门，把他的鹦鹉扔进去。不一会儿，鹦鹉就站在斯特罗斯维克的胡子上与他一起唧唧嘎嘎地唱起了二重唱。

后来，普罗斯库里亚科夫与阿尔弗雷德一起前往哈佛大学皮伯迪博物馆，她一面自修一面研究复杂的马雅象形文字问题，直到生命结束。她认定马雅文字是拼音文字——她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俄国学者尤里·克罗诺索夫的支持。但同大多数人的意见一样，她的成果遭到马雅学权威埃里克·汤普森的反对。

奇琴伊察武士庙前的查克穆尔祭坛，普罗斯库里亚科夫的研究与这一马雅遗址密切相关。



右图：代表神权的钦穆祭祀刀，大概是钦穆莱普（Na－ymlap）神的象征，用黄金制成，上面有绿松石装饰物。出土自秘鲁的兰伯耶克。该器物制造于公元12世纪至13世纪之间，长40厘米（16英寸）。

史前钦穆国控制着从秘鲁中部海岸到厄瓜多尔的广大地区。它的纪念性艺术品和建筑物，尤其是宏大的海滨首都羌蔷，给200年前的洪堡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给前往秘鲁的现代观光客留下了同样深刻的印象。

羌蔷始建于公元1000年左右。公元1470年印加人征服了它。它占地19平方公里（7.3平方英里），人口约30000，中心地区约6平方公里（2.3平方英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区有10个长方形围院，也叫"修达德拉斯"（Ciudadelas），显然是历代王室的居住区和国家的管理中枢。

一个国王死后，他的居住区就成了"禁苑"。新君必须建造一个新的修达德拉斯。于是，城市的边界步步向内地延伸。

了新进展。汤普森（Thompson）意志坚定、性格顽强，数十年孜孜不倦，把马雅象形字当作拼音文字研究。尤里·科罗诺索夫（Yuri Knorosov）的成果虽然受到一些马雅学者的支持，但没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塔蒂亚娜·普罗斯库里亚科夫(Tatiana Proskouriakoff)的研究成果也受到汤普森的压制。尔后，琳达·舒勒(Linda Schele)与彼得·马修斯(Peter Matthews)于70年代早期破译了帕卡尔的墓志铭。帕卡尔是帕伦克的君主。

在马雅学术圈，文字破译的成果层出不穷。专家们现在已经搞清楚，马雅人在石板上详细地记录了自己的历史，内容不限于人名和地名。大卫·斯图亚特(David Stuart)是新一代解码者中的英豪。他是考古神童，8岁时就参与了马雅地区的考古工作，11岁就与舒勒一起研究帕伦克的资料，13岁时提交了他的第一篇专业论文。

马雅考古学家们不断重建史前先民的生活方式，研究他们的生活状态、商品交换以及马雅先民的居住模式。然而，要想追溯史前事件，近期破译马雅历史的进展情况却还不够理想。专家们还需很长时间才能完全解读马雅人的成文史，解读结果是否正确也需用考古记录加以验证。我们毕竟还不知道马雅君主们是否用文字记录史实，也不知道他们写的东西是不是杜撰的历史和政治宣传——根据目前的解读结果看，很可能是这类东西。

在南美洲，许多考古学家致力于研究编年史和文化史，与此同时他们对农业的起源和复杂社会结构的起源也有兴趣。麦克尼什成功地找到了中美洲向农业社会转变的证据后，又把目光投向高高的安第斯山脉，他在秘鲁中部的阿亚库科谷地开展同样的工作。他到那里后同样先考察整个地区，寻找干枯的洞穴，然后进行发掘。麦克尼什没有找到培育农作物的证据，但却找到了不同时期先民们逐步种植植物和驯化动物的证据，这些证据与在特奥提华坎发现的证据非常相似。后来他在发掘中又碰到了新问题：早期人类在南美洲活动的证据问题。他在皮基马卡洞穴找到一些粗陋的石制工具和已经绝种的早期动物骨骸。放射性碳鉴定法测定它们的年代是20000年。按照正统观点——人类大约在15000年前到达新世界的——这些"石制工具"只能是天然而成，故而麦克尼什的解释没有得到专家们的普遍认同。

阿亚库科谷地还有大城市瓦利的遗址。瓦利是第一个秘鲁帝国的首都。秘鲁考古学家路易斯·伦布雷拉斯(Luis Lumbreras)与美国考古学家格雷·维谢留斯(Gary Vescelius)考察了该地区与瓦利有关的许多遗址，并对瓦利进行了发掘。不幸的是，研究考古遗址的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突然停止，因为"光辉之路"的恐怖分子们控制了这一地区。麦克尔·莫斯里(Michael Moseley)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考察位于秘鲁北部海滨的莫什（Moche）谷地，研究史前钦穆国的大都市羌蔷——很久以前，汉伯尔特曾对秘鲁海岸地区的缺雨气候大惑不解。莫斯里仔细研究了遗址，找出它产生的证据，分析了王室庭院的结构，分辨出不同居住区的类别及其在遗址中的作用。他还研究了莫什谷地的低地，那里不仅是钦穆首都的旧址，也是更早时代的莫什首都。

拉丁美洲最早的地区性发掘工作始于40年代的维鲁峡谷。这一工作一直延续到现在。早期考察重视时间－编年－文化史，现代考察则注重当今考古学家们关




82
7-14
509
92687

心的进程问题：定居生活的缘起、复杂社会的产生、君权的控制效果和气候变化对人类迁徙的影响。

中美洲和南美洲没有多少遗址可供发掘，消失的古老文明当然不会隐藏在热带丛林里。年复一年，有关这一地区的史前图画越来越清晰，甚至地区编年史和文化史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人们考察和发掘了许多孤立的考古遗址，主要发掘了建筑残骸。然而史前文化很丰富，不仅包括君主和贵族建造的东西，也包括普通人、妇女和无权者的生活。进程考古学的方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最早的考古学侧重解释限制人类行动的环境和技术问题，新考古学则侧重解释意识形态和物质色彩较淡的文化问题。

地区考察是对单个遗址考察的必要补充，对中美洲墨西哥谷地和奥克萨卡峡谷的大规模考察超出了古国的中心，延伸到周边地区，因为古国的影响扩散到了周边地区。最后，专家们对整个拉丁美洲主要文明诞生前的状态产生了兴趣。第一批平台式墓冢或金字塔建成前还有数千年历史，以前，考古学家们对那个时期不大重视。现在，考察者们正在仔细研究那个时期晚期的社会发展变化，以探讨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因为在西班牙征服南美洲前的3000年里不平等现象是极为严重的。

40多年前，莫蒂默·惠勒在《地下考古学》(1954年出版)一书中写道：

> 我们……一直在准备年代表，我们现在把顺序排了出来。
>
> 就目前的资料而言，文化目录编制得很好。但是，它们涵盖的时间很短。它们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目前需要对“社会单元”做有序的探索，规模也要比以前的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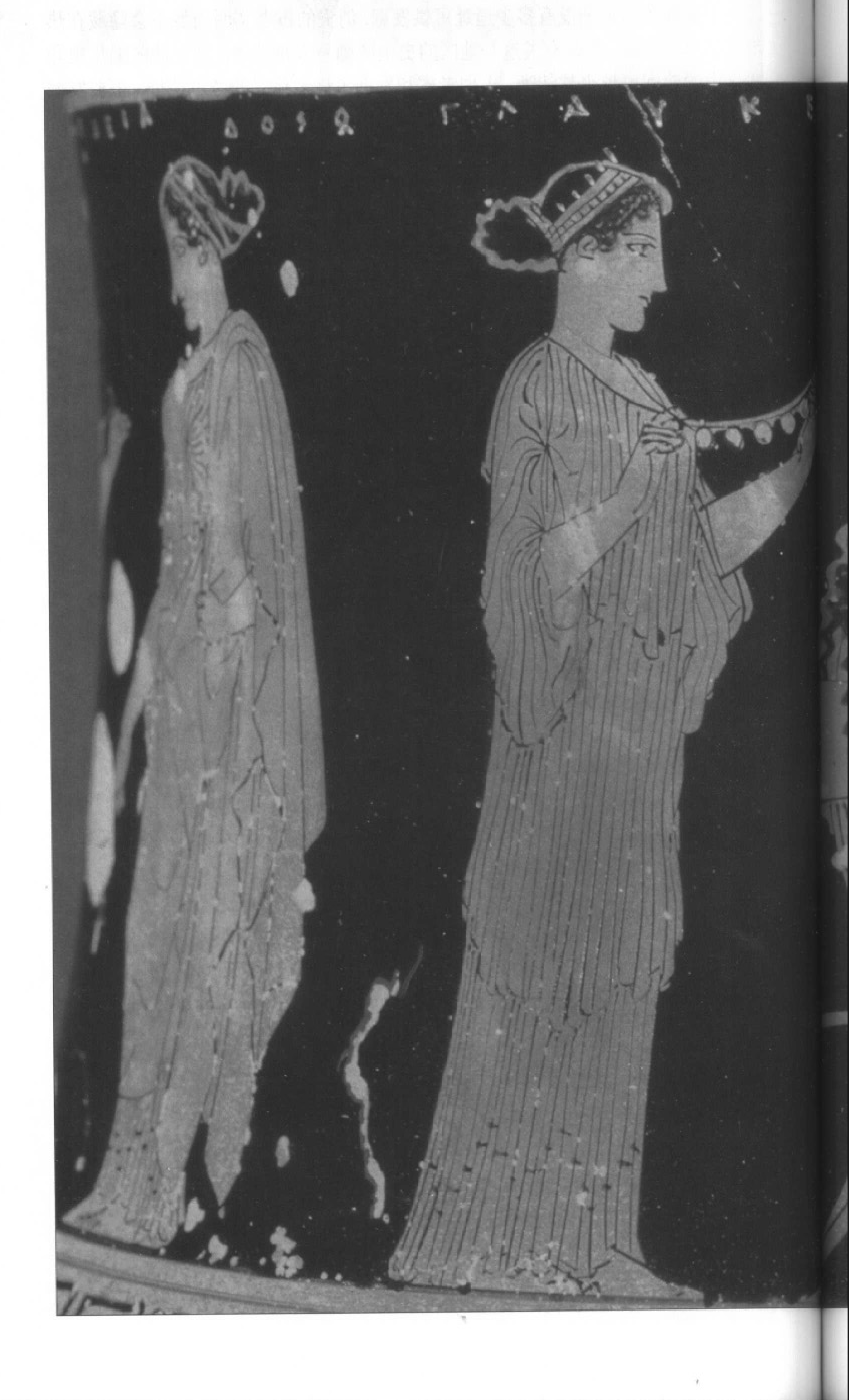
下一代学者针对考古学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不仅探询人类变迁的时间和地点，还要探询其方式和原因。这些问题要求人们用新方法收集和审视考古信息，用新方法挖掘古代遗址，用新方法处理前辈考古学家们留下的信息。结果，人们能够更充分地理解古代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而不只是早期考古学家们关心的宫廷、庙宇和宝器，虽然普通民众依然对这类东西感兴趣。

今天，“认知考古学”(cognitive archaeology)或“心灵考古学”企图深入到古人的思想，理解他们赋予城市和艺术的意义，理解他们赋予宗教实体和社会实体的意义。但是，这些方面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许多课题有待开拓——人们还没有为考古学的新课题准备好完整的时间表。这一年轻学科前景诱人，但也极富挑战性。

左图：认知地图。人类认识考古学——根据遗物重建古人的思维方式——是当代考古学最有魅力的领域之一。古代世界的实物地图非常罕见，但是人们有许多方法可以复现古人想象的地图和他们认知周围世界的心理倾向，比如，通过语言、文字、测量法、神话、乡村与城镇的布局、神力的象征、艺术对神灵与人类的刻画来理解古人的心理倾向。

古人凭借想象描绘的空间图流传下来的甚少，历代专家学者都想揣度它们的意义。这块泥版是“巴比伦的世界地图”，年代为公元前7世纪。上面的圆环被标明是“咸海”，圆环之外代表异域他乡，上面的文字说那里“永无天日”。中间是已知世界，西方位于地图的上方。圆环上部的长方形刻着“巴比伦”字样，右面的名字中包括亚述，下面的名字是苏萨。专家们认为，穿过地图中央的垂线代表幼发拉底河，河水的发源地有山，位于南方的是比特－亚金(Bit-Yakin)，河口附近是一片沼泽地。

第八章 目前的分歧和未来的趋势



今天考古学已成为一门国际学科，其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南极洲。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等早期探险家们的临时搭建的棚屋都受到很好的保护并留有详细记录。由于传媒的强大力量，许多重大的考古新闻能够立即传遍全世界。例如，1991年人们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上发现了公元前33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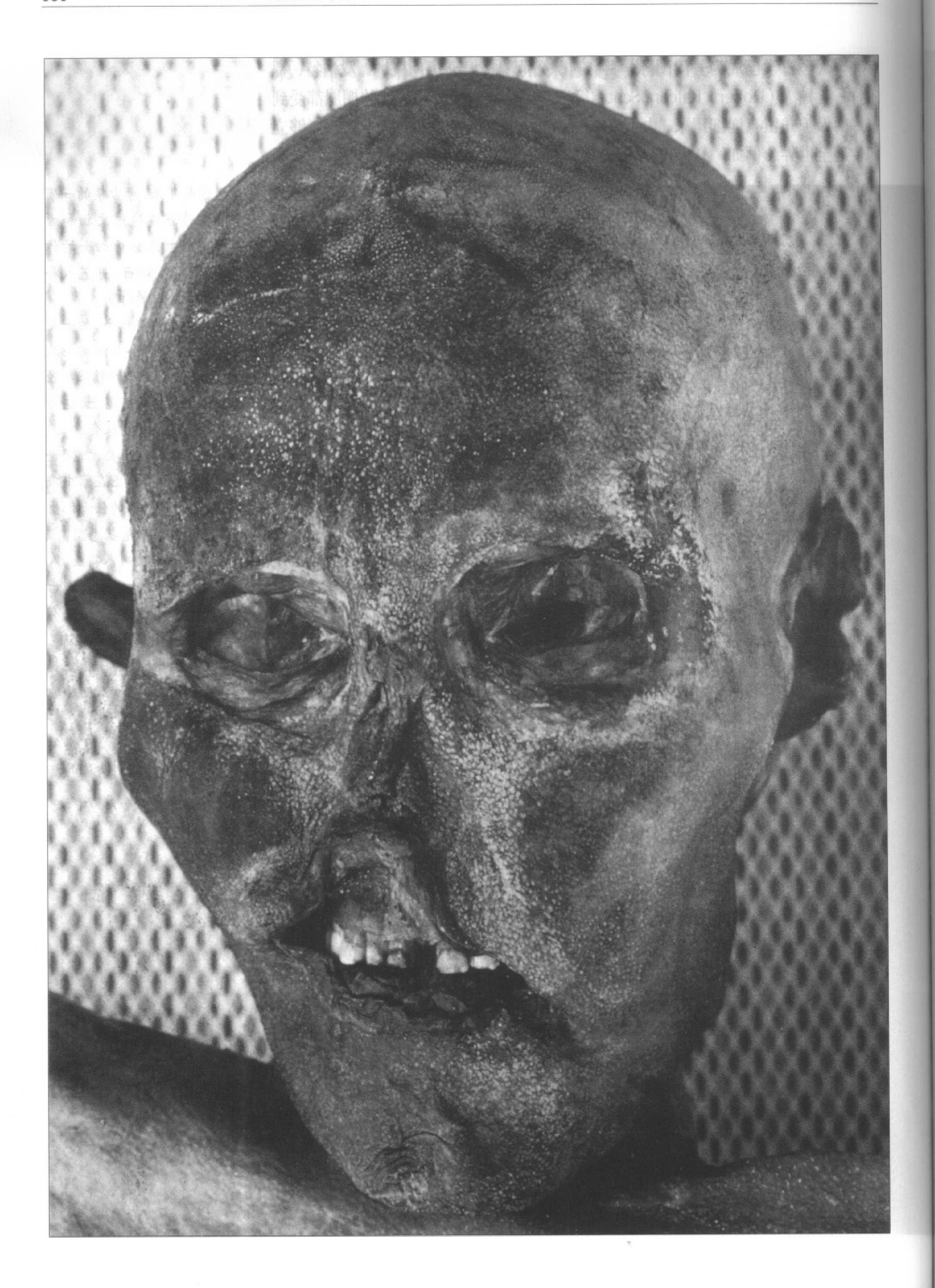
近些年来，考古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文物和古代图文形象来分析妇女的作用——或分析孩子、手艺人和奴隶等普通人的作用。

在古代雅典社会，妇女足不出户，不参与公共活动与政治活动，但是她们的形象却经常出现在精美的陶器上，这为学者们提供了研究机会。

这幅画描绘了公元前5世纪的闺房，画中人正在家中准备婚礼，上流社会的仕女们生活在东方式的幽居状态里。

坐着的姑娘叫泰莉亚，人们正在给她梳妆打扮。她身后的墙上有一面镜子，否则没有家具的房间就显得过于空旷。前面站着一个女人，手持化妆盒。她身后站着的女人叫格劳克，正在给新娘戴项链。

整个画面表现了理想的上层社会仕女家中幽居的场景。



前的“冰冻人”及其服装和设备，他的遗体保存之完好令人惊奇。

奇怪的是，考古学也是一门支离破碎的学科。许多好奇的玩家也参与进来，人们的研究方法、思路和策略千奇百怪。专业分工——“少数人为少数人准备纯净鸦片”——才把支离破碎的分支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学科。文艺复兴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可以产生无所不知的博学巨人，但是，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考古信息量巨大，任何人都无法全面了解一个大陆的考古研究成果，更不要说把握全世界的考古研究成果了。即使有人想这样做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结果，人们无法交换意见，甚至考古学家之间也无法传递信息。但是近年来，考古界——它曾为探索理论方法问题而大伤脑筋——终于跳出了自我怀疑的窠臼，痛苦地认识到严峻的现实：它忽视了妇女的作用；土著人有权对历史遗物发表意见；政治和经济仍在各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这一学科；考古学科的前景受到迅速增长但又厚颜无耻甚至是破坏性的古玩市场的威胁。

就比较光明的一面而言，考古学家们不仅在学习如何适应土著居民的各种要求，而且体验到公众对其学科的空前广泛的关注。这个学科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随着令人震惊的新发现不断问世，随着寻找、分析和为证据定年的新技术的出现，各种新的思想也应运而生，改变并重新绘制我们关于过去的画面。考古学的一个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永远不会停止演化。

就比较光明的一面而言，考古学家们不仅在学习如何适应土著居民的名种要求，而且体验到公众对其学科的空前广泛的关注。这个学科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随着令人震惊的新发现不断问世，随着寻找、分析和为证据定年的新技术的出现，各种新的思想也会应运而生，改变并重新绘制我们关于过去的画面。考古学的一个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永远不会停。

考古学与妇女

后进程考古学与性别考古学建立了紧密的同盟。美国研究人员认为，从传统上看考古一直是男人的工作，因为它的基本术语是 “early man”①。此外，它的考察重点是男人的活动：狩猎和制造工具等。他们说，考古学——不仅在专业实地考察方面，而且在解释文物方面——都必须克服性别歧视。1915年，考古学家J.P.德鲁普(Droop)说：只要发掘现场有女人，男人们感到沮丧时就无法发泄真实情绪。而现在人们说话的口气则变了。

今天人们很重视性别研究，因为一方面人们意识到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学术方面，都需要创造一种男女平等的气氛，另一方面，男女平等也为我们理解古代社会做出了实际贡献。

考古学与少数民族

最近15年来，全世界考古界都对土著人的权力问题非常敏感，因为他们正在研究土著人的过去。人们争议的核心问题是考古学家应当如何处理土著人的地下遗物。但是，这仅仅是过去的遗物应由谁控制和归属谁的问题的一部分。

① 该术语为“早期人类”或“早期人”，但这里的“人”取英文“男人”一词，因此整个术语便有“早期男人”的意思——译者注。

左图：“冰冻人”的脸部。1991年9月人们在阿尔卑斯山的希米劳恩发现了他。他的年龄在25岁－40岁之间，死于公元前3300年，身高只有5英尺2英寸（156－160厘米）。

他的大脑、肌肉纤维、肺、心脏和肝依然完好。肺被熏黑，可能是被篝火熏黑的。冰冻人的体内有六处骨折，死亡时已经愈合或正在愈合。

在脊椎骨两侧的下部，左小腿和右踝上有成片的文身，大都是半寸长的蓝色短线，右膝内侧有一个蓝色的十字纹。

死者的指甲已经脱落，但有一个手指的指甲是后长出来的。分析表明，冰冻人在世时从事的是体力劳动，正在生病，指甲患有周期性脱落症——指甲是在他死前的4个月、3个月和2个月分别脱落的。

专家们对冰冻人携带的衣服、工具和武器很感兴趣——这些日常用品被独特的“时间密封仓”保护起来。冰冻与严寒保住了容易腐烂的有机物。死者随身携带的大小物件有70件之多，木制品的种类多得惊人，皮革制品和草制品的制作技术相当复杂。这些东西对考古学家们认识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生活大有裨益。

妇女的工作

从传统上看，妇女在考古学上处于劣势。这一领域曾经是贝尔佐尼、莱亚德和惠勒等男人的天地。但是在20世纪，妇女在这一学科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英国有许多杰出的女考古学家。多萝西·加罗德(Dorothy Garrod)出身于书香世家，1939年，她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女教授。与步日耶工作一段时期后，她专攻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她与动物考古学家多罗西娅·贝特(Dorothea Bate)共同考察了卡尔梅勒山的洞穴，颇有成效地编制了巴勒斯坦的考古纪年。另一位剑桥大学的女毕业生格特鲁德·卡顿－汤普森(Gertrude Caton-Thompson)先在考古项目主任皮特里的指导下工作，后到阿拉伯的法尤姆工作，她发掘了大津巴布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非洲的起源。

温弗瑞德·兰姆(Winfred Lamb)专攻古希腊考古学，因为她是妇女，所以曾被拒绝进入大学课堂。1920年，她在爱琴地区承担了青铜时代的重要考古发掘工作，那儿的累斯博斯岛是古希腊著名女诗人萨福(Sappho)的故乡。凯瑟琳·凯尼恩(Kathleen Kenyon)夫人的父亲是大英博物馆馆长，她承担了耶利哥和耶路撒冷的主要考古工作，得到一个"可畏夫人"的绰号。有关她的传说简直就是神话，有人说她能嘴上叼着香烟把满满一锹土从很深的壕沟里甩到沟外，烟灰却丝毫不掉。在美国，玛丽·利基的成就相当突出。她与青年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结为伉俪，与他在奥杜威峡谷进行考察，她在拉依托里亲自发现了更新世远古人的脚印。

美国女考古学家弗劳伦斯·霍雷·埃莉丝、弗雷德丽卡·德·拉古娜(Frederica de Laguna)等人常常完成一些与人种学有关的考古工程。德·拉古娜在南阿拉斯加工作，1974年她提出了一个连接史前史和成文史的北太平洋文化圈的构想。阿拉斯加的雅库塔特·特林基特印第安人授予她罐宴的荣誉。霍雷·埃莉丝与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一起从事各种工作，与他们非常熟悉，她想通过研究历史上的普韦布洛文化和中美洲文化来解释他们的史前特点，她的研究成果支持了普韦布洛人对土地所有权和宗教信仰权的要求。

有些妇女的丈夫从事了考古工作，这使她们参与到了野外考察活动之中。亨利克的妻子索菲娅·谢里曼(Sophie Schliemann)就是一个早期的例子。安·阿克斯泰尔·莫里斯(Ann Axtell Morris)和琳达·布雷德伍德(Linda Braidwood)与丈夫合作，共同撰写考古报告，同时她们还独自写一些通俗读物，讲述她们的野外考察经历。阿伽塔·克里斯蒂本人不是考古学家，但她的丈夫马克斯·马洛温是考古学家，她利用自己野外考察的亲身经历写了侦探小说《中美洲的谋杀》。

业余考古学家中有许多妇女，她们发现并记录了考古遗址，收集家园附近的文物，组织成立地方博物馆，结合史前史和历史为博物馆提供展品和有关资料。最有名的例子是玛丽·巴特勒·刘易斯(Mary Butler Lewis)，她是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考古学家。1942年结婚后，她把研究重点从中美洲的陶器制作转向自己的家乡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史前史和成文史考察。



格特鲁德·贝尔(1868–1926年)是伊拉克考古服务队的创始人，1910年前后，她与伦纳德·伍莱(Leonard Woolley)一起工作。贝尔规定：考古队的所有成员必须是掌握现代标准考古技术的人：碑铭研究者、建筑师、摄影师和其他专门技术人才。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参加考古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尤其是在美国和西欧。1964年，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禁止性别歧视，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的工程项目和大学不雇用女性的陋习告终。新产生的文化资源管理业和拯救文物业提供了一些研究职位，妇女可以担任为公众讲解文物遗址的工作，也可以参加常规的发掘工作。尽管如此，女考古学家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得到的研究基金依然很少。

从1980年起，"性别考古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妇女对"狩猎男人"主宰史前史的观点提出挑战。她们说，许多出土文物的特征都与妇女的活动有关，这些特征也是野外考察和发掘工作应当关注的问题。还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对寻找女性神像和考察妇女史很有兴趣。承认妇女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并不是什么新观点。步日耶于1949年发表了一些色彩艳丽的水彩画，描绘了旧石器时代的营地，画中的女人在抢夺燧石。1972年，阿尔瑟兰（Arcelin）写了一本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小说，一个年轻女人既是梭鲁特人的酋长，也是艺术家。现在，人们开始系统研究对考古文物体现的女性的作用。于是，如何在考古专业中公平对待妇女与辩识妇女在以往的作用联系在一起——专家们更侧重人文史而非人类史。

艾丽斯·基欧与玛丽·安·莱文撰稿



弗雷德丽卡·德·拉古娜在阿拉斯加的帕鲁格维克（威廉·桑德王子）遗址，摄于1933年。照片左面是爱斯基摩人翻译R·马特罗娜·提德曼和她的父亲马卡里酋长。丹麦人种学家卡依·伯科特－史密斯（Kaj Birket-Smith）与德·拉古娜轮流跟着马卡里酋长整理、记录民族学资料，马卡里酋长帮助她们辨认文物。

以科研为目的的考古学家们站在极端立场上，他们认为，从法律和伦理角度看，他们有权处理过去的包括人类骨骸的遗物，并把它们当作科研资料。他们指出，土著人也能从研究中受益——例如，考古学家们能够发现传染病史。他们还提出，许多考古遗址可以追溯到土著人到来之前，故而应当属于全人类，而非属于某一部落或人种。最后，这些考古学家还断言，任何土著社团控制并解释考古资料的企图都意味着禁锢学术。

反之，土著人则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即考古遗物是他们的祖先留下的，而不是欧洲人的祖先留下的。北美印第安人还巧妙地指出，自从白人到达北美洲以后，印第安人就被作为一个群体驱赶到一起，白人根本就没有考虑他们之间的人种差异和文化差异：故而，如果印第安人效法白人，把史前遗物全都视为印第安人的财富，也是无可厚非的。许多土著团体还觉得，他们了解过去的一切，不能打扰死者的灵魂，不能把他们的骨骸和遗物挖出来，否则就是对先人的不敬。在美国印第安人看来，时间对于他们并不像对欧洲人那样呈线性排列，所以，考



古学家们没有必要仔细研究过去。此外，许多地道的土著人认为，控制考古是与欧洲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的组成部分。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和文化有彻底消失或被削弱的危险，按照自己的方式规定历史是防止文化失落的一种手段。

双方的争执达到白热化，但最终达成妥协。1990年国家制定了“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归还法案”，明确规定了联邦土地和部落土地上的土著美国人遗物的归属权问题，规定了分析遗物和把它们归还给有关部落的法定程序。

在美洲工作的考古学家主要是欧洲人的后裔。从前，考古学家与美国土著人的对抗是司空见惯的。在美国土著人看来，考古挖掘是对祖先遗物的大逆不道，而且根本没有必要，因为传说和历史已经为他们提供了土著美国人历史的充分知识。80年代以后，两大群体之间有言归于好的迹象。考古学家们不仅意识到史前考古遗物不仅仅是科研资料，并逐渐承认当代美国土著人有权参与研究和处理考古遗产。因为100年前是收集古物的全盛期，许多骨骸和文物是那时偷盗的，违背了印第安社群的意愿。联邦和各州都已立法，规定只要土著人的后裔提出要求，博物馆就应把骨骸和遗物还给他们。

有些印第安民族，包括西南部的苏尼人、纳瓦霍人、赫必人和华盛顿州西北部的马加人都任命了自己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让他们研究和保护自己的遗产。马加人甚至雇佣了一批考古学家发掘公元15世纪的奥支特村，它被埋在一个土坡的下面。他们还建立了一座博物馆，将他们保存的历史公之于众。其他印第安社群也雇佣了考古学家进行研究，并培养自己的年轻人掌握考古技术及其分析方法。

政治与考古学

人们都承认，考古除了客观、准确地反映过去发生的事件外，还可以为社会利益服务，尤其可以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政治利益服务。最恶劣的例子是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和白人统治下的罗德西亚。在罗德西亚，白人利用大津巴布韦（the Great Zimbabwe），以种族主义观点解释非洲的过去。有人坚持把考古学视为以人类过去为研究对象的、客观的、可予证明的科学，对他们来说，曲意附会的例证不啻为客观的教训。

人们有一种幻觉，以为考古学家会为远古社会写出一份“科学的、没有偏见的历史”。但是这种幻想在南非考古界被打得粉碎。世界任何地方的考古界都不像南非考古界那样充满偏见。在非洲，如何认识过去是当代考古学最关键的问题之一。绝对客观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考古学家都或明或暗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写作。这并不是说考古学不实事求是，或最糟糕的考古学家写的只是政治宣传品，而最好的考古学家写的只是神话故事。考古学是把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一起的学科。格拉汉姆·克拉克在纳粹主义的阴影下写了《考古学与社会》（1939年），他在书中说：“人民秉承了所有时代的遗产，相互间如兄弟一样，如果考古学能增强（人民）的体验，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那么它就有充足的理由存在。”

在赫鲁晓夫时代，苏维埃社会的自由化使苏联考古学家怀有一线希望，希望与西方考古学家们建立广泛的联系，虽然60年代日益尖锐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把他们的希望打得粉碎。一些西方考古学家与苏联考古界成功地建立了重要联系、

左图：月亮女神赛莉恩马车上的马头，出自巴台农神庙中楣的“埃尔金大理石雕像”，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

巴台农神庙中楣原有111块嵌镶板，现存97块，有些完好无损，有些已经破碎。其中56块保存在大英博物馆，40块保存在雅典卫城博物馆，1块保存在卢浮宫。大英博物馆还保存了15面柱间壁——原有92面，雅典还存有39面——和17座带有雕塑的三角墙。

希腊人企图索回这批大理石雕塑，已故的希腊演员和政治家梅利纳·迈尔库里（MeLina Mercouri）费尽气力却毫无结果。因为英国法律禁止大英博物馆归还藏品。

谁的过去？考古学家与土著人之争

过去具有强大的象征力量，可以为政治目的和社会目的服务。1970年以后，遭到剥夺的土著人不断对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考古学家发起挑战，反驳考古遗址是人类共同遗产的观点，并指责说这不过是侵略者推行文化控制的借口。他们谴责考古学家阴谋推行殖民化，把土著人描绘成注定灭绝的原始人。他们反对挖掘墓葬和其它遗址——尤其反对挖掘神圣遗址——反对博物馆收集人类骨骸和文物。

在澳大利亚，土著人日复一日地坚持说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和过去享有所有权和控制权，强烈抨击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活动。自从欧洲人入侵以来，土著人常常被粗暴地赶出家园，许多人因此丧生。欧洲人带来了天花和麻疹等疾病，使他们的人口锐减，政府的同化政策使许多孩子离开父母，毁掉了许多家庭。在过去的25年里，土著人在争取社会平等和政治权利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成功，人们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在这场斗争中，土地权利运动尤其惹人瞩目。但是，土著人也坚持要求取得遗产控制权。及至后来，澳大利亚白人考古学家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从事考古研究和如何与土著人建立联系的问题。

双方分歧很大，一方面土著人一直利用考古信息为政治目的服务，借此证明他们长期生活在澳大利亚。另一方面，在寻找和发掘遗址、控制博物馆藏品的问题上，双方的看法大相径庭。在澳大利亚西部，一名女考古学家参观了严禁妇女进入的宗教圣地，伤害了土著人的感情，为此他们撤销了已经批准的对方的考古申请书。

发掘和研究人类遗骸引起了最公开、最激烈的争论。土著人群情激昂，他们发起运动，要求全世界所有博物馆把收藏的骨骸还给他们并重新埋葬。土著人不区分近期葬品和古代葬品，也不区分科学考察和为收集解剖标本而进行的掘墓活动——从前这种掘墓活



动很普通。多数考古学家赞成归还近期遗骸，尤其是有名有姓的近期遗骸，例如，特鲁加尼尼，他是所谓的"最后一位塔斯马尼亚人"。但是多数人反对归还古代遗骸，例如，考乌沼泽地出土的一系列遗骸非常独特，年代鉴定为9000-13000年。最后，这批遗骸于1990年归还给土著人并重新安葬。最近，人们在曼哥湖发现了迄今最早的火葬遗骸，考古学家主动将它归还给了曼哥地区的土著人。

澳大利亚土著人认为考古学家不是不偏不倚的科学观察者，而是一出社会戏剧的参与者。澳大利亚考古学家们感到土著人的观念难以改变。虽然有人积极寻求与土著人合作，还是有一些考古学家干脆放弃在土著地区进行考古。但是，考古学家们渐渐向土著人咨询，与他们一起讨论有关问题，并进行了一些成功的合作。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让土著人参与遗址管理工作，请他们担任顾问委员会委员，制定研究规则，召募土著人参加工作并培训他们。1991年，澳大利亚考古协会的年会通过了一份伦理公约，该公约明确规定，发掘工作涉及土著人埋葬在地下的先祖时，所有协会成员有义务尊重并听取土著人的意见。

这些问题最终只能在土著人与普通澳大利亚人和谐相处的背景下得到解决。1992年，高等法院裁定承认土著人的权利，推翻了此前法律虚构的"无主土地"论——这种论点认为土著人没有土地所有制，故而剥夺了土著居民的土地所有权。这一裁决意义深远，它迫使所有非土著澳大利亚人重新思考他们与土著居民的历史。

在新西兰，毛利人也对毛利遗产（包括考古遗址）控制权属于白人的观念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毛利人大都认为考古学是对毛利世界观的威胁，会动摇毛利人的传统。但是，新西兰的情况与澳大利亚的情况不一样，英国人入侵时承认毛利人的主权，并于1841年签订了怀唐伊（Waitangi）协议。

故而，毛利人充分地利用了这一协议，肯定了自己对土地和遗址拥有的传统权力。

图片的标题是"曼哥夫人回归人民"。1992年，为了缓和土著人与考古学家之间的关系，曼哥1号火葬遗骸被交还给新南威尔士西部的土著长老。

但是直到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联系范围才得以扩大。大多数联系表现在西方考古学家出访苏联，而苏联公民出国旅行却受到限制。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苏联考古学家接触不到西方考古学界多种多样的学术观念和技术进步。从70年代到80年代，一些苏联考古学家出国旅行并在西方刊物上发表文章，但数量很少。他们仍然写为“苏维埃考古学”辩护的文章。但在现实中，当时东西方的共同点已越来越多。

结果，在西方人的眼中，1991年前的苏联考古学就像一幅漫画，苏联考古学家们心不在焉地抱着恩格斯的社会演化蓝图不放，而对其它方法则视而不见。苏联考古学家执拗地把意识形态模式套在史前史上，不同的人只有程度上的差异。但是，斯大林死后，苏联考古学不再是孤立的顽石，也需重新审视考古资料并重新解释，其方法与西方学者支持的方法——虽有差异——却同样有效。与此同时，苏联考古界在国际交往方面仍然受到限制，社会依然贫困，这些都给它带来了不利影响。现在，前苏联共和国与世界其它部分的障碍大都消除，因此人们才有了较详细地审视前苏联考古史的可能性。

现代意识形态与古代纪念物。1971年，伊朗国王在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约公元前529年）的陵寝前举行阿黑门尼德王朝2500周年庆典。



苏联在80年代末从中欧撤军，而后苏联于1991年垮台。重大政治事件又一次对考古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野外考察经费和出版经费急剧减少。90年代早期，研究工作大大萎缩，前苏联考古学家们不得不在全新的——往往四分五裂的——体制中费尽气力争取资金。研究机构人浮于事，被迫裁员，学术刊物和出版研究报告的费用高涨，许多刊物被迫中止发行，甚至干脆停办。

1989-1991年间许多国家都发生了革命，考古人员也有很大变动。一些前苏联共产党员被禁止担任公职，从前颇有影响的部分学者也随之失宠。于是，许多已经制定的研究计划全都搁浅。然而，90年代以后人们又乐观起来。东欧的道路建设工程和管道工程需要现代化，考古学家们期望从工程项目里分一杯羹，他们学会了通过竞争获得特批，而不再依赖国家的支持。多数研究所历经磨难生存下来并继续从事考古研究，尽管水平大大降低。可喜可贺的是，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学术气氛又重新活跃起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为主的通讯把从前各自为政的研究中心与全球的考古机构联系在一起，年轻的考古学家们可以自由讲述自己的想法，可以用新方法解释问题。但有些情况也令人不安。1989年以后，东欧和前苏联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再次出现，他们的影响最终将波及考古解释，新兴国家为了给领土边界的确定找到合法依据，这一学科可能将转到科辛纳的“定居考古学”方向上。

在世界其它地方，民族主义者按照需要解释过去司空见惯，现代人常把光荣的过去当作编造民族神话的手段。例如，公元前1世纪泰格兰斯大帝（Tigranes the Great）曾经建立过一个短命的亚美尼亚王国，其领土从里海一直延伸到黑海，南部则抵达叙利亚。今天这一地区散居着许多亚美尼亚人，泰格兰斯征服该地区的地图对消亡的政治势力及其潜在的领土要求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再向前追溯，亚美尼亚的民族神话源于铁器时代的乌拉提亚王国，它控制的领土从伊朗西北一直延伸到土耳其境内的幼发拉底河，尽管乌拉提亚人与亚美尼亚人的语言和文化绝然不同。

民族神话的另一个变体涉及到权力继承的合法性。现代统治者宣称自己是历史上功绩炳耀的国王的后代。萨达姆·侯赛因就是一个例子，他自称秉承了尼布甲尼撒的血统，并重新把巴比伦当作民族的象征。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同样如此。理查·汗是一个陆军军官，1921年，他发动军事政变夺得政权，自称“巴列维”——这个名字源于1500年前萨珊波斯的语言——并给国家重新定名为“伊朗”（“雅利安人”），这个名字从语言学和人种学上都可以追溯到波斯。1941年，俄国人和英国人占领了这个

基克拉迪群岛出土的双臂叠放在胸前的小雕像，公元前2500-2000年。

基克拉迪的大理石小雕像处在西方艺术的源头，其历史有数千年之久。自公元前3000年起，它们就是爱琴海地区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不幸的是，由于它们与现代艺术品——尤其是布兰库希（Brancusi）和贾科梅蒂（Giacometti）的作品极为相似，所以吸引了许多艺术爱好者，同时也吸引了许多国际艺术商，后者旨在谋取利润而非渴求考古知识。

结果，20世纪60年代基克拉迪群岛的非法盗挖活动达到高潮，其中纳克索斯岛的情况尤其严重，破坏十分厉害。数以千计的史前古墓被洗劫一空——其中一些墓穴里并没有小雕像——有关雕像制作者的大量信息丧失殆尽。

最近的七八十年，国际艺术品市场的需求热得发烫。为了迎合需求，大量赝品充斥市场，许多赝品显然出自巴黎。很多人的藏品几乎是清一色的赝品——考古学家们把这种现象叫作神的惩罚——基克拉迪诸神的惩罚。

右图：21世纪，保护世界历史遗产和自然环境问题将面临大规模旅游活动的挑战。

这幅破损的廊柱画出自帝王谷的塞提一世（Seti I，公元前1306－1290年）的墓室，法老与长着朱鹭头的智慧之神透特（Thoth）在一起写字、学习。

1817年10月，当贝尔佐尼发现它时，它与墓中的其它壁画一样保持着古朴的风貌：

我看到天庭上的壁画和土层上的浅浮雕象形文字时立刻觉得这里就是巨大、华丽的墓室的进口……越往里走壁画越完好，色彩的光泽犹在，效果优美。在走廊的尽头，我们沿着十级台阶下去，进入另一个走廊，而后走进另一个较小的墓室。我给那间屋子起了个名字，叫做“美的房间”，因为它的四壁像所有其他墓室一样，全是最精美的浅浮雕和彩色绘画。

国家，迫使理查·汉流亡南非，由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理查继承王位。60年代穆罕默德·理查德成了独裁者，给自己加上了“万王之王”和“雅利安人之光”的古老名号。1971年，这位伊朗国王耗费3亿美元庆祝阿黑门尼德王朝2500年纪念日——因为阿黑门尼德史明文记载了这个纪念日——他把自己视为居鲁士大帝的继承人。

19世纪以前甚至在20世纪，非洲大部分地区没有文字记录，所以，有关非洲过去的信息主要依赖考古。随着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非洲人希望了解本地人的过去，于是非洲成文史产生了，考古研究问世了。合作研究既需要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也需要口头传说。这种研究打碎了殖民主义者编造的“黑暗大陆”的神话，但是并非没有编造新神话的危险。比如，编造“快乐、古老的非洲”神话：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过着简朴的乡村生活，没有争斗，没有贫困。虽然从人种学角度看，大多数非洲现代国家的边界都是人为划定的，但是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已经开始编写旨在证明自己“国家”的历史。

非洲考古现状与欧洲和北美洲的情况不同。在欧洲和北美洲，外国研究人员很难涉足野外实地考察，非洲考古则带有国际色彩。然而，在一个饱受战争、饥饿、疾病和贫困折磨的大陆，考古是一种昂贵而奢侈的工作，只有少数非洲国家成立了研究机构，积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几乎每一个非洲国家都为尚处萌芽状态的考古研究提供了资金，并培训本地的考古工作人才，尤其是在西非。60年代，随着大批非洲国家的独立，“民族主义”考古学产生了。许多考古工作是由放弃原国籍的外国人承担的。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结果：本地人发明的考古模式取代了形形色色的带有殖民色彩的移民论与扩散论。不过，同世界其它地方一样，考古课题与如何解释考古文献与今日的政治和经济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无所不在。由于人们越来越把考古学当作工具，利用过去的光荣——想象的或真实的——为政治利益服务，所以考古学面临的挑战是怎样使西方的“批判”考古实践与非洲独立后的“承上启下”的考古学达成平衡。

劫掠和伪造

在东欧一些地区，尤其是在前南斯拉夫地区，考古遗址、博物馆、甚至考古学家们都面临着一场悲剧，它们受到战争和国家秩序崩溃的威胁。例如，克罗地亚的武克瓦尔博物馆收藏了从乌色多尔等遗址出土的铜器时代的文物，它们在1991年的塞比安保卫战中全被摧毁。其它地方的考古遗址和博物馆也遭到抢劫，文物大量流向古玩市场。例如，保加利亚的收藏者们好像特别喜欢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青铜文物。国家文物保护法曾经遏制过这种活动，但是由于边界开放、资金匮乏，指望禁绝非法盗挖和非法文物交易为时尚早。

东欧和前苏联的考古前景既乐观又严峻。在经济稳定的地区，如波兰、捷克和匈牙利，考古研究工作的进程在加快。而在贫穷、高通货膨胀和食物短缺的地区，考古界只有一些零星、偶然的发现。保存藏品，保护遗址不受劫掠和破坏的确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民族之间战火不断的地区，比如，前南斯拉夫、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是考古学的荒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那些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希望。

现在，劫掠文物已经成了一种国际现象。由于缺少资金，无法强化保护遗址的



盗墓与国际艺术市场

死人的陪葬物总能引起活人的兴趣。早在古代就有人为寻找贵金属而亵渎坟墓。拜占庭的圣徒赛克恩的西奥多（Theodore of Sykeon）在《生命》一书中讲述过一件事：大约在公元600年，加拉提亚·普利马（Galatia Prima）的总督想逮捕盗墓嫌疑人，盗墓嫌疑人打扰死者的平静，以扩大打谷场地来掩护非法盗挖活动。18世纪和19世纪，人们打开了托斯卡尼和意大利南部的一些坟墓，想搞清楚它们的背景，但是挖掘的方式很不科学。人们从坟墓里挖出一些漂亮的文物，其中的希腊花瓶尤为精美。随着国家收藏的兴起，人们开始寻找古代艺术品，并把其中的精品在伦敦、巴黎和柏林的艺术馆展出。到了20世纪，寺庙和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成了浮雕的资源，艺术价值较低的文物也变成了收藏之物。从东京到都灵，到处都可以见到人们用经过修整的文物装饰舒适的起居室。

私人收藏的兴起使考古遗址遭到毁坏，也促进了古玩市场的发展。18世纪的乡村豪宅给真人一样大的大理石雕像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背景，曼哈顿豪华公寓里的壁炉墙面为小型艺术品提供了市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人们寻求公元前3000年爱琴海地区昔克拉底的大理石小雕像做装饰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私人收藏家们发现他们的藏品与勃兰库西等现代艺术家的作品很相似。谁都没有想到国际艺术品市场对这种小雕像的需求会不断增长，结果在昔克拉底引发了大规模的盗墓活动，今天，有考古记录的小雕像不足当地出土总量的百分之十，这种情况致使考古学家几乎无法解释古代小雕像和创造它们的社会氛围。

劫掠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即伪造。如果需求持续超过供给，有人就会为市场制造赝品。最近人们才发现，在克诺索斯被雇用的工匠不仅重新建造了米诺斯宫殿，也被人雇用制造了所谓的“米诺斯”艺术品。他们制造的赝品不仅蒙骗了发掘克诺索斯的考古专家伊文斯，而且被欧洲和美洲的博物馆从巴黎艺术市场上买走。在唯美领域，作品的意义全在作品之内，与考古背景没有关系。由于不需要考古的背景知识，人



路易吉·佩尔蒂卡拉里（Luigi Perticarari）是“意大利盗墓大王”。人们在塔奎尼亚耕地时又发现了一座埃特鲁里亚墓葬，他正从一个洞口进入墓室。

意大利有好几百个盗墓贼和非法挖掘者。但是，由于他有一种特殊才能，能够发现未被盗挖过的古墓，故而被称为“魔法师”。1986年，他甚至出版了自传《一个盗墓者的秘密》。



切斯诺拉的遗产。鲁吉·帕尔马·德·切斯诺拉(Luigi Palma de Cesnola)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成立前，他曾担任过美国驻塞浦路斯领事(1865-1976年)。任职期间他总共收集了35373件文物。这只精美的银盘只是其中之一。塞浦路斯当局听说他在拍卖会上把文物卖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后立刻下令严禁文物出口——但为时已晚，切斯诺拉事先得到了消息，提前将财宝装船运出了这个岛国。

们才徒然耗费时间兴高采烈地品评和推测"专家们"仅凭目力就可以确定真伪的器物。于是，近年来冒出了许多怪事：博物馆买下的器物，一批鉴赏家说是真的，另一批鉴赏家却说是赝品。例如，最近马利布的圣保罗盖提博物馆买回一座比真人还大的大理石雕像，名叫"库罗斯"(Kouros)或"一个青年的全身像"。很快就有人指责这件耗资数百万美元的雕像是赝品。科学技术无能为力，既不能断定它是真品也不能断定它是赝品。

最近数十年从博物馆盗窃古物渐渐成风，令人忐忑不安。最著名的盗窃是有人一次从科林斯偷走271件物品，包括一幅尤利乌斯·恺撒的头像。公开发表过的物品和考古界都知道的物品不可能出现在古玩市场上，否则会被人识别出来。这意味着，此类盗窃活动是在私人收藏家指使下干的。这种现象与"古代艺术咨询"业的产生有关，也与投资组合业的产生有关，因为投资组合中包括古玩。此外，人们越来越注重一件物品自身是否美而不考虑它的背景。于是，一只雅典时代的漂亮的调酒碗，虽然当时很便宜，并且不被视为"艺术"，现在却被人从埃特鲁里亚的古墓中盗走，以上百万美元的高价在国际艺术市场上出售，并在博物馆里被当作重要艺术品展出。

一些没有标明产地的器物经常出现在伦敦和纽约定期举办的拍卖会上，它们一直是考古学家们关注的资源。每次拍卖都意味着人们再也无法知道被劫掠到市场上的这些东西源于何时何地。更令人担心的是，不少器物是20世纪制造的赝品；它们被收录在学术参考书中，只能误导我们对过去的认识。

右图：人类进入三千纪（公元后第三个千年期）后，还会有考古新发现。

这副骨架是1993年在意大利的阿尔塔穆拉洞穴群中发现的，很可能是迄今为止在欧洲发现的最完整的骨骸。它的眉骨可能较高，但由于眉骨全被石笋包住，我们很难见到它的真相。这副骨架大约有30000到40000年的历史——介于直立人与智人之间。

法律，一些泰国人竟大张旗鼓地盗挖遗址，以便从印度换回玻璃和珍珠。中国文物外流不止，盗墓者与某些地方官员联手作弊，每天都有文物流向香港古玩市场。

旅游与保护

在世界许多地方，比如远东地区，考古的重要性与旅游业和民族遗产是否丰富关系密切。政府把考古当做一种工具，一种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增加税收的工具。投入考古资金的多寡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回报。以中国为例，考古项目的选择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旅游收益。例如，西安是几代王朝的故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开发古代文物，不仅建了几座西式豪华饭店，还建了一座新机场。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见到半坡遗址和兵马俑对外公开展出。

在其它地方，比如香港和大阪，它们在建设新机场前都对施工地点做了考古调查。日本每年用于施工前的考古预算高达3亿美元，其数额相当于英国每年考古预算的300倍。这笔资金并非出自税赋，而是出自开发商，开发商再把这笔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日本法律没有"开发商支付考古经费"的规定，它是一种"君子协定"，也是一种惯例，故而很难在其它国家实行。在公有和私有土地上，开发商付款做的施工前发掘工作由世界上最大的考古机构执行，它有5000名考古员工。

远东国家的考古法律与西方的考古法律差别很大。在日本，只要涉及到建筑工程——不论在私有土地上还是在公有土地上——必需通知有关当局。根据法律，当局必须在开工前做考古调查。这种调查常常仅限于地面考察，或在施工期内做几次简短的视察。但从法理上讲，不备案是不行的。在美国，法律仅适用于公有土地而不适用于私有土地。在英国，只要将发现的文物向有关部门报告即可，只有开发登记在册的的遗址才需事先报告。由此可见，不同国家的法律要求不同数额的经济投入和不同数额的劳力投入，对考古资料的质量要求也大相径庭。

日本新闻媒体出资赞助了许多考古发掘工作，甚至赞助了其它国家的许多考古发掘工作。最近，中国和俄罗斯的一些考古工作接受了日本富士电视或报纸《读卖新闻》的帮助。日本提供高技术专家，当地国家提供发掘工作所需要的劳动力和授予发掘特许权，新闻媒体则获得对发掘结果的独家采播权，把有关信息报告给观众，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在澳大利亚和大洋洲，旅游文化的发展意味着土著人的许多考古遗址具有经济价值，同时，它们也可能遭到游客的损坏。发展经济与保护传统文化的冲突与日俱增。位于（澳大利亚）北方领土的卡卡杜国家公园就是一个例证。土地的传统所有人欲壑难填，他们既想保护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和旅游业，又想开发矿业赚取更多利润。这类问题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一些土著人不惜牺牲考古遗址而开发新矿。

随着考古知识的普及和旅游业的高速发展，航空旅行更加便捷，一些城镇和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旅游业——例如中国、秘鲁和埃及——都有赖于考古。据联合国预测，到2000年旅游将成为最重要的活动。在金融紧缩的地区，这种趋势对考古事业的发展和公众意识的产生都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带来两种不幸的后果：第一，遗址乃至旅游者本身可能成为恐怖分子打击的目标，秘鲁高原和尼罗河地



区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它吓跑了大量游客，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例如，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袭击，埃及政府1994年的旅游收入减少了6.5亿美元，这使本不景气的国家经济雪上加霜。第二，我们身陷“因为喜爱考古而毁坏考古”的危险逻辑之中。不断增长的游客使许多遗址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坏。除了偶然损坏、故意损坏和偷窃外，还有污染、身体热量的排放、凝缩、磨损、撕裂等造成的损坏。以弗德台地为例，1993年有66.6万名游客，1992年则有74.2万名游客。又如，近期日本在九州发掘的吉野遗址，它原是一个四周有堑壕的居民区，但由于被错误地宣布是一个古代王后卑弥呼（Himiko）的宫室，仅在1989-1990年一年内，游客数量就因此锐减340万人。

一些世界著名的遗址必须受到特殊保护。拉斯高洞穴于1963年关闭了，因为细菌威胁到绘画的保存，其它带有装饰性文物的洞穴也停止对外开放或大大缩短了开放时间。(英国的)巨石阵建筑群也不再允许公众踏进，因为数百万人脚踏鞋蹭磨损了小径和石块。最近有报告说，埃及的一些重要遗址损坏程度也相当严重斯芬克斯(人面狮身像)受到污染的损害。图坦哈蒙的墓室因为每年都有数百万参观者造访而濒临坍塌。拉依托里的脚印也因树根的滋长受到破坏，处境危险。

关键问题是如何权衡观赏公共文化遗产的权利和保护遗产之间的关系。解决方法之一是像拉斯高洞穴那样，搞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它虽不像原作那样令人满意，但至少可以满足多数游客的兴趣。不论怎样，保护好古墓、遗址、岩画和纪念性建筑物是考古学现在的重要课题，也是将来的重要课题。考古学的重点将放在如何保护已经发现的文物上，而不是继续挖掘和研究新文物。

公众的教育

考古信息常被当作施惠于现代社会的手段。例如，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大学的科学家们研究了古人如何开垦内杰夫荒漠的问题，并把他们的知识应用到现代农业。南美洲也实施了类似的工程，秘鲁高原和玻利维亚都重新引进了古代农业栽种法，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美国克罗峡谷考古中心”位于科罗拉多的西北部，是一所私立教育和研究机构，主要是研究阿纳萨兹，并对任何乐意支付学费学习考古知识的人进行教育和培训。虽然一些考古学家对考古专业商业化不无微辞，但是，在考古资金有限的今天，如果没有这笔收入，峡谷考古学家们就不可能完成重要的课题研究。中心把考古知识成功地、更大范围地传授给了美国公众。

大西洋两岸激进的考古学家们抨击了“遗产产业”——指责博物馆和遗产展览中心都在以文物谋取利润，人们只有先付费才能参观——他们认为，那里展出的是经过粉饰的过去，是去芜存精的再创造，而非准确的历史再现。世界各地遗产公园和再现工程的出现当然有其理由，它们把专业研究的成果——研究基金通常是由社会提供的——以通俗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观众，甚至呈现给不识字的观众。人口激增、经济发展和都市化趋势都需要造就了解考古信息的公众，惟有如此，才能形成一种保护文物的气氛，增强现行的、最基本的(文物)保护法的效力。

在地平线上

50年后考古学将是什么样的？各国考古学家都知道未来难以预测，但我们仍然有把握说考古学的前沿领域会有很大变化。

首先，本地人将继续把考古视为实现政治目的工具。这并不是说考古学必需与政治动荡纠缠在一起，而是说它有一种潜力，能够成为一种增强人种或种族和谐的工具。只有不同种族和谐共处，少数民族才能受到尊重，他们的文化才能得到理解，考古学研究全人类并服务于全人类才不至于成为空话。

第二，考古学将很快改变获取资料的方法。考古学以一部分人的祖先为研究对象，这并不意味着该学科越来越多地考虑一部分人的意愿——虽然专家们必需考虑他们的意愿。人们将发明一些破坏性较小的考察程序，以便在深入探索遗址时不再损害它们。

第三，考古理论还会发展。考古不可能只用惟一的和统一的方法指导考察。它仍将使用多种多样的、甚至相反的方法研究过去，吸取人类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同时保留本学科的基本特点。

最后，考古学必需与方方面面保持联系。它得到了公众的支持，因为公众对过去感兴趣。世界各地日益兴旺的考古社团、电视节目的普及、《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人们对新发现给予的关注——不论是像"露西"那样的重大发现，还是修建公路时的一般发现——都说明考古学仍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中央政府的预算不断压缩，意味着考古学家们用钱时必须谨慎，因为考古工作最终要依赖政府预算。专业考古学家必须首先考虑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兴趣，同时也应强调考古学有严肃的目的，用克拉克措辞精妙的话说，"(考古)不是学界精英们的智力游戏"。

我们可以夸耀说考古学已经解答了许多有关人类发展的基本问题。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人类为什么在12000年以前转向农业，城市为什么在5000年前发展起来。考古学是惟一能够解答远古人类问题的学科。如果说过去为现在下了定义，那么考古学就应永世长存。

考古大事年表(自1500年以来)

1506年 约属公元前200年的拉奥孔雕像在罗马出土，米开朗基罗受到影响。
1521年 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帝国，攻占特诺奇提特兰城。
1524年 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占领卡加马尔卡。
1533年 利兰成为亨利八世的古物收集人。
1534年 达·奥尔塔访问埃勒芬塔和孟买附近的凿岩神庙。
1542年 科洛纳多寻找位于美洲西南部奇伯拉的七座城市。
1558年 在佩鲁贾发现第一座埃特鲁里亚陵墓。
1568年 坎顿的《不列颠》一书出版。
1585年 怀特绘制美洲印第安人。
1603年 斯托描述伦敦斯皮塔菲尔德的罗马墓地。
1610年 卡特莱特拜访巴比伦和波斯波里。
1612年 霍华德挖掘罗马的古代雕像。
1615年 德拉·瓦勒访问巴比伦、乌尔、波斯波里。
1630年 伯里成为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多弗斯的皇家古物收集人。
1650年 厄舍尔大主教计算出创世记的时间是公元前4004年12月23日。
1652年 受在诺福克郡发现的盎格鲁－撒克逊陶罐的启发，布朗提出“瓮葬”说。
1663年 奥伯雷绘制巨石阵平面图。
1677年 科尔内斯在建筑圣保罗大教堂期间考察罗马陶窑。
1685年 勒·普莱沃特挖掘诺曼底地区科切莱尔的巨石陵墓。
1690年 科尔内斯在伦敦格雷旅馆路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手斧。
1691年 第一次赴近东帕尔米拉的考古探险。
1717年 梅尔卡蒂的《金属论丛》出版。
1718年 伦敦古物家协会成立，斯塔克利担任第一任理事长。
1722年 罗格文登上复活节岛。
1723年 斯塔克利在巨石阵附近展开第一次发掘英国古墓的活动。
1727年 德·克莱朗博发掘查特尼－马拉波里墓地，这是对中世纪遗址的首次发掘。
1738年 开始对庞贝和赫库拉尼乌姆进行发掘。
1744年 丹麦的弗雷德里克和蓬托皮丹发掘西兰岛的古墓。
1759年 大英博物馆创立于布卢姆斯伯里区的蒙塔古宅邸。
1763年 汉密尔顿开始在那不勒斯收集希腊陶器。
1764年 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一书出版。
1765年 尼布尔访问波斯波里，认出巴比伦和尼尼微遗址。
1768年 库克船长乘《奋进号》考察澳大利亚东岸。
1771年 埃斯伯在德国盖兰罗依特洞穴发现人骨和已灭绝的动物遗骸。
1776年 第一次在撒哈拉以南展开发掘：斯帕尔曼发掘库克豪斯石丘。
1784年 在北美的第一次发掘：杰斐逊发掘蒙提凯罗土丘。
1788年 在澳大利亚的首次发掘：汉特在杰克森港发掘坟丘。
1797年 弗里尔在豪克森发现旧石器时代的石斧，同时还发现了已灭绝的动物的骨骸。
1799年 发现罗塞达石碑。封·洪堡走访钦穆。
1802年 德农的《游历上下埃及》出版。
1804年 埃尔金将巴台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塑运抵伦敦。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首次发掘波斯波里，发掘人是摩里埃。
1811年 克劳狄乌斯·里奇为巴比伦遗址绘制平面图。
1812年 伯克哈德到达佩特拉。
1813年 拿破仑一世当政时出版《埃及描述》一书。
1815年 茹阿内挖掘孔伯·格莱纳尔和佩克·德勒阿兹的洞穴；第一次在巴勒斯坦发掘：斯坦霍普夫德发掘阿什克伦。
1817年 贝尔佐尼在底比斯发现塞提一世陵墓；汤姆森按照三个时代的体系对哥本哈根丹麦国家博物馆馆藏品进行整理分类。
1819年 首次发掘印度巨石陵墓，发掘人巴宾顿。
1821年 考尔特·霍尔的著作《古代威尔特郡》出版。
1822年 商博良破译埃及象形文字成功。
1823年 巴克兰发现“帕维兰德红赭太太”。
1825年 麦克内里探察肯特山洞。
1826年 托纳尔认为出自比兹的人类骨骸属于史前时代。

1829年　布洛埃特在奥林匹亚。

1831年　达尔文乘"贝格尔号"远航考察。

1833年　赖尔的《地质学原理》一书出版；施梅林在恩基斯发现早期人类墓葬。

1836年　汤姆森的《北方考古指南》一书出版。

1839年　斯蒂芬斯和凯瑟伍德考察中美洲的马雅城市；罗林森解读楔形文字文书。

1840年　莱普修斯考察古代努比亚。

1841年　威尔金森的《古代埃及人的风俗习惯》一书出版。

1842年　布歇·德·彼尔特挖掘芒切科特－莱斯－阿布维尔。

1843年　博塔发掘赫尔萨巴德的萨尔贡二世宫殿。沃索的《丹麦的远古古物》一书出版。

1844年　英国考古协会成立。

1845年　莱亚德发掘尼姆鲁德的阿淑尔纳希帕尔二世的王宫。斯奎尔和戴维斯考察俄亥俄州的土墩建造人。

1846年　拉姆绍尔发掘哈拉斯塔特。

1850年　洛夫特斯考察瓦尔克城（乌鲁克）。

1851年　第一次发掘耶路撒冷，发掘人是德·索尔西。威尔逊的《苏格兰考古与史前编年史》出版。伦敦水晶宫考古展。

1852年　在新西兰的第一次发掘，曼特尔挖掘阿瓦莫阿。罗马－日尔曼中央博物馆在美因兹设立。

1854年　凯勒认出瑞士湖上住宅。泰勒打出进入乌尔兹格拉特神塔的通道。

1855年　史密森学会在华盛顿DC成立。

1856年　尼安德特人遗骸首次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费尔德霍弗被发现。

1858年　斯克瓦伯在拉提恩发掘。马利耶特成为埃及纪念馆馆长。

1859年　查理·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人类的远古时代因布歇·德·彼尔特在阿布维尔的发现而得以确立。

1860年　拉尔泰发掘马萨特和奥瑞纳。菲奥莱里发掘庞贝城。

1863年　拉尔泰和克里斯蒂发掘莫斯特和马格德林。印度第一把旧石器时代的手斧发现于马德拉斯的帕拉瓦拉姆。开罗博物馆在布拉克开馆。赖尔的《人类的古代》和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出版。

1865年　彭杰利发掘肯特郡的洞穴。卢伯克的《史前时代》一书问世。

1866年　阿凯林发掘梭鲁特。威斯特洛普发明"中石器时代"一词，用来表示石器时代的中间阶段。巴勒斯坦考察基金和哈佛大学皮伯迪博物馆成立。

1867年　法国圣杰曼－恩－拉伊国家古物博物馆创立。

1868年　路易斯·拉尔泰发掘克罗马农的旧石器时代的墓葬。

1870年　坎宁安成为印度考古调查总监。

1871年　谢里曼发掘特洛伊。毛奇发现大津巴布韦。达尔文的《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一书出版。

1872年　莫尔蒂耶根据石制工具首次对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分类。

1873年　史密斯发掘库云吉克。

1875年　德国人开始发掘奥林匹亚。

1876年　谢里曼发现迈锡尼竖井墓。

1877年　在日本的第一次考古发掘：莫尔斯发掘大森贝冢。德·萨泽克发掘泰罗。

1879年　索图奥拉在阿尔塔米拉发现洞穴艺术。在科斯提昂基的第一次发掘。美国人种局建立。

1880年　发现戈克斯塔德古船。皮特－里弗斯开始发掘克兰伯恩切斯。首次发掘普列德莫斯提。班德利尔调查新墨西哥州的普韦布洛人。蒙特柳斯《论青铜时代的年代鉴定》一书出版。

1881年　皮特里调查基泽的大金字塔。莫兹利去提卡尔探险。

1882年　三角洲勘查基金会（后来改为埃及考察学会）和维也纳自然史博物馆成立。

1884年　谢里曼发掘提林斯。皮特里发掘塔尼斯和诺克拉提斯。丢拉弗发掘苏萨。首次发掘威尔兰多夫。

1886年　柏林人类文化学博物馆建立。

1887年　发现阿马尔纳泥版书信。皮埃特挖掘马斯德·阿奇尔。

1888年　韦斯瑞尔发现弗德台地的悬崖宫殿。彼德斯发掘阿淑尔。

1890年 皮特里发掘埃尔-亥西土丘。

1891年 希莱特兄弟发掘洛斯·米拉莱斯。

1892年 巴雷德发现格拉斯通伯里的湖上村庄。

1894年 杜布瓦发现爪哇人。

1896年 乌勒发掘帕卡卡迈克。

1897年 维塞洛夫斯基发掘马伊柯普。

1898年 皮特-里弗斯的《在克兰伯恩切斯的发掘》一书完成。

1899年 科尔德威发掘巴比伦。

1900年 伊文思发掘克诺索斯。

1902年 旧石器时代洞穴艺术的真实性得到确认。马歇尔成为印度考古调查总监。哈尔·萨弗里尼地下陵墓被发现。安德烈发掘阿淑尔。

1903年 乌勒发掘埃米里维尔贝冢。

1905年 赖斯纳发掘基泽的门卡列陵。

1906年 对巨石阵进行航空拍摄，这是首次航拍。温克勒发掘赫梯首都博哈兹科依。

1907年 赖斯纳对努比亚进行第一次调查。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

1908年 瓦西克发掘文卡。霍格思发掘卡尔奇美什。美洲研究学院成立。

1911年 宾厄姆到达马丘比丘。皮尔当“化石”首次被发现。

1912年 马歇尔发掘塔克西拉。科辛纳的《德国史前史》出版。

1915年 赫罗兹尼破译了赫梯文字。

1919年 舒哈特的《早期欧洲》一书出版。

1921年 安特生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第一批直立人化石。①

1922年 卡特发现图坦哈蒙墓。布吕耶尔发掘代尔·埃尔-麦迪纳。伍莱发掘乌尔。

1924年 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发现印度文明。达特发现非洲南方古猿塔翁头盖骨化石。阿布索隆发掘多尔尼·韦斯托尼克。卡顿-汤普森发掘法尤姆。基德勒的《西南考古研究》一书出版。

1925年 柴尔德的《欧洲文明的开端》出版。赖斯纳发现赫特弗莱斯墓。布里斯特德发掘米吉多。克罗伯发现纳斯卡线条。斯科普斯“猿猴审判”在田纳西州的戴顿举行。

1926年 发掘新墨西哥的福尔索姆屠牛遗址。利基首次赴东非考察。

1927年 马洛温发掘尼尼微。卡索对瓦哈卡河谷进行考察。

1928年 克劳福德的《从空中俯瞰韦塞克斯》一书出版。

1929年 柴尔德的《史前时代的多瑙河》一书出版。卡顿-汤普森确认大津巴布韦源自黑非洲。加罗德和贝特在卡尔梅勒山发掘。谢弗发掘拉斯沙姆拉。廷达尔在戴文当斯发掘石棚。开始发掘诺夫哥罗德。埃默里和柯万第二次考察努比亚。

1930年 法兰克福特在阿斯马尔土丘发掘。加斯唐发掘耶利哥。步日耶的《史前非洲》一书出版。

1931年 赫茨菲尔德挖掘波斯波里。克罗福特发掘撒马利亚。

1932年 布利根发掘特洛伊。

1933年 科斯切夫斯基发现比斯库平。布鲁姆发掘斯托克方坦。

1934年 惠勒发掘少女城堡。诺兰德在特雷勒堡。斯泰林发现奥尔迈克。

1934年 马洛温发掘查加尔巴扎。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联合考察北方印第安人。

1936年 麦卡锡发掘拉普斯通石棚。

1938年 伯休挖掘小伍德伯里。

1939年 菲利普斯在萨顿发掘。布利根挖掘派罗斯。发掘霍米切尔墓冢。蒙泰发掘塔尼斯。汤姆森的印第安民族考古学。克拉克的《考古学与社会》一书出版。加罗德成为第一位考古学女教授。

1940年 拉斯高洞穴艺术被发现。

1941年 赖歇开始研究纳斯卡线条。

1944年 惠勒担任印度古物总监。

1946年 威利考察维鲁河谷。

1947年 发现死海古卷。鲁丹科发掘帕祖里克土冢。格奥尔基耶夫发掘科拉诺沃。破译赫梯象形文字成功。赫耶达尔探索孔-提基。

1948年 泰勒的《考古学研究》出版。

1949年 利比发布第一次放射性碳素定年成果。

1950年 发现“托兰德人”。索莱基发掘沙尼达洞穴。彼特尔发掘赫尼堡。卡拉奇国家博物馆创立。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年》出版。麦克伯尼发掘哈亚弗提亚。

1952年 凯尼恩发掘耶利哥。

1953年 发现维克斯。皮尔当人的骗局被揭穿。发现西安半坡遗址。

1954年 在基泽发现胡夫的出殡船。

①发现第一个北京猿人头骨时，在现场主持发掘的人是我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后来贾兰坡又发现了3个头骨。参与发掘的还有我国学者杨钟健。发现头骨前，中国学者已发现了一些人类骨骼化石。应该说安特生是发现周口店遗址具有考古意义的人。总之北京猿人的发现是中外考古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译者注。

1955年　亚丁发掘哈佐尔。

1956年　马尔瓦尼发掘弗罗姆斯遗址。

1958年　莫维斯发掘阿伯利·帕塔德。

1959年　玛丽·利基在奥杜威峡谷发现“瘪嘴人”（东非人）。萧发掘伊格布·乌克乌。

1960年　拯救努比亚古迹的国际行动展开。利比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1961年　在奥杜威峡谷发现能人。梅拉特发掘卡塔尔·胡育克。彼德尔发掘温彻斯特。克拉克的《世界史前史》出版。马尔瓦尼的《澳大利亚的石器时代》出版。

1962年　宾福德宣布“新考古学”。勒鲁瓦－古兰发掘阿西－苏尔－居尔洞穴。马尔瓦尼发掘肯尼夫洞。

1963年　亚丁发掘马萨达。

1964年　勒鲁瓦－古兰发掘潘瑟旺。

1965年　首次挖掘列潘斯基·维尔。霍金斯的《巨石建筑解密》一书出版。

1967年　马利纳多斯发掘阿克罗提利。

1968年　克拉克的《分析考古学》和宾福德的《考古学的新视角》问世。重建阿布·辛拜尔。

1969年　蒂克西埃发掘克沙·阿吉尔。在曼古湖世界最古老的火葬。

1972年　恩格尼奥在库比·弗拉发现“1470”号猿人。

1973年　科尔斯在萨默塞特郡发掘。伦弗鲁的《史前文明》一书出版。

1974年　在西安附近发现兵马俑。约翰松在哈达尔发现“露西”（南方古猿阿法种）。

1976年　发掘约克郡的铜门。

1977年　发现哈什多夫。发掘佛吉纳。

1978年　玛丽·利基挖出拉依托里的猿人脚印。破译马雅象形文字成功。

1979年　菲莱神庙得到重建。

1982年　《玛丽·罗斯》得到发表。

1984年　发现“图卡纳男孩”。巴斯水下发掘乌鲁·布鲁恩的沉船。发现“林多人”。

1991年　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的希米劳恩隘口发现5000年之久的“冰冻人”。

1994年　发现格罗特·乔威特岩石艺术。

进一步阅读书目

保罗·G·巴恩:《考古的故事: 100次伟大的考古发现》、纽约、伦敦、1995年版。

I·伯纳尔:《墨西哥考古史》、伦敦、1980年版。

C·W·策拉姆:《神、洞穴与学者—考古学研究》、纽约、1951年版。《第一个美洲人—北美考古的故事》、纽约，1971年版。

D·K·凯克拉巴提:《1947年以前的印度考古史》,新德里,1988年版。

J·G·D·克拉克:《剑桥及其周边地区的史前史》,剑桥，1989年版。

G·丹尼尔:《考古学的起源与发展》,1967年版。《考古学150年》,伦敦,1975年版。《考古简史》,伦敦,1981年版。《走向考古史》,伦敦、1981年版。

G·丹尼尔和C·奇彭代尔:《过去的主人——11位现代考古学的先驱》、伦敦、1981年版。

G·丹尼尔和C·伦弗鲁:《史前史的观念》、爱丁堡、1988年版。

……

M·埃利奥特:《伟大的发掘——西南部早期考古的故事(1888-1939)》

B·费根:《尼罗河的洗劫: 埃及的盗墓者、旅游者和考古学家》、纽约、1975年版。《被遗忘的珍宝: 美国早期考古学家的故事》、纽约、1977年版。

B·哥拉斯伦德:《史前编年史的诞生》、剑桥、1987年版。

D·K·格雷森:《人类古迹的再现》、纽约、1983年版。

……

D·豪顿:《再现过去的踪迹—澳大利亚考古的故事》

O·科林特·詹森:《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史》, 伦敦、1975年版。

……

S·利奥伊德:《尘封的地基——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历程》、伦敦、1980年版。

J·马利娜、Z·瓦西克:《考古学今昔》、剑桥，1990年版。

B·M·马斯登:《早期的掘墓人》,《史前史的先驱: 英国考古界的领袖和里程碑(1500-1900)》

B·诺曼:《足迹: 9次考古发现的浪漫之旅》, 伦敦、1987年版。

S · 皮戈特:《废墟风景——文物工作者文集》, 爱丁堡, 1976年版。

J · E · 雷曼:《再现过去: 美国考古学论文集》

P · 罗伯特肖:《非洲考古史》, 伦敦, 1990年版。

……

N · A · 西尔贝曼:《为上帝和国家发掘——考古发掘及为了圣地的秘密斗争(1799—1917)》, 纽约, 1982年版。

K · 斯克莱那:《中欧的考古——第一个500年》。

W · H · 斯提宾:《再现过去——考古史》

B · G · 垂格:《考古思想史》, 剑桥, 1989年版。

A · B · 范-瑞珀:《猛犸象中的人类——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及人类史前史的发现》, 芝加哥, 1993年版。

G · R · 威利:《回顾考古研究》, 剑桥, 1974年版。《美国考古肖像——回忆杰出的美国考古学家》。新墨西哥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G · R · 威利, J · A · 塞布鲁夫:《美国考古史》, 第3版, 纽约, 1993年版。

该书涉及到不计其数的个人传记和自传。以上书目仅作为进一步阅读的参考。

上面的译文是本书"进一步阅读书目"英文部分的内容。要想了解本书目的全部内容、同时又有法语、德语等外文阅读能力的读者, 可参阅下面本书外文版的原文。

Further Reading

Bahn,P.G.(ed.)1995.The Story of Archaeology: 100 Great Discoveries.NewYork:Barnes and Noble; London:Weidenfeld & Nicholsn.
Bernal,I.1980.A history of Mexican Archaeology.Londona:Thames and Hudson.
Ceram, C.W.1951.Gods, Graves and Scholars:The Study of Archaeology. New York:Knopf.
__________,1971.The First American.A Story of North American Archaeology.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hakrabarti,D.K.1988.A History of Indian Archaeology from the beginning to 1947.New Delhi: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Clark,J.G.D.1989.Prehistory at Cambridge and Beyo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niel, G.1967.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Archaeology. Harmondsworth:Pelican.
__________,1975.150Years of Archaeology.London: Duckworth.
__________,1981.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London: Thames and Hudaon.
__________,(ed.)1981.Towards a History of Archaeology. London:Thames and Hudson.
__________and Chippindale,C.(eds.).The Pastmasters.Eleven Moderm Pioneers of Archaeology.London:Thames and Hudson.
__________,and Renfrew,C.1988.The Idea of Prehistory.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Daux,G.1966,Histoire de l'Archèologie.'Øue sais-je?'No.54.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Duval,A.(ed.)1992.Ka Prèhistoire en France.Musèes,Ecoles de Fouille,Associations du XIXe Siecoeànos Jours.Actes du 114e Congrès National des sociètès Savantes(Paris 1989).Paris: Editions du Comiteesd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Elliott,M.1995.Gteat Excavations:Tales of Early Southwestern Archaeology, 1888-1939.Santa Fe: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Fagan,B.1975.The Rape of the Nile:Tomb Robbers,Tourists and Archaeologists

in Egypt.New Ykork:scribner.
________,1977.Elusive Treasure.The Story of Early Archaeologists in the Americas.New York:Scribner.
Gräslund,B.1987.The Birth of Prehistoric Chronolog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ayson,D.K.1983.The Establishment of Human Antiqui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roenen,M.1994.Pour une histoire de la Préhistoire.Grenoble: Jérôme Millon.
Horton,D.1991.Recovering the Tracks.The Story of Australian Archaeology.Canberra:Aboriginal Studies Press.
Klindt-Jensen,O.1975.A History of Scandinavian Archaeology. London:Thames and Hudson.
Laming-Emperaire,A.1964.Origines de L'Archéologie préhistorique en France. Paris:Picard.
Lartet,Breuil,Peyrony et les autres.Une histoire de la préhistoire en Aquitaine. Paris:Ministère de la Culture,1990.
Lloyd,s.1980.Foundations in the Dust.The story of Mesopotamian Exploration,(2nd edn).London:Thames and Hudson.
Malina,J.and Vašiček,Z.1990.Archaeology Yesterday and Toda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sden B.M.1974.The Early Barrow-Diggers.Princes Risborkugh:Shire Publications.
________,1984.Pioneers of Prehistory.Leaders and Landmarks in English Archaeology(1500-1900).Ormskirk:Hesketh.
Norman,B.1987.Footsteps.Nine Archaeological Journeys of Romance and Discovery.London:BBC Publications.
Piggott,S.1976.Ruins in a Landscape:Essays in Antiquarianism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Reyman,J.E.(ed.)1992. Rediscovering our Past: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ldershot:Avebury.
Robertshaw,P.(ed.)1990.A History of African Archaeology. London:James Currey.
Schnapp,A.1993.La Conquête du passé.Aux Origines de l'Archéologie. Paris: Editions Carré.
Silberman, N.A.1982.Digging for God and Country. Exploration,Archaeology, and the Secret Struggle for the Holy Land,1799-1917.New york:Knopf.
Sklenár, k.1983.Archaeology in Central Europe:the first 500 Years.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Stiebing,W.H.Jr.1993.Uncovering the Past: a History of Archaeology.Buffalo: Prometheus Books.

Trigger,B.G.1989.A History ofArchae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Riper,A.B.1993.Men Amony the Mammoths.Victorian
Science and the Discovery of Human Prehistory.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Willey,G.R.(ed)1974.Archeological Researches in Retrospect.
Cambridge,Mass:Winthrop.

__________,1988.Portraits in American Archaeology.Remembrances of some distinguished Americanist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__________and Sabloff,J.A.1993.A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eology,(3rd edn).New York: Freeman.

图片致谢

在编撰本书各类插图时，有许多组织和个人给予了帮助，由于不能一一署名，出版者在此特致谢意。在获准使用各种图片资料版权的过程中，许多组织和个人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出版者在此亦一并致谢。若有遗漏和忽略，出版者表示歉意并欢迎指正。

以下为本书英文版“致谢”的有关内容。英文中的阿拉伯数字为原版书的页码。

The following abbreviations have been used:

b:bottom; t:top; l:left; r:right; AAA-Ronald Sheridan/Ancient Art and Architecture Collection;AM-Ashmolean Museum,Oxford;BAL-Bridge-Man Art Library; BL(British Library)-by Permiss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BM(British Museum)-(c)British Museum;CUL(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by permission of the Syndic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RMN-Reunion des Musees Nationaux,Paris;MNHN-Muse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Paris;UC-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 AM ii/iii Royal Collection,Belgium/BAL.viii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x Národni Galerie v Praze.xi A.von Morlot 'Underwater excavation 1854'/Berni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Bern.xiii Benelux Press,Brussels.Xiv BL,MS Harley 4337 folio 2.3 BM.4AAA.5 Bibliotheca Hertziana,Rome.6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7 BL Cotton MS Nero DI.8'St.Genevieve Gardant ses Moutons'; © DACS 1996.9 BL,MS Egerton 3028 folio 30.10 Biblioth è que Nationale,Paris.12 Life File;photo Emma Lee.14/15 © 'Leiv Erikson oppdager Amerika';by Christian Krohg 1893/photo© Nasjonalgalleriet, Oslo.16National Palace Museum,Taipei,Taiwan,Republic of China.18 The Whitworth Art Gallery,University of Manchester.20 AM.23 Map from Eduardo Matos Moctezuma The Great Temple of the Aztecs,Treasures of Tenochtitl ó n Thames and Hudson 1988.24 From Felipe Guaman Nueva Cor ó nicay Buen Gobierno Universit é de Paris 1936.25 Werner Forman Archive/ Biblioteca Universitaria,Bologna,Italy.26E.T.Archive.28Gemaldegalerie,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Vienna/BAL.30BAL.32Life File;photo nigel Sitwell. 34 By courtesy of 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36t Th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36b CUL.37 BL,MS Harley 4339 folio 2.39 BM/BAL.41CUL.42/

3BM.44/5By courtesy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V&A/BAL.47BM.48/9Städelsches Kunstinstitut Frankfurt/Artothek,Peissenberg; photo Blauel/Gnamm.51 The Office of public Works,Dublin.52t CUL.52b CUL;engraving taken from Metallotheca.53 Landesmuseum Oldenburg;photo H.R.Wacker.55 Wiltshire Archaeological and Natural History Society,Devizes.57t City Museum and Mappin Art Gallery,Sheffield.57b County Archive Service,Humberside County Council.58 Fitzwilliam Museum,UC.59 National Trust photographic Library;photo John Hammond,61Townley Hall Art Gallery and Museum, Burnlley/BAL.63 Museum of Classical Archaeology,UC.64BM.65 Bibliothèque Centrale MNHN,Paris.681 Louvre/BAL.68r From C.Hobson The World of the pharaohs Thames and Hudson.69CUL.70BM.72Comstock;photo Dr George Gerster.73 Cecil Higgins Art Gallery,Bedford/BAL.74BM.77Private Collection/BAL.78Art Gallery of Western Australia,perth.79 The Saint Louis Art Museum MO.80/1 gustave Boulanger,L'a Repetition du 'Joueur de Flū te'et de 'la femme de Diomede'dans l'atrium de la Maison pompeienne du Prince Napoleon en 1860,Versailles;(c) photo RMN 83 Hamburger kunsthalle. 84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Amiens.85 AM.86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88, 89 The National Museum, Copenhagen.90 Det kongelige Bibliotek,Kφbehavn. 91 CUL.92 Royal Ontario Museum.93 BM/BAL.95 Swiss

National Museum,Zürich,LM-30486;photo Schweiz, Landesmuseum.96 Museum Hallstatt;photo Max Singer.97 CUL.98 Stapleton Collection/BAL. 100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101 O'Shea Gallery,London/BAL.105 Christie's Images.106BM. 107 Comstock.108BM .110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Nationalgalerie; photo Klaus Göken, 1992.112CUL; from Frederick Catherwood The Views of Ancient Monuments of central America,Chiapas and Yucatán 1884 .113 Comstock.115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Art,Smithsonia Permlet Art Resource/BAL.116/17 Robert Harding picture Library/Robert Frerck.118CUL.120 MNHN,Paleontologie; Photo D. Serrette. 121 Robers S.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over, MA. 122 Musee des Antiquites Nationale Paris.123 Institut de Paleontologie. Humaine,Paris.124/5 Jean Vertut,Issy-les-Moulireaux.126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Picture Library.127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128 Alexander Marshack,New York.130 University Museum of National Antiquities,Oslo. 132 By kind permission of G.A.Pitt Rivers.134 University Museum of National Antiquities,Oslo.136/7 Saalburgmuseum.Bad Homburg.138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Museum für Vor-und Frühgeschichte.140 Robert Harding Picture Library;photo Adam Woolfitt. 141 Deutsches 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Athen,Athens.143 Hulton/Syndication. 144AAA. 146AM.147 Tony Stone worldwide ;photo Trevor Wood.148/9.151 Petrie Museum of Egyptian

Archaeology,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152 AM.153 Louvre/RMN156 Robert Harding Picture Library,159 CUL.from William J.Hamilton Researches in Asia Minor, Pontus and Armenia 1842. 161 BM.163 Tony Stone Worldwide; Photo Sarah Stone.164 Hulton Deutsch Collection. 165 The Semitic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168 Robert Harding Picture Library.171 BL.173 CUL; from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1912.175CUL.177Comstock; photo Dr George Gerster.179BM.180 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181 Hulton Deutsch Collection.183 Canterbury Museum, New Zealand,ref:3047.184/5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picture Libray. 188 Werner Forman Archive. 191 peabody Museum,Harvad University. 193 Tony Stone Images;photo Ed Simpson.194 BM.196/7 The Griffith Institute,AM.198,201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201r popperfoto.202British Crown Copyright/MOD.203t/b Michael Holford.204 BM.205 Michael Holford.208 photothèque Musée de l'Homme, Paris.209 Jean Vertut,Issy-les-Moulineaux.212 AAA. 215 Archives du Musee Bégouen,Montesquieu-Avantes. 217 The Times Magazine,London;photo Graham Wood.220 Anthony Harding.222 From Glyn Daniel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Thames and Hudson 1981.224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Univrsity College London.225 Event Horizons-David Lyons.227 Michael Holford.228 Fitzwilliam Museum,UC.230 Archaeological Receipts Fund,Athens.231 AAA. 232 Bruce Coleman Limied;photo Kim Taylor.233 Antonia Benedek.235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picture Library.237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239 Keystone/sygma.240,241 The Griffith Institute,AM.242 Michael Holford.244 Courtes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46 BM.249 AM.251 Ministry of Culture/Garo Nalbandian, Jerusalem.253 Robert harding Picture Library.256,257 Mortimer Wheeler.258 BM/BAL.260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Medicai School,Johannesburg.262 Bruce Coleman Inc.,New York.263 Anne Mcburney.264 Kathie Atkinson,Pymble NSW.267 D.J.Mulvaney,Canberra.268 Werner Forman Archive/Maxwell Museum.269 Photo Archives,Denver Musem of Natural History,all rights reserved.272 Werner Forman Archive/Anthropology Museum,Veracruz University,Jalapa.275 Archaeological Survey,Provincial Museum of Alberta. 276/7 Comstock.280/1 Michael Holford.283 MickSharp,Caernarvon.285Württembergisches Landesmuseum Stuttgart.286 Comstock;Photo Dr George Gerster. 288 Event Horizons-David Lyons.290 Cahokia Mounds State Historic Site, Collinsville IL;Painting Lloyd K.Townsend.292BM/BAL.295 Hulton Deutsch Collection.297 The Irish Times,Dublin 298 Novosti(London).300 The Vindolanda Trust,Hexham.302 Bill Curtsinger,Yarmouth ME.304l Brigitte and Gilles Delluc.304r Jean Vertut,Issy-les-Moulineaux.305 Paul Bahn.307 The Manchester Museum.308 Idryma Theras-Petros M.Nomikos,Piraeus,Greece.311 VBB, Stockholm.313Comstock.314 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Jerusalem.316 Gordon

Hillman,Institute of Archaeology,London.317 Courtesy James Mellaart;Photo Arlette Mellaart.322 Paul Bahn.323 Glynn Isaac.325Bob Campbell,Nairobi. 327 Nanci Kahn,Institute of Human Origins,Berkeley CA.328 John Reader/ Science Photo Library.330 Thurstan Shaw,Cambridge.331 Shirley Ann Pager.332 Jim Bowler.334 D.J.Mulvaney,Canberra.335 Rhys Jones.339 Paul Bahn.340,341 Comstock;Photo Dr George Gerster.344 Robert Harding Picture Library;Photo Adina.Tovy.346 Robert Harding Picture Library;Photo Michael J.Howell.348 Michael Holford.350 AAA.352/3 Michael Holford 354 Universität Innsbruck.356 Gertrude Bell Archives,University of Newcastle,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357 F.H.E Archives,Albqerque NM;Photo Frederica de Laguna. 359 BM.360/I The Age,Melbourne.363 Associated Press,London.365 Michael Holford.366 The Times Newspapers Limited:Photo Graham Wood.367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The Cesnola Collection,Purchased by subscription,1874-1876(74.51.4554).369 Giraudon/BAL.372 Courtesy of Bari State University,Italy.

译后记

19世纪以来，随着人类自我认识的速度加快，程度加深，人文学科的各个部门都脱离了常人之学，成为少数专业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领地，这当然是伟大的历史进步。但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不存在没有副作用的进步，因为人类本身是永远不完善和有局限的。就考古学而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同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保持联系。实际上，没有通畅的社会联系，任何学科都不会拥有持久的活力。国外考古学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这本《剑桥插图考古史》就是他们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尝试。

作者采用平易近人的态度，抛弃艰涩难懂、枯燥无味的的专业术语、数据和图表，避免莫测高深的长篇大论，娓娓讲述考古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人”的故事，并且力求寓论断于叙事。尽管书中还有技术语言的痕迹，且书成众手，内容选择、组织和表达的质量参差不齐，但基本上能够使一个没有多少考古学知识准备、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顺利阅读和体味书中的内容。这对我国考古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应该并且如何亲近社会的范例。

当然，书中不只是关于探幽猎奇、满足读者好奇心的故事，而且还有关于考古学的理论认识史的介绍，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思考取鉴的地方。比如考古学要警惕变成新古物学的危险，应注意探讨古文物中人的情感和思想；考古学要不断吸取人类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考古学具有政治意义，应促进人种或种族的和谐，服务于人类；考古学认识是有主观性的，人们在不断改写着考古学史，因此也在不断改写或创造着人类的历史。所以考古学认识是无止境的；考古学不是学界精英的智力游戏，需要与社会保持血肉联系，得到公众的支持、考虑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兴趣等等。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考古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也有许多工作可做。

山东画报出版社在普及社会科学智识（不只是知识）方面已做出不少抢眼的成绩，《老照片》、《老漫画》等雅俗共赏的“畅销产品”便是明证。这次出版社又选择了体现自己特色的《剑桥插图考古史》等选题，体现了编辑们的眼力。

写作一部世界范围内的史书不是容易的事，因为知识分工越来越细，通英国考古，未必懂中国考古；懂中国史前考古，未必懂秦汉考古。所以书中史实上出现了少量错误，某些价值陈述也有一些与我们接受的价值解释不大一致甚至背谬的地方，是可以理解的。希望读者对此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我们最担心的是因自己学力的局限而造成翻译上的失误，从而误导了读者。因此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对这个译本提出批评。

郭小凌

1999年8月1日于北师大